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夏铸九 黄慧琦 等译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千年终结

END OF MILLENNIUM

“本书是目前描绘全球信息化时代轮廓的最杰出的成就”。

——安东尼·吉登斯：《新政治家》

“本书是达到巅峰的成就。卡斯特成功的研究绝对可以和马克思相互比拟，如同马克思的《资本论》旨在分析早期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机制和社会冲突，卡斯特的三部曲的目的在于了解这个正被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所取代的系统。他已经如此地设定了自身终极的挑战，而他确实也完成了这项使命”。

——彼得·霍尔：《城市》

“继韦伯之后，社会科学界探讨社会变迁最具影响力且极为成功的努力成果。我们不仅希望社会科学界能阅读此书，同时也特别希望经济学者能够阅读此书。因为相较于其他人，最需被提醒的是韦伯是一个经济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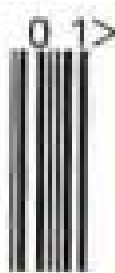
——诺思·博立曼：《新政治经济》

“一部空前的巨作，在我看来此三部曲之著作至少是目前当代社会分析最好的作品”。

——法兰克·韦伯斯特：《英国社会学期刊》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532-2



9 787801 495327

译者名单：“信息时代三部曲”：J. L. Hillman
ISBN 7-80149-532-2 / ¥ 107.00
定价：(C-卷) 49.00元 (D-卷) 58.00元

信息时代三部曲：
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三卷

千年终结

END OF MILLENNIUM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 黄慧琦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终结/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 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
ISBN 7-80149-532-2

I. 千… II. ①曼…②夏…③黄… III. 信息社会—理论—研究 IV. G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9990号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第三卷)

千年终结



著 者:曼纽尔·卡斯特
译 者:夏铸九 黄慧琦 等
策 划:薛晓源
责任编辑:严 波 许春山 曹荣湘
责任校对:闫晓琦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电话65137751 邮编100005)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开
印 张:15.5
字 数:348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532-2/F·159
定价(共三卷):99.00元(每卷33.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2-0185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anuel Castells

THE END OF MILLENNIUM

© Manuel Castells 2000

英国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授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中文简体字独家专用权。本书根据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年版译出

译者分工与说明

前言和结论：夏铸九；

第一章：黄慧琦；

第二章：黄慧琦、吴锦嫣；

第三章：陈国伟；

第四章：夏铸九、黄慧琦、翁注重、杨友仁；

第五章：黄慧琦

总校订：夏铸九

前言 一个变动的时刻

千禧年翻转被认为是一个变动的时刻。但未必如此：总的来说，第一个千禧年结束就没有什么大事发生。^①至于第二个千禧年，对那些等待某种预言的人，得满足他们自己预期千年虫（Y2K）全球电脑崩溃——它没有发生——所带来的情绪。并且，若严格地依时间先后记载之术语而言，第二个千禧年终结于公元2000年12月31日午夜，而非大部分人庆祝的1999年。更进一步地说，千禧年的改变也不过是依照基督教的格列高利的历法而来，而这样的少数人宗教在以多元文化主义为特色的21世纪中将会失去它原有的光彩。

然而，不管我们度量时间的方式如何，这的确是一个变动的时刻。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期间，一场以信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思考、生产、消费、贸易、管理、沟通、生活、死亡、战争，以及做爱的方式。一个动态的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球

① 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9年10月8日说的话可以做为本书中译本之读者与华人世界面对历史之注脚：上一个千年，当时欧洲正处在中世纪，北美洲还没有被发现。而中国正处于北宋初期，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回顾历史，国力的消长与兴衰都是有迹可寻的，一个城市也不会永远不变。



各处建构起来，将全世界有价格或价值的人及活动联结在一起，但那些与支配利益者无关的人与地，它们与权力和财富的联结网络却被关闭了。一个真实虚拟的文化，围绕着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视听宇宙被建构起来，渗透到每一处精神表征和沟通传播中，以电子超文本整合文化的丰富性。空间与时间，做为人类经验的物质基础，已经被转化了，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废除了工业年代的时钟时间。(p.1)^① 对抗信息化与全球化逻辑的社会的表达，围绕着原初的认同而建构起来，形成以上帝、地域、种族或家庭之名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性社区。在此同时，要建立父权家长制和民族国家等如此位高权重的社会制度将会在信息和财富的全球化以及认同与合法性的地方化相互结合形成的压力之下引起质疑。

我已在前两卷分析了这些结构变动的过程及其引发的宏观的政治与社会脉络的基本转化，所塑造与决定的全世界人类经验与社会行动。本卷将继续探索此一宏观转化，试着将它们解释为几种具有信息时代特性的过程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结果：如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认同的建构、父权家长制与民族国家的危机等。虽然并不是所有历史变动的重要向度都包含在本卷的论述中，但我认为在以下各章中所罗列与分析的趋势的确建构了一种新的历史图景，它的动力很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后代子孙的生活造成持续性影响。

本卷以苏联的解体为分析的起点并非偶然。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点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现象。共产主义与苏联，与对抗性的回应，曾触动整个世界，并深深地影响整个世纪的社会与人民。然而，此巨大的帝国与其强大的神话，却在短短几年中崩溃了，成为全无预料的历史

① 此为英文版原来的页码，为便于读者参照和索引附于内文中，其后各页依此，不再赘述。

变动中的最离奇例子。我认为此过程的根源，显示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表现出国家主义无能处理向信息时代的过渡。第一章将试提供这个陈述的经验性基础。

苏维埃共产主义终结、中国共产主义仓促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之后，只剩下更精明、更刻薄的新品种资本主义^①将触角延伸到全球各角落。在20世纪7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期间资本主义的重构，显示出它操作规则变通自如与它有效使用信息时代网络逻辑的能力，造成生产力与经济增长上的戏剧性跳跃。然而，它也展现了其排他性逻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的人民与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被排除在信息主义利益之外。(p.2)第二章记录了这些趋势，这与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不受管控的性质有关。进一步，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一种新的集体已经出现了，可能在未来几年改变经济与政治制度的规则：全球犯罪。事实上，他们利用苏维埃帝国崩溃后世界的失序状态，操纵被正式经济排除了的人口与地域，并使用全球网络为工具；其犯罪活动扩及全球，彼此连接，建构出一个正在浮现的全球犯罪经济，渗透金融市场、贸易、企业与所有社会的政治系统。这个异常的联结是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中一个显著的特征，但其重要性通常由媒体中获知，并未整合在社会学分析中，在本书第三章里我会尝试着纠正此理论性的瑕疵。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成长也有了非同寻常的扩张，其发展过程影响到千百万人，特别是在亚太区域（第四章）。继日本的发展之后，中国、印度、东亚与东南亚有活力的地区，进入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改变了历史，建立了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多重文化基础：这标志着做为工业时代发源地的西方世界支配地位告

^① 相对于所谓“小而美”的公司组织与资本主义重构，资本主义其实是变得“更精简”，更精明刻薄了，可参考本书第一卷第三章及班奈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Lean and Mean》一书（1994）的说法。

终。然而，亚太地区命运的戏剧性变化，为1997~1998年金融危机所震动，透露出新全球资本主义不稳定。第四章所分析的亚洲的发展与危机间的互动，乃是全球化与国家间张力渐增的一种表现。

面对全球化旋风及过去也曾发生过的世界文化与地缘政治基础重新改组，欧洲国家要合并在一起，致力于象征性地统一货币，继而在世纪之交统一经济，这些并非没有问题（第五章）。然而，文化与政治向度，欧洲统一不可或缺的向度，却仍然没有解决。以至于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区域一样，欧洲的命运终将取决于其如何解决信息主义转型，以及在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的形式下由民族国家转向民族和国家的新互动关系所带来的历史难题。

在审视宏观社会/政治转化并界定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议题之后，（p.3）我会以一种更分析性的方式总结全书。这不但关乎本卷所提出的主题，而且关乎这些主题与前两卷分析的社会过程间之连结。多亏读者耐心，本卷的结论会提出一些素材来建构一个开放式的、信息时代的社会理论。这也就是说，在探索了我们的世界之后，我会尝试理解我们的世界。（p.4）

这是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的最后一卷，内容集中在探索网络和认同的互动所诱发的全球社会变迁。

本卷《千年终结》以对苏联的崩溃研究为开端，追本穷源将之归结为工业国家体制对向信息时代进程的失控。在这一卷中，作者论证了世界的的不平等、两极分化和社会排斥等现象的日益严重，聚焦于非洲、都市贫困以及儿童的困境。此外，卡斯特还论证了深深影响着许多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球犯罪经济形态。他分析了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所爆发的危机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同时也回顾了欧洲统一的矛盾，并提出网络国家的概念。

作为三部曲的总结，在本书中卡斯特将其论证和发现的线索收拢编织在一起，为此千年终结的世界展现一个系统性的诠释。

目 录

前言 一个变动的时刻.....	1
工业国家体制的危机及苏联的崩溃	1
经济增长的扩张模型以及超工业主义的极限.....	6
技术问题	25
认同的诱拐及苏维埃联邦主义的危机	38
最后的改革	49
民族主义、民主，及苏维埃国家的解体	59
历史的伤痕、理论的教训及社会的遗产	65
第四世界的兴起：信息化资本主义，贫穷与 社会排斥	73
朝向两极化世界的全球概况	79
非洲的非人性化	92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信息化/全球经济 中排除和选择性的整合	92
非洲在信息时代黎明的技术隔离.....	103



掠夺性的国家·····	106
扎伊尔：为个人所占有的国家·····	110
阿尔及利亚：石油、种族与军事掠夺·····	112
种族认同、经济全球化、及非洲的国家结构·····	116
非洲的苦难·····	127
非洲的希望？南非连结性·····	134
远离非洲或返回非洲？自力更生的政治学与经济学·····	140
美国的新困境：信息时代的不平等、都市贫困及 社会排斥·····	142
二元的美国·····	143
城市内少数民族聚集的贫民区乃 是一种社会排斥系统·····	156
当底层阶层坠入地狱·····	165
全球化、过度剥削以及社会排斥：从儿童的处境 而得的观点·····	170
儿童性剥削·····	177
儿童的死：战争屠杀与少年士兵·····	180
为何儿童遭到杀害·····	182
结论：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	185
异常的联结：全球犯罪经济 ·····	190
犯罪组织性和全球化，罪犯之文化认同·····	193
俄罗斯之劫·····	208
结构性角度之观察·····	212
谁是参与者·····	214
积累的机制·····	217

拉丁美洲地区的毒品非法交易产业、发展与依赖·····	223
拉丁美洲贩毒产业的经济重要性是什么?·····	228
何以是哥伦比亚?·····	231
全球犯罪结构对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237
第四章 亚太的发展与危机：全球化与国家 ·····	243
亚太命运的改变·····	243
平成时期的日本：发展中国家与信息社会·····	251
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模型·····	255
下降的太阳：日本发展模型的危机·····	265
“永田町政治”的终结·····	277
发展中国家和信息社会：一个矛盾的关系·····	281
日本和太平洋区域·····	288
龙途末路？亚洲四小龙及其公民社会·····	289
了解亚洲的发展·····	290
新加坡：经由多国公司营造民族的国家·····	292
韩国：垄断性资本主义的国家生产·····	295
台湾：在无弹性管制指导下的弹性资本主义·····	300
香港模式与香港现实：世界经济中的小型企业和福利 社会的殖民地版本·····	305
龙的品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310
东亚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论发展中国家的概念·····	318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求生存的政治到民族 营造的过程·····	320
东亚再结构中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发展中国家 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成功·····	325



分道扬镳：经济危机中的亚洲小龙·····	329
90年代东亚的民主、认同和发展·····	336
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发展中的民族主义·····	345
新中国革命·····	345
关系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中国·····	350
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官僚（资本主义）	
企业家·····	355
民主、发展和民族主义在新中国·····	360
结论：全球化与国家·····	367
■ 欧洲的统一：全球化、认同和网络国家·····	372
欧洲统一是一连串防卫性的回应：以半世纪来的	
视野出发·····	374
全球化和欧洲的整合·····	383
文化认同和欧洲统一·····	392
欧洲的制度：网络国家·····	397
欧洲认同或欧洲计划？·····	400
■ 理解我们的世界·····	402
新世界的开端·····	403
一个新社会·····	408
社会变动的新大道·····	420
越过这次千禧之后·····	422
怎么办？·····	428
终场·····	429

■ 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

——在大洋彼岸与虚拟世界哲学家卡斯特对谈·····	432
第四世界意味着什么·····	433
科技将我们带向何方·····	435
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	436
中国能够做些什么·····	439
■ 附录 ·····	443

图 目 录

- 图 1-1 1928~1987 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几种评估方式
..... 11
- 图 1-2 苏联的国民收入：各项投入对产出成长的贡献 12
- 图 1-3 1951~1980 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增长率是
每三年的平均值，图示以在中间那一年来表示 17
- 图 2-1 以 55 个国家为例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86
- 图 2-2 国际的网络（互联网）联结 104
- 图 2-3 人均食物产量 129
- 图 2-4 非洲每百万人的艾滋病比例 131
- 图 2-5 1947~1997 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平均年变化率 ... 144
- 图 2-6 (a) 1973~1997 年美国男性实际计时工资不同
百分位组群的变化趋势 146
- 图 2-6 (b) 1973~1997 年美国女性实际计时工资不同百分位
组群的变化趋势 146
- 图 2-7 美国家庭收入平均变化率，1947~1997 年 148
- 图 2-8 1973~1997 年美国劳动者中低收入阶层的比例 ... 155
- 图 2-9 1850~1991 年美国的监禁比例 166



图 2-10	第四世界的崛起	167
图 3-1	1993~1999 年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	204
图 3-2	俄国非法和犯罪网络的演化	222
图 4-1	1955~1985 年日本发展的社会模型	257
图 4-2	1976~1996 年日本股票和土地的价值	269
图 4-3	1950~1985 年香港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结构	311

表目录

表 1-1	1928~1987 年苏联国民所得增长：几种评估方式	8
表 1-2	1928~1990 年苏联的产出与通货膨胀	9
表 1-3	1928~1990 年苏联的投入与产值	10
表 1-4	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以及投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产出/资本的比例	15
表 1-5	1987 年各共和国之间生产与资源的交易余额	46
表 1-6	1989 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民族组成	48
表 2-1	以 55 个国家为例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80
表 2-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于 1979 年之后 收入不均等的变化	85
表 2-3	1980~1996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94
表 2-4	1950~1990 年全世界、欠发达国家以及南撒哈拉 非洲国家出口值的比较	95
表 2-5	1990 年出口的结构	96
表 2-6	南撒哈拉非洲主要的生产项目占世界出口的比例	97



表 2-7	1985~1994 年非洲一些国家的贸易项目数·····	98
表 2-8	1965~1989 年部门增长率·····	99
表 2-9	1987 年非洲一些国家城乡地区成人 (15~49 岁) 艾滋病流行率估算 ·····	133
表 2-10	1977~1999 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	149
表 4-1	1979~1992 年中国的相对海外直接投资来源 ·····	253

第一章 工业国家体制的 危机及苏联的崩溃

如果苏联能生产 5000 万吨生铁、6000 万吨钢、5 亿吨煤、6 亿吨石油时，我们就能保障自己不受任何不幸的侵害。

——斯大林 (Stalin)，1946 年 2 月演讲^①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的需求日增，另一方面则是老式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生产关系日益落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一年比一年明显，经济结构的保守、广泛投资的倾向和落后的经济管理体系结合在一起，逐渐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与障碍。(p.5)

——阿贝尔·阿甘贝良 (Abel Aganbegyan)，《重建的经济挑战》第 49 页

世界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体系或经济地位如何，都不能自绝于世界经济之外，而得到正常发

^① 引自门希科夫 (Menshukov, 1990: 72)。

展。基于此，就应将重新设计一个彻底翻新的世界经济运作机制，迎合国际分工的新结构的这种需要，纳入我们的议事日程，同时，世界经济的成长已露出传统工业化形态的内在矛盾与限制。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联合国大会演说，1988^①

有一天我们会了解到：我们是地球上惟一一个想用 19 世纪的意识形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国家。

——叶利钦，《回忆录》，1990，第 245 页^②

苏联突然崩溃，以及伴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失，引出了一个历史之谜：为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苏联领导者迫切从事的重建工作，最终竟导致苏维埃国家的瓦解？毕竟苏联不只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三大工业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稀有金属生产国，在能源和原料上惟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的确，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苏联就承认有严重的经济缺陷存在，其增长率自 1971 年起就一直递减，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增长率为 0，可是整个西方经济在过去二十年内生产力亦是减缓，有某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也没有遭遇到灾难性的后果。苏联的技术在某些关键的领域似有落后的现象，可是总体而言，苏联科学在基础学科上一直维持着优秀的水平：数学、物理、化学都如此，惟有生物学因为李森科 (Lysenko) 事件的错误，一时之间还恢复不过来元气。从 20 世纪 80 年代表现优于美国太空总署的苏联太空计划来看，其科学能力在技术升级方面的扩散和表

① 重刊于《苏维埃生活》1989 年二月份特别专辑，以及塔拉索洛 (Tarasulo, 1989: 331)。

② 我们的英译。

现并无力有未逮之处。另外，农业虽然一直处于危机中，但消费品的短缺已成为习惯，而且能源与原料的输出，(p.6) 在 1986 年前至少足以换取外汇并进口所需的物资，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更好而不是更坏了。

从各层面来看，苏联的势力在国内或国外都未受到严重挑战，当时世界上已进入了一个列强之间各有其势力范围的相对稳定时代。阿富汗战争的确造成痛苦，在政治形象上也有所伤害，军事尊严受到打击，但它顶多也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法国、越南战争对美国影响的程度而已。此外，持不同的政见的人士仅限于一小群知识分子，他们既受尊敬同时也是孤立的；想要移民的犹太人虽有所不满，但也只是一些陈腐的话题和牢骚而已。尽管有一些暴乱与罢工的例子，大多是由于食物短缺和物价上涨引起的，但谈到真正的社会运动倒是没有。对各民族及少数民族的压迫虽招来了怀恨之情，在巴尔干各共和国都有公开的反俄敌对情绪，但这种情感并未化为集体行动或类似政治意见的运动。

人们不满这个体制，并以各种形式表现他们的退缩：犬儒主义、工作场所的小型偷盗，偷鸡摸狗、浑水摸鱼，自杀及广泛的酗酒等。由于斯大林式的恐怖主义早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有选择性且有限制的压迫，意识形态的教化顶多只是一种官僚的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审查。所以，一旦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统治建立起一种常态和烦闷的生活形式之后，人们就学会如何对付这种体制，过自己的生活，尽量利用它，敬国家而远之。尽管苏联国家体制的结构危机已经隐含在历史的发展之中，置身其中的人却很少了解到此状况。苏联的解体，也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代价也最大的一次实验之一，它也可能是惟一一次其产生竟未有社会运动或战争介入的重大历史变化。斯大林所创造的国家似已使其敌人闻风丧胆，并且成功地长期割除了社会的反抗潜能。

当我们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所发动的改革过程，其历史的迷雾



似乎更深了。这过程是如何及为何失控的？毕竟，正如凡·雷吉摩特（Van Regemoter）那本研究俄国的改革过程的别具洞见的历史分析作品的书名所显示的，苏联以及之前的俄罗斯是一连串的“改革（Perestroika）”更迭，这和西方媒体所传达出来的简化形象大不相同。^①（p.7）从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到柯西金（Kosygin）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经济管理改革，其间经过了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戏剧性的重构，及赫鲁晓夫20世纪50年代的修正主义，苏联一直在进步/倒退上快速摇动着，所以连续性与改革的交相更替就成了一种体系性的特征。的确，这是苏联体制面对每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处理的问题：即社会改变时所采取的特殊道路。不过，除了斯大林无情地不断地改变游戏规则以符合己意之外，党组织总是有能力将改革摆在体制的界限以内，有必要时就进行政治整肃及领导变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老谋深算的党怎么会在无止境的改革争端与掌控之后僵化了，竟然政治失控到必须诉诸一场绝望匆促的政变的地步，以致最终导致自身的灭亡？

我的假设是说促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危机在性质上和以前的不同，因此这种差异本身就烙在改革过程本身上，使得改革更危险更加无法控制。我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就动摇了苏维埃经济与社会的危机的蔓延，其实是国家主义（statism）和苏维埃式的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在结构上无法确保社会顺利过渡到信息社会的表现。

我所说的国家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社会体制，整个社会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原理：社会所生产的经济盈余是由在国家机器内的权力持有者所攫取，这点和资本主义形成对比。在资本主义中，盈余是由经济组织的控制者所取得（见第一卷，序言），资本主义是朝向利润的极大化，而国家主义是朝向权力的极大化；也就是

^① 凡·雷吉摩特（Van Regemoter, 1990）。

说，国家主义是朝向增加国家机器的军事与意识形态能力，以便将它的目标强加在更多的国民身上，进入更深层的意识。我所谓的“工业主义”是一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伴随着新能源的运用在量的方面不断地增加，而所谓的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把生产要素的结合与使用加以极优化的质的能力。信息主义的崛起是和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那就是网络社会（见第一卷，第一章）。20世纪最后25年的特色是由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由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转型，就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而言都是如此，（p.8）其过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在苏联，这种转型所需的做法，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官僚体制以及党的干部（nomenklatura）的既得利益。由于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改革者，看到了将苏联转型为具有更高生产力和技术能力的体制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放手一搏，让社会去克服干部对改变的抵制，并以公开性（glasnost）代替经济加速（uskorenie）成为改革的第一线。但是历史显示，俄国社会一旦进入了开放的政治空间，因社会长期受到压迫，所以它将拒绝依照国家预订的政策来重塑自己，把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意味着不可预测与不可控制。这是戈尔巴乔夫步斯托雷平（Stolypin）的后尘，付出了代价再次学到的。

再者，广泛地为苏联社会打开政治表现的空间，以致释放出在斯大林体制下备受扭曲、压迫和操弄而隐忍不发的压力，追求一种有别于消退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来源，导致那仍极脆弱的苏维埃认同的断裂，因此决定性地摧毁了苏维埃国家、民族主义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了社会与国家之间冲突的民间尖锐表现，这是导致苏联瓦解的最直接的政治因素。

造成改革出现危机以及民族主义一触即发的根本原因，是苏维埃国家体制无法保证苏联能转型到新的信息主义范式，并跟上世界其他国家的脚步。其实这个假设并不新，只不过是将古老的



马克思概念加以应用而已，意即特定的社会体制会制约住生产力的发展，但必须承认此处呈现的情况带有一点反讽的历史扭曲。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下面所做的分析，其附带的价值将显示出国家主义的特性。为什么国家主义在结构上无法配合必要的改革以跟上信息主义的脚步？这当然不是国家本身的错，日本的国家以及日本之外的发展性国家（在第四章我们分析了发展性国家的起源和成就），是促进技术创新和全球竞争力，同时将相当传统的国家转化成先进信息化社会的决定性工具。当然，国家主义不等于国家干涉主义（state interventionism），国家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体系，其目标导向国家权力的极大化，而资本累积和社会合法性只是从属于此一大目标的次要目标。苏维埃共产体系（像所有的共产主义体系一样）（p.9）的建立是为了确保党可以全面控制国家，而国家则全面控制社会，其控制是借助于两根孪生的杠杆，一是中央计划经济，另一是严格控管的文化机器所强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这一体系无法由工业主义过渡到信息主义，且在这历史转化（Historical transition）的恶水中航行的不是一般的国家（state），而是此一特殊体系。本章的材料就是用以说明此一命题的原因、情况及假设的。

经济增长的扩张模型以及 超工业主义的极限

我们在最近几年来，已经太习惯于贬抑苏联经济的说法，而往往忽略了下列事实，长期以来尤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比世界多数地区要快，但是付出人类

和环境成本等极高的代价^①。当然，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严重高估其增长率，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数字。20世纪90年代才完全被肯定的哈宁（G.I. Khanin）的重要统计作品^②指出：1928~1987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的统计数字并不是苏联要我们相信的增长了89.5倍，而是6.9倍。不过照哈宁自己的说法（在估计域中我们应考虑下限，见表1-1-1 3及图1-1和1-2），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在1928~1940年间是3.2%，在1950~1960年间是7.2%，1960~1965年是4.4%，1965~1970年是4.1%，1970~1975年是3.2%，1975年以后就出现了停滞状态，1980~1982年间的增长率是负数，1987年以后也是负数。然而，整体而言，苏联大多数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比西方国家快，其工业化脚步是世界史上最快的之一。再者，衡量一个体系的表现时一定要以其本身的目标来衡量。从此一角度来看，近半个世纪的苏联可以说是个杰出的成功故事。我们如果暂且把这些摆到一旁（p.10）（我们真能这样做吗？），数以千万计（6000万？）的人民死于革命、战争、饥荒、强迫劳动、流放和处决（在俄国和其他共和国都一样）；民族文化、历史和传统被摧毁；有系统地破坏人权和政治自由；（p.12）一大片相当原始的自然环境遭受大规模的破坏；经济被军事化和社会被教化等。假设为了分析之故，我们暂时以布尔什维克的眼光来看这一段历

① 见下列各书诺瓦（Novc, 1969/1982）；伯格森（Bergson, 1978）；高德曼（Goldman, 1983）；塔汉（Thalheim, 1986）；帕拉祖勒斯（Palazuelos, 1990）。关于分析苏联经济统计数字精确度的纷争请见美国中情局（1990b）。

② 哈宁（Khanin, 1991a）。哈宁多年来一直是俄罗斯学院西伯利亚的经济与工业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除了上述的引书外，内容大部分与其博士论文一致，他的论著一直发表于上述研究所（EKO）的期刊中，例如，1989（4）；1989（10）；1990（1）；1991（2）中讨论的主题。英文论著中对于哈宁苏联经济统计的决定性贡献的系统评论，见哈里逊（Harrison, 1993：141-167）。

表 1-1 1928~1987 年苏联国民所得增长：
几种评估方式（不同时段，年百分率）

时期	TsSU ^a	美国中情局	哈宁
1928~1940	13.9	6.1	3.2 ^b
1940~1950	4.8	2.0	1.6
1928~1950	10.1	4.2	2.5
1950~1960	10.2	5.2	7.2
1960~1965	6.5	4.8	4.4
1965~1970	7.7	4.9	4.1
1970~1975	5.7	3.0	3.2
1975~1980	4.2	1.9	1.0
1980~1985	3.5	1.8	0.6
1985~1987	3.0	2.7	2.0
1950~1987	6.6	3.8	3.8
1928~1987	7.9	3.9	3.3

^aTsSU：苏联中央统计局

^b1928~1941

^c1941~1950

资料来源：由哈里逊（Harrison, 1993: 146）以下列资料制作完成——苏联中央统计局；哈宁：净材料生产值，由哈宁计算而得（Khanin, 1991b: 85）；美国中情局：国民生产总值（GNP），由中情局计算而得（CIA, 1990a: 表 A-1）

表 1-2 1928~1990 年苏联的产出与通货膨胀 (不同时期, 年变化率)

	实质生产增长			零售物价上涨率	
	工业	制造业	国民收入	实质	隐藏
TsSU ^a					
1928~1940	17.0	-	13.9	8.8	-
1940~1950	-	-	4.8	2.6	-
1950~1960	11.7	12.3 ^b	10.2	-0.5	-
1960~1965	8.6	7.7	6.5	0.6	-
1965~1970	8.5	7.0	7.7	1.9	-
1970~1975	7.4	7.0	5.7	0.0	-
1975~1980	4.4	-	4.2	0.2	-
1980~1985	-	-	3.5	-	-
1985~1987	-	-	3.0	-	-
1928~1987	-	-	7.9	-	-
哈宁 ^c					
1928~1941	10.9	-	3.2	18.5	8.9
1941~1950	-	-	1.6	5.9	3.2
1950~1960	8.5	8.4 ^c	7.2	1.2	1.8
1960~1965	7.0	5.1	4.4	2.2	1.6
1965~1970	4.5	3.2	4.1	4.6	2.6
1970~1975	4.5	3.7	3.2	2.3	2.3
1975~1980	3.0	-	1.0	2.7	2.9
1980~1985	-	-	0.6	-	-
1985~1987	-	-	2.0	-	-
1928~1987	-	-	3.3	-	-
1980~1982	-	-	-2.0	-	-
1982~1988	-	-	1.8	-	-
1988~1990 ^d	-	-	-4.6	-	-

^aTsSU: 苏联中央统计局

^b1955~1960

^c推估值

资料来源: 由哈里逊以下列资料制表完成 (1993: 47) ——苏联中央统计局; 1928~1987 年之“国民收入”由哈宁计算而得 (1991b: 85); 其他栏位哈宁计算的包括, 工业 (Khanin, 1991a: 146)、制造业 (Khanin, 1991a: 206, 212); 1980~1990 年之零售物价上涨率 (Khanin, 1991b: 29)

表 1-3 1928~1990 年苏联的投入与产值 (不同时段, 年百分率)

	固定资产量	资本生产力	每位劳工的产值	原始材料强度
TsSU ^a				
1928~1940	8.7	4.8	11.9	-0.3
1940~1950	1.0	3.1	4.1	-0.2
1950~1960	9.4	0.8	8.0	0.5
1960~1965	9.7	-3.0	6.0	-0.2
1965~1970	8.2	-0.4	6.8	0.4
1970~1975	8.7	-2.7	4.6	0.6
1975~1980	7.4	2.7	3.4	0.0
1980~1985	6.5	-3.0	3.0	0.0
1985~1987	4.9	-2.0	3.0	0.4
1928~1987	7.2	0.5	6.7	-0.2
Khanin				
1928~1941	5.3	-2.0	1.3	1.7 ^b
1941~1950	2.4	-0.8	1.3	1.1
1950~1960	5.4	1.6	5.0	-0.5
1960~1965	5.9	-1.4	4.1	0.4
1965~1970	5.1	-1.0	3.0	0.4
1970~1975	3.9	-0.6	1.9	1.0
1975~1980	1.9	-1.0	0.2	1.0
1980~1985	0.6	0.0	0.0	1.0
1985~1987	0.0	2.0	2.0	-0.5
1928~1987	3.9	-0.6	2.2	0.8
1980~1982	1.5	-3.6	-2.5	2.5
1982~1988	1.9	-0.2	1.4	0.7
1988~1990 ^c	-0.5	-4.1	-4.1	3.4

^aTsSu: 苏联中央统计局

^b1.7~2%

^c原始资料

资料来源: 由哈里逊以下列资料完成, 苏联中央统计局; 1928~1987 年为哈宁所计算 (Khanin, 1991b: 85); 1980~1990 哈宁所计算 (Khanin, 1991b: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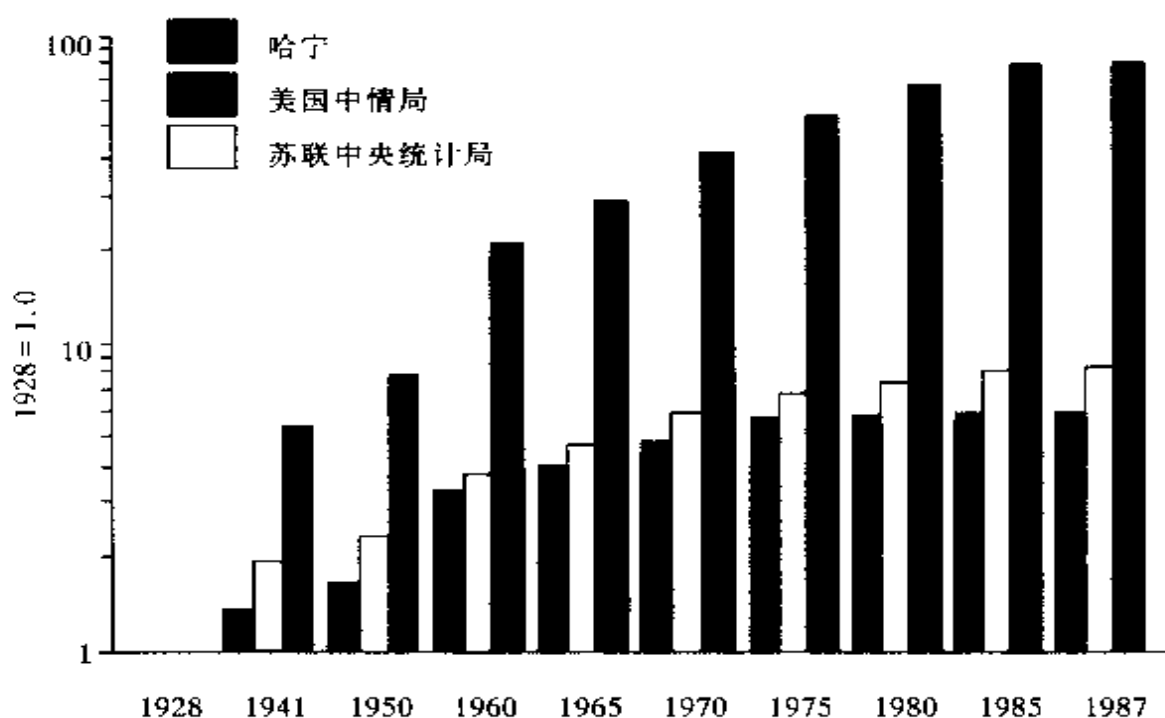


图 1-1 1928~1987 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 几种评估方式

资料来源:由哈里逊的表 1.1 绘制而成(Harrison, 1993: 45)。

史进程, 我们便不得不佩服这共产主义的传奇所取得的的确是辉煌成就。在 1917 年时, 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是一小群职业革命家, 代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小派系, 而社会主义运动又是发动 1917 年 2 月的那场更大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这民主运动几乎完全在大都市里进行着, 而俄国的人口有 84% 是乡村居民。^① 可是他们不仅能够在十月政变中夺取政权, 消除了一切政治势力的竞争, 而且还能够在—场严酷的革命战争中对付沙皇军队的残留部队、白军以及外国远征军, 他们也在这场内战中消灭了无政府主义者马克诺 (Makhno) 的农民军队以及克伦斯塔德 (Kronstadt)

① 见下列诸书, 托洛茨基 (Trotsky, 1965); 康奎斯特 (Conquest, 1968.1986); 科亨 (Cohen, 1974); 安托诺夫-欧夫斯延科 (Antonov-Ovseyenko, 1981); 派伯斯 (Pipes,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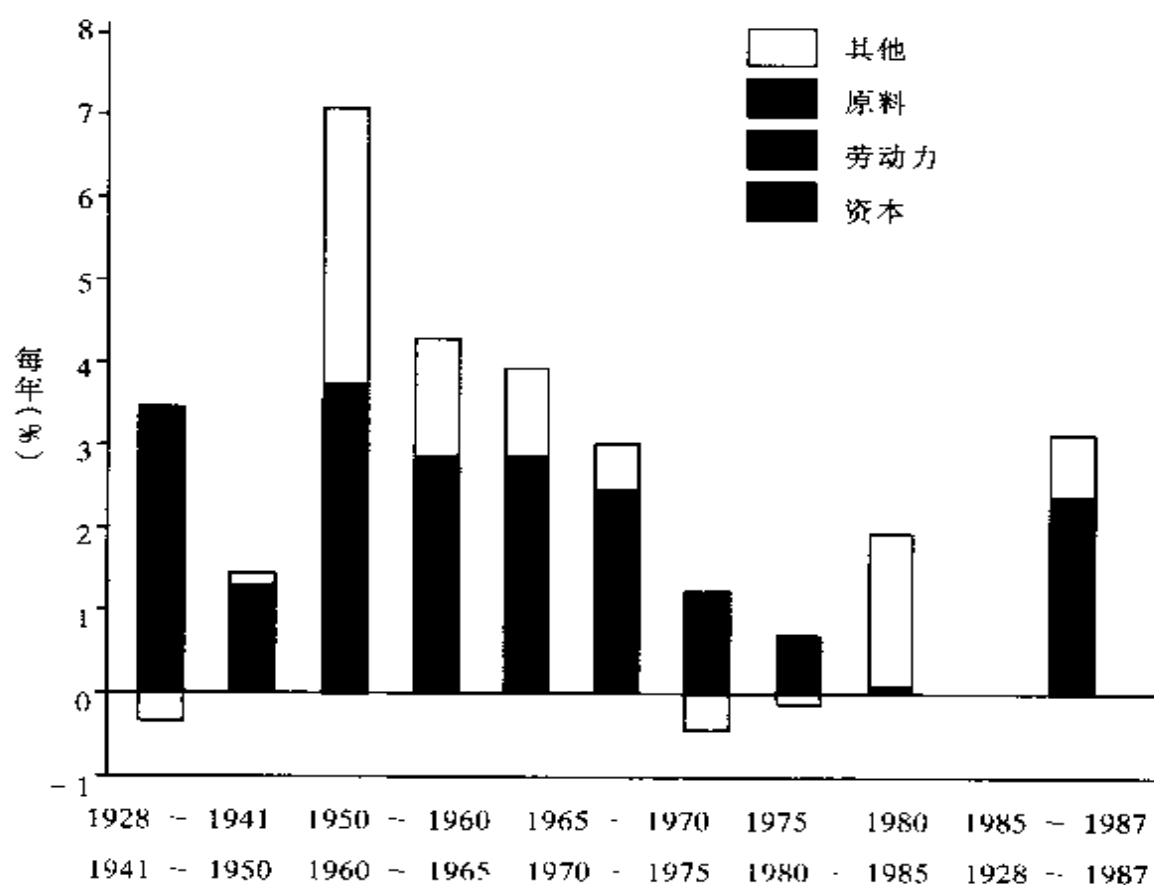


图 1-2 苏联的国民收入:各项投入对产出成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哈里逊(Harrison, 1993:149)以哈宁(Khanin, 1991a, b)的图制作完成。

的革命水兵。除此之外，布尔什维克在薄弱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中只有很小范围的社会基础，再加上几十个知识分子，(p.13)，在创造纪录的时期内，不顾国际上的孤立，建立起一个工业化的经济体制。二十年之间，它已经发展到可以提供粉碎纳粹战争机器的军事硬件的地步了。由于一种超越资本主义体制的坚决决心以及我们可以理解的防卫偏执狂，在大体上算是贫穷国家的苏联，竟然很快地成为一个核武器强权，在战略上维持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1975年时在太空竞赛中领先，(p.14)让西方政府大为吃惊，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他们自己所制造的神话：共产体制无法建

造一个先进的经济体。

这些不容否认的成就却是以永远地扭曲苏联经济为代价的。^①苏联逻辑的底部是一套呈阶梯状的优先顺序，^②农业必须把它的产品挤光以资助工业并喂饱城市，并出清其劳力以提供产业工人。^③消费品、住宅及服务必须让位给资本品，并且榨取原料，以便社会主义可以很快地在不可或缺的生产线上自给自足，重工业本身则服务于军事工业生产，因为军事力量是此政权的最终目的，并且是国家体制的基石。所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逻辑——分析到最后即视全部的权力为国家存在的理由——全部渗透到苏联经济由上而下的制度组织，并且以不同意识形态的面貌反映在苏联的整个历史中。

为了要以最严格的条件强制执行上述优先顺序，为了“把政治带到经济的指挥站”（共产党的口号如是说），于是建立起世界史上第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要是我们把一些工业时代以前的一些中央控制经济排除在外），显然在这种经济之中，价格只是一种会计办法，价格无法呈现出供给与需求的任何关系来。^④因此整个经济是由垂直的行政命令所推动，由计划机构下令给执行部门，再由执行部门下令给生产单位^⑤，生产单位彼此间的联系有水平关系，因为他们彼此间的交换已经由他们相应的所在行政单位所决定了。这种中央计划的核心有两个机构塑造着苏联经济，第一个是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它先以五年为一期，立下整个的经济目标，然后再计算每一种产品的生产所需的条件数量，还有每一个生产单位以及整个国家每一年所需，以便指派给每一个工业、

① 阿甘贝良（Aganbegyan, 1988）。

② 门希科夫（Menshikov, 1990）。

③ 强森及麦克康奈尔·布鲁克斯（Johnson and McConnell Brooks, 1983）。

④ 欲理论性地理解中央计划经济的逻辑，见耶诺斯·科奈尔（Janos Kornai, 1986, 1990）的经典之作。

⑤ 诺瓦（Nove, 1977）；塔汉（Thalheim, 1986）；狄赛（Desai, 1989）。



建筑、农业甚至是服务业的单位一定的产出目标与供给配额。举个例子来说，中央每年为 20 万种产品制定“价格”，难怪苏联的线性计划是全世界最复杂的。^① (p.15)

另一个不是那么恶名昭彰，但在在我看来却是更严重的主要经济机构，是国家材料与设备供应委员会 (Gossnab)，它负责控制全国每一项交易的供应，从一根针到一头象。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专注的是其数学模式的惯性，而触角无所不在的国家材料与设备供应委员会则是真正授权供给的施令中心，它实际上控制了货品与原料的流动，因此控制了苏联体制的一项基本特征：短缺 (shortage)。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就是 Gosbank，则从未扮演一个实质性的经济角色，因为信用与货币流通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决策以后的自动结果，该决策又是由国家按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加以诠释和实施的结果。^②

为了完成快速工业化，并实现计划的目标，苏维埃国家放手全面动员国家人力和占地表 1/6 面积的广大自然资源，^③ 这种经济增长的扩展模型，不仅在 1930^④ 年的原始累积阶段是如此，在后斯大林时期亦然。^⑤ 因此，阿甘贝良说：

在战后的典型五年计划中，通常这五年内基本资金运用和资本投资增加一倍半，燃料及原料的抽取便增加 25%~30%，再召募 1000~1100 万工人加入国民经济中，其中有一大部分转移到新的生产部门，从 1956~1975 年都是如此。最后一个大量使用资源而有所增长的五年期是 1971~1975，在

① 柯夫 (Cave, 1986)。

② 门希科夫 (Menshikov, 1990)。

③ 强士尼 (Jasny, 1961)；诺瓦 (Nove, 1977)；爱尔门和特诺维奇 (Ellman and Kontorovich, 1992)。

④ 惠特克罗夫等人 (Wheatcroft et, 1986)。

⑤ 帕拉祖勒斯 (Palaszuelos, 1990)。

此一时段，生产所需所有资源的增加的合成指数显示有 21% 的增长。^①

因此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工业经济早期的典型现象，其增长率是资本投资和带动投入规模的函数，技术的变化只占次要角色。所以潜在的涵义为：资源不断消耗之后，报酬就不断递减（见表 1-4 及图 1-3）。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便是：此一增长模型的特色是有一规模报酬不变的固定弹性生产函数，^②（p.16）其命运有赖于下列三种能力：①不断吸收额外的资源，②以技术开发来增加生产力，③利用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p.17）

表 1-4 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以及投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产出/资本的比例

年	增长率 (%)			粗投资/ 国民生产总值比例 (%)	产出/ 资本比例
	国民生产总值	以男性工时 计算的劳动力	资本存量		
1951	3.1	-0.1	7.7		0.82
1952	5.9	0.5	7.5		0.81
1953	5.2	2.1	8.6		0.78
1954	4.8	5.1	10.5		0.74
1955	8.6	1.6	10.6		0.73
1956	8.4	1.9	10.3		0.72
1957	3.8	0.6	9.9		0.68
1958	7.6	2.0	10.0		0.66
1959	5.8	-1.0	9.7		0.64
1960	4.0	-0.3	9.2	17.8	0.61

① 阿甘贝良 (1988: 7)。

② 惠兹曼 (Weutzman, 1970: 63)，引自狄赛 (Desai, 1987: 63)。

续表 1-4

年	增长率 (%)			粗投资 / 国民生产总值比例 (%)	产出 / 资本比例
	国民生产总值	以男性工时 计算的劳动力	资本存量		
1961	5.6	-0.7	8.9	18.1	0.59
1962	3.8	1.4	8.8	17.9	0.56
1963	-1.1	0.7	8.8	19.3	0.51
1964	11.0	2.9	8.6	19.1	0.52
1965	6.2	3.5	8.2	18.9	0.51
1966	5.1	2.5	7.7	19.2	0.50
1967	4.6	2.0	7.2	19.9	0.49
1968	6.0	1.9	7.1	20.2	0.48
1969	2.9	1.7	7.2	20.3	0.46
1970	7.7	2.0	7.8	21.0	0.46
1971	3.9	2.1	8.1	21.7	0.45
1972	1.9	1.8	8.2	22.9	0.42
1973	7.3	1.5	8.0	22.3	0.42
1974	3.9	2.0	7.8	23.0	0.40
1975	1.7	1.2	7.6	24.6	0.38
1976	4.8	0.8	7.2	24.5	0.37
1977	3.2	1.5	7.0	24.6	0.36
1978	3.4	1.5	6.9	25.2	0.35
1979	0.8	1.1	6.7	25.2	0.33
1980	1.4	1.1	6.5	25.4	0.31

国民生产总值和投资（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有资料）是以20世纪70年代的卢布值计算，而资本存量的资料则是以1973年的卢布值换算。产出/资本的比例是平均率，是以每一年的产出和资本的绝对值相除而得。而资本则是以其后连续两年的资本存量的平均值计算之。

资料来源：由狄赛制作完成（Desai, 1987: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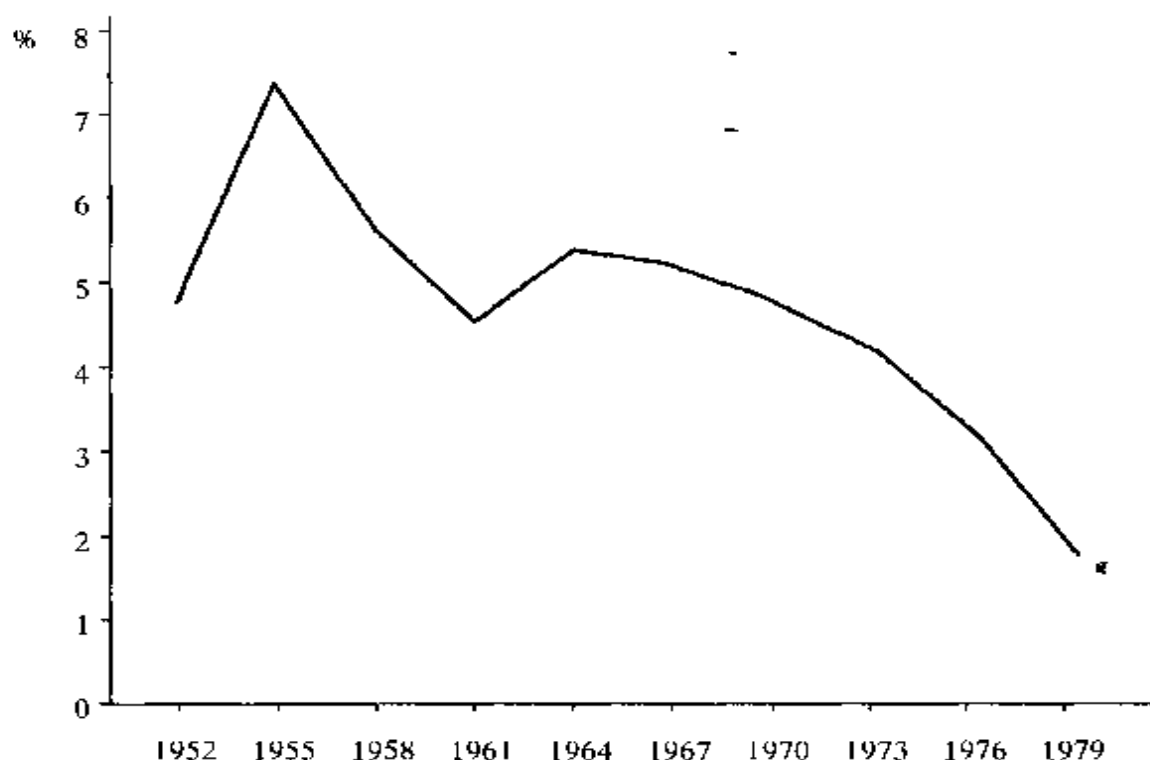


图 1-3 1951~1980 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增长率是每三年的平均值,图示以在中间那一年来表示

资料来源:以表 1-4 的资料完成。

不过苏联经济是在专制政体中发展出来的,由于长期以来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环境之中,所以产生了一种四面楚歌的心态^①。贸易被削减至必需品,而且进口与出口都受到安全考虑的制约。尽管签订雅尔塔协议(Yalta Treaty)以后,各国已承认苏联对东欧的占领,可是苏联并未掠夺性地占有额外的资源。其附属国,从民主德国、古巴到越南,与其说是经济殖民地,不如说是

^① 霍斯曼(Holzman, 1976); 狄赛(Desai, 1987: 163~172; 251~273); 阿甘贝(1988: 141~156); 门希科夫(Menshikov, 1990: 222~264)。



政治抵押品。其中有些国家（例如古巴）还花了苏联预算的不少钱。^① 有趣的是，政治准则高于经济考虑的原则还延伸到俄罗斯与非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上来，苏联的民族支配的情况非常独特：每个地区所享的投资与资源有一个颠倒的区别对待关系，（p.18）也就是俄罗斯分给别的共和国的资源比它从别国得到的多。^② 因为传统上俄罗斯不信任外国的移民，而且相信亚洲和北疆的资源潜力无限，所以经济尚需强调的不是在地理上延伸帝国势力可及之处，而是更全面地动员苏联的人力和资源（让妇女在外工作；鞭策人民卖力工作）。

这种经济增长的扩张模型缺点，直接来自政治目标，牺牲农业、强制集体化的残酷政策，永远阻碍乡村生产力，不论在栽培、收成、储存、分配皆然。^③ 经常发生的是：作物任其在田里腐烂，或在仓库中败坏，或是在长途运送至远方贮藏中腐坏。贮藏的地点远离农村，以免不受信任、满怀怨恨的农民来掠夺。小块的私有农地的产出较高，但由于地太少，又受到控制与滥用，所以对苏联荒废的农业来说，起不了什么作用。随着苏联从窘迫的状态转向一个想要喂饱其公民的社会，农业赤字就成了国家预算与国家进口的烫手山芋，逐渐把资源从工业投资中抽走。^④

中央计划型经济，浪费了很多资源，可是在动员优先目标的资源上确有很多实效。随着经济变得更复杂、技术更进步、组织更分化，中央计划型经济也成了各种生产力下降、不知变通和权宜等种种不平衡现象的来源。当政府允许人民表现出超乎生存以上的消费偏好时，当技术变化强迫改变既有的工作程序时，当经

① 马尔斯和凡诺斯（Marrese and Varoux, 1983）。对此研究（我发现有些问题）的批评见狄赛（Desai, 1987: 153-162）。

② 其他的资料，见科洛金（Korowkin, 1994）。

③ 瓦林（Volin, 1970）；强森和麦克康奈尔·布鲁克斯（Johnson and McConnell Brooks, 1983）；谢耳和雅可布森（Scherer and Jakobson, 1993）。

④ 高德曼（Goldman, 1983, 1987）。

济的规模（这么大的地区在功能上互相依赖）使得国家计划人员（Gosplanners）的规划技巧使不上力时，这指令经济就受到系统性功能失调的侵袭，以致无法实现其计划。由上而下，笨手笨脚的官僚体系，在变动不易的时代被折磨得愈来愈冷漠，仍照着他们对于计划指令的解释而行走着。

尽管苏联在科技与研发（R&D）上投入了大量资源，（p.19）尽管他工作人口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比例高于其他大国，可是此一体系却在这个根本技术变革的时代阻止创新，挫败其气。^① 因为创新本身总是蕴含着冒险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每一级的生产单位在体系上都阻止人从事创新的冒险。再者，计划经济的会计系统本身就代表了对提高生产力（不仅在技术或经营上）的一项根本障碍。我们说明如下，每一个单位的表现都以卢布来衡量生产总值，此一产出值（valovaya produktsiya，简称 val）包括所有投入值，每年产出值的比较决定了计划实现度，最后也决定经营者和工人的津贴。因此没有人想要减低某一产品的投入值，不管是使用更好的技术或更好的管理都一样，如果这类改进无法对产出值系统增值的话，他们就不愿改变。^② 再者，垂直型生产，包括科学生产在内，使得生产和技术研发之间建立起合能效果（synergistic）的联系很困难，科学院本身大体上和工业界没什么关联，而每一个部门都有他自己的研究支持系统，常和其他部门是各立门户，少有合作。在先进资本体制经济已跨入信息时代时，当新一波技术革新开疆拓土之时，苏联经济通常应付的办法是点滴解决，事后补救。^③

同样地，由于政治上赋予经济每一产业和部门一定的优先顺序，所以使得共产党得以实现其目标，这当然包括在 30 年之内取

① 阿甘贝良（Aganbegyan, 1988）。

② 高德曼（Goldman, 1987）。

③ 高兰（Golland, 1991）。



得超强的地位在内，但系统的优先顺序导致了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并造成多数产品与过程在供需之间长期缺乏协调，因为价格无法反映上述的不平衡现象，因为这是由行政命令所决定的，所以两者之间的差距就造成了缺乏，每一样东西都短缺，竟然成了苏维埃经济结构的特色。^① 上有短缺，下就有对付短缺的对策，从消费者到商店，制造商到供应商，经理到经理，都有对付短缺的实际做法。到头来这个互惠网络竟成为一个非正式经济交易的庞大体系，(p.20) 愈来愈依赖非法的金钱或实物支付而组织起来。所以效忠于监督的官僚并得到他们的保护，就成了此一系统大规模循环体制外道路运作的前提。整个党和国家就吞没在一个巨大的灰色经济 (shadow economy) 之中，而这是苏维埃体制的基本面向，格利格里·格罗斯曼 (Gregory Grossman) 这位顶尖的苏维埃经济研究学者曾对此作过彻底探讨。^② 有人认为这种灰色经济可以软化体系的僵硬性，并制造出一个类似于市场的经济，使得实际经济得以运作。事实上，一旦经理人员与官僚发现了经常处于短缺的经济体的好处，他们就经常严格地执行经济计划的硬性规定，以极大的代价来因应软化体制的需求。这个得到党高层人士默许的灰色经济，逐渐在 20 世纪 70 年代长得愈来愈大，以至于深深地转化了苏联社会结构，瓦解了计划经济，并使之所费不貲，整个行政机关“把关者” (gatekeepers) 的主要利益是收取他们的灰色收入 (shadow rent)，而非从计划目标中创造和获取他们的红利。^③

苏联在国际上的经济孤立，对此一体系而言具有功能性的作用，使得计划的实行成为可能 (因为在一个开放经济里，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并使得生产免于外部竞争压力。然而这却使得苏联的工业与农业在世界经济中无法和他人一较长短，

① 对指令式经济体系运作缺点的分析，见科奈 (Kornai, 1980)。

② 格罗斯曼 (Grossman, 1977)。

③ 格罗斯曼 (Grossman, 1989)。

因为在此同时一个全球互赖的体系在全世界正在形成，当苏联被迫进口东西时，不论是先进机器、消费品或饲料，它突然发现自己的能力受损，无法出口制成品以换取上述东西，所以它必须诉诸大量石油、天然气、原料和贵重金属的出口。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东西占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出口的90%，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就占了2/3。^①这种欠发达国家典型的外贸结构很容易受到原料价格恶化的伤害，原料价格往往比制成品价格低，当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波动时特别容易受害^②，苏联依赖出口自然资源使得苏联经济的能源和原料投入量减少，进一步摧毁经济增长的扩张模型。(p.21)另一方面，1986年原油价惨跌时，苏联经济的进口能力严重受损，造成消费品和农业投入的短缺更形严重。^③

不过或许苏联经济最致命的弱点正是苏维埃国家的优点：过度发展的军事工业体及无法永续的国防预算。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国防支出约占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5%，此一比例是美国国防预算的高峰期里根时代的二倍。有人的估计值更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25%^④。苏联大约40%的工业生产和国防有关，从事于军事工业体的企业生产高达所有工业生产的70%。面此一巨大军事工业体对国民经济的损害则更为深远，^⑤该企业集合了最有才华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并拥有最好的机器和最佳的技术资源，拥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最先进且全面的技术，以及进口配额的优先分配权。他们吸收了苏联最好的工业、人力及技术潜能，这些资源一旦分配给军事部门，就很少再转回民用生产或应用上了。而且技术应用性的副产品很少，民用产品与军事企业的总生产比例通常低于10%。即便如此，电视机及其他电

① 门希科夫 (Menshikov, 1990)。

② 伟恩 (Veen, 1984)。

③ 阿甘贝良 (Aganbegyan, 1988)。

④ 斯坦伯格 (Steinberg, 1991)。

⑤ 罗文和伍尔夫 (Rowen and Wolf, 1990); 古柏 (Cooper, 1991)。



子消费品大半是由军事企业所生产的。做为其生产活动的副产品，不说对于消费者满足的关注是极其微小的，因为这类企业根本上是依赖国防部而非消费市场，军事工业部门在苏联经济中扮演黑洞的角色，吸收了社会过半的能量并使之消失于不可见底的深渊中。毕竟，军事化体制的逻辑是为了国家的权力而将国家的权力赋予绝对优先地位。一个在 20 世纪之初还是贫穷的、大量农村人口的、没什么发展的国家——苏联，在短短的三十年间竟然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之一，必然要以苏联的民用经济和其公民的日常生活为牺牲。而苏联的领导阶层并非对计划经济所发展出来的矛盾和瓶颈毫无所悉，(p.22) 的确，如前所述，苏联的历史是一连串周期性改革与重建的历史^①；赫鲁晓夫想要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更关注消费品和住宅与社会福利（尤其是年金）等，将社会主义的成就带进人民的家里^②。他还设计出一种将生产力完全释放出来的新经济形态，科学与技术用来服务经济发展，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共和国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利用。由于受到成功发射第一批史普尼克（sputniks）人造卫星的鼓励，第二十一届党代会就以增长指标为基础来预估，在二十年之内，苏联会和美国在经济上平起平坐。因此，粉碎资本主义的全面战略就由军事对抗的不必然性转为明确宣示的和平共存与和平竞争。赫鲁晓夫是真的相信社会主义的示范效果最终会把共产党和他们的盟友带到世界其他各地去。^③ 不过在以这样宏大的视野来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前（中共与之争论），他知道他必须改革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体制。由于第二十届党大会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使党内强硬派采取守势，所以他就能控制经济的部门，限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并把责任转移到区域经济政务局（sovnarkhozy）

① 凡·雷吉摩特（Van Regemorter, 1990）。

② 古斯坦森（Gustafsons, 1981）；葛勒和海德伦（Gerner and Hedlund, 1989）。

③ 泰柏（Taibo, 1993b）。

的手上。自然我们可以预测到官僚的反应是重构由上而下控制与管理稀有资源的非正式网络。计划经济因此而解体，造成了生产下降，以及农业增长的实质减缓，后者是赫鲁晓夫改革的核心。

在赫鲁晓夫能对妨害他的政策的行动力加以反制之前（他的政策的确有过度意志主义的缺点），党组织发生了内部政变，使得赫鲁晓夫的任期在1964年划下休止符。国家计划委员会权力又立刻被恢复了，甚至设立了新的部门以强制执行计划当局的指令。

但经济改革并未停顿下来，而是改变方向，由国家行政层级改为由企业来发号施令。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① 是受到经济学家李伯曼（Lieberman）和宁契诺夫（Nemchinov）的鼓舞。此一改革赋予企业经理人员更大的决定自由，（p.23）而且也实验了一个偿付生产所用的资源的价格体制，同时也更注重消费品（在1966~1970年间，消费品的生产速度首度超越了资本品），在1966~1971年间，也提供鼓励给农业，造成产出实质的增加，可是，当它面对计划经济的逻辑时，这些改革就无法持久，结果是，利用新近得到的自由而增加生产力的企业却必须在下一季度指派更大配额的生产，所以企业经理人员和工人〔就以1967年改革的样板企业：土拉（Tula）的车诺基（Schekino）化学厂为例〕觉得他们掉入了圈套，别的工厂可以按老样子投入，进行稳定的正常生产，而他们却受罚，必须强化他们的工作进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柯西金失势了，所以这半推半就的改革所激发的创新潜能就烟消云散了。

不过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最初10年中（1964--1975），^② 经济确有相当的增长（平均每年有4%以上的增长率），伴随着政治的稳定及人民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所以通常用来形容勃列日涅夫之词：“停滞”（zastoi），至少对于此一时期的前半部是不

① 特诺维奇（Kontorovich, 1988）。

② 高德曼（Goldman, 1983）；伟恩（Vecn, 1984）；米契尔（Mitchell, 1990）。



公平的。^①直到1975年以后，相对的停滞才产生，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零增长。这种停滞的来源似乎一直是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也是促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直接原因。

帕得蒙·狄赛（Padam Desai）为我们提供了苏联经济增长迟滞的经济证据以及一个经济计划的解释。其主要的理由似乎是技术变化率的下降以及扩张积累模型的报酬递减所致。^②阿甘贝良也把经济增长缓慢归因于，以资本、劳力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扩张使用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型已过时了。^③落后的技术造成油田和天然气田、煤矿、铁矿开采，稀有金属开采的报酬递减。开采新资源的成本因为距离而增加，也因为苏联领土东北区域的不适于居住的地理障碍而增加。苏联经济的劳动力供应也下滑，这是由于出生率逐年下滑，教育与经济发展使然，还有妇女几乎已经完全纳入劳动力之中了。（p.24）因此，与劳动力持续稳定的增加相关的这一扩张积累模型的支柱也消失了。在工业早期典型的同一种生产函数底下，资本投入也受到投资报酬递减的限制，要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生产同样的量，就要投入更多的资本，从产出/资本比的戏剧性下降可知这一点（见表1.4）。

发展受阻的现象也和积累模型内在的动力及官僚逻辑有关联，史塔尼斯拉夫·门希柯夫（Stanislav Menshikov）和在新西伯利亚鄂毕河畔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群年轻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苏联经济发展出一套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模型，他说：

经济分析显示：其实我们的投资、生产和分配决策并不是以增加人民的福祉，提升技术进步，并且把增长率保持在

① 凡·雷吉摩特（Van Regemorter, 1990）。

② 狄赛（Desai, 1987）。

③ 阿甘贝良（Aganbegyan, 1988）。

足以维持经济均衡的高度上为目标的。相反地，决策的着眼点在于极大化各部门的权力，以便在极度中央化的物质、金融、劳动、自然和知识资源斗争中获胜。我们的经济—数字分析显示：这一体系本身的惯性牢不可破——一定会愈来愈没有效率。^①

当教育水平逐渐提高，使得自律自制的人民的消费需求开始对政府施压时，这种没效率就十分醒目了。但挑战的形式不是以社会运动的形态，而是以公民要求政府实现福利的许诺表现出来。^②

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两个主要的结构问题似乎阻碍着这体系本身改造自己的能力，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扩张模型左支右绌表示要把苏联转到一个技术变化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新生产函数中，可以使用发展中的技术革命以实质上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力，这就需要一部分的盈余用在社会消费上，而不危害到军事机器的推陈出新。在另一方面，经济管理的过度官僚化及其混乱副产品、灰色经济的增长，需要撼动计划机构，并把货物与服务分配的平行线路妥为掌握，(p.25) 要对付这两件事情：技术现代化与行政革新，其阻碍皆甚巨。

技术问题

尽管中央计划有诸般缺点，可是苏联的确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经济体，1961年，它向世界发出豪语挑战说，到了20世纪

① 门希科夫 (Menshikov, 1990: 8)。

② 列文 (Lewin, 1988)。



80年代时苏联会比美国生产出更多工业品，此时虽然有史普尼克卫星发射带来的冲击，但多数西方观察家都嗤之以鼻。可是讽刺的是，至少就官方统计数字而言，尽管有经济减速及社会杂乱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时，苏联在一些重工业部门实际比美国生产的更多：钢铁多80%，水泥多78%，石油多42%，肥料多55%，生铁是两倍，牵引机是5倍。^① 问题在于同时全世界生产体系正大幅地转向电子及特殊化合物，并向生物技术革命倾斜，而在这些领域苏联的经济和技术都相当落后。^② 从所有的报告和指标来看，苏联的确错过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成形的信息技术革命，我和斯芬塔拉纳·那塔鲁斯科（Svetlana Natalushko）在1991~1993年间作的柴林诺格勒市（Zelenograd）（离莫斯科25公里的苏联“硅谷”）^③ 的顶尖微电子和厂商的调查显示：虽然我们所访问的对象，是一般而言技术素质很高的科学和工程人员，但苏联和西方在电子技术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例如，即使到最近这几年的时候，苏联企业仍然没有能力设计出次微米芯片（sub-micron chip），而他们的“净室”（clean room）“脏”得甚至连他们所设计出来的最先进的芯片都生产不出来。他们告诉我们其技术低度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适当设备以生产半导体，类似的事也发生在电脑业上。根据我在20世纪90年代对位于新西伯利亚市（Novosibirsk）的西伯利亚科学院内研究所所作的另一份研究观察显示，苏联的电脑业大约落后美国同业20年，^④（p.26）个人电脑革命（PC revolution）完全弃苏联的技术而去，就像其也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于不顾，可是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不同的是，苏联设计并生产它自己的同类产品

① 华克（Walker, 1986: 53）。

② 阿曼和古柏（Ammann and Cooper, 1986）。

③ 卡斯特和那塔鲁斯科（Castells and Natalushko, 1993）

④ 卡斯特（Castells, 1991）；本分析的简要版见卡斯特和霍尔（Castells and Hall, 1994：第四章）。

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其设计疑似苹果一号电脑（Apple One）。^①在光谱的另一端，就一个国家主义技术系统而言应该是较厉害的高功能电脑，在1991年（苏联生产这类机器最多的一年）苏联高功能电脑的平均最高表现也只是超过二等级，比克雷研究公司（Cray Research）还少。^②至于最关键的技术基础建设：苏联的电信系统，照戴安妮·杜西特（Diane Doucette）在1992年的估计，也显然落后于主要工业国。^③即使在有军事应用的关键技术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也远远落后于美国。据一份1989年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北约、日本和苏联的军事科技比较中，苏联在25项评估的技术中有15项敬陪末座，而且每一样技术领域都无法和美国平起平坐。^④马拉瑞和德拉波特（Malleret and Delaporte）对于军事技术的评估报告似乎也证实了这一事实。^⑤

在此我们一样没有明确而直接的理由说明为何苏联如此落后。苏联不仅拥有一个强大的科学基础，同时它所具备的技术已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太空竞赛中超越美国，^⑥而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方信条把“科技革命”（STR）带到了苏联的战略核心，意欲超越西方，并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刺激的技术基础来建设共产主义。^⑦这种把技术排在首位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说法，赋予“科技革命”的重要性见诸于大量对于科学、研发、技术人员的训练上。结果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所拥有的

① 阿甘米尔钦（Agamirzian, 1991）。

② 沃克特和古德曼（Wolcott and Goodman, 1993）；亦见沃克特 Wolcott (1993)。

③ 杜西特（Doucette, 1995）。

④ 美国国防部（1989），被引用自阿瓦勒·冈萨雷斯（Alvarez Gonzalez, 1993）。

⑤ 马拉瑞和德拉波特（Malleret and Delaporte, 1991）。

⑥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988）。

⑦ 阿凡斯夫（Afanasiev, 1972）；拉科夫等（Dryakhlov et al., 1972）。此主题的文摘要见巴拉克曼和莎卡拉坦（Blyakhman and Shkaratan, 1977）。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比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都要高。^①

因此，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一个观念：不是人民，也不是缺乏投入科技发展的物资资源，而是这个“体系”（system）破坏了其基础，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一场重要的范型移转的关键时刻，引发了技术减速。（p.27）事实上，一直到1966年初，都没有实质证据可以说明苏联在主要技术领域中落后的原因，除了生物学因受李森科主义之害而延迟的说法之外。^②然而，一旦技术进化发生了断裂现象，如同发生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情形，科学研究是无法协助技术的进展的。所以苏联反方向所从事的学习努力，在和美国与日本的技术创新不断加速的竞赛当中注定会失败。^③在20世纪70年代“有件事”发生了，引发了苏联的技术减速，但“这件事”发生的地点不在苏联而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新近的技术革命的特色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技术应用范围广泛且扩散迅速，使苏联体系很难吸收它并据为己用。阻碍技术发展的不是勃列日涅夫停滞期的危机，而事实上苏联体系无法整合那自吹自擂的“科技革命”以至于造成他的经济停滞，且让我们细说其无能为力的理由吧。

第一个理由是经济资源、科学和技术，先进的机器以及脑力都被吸入了工业—军事复合体。这个大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产出2/3的工业产值，和军方一起创造出苏联15%~20%的国民总产值，^④却是一所科学和技术浪费的贮藏所；他吸收了最好的才干之士，最好的设备，但回馈给民用经济的却只是平凡

① 见弗特斯科（Fortescue, 1986）；史密斯（Smith, 1992: 283-309）。

② 汤玛士和克鲁斯—范斯尼（Thomas and Kruse-Vaucienne, 1977）；弗特斯科（Fortescue, 1986）。

③ 高德曼（Goldman, 1987）。

④ 萨皮尔（Sapir, 1987）；欧第吉尔（Audigier, 1989）；亚历山大（Alexander, 1990: 7620）；斯坦伯格（Steinberg, 1991）。

的电子装置和消费电子产品。^① 在军事—工业复合体中所发现和应用的先进技术很少被散布到社会中，主要是为了安全理由，但也为了要控制信息，这使得军事企业成了先进工业技术的实质寡占者。此外，从过去到现在东西方的军事企业的基本逻辑，都是去讨他们惟一客户——国防部的欢心，^② 因此技术的发展与改变是为了要配合军事硬件极为特殊的要求。(p.28) 因此这也说明了在苏联和美国要有任何民用转移的计划都遇到相当的困难。毕竟在工业或消费市场中谁需要一片设计来抵抗核子爆炸的芯片呢？使美国电子国防工业不致过时得太快的原因是他们相对于来自别的美公司 & 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的竞争保持开放。^③ 可是苏联经济是为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没有任何出口的诱因，惟有一个目的，只是要遵循一个不一定跟上时代的国防部的指示。苏联企业所走的技术轨道愈来愈远离社会的需要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创新过程。^④

军事对子技术的强加要求，要为苏联电脑产业的死亡负大部分的责任，因为苏联的电脑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还落后西方的电脑不远，而且也是苏联早期太空计划的功臣。^⑤ 电脑设计的工作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位于基辅的科学院，由列别德夫 (S.A. Lebedev) 教授所领导^⑥。第一架厚型 MESM 建造于 20 世

① 亚瓦任·冈萨雷斯 (Alvarez Gonzalez, 1993)。

② 田野调查者包括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斯芬拉那·那塔鲁斯科 (Svetlana Natalushko)，以及在 1991~1993 年于柴林诺格勒等地的电子工厂的访谈。见科斯特和那塔鲁斯科 (Castells and Natalushko, 1993)。而西方经济中的国防工业科技的副产品的相关问题见柯达 (Kaldor, 1981)。

③ 桑霍兹等 (Sandholtz et al., 1992)。

④ 古柏 (Cooper, 1991)。

⑤ 卡斯特在新西伯利亚市的田野调查 (1990) 以及在柴林诺格勒 (Zelenograd, 1992~3)；见赫钦 (Hutching, 1976)；阿曼和古柏 (Arman and Cooper, 1986)。

⑥ 阿甘米尔钦 (Agamirzian, 1991)。



纪 50 年代，仅比美国第一架电脑 UNIAC 落后四年，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和 60 年代，从这类厚型发展出一系列的大型主机电脑：M-20、BASM-3M、BASM-4、M-220 和 M-222。这系列的高峰是 1968 年所生产出的强力机器 BESM-6，每秒钟能做 80 万次运算，于是它成了往后 20 年苏联计算机界的辛勤劳工了。不过这是苏联本土计算机工业最后一次重大突破了。1965 年在军事部门的压力下，苏联政府决定采用 IBM360 型为“经济互动会议”（苏联主导的东欧国际组织）的统一计算机系统的核心，从此以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及数位电脑，后来有一些日本电脑，就成了苏联电脑的常规格式了。苏联的电子研发中心和工厂（全部隶属于国防部）不再发展他们自己设计的电脑和生产线，而从事于盗录工程并再复制每一型电脑，以配合苏联军方的指示。而苏联情报单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的首要任务是：用尽一切手段来取得最先进的西方技术与机器，（p.29）尤其是电子方面的。^① 苏联的信息技术革命的主要来源就是在设计和设备方面从西方得到公开和秘密的技术转移。这样做必然会导致时间的落差，因为一台新电脑在市场上露面（或甚至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间谍取得），以及苏联工厂能生产出来，这其间的落差愈来愈长。因为在面临最新技术时，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的技术加速度，使得技术的跟进益发困难，既然所有的电子零件及软件都面临同样的过程，因此工业的每个部门都有落差、延宕，而且彼此相互拉扯，以至于技术落差加大。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还约略旗鼓相当的局面，到 20 世纪 80 年代就变成了在设计与生产能力上有 20 年的差距。^②

① 安卓和顾高尔夫斯基（Andrew and Gordievsky, 1990: 521ff）

② 此由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的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评估，在我访问柴林诺格勒期间有六位电子通讯研究所的工程师和经理也证实此评估。卡斯特和纳塔鲁斯科（Castells and Natalushko, 1993）；卡斯特和霍尔（Castells and Hall, 1994: ch.4）。

在软件方面也有类似的发展。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的机器为从事于自己所发展的 ALGOL 语言，此一语言可为系统整合辟出一条道路来，而这是当时计算机的新领域。可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要运算美国式的电子计算机，苏联的科学家就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公式语言（FORTRAN）版本，这很快因为西方的新软件发展而跟不上时代，最后他们就诉诸拷贝，没有得到任何法律的许可。凡是美国出现了什么新软件就拷贝起来，就这样，本来俄国数学家可以在这片科学疆土上大显身手的，如今却拱手让人，又引进一套减速迁延的机制。

为何是如此？为何苏联的军方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选择在技术上依赖美国，这点实在充满矛盾！我那些在新西伯利亚市访问的研究员们，从他们亲身的经验给我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苏联的军方和政治领导者很担心，苏联的电脑科学是闭门造车的发展，而这片领域又大部分尚未开发，充满了不确定性。要是以苏联电脑能力为基础，一旦苏联研究者错失了一个关键性新发展，或是他们的技术轨道走上一个未经测试，却又偏离西方道路的方向，这岂不是危机四伏？要是美国有一天醒悟到苏联本身并没有防卫自己本身的真正计算能力，再转换轨道岂不是太晚了？因此苏联的领导人（很可能是高层所作的决定，由国家安全局提供情报）就采取一条保守而安全的道路：我们就和“他们”一样拥有同样的机器，就算是要复制“他们的”电脑要多花一点时间，毕竟要发动一场大决战，即使在电子回路的技术上落后很多年也没关系，只要有用就好。（p.30）因此苏联的高层军事利益竟导致一个诡秘的状态：苏联在信息技术这样一个关键的领域里在技术上依赖美国。

虽然，日本电子公司在早期阶段也去拷贝美国的技术，但在二三十年之内就成功地在几个关键领域赶上美国了。然而苏联的情况适得其反。为何如此？主要的理由似乎是日本（及后来其他亚洲国家）必须和他们借取技术的厂商竞争，所以他们必须迎头



赶上，可是苏联企业技术发展的节奏却是由军事技术取得程序以及强调量重于质的指令经济所指挥，由于缺乏国际或国内的竞争，所以苏联厂商没什么压力，其创新速度不必比国防部计划人员所要求的更快。^① 当“星球大战”计划这个以军事导向的技术加速度成为事实以后，就坐实了苏联所害怕的美俄两国技术落差，而苏联高级指挥部，尤其是参谋总长欧加可夫（Marshal Ogarkov）所公开表现的惊惧，是推动“改革”的诸多因素之一，尽管欧加可夫下台了。^②

尽管如此，苏联在军事部门以外有足够的科学、工业和技术资源，足以在没有军事衍生产品的情况下改进它的技术表现。可是另有一层国家主义的理由使得此等发展施展不开来。前面已经讲过指令式经济的运作是以计划的完成而不是产品或过程的改善为依归的。创新的做法总是意味着风险，不仅是结果有风险，就是取得必要的资源以从事新的领域的生产能力也有风险。工业生产体系本身并没有内造诱因以达成此一目标，事实上冒着风险创新的行为，就被印烙着可能失败的记号，技术的创新可能没有奖赏反而可能得到制裁。^③（p.31）就如同在经济管理的其他领域一样，这里是一套简单化、官僚化的逻辑来掌管一切，一切技术决定唯命是从。此一论点由一件小事可以举一反三。^④ 多数美国晶体插头长度是 1/10 英吋，负责拷贝美国芯片的苏联电子部下令要使用公制，可是 1/10 英吋在公制上很奇怪，它等于 2.254 厘米，为求事情简化，于是决定创造出“公制英吋”（metric inch）来，因此苏联的芯片仿制品看起来虽像是美制芯片，但却与西方的插座不合，后来发现错误已经太迟，结果 1991 年苏联

① 高德曼（Goldman, 1987）。

② 华克（Walker, 1986）。

③ 柏林纳（Berliner, 1986）；阿甘贝良（Aganbegyan, 1989）。

④ 报道自弗莱德·兰格（Fred Langa），是《数字杂志》（BYTE）的主编；见 1991 年 4 月号，p.128。

的半导体制作设备都不能用来生产西方尺寸的芯片，所以断绝了苏联微电子产品出口的可能性。

还有，在制度上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是分开的，那权倾一时、资源丰富的科学院是所严格以研究为导向的机构，它有自己的计划与标准，和工业企业的需要与问题无联结关系，^①由于无法依赖科学院所做出的贡献，所以企业就利用他们自己部门的研究中心，因为这些部门要有任何交流的话，一定要按照计划正式交流，所以应用研究中心也缺乏彼此的沟通。所以这种由指令式经济的制度逻辑所强加的严格单位间垂直分离，使得“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这个过程无法进行。“做中学”是西方培养技术创新的关键，基础科学、应用研究和工业科技缺乏互动，导致整个生产体系十分僵化，科学发现缺乏实验过程，使特定技术为有限的目的做狭窄的应用，而此时正是信息科技的进展要靠不同的技术领域以电脑网络的通讯为基础进行不断互动之时。

苏联领导人至少从 1955 年开始就愈来愈关心科学和工业之间缺乏生产性互动的问题。1955 年布哈宁（Bulganin）开了一次会议要讨论这个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赫鲁晓夫及其后的勃列日涅夫下赌注在科学和技术上，以迎头赶上资本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小心谨慎地经改脉络之中引进了“科学生产结合体”（science-production association），以建立企业和研究中心的水平联系。^②（p.32）其结果又是充满诡秘。他们赢得了某些自主权，并增加了他们工业和科学单位间的互动，因为他们的报酬是看他们和其他单位相比在生产上有何增加的差额，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种自足的倾向，因为他们只需向他们自己上头部门负责，所以就切断了和其他生产结合体以及其余整个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此

① 卡赛尔和坎培尔（Kassel and Campbell, 1980）。

② 卡桑彻夫（Kazantsev, 1991）。



外各部门不热衷于和他们领域范围之外的合作，而科学院很有技巧地利用害怕倒回百般顺从的斯大林时代的心理抗拒任何想削减其官僚独立性的举动。尽管后来戈尔巴乔夫很想要使这段经验复活，可是科学研究和工业企业的水平联系在计划经济之中无法施展手脚，因此就无法得到各部门的垂直传送的指示，有效地利用各种管道来进行技术发现。

我们举一个邻近新西伯利亚市的学术村阿卡得格罗多克 (Akademgorodok) 科学城的实验例子，可以说明中央计划经济根本没有能力去跟上快速的技术创新脚步。^① 1957年赫鲁晓夫从美国回来以后，决定模仿美国大学校园模型，他深信，只要条件许可，苏联的科学一定会超越西方。在一位顶尖数学家拉弗仁提耶夫 (Lavrentiev) 的建议之下，苏联开始了一个坐落于西伯利亚白桦树林的科学城的建造，该城在人工的鄂毕 (Ob) 湖畔，靠近西伯利亚的工业和政治中心新西伯利亚市，但故意和它隔开来，他们给予苏联一些最好、年轻、有冲力的科学人才充分的定居优惠，以远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学院官僚体制，多多少少免于直接的意识形态控制。在20世纪60年代阿城成了一个主要的科学中心，擅长物理学、数学、信息学、先进材料、经济学等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高峰期，阿城有科学院的研究所20所，也有一所小型的精英大学，新西伯利亚州立大学，那里总共有大约一万名研究员和教授，4500名学生，成千上万的辅助工人和技师。这些机构在各自学科的前沿上运作着，事实上，阿卡得格罗多克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培养了改革的第一批领袖，(p.33) 包括阿贝尔·阿甘贝良 (Abel Aganbegyan) 和塔雅娜·查斯拉芙斯卡亚 (Tatyana Zaslavskaya)。可是尽管西伯利亚科学城在科学上成就非凡，可是却始终没有和工业搭上线，奇怪的是它邻近了西伯利亚的工业中心，在此有主要的国防工厂，包括电子

^① 卡斯特和霍尔 (Castells and Hall, 1994: 41 - 56)。

和飞机厂在内。这两个体系的分离的情况，竟然是科学院本身在阿卡得格罗多克设立它自己的工业以提供科学实验所需的设备，而新西伯利亚市的电子企业却仍旧高度依赖他们那些以莫斯科为基地的研究中心。根据我在1990~1992年间对研究人员的访问所得到的解释是：工业工厂无意于最新的技术；他们的计划要装配他们自己装设好的机器设备，只要生产体系有一丁点改变，这都表示他们无法达到分配给他们的配额标准，因此，惟有国家计划委员会推动技术改变才会有结果。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在决定新的生产配额的同时下令引进新的机器，可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算很少依赖科学机构最先进研究成果可能会生产出的机器。反之，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依赖的是国际市场与这时的先进技术，因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取得的更先进的技术是保留给军事部门的，因此，赫鲁晓夫时代最大胆的实验之一，是打算在全世界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结合科学和技术以形成一个新的发展过程的核心。这项实验在苏维埃国家主义的发展体系所无法脱逃的重压之下失败了。

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早期西方的技术创新不断加速之时，苏联却愈来愈依赖进口机器与技术来促使其主导性工业部门转型，并相当浪费地利用西伯利亚原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所争取的外汇储备来支付。马歇尔·哥德曼（Marshall Goldman）访谈了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时期从事技术出口到苏联生意的西方商业主管，^①据他们的说法，苏联进口设备的利用率很差（约是西方同样机器的2/3效率）；外贸部对稀有的外汇则是能省则省，而主要企业的既得利益在于只要他们被授权进口设备时他们就会囤积最新进的设备及大量的零件；部门彼此间互不信任，使得要协调他们彼此间的政策成为不可能。这就造成了设备不兼容，每一种工厂所进口的设备的偿款期很长，导致技术过时，而

^① 高德曼及其后续页（Goldman, 1987: 118）。



且还有不同年的机器流程共存的可悲事实。此外，人们很快就明白，没有整修整个体系，仅将某一经济部分加以现代化是没用的。这完全是计划经济使得各单位彼此高度依赖，所以要在某些关键部门弥补技术差距（比方说，电子）而不让体系的每一分子和其他成分互动是行不通的。总而言之，把稀少的外国资源用于一个已萎缩但不可缺少的体系区段，又加强赋予军事工业部门的优先性，最后就确立了两个愈来愈不兼容的技术体系：战争机器和生存经济彼此间严重的分离。

最后一项至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压迫以及信息政策控制。这对于以信息处理为焦点的新技术的创新与传布是关键性的障碍。^① 不错，在1966年斯大林主义的过分行爲已经过去了，由“科学与技术革命”的宏伟观点所取代，后者成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赫鲁晓夫失势后，李森科终于在其操纵的知识恐怖行动20年后仓促下台；“控制论”（Cybernetics）不再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科学了；在经济学中也引进了数学模型；系统分析在马列圈子之内也有好评；最重要的是，科学院得到强烈的物质支持以及相当发展的科层自主性，以处理自己的事务，包括自己实施意识形态控制。不过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仍然持续受害于官僚作风、意识形态控制及政治压迫。^② 接触到国际科学界的机会仍十分有限，只有一群受到监视的少数科学家才能接触，结果造成了科学交流的障碍，研究信息经过过滤，科学发展的传布受到控制与限制。科学官僚常把他们的看法强加于挑战他们的人以及创新者身上，并得到政治阶层组织的支持，直到苏联政权结束之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仍持续存在于主要的科学中心，信息的再生产，研究者间的自由通讯，及研究者与外部世界的通讯，长期以来都困难重重，（p.35）这点构成了科学发展与技术传布的重重障碍。

① 斯麦尔（Smaryl, 1984）。

② 弗特斯科（Fortescue, 1986）。

在此温和的改革中，苏联一直追随着列宁以控制纸张供应做为革命后的控制信息的基本做法，印刷、复印、信息加工及通讯传播机器一直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东西，要使用影印机就要得到安全许可：俄罗斯文的文件要两个政府部门签名，非俄罗斯文的文件则要三个部门签名。长途电话线及电传打字机在每个单位内部都受到特殊程序的控制，“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这个想法本身在客观上就会对苏维埃官僚体系，包括科学官僚体系在内，造成颠覆。信息技术的流通，包括机器和技术在内，很难在一个信息控制对国家的合法性、人民的控制极为关键的社会中发生。传播信息技术愈是让外在世界能进入苏联公民的想像表达（再现）（imaginary representation）的世界中，在客观上这类技术让人民能接触到，就愈会有破坏性。因为大体上，由于缺乏信息以及替代的世界观，苏联人民已经由巨服的恐怖态度转为被动的千篇一律，因此苏联国家体制本身就否定信息技术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而缺乏扩散，信息技术就无法发展出超越国家所订定的特定功能性任务。因此使得因使用而带来的创新以及网络化互动的过程无法展开，而这点正是信息技术范型的特色。

因此，苏联技术危机的核心在于国家主义本身的逻辑：军事权力无可置疑的优先性；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僚原则；与世界隔离；无法将经济社会的某些部门现代化，因为技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修正各元素互动的整个体系就无法毕其功。

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正进行根本的技术转型时，此技术落后性的结果对于苏联的意义深远，最后并成为促成毁灭的因素之一。经济的发展无法由扩张模型转换成集约模型（intensive model），所以加速了苏联的衰落。这技术上的落差使得苏联在世界经济市场上无竞争力，也关闭了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大门，因为它只能扮演能源和原料供应者的角色。（p.36）这个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发觉自己陷入一个愈来愈无法和其他工业社会相较量的技术体系中，应用电脑到官僚制度及指令经济中，

增加了控制的难度,^① 结果确认了下列假设: 把社会的不合理性加以技术合理化会增加混乱。最后一点, 军事机器本身受到它和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愈来愈大之苦,^② 因此加深了苏维埃国家的危机。

认同的诱拐及苏维埃 联邦主义的危机

我们国家有许多问题是由于俄罗斯联邦的两条基本原则彼此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民族领土原则和行政领土原则。(叶利钦, 苏联共青团, 1994年2月25日)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标明确地以经济改革和技术现代化为开端, 但此二者并不是苏联制度仅有的缺陷。以多种族、多种族、多层次为基础的苏维埃联邦国家 (Soviet federal state) 是建立在历史重构的流沙上, 并借着无情的压制而得以苟存。^③ 斯大林下令将一族一族的民族人口大量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之后,^④ 苏联下了铁衣般 (iron-clad) 的禁令, 禁止苏联内部 100 多个民族和种族有自由表现民族主义的机会,^⑤ 虽然有些孤立的民族主义示威运动 (例如 1965 年 4 月, 亚美尼亚共和国; 1978 年 4 月, 乔治亚共和国), 有时也会受到武力的镇压 (例如 1956

① 柯夫 (Cave, 1980)

② 华克 (Walker, 1986); 普瑞宁和派瑞 (Praaning and Perry, 1989); 罗恩和伍尔夫 (Rowen and Wolf, 1990); 泰柏 (Tarbo, 1993a)。

③ 卡瑞尔·恩克斯 (Carrere d'Encausse, 1978)。

④ 奈瑞其 (Nekrich, 1978)。

⑤ 墨瑟 (Moryl, 1987); 拉恩 (Lane, 1990)

年3月，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多数民族主义的表现被压抑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惟有在赫鲁晓夫时代或20世纪70年代晚期，相对来说容忍的短暂时期，异议知识分子才有所表现。^① 不过最后使得戈尔巴乔夫改革派实验失败并导致苏联解体的，正是由各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出于个人利益而加以运用的民族主义压力。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内的民族主义，(p.37)为苏联社会主义提供了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基础；而苏联不以历史—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严格政治意识形态，在70年不断灌输共产主义乌托邦主题^②之后，引起了犬儒心态全然不信的反挫。虽然苏维埃国家体系危机和瓦解的最根本因素是苏维埃国家主义无能回应信息社会的技术与经济条件的变动，可是民族认同的再起（不论是有历史根源或只是政治上的发明）却成为最早挑战并最终摧毁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如果说经济和技术等问题是促使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从事改革的原因，那么，民族主义及联邦关系等纷乱所引爆的议题则可以解释为苏联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失去了控制力的主要政治因素。

要解释为何在“改革”年代苏联有一股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的出现，这要从苏维埃共产主义说起，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不只是单纯的苏维埃国家压抑民族/种族文化的故事而已，事实上，苏联一位有名的非俄籍历史学者、亚美尼亚史教授罗纳·格列格尔·桑尼（Ronold Grigor Suny）认为：

迷失在民族主义洋洋洒洒的论述和修辞之中的情况，某种程度可以说明共产主义长期统治的艰难岁月，实际上是持续了革命前的“民族营造”（national building）。当我们这一

① 赛门（Simon, 1991）。

② 卡瑞尔·恩克斯（Carrere d'Encausse, 1991）；卡札诺夫（Khazanov, 1995）。



代亲眼目睹苏联的自我毁灭时，反讽的是苏联不仅是他对于非俄罗斯民族的负面效应的牺牲品，也是他自己对于“民族营造”的“进步”贡献的受害者……苏维埃国家在极为矛盾的政策下，培养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他因此也加强了非俄罗斯共和国内民族的团结和民族意识，即使由于必须符合一强加的政治秩序而全面破坏了民族接合与连续的议程。^①

且让我们来重构此一强大政治自相矛盾的逻辑。^②

苏联建立于1922年12月，而在1924年终将多民族联邦国家正式载入宪法。^③起初它包括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它本身包含了俄罗斯之外的一些非俄自主共和国：（p.38）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泛高加索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后者是一具有潜在爆炸力的人为实体，将数世纪以来兵戎相向的民族：乔治亚人、亚赛人、亚美尼亚人和一些较小的民族包括在内，其中又包括了印古什人（Inquishis）、欧色人（Osetians）、亚卡斯人（Abkhazions）及梅兹克特人（Metsketyans），在1924年秋天又加入了另两个共和国：乌兹别克强迫在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布哈拉（Bukhara）及科雷森（Khoresm）的乌兹别克人合为一国，以及土库曼（Turkmenia）在1936年又创造了三个新的联邦共和国，分别称为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吉尔吉斯坦（Kirghizia）、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1936年将泛高加索（transcaucasia）分为三个共和国：乔治亚、亚美尼亚、阿

① 索尼（Sony, 1993: 101, 130）。

② 民族主义与列宁派的精英动员相关理论与分析见乔威（Jowitt, 1971, 特别见第一部分），他以比较的观点来分析。

③ 派佩斯（Pipes, 1954）。

塞拜疆 (Azerbaijan)。由于这三个共和国的内部有相当的民族因子，最后成了民族主义的炸弹。20 世纪 40 年代强迫爱沙尼亚 (Estonia)、拉脱维亚 (Latvia)、立陶宛 (Lithuania) 和摩尔多瓦 (Moldova) (由罗马尼亚抢来) 纳入苏联，才完成了苏联共和国架构。其领土扩张也包括了并吞克里米亚 (Karelia) 及吐瓦 (Tuva)，将之纳入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内成为自治共和国。在 1939~1944 年间并入由波兰割出的西乌克兰和由白俄罗斯及 1945 年由德国得到的加里宁格勒 (Kaliningrad)。^①

苏联成为联邦国家是革命时期激起政治和意识形态辩论之后的妥协产物。^② 起初，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反对以民族认同做为建立新国家 (the new state) 的主要准则，因为以阶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目的在超越工人阶级与被剥削群众之间的民族差异，这点由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所操控的民族间冲突可看出，也已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证明。可是 1918 年 1 月，在布尔什维克十月政变的内战中，亟须找到军事同盟一事使列宁确信从俄罗斯以外，尤其是乌克兰，寻求民族主义分子的力量的重要性。1918 年 1 月的第三届全俄苏维埃大会采取了“劳动与被剥削人民权利宣言”，描摹出从以前的俄罗斯帝国转向“以联邦为基础自由结合与友爱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轨迹。^③ 除了这种俄罗斯“内部联邦化”之外，(p.39) 布尔什维克又在 1918 年 4 月加入了其他民族的“外部联邦化”的方案，特别是要波兰、乌克兰、克里米亚、泛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其他民族”纳入联邦，可是论争的焦点在于到底以何种原则来处理新苏维埃国家中民族和民族的身份所获承认的问题，列宁和斯大林反对新纳粹主义者 (the Bundists) 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后

① 赛恩 (Singh, 1982); 黑尔 (Hill, 1985); 科兹洛夫 (Kozlov, 1988)。

② 卡瑞尔·恩克斯 (Carrere d'Encausse, 1987)。

③ 赛恩 (Singh, 1982: 61) 所引用。



者要在整个国家结构中承认民族文化，使得苏联成为名符其实的多民族国家，表现在各种制度上。他们反对的是这一种看法：以国土为国家独立状态基础的原则。^①再者，民族权力要以加盟共和国（Union Republics）、自治共和国（Autonomous Republics）和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s）的形态予以制度化，结果是把民族问题整个装进苏联国家的多层次结构这个胶囊中：只要可以编入治理的体系中，其认同就会被承认。这被人视为是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原则的一种表现：调和单一的苏维埃国家方案和承认其领土子民的多样性。^②因此苏联的建构是一种双重认同原则：民族/民族认同（包含俄罗斯人）以及苏维埃认同，后者是新社会的新文化基础。

撇开意识形态不谈，苏维埃联邦的领土原则是一种大胆的地缘政治学战略的应用，其目的在于将共产制度散布到全世界。萨尔明（A. M. Salmin）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型，可以解释苏维埃联邦制度底下的列宁—斯大林战略，^③此一观点认为，苏联是个集中化可是有弹性的制度体，其结构在社会主义目标节节进展于全世界时，能对加入此一体制的新成员保持开放和适应性。因此之故，1924年的苏维埃宪法不仅确立了共和国加盟的权利，也确立其脱离的权利，此一决定属于主权行为并且可逆。历史显示出在苏维埃国家的强制下脱离权的应用是困难的，它只不过是在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分离主义运动者提供法律/制度的基础而已。正是这一个继承了早期的革命逻辑，并于1936年和1977年宪法中再度强调的原则，使得分离运动照字面上来解释革命意识形

① 桑尼（Suny, 1993: 110页以下）。

② 瑞松（Rezun, 1992）。

③ 萨尔明（Salmin, 1992）。

态，并腐蚀着古怪的苏维埃联邦主义建构，最后肢解了它。^①
(p.40)

萨尔明所提出的地缘政治学模型，似乎能切合苏维埃国家起源的历史现实。^② 它总共设立了五个同心圆，做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正统捍卫者——苏维埃国家的安全地带及扩张波。首先是俄罗斯及其卫星的自治共和国，其组织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RSFSR) 之中，这被视为是苏维埃权力的核心。自相矛盾的是，它是苏联中惟一没有特定的共产组织，没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且共和国家制度最不完备的共和国，换言之，是苏联共产党 (CPSU) 的预留领土。重要的是，RSFSR 和潜在上有侵略性的资本世界没有土地交界，在这个苏维埃权力核心的周围，由形式上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RSFSR) 在权利上平等的加盟共和国组成第二层保护国。既然几个 RSFSR 自治共和国例如车臣 (Chechnya) 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是非俄的，因此，它们加入某一苏维埃或是另一个，实际的准则似乎正是加盟共和国和外在世界有直接的边界接触，因此扮演了安全上的领土屏障的角色。第三圈是由“人民民主国”所构成的，这是在苏联之外，但在军事上及领土上受苏联的直接控制。起初这只对科雷森 (Khoresm) 和布哈拉 (Bukhara) (后来分配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蒙古 (Mongolia) 和吐瓦 (Tahnu-Tuva) 才有效。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东欧的人民民主国也扮演这种角色。第四圈是亲苏联的卫星国 (最后由古巴、越南和朝鲜构成此一范畴)，中国尽管取得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却从来没有被放入此一范畴中，事实上它马上就被视为是地缘政治上的威胁。最

① 苏维埃联邦体制的民族—领土原则和苏联的解体过程彼此关系的书籍见格林柏格 (Granberg, 1993b) 犀利的分析。对于事件的搜集，见史密斯 (Smith, 1992)。

② 桑尼 Suny (1993: 110ff)。



后，第五圈是由国际共产运动及其全世界的盟友所组成，它们是苏维埃国家扩张的胚胎，一旦历史条件成熟，资本主义消亡之时，它们就会将苏维埃国家推展到全球。^①

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普遍主义和支持民族/民族认同做为潜在的领土同盟的地缘政治利益两者之间的经常性紧张，决定了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精神分裂症。另一方面，在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以民族为基础的领地（Krai）中，民族文化和语言受到鼓励，在某些例子中得到重建。（p.41）本土化（korenizatsiya）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支持，它鼓励使用当地语言与习俗，实施“防止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在共和国的国家和党机器中采取亲少数民族的招募和升迁政策，并促进土生土长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共和国的组织中发展。^② 虽然这些政策在集体化时代遭到反民族主义压迫的反对，但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又再度抬头，强大的民族/种族精英在共和国内势力巩固。赫鲁晓夫本人是乌克兰人，竟然在苏维埃联邦制的非俄偏向影响之下在1954年决定历史上归属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转归乌克兰，据报是他在乌克兰国庆日前夕晚上豪饮之下做出的决定。再者，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中亚和高加索区共和国，传统的民族特权网络结合了政党附属关系，成了一个紧密的体系，将任命制官职集团（nomenklatura）、侍从主义（clientelism）和灰色经济（shadow economic）结合成一套由下而上的私人效忠体系，直达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这套体制被海林·卡瑞尔·恩克斯（Helene Carrere d'Encausse）称为“黑手党治”（Mafiocracy）。^③ 因此当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想要

① 康奎思（Conquest, 1967）；赛恩（Singh, 1982）；麦可（Mace, 1983）；卡瑞尔·恩克斯（Carrere d'Encausse, 1987）；桑尼（Suny, 1993）。

② 桑尼（Suny, 1993：第三章）。

③ 卡瑞尔·恩克斯（Carrere d'Encausse, 1991：第二章）。

清理哈萨克腐败的党机器时，他任命一个俄罗斯人做党书记，换掉长期以来受勃列日涅夫保护的哈萨克人（勃列日涅夫起初是由在哈萨克担任党的首长而起家的）丁莫罕穆德·库奈（Dinmukhammed Kunaev），在阿玛·阿塔（Alma Alta）引起了一场护卫民族、哈萨克权利的群众暴动。^①

这一政策的最大荒谬之处在于俄罗斯文化和民族传统被苏维埃国家压制着，^② 出于每个时期共产党政治的需要，俄罗斯传统、宗教象征以及俄罗斯人民遭到迫害。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情况和所谓“俄罗斯帝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在共和国之间的交换中，俄罗斯是净输家，^③ 此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后共产时代（见表1-5）。如果我们回到萨尔明的苏维埃国家的地缘政治理论，此一体制运作似乎是要靠党把其他民族诱进体制内的能力，（p.42）以保存共产党在俄罗斯的势力，不仅是靠压迫的力量，同时也提供给他们超过俄罗斯公民所具有的资源 and 权利而取得他们的联盟。当然，这并不表示国家主要制度中没有种族歧视，以军队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指挥官为例，俄罗斯人占去大半；还有许多媒体、文化和科学中的俄化政策。^④ 不过总体来说，俄罗斯民族主义普遍受到压抑，其结果是，当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放松了控制时，民族主义又重新抬头，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是受到人民的支持同时也是解散苏联的关键。俄国民族主义与巴尔干诸共和国内的民主民族运动一道解散了苏联；反之，尽管中亚的伊

① 来特（Wright 1989：40-5，71-4）；卡瑞尔·恩克斯（Carrere d'Encausse，1991）。

② 桑尼（Suny 1993）；史塔络夫托夫（Galina Starovoitova）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斯拉夫与东欧研究中心的演讲，1994年2月23日，姬丝尤娃（Kiselyova）的笔记。

③ 见亚历山大·格兰柏格（Alexander Granberg）的其他作品，格兰柏格和苏菲尔（Granberg and Spehl，1989）以及格兰柏格（Granberg，1993a）。

④ 瑞松（Rezun，1992）。



斯兰共和诸国有他们强烈的民族/种族特性，他们却是苏维埃共产制度的最后堡垒，只在此过程即将结束之时才转向独立之路。这是因为这些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一直受到莫斯科直接的保护，(p.43) 而他们的资源高度依赖苏维埃国家体制内以政治动员为目的的重新分配过程。^①

表 1-5 1987 年各共和国之间生产与资源的交易余额

共和国	输出余额 (十亿卢布)		总余额	
	直接	总量	固定资产 (十亿卢布)	劳动力资源 (十亿卢布)
俄罗斯	3.65	-4.53	15.70	-0.78
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	2.19	10.30	8.61	0.87
白俄罗斯	3.14	7.89	1.33	0.42
哈萨克	-5.43	-15.01	-17.50	-0.87
中亚	-5.80	-13.41	20.04	-0.89
外高加索	3.20	7.78	2.48	0.57
波罗的海共和国	-0.96	-0.39	-3.22	-0.05
总计	0.00	-7.37	-12.63	-0.74

资料来源：甘柏格 (Granberg, 1993a)

另一方面，自治独立的民族主义表现受到强烈的压迫，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决意要清除各种可能的反对力量的后台，以免阻碍他不顾一切代价所推动的加速现代化和建立军事力量的计划。当乌克兰族共产党要员，米克拉·思凯尼克 (Mykola Skypnyk)，了解到在苏联境内，民族解放只是诸多布尔什维克党革命未竟之志中的一个幻影时，他于 1933 年走上了自

^① 卡瑞尔·恩克斯 (Garrere d' Encausse, 1991)。

杀的路。^① 20世纪40年代波罗的海三小国和摩尔达维亚讽刺性地结合在1939年的里宾特洛普-摩尔达维亚协定的基础之上，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地区的民族表现一直受到压迫。^② 甚至，某些忠诚度遭到怀疑的族群和民族被大量驱逐出其原有领地，或是其自治共和国遭到废除：例如克里米亚人、塔塔尔人、窝瓦加日耳曼人，曼斯坎人、因奎斯人、巴克尔人、卡拉柴人、卡曼卡人等。^③ (p.44) 同时，也有数百万的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被怀疑暗中勾结敌人。反犹太人运动是苏联国家长期的特色之一，并贯彻到每一个政治性或专业性的升迁机制中。^④ 此外，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屯垦政策也使得数百万的俄罗斯人（响应苏联国家政策）迁移到其他的共和国内，并变成为数可观的少数，甚至成为最大的民族（例如在哈萨克共和国境内）进而成为各国的具代表性的精英和民族（见表1-6）。在苏联总计约有6000万人民是离乡背井、与出生地分离的。^⑤ 这些多半是人为刻意营造的联盟，充其量只是各地方或区域的精英的合作体系，事实上并不具备民族的力量。真正的实权通常是在苏联共产党的手中，党的严密组织层级遍布在苏联领土上，由莫斯科直接传递命令到各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或地方（Oblast）等的党组织当中^⑥。甚而，经由此大规模不同民族人口混合过程，并也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新的苏维埃认同产生了，并不只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还有家庭纽带、朋友或工作关系之上。

① 麦斯 (Mace, 1983)。

② 赛门 (Simon, 1991)。

③ 尼克里区 (Nekrich, 1978)。

④ 皮克斯 (Pinkus, 1988)。

⑤ 桑尼 (Suny, 1993)。

⑥ 格那和海顿 (Gerner and Hedlund, 1989)。

表 1-6 1989 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民族组成

共和国	面积 (千平方公里)	人口组成比例	
		其他有名称的民族	俄罗斯人
巴什基尔	144	21.9	39.3
巴里雅特	351	24.0	70.0
东臣-印古什	19	70.7	23.1
楚瓜什	18	67.8	26.7
答吉斯堤	50	27.5 (阿发尔斯)	9.2
卡巴达尔-巴尔卡尔	13	57.6	31.9
卡尔梅克	76	45.4	37.7
卡累利阿	172	10.0	73.6
柯密	416	23.3	57.7
玛立	23	43.3	47.5
摩尔达维亚	26	32.5	60.8
北奥塞梯	8	53.0	29.9
鞑靼	68	48.5	43.3
图瓦	171	64.3	32.0
乌德玛尔特	42	30.9	58.9
亚库特	3103	33.4	50.3

资料来源：曹 (Chaw, 1993: 532)

因此，苏维埃国家所具有的民族认同，除了特异的俄罗斯认同之外，同时也因为苏联境内各民族的混合，在各自领地上制度性地建构起不同的认同。在此同时，民族歧视和隔离并且严禁在共产党权力范围之外进行民族自主的各种主张也得以落实。这些矛盾的政策形成一种高度不稳定的政治建构，且唯赖由政府共产党精英所强化的系统性压迫才能持续存在，而这些精英都是苏维埃联邦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但由于将民族或民族的认同转变为各

自的定义，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下惟一被允诺的主张和方式，同时这一动态过程 and 变化也为苏维埃政府制造出挑战其本身规则的各种条件，因此，以民族为基础的共和国的政治动员，包括俄罗斯，都反对一个单民族的超结构，而此实际上也触发了苏联的瓦解。

由此产生了新的、苏维埃民族 (sovetskii narod) 在文化上不同于其历史上每一时期的，脆弱无力到无法对抗苏维埃国家的市民社会。(p.45) 矛盾的是，此脆弱性格绝大部分可以归因于共产党强调民族可以在苏维埃国家定义的框架下，各自拥有文化和制度等权力。而强调这点的原因主要是强化苏联共产党的地缘政治的利益，目的在于捍卫共产党运动的国际势力。因为各民族被允许在原初的、民族或民族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定义，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失败后所遗留的意识形态空缺被简化为卑躬屈膝的犬儒主义和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等两种对立的名词和文化逻辑。虽然此民族主义的缺失在共产党无上权威的铁掌下只产生一些微不足道的震撼，但在政治权宜和压力松弛的改革过程中，它的震波却摧毁了苏维埃国家的根基。

最后的改革^①

1983年4月，大约是勃列日涅夫死后的六个月，由苏联国

① 以下两小节的资料主要是来自我和我在俄罗斯的研究者的田野调查和访问，在前面我已经提过，时间是1989~1996年。面对面的相关受访者包括：阿甘贝良 (A. Aganbegyan)，查斯拉芙斯卡娅 (T. Zaslavskaya)，沙塔林 (N. Shatalin)，雅若夫 (G. Yazov)，欧洛夫 (B. Orlov)，坎卓耶夫 (N. Khandruev)，阿凡纳赛耶夫 (Y. Afanasiev)，柏贝利斯 (G. Burbulis)，盖达尔 (Y. Gaidar)，索金 (A. Shokhin)，格洛可夫 (A. Golovkov)，以及一些苏维埃部长议会的政府官员 (1990~1991年)，以及俄罗斯联邦的政府官



家科学研究院经济与工业工程研究所社会科学部主持于新西伯利亚市召开了一个不对外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自17个城市共120位与会者讨论了一份相当大胆的研究宣告“苏联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上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①。(p.46)这份“新西伯利亚报告书”原为高度机密之用，却神鬼不知地泄漏给华盛顿邮报，并刊登于1983年8月。这份在国外曝光的报告的影响力促使当时尚未充分掌握权力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仔细阅读它并且在党内高层进行非正式的讨论。这份报告是在西伯利亚研究中心社会学家塔雅娜·查斯拉美斯卡娅(Tatyana Zaslavskaya)

(接第49页注①)员(1992年)。这些访谈的初步综合整理请见Castells(1992)。而有关苏联的政治结构以及1990-1993年的政治过程等信息的依据是以俄文资料为基础并访问了一些政治参与者，来自卡斯特(Castells)、沙卡拉坦(Shkaratan)及柯罗梅兹(Kolomietz, 1993)(此俄文版的报告为俄罗斯社会学会编印，莫斯科)。而特定的参考文献惟有在文中提及的论述或发生的事件时才会列出，我认为没有必要将俄文的参考资料或是众所周知的事详列出来。有相当多优秀的英文的出版物陈述近年苏联的改革和政治冲突，其中最好的两本为凯塞(Kaiser, 1991)以及普利策奖得主大卫·潘米克(Pulitzer Winner David Remnick, 1993)。

- ① 《调查》(Survey, 1984)、新西伯利亚报告书的实情和媒体的报道、学术界接受的观点有出入，报告书公认的作者，社会学家查斯拉美斯卡娅写信给姬丝尤娃(Emma Kiselyova)和我表达她对此报告书的起源和作用等看法。它并非如同报道所说的是来自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济会议，而中央委员会也从未讨论这份文件。这份报告书准备发表于新西伯利亚经济和工业工程学院学术研讨会之用。它被严禁散布，并归为“机密文件”，限定份数在会议中使用。在新西伯利亚会议期间却遗失了两份。国安局迅速追查流向，搜索整个研究院及成员，并追回所有与会者手中的文件。包括这份报告书的原稿。作者查斯拉美斯卡娅亦不能保留一份，直到1989年由伦敦英国国家广播电台送给她一份做为个人礼物。根据查斯拉美斯卡娅的说法，戈尔巴乔夫也是在1983年才读到由西方印刷出版的文件，所以令人怀疑他是否精心运用了一些观点于其改革初期，或于1984年10月中央委员会表达经济管理的看法。不过，也有些观察家追溯戈尔巴乔夫1986年2月于27届全会的重要报告的主要成分是来自查斯拉美斯卡娅的新西伯利亚报告。然而，作者查斯拉美斯卡娅本人相当怀疑她对戈尔巴乔夫或苏联领导者在思想上的影响力。

指导下完成的，而当时该研究中心的主任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甘贝良。因此在两年后，阿甘贝良就被新上任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延揽为最高级的经济顾问，而查斯拉芙斯卡娅则被拔擢为莫斯科第一个正式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并经常获得戈尔巴乔夫咨询，直到1988年她的调查资料显示戈尔巴乔夫的民意支持下滑为止。

一般认为西伯利亚报告文件直接推动了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23日第27届苏联共产党全会中的报告。这份报告对于主流的“行政方法”处理复杂经济的能力提出质疑，引发了苏联有史以来最富有野心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于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在那几年中安德罗波夫致力于将共产党从勃列日涅夫统治末期的死水中脱离^①。安德罗波夫自1967年成为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即掌握了足够信息并了解到灰色经济已经蔓延整个系统并且瓦解了指令式经济的核心，使国家高层腐化，也就是勃列日涅夫家族的腐化。工作纪律崩溃，思想灌输也招致大量批评，政治歧见日益增长，阿富汗的战争显示苏联武装部队的科技在以电子为基础的传统非核战事中，落后许多。安德罗波夫成功地获得年轻一代的苏联领导者的支持。这些领导者成长于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p.47)且预备要将国家现代化，向全世界开放，结束长期为苏联当局保守势力所折磨的心态。

虽然，前文所铺陈的系统性矛盾，有可能成为断裂或崩溃关键点。然而，谨慎的苏联领导阶级不愿冒险。如同历史中常见的那样，结构因素不会影响历史发展，除非社会及政治分子的个人利益与之结合。事实上，这些新分子能在苏联共产党中以安德罗波夫为中心组织起来，因为勃列日涅夫指定的继任者，安德鲁·

^① 一个分析文件讨论苏联领导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变迁。见布利斯劳 (Breslauer, 1990)。



契尔年科（Andrei Kirilenko）因动脉硬化而无能为力。尽管其任期极为短暂（自当选到死亡为期 15 个月），且为病痛所苦，但安德罗波夫在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铺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指定他为其代理人，清党并建立了改革者的网络，以便戈尔巴乔夫日后可资利用^①。但这些改革者很少是自由主义的改革者，其中的领导人之一为尤格·列加乔夫（Yegor Ligachev），他在改革期间仍继续带头反对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是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总理，捍卫指令式经济系统，反对沙塔林（Shatalin），雅夫林斯基（Yavlinsky），及其他支持市场导向的经济学者提出的自由提案。安德罗波夫原本的改革计划，着重在借由强而清明的政府，以恢复党内及劳力市场的秩序、忠诚及纪律。而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短期任职的契尔年科旧有部属的最后坚持下，终于在 1985 年 3 月竞选时，首先提出与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主题相互呼应的改革版本。其政见的两项主要目标为：科技现代化，发展机械工业，并呼吁劳工职责及推动明确的反酒竞赛，以恢复劳工纪律。

这也很快地印证了新西伯利亚报告中所说的，要修正苏联颓危的体系，需靠各机关及国内外政策的彻底检讨。^② 基于历史优势，戈尔巴乔夫充分了解此一需要，并勇于接受挑战，深信做为共产党员的中坚，其对基本党纲的信念，应能忍受再结构的阵痛，而使崭新健全的苏联能自此过程中诞生。1986 年，在苏联共产党的第 27 届大会中，戈尔巴乔夫明白表示一系列的政策将成为历史性改革的开始^③。（p.48）

这最后一次的共产党改革，如同苏联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其他

① 关于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政治当局的权力斗争的很好报告，见华克（Walker, 1986: 24 及其后页）或见米契尔（Mitchell, 1990）。

② 见阿斯隆德（Aslund, 1989）。

③ 见阿甘贝良（Aganbegyan, 1988~90）的编撰系列。

先驱者所做的一样，是由上而下，自始至实行初期，皆没有让大众参与。此改革并非出于对大众压力的反应或来自体系外。其目的是要在保留其基本原则之下，修正体系内的内部缺陷：共产党的独裁，指令式经济，以及整个苏联国家的超级强权地位。

严格说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包含了许多他个人决定的政策，目标为苏联共产党的重构，1986年2月（第27届大会）至1990年9~11月，他驳回做为过渡到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且容许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组成一保守政府，阻挠改革，引发了1991年8月反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变。

改革分别包含相关的几点：(a) 裁军，将东欧自苏俄帝国解放，且结束冷战；(b) 经济改革；(c) 民意，媒体，文化的逐步自由化（即所谓的公开性）；及 (d) 政治体系的渐进民主化和地方分权。明显的，民族主义在苏联境内并无争议，直到拿格诺·卡尔巴（Nagorno Karabagh）冲突发生，波罗的海三小国骚动，以及1989年第比利斯（Tbilisi）大屠杀，才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正视此一争议。

结束冷战仍为历史上戈尔巴乔夫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没有他对西方的抉择和信任，并克服主战派对维护安全设施的坚持，解除军备的过程及美苏之间的部分核武器拆除将不会如此顺利，尽管过程中有所迟缓及缺陷。此外，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瓦解，其措施颇为明确。他甚至威胁使用苏联军队，以阻挠柴斯（Stasi）在莱比锡示威中进行扫射的企图。撤回对东欧的控制为戈尔巴乔夫解除武装以及与西方建立真正和平共处的一大步；为了解决苏联经济问题，并将之与世界经济相联系，在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中，这些过程都是必要的。只有将苏联的巨大军事负担加以去除，人力及经济资源才能转向科技现代化，民用物资的生产，(p.49) 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进而重拾苏维埃体系的合法性的新来源。



然而，即使将裁减军备考虑进来，经济改革仍是不易。^① 由于军队的转变困难重重，以致在后共党政权的统治的数年中，仍无法实现。1986年，世界油价下跌，引发西伯利亚油田的生产力及产量下降，使十年来阻止苏联经济短缺的缓冲力减弱，此亦增加了转变的困难。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严重的核事故显示苏联工业的科技失败已达危险的标准，但实际亦增加了戈尔巴乔夫甩掉政府官僚，使之自由化的议论空间。然而，经济改革的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苏联政府，甚至亦来自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所以即使同意某些部门（主要为住宅政策及社会服务）逐步引进半市场机制的同时，也不表示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经济顾问接受土地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经由经济决定价格，将信贷自中央释放，或解除计划经济。假使他们试着推动1990年夏天由沙塔林及雅夫林斯基提出的500天计划，势必面临政府机关及共产党领导者的坚决反对。事实上，当他们于1990年夏天，暗示有此推动的可能性时，即面临了困境。此一困难的根源在于，在破坏共产党势力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于改革中试图利用共产党改革所产生的个人及政治矛盾。由改革产生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实质地扭曲了苏联经济，且造成大量短缺和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引起投机和非法囤积货物，致使灰色经济散布到各阶层的活动。做为指令式经济的寄生者，灰色经济覆盖了商品及服务的分配和整个贸易部门。即使在共产主义结束之后，先前的灰色经济，伴随其犯罪集团的追随者和腐败的官员，成为苏联社会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② (p.50) 灰色经济掌控了最有动力的经济部门，使原先的经济计划更加扭曲，导致苏联经济于20世纪90年代陷入混乱及高度通货膨胀。戈尔巴乔夫并非不切实际的理想家，而是实际的领导者，一位资深而熟练的政党政治家，曾于其出生地

① 见阿甘贝良 (Aganbegyan, 1989)。

② 见例如韩德门 (Handelman, 1995)。

斯塔夫罗波尔 (Stavropol) 省处理区域性的苏联农业危机。他对自身的协调、说服、收买和疏通的能力深具自信，且于必要时，可压迫其政治对手，只要环境许可。他的改革变得既极端又麻痹，原因是他深信他既能够保存不破坏苏联的体系，而同时又不会损害苏联共产党的利益。在此理念下，他首次露出其社会学上的无知及政治学上的自大。假使他真的对查斯拉芙斯卡娅报告中的社会学分析更加注意，他将对其所依赖的社群团体及那些坚持反对任何以其他逻辑支撑苏联体系的企图，不论在政治民主或市场经济等方面，都将有更正确的看法。分析到最后，会发现社会结构对政治计划的命运影响极大。此即为何在此分析中要特别提醒读者苏联权力体系下的社会结构的相关性。本质上，组成苏联社会势力的主要利益团体有四个：^①

1.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者，捍卫马克思主义及列宁主义的价值，且于社会制度及机构方面占有优势。其中包括共产党空论的领袖（改革期间的领导人物是列加乔夫），以及苏联文化传媒机器的权力掌控者，如出版、电视、广播、科技研究所及大学，此外还有官方的艺术家及作家。

2. 政府机器的权力精英，热衷于延续其于苏联政府中垄断的权力，享受其社会地位所附带的特权，尽管他们并不构成一个阶级。此一权力精英至少可分为四个派系，且明显地尚不足以囊括苏联政府的复杂结构：

(a) 苏联共产党的核心政治机制，形成任命制官职集团的来源，(p.51) 为苏联实际的领导阶层。众所周知，任命制官职集团一词有明确意义：指政府及政党的各级职位，其任命需经由相关的党委会通过；最严格的为上层的职位（表面上有上千的职

^① 见兰恩 (Lane, 1990)，卡斯特 (Castells, 1993)，欲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深具洞见的理论性分析见弗德瑞 (Verdery, 1991)。我们也参考了伊凡·史兰宜 (Ivan Szelenyi) 的作品，例如，史兰宜 (Szelenyi, 1982)。



位)，需经由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明确的同意。此为共产党统治苏联数十年的基本机制。

(b) 第二个派系为独特的政府精英群，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官员组成，他们独力操纵整个苏联经济，并指挥相关部长及行政单位。其他国家材料与设备供应委员会及中央银行、行政长官皆包含在内。

(c) 第三个派系为军队的指挥官组成，虽然他们大多服从政党权威（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时期将其大量杀害之后），然而随着军队日益复杂，其自主性亦随之增加，且日益倚赖科技及智力。而且，军方日渐运用其否决权，致使最后十年的苏联政权，都不得不与之磋商行事。如对 1991 年的阴谋者，政府察觉太慢了。^①

(d)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内政部的特殊势力仍于苏联持续扮演一重要、自主的角色，设法超越政党内的政治纷争，以维护政府利益。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安全委员会为 1954 年斯大林死后，于政党联盟及军队镇压贝利亚 (Beria) 和 MVD (前政治警察) 的叛变之后成立的，而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恐怖记忆，军方始终与政治警察有所纷争。因而，尽管持续存在，20 世纪 80 年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非德辛斯基 (Dzerzhinsky) 及贝利亚的历史传承，却是一更专业的军队，仍附属于苏联共产党但着重在权力及苏联政府的稳定，而非其政党结构的意识形态的纯粹产物。^② 这点解释了最后的改革中，安德罗波夫及戈尔巴乔夫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盲目支持，以及 1991 年对其发动的叛变，尽管国家安全委员会领袖克留奇科夫 (Kryuchkov) 的积极参与。(p.52)

3. 第三个苏联权力核心的主要团体，为大型国营企业的工

① 关于苏联军事实力，见泰伯 (Taibo, 1993a)。

② 安德烈 (Andrew) 和高德夫基 (Gordievsky, 1990)。

业主管，特别集中于两大部门：军事工业综合体^①，及石油工业^②。此一团体具有专业能力，且对科技现代化极有兴趣，但基本上，反对自由市场的发展、解除经济的军事控制、放松对外贸易的控制。由于其在企业，及全国一些主要城市及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势力，此一精英团体对改革的反动，明显的使戈尔巴乔夫于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所做的努力受挫，而苏联共产党到 20 世纪 90 年代已在此一精英团体的控制之下了。^③

4. 最后，另一极为重要的利益团体则透过整个苏联政府的结构而组成。这是任命制官职集团及灰色经济的领导者所组成的网络。事实上，此一团体与上述所涉及的个人并无不同，而它在苏联权力系统中的结构性位置却不相同。此一团体反对解除其赖以维生的计划经济。然而，一旦指令式经济发生混乱，与共产党任命制官职集团密切相关的灰色经济，将从中获利，将整个经济转为极具投机性的结构。因为灰色经济于经济混乱中，特别易于兴盛，灰色经济中的如罪犯的领导者，稍后将转变为狂野不羁的原始资本家，这是改革期间及之后的不安定的主要因素。^④

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在不消除其体系所衍生的特权的条件下，企图改革共产主义，所要对抗的相当棘手的主要利益团体。

① 见卡斯特 (Castells) 和那塔鲁斯科 (Natalushko, 1993)。

② 见古列契夫 (Kuleshov) 和卡斯特 (Castells, 1993) (这份原始报告是俄文，可以向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经济工业工程研究所查阅，西伯利亚支部，新西伯利亚，1993)，亦可参考姬丝尤娃等 (Kiselyova et al, 1996)。

③ 此团体于 20 世纪 90 年代秋控制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并阻碍改革，率先为政变的准备铺路，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 (Lukyanov) 为首，还有列宁格勒党书记格达斯波夫 (Guidaspov)，以及米斯鲁科夫 (Masljukov)，费尔琴科 (Velitchko)，和拉芬洛夫 (Laverov) 等军事工业企业体的领袖们，以及中央委员会军事会议的书记巴卡尔诺夫 (Baklanov)。而巴卡尔诺夫被认为在政变的筹划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他做为国家紧急安全的成员，于 1991 年 8 月 19 日被停止权力。(信息来自对苏俄政治观察的访谈)。

④ 见韩德门 (Handelman, 1991)。



(p.53) 而戈尔巴乔夫在对抗意识形态者时表现不错，当体系面临危机时，只要文化操纵的新形式是源自主导精英的实质利益，操纵价值体系的合法化的机制则可以来去自如。相对于那些对改革计划犹豫不前者，尤格·列加乔夫及尼纳·安德列耶瓦（Nina Andreyevas）成为苏联的完美形象。而军队则是必须处理的一个更大的势力，因为军队绝不接受势力削弱，特别是当其理解到整个单位将因缺乏住宿及基本设备无法遣返回乡时，困难将会更多。然而戈尔巴乔夫以裁军是基于在传统武器竞赛中落败后军队需整编及更新设备而获得谅解。军事领袖马歇尔·奥加科夫（Marshal Ogarkov）在公开发表军事预算需增加，以更新苏联军备的声明后，于1984年9月卸任。其实，早在1982年，叙利亚喷气式飞机于贝卡山谷（Bekaa Valley）遭到以色列空军的摧毁，即暴露了苏联军备的弱点。而奥加科夫传达的讯息的确被接受了，戈尔巴乔夫增加了军事预算，即使在经济极为恶化时亦然。戈尔巴乔夫的军事计划与美国的相差无几：皆设法减少花费，拆除过多的核武，同时提高苏联军力的专业和科技品质，以达到超级大国的水平。此项策略，实际上，皆为军方和国安会所支持，因而，基本上，军方并不反对改革，除了两项条件：即需保持苏联国土的完整；以及军事工业需由国防部掌控。因此，戈尔巴乔夫似乎同时深得军方及保守势力的支持，而这两股不兼容的势力也威胁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因为，要实行此两点，必须压制民族主义（不管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观点为何），且工业核心将无法经由市场规则操作。

1987~1990年间，政党的干部集团、国家高层官僚、军事工业综合体与石油界领袖、灰色经济的首脑等有效地抵制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让步，却于政党和政府官僚的结构中，防卫自己。戈尔巴乔夫的政令函成为纸老虎，这与苏联以往的改革如出一辙。

但戈尔巴乔夫是位战士。他决意不重蹈赫鲁晓夫的历史挫

败，(p.54) 借着新一代的共产党领袖的支持，在西方的同情、政府官僚的混乱以及军方和安全势力对政治混战的中立等情形下，反抗苏联的老人政治。因此，为了克服已成为改革障碍的利益集团的抵制，戈尔巴乔夫仍相信社会主义的未来，需以改革的共产党为工具，他说服大众支持其改革：加速将导致改革，而改革有赖开放，且为民主化铺路^①。他不经意触发了共产党、苏联及其自己掌握的权力的终极命运。虽然，对多数苏联人民而言，戈尔巴乔夫是国家最后一位共产党领袖，然而对少数共产党党员而言，他是摧毁列宁传统的叛徒。而就历史而言，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摧毁苏联帝国而改变世界的英雄，虽然他是无意为之，实际上却做了这一点。

民族主义、民主，及 苏维埃国家的解体

为了让社会大众支持其改革，戈尔巴乔夫决定开放政治及大众媒体，并普遍引起各层面的社会动员。在日益专断的苏维埃压力及电视的刺激下，欲弥补历史记忆的空缺，将公开的公共意见、意识形态、价值带入突然开放的社会中，经常会呈现各种表述混乱的情形，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拒斥各种官方的真理。1987~1991年间，日渐升高的社会风暴席卷苏联，知识分子批判现行体制，工人为其权益持续罢工，生态学者揭露环境危机，人权团体筹划抗争，而纪念活动则再度引发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慌，选民利用各种机会于国会及当地选举中反对共产党的官方候

^① 一些优秀的期刊报道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媒体的影响力，见沉恩 (Shane, 1994)。



选人，因而，削弱了权力结构的合法性。

然而，最强大的社会动员，并直接对苏维埃国家构成挑战的则是民族主义运动。^① 1988年2月，亚瑟士人（Azeris）于桑盖特（Sumgait）地区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的大屠杀，（p.55）凸显了拿格诺—卡拉巴（Nagorno-Karabagh）境内亚美尼亚人地区的最新冲突，导致公开的战事，迫使苏联军队不得不介入，且由莫斯科直接管理此地。而在数十年的军事镇压和表面的整合下，高加索境内的种族紧张情势也终于爆发了。1989年4月9日，一场由乔治亚民族主义者于第比利斯举行的大型和平示威，遭到毒气镇压，23人死亡，促使莫斯科从事调查。此外1989年早期，摩尔达维亚民族阵线（Moldavian Nationalist Front）发起一项共和国独立运动，最后被并入罗马尼亚。

然而，最有力且永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运动则是来自波罗的海诸共和国。1988年8月，斯大林与希特勒于1939年签订的吞并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秘密协定被公布，促使三大公国的大型示威活动及人民阵线的形成。此后，爱沙尼亚国会决议将时区自莫斯科改为芬兰。立陶宛开始发行自己的护照。1989年8月，200万人形成人墙，环绕三国的边界，以抗议第五届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协定（Ribbentrop-Molotov Pact）的周年纪念。1989年春季，三共和国宣布其主权独立，且不受莫斯科管辖，此举引发与苏联领导阶层的正面冲突，而导致苏联对立陶宛实行补给品禁运。

重要的是，虽然伊斯兰教主义日益高涨，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之中，中亚的伊斯兰教诸共和国及高加索地区并未反抗苏联政府。高加索和中亚间的冲突，主要为民族间的冲突和诸国内部的政治内战（如乔治亚）或国与国间（如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

民族主义不只是整体的民族认同。它也是苏联民主运动的主

^① 恩克斯（Carrere d'Encausse, 1991）。

要形式，特别是在俄罗斯。引发苏联各主要都市中心的政治动员过程的民主运动从未有一有组织的阵线，亦非由尤里·阿凡赛耶夫（Yuri Afanasiev）和其他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所带领的俄国民众化运动。其中充斥着持各种政治理念的政党，但大致上，此一运动为一反政党运动，乃基于以往高度组织化机构的经验，对于形成的空论及政党的不信任，而引发的社会政治运动，并以下列两项号召广泛地将之组织起来，在俄国犹然，于乌克兰、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诸国亦同：一方面，苏联共产主义以各种形式加以整合，不论重整与否；另一方面，整体基本认同的肯定，其广义地泛指民族认同，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造成的真空下，人民惟一认同的传统。在俄国，此一崭新的民族主义于民间得到极大的回响，仿佛是对反俄国的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的回应。因此，如历史常见的，各地的民族主义彼此滋养。此即为何叶利钦能够击败所有对手，并获得广大支持与信任，而成为俄国的惟一政治领袖的重要原因，即使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共产党竭尽所能地破坏其名声和形象（或许正因如此）。叶利钦于1988～1992年间的主要政治顾问哲纳狄·柏巴利斯（Gennadi Burbulis），在我们于1991年的一场交谈中，试着解释叶利钦对苏联人民的魅力的背后原因。他的话很值得直接引用：

西方观察家所不了解的是，在经历70年的斯大林主义的恐慌，及对所有独立思想的压迫之后，苏联社会呈现极度非理性的现象。基本上，社会各界非理性地依循神话运转。此一当代俄国神话即为叶利钦。此即为何叶利钦成为民主运动的惟一动力。^①

的确，1991年3月28日在莫斯科的一场重要示威，尽管遭

^① 1991年4月12日访问哲纳狄·柏巴利斯（Gennadi Burbulis）。



到戈尔巴乔夫的禁令，此一针对他的民主运动仍占据街头，蔑视军队的存在，成千的示威民众高喊：“俄罗斯（Rossiya）”及“叶利钦！，叶利钦！”遗忘过去和历史，否定现状，并将勇于说“不”而还能生存下来的人神圣化，是新生市民社会的惟一共享的原则。

民主运动、民族主义动员与拆散苏维埃权力的过程，不知为何，乃是苏维埃国家联邦权力结构原先就存在的倾向。这是由于所有的权力皆集中在苏维埃国家与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社会主义最高苏维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最高苏维埃、内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席〕，戈尔巴乔夫主导下的民主化，允许苏联的各城市、地区及共和国的候选人彼此竞争（并非自由的政治结合），（p.57）但须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掌控下。1989~1991年间，多数主要城市议会及共和国国会的席位，多呈现当地竞选人与官方共产党候选人竞争的局面。

苏联国家的阶层结构似乎减轻了政治控制机制所造成的伤害。然而，此一策略精巧地被民主运动的政治谋士所利用，来强化共和国议会的权力，特别是那些与叶利钦合作的人，并以此对苏联中央政府进行某一程度的反叛，为共和国争取应有的权力。因而，所谓的自治或分离运动，同时也是一项分离苏联国家原则的运动，最终是要脱离共产党的控制。此一策略解释了为何1990~1991年间，苏联的主要政治纷争集中在增加俄罗斯联邦的权责与自治，它是惟一无主席的共和国国会。因此，在获得1991年3月15日的新联盟条约的全民公决的多数支持后，戈尔巴乔夫以为已赢得胜利，但事实上，此一全民公决的结果正是苏联解体的开端。这也使得叶利钦的支持者，得以提出是否于6月12日，举行直接普选，表决俄罗斯联邦的总统任期。此举获得选民的赞同，因而主动呼吁的选举，远比对戈尔巴乔夫的新联邦国家的模糊提案的赞同，重要许多。当叶利钦成为俄罗斯第一任

民主选举总统，一项基本分歧逐渐在俄罗斯的政治机构和其他共和国代表间，及苏维埃联邦国家日渐孤立的上层结构间形成。此时，惟有大力明确的镇压，才能扭转此一情势。

然而，苏联共产党已无法进行镇压了。其组织已经被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被唤醒了的社会之价值和方案的渗透所分割、分散与分解。由于受到各方的批评，政治上的任命制官职集团失去其原有的自信^①。比如，叶利钦之所以能于1991年3月成为俄罗斯国会主席，(p.58)起因于一项重要因素，即由鲁兹科伊(Rutskoi)领导而新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加入了民主阵营，反抗民族主义共产党的领袖——波罗兹科夫(Polozkov)，亦即多数俄罗斯共产党的领袖，他曾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事实上，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以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Anatoly Lukyanov)(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为戈尔巴乔夫法学院的同学)为首，决意抵制20世纪90年代秋季的改革。接着继任的帕夫洛夫(Pavlov)政府，旨在重建指令式经济。警力开始于波罗的海诸国维护城市内部秩序，并抑制民族主义。然而，1991年1月内政部特别部队在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电视台的残酷攻击，促使戈尔巴乔夫要求抑制并停止压迫。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预备排除15个共和国中的六个(波罗的海诸国，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乔治亚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等)，建立新联盟协定，并获得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做为拯救苏联的惟一方法。1991年7月25日，在其对中央委员会的演讲中，他略述了摒弃列宁主义和将政党转化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计划。他轻易地获得成功，主要是多数共和国，特别是俄国已脱离苏联中央政府的控制；在无法经由标准程序掌控后，中央委员会的部队和苏联政府的大多数，已经预备对其总书

^① 乔治·布利斯劳(George Breslaue)提醒我，阻挠戈尔巴乔夫改革早期的对抗力量的主要因素是任命制官职集团失去自信。



记和总统发起政变。

1991年8月政变的细节，促使苏联分裂的事件，并未充分揭露与世人，将来是否会揭露，也是令人怀疑，尤其将政治利益的谜团考虑在内。表面上，一场由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且结合国安会的主席、内政部长、国防部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副总理，及苏联政府的大多数，所发起的政变会失败，似乎令人讶异。而且，尽管所有的分析都指出苏联这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1991年的政变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叶利钦与其支持者不站出来，冒着生命危险，以媒体做为其象征性的防御的话；又如果全苏联及一些苏联共和国，其境内人民不聚集在其工作场所，透过上千份的电报到莫斯科，表达其立场的话。虽然经过70年的镇压，于此人民仍感困惑犹豫，(p.59)但也随时准备将起而防卫其新生的自由。即使此政变能获得短期的胜利，也未必说明苏联的危机就会停止，而是整个体系的重组，此危机将以另一种形式收场，历史也会因之改写。有两个主要因素是造成此政变失败的：军方及国安会的态度；以及共产党领导阶层因位居苏维埃国家高层而日渐孤立，致使对国家本身未能充分掌握。安全部队的主要单位拒绝合作：国安会的精锐阿尔法（Alpha）小组拒绝服从攻击白宫的命令，且获得国安会主要指挥官的支持；而伞兵在帕夫·葛契夫（Pavel Grachev）将军指挥下，宣布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效忠；并且，最后，空军指挥官夏柏辛尼科夫（Shaposhnikov）将军，威胁内政部要炮轰克里姆林宫。在接获此一最后通牒的数小时内，对方屈服了。这些决定都是来自军方及国安会在改革期间的转变。并非因其为民主的热烈拥护者，而是他们已经直接参与多数社会演变，因而，任何违反确立的指挥程序的具体行动，都有可能使军方分裂，并引发内战。没有一个有责任的军官会冒险引发内战，尤其此一军队又配有火力强大而多样的核武器。事实上，暴力政变（putsch）本身的主事者也尚未准备发动内战，他们深信展示武力，追随历史先

驱——赫鲁晓夫成功例子，便可合法地罢黜戈尔巴乔夫，且足以将全国置于控制之下。他们低估了叶利钦的能力，也不了解媒体的新角色与其超乎共产党控制的范围。他们图谋发动政变，如同在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一般，而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行走于街上而不需保镖。待其发现此新国家已于世纪末萌芽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其失败亦为其政党国家（party-state）的失败。然而，拆散共产党国家，甚至苏联的分裂都不是历史必然的结果，还需要在接下几个月中，由一小撮在纯粹列宁主义传统中，有决定性的革命者所采取的谨慎行动。叶利钦的谋士伯布里斯所带领的，是新民主俄罗斯的不折不扣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权谋者。在根源于社会的共和国机构中，与孤立的苏维埃联邦国家的上层结构二者间局部进行分化。（p.60）在戈尔巴乔夫尽力设法挽救共产党的分裂，并改革苏联的机构时，叶利钦说服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共产党领袖再次转向民族主义和独立主义。1991年12月9日，他们在比洛夫斯卡雅·普什查（Belovezhskaya Pushcha）协议解散苏联，另立较为松散的独联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做为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共和国的机构，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且具破坏性的社会实验。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在4个月内，即轻松地令苏联解体，显示此一过度增长的国家机器，从此将从它自己的社会中连根被拔除。

历史的伤痕、理论的教训及 社会的遗产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明白地标示了20世纪的发展与结果，及其对全世界产生的影响。不只在其国家的地缘政治投下巨大阴影，同时亦在社会转化的想象建构之上投下巨大阴影。因为长期

以来，全世界的政治左派及社会运动者，从资本主义宣传的扭曲面纱中觉醒之后，尽管对斯大林主义感到震惊，仍将苏联的共产主义视为一线希望，且做为启发及支持的泉源。出生于此前半世纪的知识分子很少能脱离有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及苏联建设的理论魅力。多数西方领导性的社会科学家将其理论建构赞成或反对关乎苏联经验。事实上，一些著名的苏联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评论家在学生时代起就深受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影响。然而，这些全部的努力，人类的苦难及热情，这些想法和梦想，竟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消失，显示出这些论点的空洞。但这毕竟是人类对集体创造政治美景改变历史的巨大能力的惊人表现——虽与原先预期的历史计划的方向相反。而这可能也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最痛苦的失败吧：是对许多苏联及全世界人们的革命梦想与希望的扭曲，自由竟成为压迫，无阶级社会的计划变成特权阶级支配的国家，应与受剥削劳工团结一致，却转为与任命制官职集团共谋成为世界灰色经济的首脑。（p.61）持平地说，虽然在后斯大林时代有些正面的社会政治做为，但苏联的实验确实为其人民与世界带来极大的苦难。苏联事实上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迈向工业化及现代化，虽会有痛苦但也不会是斯大林时期的大屠杀。例如邻近的贫困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施行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地区，相对地成为社会平等，充分就业的社会福利国家，纳粹并非由斯大林击垮（事实上，在发生战事之前，为了施加其个人影响力而使红军多人受害而变弱了）而是由反抗外国入侵者的俄国人所打败，共产党第三国际主导了世界多数地区的革命及社会主义运动，耗费精力，却使许多政治计划停滞，且将整个国家带上绝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与世界各地的分裂和军事壁垒，将部分科技的实质发展与经济增长投注在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中。事实上，美国人（欧洲人在较少的范围内）在参与对抗、发展与使用核武器，为了主导世界而形成

两极对立导致冷战的过程中，需负同等的责任。^①然而，若没有苏联强权的联合、势力与表面威胁，西方社会与公共舆论也不会支持战争和国家军事的扩充，及无耻的殖民企业扩展，正如冷战结束后所显示的局面。进一步来看，一个强权的建立若缺乏生产力的经济与开放的社会为基础，长期看来很难永续的，因此腐化的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并没有为其人民带来明显的利益，除了20世纪60~80年代的一些生活改善和工作稳定的时期之外：这个时期如今是一个被许多俄国人理想化的时期，因为多数人口发觉自己现在正追求资本主义的狂野。(p.62)

然而，最令人嘲讽的历史灾难是共产党国家建构了人类团结的价值，而三代的苏联人民皆受教于此。多数人民真诚的相信，他们彼此分担苦难，并互相帮助以建立一较好的社会，但他们逐渐发现，其信任被享有特权的官僚阶级有系统地滥用。一旦真相大白，苏联人民的心理创伤将可能持续一段颇长的时间：生活的失落感；根源于日常生活的人类价值堕落。因此，在民主的激励与苏维埃解体之后的热潮消退后，犬儒主义与暴力充斥整个社会。苏维埃实验，改革，及20世纪90年代民主政治的连续失败，为俄罗斯和前苏联共和国的土地带来了破坏与失望。

至于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试验中获得的重要教训为理论的架构与政治计划（political projects）的历史发展应保持基本的距离。坦白地说，如果是用认真的企图将之实现的话，所有乌托邦

① 冷战的历史充满事件和轶闻揭露出这两个军事壁垒在理性的限度之外如何满足他们的防卫妄想症。一个可以描绘此种心理的例证，很快就会被遗忘，就是1995年揭发的关于苏联在瑞典海域的潜水艇的秘密。或许有人还记得，近二十年来瑞典海军的实力，受到西方联盟的支持，宣称其国家的海域经常遭到苏联的潜水艇入侵，并诉诸媒体透过电视在世界各地做深度的报道。直到1995年瑞典证实“一个令人窘困的事实：防卫武力曾猎捕到小须鲸，而不是苏联潜水艇……1992年瑞典海军引进声音探测器发现小须鲸会发出和潜水艇相似的声音变项”。（纽约时报，1995年2月12日）至于小须鲸的命运，此报道并无相关说明。



(Utopias) 理想都将导致恐怖 (terror)。理论, 和与其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叙事, 可以是 (且曾是) 有用的理解工具, 同时也可用来指导集体行动; 但它只能是工具, 而且通常要根据经验而被修正, 在这个人类肉身不完美而奇妙的世界, 不该被当成复制或再生产的图式, 因为这样的企图不过是将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合理化。最糟的是, 其支持者深信并将之实现, 如此的理论建构成为政治基本教义派的根源, 并成为独裁及恐怖的暗流。我并非为一种缺乏价值与热情的平淡政治远景而争辩, 梦想与计划仍为社会变迁的动力。然而, 有一种纯粹理性、自我的主体, 搭便车 (free rider) 的类型, 总是待在家中, 让别人去完成历史改变的工作。这种态度 (最经济的合理选择) 的根本问题是, 他们认为集体行动会由其他人来完成。换言之, 其为历史寄生虫的一种形式。幸好, 历史上极少社会是由寄生虫建构的, 因其太自私而无法参与。社会总是由社会行动者所塑造的, 在公开而冲突的过程中, 随其利益、构想与价值而动员。社会与政治的变动决定社会的命运与结构。因此, 苏维埃经验所显示的, 不是要求一种非政治性的、价值中立的社会转化过程, 而是理论分析、社会表征 (再现) 体系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与实际政治实践间应保持距离和张力。(p.63) 相对成功的政治实践总是能够勉强应付历史的限制, 但不是设法跳跃前进, 而是依社会演化的轮廓而调整, 并接受人类行为转变的低调过程。然而此论点并不是在说明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当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与主体意识转变到某一程度, 而当局无法反应此状况时, 革命 (不管和平与否) 是历史过程的正常发展, 如南非所示。当先锋们, 通常是知识分子, 为了满足其权力的欲望与理论的教条, 意图加快历史的脚步而超过社会所能承受之时, 可能会成功并重塑社会, 但通常是在压制灵魂与折磨肉体之下完成的。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可能因此而在图书馆中寻求安慰, 反省其过度扭曲的革命之梦。然而, 自苏维埃经验获得的主要政治教训为革命 (或是改革) 在人类生活中是如

此重要且代价高昂，以至于无法将之仅置于梦想或理论。一切取决于人民采取何种方式达成目的，包括理论与组织工具，以达成其个别生命的集体路线。政治理论所启发的人为乐园将随着苏联政府的解体而永远埋葬。因为从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学到的重要教训是，没有历史意识是超越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之外的。

一般社会理论，特别是信息社会的理论亦可从中获取重要的教训。社会变迁过程是由其发生的社会中的历史时空所塑造的。也就是说，国家主义的动力同时亦成为其结构的限制并且成为体系内相反过程的触媒。虽然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的掌握，可以使人力与物资以权力与意识形态为目标而充分动员，但这样的努力不合经济效益，因其毫无限制的利用与分配稀少的资源。而且其社会忍受性只有在市民社会为高压所统治或是沦落为消极的角色从事劳动和公共服务时，才能达到最低的可能性。在国家主义之下，一旦社会变为积极，其与国家的关系亦变得难以预测。国家本身将因其无力动员其子民（subjects）而衰微，其子民通常以抵制或退缩的方式拒绝合作。（p.64）

苏联国家主义在应对其经济与社会于历史脉络中转化为资本主义时，面临一个特别困难的任务。指令式经济的浪费倾向与军队势力的结构优势所加诸的限制，增加了调适至信息主义所特定要求的压力。奇怪的是，一个以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发展为标志的体系，却不擅长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技革命。此乃由于信息主义的特征，社会主导的信息处理与物质生产间的交互影响，与国家独占信息是不兼容的，与军事部门的封闭性亦不兼容。从组织层级来看，正如西方社会的发展一样，在朝向弹性网络的信息趋势下，垂直的官僚体系已过时了。但与西方不同的是，苏联体系的核心是垂直的指挥链（vertical command chain），这使得大公司要转型为新形式的网络企业机构而面临更多的困难。虽然如此，苏联的经营者与官僚确实也采取弹性与网络做为组织形式，只不过他们将之应用于灰色经济的发展，因而破坏了指令



式经济内部管理的能力，扩大了苏联体系内的机构组织与真实经济的需求之间的差距。

更有甚者，信息社会并不是这个新科技范型的上层结构。它立足于抽象的信息处理的物质力量与社会寻求有意义的文化认同二者之间的历史紧张关系。由这两方面来看，国家主义似乎无法掌握新历史。不只是因其阻挠科技革新，还有挪用历史认同而重新加以定义将之融入所有重要的权力生成过程。终于，国家主义在一个以不断更新信息、信息科技成为经济与军事的基本资源的社会为主的世界中，越来越显得无力。而国家主义亦同时衰微，因其无力在认同基础上产生合法性，最后只得毁灭。由正在快速消退的意识形态结构所代表的国家力量，无法通过历史传统与个人欲望的双重考验。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基本的结构矛盾，苏维埃国家主义并未被出自这些矛盾的社会运动所击垮。(p.65) 苏维埃经验对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的贡献为，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体系可能因其本身缺陷而消逝，但并不一定是由自觉动员的社会运动者所击垮。这样的情形似乎是国家摧毁文明社会基础的历史工作。这并非说苏联的社会构造无力发动政治叛变、社会暴动或革命。实际上，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主义动员，或 1991 年春天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大型示威抗议，显示都市人民持续要战胜苏维埃国家的积极的政治自觉。然而，政治团体极少，且更重要的是，缺乏一致性，积极的社会运动投射不出另类的政治与社会观点。俄国终结苏联的民主运动是一项自由演说的运动，主要以社会表达能力的恢复为特征。俄罗斯民主运动为集体否定经验，否定社会去历史化的经验，以及在民族认同的复杂重建外，不需进一步的价值肯定。当明显的敌人（苏联共产党）解体，过渡时期的物质困难导致日常生活恶化，在经过 70 多年的奋斗后所获得的微薄遗产存于前苏联人民心中，超越从前的集体计划的匮乏时，政治终于呈现混乱，社会陷入个人生存的野蛮竞赛。体系解体造成的社会变

迁的结果，而非另类计划的建构，可在俄罗斯及前苏联社会自苏联国家主义与改革的错误政策所接受的遗产中感觉得到。任命制官职集团为自身利益而调遣部队的行为，与国际货币基金对自由市场政策的错误建议，及个人野心家间的政治派系之争，使经济崩溃至人民难以忍受的地步。犯罪经济与全球犯罪经济结合在一起，其增长的比例在主要工业国家从未发生过。(p.66) 美国的短视政策，目的为将俄国排除于世界政治舞台之外，引起民族主义者的反弹，威胁持续军备竞赛，国际形势紧张。军队中民族主义压力，叶利钦所组政府的政治操作，与权位的犯罪利益，引发了车臣地区的战祸。民主人士迷失在其市场信仰与争取莫斯科政治基地的马基雅弗利式政治的权谋中，而忽略了受伤的广大群众迷失在与他们的国家逐渐脱节的领土上。

苏联国家主义留下最长久的遗产，将是历经数十年被系统性地否定存在的市民社会，并且被压缩成只求原始基本认同与个人生存的社会关系。当权力和金钱之流打算一块块地溶解浮现中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便可以进驻并大口吞噬他们的全球网络之中时，深处在这样的世界里，俄国人民与前苏联人民，他们的集体认同将会混乱不堪。没有一个地方比处于信息社会历史边缘的苏联民族主义崩溃所造成的荒原，更需要在全球流动与文化认同之间进行长期奋斗了。(p.67)

本章共同的研究分析作者是艾玛·姬丝尤娃 (Emma Kiselyova)，有两个主要的资料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由马德里大学俄国研究计划小组和加州大学太平洋地区研究计划所支持的，第二个来源是我于1989~1996年间在莫斯科 (Moscow)、柴林诺格勒市 (Zelenograd)、列宁格勒 (Leningrad)、新西伯利亚 (Novosibirsk)、土曼 (Tymen)、伯力市 (Khabarovsk)、库页岛 (Sakhalin) 等地的田野调查研究成果。合作的单位包括俄罗斯社会学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与工业工程研究所，以及莫斯科青年研究所高级社会学研究中心。四个主要研究计划，



分别由我和下列诸位共同主持，卡拉坦（O.I.Shkaratan）、库列斯夫（V.I.Kuleshov）、那塔路斯科（S.Natalushko）、姬丝尤娃（E.Kiselyova）以及格林柏格（A.Granberg）等。每一个计划的相关资料依不同主题分别反映在文中的注释之内。我要感谢所有俄国的工作伙伴的重要贡献，使我对苏联有所了解，而我所犯的错误或个人的诠释当然与他们无关，他们也不需负责。本章第二组资料来源，主要是参考文献、相关书籍和统计资料，此部分主要是由艾玛·姬丝尤娃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同时我也要感谢本章草稿阶段所获得的仔细而详善的建议和指正，这些人包括塔雅娜·查斯拉芙斯卡娅（Tatayna Zaslavskaya）以及格里格利·格罗斯曼（Gregory Grossman）和乔治·布瑞斯劳尔（George Breslauer）。

第二章 第四世界的兴起： 信息化资本主义， 贫穷与社会排斥

此千禧年末兴起的信息化主义是与全世界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等现象交错发展的。本章试着解释其成因和过程，并简略陈述此人类苦难的新面貌。在资本主义重组的过程中，因其经济竞争的无情的冷血逻辑，使上述苦难发展与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但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分析的，信息化时代的新科技和组织环境，在资本主义利益竞逐取代精神探索的旧模式上，加深了新的强而有力的扭紧效果。

然而，与全球人类真实窘境有关的一些相反的例证，却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之争。毕竟在 20 世纪末上千万的中国人、韩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泰国人、印尼人、智利人、巴西人、阿根廷人、墨西哥人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人等，都已经取得了发展、工业化及消费的通道；即使 1997~1998 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续波及其他地区使数百万人蒙受了财富上的损失。在西欧大部分的人享有历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准。在美国虽然大部分男性（顶尖大学毕业生除外）的薪资截至 1996 年已经有二十年停止增长或降低了。（p.68）但是大量的女性工薪阶级则



相对缩短了其与男性的薪资差距，一般说来，稳定的双薪家庭都能维持不错的生活水准，并能够接受和忍受工作时间不断增加。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的健康、教育、收入等，大致上有相当大的进步并超越了历史的水平^①。事实上，从人类整体角度而言，在过去十年中，只有社会主义解体后的苏联，以及被资本主义排除在外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经历生活条件的衰退（虽然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倒退的现象）。但是，正如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数年前在一篇很好的文章中提到：“中位数并不代表全部的信息”（the median isn't the message）^②。即使我们尚未全面探讨生活品质的意义（包括最近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上述这些对于信息时代黎明时期的粗浅综合记录资料，表露出其因缺乏明确分析，而受意识形态操弄的混乱状况。

这就是为何在评估资本主义的社会动力时，必须从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的几个过程加以区分：一方面，不平等（inequality）、两极化（polarization）、贫穷（poverty）、悲惨（misery）都是属于分配/消费关系或集体努力而生的财富分配不均的范围。另一方面，工作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of work）、劳工的过度剥削（over-exploitation of workers）、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以及异常整合（perverse integration）等则是生产关系的四个特定过程的主要特征^③。

不平等涉及不同个人及团体在财富上彼此间的（收入和资产）分配不均。而两极化则是产生于财富分配的两端增长比中间迅速，以致中间缩减并强化两端人口的社会差距的特定过程。

① 联合国发展报告（UNDP，1996）。

② 古尔德（Gould，1985）。

③ 以比较观点分析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非正式讨论。参见罗杰斯（Rodgers et al 1995）；明奇翁（Mingione，1996）。

贫穷是一种制度性定义的标准，意指以--特定时期和社会的最低生活标准衡量，不可能达到此水准的生活资源层级。（通常指由政府或官方机构制定的每户收入标准）而悲惨一词，即社会统计学家所说的“非常贫穷”（extreme poverty），也就是财富分配的底部，或某些专家所言具广义社会/经济劣势意义的“剥夺”（deprivation）一词。（p.69）以美国为例，极度贫穷是指收入在贫穷线之下的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家庭。这些定义（对于人口分类，社会政策的制定以及资源的分配有很大的影响）显然都具有统计相关性、文化性，甚至是被政治操弄的定义。虽然如此，这些定义至少能让我们在说明信息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差距时能更明确。

第二组的过程与分类属于生产关系的分析，因此，观察家评论“不稳定”（precarious）的劳资关系时，通常是指工作的个体化过程，及伴随而生的不稳定雇佣工作模式。而社会排斥是指某些阶层的人口被永久排除于正规的就业市场之外，这些过程对不平等、两极化、贫穷与悲惨等有很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两部分必须在经验上分别加以分析，以便建立彼此间的因果关系，进而促进对网络社会中社会差距、剥削、排斥等动力的了解。

工作个体化的意思是说劳动自身在生产中为劳工自己贡献的过程，特别是指自我雇佣或受雇于个人式的契约的庞大零乱的工薪劳动。我在第一卷的第四章曾论及此种劳动形式的扩散。我在此仅附加提醒在都市非正式经济中大量呈现的工作个体化的现象，已经变成发展中国家及先进经济体系下某些就业市场的主要雇佣形式。^①

① 波特斯（Portes et al, 1989）。



我用“过度剥削”^① (over-exploitation) 一词来指称一种让资本得以系统性压制报酬/资源配置的工作分配形式，或对特定的劳工施以严苛的工作待遇，甚至低于特定时空正式劳动市场的标准。(p.70) 这涉及管理单位所默许或明文规定对移民、少数民族、女性、青年、儿童或其他劳工的歧视。在此脉络下的一个趋势显示出特别的意义，也就是全世界的童工缺乏保护、受虐、过度剥削的情形再度兴起，而这也改变了存在于晚期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主义、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儿童被社会保护的历史模式。^②

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 是由欧盟委员会所构思提出的社会政策概念，并被联合国国际劳工局所采用^③，依据于欧盟委员会对各国反对社会排斥政策的观察报告所说的：“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水准、参与社交与分享工作机会等权力。”^④ 更精确地说，社会排斥指在由社会制度和价值所架构的社会标准中，某些个人及团体被有系统地排除于能使他们自主的地位之外。^⑤ 在信息化资本主义的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地位通常与家庭成员 (至少一位) 是否能取得正式、可支薪的工作有关。社会排斥基

① 我以过度剥削一词来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剥削概念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在严谨的马克思经济体制之下，此词应适用所有劳工，因为此种分类隐含接受劳动价值理论，偏向于信条而非研究，因此我将避免此项争议，以免因使用剥削一词而造成重大的困扰。所以，我在系统性研究歧视时，宁可采用自己的分类。

② 国际劳工组织 (1996)。

③ 罗杰斯 (Rodgers, 1995)。

④ 鲁姆 (Room, 1992: 14)。

⑤ “自主 (autonomy)” 一词，我意指在社会建构的个人自主/社会他律下的一般界限。很明显地，一个员工即使是自雇的，也没有他的老板或顾客来得有自主性。我所要说的是一种能够呈现出社会道德规范的社会条件，而不是于在社会架构限制下因缺乏社会对需求限定下的资源通道而无力安排自己生计以致无法维持其有限自主性的人们。而这社会建构的自主性将成为说明接纳/排除等不同的社会权力呈现的重要概念。

本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夺个人成为劳工的权力的过程。在社会福利发展良好的国家，社会接纳（social inclusion）可能包含对长期失业和残障的大方资助，而这样的情况将越来越少。我认为长期处在严苛的制度性条件下接受社会福利救助的人，也算是属于被社会排斥的一群，美国就是一个例子。而另外必须澄清的是，在英国大亨或石油巨子中有些独立财富的个人，他们并不在乎是否被划为劳工或非劳工，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是受社会排斥的人。

社会排斥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状况，（p.71）因此分界随时间而有所变化，谁会被排除或接纳，视教育、人口特征、社会偏见、商业状况和公共政策而定。虽然缺乏固定的工作做为收入来源是社会排斥的主要机制，个人或团体为何或如何陷入结构上的困难/无力而走上贫穷也是重要的因素。这不只是缺乏技能或无法找到工作，也可能是疾病袭击那些未受保健给付的社会成员，（例如美国）或是吸毒酗酒使个人人性丧失，还是监狱文化使得有前科的人无法脱离犯罪而重获自由，还是精神创伤或崩溃麻痹了人的灵魂使一个人意志消沉徘徊在心理压抑或不顾后果地违反制度之间。或是更简单，没有一技之长或文盲、非法移民或黑户、付不起房租而导致无家可归，或不幸遇到黑社会或警察，并引发一连串事件而使他们（通常其家人也牵连进去）成为人性败坏的社会边缘的一分子。

此外，在社会网络中，社会排斥的过程与人和领域皆有关。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国家、区域、城市和邻里的人口都会被隔绝。这与传统空间隔离（spatial segregation）过程并不相同，正如我检视美国都市贫民区的新模式时所要说明的，在此新模式之下，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逻辑居主导地位（第一卷，第六章），被信息化资本主义视为无价值且无政治利益的地区，财富和信息的流通跳过这些地区绕道而行（by passed），甚至连人们于今日世界中沟通和创新、生产与消费乃至生活的基本科技



设施都被剥夺了。这个过程导致社会/区域所排除和接纳的地理分布极度不均，并使得大部分的人无法经由信息科技的全球网络累积财富、信息及力量。

社会排斥以及社会整合和政策不足，形成了第四世界，也就是信息化资本主义中具生产关系特殊形式的一个重要过程：我们称之为异常整合（perverse integration），意指犯罪经济中的劳动过程。我所谓的犯罪经济是指犯罪活动所产生的收入。（p.72）此命名没有价值判断在其中，但并不是说我能够宽容毒品走私，而是说我同样不能宽容令人承受极大伤害的正当活动——一个社会对犯罪的看法会对曾从事犯罪活动的人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在第三章将会说明全球犯罪经济（global criminal economy）的形成是信息化资本主义的特点，犯罪经济的增长和正式的经济及政治制度相互依赖。被社会排斥的人口追随那些选择以更有利润、冒险方式谋生的人，造成下层社会人口增加。此现象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动力的基本特质。

此分配关系的新趋势和信息化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再结构、生产关系中的趋势等三者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关系。或是缩小范围来看，网络社会动向、不平等和社会排斥之间也存在着系统性的关系。我将试着提出上述关系的本质及其形式的一些假设。我并不是要提出一个形式化的理论架构，而是想借助个别经验事实的分析来审视上述过程的交互作用和结果并对分析下结论。我将集中分析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及其近 500 万人的社会排斥过程，并将报告拥有先进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美国境内都市贫穷的扩散与加深等现象，同时我也将从不同的观点来讨论全球发展和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过程。在此之前，我将先简略概括地介绍世界上不平等、贫穷和社会排斥的现状。

朝向两极化世界的 全球概况

普利切特 (Pritchett) 在总结世界银行的统计经济学的研究报告中指出^①：“各国人民生产贡献的差异是当代经济史最主要的特征。最富有的国家与最穷困的国家人均收入比，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1989 年已经扩大到 6:1，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落差也增加了 60~100%”。过去 20 年中，财富创造分配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均，在世界各地都有逐渐升高的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与地球上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口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的大。(p.73) 用麦迪逊 (Maddison) 的历史经济统计学方法^②，本纳 (Benner) 和我制作了表 2-1，并转化为图 2-1，以此表来呈现一些国家组群在 1950、1973 和 1992 等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发展，并依照以美国为指标所做出来的相对数值来排列。虽然西欧逐步改善，日本在过去 40 年也迎头赶上，但仍落后美国一段距离。在 1973~1992 年间，麦迪逊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国家所作的调查显示，这些国家甚至落后更多。至于亚洲国家或地区，包括有经济奇迹之称的韩国、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有实质改善的趋势。但以绝对的标准值来看，亚洲国家仍然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贫穷（非洲除外），而且整体而言，只达到美国财富标准的 18%，其中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广大人口。(p.77)

① 普利切特 (Pritchett, 1995: 2~3)。

② 麦迪逊 (Maddison, 1995)。

表 2-1 以 55 个国家为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以 1990 年美元为基准)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美国 = 100)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指标变化 (数字的变化)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指标变化 (百分率的变化)	
	1950	1973	1992	1950	1973	1992	1950-1973	1973-1992	1950-1973	1973-1992
美国	9573	16607	21558	100	100	100	0	0	0	0
日本	1873	11017	19425	20	66	90	47	24	239	36
16 个西欧国家										
奥地利	3731	11308	17160	39	68	80	29	12	75	17
比利时	5346	11905	17165	56	72	80	16	8	28	11
丹麦	6683	13416	18293	70	81	85	11	4	16	5
芬兰	4131	10768	14646	43	65	68	22	3	50	5
法国	5221	12940	17959	55	78	83	23	5	43	7
德国	4281	13152	19351	45	79	90	34	11	77	13
希腊	1951	7779	10314	20	47	48	26	1	130	2
爱尔兰	3518	7023	11711	37	42	54	6	12	15	28
意大利	3425	10409	16229	36	63	75	27	13	75	20
荷兰	5850	12763	16898	61	77	78	16	2	26	2
挪威	4969	10229	17543	52	62	81	10	20	19	32

续表 2-1

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以 1990 年美元为基准)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的指标 (美国 = 100)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的 指标变化 (数字的变化)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的指 标变化 (百分率的变化)	
	1950	1973	1992		1950	1973	1992	1950 - 1973	1973 - 1992	1950 - 1973	1973 - 1992
葡萄牙	2132	7568	11130	22	46	52	23	105	6	13	
西班牙	2397	8739	12498	25	53	58	28	110	5	10	
瑞典	6738	13494	16927	70	81	79	11	15	-3	3	
瑞士	8939	17953	21036	93	108	98	15	16	-11	10	
英国	6847	11992	15738	72	72	73	1	1	1	1	
平均	4760	11340	15912	50	68	74	19	37	6	8	
3 个西方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	7218	12485	16237	75	75	75	0	0	0	0	
加拿大	7047	13644	18159	74	82	84	9	12	2	3	
新西兰	8495	12575	13947	89	76	65	-13	-15	-11	-15	
平均	7587	12901	16114	79	78	75	2	2	3	4	
7 个东欧国家											

续表 2-1

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以 1990 年美元为基准)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美国 = 100)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指标变化 (数字的变化)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指标变化 (百分率的变化)		
	1950	1973	1992	1950	1973	1992	1950~1973	1973~1992	1950-1973	1973-1992	1950-1973	1973-1992
	保加利亚	1651	5284	4054	17	32	19	15	-13	84	-41	
捷克	3501	7036	6845	37	42	32	6	-11	16	25		
匈牙利	2480	5596	5638	26	34	26	8	-6	30	22		
波兰	2447	5334	4726	26	32	22	7	10	26	-32		
罗马尼亚	1182	3477	2565	12	21	12	9	9	70	-43		
苏联	2834	6058	4671	30	36	22	7	-15	23	41		
南斯拉夫	1546	4237	3887	16	26	18	9	-7	58	29		
平均	2234	5289	4627	23	32	21	9	10	36	-33		
7 个拉丁美洲国家												
阿根廷	4987	7970	7616	52	48	35	-4	-13	8	-26		
巴西	1673	3913	4637	17	24	22	6	-2	36	9		
智利	3827	5028	7238	40	30	34	-10	3	-24	11		
哥伦比亚	2089	3539	5025	22	21	23	-1	2	2	9		
墨西哥	2085	4189	5112	22	25	24	3	-2	16	-6		

续表 2-1

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以1990年美元为基准)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的指标 (美国=100)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的指标变化(数字的变化)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的指标变化(百分比的变化)	
	1950	1973	1992		1950	1973	1992	1950-1973	1973-1992	1950-1973	1973-1992
秘鲁	2263	3953	2854		24	24	13	0	-11	1	-44
委内瑞拉	7424	10717	9163		78	65	43	-13	-22	17	-34
平均	3478	5616	5949		36	34	28	3	-6	-7	18
10个亚洲国家/地区											
孟加拉共和国	551	478	720		6	3	3	3	0	50	16
缅甸	393	589	748		4	4	3	1	0	-14	-2
中国	614	1186	3098		6	7	14	1	7	11	101
印度	597	853	1348		6	5	6	-1	1	18	22
印尼	874	1538	2749		9	9	13	0	3	1	38
巴基斯坦	650	981	1642		7	6	8	-1	2	-13	29
菲律宾	1293	1956	2213		14	12	10	-2	-2	13	13
韩国	876	2840	10010		9	17	46	8	29	87	172
中国台湾	922	3669	11590		10	22	54	12	32	129	143
泰国	848	1750	4694		9	11	22	2	11	19	107

续表 2-1

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 (以 1990 年美元为基准)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的指标 (美国 = 100)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的 指标变化 (数字的变化)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的指 标变化 (百分率的变化)		
	1950	1973	1992		1950	1973	1992	1950-1973	1973-1992	1950-1973	1973-1992	1950-1973	1973-1992
平均	762	1584	3881		8	10	18	2	8	20		89	
10 个非洲国家													
象牙海岸	859	1727	1134		9	10	5	1	-5	16		49	
埃及	517	947	1927		5	6	9	0	3	6		57	
埃塞俄比亚	277	412	300		3	2	1	0	1	-14		44	
加纳	1193	1260	1007		12	8	5	-5	3	39		-38	
肯尼亚	609	947	1055		6	6	5	1	-1	10		-14	
摩洛哥	1611	1651	2327		17	10	11	-7	1	-41		9	
尼日利亚	547	1120	1152		6	7	5	1	1	18		21	
南非	2251	3844	3451		24	23	16	0	-7	2		-31	
坦桑尼亚	427	655	601		4	4	3	-1	1	12		29	
扎伊尔	636	757	353		7	5	2	-2	3	-31		64	
平均	893	1332	1331		9	8	6	-1	-2	-14		-23	

表 2-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于 1979 年之后收入不均等的变化

国家	时段	基尼系数的年变化 ¹	
		相对数值 (%)	绝对数值 (点数的变化)
英国	1979~1995	1.80	0.22
瑞典	1979~1994	1.68	0.38
丹麦	1981~1990	1.20	
澳大利亚	1981~1989	1.16	0.34
新西兰	1979~1994	1.07	0.25
日本	1979~1993	0.84	0.25
美国	1979~1995	0.79	0.35
德国 ²	1979~1995	0.50	0.13
法国	1979~1989	0.40	0.12
挪威	1979~1992	0.22	0.05
加拿大	1979~1995	-0.02	0.00
芬兰	1979~1994	-0.10	-0.02
意大利	1980~1991	0.64	-0.58

1: 以基尼系数的相对变化率来看，更凸显不平均的成长和变化。

2: 西德。

资料来源：米契尔等人 (Mishel et al) 以高斯卓克和斯密丁 (Gottschalk and Smeeding, 1997) 资料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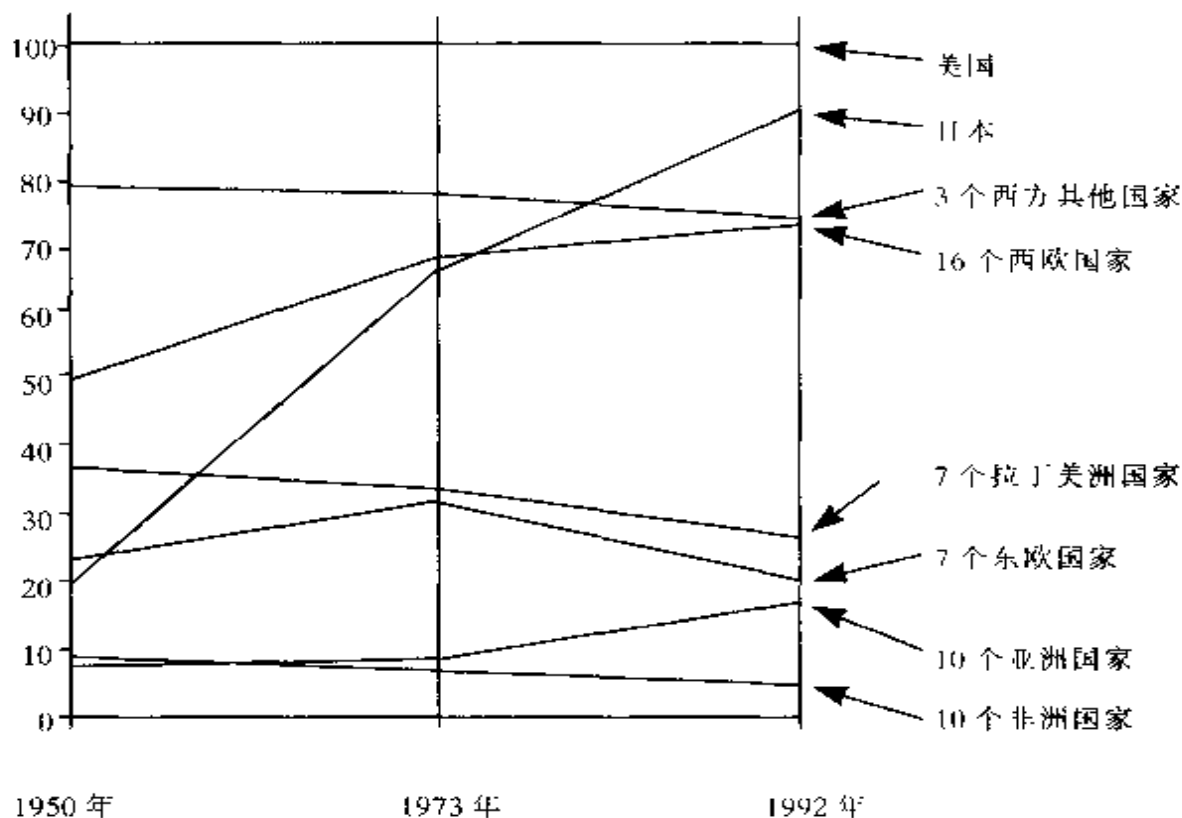


图 2-1 以 55 个国家为例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 = 100)

资料来源:依表 2-1 绘制而成。

然而,即使国家间的财富继续分化,依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标准来看;大体而言,世界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准在过去 30 年仍稳定增长,主要是因为较好的教育机会及卫生情况的改善,使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寿命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40 岁增加到 1993 年的 62 岁,1997 年达 64.4 岁,尤其女性的寿命延长最多。^①

假如我们以全球或比较的观点来看,收入的不均等发展将

① 联合国发展报告 (UNDP, 1996: 18 - 19)

呈现不同的风貌。综合来看，过去30年，财富分配不均和两极化的现象不断增长。根据联合国发展报告（UNPD）之1996年和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在1993年全球人均生产总值23兆美元当中，只有5兆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80%。全球20%最贫穷的人在过去30年中，占全球收入的比例由2.3%降到1.4%。同时，20%最富有的人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则由70%上升到85%。结果造成最富有的人与最贫穷的人之间的比例呈倍数增长，由1960年30:1变成1997年的74:1。1994年全球358位亿万（以美元计算）首富的总资产超过了全球45%人口的国民年收入总和。财富集中情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快速发展：1994~1998年，全球前200位富人的财富净值从4400亿增加到超过一兆美元。而全球前三名的首富资产总额则超过48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其中涵盖六亿人口。^① 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每人收入的差额从1960年的5700美元增加为1993年的15000美元，足足增长了三倍。^② “在1960~1991年间，全球五分之一最富的人认为他们的收入下滑，虽然如此，截至1990年超过85%的全球人口收入却未达其15%。没错，这更是两极化世界的另一指标。”^③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发展也相当不一致，举例来说，过去20年，美国^④（p.78）、英国^⑤、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泰国和俄国^⑥境内收入差距都有

① 联合国发展报告（UNDP，1999：37）。

② 联合国发展报告（UNDP，1996：2~3）。

③ 联合国发展报告（UNDP，1996：13）。

④ 费雪等（Fischer et al 1996）。

⑤ 汤森德（Townsend，1993）。

⑥ 联合国发展报告（UNDP，1996）。



升高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日本^①、加拿大，瑞典、德国^②和墨西哥^③国内收入差距也提高了。但是1960—1990年，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④等国家和地区内的收入差距却缩小了。同样的，根据丹尼杰（Deininger）和斯夸尔（Squire）收集的资料，假如我们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20世纪90年代和70年代间各国的收入不平等，并作不同层级的比较，会发现若将资料用较高层级加以整合和分析，那么，1990年东欧就显得太高，而拉丁美洲略高了一些，在其他地区则又显得过低，^⑤整个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大约都维持在0.58，这也反映出全世界大多数地区高度不平等的现象。^⑥

若我们能够允许各国趋势计算上某种程度的变异，表2.2显示出不平等日益增加的主要趋势，（p.79）该表是以基尼系数的年变化率和数值，来衡量和比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变迁。英国是不平等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但不平等增长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国家是丹麦和瑞典，因为此两国是一向强调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将日本也列入不平等快速增加的组群中，此观察结果将启发一项假设，即网络社会中有不平等日益增长的结构性的变迁和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芬兰是非常先进的网络社会，却没有和北欧其他邻近国家一样的趋势，而意大利也有显著下降的趋势。在此若能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料也放在表2.2中，将可看出不平等的增长有一个更稳定而一般的趋势。东欧和独联体经济变化也使其在20

① 包尔和马森（Bauer and Mason, 1992）。

② 格林等（Green et al 1992）。

③ 斯盖兹利（Skezely, 1995）。

④ 联合国发展报告（UNDP, 1996）。

⑤ 丹尼杰和斯夸尔（Deininger and Squire, 1996: 584）。

⑥ 联合国发展报告（UNDP, 1999: 39）。

世纪 90 年代经历了不平等快速增长等前所未有的经验。在 20 世纪结束之前，俄国前 20% 富人的收入是后 20% 穷人的 11 倍。^①然而，假使各国国内的不平等状态并不相同，那么贫穷，尤其是极度贫穷怎么会成为全球（除了一些例外，特别是中国）普遍的现象呢？渐增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同时对人们接纳与排除，我认为这是信息化资本主义朝向两极化并令更多人陷入悲惨状况的一项特质。据联合国发展报告：

从 1980 年开始，约有 15 个国家经济增长十分快速，并带给其人民剧增的收入。这些国家的人民超过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约有 15 亿人。在此同时，约有 100 个国家经济下降或停滞，导致全球同样是四分之一的人口收入减少，大约是 16 亿人。在这些国家中，有 70 个国家平均收入比 1980 年少，而有 43 个国家平均收入比 1970 年少。而且 1970~1980 年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40%，然而穷人却增加了 17%。全球有两亿人口发觉自己在 1965~1980 年间收入降低了。却有 10 亿人口发觉他们的收入在 1980~1993 年间减少了。^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极度贫穷的底线相当于一天消费一美元，全球有 13 亿人口处于此悲惨状况，约占发展中国家的 33%。这些穷人有 5.5 亿人居住在南亚，(p.80) 2.15 亿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 1.5 亿人在拉丁美洲。^③若以一美元做为极度贫穷的分野，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 1985 年 53.3% 增加到 54.4%、拉丁美洲由 23% 增加到 27.8%、南亚则从 61.1% 降到 59%，东亚及东南亚（不包括中国）则从 15.7% 降到 14.7%。根据联合国发展纲要显示 1987~1993 年之间，每日收入在 1 美元以下的人口增加了一

① 联合国发展报告 (UNDP, 1999: 36)。

② 联合国发展报告 (UNDP, 1996: 1-2)。

③ 联合国发展报告 (UNDP, 1996: 27)。



亿，达到13亿人。如果我们将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的组群加入计算，则又要多出另一个10亿人口。也就是说，在此千禧年之交，全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在最低水平线上生活，或在此水准之下存活。除了比较贫穷的所得或收入之外，其他方面的贫穷则更令人怵目惊心，在20世纪90年代中，约有8.4亿人是文盲，超过12亿人没有安全用水可用，8亿人没有卫生服务，同时，有8亿人饱受饥饿之苦。在欠发展国家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主要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们活不过40岁。女人和小孩因贫穷而遭遇的苦难更多：有1.6亿个5岁以下的孩童营养不良，夭折率是每10万个新生儿中有500人。^①目前，贫穷主要集中在市区内：1990年，巴西都市人口中穷人占66%，秘鲁占72%，墨西哥占43%，印度占49%，菲律宾则占54%。^②至于苏联和独联体国家以及东欧，世界银行1999年4月份的报告计算得出约有1.47亿人生活在每日4美元的贫穷线之下，而相同的计量方式或图表显示在1989年只有1400万人。

另一方面，有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内地和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相当程度减少了贫困。在中国内地的情形是高度经济增长，并伴随城乡流动发展。智利的情形则要归因于首次的智利民主政权谨慎的政策，在皮诺切特（Pinochet）的“奇迹”之后，大约将智利贫困人口减少至43%。^③暂不论其结构性的改变，贫困亦为公共政策的作用之一。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数国家和政府都将技术经济的再结构置于社会福利之上，（p.81）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贫困在多数发达国家也增长了。生活在贫

① 国际劳工组织（ILO，1995：表13）。

② 国际劳工组织（ILO，1994）。

③ 联合国发展报告——智利（UNDP - Chile，1998）。

困线下的家庭，在英国增加了 60%，荷兰则增加了 40%，整体而言，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工业发达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共约增加了 1 亿人。其中包括 500 万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口。^①

世界各地长期贫困的结构，还需加上因为全球金融市场诡谲多变造成的经济危机袭击所带来的贫困。因为，1997 和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增加了 4000 万人陷入贫困，即人口的 20%，同时也使韩国 550 万人、泰国 670 万人陷入贫困。事实上，即使市场和出口可以在短期内复苏，（多数受创于 1997~1998 年危机的亚洲国家约需 2 年）相对而言，就业、收入和社会福利将会受创较长一段时期。根据一项对 1973 年起 80 个国家 300 个经济危机的研究分析显示，出口增长复苏要回到危机前的水准平均约需 1 年，但是实际工资回复则需 4 年，就业增长需 5 年，持续 3 年收入分配恶化，而要超过危机前的水准则需 5 年。^② 此计算方法的前提是三到五年内没有新的危机发生。

因此，整体而言，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发展的特色，事实上同时涵盖了经济的发展与欠发展、社会的接纳与排除等现象。此过程在统计资料比较下明显地反映出来。不管在发展中或发达国家，全球多数国家都经历了财富分配、国内收入不均及贫困与悲惨的实质增加和两极化的发展。然而，社会排斥的模式及其成因仍须做进一步性质上的分析。

① 联合国发展报告 (UNDP, 1997: 24; 1999: 37)。

② 联合国发展报告 (UNDP, 1999: 40)。



非洲的非人性化^①

20 世纪末，信息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兴起正巧与非洲经济的衰退、(p.82) 境内国家的分裂、社会的崩溃同时发生。因此，饥荒、流行病、暴力、内战、屠杀、人口外移、社会及政治上的混乱成为这块大地的主要特质 [而这块土地曾孕育出堪称全人类血缘始祖的——露西 (Lucy)]。我认为结构性的社会因果关系造成了这些历史事件的巧合。以下几页我将陈述在非洲人民否定人性，同时也是对全人类的自我和人性的否定过程中，经济、科技、社会和政治等复杂的交互作用。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信息化/全球经济中排除和选择性的整合

过去二十年里，动态而全球性的经济在世界各地形成，1980~1995 年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消费等都有实质的恶化。(见表 2-2) 这个地区内的 45 个国家约 5 亿人口，其出口利润从 1980 年的 500 亿降到 20 世纪 90

① 这项分析完全是将焦点放在次撒哈拉非洲，但是不包括南非和博茨瓦纳。在我这一整章中凡提及非洲这个国际机构所定义的社会经济单元时，都不包括上述这两个国家。在此段末我将分析南非这个国家对此区域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我将不讨论博茨瓦纳，因为此国家主要靠采收钻石及输出（它是世界上仅次于苏俄的最大钻石产地）。而博茨瓦纳和南非两国经济非常密切，所以也无法将其独立出来和其他国家作比较。尽管如此，我要指出，博茨瓦纳虽然在 1996 年独立之后，其国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 13%，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面临严重的贫困和失业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1996 年的希望杂志 (Hope)。

年代初期的 360 亿元。此数据比香港同时期的出口少了一半以上。以历史的观点来看, 1870 ~ 1970 年, 非洲并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靠着殖民地的优势, 其出口量快速增长, 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比率也急速增长。1950 年非洲输出量超过全世界输出量 3%, 1990 年约降到 1.1%。^① 1980 年, 全球有 3.1% 的出口输往非洲, 到了 1995 年则只有约 1.5%, 全球自非洲的进口量从 1980 年的 3.7% 降到 1995 年的 1.4%。^② 此外, 非洲的出口仍局限于初级商品 (占出口的 92.7%) (p.83), 且主要是农产品 (约占 1989 ~ 1990 年出口比例的 76%), 甚至农产品的输出也集中于少数农作物, 像咖啡和可可就占了 1989 ~ 1990 年间出口利润的 40%。工业制品的输出率自 1965 年的 7.8% 降到 1985 年的 5.9%。在此同时, 西亚的工业制品输出率则由 3% 升至 8.2%。南/东南亚则更自 28.3% 上升至 58.5%。而拉丁美洲则自 5.2% 升至 18.6%。^③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 初级商品的价格持续降低, 因其出口结构的关系, 非洲的对外贸易持续恶化, 且很难在此基础下有所增长。的确, 依西蒙 (Simon) 等人的研究指出, 由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授意用以改善其出口表现的调适政策, 事实上反而增加了其对农矿产品如棉花和铜的依赖, 并使得一些非洲国家, 为了避免初级农矿产品相较于有附加值和服务的商品在价格上长期被压低而带来伤害, 进而将商品朝多样化发展的企图和努力都白费了。^④ 大体上, 多数非洲国家在 1985 ~ 1994 年间, 其贸易有实质上的衰退 (见图表 2-3-2-6)。

另一方面, 低落的国内市场无法维持进口替代的工业, 甚至维持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也有困难。1965 ~ 1989 年期间, 全部生

① 斯夫伯格 (Svedberg, 1993)。

② 联合国 (UN, 1996: 318 - 319)。

③ 瑞德尔 (Riddell, 1993: 222 - 223)。

④ 西蒙等 (Simon et al, 1995)。

表 2-3 1980~1996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每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以 1988 年币值计)				
	1981~1990	1991~1995	1995 ^a	1996 ^b	1980	1990	1995 ^a	1996 ^b		
发展性经济体	1.0	2.9	3.3	4.0	770	858	988	1028		
拉丁美洲	-0.9	0.8	-0.9	0.75	2148	2008	2092	2106		
非洲	-0.9	-1.3	0.0	1.5	721	700	657	667		
西亚	-5.3	-0.6	0.4	0.25	5736	3423	3328	3335		
东南亚	3.9	4.0	5.0	6.0	460	674	817	865		
中国	7.5	10.2	9.1	8.0	202	411	664	716		
欠发达国家	0.5	0.9	0.4	1.75	261	249	238	243		

a: 粗估值

b: 预测值

表 2-4 1950~1990 年全世界、
欠发达国家以及南撒哈拉非洲国家出口值的比较

地区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十亿现金		
全世界	60.7	129.1	315.1	2002.0	3415.3
LDCs	18.9	28.3	57.9	573.3	738.0
SSA	2.0	3.8	8.0	49.4	36.8
			LDCs 所占的比例 (%)		
全世界出口值	31.1	21.9	18.4	28.6	21.6
			SSA 所占的比例 (%)		
全世界出口值	3.3	2.9	2.5	2.5	1.1
LDC 出口值	10.6	13.4	13.8	8.6	5.0

LDCs 是欠发达国家，SSA 是南撒哈拉非洲。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1979、1989 和 1991 表 1.1）由西蒙等人（Simon et al, 1995）整理而成。

表 2-5 1990 年出口的结构 (所占百分比)

地区	原油矿产	其他初级商品	机械和交通设备	其他制造业	纺织和成衣
南撒哈拉非洲	63	29	1	7	1
东亚和太平洋	13	18	22	47	19
南亚	6	24	5	65	33
欧洲	9	16	27	47	16
中亚和北非	75	12	1	15	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38	29	11	21	3
低和中低收入国家	31	20	15	35	12
中低收入国家	27	20	9	45	21

百分比为各地区的出口值；所有的资料都以流通规模加以权重；所有的南撒哈拉非洲国家都是低收入国家除了：(a) 中低收入国家；津巴布韦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喀麦隆、刚果、波扎那、安哥拉、纳米比亚；(b) 中上收入国家；南非、加蓬；(c) 低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

资料来源：1992 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World Bank, 1992)，由西蒙 (Simon) 制作完成。

表 2-6 南撒哈拉非洲主要的生产项目占世界出口的比例

生产项目	生产项目占世界出口的比例		南撒哈拉非洲占世界出口的比例		生产项目占美国出口的比例	
	1970	1988	1970	1988	1970	1988
原油（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331）	5.3	6.0	6.5	6.9	14.0	34.5
非油生产（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0-0, 331 以下）	94.7	94.0	2.2	0.8	86.0	65.5
初级商品 ^a	25.9	16.3	7.0	3.7	73.8	50.4
农业商品	7.0	2.8	6.3	3.6	12.3	8.2
矿物和矿砂	7.5	3.8	9.7	4.2	30.0	14.6
18 种高积分综合商品 ^b	9.1	4.3	16.1	10.0	59.1	35.6

a: 国际标准贸易分类 (SITC) 0, 1, 2 - (233, 244, 266, 267), 4, 68 以及 522.56 等项目。

b: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CTAD) 认定之综合标准商品 (IPC) (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不可或缺最重要的部分) 包括: 香蕉、椰子、咖啡、棉花、棉纱、高纤维产品、麻纤维和麻制品、牛肉、橡胶、糖、茶、热带林木、蔬菜油和种子油、氧化铝、铜、铁矿、磷酸盐、锰、锡等。

SSA 南撒哈拉非洲

资料来源: 摘自 1984, 1986, 1988 及 1998 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的不同表格, 以及 1980 年的表 1-1 和表 1-2, 由西蒙等 (Simon et al, 1995) 制作完成。

产值加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不到 11%。(p.85) 相比之下, 所有发展中国家则上升了 20~30% 间不等^①。农产品的增长跟不上每年人口 3% 的增长率。因此,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食品进口量每年即上升约 10%^②。表 2-7 显示非洲的农业、

表 2-7 1985~1994 年非洲一些国家的贸易项目数

国家	贸易项目数 (1987 = 100)	
	1985	1994
布基那法索	103	103
布隆迪	133	52
喀麦隆	113	79
乍得	99	103
刚果	150	93
象牙海岸	109	81
埃塞俄比亚	119	74
赞比亚	137	111
肯尼亚	124	80
马达加斯加	124	82
马拉维	99	87
马里	100	103
莫桑比克	113	124
尼日尔	91	101
尼日利亚	167	86
卢旺达	136	75
塞内加尔	107	107
狮子山	109	89
坦桑尼亚	126	83
多哥	139	90
乌干达	149	58
津巴布韦	100	84

资料来源: 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 (IBRD, 1996) 表 3, 第 192 页。

① 瑞德尔 (Riddell, 1993: 22~23)

② 西蒙等 (Simon et al, 1995: 22)

表 2-8 1965~1989 年部门增长率 (平均每年增加值的百分率变化)

国家群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65~1973	1973~1980	1980~1989	1965~1973	1973~1980	1980~1989	1965~1973	1973~1980	1980~1989
	低收入国家经济	2.9	1.8	4.3	10.7	7.0	8.7	6.3	5.3
中收入国家经济	3.2	3.0	2.7	8.0	4.0	3.2	7.6	6.3	3.1
相当富裕的中收入国家	3.1	3.6	2.7	6.8	5.4	1.0	7.2	5.4	1.7
南撒哈拉非洲	2.2	-0.3	1.8	13.9	4.2	0.2	4.1	3.1	1.5
东亚	3.2	2.5	5.3	12.7	9.2	10.3	10.5	7.3	7.9
南亚	3.1	2.2	2.7	3.9	5.6	7.2	4.0	5.3	6.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3.0	3.7	2.5	6.8	5.1	1.1	7.3	5.4	1.7

1980~1989 年的栏位内之斜体字表示并非整个时期的资料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 (World Bank, 1990, p.162) 由西蒙等人制作完成 (Simon et al, 1995).



工业和服务业等经济增长自 1973 年起增长就较全球其他地区为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快速增长以后，70 年代的些微上升及 80 年代的工业萧条。非洲工业化陷入危机的同时正是在全球多数国家（包括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朝向科技革新和出口导向发展之时。在此情况下，非洲的经济复苏主要依赖国际援助及国外的贷款。（p.87）外援主要来自各国政府，但也有来自人道捐款，这已经成为非洲的政治经济的基本特质。1990 年，非洲接受全球外援 30%。1994 年，国际援助资金占非洲国民生产总值的 12.4%，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整体又占 1.1%。^① 对许多国家而言，事实上国际援助基金也涵盖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例如莫桑比克即占了 65.7%，索马里则占 45%）。^②

20 世纪 80 年代中，涌入大量国外贷款援助的濒临崩溃的非洲经济（主要来自政府即国际机构，或由类似机构赞助）。结果，非洲成为全球外债最高的地区。（p.88）国民生产总值中总外债所占的比率自 1980 年的 30.6% 升至 1994 年的 78.7%，^③ 且输出值的百分比也由 1980 年的 97% 升至 1990 年的 324%^④。显然，如此庞大的外债不可能偿还，借贷的一方，政府和国际机构即利用此财务上的依赖，将调节政策强加于非洲国家之上。在后续的讨论中，我将会讨论这些调节政策对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所造成的实际影响。

正当全球各地国外直接投资（FDI）持续增长的这段时间，非洲却被绕过了。根据柯莱尔（Collier）所言：

① 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IBRD，1996）。

② 西蒙等（Simon et al，1995）。

③ 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IBRD，1996）。

④ 西蒙等（Simon et al，1995：25）。

过去十年，正当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每年约美金2000亿，而对非洲的投资几乎遭到冷落：目前的估计是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资金少于1%。即使如此，其百分比仍持续降低，1992年其总额比1985年的流入量更少。非洲内地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最低迷的经济危机当中。^①

西蒙等的报告也指出，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国外直接投资在非洲不论是绝对值或相对值都是下降的。1992年总国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只有6%，虽然非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占英国国外工业投资额4%，但到了1986年就只占0.5%了。^②

造成非洲在全球经济中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的原因，在专家中引起热烈的讨论，同时也在政治领袖间引起激烈的争论，保罗·柯莱尔（Paul Collier）根据他对150个东非的外商主管所作的调查结果^③，提出多重原因的解释。其内容可以简化成下列三点：公共环境的不可依赖性、缺乏生产及通讯的基础设备及人力资源，另外，基于国家官僚作风支持当地企业而做出的错误政策，抑制了其出口与投资。到非洲投资需冒的极大风险，令最大胆的投资家也裹足不前。在无法在新的全球经济下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情况下，（p.90）多数非洲国家的国内市场也无法提供其境内资本积累的基础。

然而，并非全非洲皆为全球网络所边缘化，有价值的资源如石油、黄金、钻石和矿物的持续输出，为博茨瓦纳（Botswana）带来实质的经济增长，且提供其他国家相当的利润，如阿尔及利

① 柯莱尔（Collier, 1995）。

② 西蒙等（Simon et al, 1995: 28）。

③ 西蒙等（Simon, 1995: 28）。



亚。问题在于如何利用由这些资源所获致的利润及政府所接收的国际援助基金。^①许多国家中，少部分的富有官僚阶级展现了对昂贵进口商品的高消费能力，包括西方食品及国际流行服饰。^②资本自非洲国家流向个人账户及有利可图的国际贩子，极少数独占利益的个人并未将私人累积的财富投资在生产资源的国家之中。^③因此，虽然绝大部分的人口经济状况面临困境且挣扎于生存与暴力掠夺之间，但非洲的资本、贵重物品的市场及有利利润的输出仍有部分整合入全球资本当中。^④

此外，在非洲企业难以和全球经济竞争的同时，经济的连带关系又渗透进非洲的传统产业部门。由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与特殊经济作物，必须极力在国际市场卖出，结果造成许多国家的民生作物及食品在本地市场也陷入危机。^⑤因此，所谓全球性的边缘化，仍然以非洲为中心，而其传统的经济形式已遭到真正的破坏^⑥。依此，非洲并非全然排除于全球经济之外，相反地，非洲经由有限的农矿产品输出、高价资源的投资，及与国外金融的交易和进口商品的消费等片段地编入全球经济中。

在全非洲缺乏外资时，信息科技革命已经转变了各地的生产、经营及通讯基本结构。(p.91)因此导致非洲的公司和劳工与全球的新经济状况脱节 (de-linking)，同时将非洲的精英与财富、权力、信息与通讯的全球网络联结 (linking up) 在一起。

① 杨森 (Yansane, 1996)。

② 艾克门·弗里德曼 (Ekholm-Friedman, 1993)。

③ 杰克逊和罗斯伯格 (Jackson and Rosberg, 1994); 西蒙等 (Simon et al, 1995)。

④ 布鲁斯壮和鲁德哈尔 (Blomstrom and Lundhal, 1993); 西蒙等 (Simon et al, 1995)。

⑤ 贾马尔 (Jamal, 1995)。

⑥ 卡拉格和瑞芬黑尔 (Callaghy and Ravenhill, 1993)

非洲在信息时代黎明的技术隔离

当代培养或获致财富、权力、知识的要素乃是利用信息科技及适应它的能力（参见第一卷二、三章），假如将一些非洲经济、社会与全球网路相关的财物纠纷及国际管理问题抛开，非洲可以说一开始即被排除于信息科技革命之外。

不只是因为非洲乃目前全球最缺乏电脑设备的地区，同时也因为非洲缺乏使用电脑所需的最低基础设备，因而使得提供各国及团体电子设备的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① 确实，非洲要进入电子化前，首先必须要有稳定的电力供应。在 1979～1993 年间，非洲地区的商业使用能源由每人 251 千瓦上升到每人 288 千瓦。而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的消耗量则是非洲的两倍，自每人 255 千瓦上升到每人 536 千瓦，至于工业国家的消耗量则每人达 4589 千瓦。^② 此外，信息时代中，使用电脑的主因即因电脑本身的网络化能力，而此能力主要是有赖于电信的基础建设与网络的联结性（networking connectivity）。非洲的电信设备相较于目前世界的标准稍嫌简陋。曼哈顿及东京的电话线比整个撒哈拉非洲还多。1991 年，非洲约每 100 人才有一条电话线，而发展中国家则有 2.3 条，工业国家则有 37.2 条。1994 年，非洲所拥有的电话线只占全世界的 2%。^③

发展电信部分障碍来自政府的官僚体系及其对国营企业的保护政策。安装任何电信设备都需获得其国家电信局的许可，电信设备仰赖进口十分昂贵，（p.92）不可靠且常在海关“遗失”，这

① 欧德拉等（Odedra et al, 1993）；詹森（Jensen, 1995）；希克（Heeks, 1996）。

② 联合国发展报告（UNDP, 1996: 183）。

③ 霍尔（Hall, 1995）；詹森（Jensen, 1995）；联合国发展报告（UNDP, 1996: 167）。

一切都减缓了其现代化的脚步。^① 非洲团结组织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创立了全非洲电信联盟来协调非洲的电信政策, 然而, 蒙博托 (Mobutu) 却坚持将此机构的办公处设在扎伊尔 (Zaire) 这个全非洲最差的电信网络地之一, 因而降低了此联盟的影响力。由于国际频率的不足, 加上非洲国家间缺乏联结性, 使上网的空间非常有限。1995年, 一半以上的非洲国家无法连上互联网 (Internet), 且至目前为止仍是世界的断了线的区域 (the switched-off region) (见图 2-2)。然而, 在 1996 年, 有 22 个非洲首都能够充分连上互联网, 但只有一个国家 (塞内加尔), 在首都之外的地区也能联络上网。^② 因此, 除了一些管理中心能够连上互联网, 其他地区则断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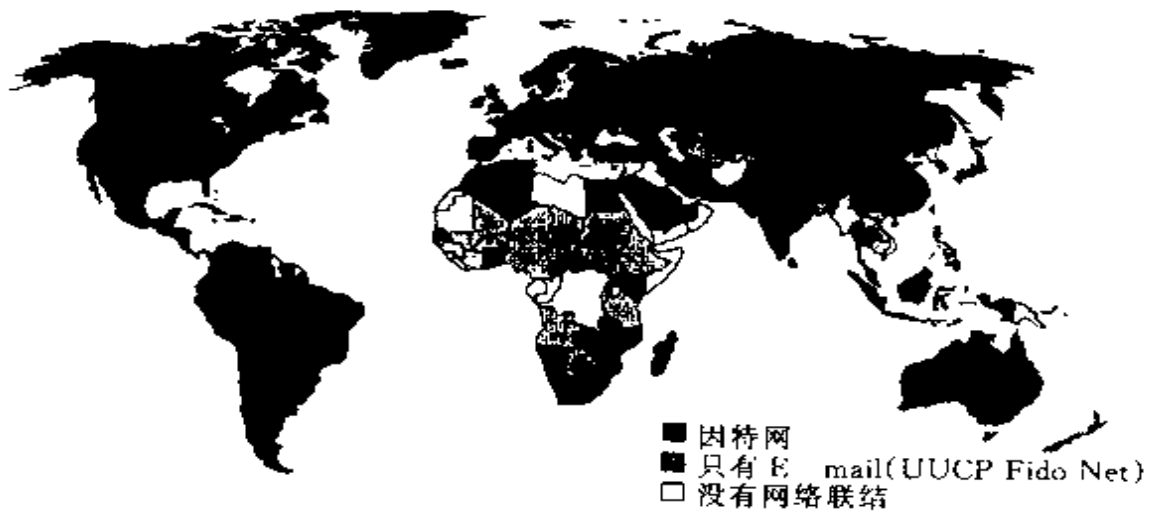


图 2-2 国际的网络(互联网)联结

资料来源:1995年 Larry Landweber 和互联网社会

除了硬件的基本设施落后外, 非洲的信息科技人才也十分缺乏。非洲信息科技的观察家马尤瑞·欧德 (Mayuri Odedra) 写

① 亚当 (Adam, 1996)。

② 詹森 (Jensen, 1995)。

道：“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地区缺乏电脑相关技术，包括系统分析、程式、电脑维修以及咨询等，且在操作层面从基础使用至管理技术都相当匮乏。多数国家缺乏教育与训练机构来训练人们取得必要的技能，而现有的少数训练中心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只有一些国家的大学提供电脑科技学位，如阿尔及利亚等。其他国家所提供的课程主要是文凭和证书，但是缺乏技能训练。这迫使经营者必须聘用外籍员工，但这些员工对当地团体缺乏了解，因而设计出拙劣不适用的系统。”^① 大多数的电脑都被用来处理例行的资料，很少用来协助作决策，而非洲政府部门在经济中强力运作执行“盲目的电脑化”（blind computerization），起因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和国外电脑政府公司的财务诱惑，但却未将设定好的电脑真正应用于处理相关信息。政府部门通常对电脑设备的取得采用集中管理且规定繁琐，并且对私人公司课税而降低个别的进口量。虽然有限的电脑化为非洲的官僚创造出另一条生财的来源，但这些和该国的经济或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无关。^② 20世纪80年代，进入非洲的电脑有一半是捐助或过时的。（p.94）因此有专家认为非洲已经成为快速科技革新所制造的大量过时设备的垃圾场。至于个人电脑市场，主要是由一般被认为会负责维修的多国市场所把持。大部分的系统从购物架上被卖出，只是以口头常识告之如何操作，至于系统的执行或修护则是一片空白，在极少数本地的软件店也只能从事小规模的程序设计工作。^③

在世界其他国家加速科技革新期间，非洲的技术依赖和技术落后（低度发展），令其不论是在制造业或先进的服务业都无法在国际间与其他国家竞争。至于其他活动也相当需要有效率的信息处理，例如兴盛的旅游业，则由国际领队与旅行社借着市场信

① 欧德拉等（Odedra et al, 1993: 1-2）。

② 贝兹（Bates, 1988: 352）。

③ 沃赫雷姆（Woherem, 1994）；希克（Hecks, 1996）。



息的操控而瓜分旅游市场的大饼。甚至连占非洲出口大宗的农业和矿业出口也越来越依赖能管理信息的国际经理人，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所需的电子设备及化学/生物工艺的进口。由于非洲国家无力制造/使用先进科技设备和知识，以至于其无法维持贸易平衡；因为相较于原料和农产品，不断增值的科技加工产品及服务也让非洲国家进口维持农矿产品生产原料的能力被限制。当信息化/全球经济朝科技革新不断三级跳时，非洲逐渐变成边陲，并且在竞争中不断下降盘旋。在这信息时代的黎明，非洲的非信息化也许是新的依赖形式施加在非洲内地的永久伤痕，而掠夺性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则加深此伤痕。

掠夺性的国家

越来越多非洲主义者都有个共识，认为非洲的民（国）族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层面在扮演破坏性的角色。（p.95）加纳（Ghana）中央银行的前任官员佛瑞朋-安萨（Frimpong-Ansah）就认为资金紧缩并不是发展的障碍，真正的困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动用存款的制度性能力被腐蚀了，由于“吸血鬼国家”（vampire state）对资金的滥用，国家全然被一群谋己利的政治精英所垄断和继承。^①一位在非洲颇受尊重的非洲主义者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从另一个观点认为“非洲的危机来自许多动乱与冲突，但是根本的问题与这些都没有关系……，基本上，应该说是制度性危机。怎么样的制度呢？我们要探讨的是在殖民阶段结束后新非洲独立民族国家所赖以产生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变成了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②法顿（Fatton）强调“掠夺统治”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特色，此乃起因于统治阶层的个人化过程：“其成员主要是外籍雇佣兵，他

① 佛瑞朋-安萨（Frimpong-Ansah, 1991）。

② 戴维森（Davidson, 1992: 10）

们在职位上的特权和力量取决于最高领导者变幻不定的决策。”^①这似乎也可说明残酷的独裁统治者，例如扎伊尔的蒙博托 (Mobutu) 或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 (Bokassa)、“君主”，再如象牙海岸的胡布威-拔尼 (Houphouet-Boigny) 伪民主政权。如同柯林·奈斯 (Colin Leys) 所言：“马克思理论或依赖理论信条的理论家几乎无法想象秉持其意识形态各流派发展的后殖民国家竟会如此腐败、贪婪、无能及不稳定。”^②

让-弗兰西斯·贝耶特 (Jean-Francois Bayart) 认为非洲的困境是其“政治资源” (the politics of belly) 长期为精英把持的历史效应，因为这些精英不仅无法提供任何策略，且不断利用其国内和国际的关系诈取国家的财富。^③ 让-弗兰西斯·贝耶特举出了个人利用国家职权掠夺资源的几种机制类型：

- “向外”获取资源的通道 (国际联结)。包括外交军事资源、文化资源和西方的专门技术知识。

- 在政府公共部门的职位，提供定期的工资和资产，不论多寡。

- 在可掠夺的职位上，利用其权力获取商品、现金或劳力。(p.96) 至少在乡下许多行政及政治干部都是如此。^④

- 非以暴力或威胁所获致的政治献金 (prebend)，来自各利益团体的贿赂和捐献。由此普遍形成国家非正式经济。大多有潜在利益的科技或行政决策皆成为有意的政党竞逐的标的。贝耶特引述扎伊尔的富庶省份——沙巴为例，1974年，此地的委员月薪为2000美元，另外，得自政治献金一个月约10万美金。^⑤

① 法顿 (Fatton, 1992: 20)。

② 李斯 (Leys, 1994: 41)。

③ 贝耶特 (Bayart, 1989)。

④ 贝耶特 (Bayart, 1989: 76)。

⑤ 贝耶特 (Bayart, 1989: 78)。



- 国外贸易及投资的环节为个人财富累积主要来源，海关的职责及保护政策令负责的官僚有机会从中获利。

- 国际开发援助，包括食品援助也在私人谋取利益的范围内。这些援助即使能抵达贫困地区或预定救助的目标，也是在政府机构及负责分配和执行的人员打过折扣后。

- 大部分官员及政治精英将收入的财富用来置产，及投资国内的农业及运输业，并不断寻找有利可图的短期投资机会，而且彼此支援合力掌控国内任何有利的资源。然而这些个人财富绝大部分存放在外国银行，占每个国家累积资本的相当大比例。如象牙海岸的教父——胡布威-拔尼（Houphouet-Boigny）所言：“世界上有谁不把部分财产存入瑞士？”^① 1984年，蒙博托存在国外银行的私人财产及国外投资估计有美金40亿，约相当于扎伊尔的外债总数。^② 到了1993年，扎伊尔经济衰退期间，蒙博托于国外的资产已经增加至100亿美元。^③

刘易斯以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分析基础，提出掠夺性（predation）与政治献金主义（prebendalism）之间的一项有趣的区分。^④（p.97）“政治献金主义”基本上与全球多数国家的政治特权或政治制度腐败并无不同，他认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阿尔及利亚在巴邦吉达（Babangida）政权统治期间，政治掠夺才兴盛起来，且经由军事控制的寡头政治散布“扎伊尔化”的口号。虽然，刘易斯并未将其分析扩展至阿尔及利亚以外的国家^⑤，而认为此掠夺式的统治发生在非洲危机的晚期阶段，因为每个国家依其情势的不同而发生于不同时期。但是，此

① 贝耶特所引用（Bayart, 1989: 101）。

② 桑布鲁克（Sandbrook, 1985: 91）。

③ 肯普斯特（Kempster, 1993）。

④ 刘易斯（Lewis, 1996）。

⑤ 法顿（Fetton, 1992）；荣格拉-塔拉耶（Nzongola-Ntalaja, 1993）；奈斯（Leys, 1994）；凯萨尔（Kaiser, 1996）；《经济学家》（1996a）。

论点与贝耶特的历史重建论中的主张却正好相反，贝耶特认为非洲的政治精英掠夺始于前殖民时期；相较于政治献金主义，掠夺式统治的特点在于权力集中在上层阶级，以及此权力代表网络的个人化，且因无情的压制而增强。经济诱因及其对政府人员的刺激、普遍的腐化与贿赂成为政府的内部模式。此种行为模式导致政治制度腐蚀，并为个人及种族忠诚紧密结合的关系网所取代：整个国家非正式化，而权力及权力网络则朝向个人化。然而，掠夺统治存在于前殖民期或独立后非洲民（国）族主义早期的论辩并不重要（贝耶特认为前者才是正确的，然而他的看法受到了戴维森、刘易斯、费特等其他人的观点的挑战），要了解目前的社会排斥过程，掠夺统治模型及政治献金主义同为 20 世纪 90 年代多数非洲国家的特征，除了南非和一些可能的案例之外。

掠夺统治的三个主要结果成为多数非洲国家的特征。首先，无论是国内或国外资源进入这些国家主导的经济都依私人财富积累的逻辑处理，即大多与国家经济脱离。从国家经济发展观点来看这毫无道理，但统治者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却感到十分正确。第二，能接近国家权力中心即表示有获得财富及未来财富资源的通道。其间通常伴随着暴力对抗的模式，以及不同政治派系间不稳定的联盟，彼此竞争获取掠夺机会，这又导致国家制度的不稳定，且军队在非洲多数国家扮演重要的角色。（p.98）第三，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在于建立联结掌权者与部分人口的侍从主义式网络（clientelistic networks），由于国家绝大部分的财富掌握在政治/军事精英及政府官僚手中，人们必须对其所支持的对象效忠，以便被包含在工作分配和服务的范围内，并在国家各方面大小事宜皆能获得帮助：无论是国际机构或是当地政府的慈善机构。在此政治特权系统下，不同层级政府的各个精英，最终要联系国家权力的顶峰，必须仔细计算其策略：如何以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大的支持并巩固由种族性、领域性、经济性交织的准则，构成非洲大多数真实政治的多变几何形式的网络。



详细的经验分析不在此章的范围内，不过，我仍将以非洲两个最大的国家——扎伊尔（1997年更名为刚果）和阿尔及利亚来说明非洲掠夺国家的变动和发展。

扎伊尔：为个人所占有的国家

扎伊尔至少在1997年前（此后更名为刚果）是非洲掠夺政治的缩影，为社会、政治崩溃的警示，也是人类受难所（层出不穷的流行病、掠夺、暗杀及内战）。这些皆起因于政治关系。^① 扎伊尔于冷战期间便由蒙博托的个人独裁政府所管辖，并为法国、比利时、美国所支持。洛杉矶《时代》杂志的记者于1993年写道：蒙博托是比利时殖民军队的前任中士，在1965年，他获得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支持，结束了支持共产党和反共产党派系间的混乱敌对状态，并获得政权。三十年来，他让美国中情局及其他西方机构代理其广大的国土——次撒哈拉第二大国，并让这些机构以此为基地从事活动，他则在家中享受，并用扎伊尔矿产中获利的数十亿美金来自娱，而弃多数扎伊尔人于贫困而不顾。^② (p.99)

蒙博托依靠极简单的权力系统，来掌控军队唯一的指挥单位——总统侍卫队，并且在行政管理机构及军职之间划分不同种族的政治立场。^③ 他好像照顾所有的人，但也煽动他们之间的暴力冲突。他专注于管理矿业，特别是钴、工业宝石、铜等，将矿业纳入国营企业并与国外投资者合作，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些“扎伊尔化”（Zaireanization）的外国公司也将所有的资产投入官僚及军

① 桑布鲁克 (Sandbrook, 1985); 贝耶特 (Bayart, 1989); 大卫森 (Davidson, 1992); 诺贝尔 (Noble, 1992); 坎培斯特 (Kempster, 1993); 普力斯 (Press, 1993); 奈斯 (Leys, 1994); 法兰奇 (French, 1995); 卫斯 (Weiss, 1995); 麦克凯利 (McKinley, 1996)。

② 坎培斯特 (Kempster, 1993: 7)。

③ 普雷斯 (Press, 1993)。

队手中。对于社会福利及基础设施，他并没有加以投资，而是另辟有利可图的投资事业，并将其营利收入送往国外。他带动鼓励整个军队和政府都这么做。贝耶特指出扎伊尔的空军从事非法的空中运输，走私，甚至将飞机拆开来贩卖，直到飞机无法使用。^①如此，蒙博托便可向其西方盟友要求额外的航空设备。对当地及地方政府缺乏管制的结果导致扎伊尔国内的实际分裂，几乎所有地方都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包括金沙萨（Kinshasa）在内。1991年9月的反叛军四处任意掠夺，造成许多外国人撤离，并使蒙博托的势力范围退到其家乡——伊奎特省（Equateur）的巴多里特（Gbadolite），并由其私人军队保护。他本人则大多逗留在位于瑞士、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别墅里。地方政府多方效法其领袖，滥用职权对弱势种族加以掠夺，最后，整个国家地方政府的掠夺变得无可挽回。1996年，东扎伊尔（Eastern Zaire）的金鲁（Kivu）政府强制征收了班尼亚母拉吉（Banyamulenge）的土地，并命令在此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少数民族图西人离开这个地区。结果引起此地区人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叛，这一连串由卡比拉（Kabila）（一革命老手）领导的反叛行动击退了相互刺杀的扎伊尔军队，且暴露了扎伊尔国内的党派纷争。最后，1997年，结束了蒙博托的政权。^②在短短几个月内这个新成立的刚果又陷入一个新的内战和种族冲突，（p.100）例如卡比拉回来反抗其之前的联盟，许多非洲的其他国家也卷进这场战争协助他们的势力代理人争夺刚果的财富。非洲内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在经过其统治者及其党羽联合国外势力将近三十年的长期掠夺后，不管是对扎伊尔/刚果、非洲还是全世界都造成了强烈且长远的影响。对扎伊尔/刚果而言，其通讯、交通及生产的基本设施都毁坏殆尽，比独立之初的状况还要恶劣。扎伊尔人民则大多营养不良，不识字且生活悲

① 贝耶特（Bayart, 1989: 235-237）。

② 麦克凯利（McKinley, 1996）；《经济学家》（1996c）；法兰奇（1997）。



惨，甚至渐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农业。对非洲而言，其内地核心的最大经济之一的崩溃阻碍了区域间的有效整合。此外，“扎伊尔榜样”（Zairean model）将对非洲内地上其他的精英产生负面的影响。此样板由蒙博托推广，做为西方特权的一分子且在非洲团结组织及非洲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蒙博托利用其地位推广其行为模式。对世界而言，扎伊尔/刚果已经成为出名的“流行病新生地”致命的来源。包括孕育伊波拉病毒，此病毒极可能对 21 世纪的生计造成严重的灾难。此外，在扎伊尔军方及官僚派系私吞西方的间接赞助资源，特别是法国，令一些优秀的非洲人对未来的国际合作政策多少失去了信心。因蒙博托治理模式而四分五裂的扎伊尔国家，彻底展现了与掠夺统治，特别是与冷战及后殖民模式的历史关联，而蒙博托后期的经验则显示此模式是非洲各种势力长期作用的结果。事实上，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几乎指出掠夺国家有其深刻的结构和历史根源。这跟非洲过去的殖民经验及其与全球经济结合的模式皆有关系。

阿尔及利亚：石油、种族与军事掠夺

拥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五分之一人口的阿尔及利亚的命运很可能关系着非洲的未来。要是真是如此，那么前景堪忧。阿尔及利亚的经济随国家情势而变，而国家控制石油收入。石油收入占阿尔及利亚出口的 95%，并占政府财源的 80%。其国家的政治及结构皆由军方组织和筹划，军方于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 35 年间执掌政权 26 年，取消选举再于必要时举行以贯彻其意志，(p.101) 如 1993 年沙尼·阿巴克 (Sani Abacha) 将军所发起的军事政变^①。阿尔及利亚国营石油公司及多国石油公司间对石

^① 《经济学家》(1993)；弗瑞兹 (Forrest, 1993)；阿干贝斯 (Agbese, 1996)；赫伯兹 (Herbst, 1996)；艾克波克波 (Ikporukpo, 1996)；刘易斯 (Lewis, 1996)。

油的开发和占有，源自于 1966~1970 年间内战引发的种族、领土、派系间的纷争，且使阿尔及利亚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政治斗争及派系可分为三方面：北方（控制军队）对抗南方（生产石油）；三个主要种族间的对立：胡沙-福拉尼人（Hausa-Fulani）（通常掌控武装部队）、尤鲁巴人（Yoruba）及伊柯波人（Igbo）；以及三大种族与其他被排除于权力核心的 374 个弱势种族间的对立。阿尔及利亚联邦中 30 个州只有在奈吉尔三角洲的四个州纯粹生产石油，也就是河流（River）、三角洲（Delta）、伊多（Edo）、阿卡娃-伊波（Akwa-Ibom）四州。这些都是少数民族的家乡，特别是安哥尼人（Agoni），逐渐都被驱离他们自己的富庶之地。安哥尼人的反抗引起军方接二连三的强烈镇压。1995 年，珊-威瓦（Sane-Wiwa）及其他反抗领袖被阿巴卡当局处决，以平息石油产区的社会不安，并借此压制安哥尼人对石油开采方法及生产方法的抨击，因而引起国际上的强烈抗议。

阿尔及利亚专制的殖民结构自始就外加于其广大的区域选民之上。因此，其领导者便以控制资源为手段，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以维持其权力。如赫布斯特（Herbst）所言：

阿尔及利亚境内的侍从主义并不应只被视为个人掠夺国内资源的罪证……而应视为依政府公职侵占的政治准则而合法化的政府公职配给。这样的政府公职侵占不只是个人贪婪及野心的表现，同时也满足了部分人口的短期目标。^①

此团体有哪些人参与其中以及团体的大小，决定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和掠取的资源通道——而这些资源都是直接或间接操控在国家手中。这些特权关系的扩展与石油收入有实质性的关联，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以及 1990~1991 年的“石

^① 赫伯兹（Herbst, 1996: 157）。



油景气期” (oil boomlet)。(p.102) 为了减缓少数民族反抗所带来的威胁，联邦政府在军方控制下将境内由 12 州增为 19 州，接着又增为 30 州，以加强跨种族和州的侍从主义，并且扩大政府官僚体系，因而增加了不少职位、兼差及接触政府资源的通道和处理租借的职位。在国际金融机构、外国公司及政府的压力下，联邦政府也尝试稳定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将其生产部门与国际贸易及投资联结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巴邦吉达 (Babangida) 掌权期间前半期所做的努力 (1985~1993)。这段时期，他取消了部分经济管制，解放了农业输出的市场垄断，且限制了财政供应及政府外债一段期间。这些政策上的努力并未削弱北方军队精英的特权，而且以对南方及少数民族的剥削为代价。1990 年，一位年轻军官以获得南部地区支持之名，企图发动军事政变且几乎成功了。执政当局在血腥镇压之后，决定让更多阿尔及利亚的统治阶级分享财产，以稳定政局。没错，要在不减低利润情况下，分享大饼。这个大饼必须更大。也就是更多财富将来自人民的税收。依勒维斯 (Lervis) 的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及 90 年代早期，情势由“政治献金主义” (prebendalism) 转为“掠夺统治” (predatory rule)。营利活动范围不断扩张到各种非法交易，包括国际毒品非法买卖、洗钱及走私。^① 由国际机构支持的金融调节方案被阿尔及利亚当权者转为私人所用，以下是刘易斯对此状况的描述：

总之，政府处理调节方案的做法是透过国内政治共谋、补偿措施及高压等混合的手法。对精英而言，国家提供新市场及非法活动的特殊通道，且巧立政策以提供适当的佣金……面对不断升高的政治异议，人民不安的浮现，额外新增的税收，巴邦吉达总统的经济管理越来越疯狂而不顾后

^① 刘易斯 (Lewis, 1996: 97~99)。

果。这涉及转移大量政府公共资源，放松基本财政金融管制，及扩张非法经济形式。^①

随着个人不安持续上升及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崩溃，合法的外国投资及贸易也停滞了。(p.103) 1993年选举时，执政当局试图转移政治议题，利用选举动员引发企业精英彼此竞争。接着巴邦吉达又取消选举，引起社会抗议，包括发起影响石油运输的罢工，及地方派系重新划分国土的威胁。这时，军方再度介入，建立了阿巴卡(Abacka)将军领导的独裁统治。这位独裁者借着货币的再次升值切断了阿尔及利亚与全球经济的货币流通，并且颁布负利率，同时加强保护主义。这些措施再度让在位者有机谋取个人财富，同时导致资金流失，合法的出口被伤害，并造成走私风行。其国家剩下一个无力的中央政府、种族间的激烈竞争，及高度政治化的经济管理所集中的财源……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经济充斥着专制政权的特色，例如扎伊尔的蒙博托(Mobutu)、海地的让-克劳德·杜华烈(Jean-Claude Duvalier)，或尼加拉瓜的苏慕沙(Somoza)王朝。很明显地，非中心化(decentralised)的侍从主义或政治献金主义，变成了贪婪的独裁制度或掠夺。^②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尽管石油业兴盛，因其政治因素，甚至在1995年时，比独立初期更加贫困。在1973年(世界石油价格上涨日)与1987年(经济调整方案)间，其人均收入下降了22%。^③

因此，许多非洲国家可以说是自身社会的掠夺者，不只对发展而且对其生存及文明皆造成巨大的障碍。实际上，由于管理国家衍生的额外财富，许多派系参与内战。有时是基于种族、领土

① 刘易斯(Lewis, 1996: 91)。

② 刘易斯(Lewis, 1996: 102--103)。

③ 赫伯斯特(Herbst, 1996: 159)。



或宗教纷争引起的。结果造成非洲内地上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中断，居处不定，社会秩序崩溃，另外，在有些民（国）族国家，国家的存在失去了实质的目的（如扎伊尔、塞拉利昂、索马里等）。

为何如此？为何非洲的民（国）族国家会变成如此具有掠夺性？（p.104）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特别是殖民地化（colonization）之前、期间、之后的社会结构所引发的〔如贝耶特（Bayart）所言〕呢？或是相反地，是殖民政策造成的持续性伤害的结果，及柏林条约造成的政治机构的不当遗产造成的？〔戴维森（Davidson）提出的〕还是如媒体报道的乃是出于种族的迷乱，长期的种族间内部斗争？为何民（国）族国家在非洲变成掠夺性国家，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却成为推动发展的作用者？还是如依附理论学派提出的评论所争辩的，非洲的国家形成过程和非洲并入（或不并入）全球新经济的体制是两个独立事件？这些根本的问题都需要谨慎的，哪怕是暂时性的回答。

种族认同、经济全球化、及非洲的国家结构

非洲的苦难特别是在媒体上，常被归因于种族间的仇恨。确实，在20世纪90年代，非洲内地各地皆有种族冲突爆发，甚至伴随发生各种暗杀行动及有目的的种族屠杀。如同世界各地一样，种族问题在非洲也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种族、社会、国家经济间的关系太复杂而不能将之简化为“部落”间的冲突。正确地说，过去20年，复杂的关系网络及其转变是构成此掠夺状态的根源。

假使与种族有关，那么今日非洲政治环境的种族差异主要就是一种政治建构而非根源于文化。虽然来自不同的理论观点，非洲学家如贝耶特、戴维森、拉马奇（Lamarchand）和亚地坎尼（Adekanye）等，最后均归纳出一类似结论，如贝耶特（Bayart）

写道：^①

许多情况下，政治竞技场所建构的各种情况似乎都清晰地将种族与认同划上等号，然而种族认同在一个世纪前并不存在，至少尚未被清楚地定义。……殖民者以其特殊的认定模糊地将人文地景加以概念化，在其想像中建构以民（国）族国家契约协商为基础的国家。因不同的政治传统，法国（雅各宾激进民主派和地方社区的起源）行政长官明言其国家领土概念，相对地，英国没有直接的法令且较具文化主义色彩。若抛开此细微差异，殖民政权依赖此组成，目的在于掌控现实秩序，为达此目标，殖民政府采取高压手段，以权威政策压迫殖民地，控制社会活动的动向，(p.105) 并透过出生证明及身份证或多或少人为地确认种族差异。但是当代的种族意识的力量却多来自当地人的占有，并限制了国家资源的分派。^②

戴维森指出殖民管理的政治逻辑偏好是在征服的领土上从事种族划分 (ethnic classification)：

欧洲人认为非洲人居于“部落”、(无特定意义的字)——且以为“部落忠诚”为非洲政治惟一且原始的内容。殖民统治以此假设为基础，将非洲人划分为不同部落，即便这些部落是被编造出来的。然而这些只是误导的表象，快速发展的不是部落主义的政治，而是某种不同且加深分裂情势的要素，也就是政治的侍从主义。部落主义应该是每个

^① 贝耶特 (Bayart, 1989); 大卫森 (Davidson, 1992, 1994); 拉马奇 (Lemarchand, 1994 a, b); 亚地坎尼 (Adekanye, 1995)。

^② 贝耶特 (Bayart, 1989: 51, my italics)。



部落认同共同的利益并推派共同发言人，依此“部落代表们”才可能达成协议而形成“部落的统一体”。但是侍从主义——“塔曼尼协会”、(Tammany Hall) 式的处理手法^①——几乎随即引发政治力量争夺的混乱。^②

由殖民列国对种族认同的再确认 (redefinition) 反映了殖民政府的结构，且以某种方式在独立的民 (国) 族国家造成长期的影响。首先，国家的创立是任意的，依其征服的疆界或殖民地理学者的不确定地图来界定，这与 1884~1885 年导致柏林条约签定的外交策略也有关系^③。此外，殖民政府的运作方式，在后——独立期间大量再现，结果产生马慕·马丹尼 (Mahmood Mamdani) 在分析其国家结构时所称的“分歧性国家” (bifurcate state)。^④ 一方面，在欧洲的管理之下，做为一种族化实体是合法的国家；另一方面，种族/部落认同是当地权力结构的传统力量。前者的统一及后者的分裂是殖民政府管理的基本机制，且通常投入极少的人力和设备以扩大其利润 (如德国，在 1924 年，只有 5 个文官及 24 个军官驻守在卢旺达)。哪位成员属哪个单位是经由行政组织决定，(p.106) 基于努力简化分发识别证的过程，有时以体质人类学家扼要的分类的外表为分类标准。因此，一旦部落首长结构建立了，旧有的国家便成为支配土地及劳力的基础，如此，属于某个特定部落是获取资源的惟一通道，且是取得合法的现代国家的途径。这就是与外界广大资源的联结和进入财富及权力的国际体系。在独立之后，非洲的国家精英即建立了

① 塔曼尼协会是美国纽约州四个民主党委员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原为一个俱乐部 (塔曼尼社)，1789 年成立，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以政治腐败而恶名昭彰。在挑选总统候选人的过程中，它往往控制纽约州其他代表的选票。

② 戴维森 (Davidson, 1992: 206~207)。

③ 戴维森 (Davidson, 1992)；林达维斯 (Lindqvist, 1996)。

④ 马丹尼 (Mamdani, 1996)。

同样的合法/现代国家的结构，所以是去种族化的。然而他们却承袭了片断化的、种族化的国家。当国家资源愈来愈缺乏而精英的掠夺仍在持续，使资源分配陷入困难时，情势将对最能代表合法地位的种族划分支持者或掌控军队者较为有利。种族性 (ethnicity) 成为国家掌控资源的主要手段。但正是国家及其精英塑造并改造了种族的认同及忠诚，而不是颠倒过来。根据贝耶特的说法：

非洲的政治向来不与种族性分离，然而种族性从未提供其基本构造……以当代国家的脉络来看，种族性的存在主要扮演财富及政治势力累积的作用者，而部落本身被视为一种政治势力，同时也是表现为获得财富、权力、地位榨取的竞争通道。^①

确实，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大湖区，权力结构造成的种族定义过程，做为扩展/限制资源通道，似乎在日期上早于殖民统治。^② 此点，可以简略的加以举例说明以厘清。基于千禧年末现状的明显理由，我将以卢旺达、布隆迪和东扎伊尔、南乌干达等地的图西族 (Tutsi) 和胡图族 (Hutu) 种族间的暴力冲突为例。既然这件事广为人知，^③ 我将只讨论与非洲当代危机有关的分析。

首先，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客观”区别似乎不如一般认为的清楚。(p. 107) 西方对此居领导地位的专家雷尼·拉马奇 (Re'ne Lemarchand) 写道：

① 贝耶特 (Bayart, 1989: 55)。

② 马丹尼 (Mamdani, 1996); 列马钦 (Lemarchand, 1970)。

③ 拉马奇 (Lemarchand, 1970; 1993, 1994a, b); 纽伯瑞 (Newbury, 1988); 亚地坎尼 (Adckanye, 1995); 马丹尼 (Mamdani, 1996)。



如先前强调的，胡图族及图西族有共同的语言——在布隆迪是奇隆地（Kirundi）语，在卢旺达的则是奇亚卢安达（Kinyarwanda）语——相同的习俗，且在殖民统治前和谐共处了几世纪。此与媒体营造的意象正好相反，独立前后的敌对模式不能被简化为“由来已久的敌对状态”。虽然前一殖民期的卢旺达无疑的比布隆迪的阶级划分严密，也因此更容易被胡图族领导的革命所伤害。要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命运，必须了解种族流动的过程在进行独立的几年中即已开始……两者皆起因于种族的现实和政治领袖所引导的主体重建（或操纵）二者的交互作用，因而埋下胡图族及图西族冲突的根源。^①

甚至外表的差异也被过度强调（高瘦而肤色较浅的图西族与粗壮而黑皮肤的胡图族），而未将种族间的常态通婚及家庭结构考虑在内。因而马丹尼（Mamdani）指出，1994年期间英查罕威（Intrahamwe）胡图族凶暴的民兵对图西族人的屠杀，乃是经由身份证查出，且胡图族丈夫常因怕被戴上背叛者的罪名，而将其具图西族血统的太太揭发。^②此外，上千持有温和论调的胡图族人也与上千的图西族人同时被杀害了。有计划的灭种策略加深了社会、政治裂缝。让我简短的叙述整个事件，并试着从其中获取教训。

在前殖民时期，卢旺达及布隆迪的土地是被自称为图西族人游牧民族/战士的贵族阶级所统治。农民（胡图族）在卢旺达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政事并居特权地位。布隆迪的情况类似但较不严重。然而财富的累积（主要指牛群）让胡图族家族能攀升到社会的上层 [此过程称为奎呼图拉（Kwihutura）]，因而变成图西族：

^① 拉马奇（Lemarchand, 1994a: 588）。

^② 马丹尼（Mamdani, 1996）。

好一个顺应生物/文化决定论而形成的种族！如马丹尼所言：

显然，我们所谈论的是政治鸿沟（political distinction），是将受支配者从非受支配者中划分出来，而非谈论社会、经济鸿沟，（p.108）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或富人与穷人间的分隔……图西人发展出——政治认同——他们形成一个不同的社会范畴，而以婚姻和种族的禁忌加以区分。此即麦菲杰（Mafeje）所说的，一种出自与附属者不同而产生的自觉。因此，他们仅以外表的差异为依据，做为政治差异的象征——通常是鼻子，再来是身高。^①

殖民国家——先是德国，接着是比利时——加深并扩大了此政治/种族裂痕。先是让图西族人全面掌管一般事务（甚至在原先由胡图族掌管的地区），且为他们提供教育、资源、行政工作的通道，因而确立了图西民族附属于殖民政府的地位。另外，比利时殖民政府所采用的方法与英国政府在桑给巴尔（Zanzibar）殖民地所推行的方法并无不同——英国政府委任阿拉伯苏丹（Arab Sultanate）管理当地人民。在比利时统治下，甚至奎呼图拉（Kwihutura）的体制也被废止。正如人们所预期的，独立过程及其伴随的政治流动，使原先被排除于权力外的胡图族（约占人口的84%）有机会翻身。然而，卢旺达及布隆迪，它两国的政治结局并不相同。1959年，卢旺达境内的胡图族起而革命进而掌权，之后，图西族族人便遭到有计划的大量屠杀，并且被驱逐出境而前往布隆迪及乌干达。至于布隆迪，它独立后便实行君主立宪制。在颇受敬重的罗格梭尔（Rwagasore）亲王的领导下，似乎尚能维持国内的种族和谐。然而，1961年，这位亲王遭到暗杀，另外胡图族在1965年发起的军事政变失败，使得图西主

^① 马丹尼（Mamdani, 1996: 10）。



导的军方控制了整个国家，由君主立宪改制为共和制，并在政治上将胡图族的政治边缘化加以制度化，胡图族族人的反抗则遭受残酷镇压：1972年，图西军队在布隆迪屠杀了超过10万胡图族人。1988年，胡图族人在尼格/摩格拉（Ntega/Marangora）附近杀害了千万计的图西族人，做为对图西军方屠杀成千上万的胡图族公民的报复。1990年，卢旺达遭到被乌干达驱离的图西族人〔他们在乌干达境内参与反米尔顿·欧博特（Milton Obote）的游击战获胜〕的侵略，且引发内战，也就是1994年的大屠杀。一般认为起因可能是哈拜尔马那（Habyarimana）总统的座机被导弹击中而身亡，引起胡图民兵和总统侍卫的愤怒并进行疯狂屠杀，但此真实情况至今仍不明朗。对图西族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企图不只涉及卢旺达的军方与民兵，（p.109）还包括分散各地的胡图族市民，在各邻里和各市镇中：这是一场非集中的、群众参与的大屠杀。因此，图西族主导的“卢旺达爱国前线”的军事胜利也造成上百万人迁往扎伊尔，直到1996年，才持续回流，这些都造成中非的政治极度不稳定。同时布隆迪1993年选举，产生了当地第一位民选总统胡图族总统麦什·那达（Melchior Ndadaye）。但是，三个月后，他就被图西军官暗杀了，从而引发了另一次的相互屠杀，并造成无数的胡图族人的迁移，而且也引发了内战，情势于1996年7月图西军方发动兵变后更加严重，也使得邻近国家对布隆迪禁止贸易运输。在数十年来围绕着种族问题而生的政治互斥和反复大屠杀之后，还会否定图西族与胡图族认同的差异，并认为民主制中的大数法则不容置疑，将是非常愚蠢的。^① 我们只能说这似乎开启了图西或胡图人的残暴政治的另一条道路，也就是冗长的内战和不断重新划定的疆界。然而，此令人震惊的经验事实似乎也说明了种族歧视的尖锐化，以及因社会地位和政治力量具体结晶形成的种族性，是来自国家的社会

^① 马丹尼（Mamdani, 1996）。

基础的历史性变动；殖民国家先如此，独立后的国家亦然。同时，这也说明了由种族建构的政治精英，无力超越其所承袭的过去的局限，这一点可从他们总以种族划分为号召，以取得或抵抗国家权力可以看出。如此导致多元的民主国家无法推行，因为种族性和公民身份在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上相互矛盾。甚至，两方持续的相互屠杀也不断刷新种族屠杀的记忆，使种族性染上血腥暴力，自此，种族性因国家的政治改造和加深之后，成为主导政治的主流。在国家逻辑支配之下，种族性与国家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正是我们了解非洲政治及其悲剧所要注意的。

然而即使国家种族化 (ethniced) 了，也很难说就是民族化 (nationalized)。事实上，非洲民族国家的弱点解释了为何亚太地区及拉丁美洲能形成发展性国家，而在非洲不行。并非非洲缺乏民族主义：(p.110) 毕竟，民(国)族主义运动是达成独立的主力。20世纪50年代晚期及60年代早期，一群激进的民族主义领袖震撼了全世界并鼓舞了非洲的复兴。[包括西寇·图希 (Sekou Tusc)，努库马 (N'krumah)，肯尼亚特 (Kenyata)，卢慕巴 (Lumumba) 等人] 然而，他们自殖民主义承袭了国家有限的资产，同时，非洲文化/种族/历史/地理/经济上复杂的政治版图，将大部分的非洲的民族主义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极少数都市的工商阶级等结合在一起。如非洲文化研究者——戴维森所言：“对非洲困境的分析也将是一个对过程的探索——主要是民族主义的过程——即将非洲人民及文化分割为数个国家，并彼此宣称拥有对方主权 (sovereignty) 而陷入痛苦的过程中。”^① 这些民族国家缺乏民族基础，即在其他地区通常由拥有共同地理、历史、文化根源的民族组成 (见第二卷第一章)，此为非洲地区与亚洲太平洋地区之间的基本差异 (除印尼之外)，因而有各自的发展过程并面临不同的命运。另外其他两点因素也促进了太平

^① 戴维森 (Davidson, 1992: 13)。



洋区域成功的发展策略（即东亚地区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得自美国地缘政治的支持和其对亚洲太平洋国家的市场开放）。虽然，非洲也很快地为大众提供基础教育，至少在都市内是如此，而且其前殖民政府——法、英两国，都持续提供“援助”，并于都会区提供销售通道。但二者主要的差异在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能在威权统治之下动员其国家，并且在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及求生存政治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性的目标（见第4章）。非洲缺乏社会基础的民族计划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此与冷战时期，各国势力在此互争长短及不同种族争当拥护者有关。

非洲在独立的前三十年间，不断被外国军队及西方军事顾问干涉，（这些西方势力包括西方列强——特别是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南非，也包括美国、英国、比利时及西班牙）苏联、古巴、利比亚也参与其中，使非洲成为激烈的战场。分裂的政治团体和国家、不同地缘政治联盟的地区，造成非洲国家的不安及军事化，（p.111）也增加了国防预算的庞大负担，且将生产重武器的兵工厂交至危险人物手中。^① 非洲民族主义的短暂历史建立于不稳的历史基础上，破坏了民族及民族主义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及与发展形成密切相关的单位。另外，要解释非洲当代的危机，还需考虑到（微弱的）民族国家的种族政治，与过去五十年非洲的政治经济间的关联。没有考虑此点，会对非洲政治固有的分歧本性，做出类似种族主义者的结论。我同意柯林·奈斯（Colin Leys）的主张——非洲的危机若不考量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则难以理解，包括国家扮演的角色，他推论出一些理由，包括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及直到殖民末期仍盛行的家庭加工生产系统。另外，“非洲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时，挟带着其前殖民期的经济缺陷及殖民地政策的限制，使非洲内地于独立后无法转型为能自行持

^① 迪沃尔（De Waal, 1996）。

续的资本累积”。^① 我将简略地说明此看法。^②

依历史顺序,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非洲的“起飞有一个坏的开始”(got off to a bad start)^③。在 70 年代全球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并再结构的背景下, 非洲发展模型瓦解, 最后几年, 须求助于外债及国际机构。80 年代, 外债的负担及结构调整计划, 加重了国际借贷、经济萧条、社会贫困及国家不安, 结果在 90 年代造成某些国家局部纳入全球资本主义, 同时却有更多人口及区域与全球经济混乱地失去关联 (de-linking)。这些相继的发展的原因何在?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政策偏向于农产品输出及自给自足的产业发展, 导致当地农民经济及多数人口的生计基础遭到破坏。狭小的国内市场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化, 而国际经济贸易仍为新殖民地的利益所主导。(p.112) 20 世纪 70 年代, 科技落后, 管理效能低, 后殖民时期紧张状态的持续 (比如, 前法属非洲的法郎区) 令其无力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同时, 在现代化部门需新的科学技术及人民需进口食品的情况下, 贸易恶化令进口更加困难。无疑地, 缺乏标准及控制 [多用在提高国防预算, 工业的“白象” (white elephant)^④, 及炫耀性消费, 例如, 亚马苏克 (Yamassouk) 的建立, 胡布威·拔尼 (Houphouet-Boigny) 在其家乡所建的理想首都] 导致非洲国家的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建议/强加的结构修正计划, 使社会条件恶化且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也宣告失败。他们致力于减低国家干扰, 并刺激初级产品输出。后项目标, 一般而言, 在今日的科技及经济环境中是不可行的; 在面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持续的农业保护

① 迪沃尔 (De Waal, 1996)。

② 相关资料, 见撒卡尔和辛格 (Sarkar and Singer, 1991); 布鲁斯壮和蓝达 (Blomstrom and Lundhal, 1993); 瑞德尔 (Riddell, 1995); 杨森 (Yansane, 1996); 《经济学家》(1996a)。

③ 杜蒙 (Dumont, 1964)。

④ 精心设计而结果无用的冒险, 即累赘无用之物。



政策时，此主张显得特别不合实际。^① 在某些国家经济效率逐渐增强的同时，非洲一些大而具竞争力的公司 [例如，加纳的阿香提·葛菲德 (Ashanti Goldfields)]，原料及人力资源皆已耗尽。且如前述，非洲经济整体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情况更糟，不管是生产或消费情况皆然。

资源的大量缩减起因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危机和调节政策，严重影响民族国家的政治动力，同时也因国家精英分配资源于不同的支持者，通常依下列种族和领域划分，当然也留下足够资源给自己，此资源的短缺产生下列三种结果：

1. 当国际资源及外债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便开始从事乞求式的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of begging)，即利用人类灾难获得国际注意及慈善财源。在冷战末期，列强停止金融及军事转移至其非洲的附属国家时，此政策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了出来。

2. 当经济的正式和现代部门的财源缩减，政治领袖，军事将领，官僚及当地商人极可能从事大规模的非非法买卖 (illicit trade)，(p. 113) 包括与各种事业伙伴共同进行全球犯罪经济的冒险事业。(见第三章)

3. 当财源减少而人民需要又增加时，则必须在不同的侍从支持者中做出选择，通常偏好可靠的种族或区域性团体 (与精英的支配性派系较亲近的)。一些地方派系失意之后，通常诉诸政治阴谋或军事叛变，不是与原有势力分享财源，就是占据了整个控制财源的国家。

随着派别活动增加与国家军队分裂，盗匪活动及政治暴力对抗间的区分愈来愈模糊。而种族及区域性的密切关系成为辨识成员及其忠诚的根源，所以暴力扩展到整个广大群众。因此，邻

^① 亚地玻 (Adpoju, 1993); 亚地坎尼 (Adekanye, 1995); 西蒙等 (Simon et al., 1995)。

居、同事与同胞突然间都成为生存的竞争者，接着成为敌人，最后成为可能的杀手或牺牲者。制度的分裂，广布的暴力，及内战使经济更加混乱，引起人口大量的外移，以逃避毫无保障的生活。

此外，人民发觉到此每况愈下的乞求式政治经济学版本，是使它们成为难民的条件，能够使他们在联合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不同旗帜下获得生存。最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洲不仅被全球/信息化经济边缘化，同时，许多民族国家也分裂了。颠沛流离，身受伤害的人民按照人类学家贴上的各种标签重新聚合为求生存的“社会共同体”（communes）。

非洲的苦难

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评估，国际金融机构解决非洲20世纪80年代的外债危机的缜密企图，依全球新经济规则，在非洲均质地统合各种贸易及投资的条件，结果是留下一个烂摊子。^① 有一项由联合国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主导的有关非洲结构性调整计划所造成的影响研究。现将其发现节录如下：（p.114）

本研究的作者们发现，在所调查的国家中其调整政策与经济表现并无重大关联。证据显示调整政策不能担保非洲国家能克服外在冲击的影响，即使长期看来，也不可能；除非能有更好的外在环境，才有可能。许多非洲国家施行结构调整政策，其进展却只限于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而经济结构却没有实质的改变。以加纳（Ghana）为例（评估世界银行援助的效果的重要例子），该国1984～1988年间平均增长率是5%，然而，制造业的生产力依然低落，1988年时只达到35%。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① 亚地坡（Adepoju, 1993）；瑞芬黑尔（Ravenhill, 1993）；胡契费尔（Hutchful, 1995）；拉格斯列（Loxley, 1995）；瑞德尔（Riddell, 1995）。



1986~1987年间这一数字只有38%。在本研究范围内的许多国家，中小型企业受汇率及贸易自由措施影响下，都被排挤掉了。严苛的货币及信用贷款造成的国内高利率，对企业发展造成阻碍。产业停业的情形非常普遍。位于喀麦隆的银行有四分之一倒闭了，其他国家许多商品的行销部都废弃了。虽然农业在多数国家仍持续增长，然而食品的生产却降低了。在加纳，谷类食品的生产在1984~1988年间降到7%，同时，淀粉类的产品也降到39%。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形。虽然出口及进口利润一般都增加了，却增加了债务平衡的危机。联合国组织会议总结道，“调整措施的实施使人类付出极大代价及牺牲，且破坏了非洲社会的结构。”^①

非洲经济全球化的企图失败了，付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代价，且没有将其社会信息化，因此造成另一项后果：持放弃念头的非洲人持续增加。可以用以下三项主要论点来说明。

第一点，都市的正式劳工市场已达饱和，导致失业及就业率增加，且造成贫困阶级日益增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洲劳工市场演变的研究，调查6个法语国家^②，发现就业与贫困几率间具有统计关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整体而言，在1975~1990年之间，都市地区失业率增加了两倍，由10%到20%。现代化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就业率不是停滞就是降低。在14个国家中，工薪阶层在1975~198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p.115)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只增长了1%。而劳工需求的增加视人口增长及城乡迁移而定。非法的职位每年增长6.7%，成为失业劳工的避难所。非洲城市中的多数劳工都属于“非正式的”、“自雇的边缘人口”及“没受保障的工薪阶层”。这些都造成低收入，缺乏保障，及贫困的产生率增加。1985年，

① 列乔得 (Lachaud, 1994)。

② 列乔得 (Lachaud, 1994)。

整个非洲有 47% 人口是生活在低于贫困水平之下，而发展中国家整体则有 33%。1975~1985 年间，非洲赤贫的人口数增加了三分之二，且据估计，非洲将会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贫困阶层惟一会增加的地区。^①

第二，非洲人均农业产量，尤其是食物产量在过去 10 年有实质的降低（见图 2-3）。如此，一旦发生干旱、战争或其他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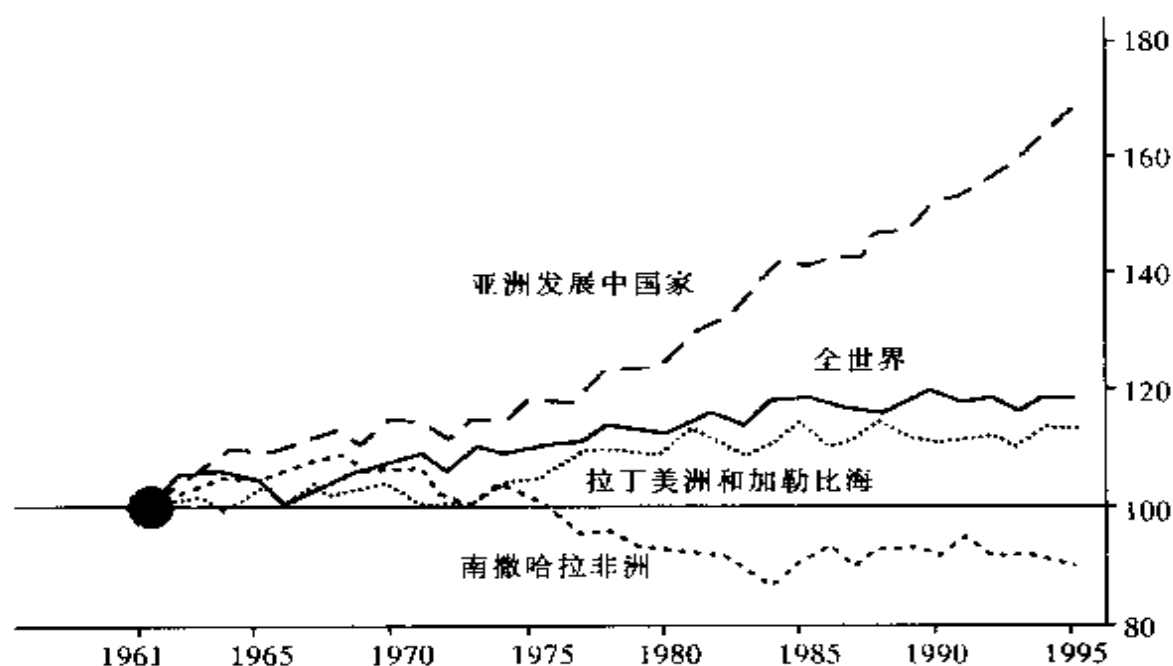


图 2-3 人均食物产量(1961=100)(除南非以外的南撒哈拉沙漠非洲地区)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Economist:1996'9'7);资料来自食物和农业组织。

祸，许多国家将容易被饥荒或流行病伤害。农业危机似乎起因于过度发展出口导向产品和不适当地引进与当地生态及经济情况不合的技术或生产线。^② 例如，在西非，外国林业公司以外来树种取代洋槐（阿拉伯橡胶树）(acacias)，几年后才发现洋槐比较不需水分且不需特别照顾，而且在干季时还能提供羊群食料，然后

① 亚地玻 (Adepoju, 1993)。

② 贾马尔 (Jamal, 1995)。



才又改变方针。另一不适当的技术转移的例子，发生在东非的土库纳湖（Lake Turkona），挪威专家筹办了一项计划预计将土库纳地区的放牧者转型为更有市场的鱼制品的生产者，像 tilapia^① 及鲈鱼。然而，冷冻鱼的设备费极高，以至于生产/分送的费用比收入利润还高。无法再从事放牧的两万多个土库纳人只有依赖慈善团体的食物救助。^② 非洲农产品挤进国际市场的困难，及 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对农业政策的转变，使得农业相当无法预期。因此，许多农民转向短期的耕作以求生存，而不投资长期的、出口导向的作物，也毁损了日后进入国际竞争的机会。^③ (p. 116)

第三个主要趋势是非洲社会、经济因国家崩溃而引发的生产及生计瓦解。20 世纪 80 及 90 年代不断的暴力、掠夺、内战、盗匪活动及屠杀赶走了此地区数百万人，且毁坏了区域与国家的经济，同时，处理危机及重建生活基础的制度性能力也降低了。^④

如联合国 1996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所记录的，都市贫困、农业危机，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萧条、制度崩溃、暴力普遍，以及大量的人口外移，都使过去十年，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处境更加恶化。贫困、迁徙及社会混乱都促使流行病大为扩散，并威胁到非洲多数人的生命，同时也极可能将病菌散布到世界其他地区。应该注意的是造成疾病广泛传播的原因，(p. 117) 不只是多数非洲人的营养不良及其卫生环境的落后，同时，也是因缺乏足够的医疗照顾及教育。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艾滋病的流行 (epidemic) (见图 2-4)^⑤。非洲第一个受人体免疫缺乏病毒 (人体免疫

① 一种产于非洲的棘鳍类热带淡水鱼。

② 《经济学家》(1996a)。

③ 贝瑞 (Berry, 1993: 270~271)。

④ 奈斯 (Leys, 1994); 亚地坎尼 (Adekanye, 1995); 凯撒尔 (Kaiser 1996)。

⑤ 贝纳特和布莱克 (Barnett and Blaikie, 1992); 霍普 (Hope, 1995); 菲利普森和波斯纳 (Philipson and Posner, 1995); 玻亨 (Boahene, 1996); 卡马里等 (Kamali et al.,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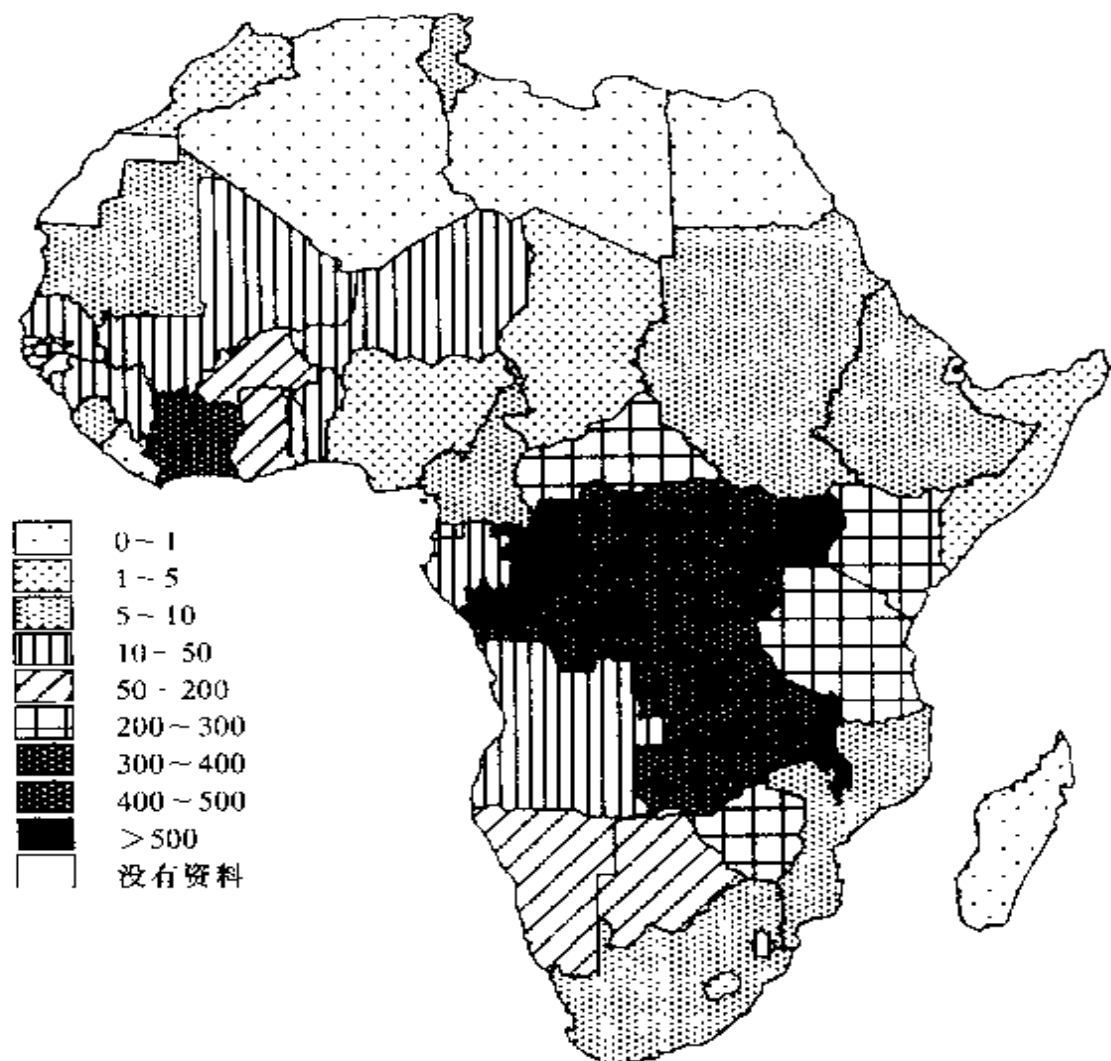


图 2-4 非洲每百万人的艾滋病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记录，世界艾滋病，1990 年和 1991 年，巴纳特和布莱克(Barnett and Blaikie, 1992)制图完成。

缺乏) 感染的例子发生在 1980 年，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全世界约 1700 万人人体免疫缺乏病毒呈阳性反应的人口中非洲即占了 60% (见表 2-4)^①。(p.118) 到了 1997 年，乌干达、卢旺达及赞比亚等国有 17~24% 的都市人口被感染。一般而言，

① 玻亨 (Boahene, 1996)。



近年来许多国家感染人数仍持续增加，除少数例外 [如加蓬 (Cabon)]。艾滋病目前被视为乌干达国内人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是人民主要的死亡原因。在非洲，艾滋病的感染有 80% 是经由异性接触而传染的。因此，在人口不断流动的背景下，男性同性恋的几率也持续上升，而女性又附属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受感染的几率极大。女性的屈从地位使她们很难获取相关信息或资源以预防艾滋病感染，进而降低了她们接受治疗的通道。研究显示女性较少到医院看病，且较常于年轻时即死于人体免疫缺乏病毒/后天性免疫缺乏症——艾滋病。另外，当其配偶断出人体免疫缺乏病毒呈阳性反应时，(p.119) 她们也比较可能留在其配偶身边。^① 甚至，许多女性在生育年龄人体免疫缺乏病毒即呈阳性反应，未来 10~25 年，艾滋病对儿童的生存所造成的影响预计将比一般人口的影响更大。艾滋病预料将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儿童死亡的主因，而非是疟疾或麻疹。过去曾预测儿童与婴儿的死亡率未来十年将降低 35%~40%，现在看来则可能维持不变，或甚至因为艾滋病而增加。小孤儿将成为一大问题。预计到了 2000 年，约一亿未受感染的儿童其双亲中的一个或二者将因艾滋病而死亡。在此孤儿潮的压力下，大家庭的系统无法再运作下去了。

艾滋病扩展的速度及范围主要是起因于社会、经济状况。一位一流的专家，坎普·隆纳·霍普 (Kempe Ronald Hope) 写道：“毫无疑问的，非洲国家的贫困及经济困境造成人体免疫缺乏病毒和艾滋病的流行”。^② 人体免疫缺乏病毒的感染与医疗照顾的缺乏、教育程度的低落、卫生环境的不良、有限的基本服务、快速的都市化、失业及贫困皆有关。非洲的医疗照顾通道非常有限。1988~1991 年的资料指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每

① 玻亨 (Boahene, 1996)。

② 霍普 (Hope, 1995: 82)

表 2-9 1987 年非洲一些国家城乡地区成人 (15~49 岁)
艾滋病流行率估算

	艾滋病流行率 (%)		感染艾滋病毒人数 (千人)
	城市	乡村	
乌干达	24.1	12.3	894.3
卢旺达	20.1	2.2	81.5
赞比亚	17.2	-	205.2
刚果	10.2	-	46.5
象牙海岸	10.0	1.3	183.0
马拉维	9.5	4.2	142.5
中非共和国	7.8	3.7	54.3
扎伊尔	7.1	0.5	281.8
加纳	4.7	-	98.7
布隆迪	4.3	-	15.0
坦桑尼亚	3.6	0.7	96.6
津巴布韦	3.2	0.0	30.9
肯尼亚	2.7	0.2	44.5
喀麦隆	1.1	0.6	33.2
莫桑比克	1.0	0.6	43.5
苏丹	0.3	-	6.8
尼日利亚	0.1	0.0	8.1
斯威士兰	0.0	-	0.0
全部非洲国家总感染人数 (包括其他未列出的国家)			2497.6
1987 年, 感染人数占全部非洲国家的比率 (%)			0.9

资料来源:《超越》(over, 1990), 巴纳特和布莱克 (Barentt and Blaikie, 1992) 的报告。

18488人才有一位医生，相较之下，所有发展中国家每5767人有一位医生，工业化国家则为344人。^① 贫困减少了预防的信息，同时也妨碍了预防措施的推行。农业危机、饥荒、战争造成了人口迁移，家庭、社区和社会网络的崩解。移居到市区且定期回到其社区是人体免疫缺乏的主要带原者，这些人经由嫖妓而将此病毒扩散出去。贫困的人染上人体免疫缺乏病毒而演变为艾滋病的几率比高社会经济阶层的人大。

艾滋病可能由非洲传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危险性比一般所言还严重，南非即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开始在南非边境蔓延开来。虽然南非的经济及制度的发展比非洲其他地区高出许多，(p.120)然而其黑人人口却长期处于恶劣的社会、健康环境。20世纪90年代，南非境内重演了邻近国家十年前艾滋病肆虐的情景，一些特定人口，如娼妓、外来劳工估计有10~30%被感染。全国达生育年龄的女性受人体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估计高达4.7%，在其他地区如在克诺/祖鲁(Kwa/Zulu)出生的感染率则更高。以目前散播的速度预估，到公元2010年，27%的南非人口将被人体免疫缺乏病毒/艾滋病所感染。另一较乐观的估计则推测，性交伴侣数目将降低40%，且保险套的有效使用率将提高20%，依此预估则至公元2010年将只有8%的人口遭到感染。^②

即使非洲的苦难被忽视或轻描淡写，其影响将不可能局于其区域内。所有人类及其人性和知觉都将被威胁。处于信息时代，全球种族隔离政策只是一种犬儒式的幻想。

非洲的希望？南非连结性

南非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处于全球经济中的社会排斥状

① 联合国发展报告 (UNDP, 1996)。

② 坎培尔和威廉斯 (Campbell and Williams, 1996)。

态，将无力改善吗（至少在可预知的未来）？此为一基本议题，然而并非本章所要讨论的范围及本书的目的。本书关切于分析此情况而非提出方针或预测其未来发展。以实际状况来看，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束，施行民主制，黑人领导的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的潜在关系，让我们有机会审视此一假设——即透过与南非的联结，非洲并入全球经济的情况将会好转。因为这涉及对全球经济中复制条件的全面分析和社会排斥的修正，在结束讨论非洲之前，我将简短地评估这项假设。

南非明显地与撒哈拉非洲以南其他国家不同。其工业化程度较高，且拥有多样化的经济。另外，它比非洲内地上其他地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来得大。它并非属于低报酬的依赖经济，但也不是具高科技竞争的经济。事实上，其经济结合了两者的特色，且南非境内同时发生排斥与接纳的现象比其他国家明显且引人注目。（p.121）民主时期，选举过后，政治环境转变极为快速，此外，在数十年的孤立后，其经济快速地纳入全球经济体制，且获得改善。这些皆得力于南非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及高关税限制。

在全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南非即占了44%，其工业产品出口亦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52%。且南非的电力消耗量亦占此地区总消耗量的64%。1993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实际人均的生产总值（包括南非）为1288美元，若只看南非则为3127美元。南非人均享用的电话线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9倍。约翰内斯堡的股票交易量为全球排名第十（因为市场资本化）。且其银行及金融系统是由四大商业银行所援助并为多数工业部门提供服务，少数资金提供给小型企业。至少自19世纪在南非发现钻石后，南非便参与了全球经济，过去一个世纪，矿业对此国家的全面发展具重大影响，且为其资金累积提供了增长动力。尽管有下降趋势，黄金仍是南非矿产企业的生产重心，占矿业出口及就业约70%，且占



税收的80%。^①目前,南非的大部分黄金蕴藏量已几乎消耗殆尽。过去一个世纪,约挖出4.5万吨的黄金,约为原蕴藏量三分之二以上,且剩下的2万吨则属于等级较差的黄金。其他矿业相关产业包括铁、钢、锌、锡、铁合金、锰、铜、银、铝及铂。虽然全国生产总值有一半来自服务业,且将近有四分之一来自制造业,矿业仍占国际贸易总盈余的71%。^②基于矿业对临时工及混合劳力的依赖,矿业与隔离政策的关系比其他企业更加密切。制造业于20世纪60年代有实质的增长,但在70年代,增长趋于缓慢,且在80年代,完全停滞。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产品输出增长平均每年约5.3%。^③但在1980~1985年间,制造业输出实际降低了1.2%,且在1985~1991年间增长约0.7%。同时,制造业的就业实际上亦降了1.4%。^④(p.122)南非的制造业部门具有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的典型特征,拥有消费品制造的巨大生产力,以及设有与矿业及矿产加工业相关的重工业,却缺乏资本品及许多中间品。尽管如此,南非与信息化全球经济仍有相关,其为非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中,网际网络(互联网)主机人数最多的国家。^⑤然而其技术能力的增长则局限于不完整的制度环境,且缺乏政府的有效支持。企业研究开发支出在1983年间及1989年间降了27%。此外,工业技术的获得也强烈依赖国外,主要透过许可协议。研发比其他快速增长中的国家少了许多。^⑥1993年,“至少无充分证据显示此种技术转移有伴随着训练计划,以确保其有效的吸收。”^⑦

① 宏观经济工作小组(MERG, 1993)。

②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1995)。

③ 工业策略计划(ISP, 1995: 6)。

④ 宏观经济工作小组(MERG, 1993: 239)。

⑤ 《神奇网络》(Network Wizards, 1996)。

⑥ 工业策略计划(ISP, 1995: 239)。

⑦ 宏观经济工作小组(MERG, 1993: 232)。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南非的平均就业率即开始下滑，包括农业、运输业、矿业及制造业。若非 1986 ~ 1990 年期间政府部门工作机会有所替代性增长，那么整个工作机会增长在此时期将呈负增长。1989 ~ 1992 年经济上非农业部门的职位总数下降 4.8%，相当于损失 28.6 万个工作机会，只有政府部门呈正增长。在此期间，私人部门的职位数降低了 7.8%。1982 年，正式经济中劳工就业比率的数字从约翰内斯堡/普利陀利亚（南非行政首都）地区的 61%，到最贫困地区的 22% 之间不等。由于缺乏可靠的失业数字显示，明显的求职人口的数目与正式经济所能提供的工作量有极大且持续扩大的差距。1986 ~ 1990 年期间，非洲劳工的工资呈负增长。属于教育程度最低且工作类型水平最低的劳工，其工薪于 1975 ~ 1985 年之间，每年约下滑了 3%。^① 1994 年，由官方的中央统计部门估计的失业率约为 32.6%，然而此数据——和非洲其他国家相比较起来——并未将依土地的生计和就业并入计算，此乃农村的安全网，而这部分的失业问题正在恶化，（p.123）年轻人的失业率特别严重，1995 年 16 ~ 24 岁之间经济上活跃的年轻人其失业率高达 64%。

因此，有许多南非人口在非正式经济体制中求生存，尽管其估计数目有所差异。中央统计部门于 1990 年估计，约有 270 万或 24% 的劳工活跃于非正式经济。然而此数据或许低估了非正式经济活动。例如，1990 年的一项对亚历山大（Alexandra）小镇居民的调查（约翰内斯堡的一主要乡镇），有 48% 的居民说他们是自雇、在家工作或到外地工作。^② 南非的非正式经济主要仅是为了生计。约有 70% 的非正式事业涉及街头贩卖，包括食品、衣服及古玩。^③ 大约只有 15 ~ 20% 涉及制造业形式，且南非的非

① 宏观经济工作小组（MERG，1993：149 - 150）。

② 大亚历山德罗/桑得汤报告（1990），班纳所引用（Benner，1994）。

③ 瑞力（Riley，1993）。



正式经济中转包的情形似乎比其他地区要少许多。其非正式企业中制造业发生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种族隔离政策，此政策阻碍了黑人社区的都市化，且令黑人无法成为企业家；此外，也是由于黑人被长期有系统地阻隔于教育、技能及创业所必要的实务经验之外，特别是信息化技能。南非经济同时具有高度资本集中及少数厂商控制市场的特质。^①

南非的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依某些测量方法评估，甚至是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 0.65，超过巴西的 0.6，墨西哥的 0.5，马来西亚的 0.48，先进工业化国家则低于 0.41。收入最低的 20% 的收入者的收入只占全国收入 1.2%，而最富有 10% 的家庭收入则占全国收入的 50%。估计约有 36~53% 的南非人生活在贫困底线之下。多数非洲人及有色人种处于贫困之中：95% 的穷人是非洲人，而 65% 的非洲人是贫困的；有色人种有 33% 是穷人，亚洲人 2.5%，白人则是 0.7%。^②

尽管黑人中产阶层逐渐增多，种族差异仍是不平等的主因。(p.124) 例如，1994 年 10 月中央统计部门所作的户口调查指出，只有 2% 的黑人的职位是属于管理阶层上层，而白人则有 11%。同样位于管理级高阶层的，有 51% 的黑人和 89% 的白人月薪超过南非币 2000 元（约 500 美金）。另有 51% 的黑人受雇为“基础劳工”或“接线员和装配员”，而白人则只有 36%。^③ 因此，比起由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组成的非洲内地周遭的环境，南非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乐观。因为，我们还须考量南非与其邻近国家的经济关系。在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抗争期间，非洲的许多国家被极大伤害，主因乃南非发动了控制

① 罗格森 (Rogerson, 1993); 马宁 (Manning, 1993); 马宁和马西哥 (Manning and Mashigo, 1994)。

② 南非政府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1996a)。

③ 南非政府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1996b)。

整个地区的全面战略，并对支持非洲国家委员会的邻国加以严惩。尽管极力地发展其他运输通道，并使贸易更加多样化，20世纪80年代，许多非洲南部的国家仍极为依赖南非。90年代开始，焦点转向南非是否能成为整个区域的“发展动力”的评估。整个南非境内趋于整合，许多运输路线皆通过南非，且许多邻近国家亦为南非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力。例如，1994年，有45%的矿工（约368463人）是外籍劳力，追溯至1974年时，则有77%的矿工皆是外来的，显示已有下降趋势。关于南非来自邻国的非洲人口的估计范围很广，根据南非治安部门估计人数约在550万~800万之间，人口研究委员会也做出类似评估，约在500万~800万之间。^①

南非与其邻国间的不平等关系是非常明显的。非洲南部共有11个国家1.3亿人口，但有超过4000万人口住在南非。整个区域的生产总值，南非即占了80%。南非人，平均而言，比莫桑比克人富有36倍。南非的出口量比其他地区的交易量多出8倍。然而，以自由贸易联盟发起的区域整合会议亦在持续进行中，正在进行的计划包括了铁路及莫桑比克港口。铁路主要是要重建在莫桑比克战争中受损的铁路，(p.125)重建莫桑比克港口的目的是为处理来自津巴布韦、波札特、赞比亚的出口。然而观察南非与其邻国间不同的经济结构，有两点非常重要：(a)大体上，各国经济包括南非其日用品皆依赖出口盈余。(b)除南非的几个小卫星国如波札特、赖索比等，极少制造业产量能满足南非广大市场的需求。交易资料显示南非公司接收了大部分邻近国家有限的进口市场。

因此，在严苛的经济条件下，南非及其非洲环境少有互补性。如果有的话，也是某些主要部门间的竞争，如全球旅游业。南非并不具备制造业及工业科技基础成为促进发展的实质重心。

^① 南非政府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1996a).

确实，南非有其社会、经济等实质的问题，并有必要修正其就业政策，因其问题极有可能来自他国的移民造成的重大影响，而这些移民乃是邻近经济外汇的主要来源。南非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一旦其经济开放之后，要如何在全球新经济体系中的强烈竞争中求生存。因此，区域性合作计划将有助于改善邻近国家的运输及科技基础。且一些资金由南非转向其他非洲南部国家（如矿业及观光业的投资）将改善其他国家极度贫困的状态，如纳米比亚、波札特及莫桑比克。然而，以为南非将透过其与全球经济的多元合并，而带动整个非洲内地的发展（类似日本“雁行”的非洲版本），仔细评量，似乎并不切实际。假使南非的政治命运是与非洲的认同相连的，那么其发展将和邻国朝向不同方向发展——除非黄金热潮结束、科技产量缩减，以及社会与种族日益升高的压力将南非逼于社会排斥的深渊，而此正是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① 极力要避免的。（p.126）

远离非洲或返回非洲？自力更生的政治学与经济学

人类学家艾达·苏舍（Ida Susser）刚结束其于纳米比亚境内喀拉哈里（Kalahari）沙漠的田野调查，他于1996年的报告中指出，农民与工人仍在国家间的空隙中求生存。其贫弱的生计只能过一天算一天，然而，并无社会混乱及广大饥荒的明显迹象：虽然贫困但并不缺乏。^② 他们或许并不能代表维持多数非洲内地人口生计的维生经济（subsistence）的多样性。但这些维生组织与其相结合的传统社区共同体真能做为充满毁灭及崩溃的非洲的避难所吗？事实上，有愈来愈多的非洲知识界及政界或所谓的关心非洲未来的人士呼吁以自力更生（self-reliance）为基础来重建非

① 非洲国民大会，也称国民大会党，为南非民主化过程中争取南非黑人多数统治的团体。

② 苏舍（Susser, 1996）。

洲社会^①。此口号不只意味着仍将附着于原初经济体及传统社会，且将从基础做起，依不同途径迈向现代化，并基本上反对援助全球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及目标。持此立场的有力论证，可以从目前非洲科技/经济的脱离主流，及掠夺性国家的兴起等看出来；另外，也可能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发起的调整政策的失败中略知一二。此另类发展模式，事实上在社会和环境方面较能够永续发展，且非乌托邦理想。此外，许多国家有切合实际且技术上可靠的方案可以提供自力更生发展的模式，以及促进以非洲为中心的区域合作策略。在多数的案例中，他们假设非洲经济部分脱离（partial de-linking）全球经济资本积累的原因在于本章所述的现存的不对等联结。然而，自力更生策略在执行时更根本障碍是：多数非洲政治精英的利益及价值，及其特权网络。我已指出为何多数非洲国家仍持续为精英提供财富及特权的人类悲剧及其原因。此反常的政治系统已是历史的产物，且得到欧美势力结构性的支持，同时也因为非洲片断地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网络。（p.127）很清楚地，此精英及资产选择性的结合，与脱离社会主流的多数人口，及大部分自然资源的经济贬值，呈现了非洲悲剧的新面貌。

因此，非洲的脱离（de-linking）就其本身的意义说，就是革命（revolution）（最古典的政治意义）。然而，在可见的未来，在顾及其人口中分裂的种族，以及相对于多数领导者及救助者，其人民惨遭蹂躏的经验等情况之下，这似乎不太会发生。同时，历史经验可以见证，镇压和抗争之间密不可分。对抗争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来说，最可能的风险是不确定性和实验性，同时其过程必然交织着愤怒、冲突、挣扎、希望、失败与妥协。

^① 戴维森（Davidson, 1992, 1994）；阿纳（Aina, 1993）；瓦·木坦克（Wa Mutharika, 1995）。



美国的新困境： 信息时代的不平等、 都市贫困及社会排斥

美国做为全世界最大且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在信息时代黎明之际，它是第一个经历网络社会所带来结构性及组织转变特征的社会。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间，其社会也呈现了社会不平等、两极化、贫困和悲惨等明显增长的现象。诚然，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其种族歧视具有历史因素，拥有独特的都市形式——内城，且对政府控制及福利国家制度深具意识形态政治性的嫌恶或抗拒。然而，即便如此，在网络社会形成的阶段，美国所经历的社会不平等及社会排斥仍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即将经历的时代所面临的征兆，特别是欧洲地区更是如此。有两个理由支持这样的说法。第一，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及政策都强调一种“资本主义再资本化（recapitalization of capitalism）”的解除市场管制及弹性管理，这贴切回应了美国于20世纪80及90年代所经历的许多策略、政策和管理决策^①。第二，可能更具决定性的是，全球经济的资本、市场及公司持续地整合，（p.128）使得某些国家很难与其他地区的制度/总体经济环境一分为二地分隔出来，特别是如果这“其他地区”指的是像美国这样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的地区，则将更加困难。至于欧洲或日本的公司和资本及劳动市场的运作方式则有不同，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比在美国的公司高，所以必须面对下列两种情况，一则它们的市场，包括资本及服务市场必须被保护；一则它们的生产力

^① 布朗及康普顿（Brown and Crompton, 1994）；哈顿（Hutton, 1996）。

(productivity) 必须比美国更高。但是就我们所知，美国的生产力虽然过去二十年增长缓慢，但与其他地方比较起来，紧随法、德之后，等同于荷、比，但仍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的总平均。在市场保护方面 (此为日本主要采用的方式)，新的贸易协定及资本的加速流动已经为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政府间的劳动条件开了先路。因此，虽然每一个国家都需回应各自的社会结构及政治过程产生的问题，而发生在美国的不平等、贫困及社会排斥等趋势——仍可视为是深植于信息化资本主义时代市场力量多不受约束而产生的——可能是结构性的后果。事实上，有些比较研究已经指出西欧和美国贫困增长的相似趋势 (但层次并不相同)，特别是英国^①。虽然说上层及下层社会阶层的明显不平等乃是全球趋势，然而，在美国这个现象却是特别明显。

为给探讨先进社会即信息资本主义的社会涵义打下基础，我将尽可能简洁地以经验研究展开，说明过去二十年间美国社会不平等、贫困及社会排斥现象的演进，并利用本章节开始时所提出的分类架构分析这些趋势的形成及发展。

二元的美国^②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再结构、信息化及全球化的情况下，似乎成功地成为获利最高的系统。税后收益比例从 1973 年景气高峰的 4.7% 往上爬升至 1979 年的 5.1%，而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处于稳定状态，接着于 1995 年再度爬升而成为 7%。(p.129) 而股票市场的价值于 1999 年攀升至历史新高，达到 11000 点的水平。虽然股票市场上上下下，但是除非金融市

① 方基与古柏 (Funken and Cooper, 1995); 哈顿 (Hutton, 1996)。

② 这部分“二元的美国”的主要资料来源乃是取自于马歇尔 (Mishel) 等的杰出年度研究，他们在可信赖的统计数字中做出具有洞察力的详尽说明。除非有特别指出，这部分所使用的资料皆是出自此来源。

场发生毁灭性的崩盘（这个可能性一直存在），道-琼斯指数所在的平均高原期似乎创造了持续增加的高水平。不只是资本有所回报，资本主义经理人的报酬也相当可观。以1995年为基准来看，美国主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s）的总平均收入从1973年的每年126.9万美元攀升到1989年每年318万美元，而1995年则达每年436.7万美元。全体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与全体员工收入的比例从1973年的44倍攀升至1995年的172.5倍之多。在1999年，1%富人税后收入是515600美元，是自1977年的243700开始增长至今日这个局面的。^①

与此同时，中等家庭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以每年0.6%，80年代0.4%，而在90年代则以十分微小的0.1%增长的（见图2-5）。特别是制造业及非管理阶层的工作者，他们的平均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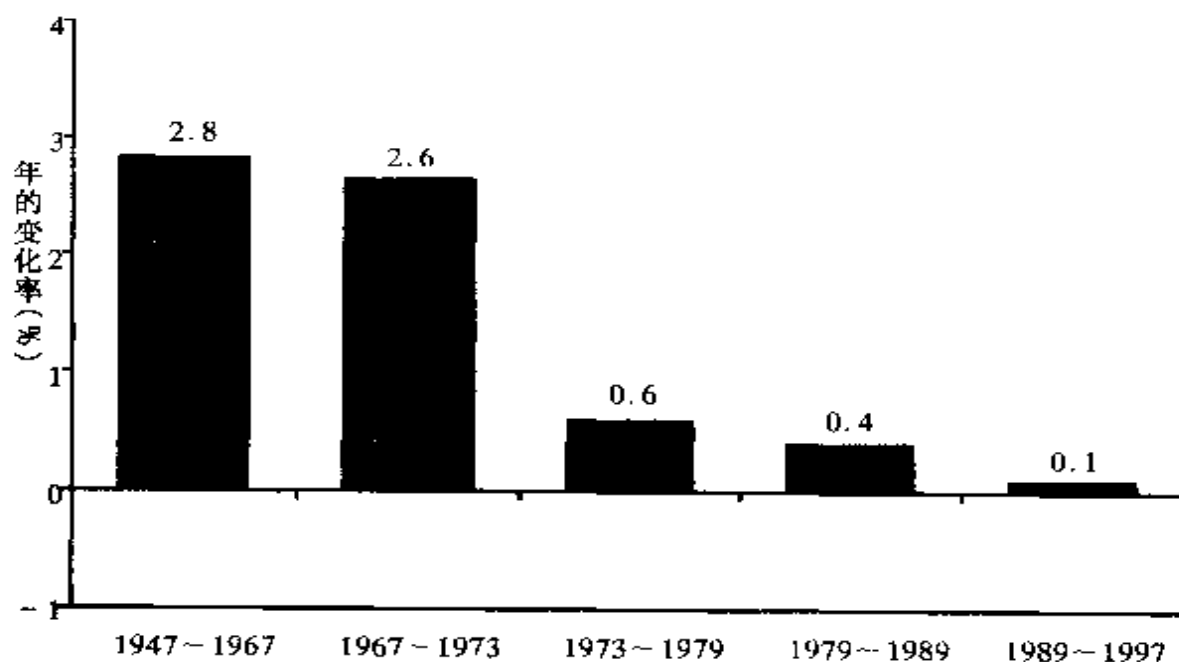


图 2-5 1947~1997 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平均年变化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8)。

① 美国普查局，1999。

薪从 1973 年的 479.44 美元减少到 1995 年的 395.37 美元。有 80% 的美国家庭或是 2.17 亿美国人，眼看着自己占全国收入的比例缩减，从 1977 年的 56% 降到 1999 年 50% 以下。

在黄金加州，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景气大增时，所有劳工的平均工薪在 1993~1998 年之间减少了 1%，而男性则减少了 5%。^①事实上，大部分的家庭只有在家庭中的两个成员同时贡献家庭收入才能够应付这样的情况。而在此时，职业妇女对于家庭收入的平均贡献从 1979 年大约占 26% 到 1992 年的 32%，因此家庭结构成为不同家庭收入差别的主要来源。男性每小时工资的缩减状况特别集中在最低的工薪阶层的组群中，而最高的工资给付阶层（图 2-6a）乃是惟一未感到工资缩减的一群。然而，即使是拥有最高教育水准的男性工作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多数时候也感到了实际工资的缩减：拥有 1~5 年经验，受过大专训练的男性目睹了他们每小时工资从 1979~1995 年缩减了 10.7%。然而，在 1996~1999 年，受过大专训练的男性的工资有些许增加，但是这种增加是相当不均等的，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是位于什么样的产业之中。平均来说，增加的幅度是十分缓慢的。例如，加州，这个众人向往的新经济圣地，在 1993~1998 年之间大专毕业男性的平均工薪仅增加 0.9%，（p.131）而那些拥有更高等的学院文凭的男性则仅具有 0.8% 的增长。相对的，女性大专毕业的工作者在这段期间见到她们的工资增加，特别是具有经验的工作者更是如此（图 2-6b）。在加州，大专毕业的女性工资在 1993~1998 年之间暴涨 6.1%。综观整个美国，虽然工薪给付上的性别差异逐渐减少，由 1989 年的 66.4% 变成 1997 年的 66.9%，但是女性于 1989~1997 年间的平均工资却仅增长 0.08 美元，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工资的减少所致。

^① 班纳等 (Benner et al.,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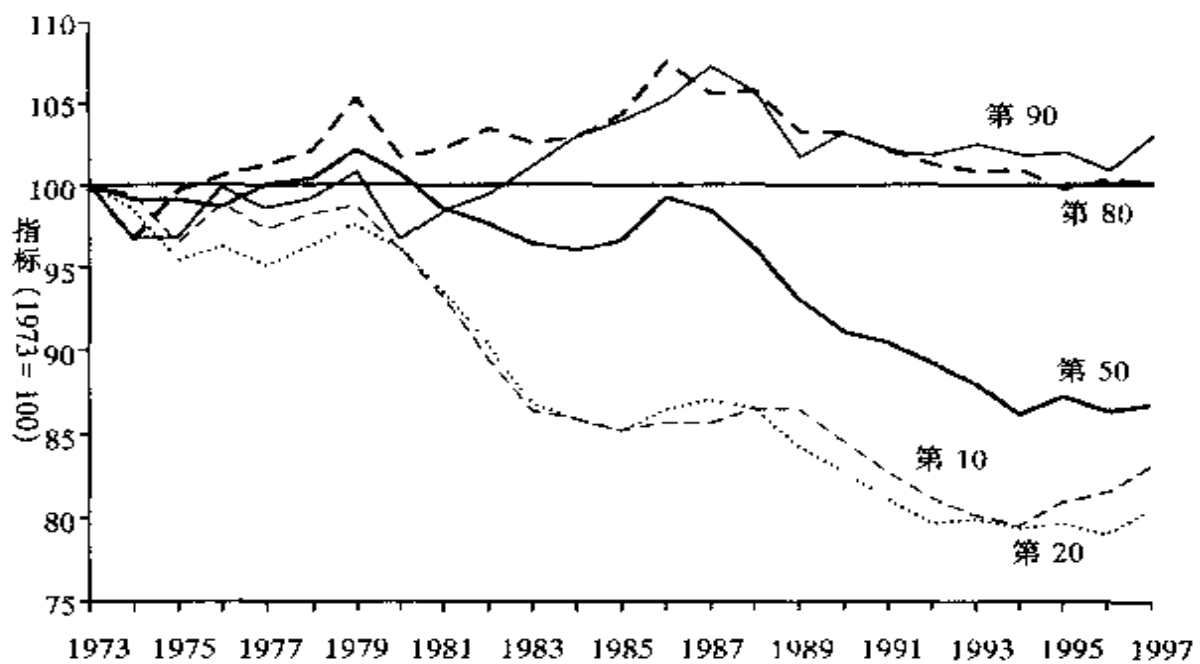


图 2-6(a) 1973~1997 年美国男性实际计时工资不同百分位组群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米歇尔等(Mishel et al, 1999.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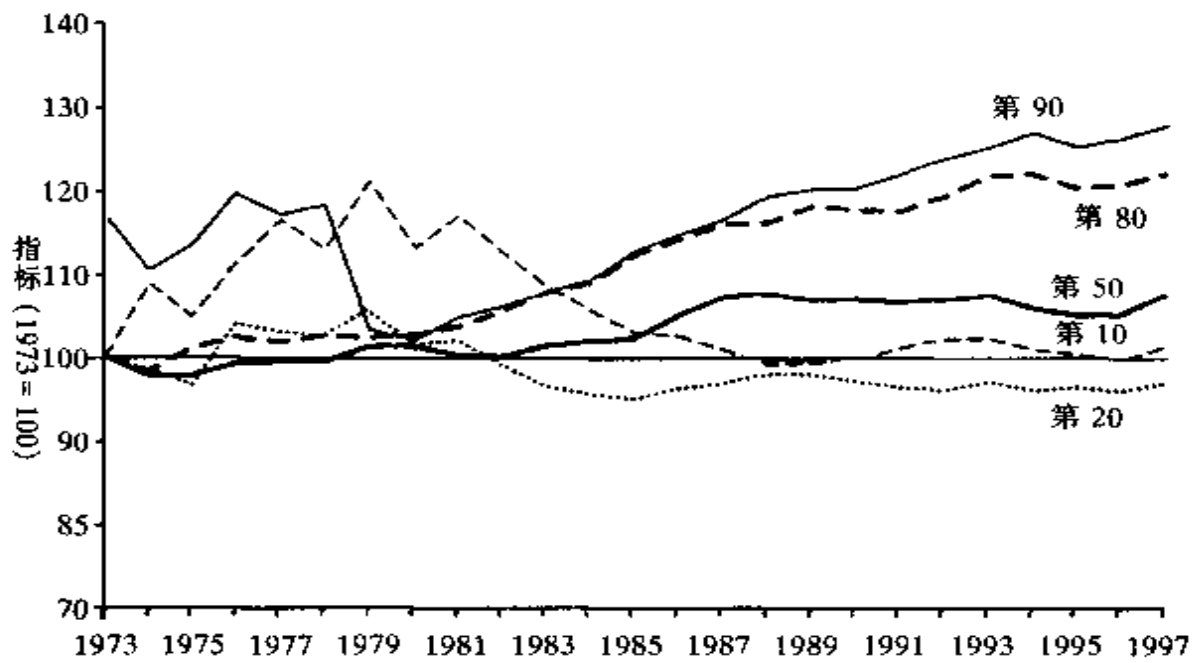


图 2-6(b) 1973~1997 年美国女性实际计时工资不同百分位组群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米歇尔等(Mishel et al, 1999. 134)

收入普遍缩减的现象，对于高、中、低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影响。社会不平等，若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则可以发现比例从1967年的0.399升高至1995年的0.450，更甚者，不平等趋于两极化：1973~1997年，富裕的家庭年收入增加最为快速，而贫困的家庭收入则持续减少（见图2-7）。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看到，1999年收入位于前1%的家庭占了总收入的12%，他们的税后收入从1977~1997年增长了119.7%。而收入位于最高五分之一，也就是最上层20%的家庭占总收入的50.4%，他们的税后收入自1977年起增加了44.2%。而收入位于最底层20%的家庭则仅占总收入的4.2%，他们见到自己的税后收入自1977~1997年下跌了12%（见表2-10）。（p.132）根据沃尔夫（Wolf）的计算^①，财富（家庭资产去除债务）分配亦出现类似集中化和两极化的现象。1997年时，最富裕的前1%家庭占总财富的39.1%，此例是自1983年33.8%开始增长的。另外一方面，收入位于倒数第二的五分之一，也就是20~40%收入的家庭仅占有总财富的15.7%，不及1983年的18.7%。股票市场价值的扬升，可能是进一步使1995~1997年间财富累积更集中的原因，其中最富有的1%家庭中在股票市场拥有的分配比例自1995年的37.6%，上升至1997年的39.1%。而最为贫困的20%家庭不论是在1983年或1997年，拥有的负债都比财产来得多。如果以变动率来计算，在1989~1997年之间，最富有的前1%家庭财富增加1.8%，而前20%的家庭则增长了0.8%，然而，收入位于20~40%收入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则滑落0.8%。^②因此，这不仅仅是不平等的增加，同时也是社会两极化现象的增强。

① 沃尔夫（Wolf, 1996）。

② 马歇尔等（Mashel et al, 1999: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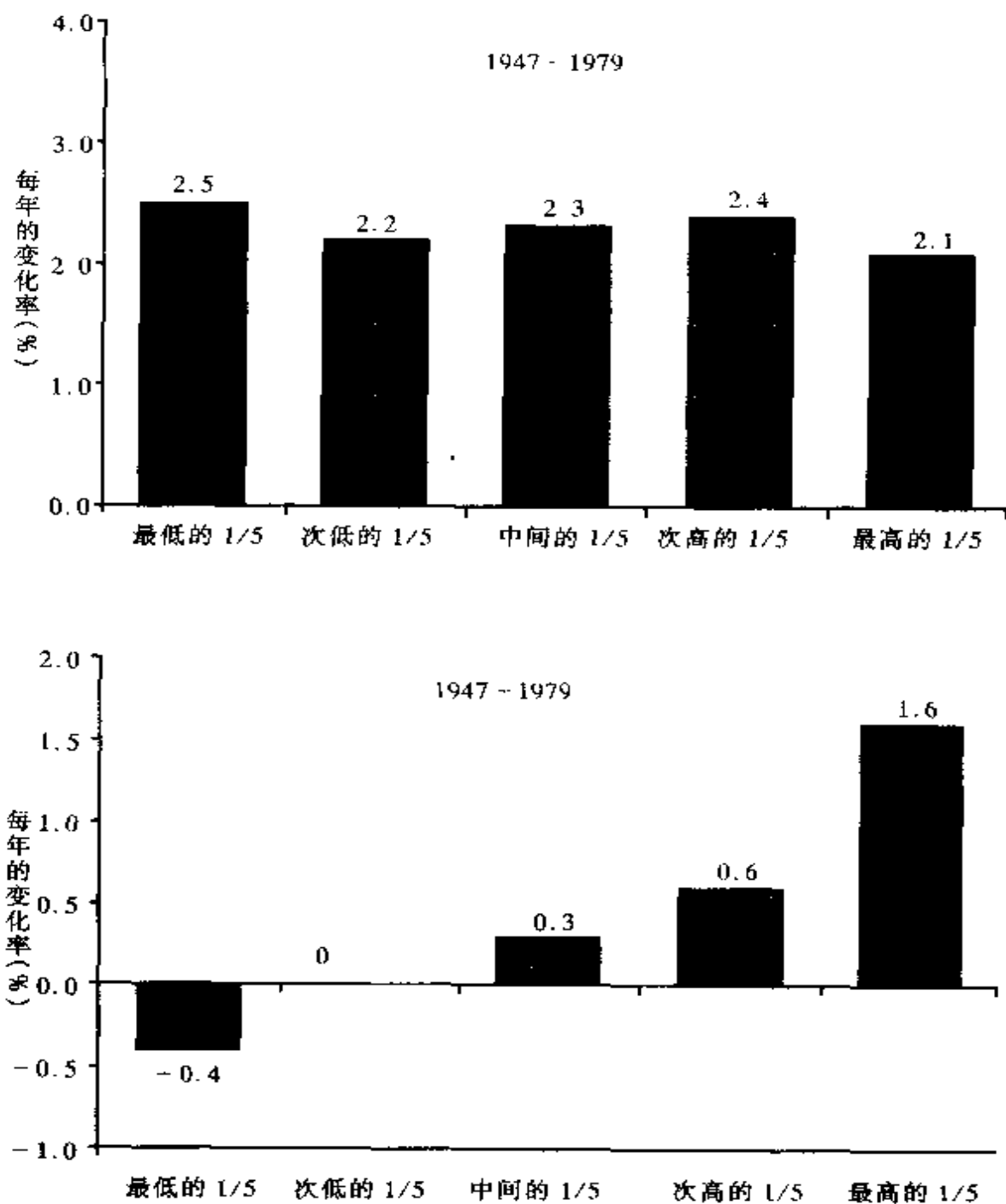


图 2-7 美国家庭收入平均变化率, 1947~1997 年

资料来源: (历年) 美国普查局, 米歇尔等 (Mishel et al. 1999: 52)

表 2-10 1977~1999 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

不同的收入群组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 ¹		平均税后收入 (估算值) (美元)		变化 (%)
	1977	1999	1977	1999	
最低的五分之一	5.7	4.2	10000	8800	-12.0
次低五分之一	11.5	9.7	22100	20000	-9.5
中间的五分之一	16.4	14.7	32400	31400	-3.1
次高的五分之一	22.8	21.3	42600	45100	+5.9
最高的五分之一	44.2	50.4	74000	102300	+38.2
1%的最高所得组	7.3	12.9	234700	515600	+119.7

1: 由于小数进位, 加起来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 美国中央预算局的资料, 由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进行分析。

在 1997~1999 年, 最底层 10% 的工资赚取者的情况有所改善, 收入增加了 10%, 高于平均值。企业界以此现象做为新经济获益下跌的证据, 但事实上, 工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的决策所致: 也就是在 1996 年法定最低工资调高的结果。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比例增长, 这 10% 使得工资每小时确实增加了 0.6 美元, 然而实际工资收入最低的 10% 的工作者的收入仍然低于 1979 年的水平。

贫困亦在增加中。低于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从 1973 年的 11.1% 增加到 1994 年的 14.5%: (p.134) 也就是超过 3500 万美国人, 其中三分之二是白种人, 包含了相当部分的乡村地区。悲惨或极度贫困蔓延得更快。如果将贫困线之下后 50% 的穷人归属于这个极度贫困的分类中 (以这个标准来看, 即是在 1994 年一户四口年收入低于 7571 美元者), 1975 年时他们大约占了所有穷人的 30%, 而 1997 年则达 41%, 大约共 1460 万的美国人。

不平等、两极化、贫困、悲惨等现象在信息化的美国社会不



断增加的原因，是辩论相当激烈的话题。我也不会佯称我在一些段落讨论中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一些与主要争论相关的假设。长话短说，我认为经验研究的证据支持以下的诠释方式，亦即美国的社会不平等及贫困的形成与六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有关：(a) 由工业经济向信息化经济转移，连带的劳动力部门产生结构性转化；(b) 信息化经济对高教育程度者的酬金，联系着获得高品质、州立教育的机会日益更加不平等；(c) 产业生产、劳工及市场全球化而产生的冲击，其中包括去工业化的过程；(d) 劳动过程个体化及网络化；(e) 移民在劳动力组成中分量增加，此外，他们总是处于遭受差别待遇的状况之下；(f) 在充满父权歧视的情况下，女性被纳入信息化经济的有工作者的行列，以及因父权家庭危机而造成的进一步经济负担。在讨论市场力量不羁难驯而占有强势地位所产生的这些结构性过程时，我必须加入社会政策面的因素以强调社会不平等的逻辑所在。^①

这些机制是如何运作而引发社会不平等及贫困状况？

首先，经济动力中的“新经济”部门与传统部门（见第一卷，第二章）间的差距日益增强。根据《商业周刊》于1999年9月的统计，在1994~1999年期间，正当“新经济”开始萌芽之时，在新经济产业中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11%，相对的，剩下的经济仅增长3%。^②更甚者，计算1988~1999年的实质工资演进时，“传统经济”下滑了4.5%。若以1988年做为基准指标100，(p.135)在1999年新经济工资指标值上升至112，然而，“旧经济”则是下降至95.5。重点在于，在这样的定义下，在1999年，“新经济”的劳动岗位占有1900万个劳工，而“旧经济”则占有9100万个劳工。这两大部门在生产、获益以及就业增长上具有相当的差异。由于“新经济”需要劳工，他们早已

^① 布朗和克兰普登 (Brown and Crompton, 1994); 那瓦洛 (Navarro, 1997)。

^② 《商业周刊》：“繁荣落差 (The Prosperity Gap), P.90-102”, 1999年9月。

准备好给付高的工资，给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对产业创新及竞争都十分重要的劳工。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则因未能拥有边际效益，或是并未对他们的股票价值提升有所期盼而酬赏劳工，无论其劳工所具有的技术水平为何皆是如此。事实上，他们经常企图压缩工资或是借助调整劳动力而降低成本，这使得他们掉入借助裁减成本、而非增加创新和生产来增加竞争的恶性循环中。由于大量的劳动力都深陷于“旧经济”之中，新的信息经济中生产价值的的能力集中在就业结构的相对小部分，因而也不对称地占有了整个生产的果实。为新经济工作的人们得以累积足够的收入来投资股票市场，而获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利益。或许过一段时间之后，将有更高的就业比例进入“新经济”，并将最好的技术与管理实践在整个圈子中扩散开来，那么，将会有更大群人从目前的财富生产过程得到利益。然而，引发不平等的是在此两个部门的初始阶段（initial stage），而且不平等的现象有再生产/复制自身的趋势，也就是低收入及低教育者在以知识做为基础的经济体中要发展的机会少之又少。发展到最后，贫困将成为结构性区块，由那些不能满足信息劳工要求的人口所组合而成。

第二，教育成为新经济中劳动力附加值的重要资源。在1979年，拥有大专学历的人所拥有的平均工资较仅拥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人高出38%。在1999年，两者的差异是71%。更甚者，教育（education）与学校教育（schooling）不再相同。知识做为新经济的基础需要一般的分析技能，以及了解与创新的能力，只有较为高级的教育机构中才能满足这些需求。低收入的种族、移民者及少数民族在接受接触较佳教育品质的机会上明显低，不管是在高中教育或是大专教育都是如此。^① 在缺乏教育政策配套的情况下，教育在就业晋升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大，不平等增加的机会也将日益加大。既然，根据预测，（p.136）2050年

^① 卡诺（Carroy, 1995）；赖曼（Lemann, 1999）。



美国人口组成少数民族将占 50%，除非现今趋势有所改变，一个明显的社会——种族分裂即将展开。

第三，全球化导致美国局部去工业化，因为产业生产转移至世界其他地区（不是消失），全球化淘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作——亦即在美国工作占有主轴地位的半技术性、报酬丰厚的工作。值得探究的是劳工组织的经济和结构基础瓦解了，从而弱化了劳工组织并且剥夺了劳工们集体反抗的机制。毕竟，昔日强大的劳工组织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从前制造业工作较相当技能的服务业工作拥有较丰厚的收入。在 1999 年劳动力中工会组织的比例下滑至 13.9%，而加入工会的劳工集中在政府公共部门的比例日益增加。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工会成员与工资二者的正向关系，特别是工会密度高的地区更是如此，如政府部门的例子就是如此。在 1985~1999 年，非工会劳工的平均工资减少了约 6%，而工会劳工则仅减少 3%。^①

第四个机制，也就是工作个体化以及伴随网络企业形成而产生的公司转化，乃是引发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见第一卷，第三章及第四章）。这里所指的是，一方而，由于劳工形成一个个团体，而每个团体都被置于极度特殊的工作条件下，因此，他们被委弃在个人的命运中。从 1993~1997 年之间，网络经济扩张的主要地区——加州，大型企业缩减了 277443 个工作，但员工数少于 100 人的公司却创造了 130 万个新工作，其中，员工人数少于 20 的公司对这个增长的贡献为 65%。这是一个强大企业家主义的展现，对劳工们的影响是悲惨的：在员工人数多于 1000 人的公司中的员工，平均工资较小公司多出 39%，其中 78.4% 拥有健康保险，而小公司中只有 30% 的员工享有健康保险。此外，在大公司的就业期较人数少于 25 人的小公司长达两倍之久。^②

① 班纳等 (Benner, 1999)。

② 班纳等 (Benner, 1999; 31)。

另一方面，雇主及劳工间个人化的协议过程导致了劳动力安排的高度差异性，(p.137) 并且赋予拥有独特技能的劳工毫无疑问相当丰厚的工资，然而也使得大部分的劳工处于随时容易替代的状况中。更甚者，今天的成功工作者，由于拒绝了以往终身贡献于同一事业的工作模式，明天可能就成为被扫地出门的劳工。因此，总体而言，只有那些始终位于阶梯顶端的劳工们，长期下来才可以积累财富。拥有此种优势的少数人必须具有相当高的教育程度。但是这并不是要回应教育乃是解决个人或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说法，毕竟，教育虽是必要的，但尚不足以成为在信息时代成功的充分条件。资料显示的结果是，受过大专教育的男性工作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前五年间眼见他们实际工资的停滞，而在 90 年代后期景气萌芽时他们才看到工资逐渐地增加。在受过大专教育以及未受大专教育劳工之间工资差距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低教育程度者工资的明显削减所致。得到报酬的人们属于另外一个社群，这个社群的特色并不是传统的统计分类所能够捕捉得到的。他们是一群工作者/表演者/企业家，无论何种原因之下，在他们所处的特殊活动范围内位居企业前沿：有时候，形象的创造比实质的内容来得重要。此种附加值的具體表现引发少数高工资的企业家/工作者/合作者，与其他大多数的个人之间不平等的增加。而这些个人，由于他们是单一个体，因此通常必须接受市场提出的最低的共同标准和要求。这样的差距使得收入及资产分配倾斜日益加大。

第五，持续增加的移民处于结构性的差别待遇的情况下，首先导致了较低工资的产生。这些移民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面助益，然而，这同时也助长了不平等的产生，因为大部分的移民收入的工资都是低于市场行情，特别是在这些移民没有合法文件时更是如此。在加州，政府公共政策中心于 1999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移民是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事实上，这个研究显示移



民与教育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不平等现象增加了 44%。^①

最后一点，信息化经济将大量女性纳入劳动力市场，乃是经济得以在相对较低的成本下仍得以有效运作的关键。当美国受过教育的女性工资得到实质增加的同时（特别是白种女性），他们的工资平均来说，仍只占相当位置男性劳工工资的 67% 而已。（p.138）因此，他们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平均工资，在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仍是处于下滑的状态。这并不支持女性乃是构成了信息化经济成功故事的说法。事实上，父权家庭的解体（这部分与女性持续在经济上享有自主性有关）对大多数人们造成负面和惩罚性的影响，特别是女性及单亲母亲。事实上，艾根彼（Eggebeen）及里奇特（Lichter）、洛杰（Rodger）及勒曼（Lerman）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家庭结构的转变及女性及其小孩贫困状况增加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② 勒曼估计，婚姻家庭变成单亲家庭的趋势，几乎使儿童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增加一半，同时也是自 1971~1989 年整体儿童贫困加剧的原因。^③

非家庭式的个人贫困所占的比例在 1989~1994 年间增长了 2.2%，他们占有贫困人口的 21.5%，是所有人口的 14.5%。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亦在同期增加了 2.2%。在 1994 年，有 38.6% 的贫困人口都是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这导致了一个结果，也就是从 1973~1993 年间，贫困的白种小孩数目增加了 52.6%，贫困的西班牙裔儿童则增加了 116%，贫困的黑人小孩则增加 26.9%^④。总体而言，在 1997 年有 19.9% 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其中黑人小孩占了 37.2%。未满六岁的儿童生活于贫困之中的比例亦增加了（分别是 22% 与 40.2%）。

① 理德（Reed, 1999）。

② 艾根彼与里奇特（Eggebeen & Lichter, 1991）；勒曼（Lerman, 1996）；罗杰斯（Rodgers, 1996）。

③ 勒曼（Lerman, 1996）。

④ 库克与布朗（Cook & Brown, 1994）。

所谓“新贫困”(new poverty)的特征是它对无法仅靠工资过活的工作者和家庭的广泛影响。正如图2-8所显示的，贫困阶层男性工资的分配从1973~1997年乃是呈现增加的状况，然而，同阶层的女性工资却是呈现下滑的状态，因此，在1997年，大约有28.6%的美国劳工赚得的收入是位于贫困水平的工资，这是从1973年的23.7%往上攀升的。这类新贫困人口最具显著的现象即是无家可归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都市中，游民的数量猛升，而在20世纪90年代只停留在一个高点。人们对于游民人数的估计有相当程度的差异。1994年政府所提出的“当务之急：家！”的报告中估计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游民的数量约在500万~900万人之间，而有大约7%的美国成年人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个阶段也曾经成为无家可归者。这个估计值也许过于夸张，但是重要的是，与拥有儿童的家庭比较起来，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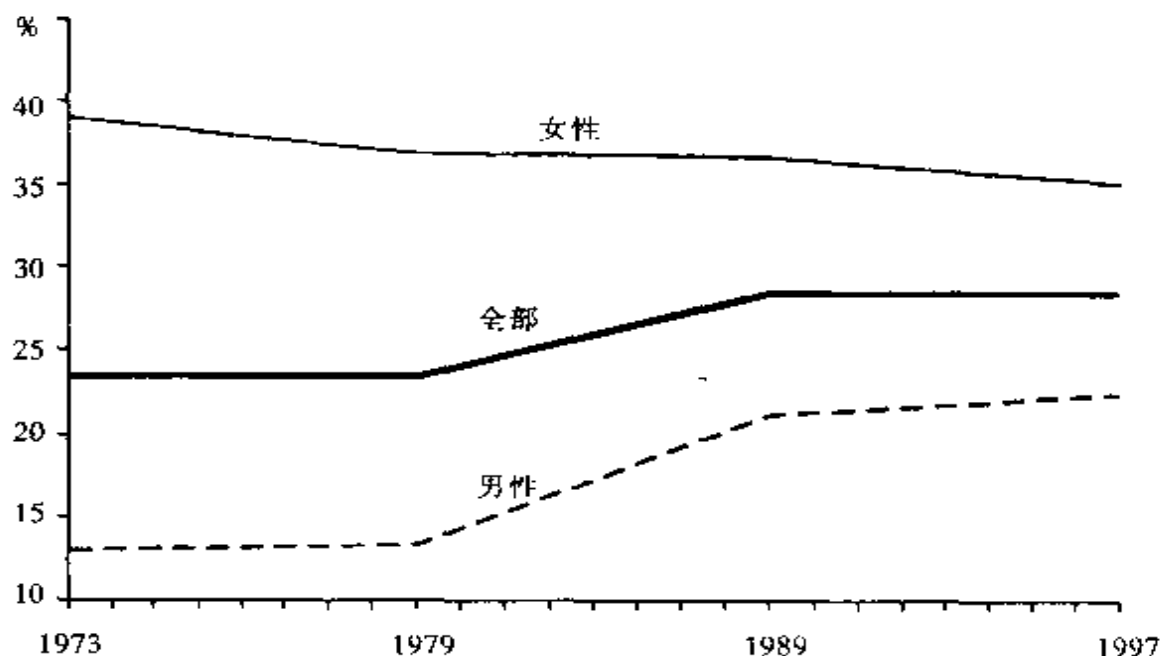


图 2-8 1973~1997 年美国劳动者中低收入阶层的比例

资料来源：米歇尔等(Mishel et al, 1999:137)



家可归者占有庞大的比例，他们是增长最快速的群体。事实上，他们在一些城市中代表了相对多数的群体，例如在纽约即是如此。(p.139)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无家可归者中有四分之三是有家庭组织的。^① 重点是一旦贫困被加强而成为贫困潦倒及社会排斥——生命是在街道上度过的——污名从此进驻，而个人人格及社会网络的解体更加深了穷困的状况。^② 这就是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强势趋势、不平等及贫困而终导致社会排斥的过程的关系配置情形。人们鄙弃生活在美国内城区的贫民即是社会排斥的典型表现。

城市内少数民族聚集的贫民区乃是一种社会排斥系统

少数民族聚集的贫民区内对生命日复一日的残害构成了最古老及最沉痛的美国社会问题。数十年来，都市的社会危机，在不同种族及阶层隔离而居的内城地方具体呈现，并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焦点及政治辩论的核心，此外，也提供了都市社会学特殊的研究传统。^③ 然而，在千禧年转换之时，城内贫民区，特别是黑人贫民区，(p.140) 或一些拉丁美洲裔贫民区，例如位于东洛杉矶地区的某地区，浓缩呈现了美国信息化时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歧视、人间惨剧及社会危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虽然（或是因为？）都市社会计划及福利政策仍持续推动，但大部分的城内贫民区所呈现的社会、经济及居住情况在过去三十年间有明显恶化的趋势。^④ 我与威廉·威尔森（Willion J. Wilson）及

① 达柯斯塔纳斯 (Da Costa Nunez, 1996: 3--8)。

② 苏舍 (Susser, 1996)。

③ 卓克与凯顿 (Drake and Cayton, 1945)。

④ 钟斯 (Jones, 1992); 马瑟与戴顿 (Massey and Denton, 1993); 根斯 (Gans, 1995); 温·肯潘与马库仕 (Van Kempen & Marcuse, 1996)。

其他社会科学家^① 提出一个假说，即我分析的结构性转变所产生的新社会网络的特征与日益恶化的贫民区之间有系统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再结构下，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从此建立；民族国家发生危机伴随而生最明显的现象即是福利国家危机；父权家庭让位，却缺乏其他替代的形式提供欢愉及社会化功能；全球性且分散的式犯罪经济浮现，渗透了社会及制度的各个角落，并接收了某些领域的运作；政治异化和社区共同生活的退缩发生在许许多多区隔的穷困人群间，并感受权利被剥夺。贫民区乃是一种社会排斥系统，其中的种族歧视加上空间的分隔乃是贫民区形成/强化的主因。它所造成的影响在信息主义的情况中具有新的意义，更加具毁灭力，我将于下面章节中将原因说明清楚。

为了清楚说明，我将以威廉·威尔森于1996年在他“当工作消失”（When Work Disappears）书中提出有力的经验分析为基础。然而，我发现该书只在主要论点上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我将以我的语汇重新整理，一方面可以和我在此书中的理论联结起来，另一方面，让威尔森可以不需要为我阅读他的研究后发表的论点负责。如果需要，我也会利用到其他的资料。

美国大都市内城中大片贫民区，是广为人知的一系列过程所造成的结果。^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方农业州的机械化以及工业劳动力的移动，使得大量的黑人城乡移民聚集在被联邦政府住屋及交通政策支持郊区化过程面空出来的邻里之中。（p.141）由联邦政府推动的都市更新计划，希望能够保存商业及文化中心，大量取代了都市核心区，这使得黑人及少数民族更加集中于都市颓垣的邻里中。政府的住宅政策所选取的区位则是强化了隔离。脏乱贫民区的租赁方式及住宅区遭遗弃，加速了人们

① 威廉·J. 威尔森（Wilson, 1987, 1996）；瓦克昆特（Wacquant, 1993, 1996）；苏舍（Susser, 1996）。

② 卡斯特（Castells, 1977: 370 - 472）。



一旦有机会即会逃离内城的过程。以居住区为基础而兴建的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去中心化且将城市与郊区分割开来的系统，将处于劣势的儿童置于内城中缺乏充分财源、缺乏充分教员的州立学校系统，这些学校随之衰颓。由于人们对杰弗逊派传统（Jeffersonian）的地方性自治政府的曲解，造成了财政上需求与资源的不均衡，郊区的人们享受着较多的资源，而城市中的居民却为生活需要而受苦。这即是典型美国贫民区形成的模式，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引发社会暴动及政治抗争。为了回应压力，社会政策降低制度性的歧视，强化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精英权力，帮助高教育非洲裔美国人的个体向上阶层移动，而这些人大多数也迁出内城了。然而，贫民区的其他居民却目睹其未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他们的情况将更加糟糕。为何会如此？

威尔森以信息化及全球化经济的架构诠释工作及就业的转变，我同意他的说法。并不是新的科技引发了失业：一如我在第一卷第四章阐释的，经验资料和分析皆驳斥过分简化的假设，即机器逐步淘汰大规模工作及劳工。事实上，借助将女性纳入劳动阵营，全球各地正经验着有偿劳动力前所未有的扩充，制造业、服务业及都市非正式经济活动取代了农业劳动力。正是因为制造业的全球化以及向外采购低制造成本区域的产品，严重造成那些在美国境内算是成本较高、且技术跟不上高度工业化环境的工作机会消失。信息化刺激美国高技术工作需求的增长，而全球化的旋风则将低技术制造工作扫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① 因此，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确实有所缩减，特别是那些低技术工作，也就是那些当初将黑人城乡移民吸引至都市地区，进而成为他们稳定且重要就业来源的工作。信息化经济的许多新工作机会需要高教育和语言或公关的技能，内城的州立学校却很少提供。此外，新兴

^① 卡诺伊等 (Carnoy, 1997)。

的制造业以及增加中的服务业工作已经慢慢的郊区化，这也是内城居民所不可得的。(p.142) 因此，许多新的工作机会与居住在内城的贫困黑人之间变成越来越是不相干、不协调的两回事了。^①

事实上，美国境内仍有其他低工资工作机会，特别是在社会服务部门及政府公共部门。防止种族与性别歧视的积极行动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② 的推行，增加了内城女性包括黑人女性的工作机会。^③ 但是教育程度较低的黑人男性，则较不可能获得这些工作。此外，政府部门缩减，使过去二十年来社会服务工作减少，也降低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机会，并提高应征者教育程度的要求。

也有属于低技术低服务的卑微工作 (例如：清洁服务、食物供应、非正式的工程工作、修理及维护工作)。在威尔森的分析中，黑人男性不易获得这类工作的原因并不清晰。我认为种族歧视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威尔森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印证此论点，而是强调，例如，黑人雇主也厌恶雇佣内城黑人男性。威尔森暗示两个可能因素，一方面，在低技术服务活动的劳力市场中，墨西哥移民以及其他移民种族与黑人比较起来，有较佳工作表现。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弱点，也就是他们通常未具合法的身份证明文件，虽然被迫处在充满歧视的情况下，他们却较有意愿接受较低的工资及繁重的工作。然而也有可能许多黑人为自己先设定了工作及收入标准，经常导致其对工作的不满和抱怨，使有可能雇佣他们的人得到负面的观感，包括将内城黑人视为“麻烦的工人” (difficult workers) 的想法等。更甚者，贫困的黑人并不具

① 卡沙达 (Kasarda, 1990, 1995)。

② 指鼓励雇佣和录取少数民族、弱势民族和妇女，防止种族与性别歧视积极行动的政策与法案。

③ 卡诺伊 (Carnoy, 1994)。

备新兴服务部门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尤其是男性，这个现象在不知不觉中也对他们的就业机会造成伤害。我认为在多数人当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特别是针对黑人，是造成黑人雇员要在以黑人为主要客户的网络之外寻找工作时，会遇到困难的主要因素，虽然它不是惟一的因素。^① 因此，也许正在败坏中的学校无力在新的服务经济中提供低技术劳动力关系及信息的活动是一个事实，(p.143) 然而这个新的障碍与旧有的排挤根本上产生交互作用，换句话说，种族的藩篱，造成了社会互动的偏颇。我认为，家庭生活的危机、贫民区生活的不稳定及工作模式对黑人男性所面临的困境起了强烈的交互作用，特别是对年轻的黑人男性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许多工作中，工作道德模式以及是否能为社会接受，乃是凌驾于一切决策的考量之前的。

最后一点，黑人贫民区的贫困以及家庭危机导致社会网络的贫瘠，因而降低借助个人关系而获得工作的机会。威尔森及亚力山德罗·波特斯 (Alejandro Portes) 及其同僚指出^②，这乃是黑人与墨西哥及拉丁移民/少数民族最鲜明的对比，后两者的稳固家庭结构以及广大的社会网络，在介绍工作及信息交换上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

上述这些趋势相互加强作用的结果是大量正式工作机会消失无踪，特别是黑人贫民区的男性，对年轻男性而言更是如此。威尔森强调，这些地区除了高失业率，尤其年轻男性失业情况严重之外，还有为数可观的成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甚至不再工作。他于伍德隆 (Woodlawn) 及奥克兰 (Oakland) (为芝加哥市南端的两个贫困邻里) 所进行的研究而得到的发现显示，两个地区分别只有 37% 及 23% 的成年人在特定的期间内有工作^③；此外，

① 韦斯特 (Wess, 1993)。

② 波特斯 (Portes, 1995)；威尔森 (Wilson, 1996)。

③ 威尔森 (Wilson, 1996: 23)。

大多数的贫困男性同时也被摒除于都市的福利国家政策之外。^①

然而，这并不是说大多数成年人缺乏活动能力或是没有收入来源通道。非正式经济，特别是犯罪经济，风行于许多的贫困邻里之中。这些邻里成为这类活动的工作场所，犯罪经济对于部分种族的习性及其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20世纪80年代期间，黑人贫民区可卡因的交易与消费的激增情况乃是这些社区的转变点的关键因素。^②帮派成为年轻人组织的重要形式以及行为模式。^③ (p.144) 同时，枪支成为工作的家伙、自负的象征以及获得同侪尊敬的动因。^④ 而当警察放弃在许多贫困邻里强力执行政策后，每个人莫不争相拥枪自保，枪支泛滥的情形引来更多的枪支。^⑤ 这些内城的经济交易常被归纳为犯罪经济，是工作及收入的来源，也是充满危险的活动，此外，它们还是非正式经济中保护/税收运作组成单位。在这儿，经济上竞争往往借助暴力而分出胜负并造成社区生活进一步的崩溃。除了极少数以社区为基础的教会组织之外，帮派组织也越来越和其他的社会网络组织交融在一起。就如海格登在其对密尔瓦基 (Milwaukee) 帮派的具洞察力的研究所作的结论说的：

密尔瓦基的人们与帮派的故事就是现代美国城市的故事。我们所研究的男性与女性帮派成员努力想成为有生产力以及快乐的成年人，但只见到他们的经济保障被其能力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攫取。大部分的年轻女性都紧守传统的性别角色，尝试着在许多条件之下扶养其家庭。他们的未来是充满变数的……另一方面，一些不顾后果的男性，可以预期将

① 苏舍 (Susser, 1993)。

② 包格斯与当勒普 (Bourgeois & Dunlap, 1993)；包格斯 (Bourgeois, 1995)。

③ 桑其士·珍可沃斯基 (Sanchez Jankowski, 1991)。

④ 威尔森 (Wilson, 1996)。

⑤ 苏舍 (Susser, 1995)。



因正式工作的消失而转入“淘金”的毒品经济中。他们之所以可以被如此地预期，乃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价值与了解的文化与我们所有人都是相似的——他们要分得他们的饼（pie）。美国梦的基本教义仍然活跃在中心城市的各个角落。^①

贫民区的危机不仅是正式经济部门的失业问题，或非正式/犯罪经济的问题而已。在父权制度发生危机，一如我在第二卷第四章所分析的，它还影响了家庭组成模式。单亲家庭以及非婚生子的增加成为趋势，贫困或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亦不免被牵连。事实上，在1993年时，有27%的美国境内低于18岁的儿童生长在单亲家庭中，而其中有21%是白人儿童，32%是西班牙或葡萄牙裔儿童，黑人儿童则占有57%。在1988~1992年之间，黑人非婚生子的比例增加为9%，而白人非婚生子的比例则是惊人的增加了94%。^②此增长率的差异性可部分归因于非洲裔美国人原本即具有较高几率非婚生子的传统。事实上，黑人家庭危机长久以来已经成为社会学家以及社会政策的制订者之间的重要争论议题。然而，我们亦可这样看待，即不将之视为社会偏差，此现象可以做为黑人女性掌控生活的努力和前兆，不再乞求男性迟滞的责任心。（p.145）不论使都市非洲裔美国人的父权家庭式微的历史/文化原因为何，此种模式具有历史前瞻性，对许多美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来说，这些黑人女性乃是先驱者（见第二卷，第四章）。威尔森列出许多因素，相当符合贫困黑人邻里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单亲家庭的情况。首先，对年轻的男性黑人而言，就业机会的缺乏导致收入的不稳定，使得他们承诺的能力逐渐减弱。我还要补充一点，在这些贫民区生活的男性

① 海格登（Hegerdorn, 1998: 208）。

② 威尔森（Wilson, 1996: 87）。

中，被监禁、受伤或甚至是死亡的可能性极高，因此在一些情况中，不去组织家庭实际上还会被视为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他们未来的生活保障是极不稳定的。第二，以威尔森所带领的团队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为根据所显示的，在黑人邻里中，年轻男性与女性之间存有相当程度的不信赖，甚至充满敌意。在此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同样的研究，如果以居住在广大都会区的中产阶级白人为研究对象，也许也会产生类似的研究结果。然而，差别在于，非洲裔美国人却会固守决定不结婚，而拥有非婚生子的态度。威尔森指出这样的决定与婚姻缺乏经济报酬及社会流动的期待有关，这与德雷克（Drake）与凯顿（Cayton）^①对黑人贫民区的经典研究结果一致，这是贫民区黑人与白人中产阶级之间婚姻模式最鲜明的对比。贫困的年轻黑人女性看不到婚姻可能带来的经济及社会利益，加上长期对男性承诺的不信任，使得她们不具结婚的动力，结婚使她们除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解决男性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在1993年，9%的美国儿童是生活在从未有婚姻关系的家庭中，但是黑人小孩中有31%是生活在从未有婚姻关系的家庭中，贫困的黑人家庭所占的比例更高。根据威尔森的资料，芝加哥的内城邻里中，在18~44岁的黑人成年人中，有60%从未结婚，而生活在高度贫困地区的为人父母的黑人中，仅有15.6%的比例是结了婚的。^②为何黑人女性，特别是十分年轻的黑人女性仍然选择要拥有孩子？主要似乎与自尊、尊敬，在生活的社会环境中成为有地位的人物等因素有关，除外，拥有自己的孩子做为生命中努力的明确目标。虽然大部分的少女怀孕都是未经深思的爱情/性行为而得到的副产物，（p.146）但留下孩子的决定通常与自负的母性气质有关，此与贫民区生活

① 卓克与凯顿（Drake & Cayton, 1945）。

② 威尔森（Wilson, 1996: 89）



缺乏教育或工作机会的情形形成强烈对照。^① 鲜少的证据可以支持保守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是福利制度助长了单亲母亲及其孩子，并提供他们继续留在单亲家庭状态动机的说法。^② 毕竟，一旦女性自己抚养儿童，光是个人的因素，要脱离福利制度的陷阱变得日益困难^③。因为她们所能得到的工作机会的工资是那样的低廉，根本不足以负担儿童照顾、交通、住宅以及健康照顾（通常她们的雇主不会提供这项保障）所需的花费。既然二者都一样困难，接受福利成为一个较佳的选择，特别是在儿童的健康照顾也被纳入考虑的情况时更是如此。在1997年1月，单亲母亲及其儿童的福利大幅遭到削减，这对单亲母亲及其孩子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更可以确定的是，进入21世纪，贫困邻里的社会生活将进一步恶化。

许多失业和离家的年轻男性，通常不得不屈就犯罪经济所提供的机会。由于他们的职业道德及工作模式很难满足雇主的期望，因此加深了雇佣内城黑人男性的偏见，终至宣判了他们的命运。因此，黑人男性的失业和贫困有关，但与此关联的具体内容是种族歧视以及黑人们对此歧视的愤怒。

我曾说过空间结构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过程有决定性的交互作用。我在定义网络社会的特色时指出（第一卷，第六章），都市隔离是流动空间逻辑和地方空间逻辑二者越来越分化的结果。贫民区做为一个地方，日渐被其贫困性以及边缘性所局限。^④ 在这个意义上，向上流动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黑人都市家庭的向上流动情形，他们接受政治、教育以及反歧视法案的援助，再加上他们自身的努力后，他们跻身进入主流社会，之

① 普勒托尼克 (Plotnick, 1990)。

② 威尔森 (Wilson, 1996: 94-95)。

③ 苏舍与可伦斯基 (Susser & Kreniske, 1996)。

④ 瓦克昆特 (Wacquant, 1996)。

后，大部分的这类人们，将离开内城以避免他们的孩子陷入社会排斥以及污名的系统再循环环境之中。借助保护自身，他们得以远离贫民区的衰败系统。有三分之一的贫困黑人（以及超过40%的黑人小孩）（p.147）组成了美国人口中最为穷困的部分。更有甚者，流动空间的浮现，使用电信设备及运输来联结有价值地区的方式，并不需要有一个连续性的空间模式存在，他们直接跳过不可欲的（undesirable）地区，让这些地区自生自灭，另外他们还允许策略性活动中被选取联结节点的都会地区的再结构。郊区化首先开展，准郊区接着向四方蔓延，然后“边缘城市”（edge city）在边缘形成节点（见第一卷，第六章），这些都使得都市世界得以完全摒除内城贫民区于都市功能与意义之外，在都市二元化和社会排斥之下使空间和社会产生不连续性。^① 空间上的限制使得穷苦黑人在正式劳动力市场被排挤的情形恶化且不断发生，也使其受教育的机会减少、住宅与都市环境逐渐恶化，将其邻里陷入犯罪帮派的威胁中；同时，由于他们与犯罪、暴力、毒品常被刻板地联想在一起，因此削弱了他们政治选择的合法性。美国内城的贫民区，特别是黑人贫民区，可以说已经成为人间地狱了，用来惩罚可怜的贫困者中具危险性的人。由于大多数的黑人儿童是在这类邻里中长大成人，美国正在系统性地再生产/复制其最深刻的社会排斥、种族仇视以及人际间暴力相向的模式。

当底层阶层坠入地狱

社会排斥的最终表现为实质及制度的拘禁、社会隔离或机构性的监禁，可能是在拘留所中或是在法律系统的监督之下进行缓刑或假释。美国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即它具有全世界最高比例的囚犯人口。相较于历史趋势，1980年起，监禁的比例增长最为

^① 马伦可夫与科司特（Mollenkopf and Castells, 1991）。

快速（见图 2-9）。在 1996 年 1 月，收容所及监狱（地方监狱、州政府监狱及联邦监狱）收容了大约有 160 万的囚犯，另外有 380 万的人是处于缓刑或假释，因此总数有 540 万人正在改过，并被他人监督着，他们占有了 2.8% 的成年人口比例。这个数目是 1980 年的三倍，年平均增长率 7.4%（见图 2-10）。在 1996 年囚犯与一般人口的比例是每 100 万个美国居民中就有 600 个囚犯，这个比例在 10 年中增加将近两倍。联邦监狱于 1996 年时监禁的人数超过其容量的 26%，（p.148）而州政府监狱的超员则是在 14-25% 之间。^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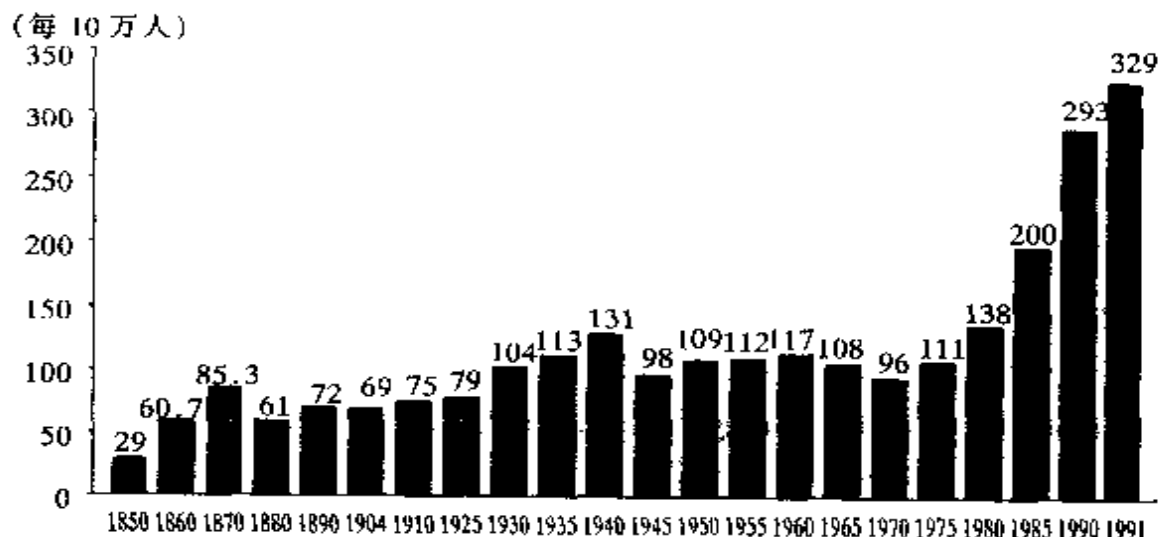


图 2-9 1850~1991 年美国的监禁比例

资料来源：玛格丽特·文纳·卡连 (Margaret Wernet Cahalan), 1850~1984 年监禁统计史, 1991 年美国司法统计局犯罪总计资料 (司法局, 1992), 以及 1991 年司法统计局报告 (司法局, 1992), 由葛利尔德和贝克 (Gilliard and Beck, 1996) 完成。

囚犯人口呈现出社会的及人种的偏误 (bais): 1991 年,

^① 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6); 基理亚德与贝克 (Gilliard and Beck,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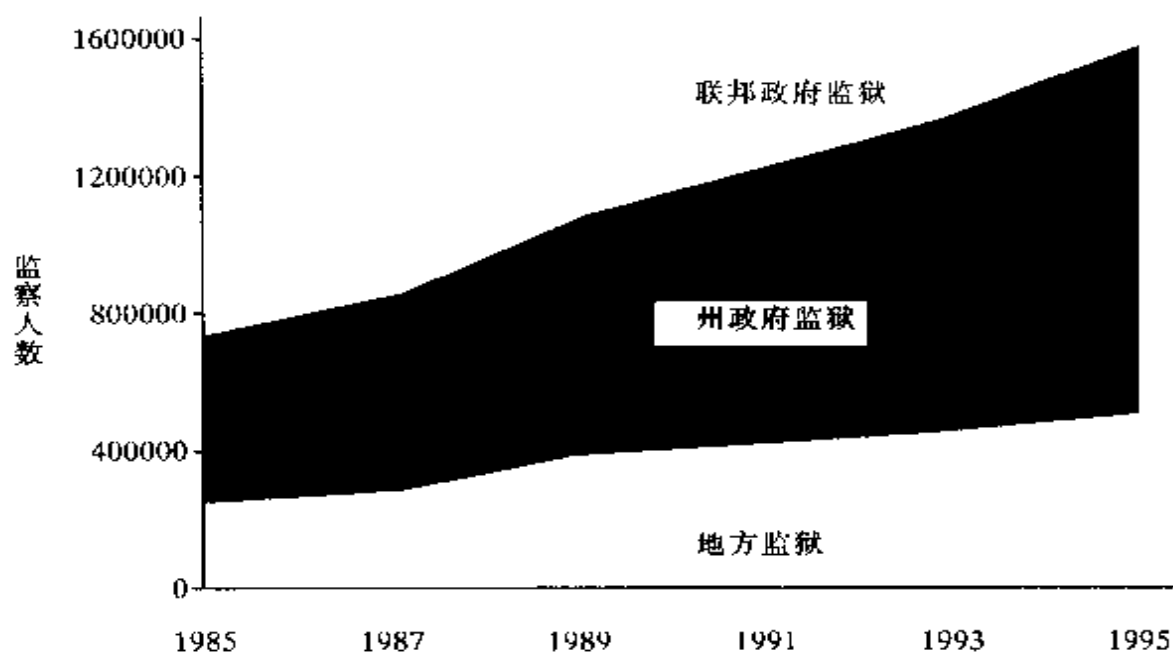


图 2-10 第四世界的崛起

53%的囚犯是黑人，46%是白人，而黑人囚犯的比例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增加。西班牙裔在拘留所的比例为13%，在监狱人口中则有14%。黑人占死刑犯人口的40%。在1990年，黑人犯罪比例是白人的6.44倍。有关证据显示这大部分是因为审判时对黑人抱有歧视以及预先收押的结果，而不是黑人具有较高的犯罪频率。^①而在1995年处于假释的成年人中，黑人占有49%，西班牙裔则占有21%。^②让我们将镜头移近至加州检视监狱系统的演化，这个州拥有全美最多的囚犯人口比例。^③（p.150）加州的囚犯数目自1980~1991年增加四倍之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州的囚犯比例是每10万人中就有626个人是囚犯，这个

① 汤利 (Tonry, 1995)。

② 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6)。

③ 海威特等 (Hewitt et al., 1994); 柯汀与斯却若第 (Koetting and Schiraldi, 1994); 斯却若第 (Schiraldi, 1994); 康诺利等 (Connolly et al., 1994)。



比例近乎南非或是苏联的两倍。其中每 10 万个囚犯中有 215 个白人，黑人则达 1951 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加州，10 个非洲裔美国人中就有 4 个是处于某种犯罪司法的控制中。这个数量若是与受大专教育的非洲裔美国人数相比起来，可以得到惊人的结果。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有 27707 位非洲裔美国人就读四年制的加州州立大学，然而，同期却有 44792 位非洲裔美国人身陷牢狱之中。加州监禁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于 1994 年的报道中指出，其监狱的运作已达容量的 194%，并且估计在 2005 年必须兴建 24 个新监狱才足以赶上囚犯增加的速度。此估计也反映出 1996 年监狱容量约为 256%。整个系统只是用来配合实行惩罚并具威吓作用，社会重建做为监禁目标之一的条款已在 1977 年加州刑法中被废除。^①

尔文（Irwin）、奥斯汀（Austin）、汤利（Tonry）、威尔齐（Welch）及默根哈根（Mergenhausen）^② 及其他人等，曾经仔细地描写过囚犯人口的特征、被监禁的原因以及监禁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等。他们发现大多数的罪犯与暴力无关。事实上，在 1994 年，28% 被送入监狱的罪犯承认自己乃是违反假释规定而再度入狱，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技术上违反假释规定，并没有真正的罪行。接到法院判决的囚犯中，有 70% 被判为非暴力犯罪（偷窃、私藏或贩卖毒品、抢劫、违反政府公共秩序）。在 1993 年，有 26% 的监狱囚犯的罪刑与毒品有关，1980 年，此比例仅有 8%，而同期暴力犯罪（包括抢劫）的比例则是从 57% 下降至 45%。^③ 在尔文与奥斯汀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罪犯“与大多数人对罪犯议题所抱有的耸人听闻想象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

① 康诺利等（Connolly et al., 1996）。

② 尔文（Irwin, 1985）；尔文与奥斯汀（Irwin and Austin, 1994）；汤利（Tonry, 1995）；威尔齐（Welch, 1994, 1995）；默根哈根（1996）。

③ 默根哈根（Megenhausen, 1996）。

的……我们的内城实际上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通常不是白人，由于缺乏生存之道并获得一般的生活，他们就涉入非技术性以及微不足道的犯罪。”^①事实上，有64%的囚犯缺乏正式高中的教育程度，他们大部分是“未受教育的、无技能的（不管是在犯罪或是在其他方面皆是如此），（p.151）而且是高度缺乏组织的个人。”^②犯罪司法系统中所处理的少年犯罪的数字也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在1991年时，60万的少年中有10万人是被监禁于监狱中或是少年拘留机构中。女性构成犯罪人口的6%，但是这个比例显著地自1980年的4%向上攀升；他们之中的6%在监狱中怀孕。许多的囚犯乃是为人父母：有78%的女性及64%的男性有小于18岁的孩子。这个事实明显成为电话公司的好买卖，因为囚犯会打对方付费电话与他们的孩子保持联系。因此，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一个囚犯一年所打的电话总额可以达到15000美金。更甚者，监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毒品与暴力四处散布着，帮派掌控一切，有时候连狱卒也牵涉在内。健康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有三分之一的州政府囚犯正在接受毒品治疗计划，而大约有3%的囚犯的人体免疫缺乏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或是正为艾滋病所苦。监狱中肺结核的发生率是一般大众的四倍，另外，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囚犯有慢性精神疾病问题。^③

更有甚者，监狱社会使监狱文化再生产，进入监狱的囚犯由于社会污名以及内心被伤害，眼见他们与社会联结的机会逐渐减少。用尔文及奥斯汀的话来说：“监狱真的变成堆人的货仓——它们通常十分拥挤、充满暴力以及残酷。”^④ 监狱的管理花费对

① 尔文与奥斯汀（Irwin and Austin, 1994: 59 - 60）。

② 尔文与奥斯汀（Irwin and Austin, 1994: 143）。

③ 默根哈根（Megenbagen, 1996）。

④ 尔文与奥斯汀（Irwin and Austin, 1994: 144）。



纳税人来说是一项十分高的成本负担：每一个囚犯每年要花费大约 39000 美元。就如犯罪学家的一句老话：这要比送一个年轻人进入耶鲁念书还要花钱。加州政府在 1990 年时在监狱上的支出与它在教育上的支出金额相当（两者各占州政府预算的 9%）。

更多的研究都显示惩罚对于阻止实际犯罪发生的影响有限。^① 套一句纽约惩治委员会的主管——罗伯特·甘吉（Robert Gangi）的话：“建造更多的监狱以惩治犯罪就像建更多的坟场来处理致命的疾病一样。”^② 然而，对于社会偏差的大量惩罚除了在阻止犯罪方面具有效果之外，还造成实际的影响：它揭示了社会排斥的边界所在，它以责难的方式对待被排除在外的贫苦人们，将他们可能的反抗非法化，并且将社会难题局限在为他们量身订做的地狱之中。让数量庞大的下层阶层青年陷入危险的处境，可以说是美国在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新困境。（p.152）

全球化、过度剥削以及社会排斥： 从儿童的处境而得的观点

如果有人质疑信息时代主要劳工议题，不是工作的消失，而是劳工的情况，他们必定是着眼于过去数十年间低工资童工的暴增现象。根据 1996 年 11 月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的报告显示^③，在发展中国家中约有 2.5 亿个年龄在 5~14 岁间的儿童，从事有收入的工作，而其中有 1.2 亿个儿童是全职工作者。这个估计值，是采用改良方法而得——首次将 5~10 岁

① 罗伯斯（Roberts, 1994）；林区与帕特森（Lynch and Paterson, 1995）。

② 由斯莫劳引用的（cited by Smolowe, 1994: 55）。

③ 国际劳工局（ILO, 1996）。

的儿童列入计算——是估计值的两倍之多。这些童工里，亚洲占了1.53亿人，非洲占有8000万人，而拉丁美洲则占有1750万人。然而，非洲童工发生的比例是最高的，5~14岁的儿童中约有40%是童工。1995年国际劳工局的观察报告指出，在加纳、印度、印尼以及塞内加尔境内有25%年龄在5~14岁之间的儿童从事经济活动，而大约有33%的孩子没有到学校就读。国际劳工局亦指出，虽然没有进行定量研究，但可以发现欲转型为市场经济的东欧以及亚洲国家的童工数量有明显的增长。^①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童工数量相较于其他国家占压倒性的多数，但任用童工的现象亦发生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别是美国，其境内充斥着以青少年为主的快餐销售工作，另外，其他的商业活动——例如，糖果販售——也在激增中。在1992年，美国劳工部提出了19443件违反童工雇佣法的案件，是1980年的两倍。除了快餐业这个罪魁祸首之外，一些案例也显示在曼哈顿（Manhattan）地区非法雇佣移民童工在服装工厂工作，在布朗克斯（Bronx）区有童工从事建筑工程，或是在德州、加州及佛罗里达则是从事农业活动。根据国家工作场所安全组织（The National Safe Workplace）的估计，每年有大约300名的儿童因为工作而死亡，而有7万名被工作伤害。达曼尼（Dumaine）引用专家的说法，将美国童工增加的原因，归因于劳动阶层生活条件恶化以及非法移民的增加。^②拉瓦雷特（Lavalett）发现英国童工也有类似的扩张，他所引用的研究显示，13~16岁的学童人口中，有80%的女孩与69%的男孩从事某种形式的就业活动；在伯明翰，根据一个对1827位年龄在10~16岁的学生所做的调查显示，有43.7%的儿童正在以某种方式工作，（p.153）或是在过去近期时

① 国际劳工局（ILO，1996：7~8）。

② 达曼尼（Dumaine，1993）。



间内有过工作。^①他说“目前关于先进经济体中儿童兼职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所有的研究都指出，雇佣童工的现象是普遍的现象，儿童们的工资极少而且所在工作环境极差”。^②除了统计观察之外，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数量相当多的儿童，涉及犯罪经济有关的营利活动，特别是毒品交易、小规模抢劫以及组织化的乞讨活动。^③街头儿童的激增与这些活动都有关联，巴西的城市研究显示，特别是在其旧都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一个最令人醒目的例子即是，数千的儿童在街道上讨生活。事实上，大部分的儿童在一天结束时会返回他们贫困的家中，将其微薄收入交给家人。1989年，里约热内卢的一项街头儿童的调查显示，其中独自生活于街道，没有和家人同住的仅占14.6%。染有毒瘾的占了80%。另外有13.6%的儿童是无家可归者，他们与他们的家人过着流落街头的生活；21.4%的儿童有家庭住所，他们在家庭的控制下于街道讨生活。大多数的儿童（有50.5%）与家庭都有联系，但是自行在街道讨生活，他们有时就睡在街道上。然而，不管是哪一类的儿童都冒着暴力与死亡的高度危险，他们常常落入热衷于“清理街道”（street clean-ups）的“保安人员”（vigilantes）与一般警察的手中。^④派德罗兹尼（Pedrazzini）与桑奇兹（Sanchez）报告指出加拉加斯（Caracas）地区的“坏男孩”（malandros）也发现类似的情况。^⑤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所言，童工涉及各种活动，而其中许多活动具有高危险性。^⑥在印度以及巴基斯坦，除了为人熟知的地毯

① 拉瓦雷特（Lavalette, 1994: 29-31）。

② 拉瓦雷特（Lavalette, 1994）。

③ 哈里南（Hallinan, 1994）；派德罗兹尼（Pedrazzini）与桑奇兹（Sanchez, 1996）。

④ 瑞日尼（Rissini, 1994）。

⑤ 派德罗兹尼（Pedrazzini）与桑奇兹（Sanchez, 1996）。

⑥ 国际劳工局（ILO, 1996）。

与毛毯编织之外，一些出口产业也大规模地雇佣童工。在印度，童工出现在黄铜工业中；而在巴基斯坦，童工则出现在造砖工业中；东南亚的姆洛阿米（Muro-ami）渔业（包括深海潜水）也有童工参与；斯里兰卡，童工则是处在充满杀虫剂毒性的耕地之中；埃及、菲律宾及土耳其，童工则是在充满有毒气体的修理工厂以及木工厂工作；童工在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都参与小规模采矿工作；此外，为数众多的童工是待在家庭中成为家务劳工，他们常常处于被虐的情况之中。（p.154）在委内瑞拉，年龄位于10-14岁的女孩中，有60%成为家务劳工。年幼的儿童家务劳工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孟加拉有24%，委内瑞拉则有26%的家务劳工未满10岁。这些家务劳工每天工作时数高达10~15个小时，而且研究报告指出：“惊人的证据显示，青少年及年轻的女性家庭劳工正遭受实体的虐待、心灵上的虐待以及性虐待。”^①

增长快速的全球观光业，流动性地雇佣全球劳动力的7%，亦是全世界儿童劳动的主要来源。^② 由于它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同时它的活动有季节性与不规则的特性，因此，若能用具有弹性的雇佣方式、便宜的劳工则可高度助长产业的发展，于是，童工便成为最佳选择。这类工作包括旅馆侍者、女侍应生、女仆、政府公共计程车的收票员、按摩师、招待员、“殷勤”的工作人员、舞会男孩、球童、信差、供应茶与零食的服务生、帆布躺椅与海滩小马的看守者，等等。这类工作工薪都相当低廉：布拉克指出，在墨西哥的阿卡波库（Acapulco）7~12岁的儿童在担任饮料服务生时，除了小费以及每杯饮料微薄的服务费以外，是没有任何工资的。^③ 针对其他国家的童工雇佣情形所进行的研

① 国际劳工局（ILO，1996：15）。

② 布拉克（Black，1995）。

③ 布拉克（Black，1995）。



究收入的结果与这个结果是一致的。

在某些例子中，儿童们从事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在1996年，为贫困以及内战所苦的喀布尔城市中，许多儿童为了让家人能有所收益，他们参与了可赚钱的抢劫及偷运人骨的活动。他们自墓地得到骨头，将它们与狗、猫以及马的骨头混在一起（以掩饰它们的来源），接着将其卖给中间人，而中间人则将其运到巴基斯坦，然后用这些来制作食用油、肥皂、鸡饲料以及纽扣。参与这种贸易工作的儿童，每一个月能获得12美元，这个收入是以穆斯林为主的阿富汗国内仆人工资的三倍。^①

特别剥削童工的情形出现在契约式童工的工作形态中。就如1996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所写的：“奴隶制度并未死亡。社会不愿意承认而有所隐瞒，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的推测，在世界许多地方仍有为数可观的儿童困于奴隶制中。在所有的童工中，他们的处境肯定是最悲惨的。”^② 根据美国劳工部于1994年进行的研究显示：(p.155)

在印度，受限于契约式劳工的成年人与儿童保守估计至少有300万人，负债的枷锁起因于一个人需要贷款，却又没有抵押品，于是将自己的劳动力作担保，或是以其所能控制的人担保，他们就像抵押品一样……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印度的服务业及制造业部门拥有契约式劳工……在一些国家中，人力贩卖者会到乡间寻找人选，他们会付钱给儿童的父母亲，然后将儿童送到工厂工作。例如，在泰国，许多童工是来自为贫困所苦的东北地区，他们被父母卖出，或是签订负债担保的合约。无耻的“职业介绍所”常常转让交易，并将儿童分送到工厂，例如剥虾或是卖淫。在菲律宾，在对一个沙丁鱼罐头工厂的两次围捕行动中就发现11岁的年幼童工，正在从事将切片的鱼装入罐头的工作，以偿

① 纽约时代杂志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月12日, 1997: 30-32。

② 国际劳工局 (ILO, 1996: 15)。

还他们积欠人力贩卖者的债务。^①

这个报告收集了不同国家契约式童工的个案研究。美国劳工部的另一个报告提供了儿童被强迫以及经由契约签订而从事经济农业的大量证据，同时也显示这些儿童如此年幼，暴露在化学肥料及杀虫剂所造成的伤害性影响下。^②

为什么这些活动都涌现在儿童劳动力市场上？首先，贫困的深化以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同时发生乃是原因。如同前面所说的，现存经济的危机以及大部分人生活上的贫困，使许多家庭和他们的儿童采取各种形式的求生存策略：儿童没有时间去上学，因为家里尽可能的需要更多的收入供应者，而且他们现在就需要这些儿童。家庭因为生活所迫，有时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契约式劳工，或是将他们送至街道讨生活。研究显示，大家庭对童工数目的影响：家中拥有儿童越多，家庭送学龄儿童到街道上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同样的研究也显示在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的国家，家庭规模对于童工数目的影响则是十分不显著^③。

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提供了实质收益增加的机会，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雇佣童工的低成本，与富裕市场中货品或服务的高价格之间的差价。一个明显的例子即是全球观光产业。就如布拉克（Black）所描述的，中等收入的旅客在许多“热带天堂”（tropical paradises）（p.156）的豪华享受和服务奠基于对当地劳工相当程度地剥削之上，其中包括许多的儿童。^④然而，国际劳工局于1996年的报告中指出劳工成本并不必然是雇佣儿童的主因。以印度为例，雇佣童工而节省的劳工成本仅占最后手镯价值的5%，占毛毯价值的5~10%而已。那为什么要雇佣儿童呢？

① 美国劳工部（USA Department of Labor, 1994: 19）。

② 美国劳工部（USA Department of Labor, 1995）。

③ 格鲁特尔特与冈伯（Grootaert and Kanbur, 1995）。

④ 布莱克（Black, 1995）。



根据报告，“答案就在雇佣童工能够获利之处。以毛毯产业为例，拥有织布机并监督工人编织者是直接获利的人，而多数的小承包商通常都很贫困，为了微薄的利润而工作，因而尽量雇佣童工可以使自己贫乏的收入倍增。”^① 小制造者与出口至富裕市场的大工厂之间的联结网络，常常是借助这些市场的批发零售商以及大型百货公司做为中介，这解释了这些产业的弹性以及获利的来源为何。美国劳工部于1994年的研究显示虽然大多数的童工并未直接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工厂中工作，然而，转包网络以及以家庭代工普及，已经使得许多国家的儿童与外销产业联结起来。例如，一项以拉丁美洲成衣业的女裁缝师为样本的研究，发现有80%的女性在家中工作，其中34%有家中儿童参与帮忙，而一周工作50个小时者，有40%需要孩子的帮忙。在另一个例子中，墨西哥出口导向的保税加工出口区（maquiladoras）^② 中大部分的劳工都是14~20岁的年轻女性，但一般认为有些是未满14岁的儿童。^③

然而，雇佣儿童的最重要因素是因为他们没有防御力（defenselessness），微薄的收入和恶劣的工作环境相对较易实行。就像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所陈述的：

儿童们并未拥有不可取代的技术，而且雇佣他们的成本并未比雇佣成人的成本低很多，因此，为何雇佣儿童的主要且重要的解释是非经济性的。有很多不是金钱上的理由，但是最重要的是，孩子似乎鲜少察觉自己的权利，他们比较不麻烦，而且愿意服从命令并能接受单调的工作而没有怨言，

① 国际劳工局（ILO, 1996: 19）。

② 位于墨西哥境内，属于美国政府司的工厂，专门使用从外国免税输入的部分物品或零件来配装为成品。

③ 美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94: 19）。

他们比较值得信赖，比较不可能偷窃，而且比较不会缺席，儿童的^①低缺席率对非正式经济部门产业的雇主而言是价值不菲的。(p.157) 在那样以天、临时的工做为基础的产业中，必须能确保每一天都能找到连续的工作者

孩子们是随时待命 (ready-to-use)、可任意处置 (disposable) 的劳工，他们是网络及全球资本主义下，翻新的过度剥削伎俩中最后的新领域。是这样吗？

儿童性剥削

前述的问题并非夸张。许多孩子目前的处境更加恶劣悲惨：他们成为大规模产业中的性商品。这些企业使用先进技术将组织国际化，并利用观光业和影像的全球化创造商机。世界反儿童商业性剥削会议在 1996 年的 8 月 27~31 日于斯德哥尔摩举行，会场中放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文件，提供了各种证据，显示此种剥削的程度、它的迅速扩散以及这个现象的成因。^② 统计并不能精确地描述这个问题的本质，然而可信赖的经验估计则可以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它的快速增长。它经常与观光业的全球化以及人们在标准化性消费之外寻求性欢愉有所关联。^③ 泰国，是全球性产业的热门据点，根据一个已经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儿童权益保护中心估计，有 80 万名儿童从事卖淫的工作，而人体免疫缺乏病毒的感染也在他们之中扩散蔓延。事实上，处女是一个相当赚钱的商品，而进行性交易时要求不戴保险套的交易价码也很高。1991 年今日印度杂志 (India Today) 指出印度儿童中从事卖淫工作的数目在 40 万~50 万之间。在斯里兰卡，估计值约在

① 国际劳工局 (ILO, 1996: 20)

② 世界会议 (World Congress, 1996)。

③ 《基督教科学监察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96)



2万左右。而在小小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中，有超过2.5万个未成年人从事卖淫工作。另一个研究则是指出波哥大有超过3000名未成年卖淫者。拜尔估计，在巴西约有20万个青少年卖淫者，而秘鲁则有5万人。^①但是这个问题决不仅是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根据欧洲议会于1988年的估计，巴黎有5000位男孩与3000位女孩当街从事卖淫的工作；国际儿童保护组织于1990年的计算显示，荷兰有1000位的儿童从事卖淫；(p.158)而一个1996年于世界会议发表的研究指出在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捷克的儿童从事卖淫工作的情况有明显的增长。^②在比利时，一个规模最大的政治示威游行活动发生在1996年的10月20日，人们站出来抗议政府包庇四个小女孩遭到谋杀的案件，这个事件很明显的牵涉儿童卖淫的同党，而且可能有政客牵涉其中。^③

儿童卖淫市场增长最为快速地方之一乃是美国与加拿大地区，1996年儿童卖淫人口估计约在10万~30万相当大的落差之间。^④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目标明显。例如，纽约的皮条客喜欢在堪萨斯以及佛罗里达招募卖淫的奴隶，这些皮条客将儿童从一个城市运送到另一个城市，以使他们对于周遭的环境感到陌生；他们将孩子们锁起来，而且不给他们钱。这些儿童是怎么落人这样的境地呢？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指出，理由有很多种：

父母亲有意将孩子卖给人口贩子以增加家庭的收入，而这些人口贩子作了不实的承诺，孩子自此被绑架，或者是逃跑而且被引诱进入卖淫的行业以在街道上生存……，不管是什么造成的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一个大规模而且可获利的产业是十分乐

① 拜尔 (Beyer, 1996)。

② 世界会议 (World Congress, 1996)。

③ 《经济学家》(1996b)；楚哈特 (Truehart, 1996)。

④ 克雷顿 (Clayton, 1996)；福洛尔斯 (Flores, 1996)。

意对儿童进行性剥削以满足嫖客对于雏妓的满足。一般儿童生命被残害——由于他们的职业存在着危险，如艾滋病以及其他借助性行为而传染的疾病，或是残暴的身体虐待，这使得他们的寿命可能很短。^①

与卖淫相关，然而却是另一个景气十分好的儿童性产业，即是以儿童为主角的春宫图片。科技的发达乃是支持这一个行业的主要原因。数字相机、影音视听光盘、家庭编辑工作平台、电脑绘图都将儿童春宫图片这个产业移入家庭之中，使得它更难以整顿。而互联网则为那些寻找儿童做为性对象的人打开一个信息通道。例如，电脑信息系统能够由被监禁在监狱中的变童癖所操控。因此，在明尼苏达北部一个赤贫、未工业化的小镇里，人们发现他们的孩子成为警察没收的春宫录像带中的特定目标，这是由监狱囚犯发展出的变童癖网络所运作的。由于春宫图片以及影视片可以利用几乎是匿名的方式进行上传或下载，一个全球化的儿童春宫图片网络因此建立，它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形式运作，要进行法律强制的机会少之又少。^② (p.159) 事实上，随时连线的儿童春宫图片运作方式，常成为互联网是否应该建立检查机制的主要论点。然而，责备传讯者要比去质问信息的来源容易得多，亦即为什么这个活动以如此大的规模深深涉入我们的信息社会之中？事实上，这些儿童春宫图片的主要制造者及分配和行销商（大多关于男孩而非女孩）大多位于法令许可的、高科技社会的合法工厂中，例如日本、丹麦、荷兰以及瑞士。^③

有许多研究探究全球儿童性产业（这与遍布于历史中的对于儿童进行的性虐待传统是有差异的）惊人崛起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一系列因素。首先是所有物品市场的全球化，不管是组织化的

① 美国劳工局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95: 11)。

② 世界会议 (World Congress, 1996)。

③ 希利 (Healy, 1996)。



性旅行或是影视春宫图片的散播都可以从任何地方到任何角落。电子化家庭或是外地旅游保证了匿名性，帮助人们打破对身边大量变态者的恐惧关卡。人们逃离社会标准化的性倾向（见第二卷第四章），进入更加违反社会标准的性刺激，这为新的情感需求更添动力，特别是对那些富裕且无聊的专业阶层人口而言更是如此。

而在供应面，贫困以及家庭危机提供原始的材料。而供应面与需求面的联结常常是由全球犯罪网络所进行的，他们控制遍布世界的多数卖淫事业，而且他们总是努力在寻求新的、获益更丰的生产线及市场。特别是，东南亚的儿童卖淫网络从泰国、高棉以及菲律宾及其他国家最贫困的乡村地区买卖儿童，他们的分配网络遍及亚洲，特别是以国际性旅游中心及与黑道结合的日本地区为目标，曼谷、马尼拉以及大阪是全球以儿童卖淫而恶名昭彰的地区。1998年，洪都拉斯成为美国皮条客最喜欢的目的地，可以很方便地透过网络得到在其首都德加斯加巴（Tegucigalpa）接洽的详细资料和地址。最后，就如1996年的世界会议所陈述的，媒体对于儿童春宫图片与卖淫的兴趣在无意中燃起人们的欲望，再加上信息取得容易，使得供应通道以及需求增加的大门因此打开。

因此，网络社会将自取灭亡，当它消耗/毁灭自己的孩童彻底到使他们失去世代间生命的连续感时，也将否定未来的人类和现在是同一的物种。（p.160）

儿童的死：战争屠杀与少年士兵

关于人类自我的否定和毁灭，还有更多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这千禧年之末，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特别是（但绝不仅是）在一些毁坏最为严重的区域，即非洲，成千上万的儿童已经在战争中死亡，或者是正要步向死亡之路。好几万的儿童已经或正被转变成好战/垂死的动物，喂养危害地球充满血腥、麻木以

及无聊的战争。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儿童的处境”^①的报道主要着重于探讨战争对儿童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后冷战的世界中，战争最直接的影响是有200万的儿童因此死亡，而有400~500万个儿童成了残障者，有超过100万的儿童成了孤儿或与他们的父母亲分离，有120万名儿童成了无家可归者，而有超过100万的儿童心灵受创。儿童在战争中牺牲的比例不断增加，主要是由这些新的、被遗忘的战争的特点造成的（见第一卷，第七章）。就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所陈述的：除了相互斗争的军队间的战斗场面，还有更多复杂的事情交杂其中——军队于人民之间的苦斗，或者是与武装民兵战斗部队的斗争。他们很可能在村落以及郊区街道或是任何地点开启战火。在这样的情形下，军营遍布各地，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之间的差异，在充满着怀疑与敌对战斗中消失。^②

儿童也被带至战争中成为士兵，而且数量在增长中。科恩（Cohn）与古德温（Goodwin）曾以此为题进行深度研究。^③他们指出已有数以万计的儿童被征召，进入国家常备军队之中（例如伊朗与波希尼亚）、进入反叛自卫军行列以及土匪帮派之中。在某些例子中，儿童们就是单纯的被送往地雷区受死。而在其他例子中，如莫桑比克国家地下抗暴运动（RENAMO）的反政府游击队或是高棉的游击战（Khmer Rouge），他们会折磨孩子们一段时间，孩子们的心智被残害，但从此他们成为粗暴的战士。在所有的例子中，孩子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加入，或是被迫加入这些有好战的军事领导者的统治下。贫困、错置、与家人隔离、意识形态或宗教的操控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④（p.161）一些案

① 贝拉米（Bellamy, 1996）。

② 贝拉米（Bellamy, 1996）。

③ 科恩与古德温（Cohn and Goodwin, 1994）。

④ 卓根（Drogin, 1995）。



例，如1996年东扎伊尔的儿童反抗军，甚至相信他们具有神奇的力量，而且不会死亡。而在其他案例中，权利的感觉、逐渐灌输的恐惧感以及“成为男人”或战士的感觉，往往是引诱孩子的强大动力。在所有的案例中，孩子们似乎都成了凶恶的战士，随时准备进行杀戮，愿意受死，他们对战争与游戏、生与死之间界线的了解甚微。当新的军事科技提供更轻便、可携带式而且火力超强的武器之时，军中儿童的伤亡更惊人。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孩子，套一句科恩与古德温·吉尔的话来说，“参与战斗行为的孩子常在自身的生命、心智、道德以及肉体上留下战争的烙印。”^①

为何儿童遭到杀害

那么，信息化资本主义与这个恐怖的现象有何关联？毕竟，从有历史以来不就有儿童被虐待吗？答案既是，也不是。历史上儿童常被家人迫害是真实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他们遭受身体、心理与性的虐待；而在工业发轫时期，亦目睹大量童工进入矿业与工厂中，其处境和奴工相近。同时，既然孩子也是人，社会对待儿童的形式对人类处境造成长久的道德伤害。但我要提出讨论的是，在此信息时代的开端有些不同：信息化资本主义流动、不受约束的特性，与世界上大部分儿童生活的毁坏之间具有一个系统性的联结。

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目睹成熟工业社会的社会改革所获得的成果和孩童权利正发生剧烈的变动和反转，要求去除管制的呼声上涨，避开政府控制的全球网络正在形成。不同之处在于，世界各地的传统社会的瓦解，并将孩子们暴露在巨型城市（mega-city）贫民区里未被任何保护的地区里。不同之处在于，巴基斯坦的儿童编织毛毯借助网络，输出至世界各地，以供应富裕市场大型百货公司的需求。从前所没有的新事物是大量的、全

^① 科恩与古德温（Cohn and Goodwin, 1994）。

球的观光产业在霎童癖间组织起来了；从前所没有的新事物是电子儿童春宫图片在网络上刊登，遍及世界；以往所没有的是父权制度的瓦解，然而却没有新的家庭形式或是新的状态提供儿童应有的保护（p.162）；从前没有发生过的是支持孩童权利的机构逐渐衰弱，例如劳工组织或是社会改革政治，它们被家庭价值中的道德训诫所取代，他们将生活的贫困归咎于受害者身上。

更甚者，信息化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实体。它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它有自己的规则以及就如本章所陈述的过程变动性，除非深刻思考与这些趋势相反的政策与策略，你才会发现它是系统地与儿童的过度剥削与虐待有所关联。

根本上，遍及世界的贫困与社会排斥生成机制造成了剥削儿童的现象，从南撒哈拉非洲到美国皆是如此。儿童处于贫困的环境中，整个国家、地区以及邻里被排除在相对富裕、有权力以及充满信息的环境之外，而家庭的瓦解则打破了儿童最后一道防线。在一些国家，如扎伊尔、高棉或是委内瑞拉，悲惨笼罩压迫着家庭，不管是在乡村小镇或是充满铁皮棚屋的小镇皆是如此。为了求生存，孩童被卖掉、被送至街道挣钱，或是逃离家庭地狱而到另一个非人的地狱中。在其他社会中，父权制度的历史危机毁了传统的核心家庭，然而却没有其他形式取代，使得女性与儿童必须为其付出代价。这是为什么 22% 的美国小孩都生活于贫困之中，这是工业化世界上最糟的孩童贫困比例。这也是为什么罗杰斯（Rodgers）与勒曼（Lerman）在其分析中说到，美国家庭结构的改变与女性及儿童贫困人口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① 不管是什么人与父权制度进行宣战将自己承担风险，而她的孩子也即将承担风险。根据 1996 年美国健康与人道服务部的估计，被虐待及忽视的儿童在 1986~1993 年间增长近两倍，从 140 万增长到 1993 年的超过 280 万人。四肢被严重伤害的儿童人数从

^① 勒曼（Lerman, 1996）；罗杰斯（Rodgers, 1996）。



14.3万人攀升为57万人。来自最低收入水平的儿童比一般儿童遭受性虐待的机会高出18倍，在教育上遭到忽视的情形为56倍，以及有22倍之多的机会在虐待中遭受严重的伤害。同时，被移送调查的案件比例正明显的下滑^①。

家庭结构弱化以及被毁坏的童年使儿童供应不绝，它与需求面，也就是前面我特别引用的分析所呈现的全球化的过程、商业网络、犯罪经济活动部分以及先进的通讯技术等产生会合。(p.163)我们必须将儿童过分剥削、排挤及毁坏、国家与社会的不连续状态，以及大量在战争、饥荒、传染病与盗贼行为中的毁灭人口加入供给与需求两方因素中。

另外，我们社会中片段化的文化，也在助长甚至是合理化儿童生命的毁灭。在孩童自身有一种文化正在蔓延着，那就是派德罗兹尼(Pedrazzini)与桑奇兹(Sanchez)根据他们于加拉加斯(Caracas)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而标示出的“迫切感文化(the culture of urgency)。”^②那是代表一种没有未来、没有根源、只有现在的一种思考方式。而现在则是由瞬间，每一个瞬间所组成的。因此，对待生命的态度就要以好似每一个瞬间就是最后一个瞬间的方式来过活。于是，非常个人式的消耗而冲动行事成为其生活惟一的写照。这种持续不断的、毫不畏惧对生命进行挑战的探索，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衰败，使得这些孩子能够继续过日子：但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就必须面对彻底的毁灭。

社会上，在传统家庭道德和形式不断复制的表象下，社会制度正在大规模地瓦解。传统家庭价值已经渐渐不存在，只剩下个人，特别是男人与他们违反常态的欲望。他们的力量涌现并寻求毫无止境的消费，而短暂的欢愉形式正是这类消费的特色。既然如此，他们何不去剥削最没有反抗能力的社会成员呢？

① 森雷克与布尔德贺斯特 (Sedlak and Broadhurst, 1996)

② 派德罗兹尼与桑奇兹 (Pedrazzini and Sanchez, 1996)。

在经济方面，当全球市场使任何东西从任何地方传送到任何地方变成可能时，此对人类本身造成影响的商品化最高发展形式，看来似乎和纯粹的市场逻辑和精密的规则不相抵触，且成为人际关系的惟一规则，超越了价值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我当然不是说信息化资本主义是由一群皮条客与虐待儿童者所组成的，事实上，保守的资本主义精英确实是喜好家庭价值、法人基金会，而且支持孩童保护主张的。然而，因网络经济和先进科技而增强力量、不受约束的全球市场逻辑，与我在这个章节所陈述的现象间确实存在着结构性的联结。而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发现经济发展领域里的专家接受和支持这种观点，即认为童工的散布在某种条件下是理性化市场的一种回应，可以为国家与家庭产生利益。

孩子们遭到杀害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信息时代里，(p.164)当信息与资本全球网络回避了社会制度的控制时，社会趋势就借助社会的新科技/组织能力而扩展了。既然我们都身处于其中，同时，人们都具有人性的善与恶，当黑暗面接管一切之时，它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力量。

结论：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

我尝试在这一章显示信息资本主义的特色与大多世界中的不平等、社会两极化、贫困与悲惨之间的复杂联结。信息化的确在价值与无价值的人与地方面造成鲜明的区分。全球化选择性的前进产生了信息、财富与权力的网络，将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区段接纳于内或排除在外，造就了新的支配系统。工作的个体化使得劳工们孤立一人，他们面对着持续变化的市场力量为自身的命运进行协商讨价还价。民族国家以及在工业化时代建立的公民社会制



度产生危机，逐渐损害借助制度纠正因无限制的市场逻辑而造成的市场不平衡的能力。这个现象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是代议制度呈现真空状态，一些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以及美国成为自身人民的掠夺者。新的信息科技造成了全世界的财富积累旋风以及贫困的扩散。

社会再结构的过程不只是造成不平等与贫困而已，还包括因全球信息化经济支配利益观点下，被排挤的人们与地方，将移向结构性不相干的位置。这种广为蔓延、繁杂的社会排斥任意发展的过程若以宇宙星球间关系来做隐喻，那就是它将导致信息化资本主义黑洞（black holes）的形成。在不变的状况下，可以说进入这些承担人类处境的社会地景的人们，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是无法摆脱痛苦与破坏的命运。然而，不像宇宙力量那样无法加以控制，有决心的人们能够改变社会结构的规则，其中也包括引发社会排斥的原因，人们可以寻求改变治理信息资本主义的法则。

这些黑洞集中各方所有破坏性能量，密度日益厚实，由多重来源影响人性。人民与地域（locales）如何陷入这些黑洞，并没有比在他们陷入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来得重要，（p.165）亦即复制/再生产社会排斥，及加诸在已被排除的人身上更多的伤害。例如，提摩（Timmer）等指出了美国城市中游民的各种成因。^① 20世纪90年代游民的人口组成混合了下列各种人，包括“老游民”，即古典型陋街类型、或是去机构化的精神病患；以及包括较新的组成，如“福利母亲”、在去机构化与再结构时被遗弃的年轻家庭、因为缙绅化（高级化，gentrification）而被扫地出门的租屋者、逃家的青少年、没有家的移民者以及逃离男性的被殴妇女。一旦他们进入街道，游民的黑洞，就像一个污名，也是一个充满暴力与虐待的世界，一视同仁地作用在这些游民者身上，

^① 提摩等（Timmer et al., 1994）。

如果他们在街道生活下去一段时间将陷入万劫不复的贫困。例如，在前几页曾讨论过的，艾达·苏舍（Ida Susser）指出纽约游民收容所以对母亲与儿童的隔离管制措施通常给儿童带来被害和灾难。^①

另一个例子，较不常被提及。功能性文盲在一个越来越依赖至少要有一点儿语言转译能力的社会里，依序引发了失业、贫困以及社会排斥的机制。此功能性的障碍在先进国家蔓延的程度比一般所知的情形严重。一项 1988 年美国教育部进行的全国读写调查发现，具代表性的样本数中，有 21~23%，也就是 4000 万~4500 万之间的美国成年人英语读写能力程度明显不足，基本算术能力亦然。其中三分之二未完成中学教育；有四分之一是移民，正在学英语；而仍尚有超过 3000 万原生的美国人是功能性的文盲。另外 25~28% 人的能力表现位于该研究界定的第二级，亦即仅具有十分有限的了解能力，此能力限于接受书面指示的能力，但不包括可以写信解释信用卡表列中的错误，或是利用公共汽车、飞机时刻表来安排会面。功能性的文盲为进入任何层级的正式劳动市场的根本障碍，且与低薪工作及贫困高度相关：读写程度最低的人，将近一半生活贫困。同样的，美国的囚犯人口大多数是功能性文盲。^② (p.166)

吸毒、精神异常、犯罪、人狱与非法行为也都是通往毁灭的各种特殊样态的道路，扩大和增加此可能性——即无可救药地犯罪和违反社会所约束的生活方式。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皆源于贫困，或正走向贫困。这些黑洞在社会/文化方面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世界，然而它们彼此间相互进行交流。它们在经济上借助特殊的市场联结（例如，借助毒品联结卖淫的犯罪经济），而且它们与国家间则有着官僚政治的联结（一些为牵制它们而设

① 苏舍 (Susser, 1991, 1993, 1996)。

② 克尔渠等 (Kirsch et al., 1993); 纽曼等 (Newman et al., 1993)。



置的机构，如警察与福利机构），毒品、疾病（例如艾滋病）、犯罪、卖淫与暴力乃是同一个网络下的各个部分，每一个特征都可以加强其他的部分（例如吸毒者借助共享针头以及/或借助嫖妓而传染人体免疫缺乏病毒）。^①

社会排斥常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系统性的对不具价值的人们进行区域隔离、切断他们与有价值的功能与人们的联结网络，事实上，就如我在第一卷第六章所说的，是网络社会的空间逻辑的特色之一。在本章中，我概论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边缘化，并参照美国内城贫民区的现象来陈述社会排斥的空间逻辑。然而，在信息化资本主义的不均等地理空间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也是具领域性的社会排斥。相当明显的是太平洋地区许多小岛被全球资本主义强大势力改变了命运，热带天堂里居住着极度贫困的人，并经历着因旅游业所带来的社会解体（disintegration）。^② 然而，人们为何会进入黑洞，领域为何以及如何被排除在外或是接纳于内，有赖一些特殊事件将边缘化轨道“锁入”（lock in），可能是贪婪的独裁者，例如扎伊尔，或是一些警察决定放弃充满毒品交易的邻里，或者是房屋贷方的“红线区”（red lining），或是在某些地区人们所赖以维生的矿产耗尽或农产品贬值。不管什么原因，对陷于这些区域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是贫困的恶性循环，继而向下沉沦而终至毫不相关。这样的运作方式将持续进行，除非与之对抗的势力出现，包括人们反抗自身所处的环境时，才能够反转这样的倾向。

在这千禧年之末，从前所谓的第二世界（国家主义世界）缺乏统御信息时代力量的能力，已经瓦解。（p.167）在此同时，第三世界做为一个有关联的实体也已消失，它的地缘政治意义空洞化，而它们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高度分化的状态。然而，

① 苏舍（Susser, 1996）。

② 瓦勒斯（Wallace, 1995）。

第一世界则是尚未完全拥抱新自由主义神话的世界，因为一个新的世界——第四世界已经浮现了，它包含遍及这个星球因社会排斥而造成的各式黑洞。第四世界包含了全球大部分的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国家里崩毁的乡村地区。但毫无疑问的，在这社会排斥的新地理版图之下，它同时也包括每一个国家与每一个城市。美国内城少数民族贫民区、西班牙充满大量年轻失业者的异类生活区、像货物一般被堆放在法国郊区的北非人、日本的寄场（Yoseba）^①地区以及亚洲巨型城市中简陋违建城镇都是它的表现形式。它包括了数以百万计的游民、囚犯、卖淫者、罪犯、残暴者、病人以及文盲。他们在某些地方是多数，在某些地方则是少数，而在一些享有特权的网络中也有极少数存在。在信息化资本主义选择性地进行分类、福利国家政策瓦解、社会排斥增强之时，他们的数量在每一个角落持续壮大，可见度提高。在当前的历史脉络之下，第四世界的兴起与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不可分的。（p.168）

① 大阪的失业劳工与穷人的聚居区

第三章 异常的联结： 全球犯罪经济

过去数年间，国际社会经历了有增无减的政治动乱、地缘政治的变迁与技术的再结构。无疑的，做为“传统”的有组织犯罪形式的一个新的动向，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已然是这些新近出现的众多挑战中最令人担忧的。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有能力扩张其活动，以一些国家的安全与经济为目标，尤其是发展中与转型中的国家，这些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稳定，保护他们人民的安全，保存他们社会的整体构造，以及维持他们经济上的生存能力与进一步的发展，以上是他们的政府所不得不起面对的重大威胁。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1994年，第3页

国际犯罪组织对于瓜分地理区域，发展新的市场策略，寻求相互支援的形式，以及冲突的解决等，已彼此达成协议与谅解，而这正以全球的规模展开。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纯粹的犯罪的反势力，有能力左右合法政权的动向，有能力动摇那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力量与机构的根基，且有能力破坏经

济与金融的微妙平衡，并摧毁民主生活。

——意大利国会反黑手党委员会^①

犯罪有如人类一样古老。的确，在圣经里关于我们的起源的讲法中，我们的苦难处境是从非法偷吃苹果开始的。(p.169) 全球的犯罪、势力庞大的犯罪组织的网状结合与串联、其遍及全球的共同活动却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深深影响国际的与各国的经济、政治、安全，而最终及于整体的社会。西西里的科萨·诺斯特拉 (Cosa Nostra) 以及它的联盟拉·卡莫勒 (La Camorra)、恩德兰格塔 (Ndrangheta) 与圣冠联队 (Sacra Corona Unita)、美国的黑手党、哥伦比亚的卡特尔 (Cartel, 即“集团”)、阿尔及利亚的犯罪网、日本黑道 (Yakuza, 即“作苦力者”)、华人黑道人物 (Triads, 即“三合会”)、俄罗斯黑帮 (Mafiyas) 的众多组织、土耳其的海洛因走私团体、牙买加波西队 (Posses, 即“民团”)，以及无以计数之区域与地方的所有国家中的犯罪团体，已借全球化与各种网络凑聚在一起，渗透过边界，连接起形形色色的投机活动。这个世界性的产业的最重要部分当然是毒品走私，武器交易也有高度的市场价值，此外，还包括所有因制度环境禁止而价值反增的东西，这些东西走私之起点和终点可以是任何地方，走私项目包括放射性原料、人类器官、非法移民、妓女、赌博、不法贷款、绑架、非法图利与非法强夺、仿冒商品与伪造之银行票据、金融文件、信用卡、身份证，以及职业杀手、敏感性资讯、科技及艺术品的走私、失窃物品的国际买卖或甚至国家间非法倾倒的垃圾等 (例如：1996 年美国垃圾走私运人中国)。此外，强夺发生在国际之间，例如：日本黑道则是以海外日本公司为强夺之目标。在这系统的中心，洗钱的数额已达千亿甚至数兆

^① 斯特林 (Sterling, 1994: 66) 引自意大利国会反黑手党委员会 1990 年 3 月 20 日对联合国会议提出的报告书。



美元以上。犯罪经济与正式经济是经由复杂的金融领域与国际贸易网络而连接起来的，因此深深地穿透了金融市场，而在脆弱的全球经济之中，构成了一种攸关而多变的因素。许多国家如意大利、俄罗斯、前苏联之众共和国、哥伦比亚、墨西哥、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巴拉圭、巴拿马、委内瑞拉、土耳其、阿富汗、缅甸、泰国，甚至日本（见第四章）、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包括卢森堡与奥地利在内的众多小型国家等，在这些国家中，如果忽略了他们日常运行中既存的犯罪网络活动，就无法掌握和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以及政治的运作。这些犯罪活动在国际网络中的弹性关系网，既构成最新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信息时代之社会/政治动能的重要特征。关于这现象的重要性与事实，已被广泛地认知，也有主要得之于新闻界的报道与国际组织会议上的大量证据。^①（p.170）但是在促进对经济与社会之了解的范畴里，这现象却甚为社会科学家所忽视，认为资料缺乏可靠性，而其解释又不免带有取宠或煽情的成分云云。我反对这类观点，因为假如一个现象已被认为的确是这崭新而全球化的体制下之重大的社会面向，那么我们则应该利用手边所有的证据，对这些犯罪活动和我们整体社会与经济间的关系，加以探究。

① 关于全球犯罪最具权威性与国际性的资料来源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UN ESC）为1994年11月21-23日在那不勒斯（Naples）举行的有组织跨国犯罪世界部长级会议所汇编的资料文件。本文中我曾大幅引用这些资料而希望向提供资料给我的人致谢：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ILO）劳工研究国际学院院长郭平纳斯（Gopmath）博士，维也纳联合国犯罪防治与罪犯正义分部主任维帖尔（Vetere）先生。关于全球犯罪结构的扩张曾举证充分的是斯特林（Sterling, 1994）的杰出综合概观之作。虽然斯特林的著作的煽情倾向受到批评，但我没听说过她那一向经过调查与访谈而报道出来的实情曾经被质疑或挑战。亦请参考马丁与罗曼诺（Martin and Romano, 1992）；与凯立（Kelly, 1986），虽然后者有些老旧。

犯罪组织性和全球化， 罪犯之文化认同^①

过去二十年间，跨国营运的犯罪组织越来越增加了，利用的是经济全球化与最新通讯与交通之技术等有利条件。他们的策略是把管理与生产部门的基地设在风险较低的地区，因为他们对那里的制度化环境有相对足够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则以需求旺盛而富裕的差别市场为目标，以便索求更高的价格。对于毒枭而言，很明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运作的，无论是哥伦比亚与安第斯山地区的可卡因，或是产自东南亚金三角地带或阿富汗与中亚的鸦片/海洛因都一样。而这也是武器交易与放射性原料走私的重

① 这一节所引用资料的来源，当没有特别提及时，是引自1994年联合国以UN-ESC名义发布的关于有组织跨国犯罪的会议的背景报告书（1994）。关于有组织犯罪结构在欧洲的影响，除了斯特林（1994）的感知性质的分析，亦参阅罗斯与弗雷（Roth and Frey, 1995），关于意大利黑手党，则参阅哥伦坡（Colombo, 1990）、桑提诺与拉非乌拉（Santio and La Fiura, 1990）、卡坦查洛（Catanzaro, 1991）、卡尔维（Calvi, 1992）、沙沃纳（Savona, 1993）、传发格里亚（Tranfaglia, 1992）与阿尔拉契（Arlacchi, 1995），关于美国黑手党的新近转变，参阅波特（Potter, 1994），也参阅斯特林（1994）。关于全球犯罪对美国犯罪的影响，参阅克兰克涅（Kleinknecht, 1996）。关于华人三合会，参阅布斯（Booth, 1991）、墨瑞（Murray, 1994）、朱（Chu, 1996）。关于进出缅甸泰国金三角的海洛因走私，参阅瑞纳德（Renard, 1996）。关于日本黑道，参阅凯普兰与杜布罗（Kaplan and Dubro, 1986），与西摩（Seymour, 1996）。关于非洲，参阅佛陀里诺（Fottorino, 1991）。关于俄罗斯与拉丁美洲，参阅下文。还有，我也引用经过艾玛·姬丝尤娃（Emma Kisclyova）搜集分析的来自新闻报道的一些消息来源，包括美国、欧洲与俄国发行的报纸。至于本节所用的特定资料来源则在各脚注中已注明出处。



要操作机制。(p.171) 利用在过渡时期的俄罗斯与前苏联诸共和国等国家中较不易受到法律制裁的漏洞，俄国与世界各地的犯罪网已控制了大量军事与核子物资的供应来源，准备卖给后冷战混乱之国际局势上出价最高的竞购者。这种犯罪活动的国际化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犯罪组织各在对方的地盘上开始形成策略联盟，以便合作，而非互斗，并采取转包以及企业合作的方式，这类商业手法非常近似我曾所说的做为信息时代特征的“网络企业”组织逻辑（见第一卷第三章）。进一步来说，既经由全球金融市场进行洗钱，就定义而言，这些活动的程序的大部分，已可以说是全球化了。

对于犯罪经济的利润与金融流通的估计总是出入极大而不完全可靠，但是这些数字对我们所描述的现象其难以置信的庞大规模，则不无提示作用。根据 1994 年联合国全球有组织犯罪会议的估计，全球毒品交易数额已约达每年 5000 亿美元；也就是说，它大于全球石油贸易总额。^① 而从所有各种活动得来的总利润则有人认为高达每年 7500 亿美元之多，^② 另外也有估计提到 1993 年的数字是美金一兆元，这几乎是同年度美国联邦预算那么多。^③ 斯特林 (Sterling) 则认为 5000 亿美元毒品交易额似是一个较切近的数字。^④ 1999 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IMF) 曾尝试针对全球洗钱作一个极为广泛的估计，约介于每年 5000 亿到 1.5 兆美元之间 (或者是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5%)^⑤。毒品收益的一大部分则被漂洗过 (付给洗钱人的佣金是票面价值的 15~25%)，并且有半数洗后的钱又被再投资到合法的活动中去，至

①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 (UN-ESC, 1994)。

② 联合国，根据寇威尔 (Cowell 1994) 的报道。

③ 华盛顿国家策略信息中心总部，根据 1993 年 12 月 13 日《新闻周刊》的报道。

④ 斯特林 (Sterling, 1994)。

⑤ 由《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1999.6.26.p.17) 所引述。

少在西西里黑手党的案例是如此。^① 从犯罪活动获得的收益与它们合法投资活动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使得全球犯罪对经济的影响无法受到制约，因为它扮演了担保与掩护这体制的整体活动力。更有甚者，交易的执行也结合了在各国内与国际间对法律程序与金融系统的娴熟操弄，(p.172) 以及暴力的选择性使用，并利用了由政府官员、银行家、官僚与执法人员间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

在全球犯罪的源泉地，则有深深根植于民族国家的、区域的与种族的组织团体，其中多数拥有他们悠久的历史，正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关于荣誉的规范，他们团结的机制而连上某个特殊的国家与区域的文化。这些有文化根基的犯罪组织并不消失于这崭新的全球网络之中。相反的，他们的全球网络提供传统犯罪组织在他们的艰困时刻中躲避特定国家的控制而得以存活繁盛。因此，20世纪80年代因遭受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摧毁性打击而一蹶不振的美国黑手党，因为有西西里黑手党，以及与华人三合会、俄罗斯黑帮与其他种族之犯罪集团的结盟，在20世纪90年代又得以复苏。^②

西西里黑手党仍然是世界上势力最强大的犯罪组织之一，运用它历史上对意大利南部的控制，以及它对意国政府的深度渗透。黑手党与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关系，使它足以伸展它的势力至全国，并与银行业体制挂钩，借之再与全国政商精英的阶层互通声息，甚至透过显然是由该黑帮所控制的安布洛西亚诺银行(Banco Ambrosiano)，而得以与罗马教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987年西西里黑手党与梅德因集团(Medellin cartel)间的一项协定打开了欧亚海洛因与哥伦比亚可卡因以毒易毒的门路。经此，哥伦比亚人得以进入美国的海洛因市场，而这从前只有西西

① 斯特林 (Sterling, 1994: 30)。

② 克兰克涅 (Kleinknecht, 1996)。



里人、美国黑手党与华人三合会才有机会瓜分的，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一方面借用了西西里黑手党的基本管道供销可卡因到欧洲，一方面也缴纳其份额给西西里党人^①，这只不过是西西里黑手党人一连串国际行动中记录最详实的一项。其他如对德国犯罪市场之深度渗透，以及对过渡时期苏维埃政权财产与通货的投机性并吞（见下文）等。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意大利黑手党对于该国基督教民主党与其他传统政党的控制稍显动摇，意大利政府试图向黑手党摊牌以讨回它的治理权时，引起黑手党的残酷反应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包括杀害多位意大利反犯罪行动的领导人，最令人瞩目的是法尔孔尼（Falcone）与伯沙里诺（Borsalino）两位法官。（p.173）其后在民意的声援和媒体的报道以及意国腐败政治的局部崩解之下，杀人狂“老总”（Capo di tutti capi，即“众人之头目”）瑞意纳（Totò Riina）被捕入狱，黑手党在意大利国内的势力大大削弱。但是20世纪90年代黑手党活动的日益国际化，使它的党人们得以开创另一番繁荣景象，尽管他们不得不稍许（但绝非大部分地）放弃对意大利地方社会与政府机构的控制。

在这国际化过程中，意大利黑手党恰巧与华人黑道“三合会”沆瀣一气，“三合会”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及勾结网最绵密的犯罪组织，光是香港一地就拥有16万徒众。其下分14k、“新义安”（Sun Yee On）与“和”（Wo）集团。另外一支势力庞大的犯罪网“竹联帮”，则以台湾为基地。正如意大利、美国的黑手党一般，“三合会”也是根深蒂固在历史与种族的特性之上。“三合会”源自16世纪的中国南方，前身是清代反抗满族侵略者的抵抗运动。共产党革命后他们逃离中国，在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尤其在美国。他们在1997年之前10年便已预见将失去在香

^① 斯特林（Sterling, 1994）

港的根据地，于是进行大规模的国际化与多角化运动，利用了通常是经由“三合会”所非法偷运进入美国、欧洲与加拿大等国家的华裔移民，其中一部分人继续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巴黎的意大利广场 (Place d' Italie)，旧金山的新旧唐人街 [旧的唐人街在都板 (Grant) 街，新的在纪利文 (Clement) 街]，所见到的蒸蒸日上之华人商业，其中有部分是做为支应广泛之犯罪活动，以及洗钱作用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仍是从金三角 (the Golden Triangle) 走私海洛因，历史上该毒品是被毒枭的军队所控制的，军队原属蒋介石部队的成员，在冷战时期则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①

日本的黑道——“做苦力者” (Yakuza，即“无赖”或 Bo-ryokudan，即“暴力团”) 的存在具有半合法性。在日本政商活动 (通常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派系) 的多数场合中公开现形。最重要的帮派是山口组 (Yamaguchi-gumi)，拥有 944 个帮派组织网，26000 徒众；稻川会 (Inagawa-kai)，8600 徒众；以及住吉会 (Sumiyoshi-kai)，超过 7000 徒众。他们是由 19 世纪日本社会都市化之早期阶段，城市里贫穷人口中失意武士 (Samurai) 组成的保护体制衍生出来的。就如同其他组织一样，保护作用转而变成对自己人的掠夺与索求。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黑道在自己的国内感到安定，(p.174) 所以它的国际活动只限于从美国走私武器到日本，以及从其他亚洲国家私运女性性奴隶到日本的妓院与夜总会。但是，他们随着日本公司的全球化，也把他们对公司的恐吓、强夺等惯常行径外销到美国，派遣总会屋 (Sokaiya，或 violent provocateurs，即暴力索客) 胁迫海外日本公司的主管人员。他们模仿日本公司大量投资于房地产，特别是美国的房地产，以及操纵金融市场的股票。他们与西西里及美国的黑手党，以及俄国的不同犯罪团体等，达成若干协议以便在美国与欧洲境

^① 瑞纳德 (Renard, 1996)。



内进行活动。

从20世纪90年代起，几个俄国犯罪网的戏剧化扩张曾经在全世界造成头条新闻。然而这个地下世界的某些首领人物与盗贼世界（vorovskoi mir）这一古老俄国之传统有关联，而当之俄与前苏维埃诸共和国的有组织犯罪，则是因为从国家主义到狂野之资本主义间过渡期失控导致的结果。苏维埃体制中的任命制官职集团（nomenklatura）的成员是一群极富企业精神，热衷成为“千禧末年盗邦之尊”（end of millennium robber barons）的资本主义者，以及无数各族裔的犯罪集团（其中最残忍与最邪恶的莫过于车臣人——the Chechens），构成苏联瓦解后遗留下的荒原之中的犯罪网络。它们以该处为基地并扩张到全世界，与各地的犯罪组织勾结，聚合或竞争，至于是共享利益或彼此残杀，则视情况而定。^①

一群经由在中南美贩毒而崛起的犯罪集团，如哥伦比亚的梅德因（Medellin）与卡里（Cali）集团，墨西哥的塔茅里巴（Tamaulipas）、提花纳（Tijuana）与华雷兹（Ciudad Juarez）集团，以及几乎每一拉丁美洲国家的类似犯罪集团，均组织着有一种纠合生产、管理、分销活动的网络，串连起农业生产地带、化学炼制厂、仓储设施与向富裕国家出口的运输系统。这些集团几

① 国际化的俄国犯罪结构与拉丁美洲毒枭们之间勾结的情况最耸人听闻的案件之一是，1997年3月，迈阿密的美国毒品管制局（DEA）逮捕了路温·范因伯格（Ludwig Fainberg），此人为俄国移民，以及被认为是哥伦比亚毒枭的中间人的两个古巴人胡安·阿美达（Juan Almeida）与尼尔森·叶斯特（Nelson Yester）。根据美国毒品管制局，在迈阿密机场附近拥有一家脱衣酒吧的范因伯格，正在协商一桩一艘俄国潜艇的买卖，连舰上人员一道配备待售，由前苏联海军一位将官领导，准备私运可卡因进入美国西岸沿岸港口。事实上，这一犯罪同盟早在1992年已开始其合伙生意：卖出两架俄国直升机给毒枭集团。范因伯格从前的身份是苏联的牙医，也从事私运可卡因到俄国，并且正设计运输毒品的新方式，由俄罗斯与哥伦比亚的犯罪组织共同担纲操作。参阅亚当斯（Adams, 1997），那伐罗（Navarro, 1997）。

乎专门集中在毒品的走私，(p.175)起先是可卡因，其后加上大麻、海洛因以及化学合成毒品。他们有自己的执行单位与独立的洗钱计划。他们习惯并偏好渗透警察、军队、司法与政客的机构与体制，以一种能改变中南美洲的政治的贪污与影响力的广泛网络，运作他们在未来世界中的深远影响，以他们的真正本质而言，这些集团（实际上是由受到枭首以暴力、金融与分销能力所控制的较小生产者的协调网络所组成）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本质。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向欧美以至全世界输出。而他们的策略，实际上是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针对某些中南美地区制定的发展政策所启发而得来的奇怪变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考虑发展中国家适应新的全球经济之高科技环境的竞争实力而制定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的。他们与欧美国家及地方层级的犯罪组织勾结以便运销他们的货物。他们并且设立庞大提供洗钱的金融与商业帝国。比起任何一个犯罪集团，他们更能深度地渗透全球金融体制。哥伦比亚与拉丁美洲的毒枭们，正如在西西里的，或华裔、日裔或俄裔等他们的同伙一样，也是深植在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之中。梅德因集团的枭首亚斯寇巴（Pablo Escobar）就曾叫响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宁可死在哥伦比亚也不要被关在美国的监狱里”。他果然如愿以偿。他们对于自己国家之内的法官、警察与刑事制度的控制总相对地较有把握，亚斯寇巴的立场，以及拉丁美洲众毒枭的类似看法，反应了这种明显的机会主义。但显然还有其他因素，在他们与美国对抗的立场中，及在他们对其区域及民族（nations）的依恋中，存在着一种更为特殊的文化成分，这是我以下将较详细加以讨论的主题。

以上我所提到以国家与族裔为根基的犯罪组织，算是最恶名昭彰的一伙，但绝非全球场景中仅有的。土耳其的犯罪组织（具有对该国政治与执法机构的高度影响力）是运送海洛因进入欧洲的传统巴尔干路线上的重要角色。这条路线如今用于更多的各类走私。20世纪90年代末期，阿尔巴尼亚（Albanian）的黑帮在



非法偷渡移民到意大利的人蛇活动上建立起了他们的支配性势力。1998～1999年间，他们曾积极参与了对科索沃解放军（Kosovo Liberation Army）的金援与军援的活动，因此这批黑帮也在巴尔干半岛上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多角化的阿尔及利亚犯罪网络已是一撮不可忽视的势力，不只在阿尔及利亚与非洲（在该地他们是做为国际犯罪集团有关当地情况的报信者），（p.176）在国际舞台上例如信用卡诈骗更见他们的特长。各国与各地的黑帮，以及黑帮的网络，如今都已明白他们要与更广泛的地下世界连锁活动勾搭上才能得到机会，因为这既有的地下活动在多数邻里、城市与区域形成了一种支配性的存在力量，而这些力量已经足以购买一些小型国家的大部分资产，例如委内瑞拉外海的岛国亚鲁巴（Aruba）。

基于认同，仰仗着信赖/不可信赖的人际关系（当然是靠机关枪而维持的），从这些地方性的、国家的与族裔的根据地上出发，犯罪组织从事广泛的活动。毒品走私做为他们最主要的事业，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这类违禁药品一旦合法化，恐怕将构成犯罪组织所不得不面对的最大威胁。但他们仍然能够仰仗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盲目无知，以及这社会倒错的道德意识：不肯向问题的底线来摊牌，而这个问题事实上是，需求面在驱策着供应面。因为我们社会日常生活所加诸个人身上的苦难造成的心理伤害导致沾染毒瘾，以至于导致这世界上多数犯罪的渊藪。因此，无论如何加以压制，在可预知的未来，必见毒品的大量消费。全球犯罪集团必找得到途径以供应这项需求，使之成为最有利可图的事业，而成为多数其他犯罪之母。

然而，除了毒品走私，犯罪经济已拓展它的领域，达到一种极端多角化的经营，使之成为日益嬗变、相互关联的全球产业。1994年联合国跨国犯罪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nsnational Crime）列出这类有组织犯罪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在毒品的非法交易以外，尚有：

1. 武器的非法交易 这当然是一个动辄数十亿元为计的庞大生意，但它与合法武器外销的界线并不容易区分清楚，这个生意里的关键之处是最终使用者的身份问题。有些国家是基于国际协定或地缘政治被禁止取得某些类型的武器，有些则是在国际禁运制裁下的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其他则为游击队团体，或牵涉内战的一方；还有的是恐怖分子的团体，以及犯罪组织。美国与苏联构成世界上战争武器的主要供应者，凭借着对不同的敌对势力慷慨地提供武器，企图在地缘政治的对抗赛中影响受援者。冷战结束后，武器落入那些常是不太可靠的对象者的手中，运用他们的存货滋哺这个市场。另外有些交易是来自武器制造国家的半合法外销，诸如法国、英国、中国、捷克共和国、西班牙或以色列。联合国报告指出：“无论最终使用者为何人，黑市的武器交易拥有三项特征：它们总是暗地里的（covert）活动，有一大部分的代价与花费其开销是与这种交易的不可告人的特质有关，最后，回流的金钱总是经过漂洗的。”^①

2. 核原料的非法交易 这里所谈的是属于核武器等级的原料的走私，目的是用来提供建造核武器以及/或者威胁动用核武器以从事敲诈。苏联的解体提供了供应这类原料的主要机会。20世纪90年代，德国一直处于这类非法交易活动的最前哨，来自前华沙公约（Warsaw Pact）诸国的犯罪网络持续替国际中介人从事核子原料的走私，有时简直不择手段，例如在走私者个人口袋中挟带具有高度辐射性的物品。^② 根据德国联邦警察署总长汉斯-路温·札赫尔特（Hans-Ludwig Zachert）的公开证词，1992年曾有158件放射性原料的非法交易；1993年则为241件。这两年中总共有39次为警方查获，1993年中确认涉嫌的545人

①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UN-ESC，1994：18）。

② 斯特林（Sterling，1994）。



犯，其中 53% 为德国人，其余则多数为捷克人、波兰人与俄罗斯人。^① 核原料非法交易的供应虽然主要来自东欧，但这类交易是国际性的：1994 年 8 月 10 日，德国警方查获 350 克的浓缩铀，逮捕一名哥伦比亚人与两名西班牙人，虽然，据传言该交易是德国情报单位所设下圈套的案件。^② 其他在布达佩斯与布拉格也查获核子原料。专家们相信中国的核子原料中也有些正流人犯罪市场。^③ 然而，在这个非法交易活动的源头，即俄国核子武器工业却存在着大祸临头一触即发的景象，该工业雇佣了约 10 万名员工，1994 年这些人的平均月薪为 113 美元，他们曾数度诉诸罢工以争取当局对他们处境的注意。1996 年，一家与俄国军事核子复合设施有关的核子研究机构主管在绝望之余而自杀。然而只要鉴于一颗炸弹大小所用的铀的数量，其潜在的黑市价格是几亿美元这个事实，对于这数万名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p.178) 其诱惑确实是太大了。除此之外，前苏联在俄罗斯以外的基地在苏维埃解体后的安全状况堪忧，管理上异常涣散：1995 年，爱沙尼亚 (Estonian) 政府即承认帕迪尔斯基 (Padilski) 核子基地的放射性原料曾遭窃。^④ 在俄国的远东港口，堆积着那些缺乏适当储存设施的核潜艇的放射性废料，不仅代表一种严重的环境祸害，在此警戒松散的东部边疆，而且极易引发越界的走私。^⑤ 对此，1994 年联合国的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 (UN-ESC) 的报告中有此结论：

假如仅仅是做为核原料处理失当的结果，这种贸易将导致贿赂、强夺与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的可能性当然很高……

①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 (UN-ESC, 1994: 18)。

② 《镜报》(Der Spiegel), 1995 年 4 月 4 日。

③ 《时代周刊》，1994 年 8 月 1 日。

④ 《波罗的海观察家》(Baltic Observer), 1995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5 日。

⑤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96 年 12 月 18 日。

然而在俄罗斯联邦内部，核子原料常自政府管制下的组织之外获得，这一事实表示在其中有不法图利的犯罪组织的参与。假如他们无法以一种方式——即售予购买者——而获得预期的利益的话，那么下一步它便会以某种核子勒索的方式企图谋取。随着核子裁军的持续进行，核原料可能取得的途径只有增加而非减少。^①

3. 非法移民的偷渡 见诸世界的普遍灾困，人口的不适其所，与核心地带经济的蓬勃，几个因素的加成，推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涌向移民。另一方面，边境的控制，尤其是富裕社会企图拦阻移民潮的各项措施，却有增无减。这些互相矛盾的趋势提供犯罪组织一个打开偌大市场的上好机会：一个具有全球性规模的“山狗”（Coyote）人蛇网。^② 1994年的联合国报告书中引用可靠的估计说，每年从贫苦到较富有的国家的非法移民偷渡的数量约为100万人，其中约有20%是中国人。这一数据难以说明每年以不同方式进入美国而没有合法证明文件的70万移民，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欧盟（European Union）内部，非法移民增加到约每年50万人（见图3-1），而东欧黑帮正是指挥这其中部分的非法偷渡活动的主要角色。^③ 因此，世界上非法移民的实际数字应该比联合国估计的还高出更多。被犯罪集团控制的移民活动不仅可由移民前的付款得到利润（p.179）（举例说，仅对墨西哥与加勒比海的一项估计就是35亿美金），还可置移民们于偿还此付款的高利贷的长期束缚之下。这期间也使移民们陷于面临欺诈、凌虐、暴力与死亡。甚至，由于合法移民管道即将遭到淹没的威胁，触发那受煽动性政客所操纵的反弹性仇外情绪，正

①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UN-ESC，1994：19）。

② “山狗”是在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私运移民的人口贩子们的绰号。

③ 《欧洲边境》专文，《经济学家》（Economist，1999. 10. 16，pp. 26-28）



在破坏多数国家中的文化宽容与团结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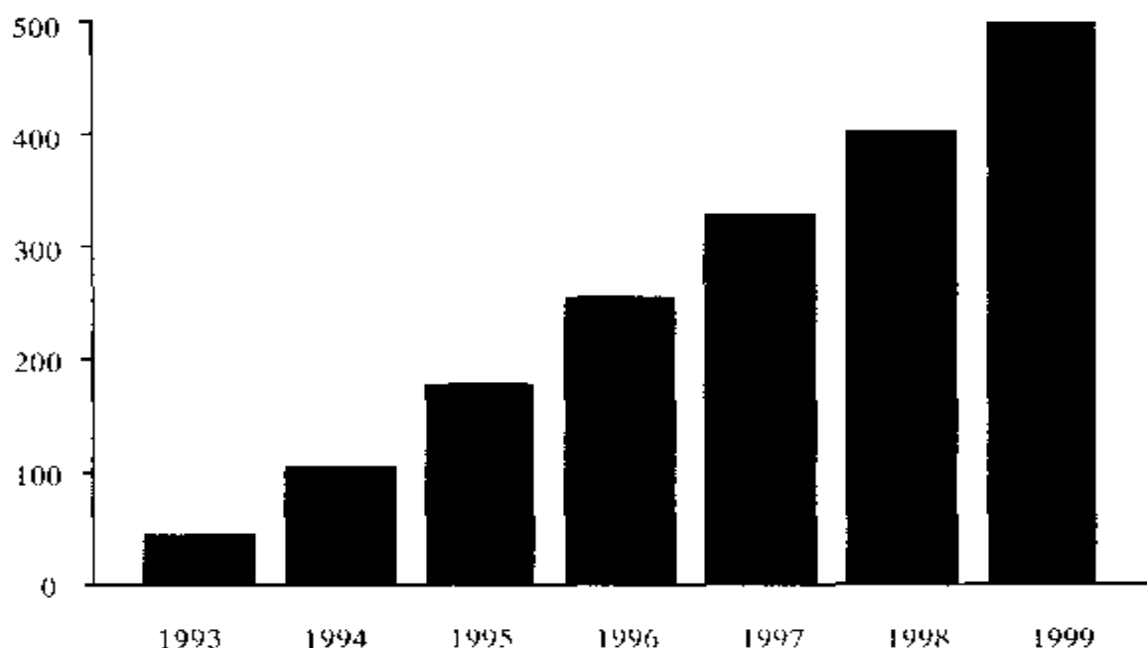


图 3-1 1993~1999 年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

资料来源: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取材自《经济学家》(1996b, 26)

4. 有关妇女与儿童的非法交易 全球的观光事业早已与全球性卖淫事业密切关联,在亚洲由于经常处于华人黑道与日本黑道的控制之下而特别活跃。但在欧洲也有此情形,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在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的黑帮就曾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卖淫网络,私运那些已遭驱使成为性奴隶的移民妇女,她们之中许多来自阿尔巴尼亚,其他则来自东欧与中东。这非法的人口贩卖活动的影响也愈来愈波及儿童(参阅第二章)。除了虐待与剥削儿童之外,领养儿童也成了日渐兴盛的行业,尤其在拉丁美洲,送养的目的地是美国。1994 年,中美洲的婴儿曾以两万美金售予领养集团,多数(但并非所有)案例倒是经他们父母同意的。据信这类买卖早已扩展成为数百万美元的事业了。(p.180)

5. 身体器官的非法交易 根据1994年联合国的报告，在阿根廷、巴西、洪都拉斯、墨西哥与秘鲁，对于这类非法交易已有经过证实的报道，而大部分的走私目的地均是在德国、瑞士与意大利的购买者。阿根廷就有过例子：病患的脑膜经过伪造的脑部扫描报告宣判其脑死后而割下。在俄国停尸间里无人认领的上千尸体，问题看来颇严重：根据1993年的报道，莫斯科的一家公司曾经撷取700件主要器官，肾脏、心脏与肺脏，超过1400件的肝脏切块，18000件胸腺器官，2000只眼睛，超过3000对睾丸，准备全部供应出得起高价的购买者作器官移植之用。^① 1996年4月26与28日，伯克利加州大学举行“器官交易：全球市场的文化、政治与生物伦理之国际会议”，有来自世界的一流学者专家的参与，会中既证实这一扩张性市场的重要性，也强调非法买卖与政府所进行的交易之间的薄弱界线。例如，这次会议提出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似乎例行性地授权死刑犯的身体器官售卖，每年有数百人，其处置的结果均合法地缴归国库。在印度与埃及，非法交易事件似乎特别重大，因为买主是富有的中东患者。多数这些器官是人们自愿割下售出的，要不是在活着的状况下（一个肾脏，一只眼睛），便是在他们死后由家人卖出。然而，在国家与国际的立法下这类交易确属非法，因此是由走私网络所操纵，器官走私的最终买主，自然是全世界的主要医院，这便是全球的贫穷与高科技间层出不穷的纠结之一。1999年11月，学者与人权斗士们再度在伯克利集会，而建立了永久性的机构，叫作“器官守望”（“Organs Watch”），用以记录、宣传，并期望最终能减少私运人类器官的案件。

6. 洗钱 整个犯罪体系只有当其产生的利润可在合法的经济结构里进行再投资时才符合它的算盘。鉴于其难以置信的高额利润使得上述过程益加复杂，这便是何以洗钱是全球犯罪之母的原

^① 《时代周刊》，1993年11月18日。



因，以及它是最直接关联到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点。(p.181) 洗钱^①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是最需经绵密的处理的阶段，必须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将现钞掺入金融体系。有些例子，所选银行是坐落在几乎无所管制的国家中。巴拿马、亚鲁巴、开曼群岛 (The Cayman Islands)，巴哈马群岛、圣马尔登 (St. Maertens)，凡努亚图 (Vanuatu)，但也包括卢森堡与奥地利 (虽然在这两国的情形近来有所改变)，在警方报告中这些地方经常被引述为赃款混进金融体系的主要通道。虽然各大经济结构规定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交易 (在美国是一万美元) 必须报告，于是通过大量的 9999 元 (或少于此数) 的交易，即以—种称为“小精灵化” (smurfing) 的过程做为存款的方式。第二阶段称为“压条法”，即分离赃款及其来源以避免在未来查账中被查出。在此做为关键的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轻易于数秒之间完成程序的电子转账的能力。结合了现金交换 (swap)，对各式证券的投资，以及夹附部分赃款于合法的资金贷款中，交易的多变与速度使得资金的来源极难被侦察到。鉴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截获的这类款项只有非常少量的事实，侦察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② 第三阶段称为“整合”；亦即把洗过的资本投入合法经济结构，通常投资于房地产或股票，且一般会利用合法经济结构中最弱的——即在一些缺乏或很少有反洗钱立法机制的国家为通道。经过了这段整合，犯罪的所得即已融入全球财金的湍湍巨流中了。^③

20 世纪 90 年代中全球犯罪的成功与扩张的关键在于其组织的弹性与变通。网络化联结是他们操作的形式，既在各个犯罪组

① “洗钱” (money laundering) 这个用语的起源来自 20 世纪 20 年代的芝加哥，当地黑手党的一名掌柜人买下几家有自动设备的洗衣店，洗衣服务只收现金。在将每日所得报税之前，每晚他会掺些“肮脏”的钱混进他要进行“漂洗”的钱里 (根据《文献公报》，Literaturnaya Gazeta, 1994 年 7 月 12 日)。

② 斯特林 (Sterling, 1994)。

③ 迪费奥与沙伏纳 (De Feo and Savona, 1994)。

织内部（如西西里黑手党，卡里集团），也在与其他犯罪组织间的关系中如此操作。货流网络则以自治性地方帮派为基础而运作，帮派供应该网络以货色与服务，其相对的获得是现金。每个主要犯罪组织各拥有厉行其交易的手段。残忍无情的暴力（包括胁迫、酷刑、绑架家庭成员、灭口）当然是例行公事的一部分，也经常下包给职业杀手下手。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有组织犯罪的“安全机器”，（p.182）就是列于黑道的授薪名单中的执法人员、法官与政客们的网络。一旦踏入这一个体系，他们将终生无可自拔。一方面认罪协商与罪犯的保护计划的司法策略有助于压制有组织犯罪，特别是在美国与意大利，另一方面犯罪头目们找寻安全掩蔽所的能力的与日俱增，以及职业杀手的无限的能力，使得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与80年代的意大利传统上使用的压制对策，其有效性颇受到限制。

这种逃避以民（国）国家（nation-states）为基地的警方压制的需要使得犯罪网络间的策略同盟变成重要的新作业方式。没有任何单一组织凭其自身能够造成其组织的全球串联。甚至，如不进入另一犯罪势力的传统势力范围中的话就无法伸展它的国际触角。纯就商业的逻辑而言，这也是何以犯罪组织会彼此尊重，且会跨越国家的疆界与地盘找到彼此聚合之点的缘故。多数杀人事件发生在国内：俄罗斯人杀俄罗斯人，西西里人杀西西里人，梅德因集团与卡里集团互相残杀，的确就是为了控制那当地与国内基地，据之他们才能放心地经营。根植于传统与认同的地方性地盘的弹性化网络联结，处于一个有利于营运作业的制度环境，以及透过策略同盟提供的全球扩张，这些因素的总合说明了全球犯罪的组织化实力。这些因素使之成为信息时代的经济与社会中的根本作用者与主要参与者。这个在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再也没有比在俄罗斯的劫难（the pillage of Russia）时期更为明显了，这是在苏维埃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转变成无法无天的狂野的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与后续的一段期间所发生的。



俄罗斯之劫^①

黑手党是从何处取得它的源头的？这很简单，它开始于政客们、生意人与歹徒们的共同利益。所有其他人则是这个邪恶同盟的人质——所有其他人指的是我们。（p.183）

——帕维尔·弗夏诺夫（Pavel Voshchanov），《共青团真理报》第13页

从苏联到市场经济的混乱转变，在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内为有组织的犯罪制造了条件，以对广泛的商业活动进行渗透。这转变也导致原来在俄罗斯与前苏联境内，以及以之为基地的越界犯罪活动的扩张，例如有关武器、核子原料、稀有金属、原油、自然资源与货币的非法交易。国际犯罪组织便与数以百计的后苏联社会中的黑手党网络进行勾结，他们之中许多是循着族裔的分界而组织起来的（车臣人、亚赛人、乔治亚人等等），从事洗钱、攫取贵重资产以及介入那些赚钱的非法与合法的生意。根据俄国总统府社会与经济政治分析中心1994年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报告估计，几乎所有小型私人企业都曾持续向犯罪集团缴纳勒索款。

① 这一节是根据多种不同来源的资料。首先，是姬丝尤娃所做对于来自俄国与西方的新闻报道的分析。我不认为有必要引证所有这些报道，既然它们都是众所周知的。第二，1989~1996年间我在俄罗斯进行的田野研究，如本卷第一章及第一卷第二章中所提及的与陈述的，我经常在我所要调查的经济与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发现犯罪活动的踪迹。第三，关于这主题我引用了几本重要的书与文章。有关俄国的有组织犯罪最好的一本是韩德尔曼（Handelman, 1995）写的。斯特林（1994）的书中有几节关于俄国与全球犯罪的震撼性报道。弗夏诺夫（Voshchanov, 1995）与高德曼（Goldman, 1996）则以令人折服的论证把对实据资料的解释接连上俄罗斯经济的犯罪化过程。

至于较大的私人机构与商业银行，报告称其中约有 70~80% 的公司也向犯罪集团缴纳保护费。这些付款代表这些公司资金周转率的 10~20%，约等于其半数以上的利润额。^①

1997 年情况似乎未见好转。根据另一则《消息报》(Izvestiya) 的报道，估计约有 41000 家工业公司，50% 的银行，80% 的合伙生意与犯罪有所关联。^② 同一报道指出种种迹象显示这个灰色经济可能在数量上占有俄国经济的 40% 之多。其他观察家，包括马歇尔·高德曼 (Marshall Goldman)，在估计有组织犯罪对商界与政府广泛渗透程度的看法上也相同。^③ 赋税体系的瓦解，与企业对于威迫性组织的屈从与付款，二者有直接的关联，为的是在缺乏可靠的国家机构的情形下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在两难的困境中做选择，一个是没有回应的当局政府，另一个则是颇富效率却残酷无情的勒索集团。公司与人们逐渐习惯于仰赖后者，出于恐惧或一时之便，或出自这两个都有的原因。

有些城市（如伏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中，地方的行政职能高度受制于其不清不白的牵连关系的摆布。再则，即使某个企业并不与犯罪组织有牵连，它仍不得不在一个犯罪集团无所不在的环境中运行，特别是在金融界、内外销事业、原油、稀有及贵重金属的贸易事业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国商界弥漫的暴力，程度确是惊人：1996 年中就有一份《商业人报》(Kommersant) 刊出每日讣告栏，公布当天因公遇害的生意人名单。(p.184) 商界中雇请职业杀手杀人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④ 根据俄国内政部的资料，1995 年约有 450 件职业杀手杀人事件受到调查，而只破获 60 件。俄国的新富们避祸他乡，身处加州豪

① 《消息报》(Izvestiya) 的报道，1994 年 1 月 26 日。

② 《消息报》，1997 年 2 月 18 日。

③ 高德曼 (Goldman, 1996)。

④ 夏格罗德斯基 (Shargorodsky, 1995)。



宅遥控他们在莫斯科的事业营运，以避免他们及其家人受到生命威胁。同时却每日不忘参与那借了滚动金钱与权势的大球，而争逐今世无与伦比的致富机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法制环境中执行商业交易，通常都在胁迫方式下进行，有时借助于杀人。此外，有组织的犯罪一般不止满足于承包暴力或非法活动而赚取酬劳，他们要的，且通常都能够得到的，是生意上的一杯羹，有的是要求股份，更常见的则是现金进账，要不然就是特惠或方便，例如特惠贷款或走私的机会。在私有部门，企业持续缴交“税金”予犯罪组织而非缴给政府。的确，威胁要向政府税务稽查单位揭发企业的伪造账册就是有组织犯罪勒索常用的方法之一。

海外之后苏维埃犯罪网络的戏剧性扩张，特别是在美国与德国，充分反应国际犯罪集团在俄罗斯与前苏维埃诸共和国中的广泛存在。这些犯罪网络在美国的运营一向具有金融与技术层面上的高度纯熟与缜密，它常由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的专业人员为主而组成，这些人对于动用极端但周全的暴力手段以支持其行动是绝不迟疑的，而常常由前克格勃（KGB）干将下手，这些干将在后冷战社会的专业领域里，确曾为自己找到了职业的第二春。^① 正因俄罗斯在战略、经济与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由于它的大量军事与核子兵工厂与储存库，它与全球有组织犯罪的全新的与深深纠缠的关系，成为这千禧末年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也成为世界的地缘政治会议中一项热门的议题。^②

① 克兰克涅 (Kleinknecht, 1996); 库兹涅索瓦 (Kuznetsova, 1996); 华莱士 (Wallace, 1996)。

② 关于俄罗斯参与全球犯罪结构的重大发展，参阅欧大钦斯基 (Ovchinsky, 1993)。关于俄罗斯犯罪活动的持续状况，根据 1997 年 1 月 17 日俄国内政部长库里科夫 (A. Kulikov) 的一项报告，有以下的估计：1996 年的犯罪有 700 万件，约 262 万件经举发在案。29700 件是谋杀及企图谋杀。警方曾破获并解散多达 200 个以上的帮派。库里科夫承认他的内政部里贪污情形严重。该部的技术与军事供应部门首长与其他 30 名公职人员因为侵吞罪而被解职。1996 年内有 10000 名内政部雇员遭到调查指控，其中 3500 人犯的是刑案。

问题是怎么发展到这样地步的？首先，我们必须说，这并非与过去俄罗斯的经验，或与苏联的地下经济，有历史性连续的关系。(p.185) 虽然在前体系下曾参与犯罪与非法活动的人，自然在新的犯罪经济结构里会相当活跃，但犯罪舞台上许多其他行动者也早已加入这个行列，至于新犯罪经济的成长与形成的机制则是完全不同。犯罪组织存在于俄罗斯已有好几世纪之久。^① “盗贼世界” (vorovskoi mir: “thieves’ world”), 通常由身系图圈的“准贼人” (vory v zakonye: “thieves - in - law”, 即“法制内盗贼”) 中的一名精英所操纵，这些人经历压迫而存活下来，并与沙皇及苏维埃国家保持距离。然而，他们曾在斯大林时代受到严惩，随后又在他们自己内部的分裂与杀人，特别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所谓“疥疮 (译注：成员之敌) 战争” (Scab Wars) 的时代中，削弱了实力。在“改革”期间重新出现后，但他们已不得不与窜起的少数族裔的黑帮 (Mafiyas), 以及这一行业的众多新秀，彼此共享或为控制地盘以及非法交易而竞争。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只是一个更广阔图景里的一部分罢了，这个图景的权力与财富中心是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甚至当代俄国黑帮都不是曾经控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中壮大起来的地下经济的那个犯罪网络的延续。近代俄国的地下经济并不是由犯罪集团所控制，而是共产党的任命制官职集团所控制的，这集团固然为日益僵化的指令式经济注入了弹性，却同时为每道官僚藩篱的守门人提供了报偿 (租费)。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这一地下经济包括事业体间的实物交易，以及经济体制的整体而向上的物资与服务的非法售卖，在硕大的官僚网络下受到监督，也提供个人的利益，通常与共产党的权力结构有所关联。这个地下经济的存在，完全攀附着指令式经济的结构，也因此苏维埃政府垮台后，它的网络就无法生存了。虽然，任命制官职集团里的许多不法之徒，利用他们

^① 韩德尔曼 (Handelman, 1995)。



积累的财富与影响力，在后苏维埃的俄国的新犯罪经济体制内取得地位，这犯罪经济的结构，以及它与企业及政府的机制联结，则是个全新的产物。

新的犯罪网络是在 1987 - 1993 年期间，俄罗斯之劫的进程中形成的；并且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强化了他们与企业界及政治体制间的纠结关系。^① (p.186) 我尝试为这异常联结的发展提出分析，将根据所获得的资料做出一套我认为合理的三个阶段的解释。^② 我综合了一种结构性的诠释，以及对那些曾经肆无忌惮地侵占苏维埃资产的参与者的来路进行识别，最后，对这些参与者所用来迅速积累财富与权势的机制加以描述。

结构性角度之观察

经济的混乱导致企业体局部陷入犯罪化。那混乱首先来自从指令式经济结构迈入市场经济结构的过渡过程。该过程缺乏能够组织与调节市场的体制，也被国家部门的解组所妨碍。这些部门

① 以 1987 - 1993 年之间做为当代俄罗斯黑帮形成的时期是有根据的。1987 年，戈尔巴乔夫以极端含糊的方式授权私有企业以主要为合作制的形式创生与发展，而不曾提供适当的法制环境，于是诱发了—种原先常只能在非法的保护计划下营运的原始资本主义的胚芽。1993 年 10 月，叶利钦以坦克镇压苏维埃时代建立的俄罗斯国会的叛变，事实上结束了这场政治的过渡。就是在这段不确定的时期，除了总统本人，无人真正知道谁在掌权，而有组织犯罪乘机建立起它们的网络，许多政客也涉足了这场对俄罗斯财富大肆侵吞的行动。至 1993 年底，当有了新的宪法以及—个新的经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国会时，俄国的体制方进入些许正常状态。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企业、政府与黑道，已经盘根错节纠缠—块，更加牢固不化，变成新体系—项特征了。

② 参见迪费奥与沙伏纳 (De Fco and Savona, 1994)。另参阅伯棱 (Boblen, 1993, 1994)；伯涅 (Bonet, 1993, 1994)；欧大钦斯基 (1993)；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 (1994)；鄂兰格 (Erlanger, 1994a, b)；迦玛俞诺夫 (Gamayunov, 1994)；《消息报》(1994b, c)；库兹涅索瓦 (1996)；波德列斯凯克与特瑞修诺克 (Podlesskikh and Tereshonok, 1994)；萨瓦德耶瓦 (Savvateyeva, 1994)；《当前之后苏维埃报纸之文摘》(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 Soviet Press, 1994)；贝内特 (Bennet, 1997)。

变得无法控制其发展。高德曼如此写道：

苏联的解体伴随来的是经济基础构造的瓦解；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中央部委，全部的作用机制——统统消失了。最后剩下的是体制的真空。一切的一切之上，没有既成的商业行为规范。突然间，俄罗斯发现自己即将迎接一个市场的到来，却没有商业规范、没有民事规范，缺乏起得了作用的银行体系，缺乏起得了作用的会计体系，没有足以宣告破产的程序。剩下来仅有的东西也不怎么管用，尤其当普遍的看法居然认为欺骗国家是属全然正当时。^①

向市场机制的加速过渡，包括物价管制自由化，在此体制混乱的局面下，过渡过程为通向以任何手段攫取国家财产的疯狂竞争打开了道路，所采手段通常都带有犯罪的成分。高德曼写道：(p.187)“我们可以说，就某种程度而言，俄国的改革者使得黑帮的活动后果比它原来可能造成的程度更糟。”^②

苏联解体成为 15 个独立共和国，使这体制性混乱更形恶化。安全机构与军队解组；官僚指挥系统变得模糊；立法机制无秩序

① 高德曼 (Goldman, 1996: 42)。

② 高德曼 (Goldman, 1996: 40)。1992 年时的第一个俄国民主政府曾得到充分警告道，若事先不建立起那提供市场适当运作的机制，而向市场经济加速过渡的话，其潜在的后果将会如何。1992 年我所主持的俄国政府国际顾问委员会（参阅本卷第一章的解释，以及第一卷第二章）除了一再口头警告，还向该政府提交了数项照会与报告（我现在仍然持有）指出，正如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昭示的，市场需要机制与调节。1992 年 7 月布尔布利斯 (Burbulis) 告诉我，他同意我们的见解，但“克里姆林宫中有影响力的人”赞成一个更加实际与较少管制的、那种提供有更大操作的自由的取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支持，盖达尔 (Gaidar) 坚决相信以市场力量固有的能力就能自行排除障碍，认为价格若能自由化，人民就能用他们的证券购买股份。1996 年，盖达尔事后承认，失控的私有化产生一些问题，那也是我们委员会早在 1992 年 3 月就预见的，他却怪罪“共产党与其



地扩散，此外，边境管制几乎不存在。原始资本主义者与不法之徒游走各共和国之间，挑选最有利的环境，而仍然在前苏联的广大疆域之内活动。因为技术的低度发展，使得难以追踪广大疆域中资本、物资与服务的动向。地方性黑帮控制了地方政府，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联结网络。俄罗斯黑帮以及他们生意上的合伙人，比政府官僚们更快一步搭上了信息时代的列车。半犯罪型企业控制了地方环节与通讯环节，绕过那多数职能依在的中央体制的统御。他们透过自己的网络治理着这个国家。

谁是参与者

这个狂野的积累过程，部分是由犯罪利益所塑造的，而究竟是哪些人参与造就这个过程？对于帕维尔·弗夏诺夫（Pavel Voshchanov）这位颇受尊崇的俄国政治观察家来说，答案是再明白不过了：（p.188）

这个犯罪充斥的俄国是如何诞生的？某种程度说它是 1991 年 8 月政变（coup）之后浮现的。当时新产生的政治精英正煞费脑筋思索着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如何叫这个政变后的政经变革成为不可逆转。那群官员一致认为他们必须拥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根基——一种所有者的阶级（a class of owners）。这个阶级必须大得足以支撑他们的赞助人（特权者与保护者，patrons）。问题在于创造这个阶级的工作得从全部人的收入与财产仍旧大约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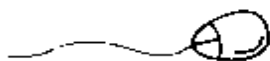
（接第 213 页注②）“同路人”。我个人并不认为 1992 年时盖达尔、布尔布利斯以及叶利钦的最早的内阁中的其他领导人是贪污的。我相信关键是在，他们的确不曾拥有法制的、政治的或官僚的权力来控制他们所下决策的结果。因此，他们将经济力量自由化，解除了束缚，而他们却被盘踞在该国政府内外外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团体所超越与淹没了。当自由化与私有化过程变成一场见者有份之战，而政府机构无法提供保证，各路黑帮于是介入，部分地控制了这个过程。这是历史必须记取的一次教训。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一旦缺乏国家政府合法性力量的调节与控制，暴力性私有团体的非合法性力量就会无情地予以接管。纵任的市场即无异于狂野的社会。

等这个起始点着手……克里姆林宫里的任命制官职集团的新贵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就是法律。根据 1991 年总统身边参谋人员说的，只要它“阻挠民主进程”，任何法律都是障碍。^①

1991~1992 年，大权在握的革新人士，他们的战略及政治利益，在于诱致一个快速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进程，在进程中创造一个庞大的自有者阶级，并且也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掌握既得的利益。改革者中有些人或早已有心仗势攫取个人利益，正如其后有些人确实这样做的。然而，要点在于，他们有意无意地，为有钱的与有势的人敞开了攫取那几乎等于全部俄罗斯国家财产的机会。这批准资本家，为首的就是那些已经积累了财富，特别是改革年间，那些已把国有资产化为自己名下的海外银行账户的共产党任命制官职集团中的领导人。1992 年叶利钦 (Yeltsin) 内阁中的高阶官员们曾经告诉我，当他们上台时，苏维埃国家的黄金与强势货币储备金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这消息后来为许多其他来源所证实，并且经公开指证，包括尤格·盖达尔在 1996 年的陈述。此外苏联共产党的秘密海外账户也在全球的金融洪流中消失无踪。所有以上全算在一起，显示极有可能是百亿美元以上的数字。这资金的一小部分即已足够买下俄国境内为数不少的财产、企业、银行、物资与服务，尤其当政治的影响力如果仍旧掌握在任命制官职集团的同伙手中，因而方便促成国有财产的购得时。苏联瓦解之后仅仅数月间，拥有多角化广泛领域的投资的巨大金融帝国即在俄国的经济结构中出现。未久，这类聚合公司立即就在新的政治体系中找到关系触角，因为体制的真空，使得处在时而被仓促拟就的法令所动摇的不安定环境中，有必要取得某种形式的特设政府的力量照顾以确保繁荣昌盛。(p.189)

新俄国资本主义脱缰野马式的发展中还有其他积极的参与者

① 弗夏诺夫 (Voshchakov, 1995: 13)



的投入。全球有组织犯罪集团，特别是西西里黑手党与哥伦比亚的卡特尔集团，就曾抓住俄国情势混乱的机会大量地漂洗其现金，以及搀混数十亿美元假钞于其“脏钱”中。^① 1994年盖达尔自己就承认说，在俄国确有为数可观的“脏”钱，洗过的资本，以及正在进行搓洗的资本的存在。^②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90年代初期，全球犯罪网络已在俄国立足稳固，足够沾到私有化过程的便宜，串连起俄国的犯罪集团，也诱发了新犯罪组织的发展。他们自然也勾结那些围绕着军火库、核设施、油田、贵重与稀有金属矿床而起家的走私网络。^③

当1991年体制崩溃时，一个失序的市场经济在市井层面大为繁荣，各色罪犯，老贼新寇，来自不同的族裔背景，犹若寄生虫般繁殖、吞噬任何出现于俄罗斯的大小企业。许多非营利与免税的机构也变成黑帮的囊中物，例如国家体育基金会，阿富汗战争伤残官兵基金会，全俄听力有障碍者会社。甚至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也可能在俄罗斯黑帮的保护之下，操起免税事业，以人道救援之名目免税进口香烟，以及投资于石油贸易公司。^④ 由于缺乏能发挥实际作用的政府规范与管制，在私人企业的成长与犯罪网络所施加的勒索与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这个被犯罪渗透的商业界与各级——即地方的、省级的、国家级的——政客们挂钩，以至于这三个领域——政治、商业与犯罪——最终总不免纠结在一起。这并非意味着犯罪结构控制了政治，或意指多数企业体就是罪犯。它毋宁指出商业界是在一个被犯罪活动深深渗透的环境中运行的；也指出商业界确需政治力量的保护；以及许多政客确在20世纪90年代中透过他们与商界的来往关系聚敛

① 斯特林 (Sterling, 1994)。

② Trud, 盖达尔专访, 1994年2月10日。

③ 比提 (Beatty, 1994); 韩德尔曼 (Handelman, 1995); 戈登 (Gordon, 1996)

④ 《商业周刊》，1996年12月9日；斯贝克特 (Specter, 1996)

了可观的财富。

积累的机制

俄罗斯的原始资本主义者所借以进行积累的机制是五花八门的：(p.190) 的确，大胆而有想象力的计谋与勾当是俄国的资本家与诈骗高手们的看家绝活。但是主要的机制一直是私有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尽是黑箱作业，毫无管制，也尽是不可信的会计记录。正是经过如此失控的私有化过程，所有贵重的俄国资产全部被以荒谬的价格出卖给任何有钱财有权力足以控制交易的人。这也就是政府官员们、前任命制官职集团的成员们，以及有组织犯罪之党徒们——包括俄国与其他国籍的，之所以凑在一起的原因与过程。

就在私有化过程发生前不久，有几桩超级的侵吞与诈骗案情加速搅乱经济体制的稳定，同时撒下了那启动俄罗斯资产的原始积累的种子资本。克莱尔·斯特林 (Claire Sterling) 对其中也许是最大的一桩骗局曾经仔细加以记载，并指认出 1990~1992 年，由全球犯罪网络，特别是由西西里黑手党所发动的诈骗案，不只获得苏维埃政府内部人员的共谋，甚至或许也有西方情报单位的参与。我所参阅的是她那引述了人名、地名、日期与数据并表列出一些可靠消息来源的报道。^① 透视这个过程的细节，犯罪集团与其同路人，则是利用一批中间人乔装成“国际商界人士”模样，以其“肮脏”的美元，在俄国境内购人大幅被削价的亿万卢布，使卢布贬值，从而在世界市场上将这些卢布贱价卖出。进一步，他们又散播有关更大的这类交易的谣言，从而引发更大的贬

① 斯特林 (Sterling, 1994: 169 - 243)。

值。任命制官职集团中的同路人则汲汲于将这些不值钱的卢布转变成强势货币，一方面为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一部分原因也为了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货币储备金。这类交易在改革的末期触发了资金从苏联抽离。国家的储备黄金似乎也曾被用来充做某些交易的保证。卢布的贬值使俄国国内的资产与商品变得非常便宜。犯罪的网络、投机的中间分子，以及任命制官职集团的大头头们，动用他们已敛聚的亿万卢布，以及数百万美金，购买并走私原油、武器、原料、稀有与贵重金属。他们也投资房地产、旅馆与餐饮业。他们从那些不知如何处置其手中的私有化证券的一般国民那里，整宗地加以购买，或者强迫让售，一旦这个投机性与犯罪性的资本在经济结构中已稳当就绪，它即寻求并得到苏维埃，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政府的支持，以进行其国内的投资与进出口生意。这类投资，最初用的是洗过的钱，以及/或者盗用自国家的资金，后来也因而颇为可观地翻了好几倍。(p.191) 既然多数合法的外来投资很快就被俄国不安定的投资环境所吓跑了，企图吸引外资与外贸的苏维埃与俄罗斯的立法，其制定的方向即大大地倾向于优惠这类准犯罪型网络。诈骗案件中有些主使人的身份虽早已现形 [斯特林引美国人利奥·汪塔 (Leo Wanta) 与马克·瑞奇 (Marc Rich) 为例]，但他们从来不曾被抓到过，甚至仍从他们位于其他国家的掩避处所继续操持他们的事业 [例如 1994 年瑞奇就是以瑞士的楚格 (Zug) 为基地]。斯特林曾估计 1992 年中不法的资本流通额约 200 亿美元，原油与原料的非法外流则又约 170 亿美元。这是 1991~1996 年期间外国在俄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数倍。虽然斯特林的内情报道有如惊险小说情节般离奇，她的文献记录倒是严谨不苟而足资采信的。她指陈历历的要点也与其他来源的报道相符。^① 再则，虽然我没有自己研究所得的实据

① 斯特林 (Sterling, 1994) 的见解与其他的消息来源相符。在本章注释中对此有所引述。

资料，当 1989~1996 年间我在俄罗斯的田野调查研究中搜集到的，关于非法交易与经济之动摇与不稳定化，包括在苏维埃与俄罗斯政府最高阶层所做访谈而获得的印象，即与斯特林、韩德尔曼 (Handelman)、弗夏诺夫等人及许多其他观察家的报道，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然而光是全球犯罪结构在苏维埃解体的混乱年代中的投机操弄，还不足造成政治、企业与犯罪结构的相互纠结，这个纠结的情形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俄国社会状况的典型。先是有戈尔巴乔夫犯下的影响深远的错误，即在缺乏替代的体系的前提下解散了苏维埃，后又有俄罗斯民主派人士未能在社会与体制方面加以控制，就加速了迈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制造出如此的形势条件，竟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也自然是最富有之一的国家被兼并与接收。就是这个受到既存的权力结构所策动或纵容，而听任财富被肆无忌惮地侵吞与私用的事实，说明了犯罪成分的无所不在，而不是相反的解释，即由犯罪要素的存在来说明转变后的结果。不过，鲁莽的俄国资本主义圈内人士并不像美国的“无道义的工业巨子”（即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那样无所不用其极只为聚敛那用于投资的资本，俄国佬除了忙于自图富贵，也深深嵌入全球犯罪结构与全球财金网络之中。一旦有所获利立刻送进全球金融的无名涡流，其中只有一部分趁便漂洗后会再进行投资，投资于报酬率与风险都很高的俄国经济结构中。

1999 年 8 月，《纽约时报》有一则报道，关于一项非法的资金转移的周密计划，引起了国际间的注意。该计划假借一系列坐落在英国、瑞士与美国，(p.192) 以及数个周边地点的幽灵公司的中介，透过纽约银行从俄罗斯转出巨款。所涉金额据估计近百亿之多。虽然涉案者其中有一个以色列公民莫吉列维奇 (Mr. Mogilevich)，以及曾参与部分勾当的来自从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东欧黑帮的一名声名狼藉的黑道大亨，但因为转账的数额不寻常，不久事情已可瞥见端倪，即单凭俄罗斯的黑帮独自不可



能搞出这笔资金来。案发后数月案情仍持续揭露（截至本文写作时为止仍然在发展当中），欧洲与俄罗斯的报纸，对于这么一个庞大利益网络集中一道为了逃税、诈骗，以及非法从俄国转移巨额款项出境的案件皆有大幅的报道，结果有种假设的看法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给俄国的款项中为数不小的一部分已被拦截，被银行家、政府官员们过户到俄罗斯境外，而俄罗斯最高当局则从头到尾是知情的。《邮信晚报》的报道更指明了克里姆林宫财产的管理人与叶利钦总统的家人在该阴谋中有直接的牵连。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某些款项的非法转账，是透过英国的银行，从俄国转入美国。该报指控弄些金钱的最终目的在于贿赂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官员。正当情报与反情报已变成俄国以及国际间的普遍政治弹药时，这个越来越重要，却越来越不容易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捏造，以及什么是受到操弄摆布的无比隐晦的事件，是证明不了任何事情的。为了便于说明清晰起见，我将提出下列假设：首先，在资金非法外移现象的根底，存在着荒谬绝伦与极端模糊的法律规章，是俄国政府为了资金的控制与商业赋税而设定的，也存在着为了执行这些规定而产生的全然武断的做为。因此，俄罗斯的合法企业，特别是在金融与外销企业中的机构，就被迫不得不诉诸非常的手段以推动作业，包括为其合法外销营运而设立的海外账户保留海外付款，以及将他们的获利迳直做国际性的投资，以逃避俄国官僚体制的局限。这也许不合法，但其本身不见得是与黑道相关的活动。第二，逃漏税私下的所得，不得不寻求逃脱境外之路。第三，在政府内外经不法侵占得来的款项的处置，也需要有个逃出孔道。第四，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对于资金非法外流与非法敛财这两种勾当给予掩护而换来一杯羹：收受平分，要不然就加入这个对资金进行非法侵吞的联谊会。第五，一些犯罪组织极有可能帮忙设立了非法资金流通之网络，并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收入的洗钱管道。第六，一个由俄国与西方之中间人构成的网络，发展出了一个包括幽灵公司与金融机构的

复杂系统，它们之中大部分是夹处于国际商界的灰色地带，(p.193) 从不同的来源汲取俄国资金，以及借它们的灰色企业而获利。最后，纽约银行，以及其他声誉良好的金融机构，在这些事情上只是径自拿钱，不发一问——而其实是对它们属下拥有能赚进大把钞票的丰盈商业人际关系的俄裔雇员的一种犒赏。特别是当所涉钱财是以百亿美元计算的情况时。到了那个田地，这样的钱财已是再无限制的，其中的部分尚且可以化身外国资本，在崭新与更有利的条件下再将之投资于俄罗斯。因此，外间媒体所指称俄罗斯的黑帮在其中只是这非法活动的庞大网络中的小环节，经由它们的非法活动，该国的大部分财富（以及，也许包括国际援助的一部分）最终将被极少数的个人所侵吞，且最终将转移进入全球金融网络，与主要的西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其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携手合作。^①

1999年8月，《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灰色经济的演进的调查，范围涉及这一经济结构从由边缘性人物与种族性黑帮所领导的低犯罪性活动，到随着私有化过程在国家政府的羽翼之下，以及在（我所加的一条）那些认为只要俄国能在其亲西方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其政治的低调及节制，而对其贪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西方政府与机构的刻意纵容下急速加剧的高犯罪性活动。《经济学家》对此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做出过一项摘要性的表列（见图3-2）。

如此，俄罗斯遭遇拦劫，到手容易的利益之泉水源源不绝，以及做为国际犯罪与非法活动的舞台，活动的痕迹总在全球金融网络中消失无形。如此，俄罗斯之劫依然，而未来也不会停止。

① 总结这些事务的大事记至1999年11月止，关于俄国的综合分析资料，可以在俄国政府网站获取，（网址为 <http://www.polit.ru/stones.htm>），而西方国家得资料可见研纳（Bonner）和欧布林（O'Brien）1999以及《经济学家》199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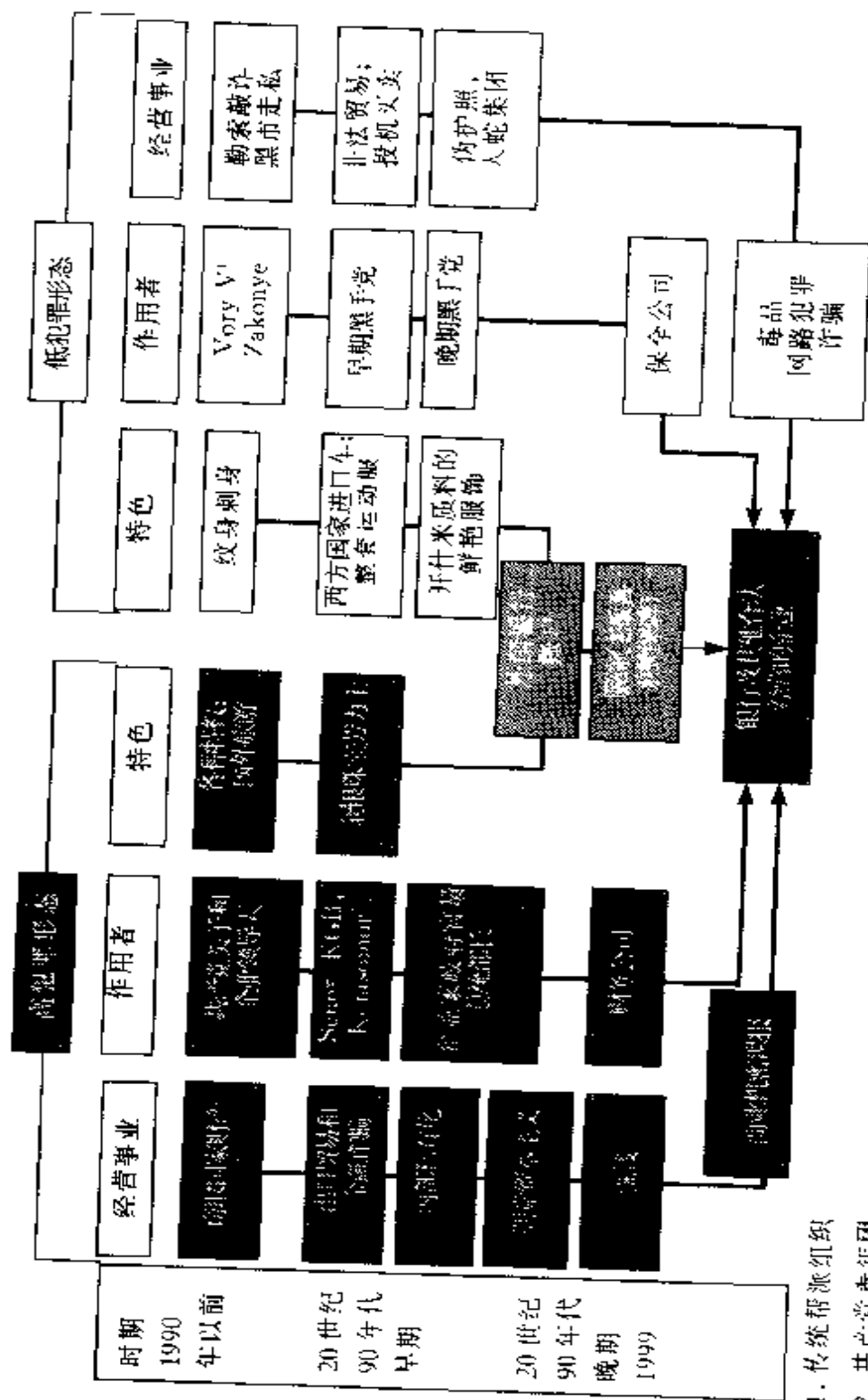


图 3-2 俄国非法和犯罪网络的演化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1999a)

时值千禧末年，大部分俄罗斯社会仍停留在信息时代的门槛以外。犯罪恶疾缠身的俄国资本主义倒是完全浸润在财富与权力的全球流动之中，而这些是它付出扭曲及亵污俄罗斯民主之希望的代价才得到的。^①

拉丁美洲地区的毒品非法交易产业、 发展与依赖^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毒品非法交易产业的惊人成长确实转化

① 卡斯特与姬丝尤娃 (Castells and Kiselyova, 1998)

② 关于拉丁美洲毒品走私活动的最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一是梭米 (Thoumi, 1994) 的研究，虽然其重点在哥伦比亚。关于在拉丁美洲的国际毒品产业结构，参阅阿尔奈迪 (Arnedo, 1990)；托卡特利安与贝格里 (Tokatlian and Bagley, 1990)；欧尔莫 (Del Olmo, 1991)；国际研讨会 (Simposio Internacional, 1991)；拉瑟纳 (Laserna, 1991)；与巴斯提亚 (Bastias, 1993)。关于可卡生产与可卡因交易对国家与地区性经济的影响，参阅拉瑟纳 (1995, 1996)。欲了解有关毒品走私在心理、社会脉络与政治等层面的牵连关系，最具有启发性的报道是贾西亚·玛奎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 的非凡之作《绑架案消息》(Noticia de un secuestro, 1996)。关于毒品走私世界的文化面向，参阅迪伯尼耶甲 (De Bernieres, 1991)；普罗隆鸠 (Prolongeau, 1992)；萨拉札与杰勒米罗 (Salazar and Jaramillo, 1992)。关于毒品产业与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间的联结，参阅史考特与马歇尔 (Scott and Marshall, 1991) 的经典著作。关于玻利维亚，参阅拉瑟纳 (Laserna, 1995) 与帕斯基尼与迪米贵尔 (Pasquini and De Miguel, 1995)。关于厄瓜多尔，参阅贝格里等 (1991)。关于委内瑞拉，参阅阿尔卡拉 (Azocar Alcalá, 1994)。关于墨西哥，参阅普里耶托 (Prieto, 1988)；贾西亚 (1991)；以及第二卷第五章。关于秘鲁，参阅杜尔宾诺 (Turban, 1992)；与塞格维娅 (Pardo Segovia, 1995)。关于拉丁美洲贩毒的政治经济学的信息与见解的权威专家之一是拉瑟纳 (Roberto Laserna)，他是柯查彭巴 (Cochabamba) 圣西蒙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结构 (p.195) 关于依赖与发展的古典模型已不得不予以重新思考, 以便包括毒品产业的特质, 以及做为该区域的基本特征的它对国家与社会体制的深层渗透。产业主要以可卡 (coca) 与可卡因 (cocain) 的生产、加工与外销为重心。不过 20 世纪 90 年代海洛因也已成为重要的一宗, 而大麻, 尤其在墨西哥, 也已恢复它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时候的重要地位。以毒品的非法交易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犯罪网络为中心, 其他犯罪活动也开始组织起来, 尤其洗钱、走私、武器非法交易、移民偷渡、国际卖淫、绑架等, 于是构成一个复杂的犯罪的世界, 这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结构普遍渗透了, 也深深烙伤了整个拉丁美洲社会。拉美非法交易毒品产业 (narcotrafico) 的几项主要特征如下:

1. 需求导向与外销导向的最初的也仍然最重要的市场是美国。不过, 西欧与亚洲的有钱国家也很快地变成重要的市场。以下关于可卡因产业的底线经济学的实例说明, 1991 年在哥伦比亚境内生产一公斤可卡因的成本——包括从他国进口哥国的可卡浆 (coca paste) 的生产成本——估计为 750 美元; 从哥国出口的价钱约 2000 美元; 这一公斤的批发价在迈阿密是 15000 美元; 而在美国的城市街头, 则论公克售卖, 当适当地与其他成分“切” (cut) 在一起而卖时, 价格可达 135000 美元。^① 运输与分销成本, 以及对这些分销体系的保护, 都与它的非法性本质, 以及它在美国高居不下的需求明显相关。(p.196)

2. 这个产业十分国际化, 拥有不同地方之间不断在改变中的分工形态。我们同样再以可卡因为例, 可卡叶在今天, 以及数千年来一直都是以安地斯山地区为栽种地, 并且向来是安全地被消费的。^② 世纪之交之际, 哥伦比亚生产世界上约 40% 的可卡

^① 梭米 (Thoumi, 1994: 295)。

^② 拉瑟纳 (Laserna, 1996), 古腾堡 (Gootenberg, 1999)。

叶，玻利维亚与秘鲁则大约占另外的 40%，其余主要产地为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以及近来的巴西与墨西哥。由可卡叶转化成可卡浆，以及近来的转化成一种可卡盐基，通常是在产地进行的，虽然地点会与种植田有些距离以逃避查缉。举例说，我曾造访玻利维亚境内当时主要的可卡生产中心地，柯查彭巴（Cochabamba）省的恰巴瑞（Chapare），可卡浆在距恰巴瑞 100 公里处柯查彭巴市附近山谷中的村庄生产制造，然后经由挑夫背负运至丛林中的秘密机场。再从该处，以及从秘鲁境内的主要产地亚尔托·华拉加（Alto Huallaga），可卡浆与可卡盐基以空运进入哥伦比亚。在该国，这个产业的主要中枢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就已经巩固了他们的控制。尽管饱受压制，哥伦比亚仍保持着做为可卡因的先进加工与提炼主要中心的地位。哥伦比亚也庇护着这个产业的管控与商业中枢，以之为基地而策划流向富裕的市场，尤其是美国，进行运送的精密作业行动。另外，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因为相继受到美国政府毒品管制局（U.S. DEA）的压力，秘鲁与玻利维亚政府加强了对可卡种植者的施压，哥伦比亚反而变成主要的栽种中心。这是因为该国有广大的区域不在政府控制之下，比起他国，该国农民比较有可能因栽种可卡叶而受到查缉的风险较低。

这个产业经过它早期阶段以人力运送的原始而简陋的走私方法，如今运输至美国的主要方式是以加勒比海为基地的小型飞机。这种方式首先是由一名主要毒枭卡洛·列赫德（Carlos Lehder）建立的。他买下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诺曼岩礁（Norman's Cay），将其飞机跑道提供给其他出口毒枭租用，因而构成这些出口毒枭间合作的基础——一个具有弹性的卡特尔（集团）。被海关人员查获的次数增加，也促使利用其他的方法：例如商用航线的班机、货轮、人员信差、暗藏于合法出口的商品如建材、玻璃板、水果、罐头、成衣等，以及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以陆路偷越美、墨边境。因此，墨西哥贩毒集团在 90



年代中长足发展。(p.197) 首先做为哥伦比亚集团的中间人，后来自立门户，除了在贩卖可卡因上他们是哥伦比亚集团的搭档，还加上海洛因、安非他命与大麻。

运输的方法经常是直截了当的：也就是贿赂相关国家的海关人员。其他还有的案例，则更具有想象力：比如在1999年，毒枭竟说服负责美国在哥伦比亚军事行动的陆军上校之妻，由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寄发六箱邮包到纽约市^① 较长的路线，例如到欧洲或亚洲，则主要依赖货轮，以较小的船只在近海卸货，在西班牙的加里西亚（Galicia）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对它而言是其历史角色的延续，加里西亚曾经是香烟走私网络进入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美国分销网络多由哥伦比亚毒枭，或其同伙——大部分是墨西哥人——所控制，利用他们来自同一民族，甚至同一区域的背景的移民：一个以信任做为担保的网络。至于在欧洲与亚洲，哥伦比亚集团则提供商品，经由盘踞各地的犯罪组织控制分销。由海运进入美国的渠道上瓜亚奎尔（Guayaquil）的角色举足轻重，由空运进入欧洲，那么委内瑞拉则是跳板。

这个产业另一不可或缺的收入项目是化学催化剂，主要自瑞士、德国与美国进口，但越来越变成由拉丁美洲国家的化学炼制厂所供应，尤其是由阿根廷与巴西。在巴西栽种的可卡数量尽管有限，巴西所以也加入加工的行列，则是因为哥伦比亚的化学炼制厂遭美国政府麻药管制局查缉日紧之故。虽然拉美非法交易毒品产业的地缘模式持续地演化及扩展，它仍一直出奇地维持着它内部阶层的稳定，也因为哥伦比亚的“卡特尔”（集团）一直能够维持它的统治性地位，其中的原因与机制我以下将提到。

值此世纪之交贩毒产业国际分工的转化，最重要的三点是：
(a) 墨西哥因乘紧邻美国之便，窜起成为半独立的外销中心；
(b) 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与全世界的犯罪组织，尤其西西里黑手

① 友法登 (McFadden, 1999)

党、美国黑手党以及俄国犯罪网之间成立了策略联盟；(c) 新通讯技术的使用，特别是移动电话与手提电脑，用于联系沟通，追踪交易，因而使该产业更形复杂与具有弹性。

3. 整个贩毒产业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是洗钱系统。这也是由哥伦比亚与墨西哥的主要毒枭所控制的，(p.198) 但这作业是由位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与佛罗里达的银行与金融机构中的专业负责人员所执行的。许多加勒比海小国的金融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中曾扮演洗钱的注入关口的重要角色，诸如开曼群岛、吐耳寇与该柯司群岛 (Turcos y Caicos)、阿鲁巴岛与巴哈马群岛等，可是它们的秘密性的揭露与规模不大的金融体系使它们在全球洗钱结构的角色分量已经减轻，虽然仍然为毒枭们的个人理财提供安全的储蓄账户。

4. 整套交易过程有赖极端程度的暴力来执行与维持。所有主要犯罪组织都成立有他们自己的杀手网络，例如哥伦比亚的职业杀手 (sicarios)，其中一部分人可说高度内行而专业，剩下数以千计的其他成员则多数负责全城的监视控制与实施恐怖统治，这些人要不是身为组织的成员，就是雇的杀手。除了执行帮规的功能，当组织为了控制既定市场而互相残杀，或为了分赃条件起争执时，这些杀手网络也是用于竞争，以及用来保护的工具有。诚如梭米 (Thoumi) 所观察的，高度的暴力对这个产业的潜在竞争者形成一种决定性的“进入障碍”。^① 除非他们拥有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源以及拼个你死我活的蛮劲，要不然他们就会在尚未站稳脚步之前就在市场上遭到铲除。

5. 这个产业有必要对它所在的体制环境之体系的每一环节加以腐化与渗透，以便于进行运营与作业。毒枭势必不得不腐化以及/或者胁迫地方与国家当局、警察、海关、法官、政客、银行家、药剂师、运输工人、新闻记者、媒体老板与商人等。对大

^① 梭米 (Thoumi, 1994)



多数上述这些人而言，在获得相当一笔金钱，与眼巴巴看着自己家人被恫吓之间做抉择，这个威胁着实令人无法抗拒。由于缺乏一个强势的国家力量的坐镇，拉美非法毒品产业的网络便会对被他们所需要的，存在那周遭里的人员与组织悉数接管。诚然，对抗国家的正面攻击，反而经常为犯罪组织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例如哥伦比亚的亚斯寇巴与梅德因集团在1984 - 1993年所发动的那样。虽然，梅德因集团的策略本来就是极端的，而且与其首脑人物的性格很有关系，1989年被杀的“老墨”（el Mexicano）罗瑞吉·柯查（Rodriguez Gacha），以及对于判他政治放逐的政府怀恨在心的亚斯寇巴都是例子。卡里集团的残忍与暴力并不亚于梅德因集团，却发展出渗透政府的一套更细致的策略，（p.199）贿赂以代替杀人，而保留杀人手段对付对手梅德因集团，以及轻易能逼之屈从的低阶人员。这策略的成果是，1997年1月当卡里集团的枭首们终于落网且被起诉，米盖尔与纪尔伯多·罗瑞吉·欧雷惠拉（Miguel and Gilberto Rodriguez Orejuela），只被判了顶多3 - 4年的徒刑而已。对国家政府进行系统化的腐化，以及视极端的暴力为其日常的生活方式，是这个拉美非法交易毒品产业的基本构成。

拉丁美洲贩毒产业的经济重要性是什么？

在这千禧末年，犯罪的经济结构无疑是代表拉丁美洲的经济中一个颇有规模与活力的部门。此外，不同于拉丁美洲传统上生产与贸易的国际化过程的模式，这是个由拉丁美洲所控制的、出口导向的产业，拥有已被证实的全球竞争力。甚至假如未来化学合成的毒品取代实物提炼的毒品，以哥伦比亚为基地的网络，仍拥有可以持续他们现今在市场上具有优势成就的既有系统架构，包括他们所资助的新产品设计与运输技术的研发活动，主要的市场仍在美国，它对毒品消费的需求总是稳定而且庞大。美国是为了它缠上毒瘾的后果，而深深为犯罪、社会解体以及警察、司

法、监狱感化部门的成本的重大负担所苦。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对麻醉药品 (drug) 与麻醉药品交易 (drugs traffic) 的犯罪化 (译注: 即将两者视为“毒品”与“毒品走私”)。在此犯罪的舞台, 亚洲来源的海洛因有其角色, 美国与西西里黑手党以及许多美国城市中的土产帮派, 分量也不轻。但是以拉丁美洲为基地的毒品走私才是美国犯罪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 这个比重已到了这种地步, 使得美国对中南美政策已被那企图在供应点上打击毒品走私的固执观念所支配。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这个企图却已经彻底把美国与中南美的外交关系, 从旧式的帝国主义关系结构转变为对一个消失中的敌人的穷追不舍——这敌人既一再脱逃, 歇斯底里的追击只徒然伤害了政治的体系。

假如拉美非法交易毒品产业已倒转了依赖的模式, 这难道就是发展吗? 关于这个议题颇有过激烈的争辩, 研究毒品走私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位主要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学者弗兰西斯柯·梭米 (Francisco Thouni) 认为不是。其他如萨米延托 (Sarmiento) 则认为哥伦比亚的经济的增长应归因于走私毒品换来的外国汇款与投资,^① (p.200) 另外的看法诸如拉瑟纳 (Lasersa), 则采取中间立场, 认为评估可卡与可卡因的经济影响, 应取决于我们所评估的是哪一种发展而定。^② 我的意见与他相同。在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境内的栽种地区里, 收入的状况确实改善了, 但不全然是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是因为生产的不确定性妨碍了对这些地区的永久性投资。这些是荒凉的边陲市镇, 随时准备跑路, 准备当一处地点遭夷平, 随时在另一 100 公里外丛林的更深处再起炉灶。1985 年当生产的景气正值巅峰的时期, 我在恰巴瑞所见, 则尽是简陋的棚屋, 没有卫生设备、没水, 少之又少的电力供应, 没有学校, 没有健康照护, 几无女人, 更无几个

① 萨米延托 (Sarmiento, 1990a, b)。

② 拉瑟纳 (Lasersa, 1995, 1996)



儿童。但我也目睹，在一个仅有 3 公里铺面道路的地方，倒是满街奔驰（Mercedes）与 BMW 轿车，到处充斥日本品牌的消费性电子产品，还有一台没插上电的 IBM 个人电脑的主人，骄傲地告诉我这东西将是解决他孩子的教育问题的答案。大部分因恰巴瑞的生产而换来的金钱（每年收成三作的可卡农户每家每年收入约两万美金）都会在街头换成比索，回到自己的村庄购买一部卡车，盖一栋房子。这笔钱的一部分会存在柯查彭巴的银行里，就是从这里，这笔资金即将经由拉巴斯（La Paz）、加勒比海地区与迈阿密进行洗钱。甚至从柯查彭巴的城市外表也看不出它拥有的财富，就只有为数半打刚盖好的宅邸。不过，1998 年我对柯查彭巴的最新造访，则见到更多的豪宅华夏，以及更惹人注目的大肆消费。似乎“毒品资产阶级”（narco-bourgeoisie）是更感觉安全与更受到尊敬了。就拉巴斯，以及玻利维亚全境的经济情况而言，的确是曾经受益颇广。而且多少与秘鲁一样：在 1992—1996 年间，它令人咋舌的资本投资额中的一大部分，是衍生自犯罪经济。但是在亚尔托·华拉加，该地一大部分区域是由与毒枭有联盟关系的鲁弥诺索（Sendero Luminoso，即“光明之路”）游击队所控制的，这地方的小农们，显然并未从这番景气中得到多少好处。哥伦比亚人占有绝大部分的利润，虽然，其中最大比例的一份，当然是卷回全球金融市场的再循环中，其收益归于一小股有犯罪成分的商业精英的手中。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哥伦比亚就曾有过基础建设、房地产发展与投资业方面的显著蓬勃时期。尽管饱受毒枭恐怖活动之害，以及政治的不稳定，在 1995 年，波哥大（Bogota）都会地区经历了 12% 的年国内总产值（GDP）的增长。1994 年 12 月，我在波哥大与梅德因市市长的一席可说极其超现实的晚宴中，他就曾端出他为这城市的新发展所做的，一个跨入 21 世纪的宏伟计划。（p.202）确实，这一波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投资热潮，是难以追溯它的犯罪源头的。但是，基于正规的外国资本对哥伦比亚投资环境谨慎保持

的距离，似可合理地推断：关于这些投资的一部分，甚至关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间人，他们在哥伦比亚从事管理关于基建、农业、工业与先进服务业方面的投资，足以关联到毒品走私利润混入合法事业的再循环的事实。波哥大，以及哥伦比亚，在这利润丰厚的毒品走私环境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它们的经济受益于这种地位颇多，虽然在恐怖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中，在暴力的氛围中，以及处于来自毒贩与美国政府的矛盾压力所导致的不安中，这个贸易的获益，已部分被抵消。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哥伦比亚的毒枭们处在来自其政府与美国有关机构与日俱增的双重压力之下，以及在该国国内暴力活动与游击战争的蔓延之中，哥国经济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萧条，再次证明了一个沉溺于毒品资本（narco-capital）的经济结构其结构的不稳定性。

何以是哥伦比亚？^①

哥伦比亚的集团与网络，已在全球可卡因产业具有支配性的地位，而除了咖啡的出口之外，它所以首度在全球经济的主要部门中占有领导权的一席之地，与文化及体制性的特征是有关联的。在哥伦比亚人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的毒品走私产业，是如何在

① 关于哥伦比亚毒品走私的社会史，佐证详实的参见比坦科尔特与贾西业（Betancourt and Gacia, 1994）。一本不错的新闻体记述是卡斯提罗（Castillo, 1991）。关于对哥伦比亚经济的影响，参阅萨米延托（1990；L.F. Sarmiento, 1991）；卡尔玛诺维次（Kalmanovitz, 1993）；梭米（Thoum, 1994）。关于哥伦比亚罪犯的次文化及他们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的社会分析，参阅普罗隆鸠（Prolongeau, 1992）与萨拉札与杰勒米罗（Salazar and Jaramillo, 1992）。关于梅德因集团的报道与分析，该集团是可卡因类的相关犯罪组织中留有最多相关记录文献的，以及关于梅德因与卡里集团的战争，参阅维洛查（Veloza, 1988）；迪伯尼耶里（De Bernieres, 1991）；郭梅士与纪若尔多（Gomez and Giraldo, 1992）；与史壮（Strong, 1995）。关于哥伦比亚的拉丁美洲非法毒品产业与武装组织间的勾结，重点在波亚卡（Boyaca）者，参阅梅迪纳·贾列国（Medina Gallego, 1990）。关于更详细的



哥伦比亚发展起来的？对其简单的回顾将有助于介绍以下我所解释全球犯罪的一项重要主题：犯罪网络的构成、运作与策略中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哥伦比亚出口导向的毒品走私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与 70 年代初期，在拉瓜黑拉（La Guajira）的大西洋沿岸地区进行大麻的交易，大麻产自圣马耳他（Santa Marta）附近的山岭地区（所产就是大麻亚种之一的“圣马耳他黄金”）。哥伦比亚的社会史家们的研究说，发现大麻的潜力的由来，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和平工作团（US Peace Corps）派来此地的年轻人，对哥伦比亚生产的大麻曾显示狂热的嗜好。当时透过巴拿马而与哥伦比亚有所接触的美国黑手党人，与巴朗奎拉（Barranquilla）附近的拉瓜黑拉的一股松散的网络合作，组织起走私的活动，巴朗奎拉几世纪以来就是海盗、末世移民与走私犯的巢穴之地。这伙人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新兴的繁荣时期中为人所知的马林贝罗党人（the Marimberos）。但好景不常，大麻运送起来太笨重，价格与体积的比率太低，使它当遭遇美国海关更严格管制时就失去了竞争力。美国的大麻市场开始由美国本土供应，加州北部的洪伯特（Humboldt）郡不久便凌驾哥伦比亚成为大麻的主要产地。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由美国主导而对墨西哥与哥伦比亚的大麻栽植与走私所进行的压制行动，使多数产地大举转移到美国境内（如阿帕拉契山区），以后直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对该国绝大多数部门的控制达到一个程度，才使它能够回到越界向美国出口的大麻生产活动。

（接第 231 页注①）资料，参阅卡玛秋·奎查兹（Camacho Guizado, 1988）；皮瑞斯·郭梅士（Perez Gomez, 1988）；以及阿瑞耶塔等人（Arrieta et al., 1990）。如前述，贾西亚·马奎斯（Garcia Marquez）的《绑架案消息》（1996）对于了解拉丁美洲非法交易毒品产业与哥伦比亚社会间互动关系是最具启发性的资料来源的读物。1992~1994 年我造访波哥大期间我一方面搜集资料另一方面我的分析也成形了。

环绕哥伦比亚的大麻出口而建立的网络有相当一部分留存下来。以巴拿马为据点，混杂着哥伦比亚人与玻利维亚人的美国黑手党，曾探问他们在哥伦比亚的接头人关于转换为可卡因的可能。走私行业中一部分富有创业头脑的哥伦比亚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原也可种植可卡的，但更重要地，他们更能接收那已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与智利发展起来的走私业雏形。这些人之一就是来自梅德因的前学生领袖欧罗·亚斯寇巴，他在走私盗窃来的墓石的勾当中已开了杀戒，也熟悉如何以贿赂及谋杀规避司法部门的镇压。总之他即是受益于这个有利的企业环境的。

安提欧奎亚（Antioquia）省的首都梅德因，传统上一直是哥伦比亚企业创业活动者的温床，等于巴西的圣保罗。20世纪70年代时，它的传统纺织业因受到国际人造丝业竞争的影响而处于风雨飘摇中。哥伦比亚的其他企业中心地也一样，考卡谷（Valle de Cauca）省首府卡里，它的糖业受到当时国际贸易新制定的出口配额所打击。第三个区域，位于该国中央的伯亚卡（Boyaca），它的主要产品翡翠矿业的开采与走私也正经历因为危机所带来的动荡。这三个区域于是变成以可卡因为主的走私网的中心。（p.203）伯亚卡的首脑是一个血腥的民粹主义者柯查柯查，他联合亚斯寇巴与欧秋亚（Ochoa）家族领导下的梅德因集团。卡里则另外自成一个网络，而且与梅德因集团经常凶残地互相厮杀，甚少和平共处。卡里集团，是由来自该城中上阶层的罗瑞吉·欧雷惠拉（Rodriguez Orejuela）兄弟所领导，而且从不挑战传统哥伦比亚寡头政治的威权，这寡头政治实体一直统治着商业、威望、财富、土地、政府以及保守（Conservador）与自由（Liberal）两党。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拉丁美洲最残酷的内战“残暴年代”（La Violencia）中，这批寡头领导群仍有办法鼓动两党相斗，开启了一种终于成为哥伦比亚犯罪网络标志的暴力模式的先河。



与之相比，来自于中下阶级的梅德因集团，在一个只有财富才能赢得尊敬的文化国度，必须得解决他们与地方精英之间的阶级差异。他们也是一样的高度政治化。这政治化的程度就曾在1982年将亚斯寇巴与其另一位亲密政治同伙送进哥国国会，只是之后，因美国大使馆的干预而遭驱逐。还有，两个集团与社会的边缘阶层人们的关系也有尖锐的差异。亚斯寇巴资助梅德因市的低收入住宅计划与穷人的社会服务，为贫民窟大量建立社会救济的设施。他甚至试图维护他属下帮派青年的“人权”，以对抗国家警察明显的滥用职权。另一方面，卡里集团却执行着“社会肃清”；成千成百地任意残杀毒枭眼中的败类（desechables），包括流民、妓女、乞丐、小偷与同性恋者。不幸的是，在波哥大，这种做法仍由武装组织的杀手，以及仿效自上流社会的“狩猎团”在执行着，惊悚着城市的午夜。

尽管不同，所有贩毒集团都是在同一伙杀手网络“玛斯”（the MAS）里培养起他们的战斗技能的：“玛斯”（Muerte a Secuestradores，意即“掳匪无赦”）是因应梅德因市的欧秋亚家族成员玛莎·迪·欧秋亚（Martha Nieves de Ochoa）遭左派游击队“M-19”绑架而在1981年成立的。经过谈判后欧秋亚小姐虽被释放了，但数以百计的袭击事件，却持续经年；毒枭从不停止放出这样的讯息，即他们的实力如钢，斗志如铁，绝不允许任何人骑到他们头上来。

然而，姑不论他们暴力性的分歧，和对比性的策略的这些不同，梅德因与卡里集团都有心完全融入哥伦比亚社会。他们不只一次地向不同的总统建议以现金偿还哥伦比亚的外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数额，但总是数十亿美元之多），（p.204）而将他们的资本再投资于哥伦比亚，以摇身变成合法的生意人。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但它确曾只是个梦想，因为美国政府决心要廓清这个分界，而且动用一切办法以防止毒枭把哥伦比亚变成他们的安全巢穴。因此主要的问题就是引渡毒枭到美国，这是20世

纪 80 年代时美国所曾成功地获得哥国配合而引用过的办法。但这也是何以梅德因集团曾发动一场对哥伦比亚国家政府的正面攻击的原因，企图翻转法律上的引渡条例。它虽输了这场战役，但却赢了全场战争。在经历了多年的拉丁美洲有史以来最残酷的都市恐怖活动之后，梅德因集团损兵折将，亚斯寇巴本人也在 1993 年 12 月被枪毙在梅德因市的屋顶上。然而，1992 年，哥伦比亚的新宪法已明文禁止引渡该国国民。但是，由于仍然屈从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在 1998 年，又重新恢复了引渡的行动处置。

毒品走私者对他们的家国以及对他们家乡地区的依恋，是超乎战略观点的算计与考量的。他们深植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与地区社会里。他们不只与他们的城市共享财富，对他们的家国有并不算小宗的投资（但却非他们财产中的最大宗），而且也重振他们的文化，再造农村生活，强烈宣示他们的宗教情感，及对他们的地方圣徒与神迹的信仰，赞助民俗音乐（而得到哥国游吟诗人为其所作赞美诗的回报），拔擢（传统上表现不佳的）哥国足球队成为该国的光荣，恢复梅德因与卡里一蹶不振的地方经济与社会的生机，直到炸弹与机枪搅扰了他们的快乐时光。亚斯寇巴的葬礼是一场全梅德因市的人们，尤其是城里的穷人们，对他的敬意的表达：他早已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大恩人。成千的市民上街，高喊反政府口号，他们祈祷、哀歌、哀泣与顶礼膜拜。

为什么是哥伦比亚？这是因为几个基本因素的结合：一个处于冬眠状态中的既有走私美国的贩毒网，一个在拉丁美洲失败的工业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既有企业家阶层，以及一群多少受过教育、经济上正在上升流动的走私业者们对他们故里的文化与地方社会的强烈扎根意识。这偶然凑合的形成模式，无论如何，仍建立在一个传统之上，而且占尽一个非常有利的体制化环境的便宜。这个传统就是构成哥伦比亚历史的特征的暴力现象，尤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20 世纪 80 年代中的职业杀手是“残暴年代”时期受雇于各地乡村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双方的杀手（pa-



jaros, 原意小鸟)角色的再世。(p.205) 哥伦比亚的毒枭利用的是哥伦比亚国家政府在合法性与统治权方面长年处于危机的机会。在这千禧年之交的南美, 哥伦比亚是惟一还有广大区域仍不受政府控制的国家。共产党游击队, 诸如哥伦比亚革命海军战斗队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Colombianas), 与其他较小团体, 如民族解放军 (Ejercito de Liberacion Nacional),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控制着哥伦比亚的乡村、丛林与山区。20世纪80年代柯查与列赫德在哥国中部建立“反共自由领土”组织, 恣意进行他们的恐怖活动, 则是受到军方纵容的。哥伦比亚的国家政府一向被一个褊狭的寡头政权所宰制, 也深深被腐败所渗透, 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来得严重。勇敢的领袖如路易·卡洛斯·嘉兰 (Luis Carlos Galan) 等人试图扭转这个逆境, 结果就是活活遭到谋杀 (嘉兰则是被业斯寇巴派出的职业杀手所刺杀)。武装团体与警察及军中不肖分子勾结, 凶残地强迫政府中的温和派接受苛刻条件, 方式是对民选公职人员、工会领袖、社区活跃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左翼好战分子持续执行发作性的狂暴杀害。早在可卡因走私盛行于哥伦比亚之前, 有组织犯罪结构已在政府中取得发言的席次。因此, 如学者梭米所指出的, 以哥伦比亚国家政府的脆弱做为孕育哥伦比亚成为全球可卡因走私之首的假说, 就不是空穴来风了。^① 这样的说法还指出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假如一些大型但脆弱的国家如哥伦比亚, 能提供做为受犯罪网络统治与管控的处所, 这些犯罪中枢的力量极有可能进一步吃下这些国家。接下来是一个螺旋下坠的趋势, 犯罪集团终将控制某些国家: 也许不采取梅德因式的暴力对决策略, 而采取混合了贿赂、胁迫、政治献金、固守文化认同、精练其国际企管的知识技能等手段。哥伦比亚之后, 是墨西哥, 然后是俄罗斯, 然后泰国, 然后阿尔及利亚, 然后阿尔巴尼亚, 然后……。全球化与认

^① 梭米 (Thoum, 1994)。

同两个因素在拉丁美洲的犯罪经济结构中互相作用。它们共同组织起这么一个邪恶的关系网，使发展与依赖以史所未见的方式重新定义。

全球犯罪结构对于经济、 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洗钱，以及它衍生出来的相关事物，(p.206) 已经变成全球金融流动与股票市场一个显著而扰乱性的构成部分。这些资金数额，即使无从知道真正有多少，总是可观而不容忽视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流动性。为了避免被追查，犯罪经济所产生的资本经常从一个金融机构转移到另一个，从一种货币或股票变换到另一种，从对房地产的投资到对娱乐界的投资。因为犯罪性资本流动无常的特性，以及甘冒高度风险的主导意识，它常伴随并放大了金融市场上的投机狂澜。因此它已构成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所以动荡不安的重大理由。

犯罪活动并且对不少国家的经济具有强大的直接效应。某些情况下，这些犯罪资本的规模竟足够淹没小国的经济。另外在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或阿尔及利亚，它代表一种足以制约该国宏观经济过程的可观数目，在某些特定地区或部门举足轻重。再则，在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或意大利，由于企业与体制被渗透而使经济环境产生转化，变成更加变幻不可测，而且更加具有短线投资的特质倾向。甚至在大而稳固的经济结构中，如日本，犯罪性的操弄也能触发经济危机，例如 1995 年储贷银行发生被积欠上千亿美元贷款债额的案件，就是日本黑道强迫一些金融业者吃下呆账的结果。由于不可见的犯罪经济影响货币政策以及整体的经济政策，使得那以国家 (national) 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结构

中的经济过程更加难以控制，因为它的构成的一部分，在官方记录上总是不存在的。

犯罪结构对于国家体制 (state institutions) 与政策的影响更大。早已被全球化与认同过程搞得焦头烂额的国家主权 (State sovereignty)，又受到犯罪结构的弹性网络的直接威胁，这个网络超越且逃避过管控，能够承担其他组织所不能吸收的风险程度 (参阅第二卷第五章)。这个可能在技术上与组织上建立起全球网络的上好机会，则已转化与增强了有组织犯罪结构的实体与实力。长期以来，黑道的基本策略就是对它所在地的国家与地方体制的渗透，目的在于保护它的活动。西西里黑手党、日本黑道、各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与曼谷为地盘与巢穴的华人黑道、哥伦比亚的犯罪集团，都依靠他们与国家及地方政府中的贪污人员经年累月建立起来的深切勾结关系，贪污人员中有官僚也有政客。以下这点仍然是有组织犯罪结构操作程序中的基本要素：它仍旧只能在贪污腐败的前提下生存，包括对政府中的人员，有时是整个政府体制所进行的腐化与胁迫。(p.207) 然而，近来的全球化给予有组织犯罪的体制性策略更增添一项决定性的转折。安全无险的，或相对地有安全性的保障的巢穴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寻觅到：小型者如亚鲁巴，中型者如哥伦比亚，大型者如墨西哥，超大型者如俄罗斯，还只是凤毛麟角。此外，犯罪网高度的流动性与极端的弹性使得它有办法躲避国家法规条目与国际之间警察单位合作时的僵硬程序。因此，欧盟的统一带给有组织犯罪一个大好的机会，利用诸多国家立法之间的矛盾与多数警察单位的不甘放弃他们的独立性。因此，德国已变成西西里黑手党的大本营，加里西亚是哥伦比亚毒枭的主要整备据点与跳板，荷兰是提供华人三合会走私海洛因的重要驿站的一个避风港，^① 当在一个特定

^① 斯特林 (Sterling, 1994)；罗斯与弗雷 (Roth and Frey, 1995)，《经济学家》，1999b。

国家里来自国家政府与来自国际的干涉力量（常是美国情报单位）变得太大时（例如 1995 - 1996 年在西西里，或 1994 - 1996 年在梅德因与卡里，曾有过对付犯罪组织的强大压力），即使在一个原来对犯罪组织而言是“安全”的地区，网络的弹性也在转变它的组织形态，移动它的供应基地，改变运输路线，而且愈来愈在原属正派的国家里，诸如瑞士、西班牙与奥地利，另觅他们首领们的新住所。至于真实确凿的东西反而是涡流中安全地回旋的金钱，由境外的金融基地控制管理它的电脑化的金融交易导引它在时空中的流转

而且，经由网络化与全球化的过程而逃避警方监控的方式反而让犯罪组织对其本国基地紧抓不舍。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哥伦比亚的毒枭，特别是梅德因集团，遭遇严重的打击时，哥国毒枭经由调整他们的组织，减少他们结构的集中化而得以存活下来。事实上，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层级化的、巩固统一的集团，而是一群出口商的松散的协作组织，以卡里集团为例，名下是 200 个独立组织。因此，当一些领袖变得太碍事（例如柯查与亚斯寇巴），或已经被铲除，这些网络就会再寻求组织的新的领导关系安排，新的权力关系架构，以及新的——即使是仍欠安定的——合作形式。当僵硬而缺少变通的全国性政府，在这一刻自知即将输掉这场战争，而情急拼命地力图控制之时，犯罪经济却借着强调地方层面的弹性与国际层面的复杂性，来适应这最后一搏的国家体制。而面临这样的挑战，国家机构也正失去国家的主权与合法性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维系法律与秩序的能力。（p.208）

民主国家当面对有组织犯罪结构日渐壮大的力量时，在它乱了阵脚的情急反应中，常为了自卫而采取那种损及民主自由的措施。而且，犯罪组织常利用移民网络渗透社会，移民社会与犯罪结构之间不法与不义的结合，引发了公共舆论的仇外情绪，在根本基础上破坏了这个日益种族多元化的社会所急需需要的容忍与共存的气度。民族（国族）国家如此遭受全球犯罪势力的兵临城



下，加上它的民族（国族）社会与经济结构与跨国的资本及人民的网络纠缠不清而本就有欠安定，全球犯罪结构日益扩大的影响极可能导致民主的权利、价值与体制的显著缩水。

国家（state）不仅被有组织犯罪结构从外部跨过。它也从内部开始瓦解。黑帮除了有办法对警察、法官与政府官员进行贿赂与/或胁迫之外，还有更阴狠毒辣、更具破坏性的渗透方式：即对民主政治的腐化。政治候选人与政党愈来愈形重要的财政需求在政治的竞选时刻为犯罪组织打开了一个提供支援的大好机会，踏上这歧途的任何一脚步都将令政客们终其一辈子梦魇缠身。而且，被丑闻政治、人格谋杀以及形象塑造所主宰的民主过程，同样提供犯罪组织一个施展政治影响力的有利环境（参阅第二卷第六章）。经由诱惑政客进入性、毒品与金钱的陷阱，或在必要时为其假造证据脱罪，有组织犯罪结构已开创了一个秘密情报与恫吓勒索的宽阔网络，这样的交易与流通的影响力是用于对政客们施压。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不限于在拉丁美洲，他们的政治圈早已被存在于犯罪组织与政治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勾结关系而诱发的丑闻与危机所充斥。但除了这些已知的或涉嫌的政治腐败的案例以外，丑闻政治的无所不在，暗示了有组织犯罪团体在不少国家的政治与媒体圈中早已牢牢盘踞一方的可能性，如日本的日本黑道^①，或意大利西西里的黑手党。（p.209）

全球犯罪结构也以更细致的方式伸展其对文化领域的影响。

① 关于日本的有组织犯罪结构对政府渗透的情形在此就只举一例，我从日本的一份可靠的杂志摘引其一项报道。1997年1月3日，前日本政府的国防部长中西奎介（Keisuke Nakanishi），事发时仍然是新进党的一名政要，在羽田机场遭遇两名日本黑道的成员攻击而受到轻伤。这次攻击可能因这位前部长与日本黑道间的争执而引起的，关于一笔由银行授予开发商的巨额贷款，是黑道对于在谋取这项对他们有利的交易过程中该部长的行为有所不满而导致的，在该交易中，约2亿日元不翼而飞，黑道下是以胁迫方式企图索取该款项，中西涉嫌在他国防部长任内参与了和日本黑道集团合作的多次生意来往（引自《周刊新潮》，Shukan Shincho，1997年1月16日）。

从一方面来看，文化认同孕育了绝大多数这些犯罪网络，替各个网络内部提供了能够建立互信与沟通的规范与情结。这个共犯结构并不排除同类相残的暴行。相反的，多数暴力发生在网络内部。然而，建基于历史、文化与传统的犯罪组织，内部其实存在着广泛的分享与了解，犯罪组织产生它自己的自视合法的意识形态。自从18世纪法国占领时期黑手党即已有抵抗活动，许多关于西西里与美国黑手党的研究记录着这类文化特质，或以源自中国南方对北方统治者的抵抗活动而起家的华人黑道（即“三合会”）为例也是一样，他们其后在海外发展成为兄弟结义型的组织。我先前大致提到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时，曾描述过他们深度扎根于地区文化与其农村历史的大体轮廓，这两者都是他们企图恢复的。对于也许是最具有世界性写照的俄罗斯犯罪结构而言，他们也仍是深植在俄罗斯的文化与体制中。事实上，犯罪团体愈变得全球化，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愈强调其文化认同，以确保不至于在流动空间的漩流中消失无形。这样做，他们保存了他们的种族的、文化的以及如果可能的话，保留他们的领域性根基。这是他们足以自恃的长处。犯罪网络在他们结合文化认同与全球商贸的决断能力上，极可能早已领先了现今的多国企业。

然而，全球犯罪网络对整个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所表现的地步，并诱发出新文化。虎胆神威、所向无敌的黑道大哥变成许多社会里年轻世代的角色模范——这个世代里无缘于找到挣脱贫穷的捷径，当然更不用谈到消费享乐与辉煌际遇那年轻的一群。从俄罗斯到哥伦比亚，当地青年心仪黑帮的狂热与执迷不难被观察到。身在一个排除异己的世界，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处境中，无论是抗议、追求即刻报偿的习惯方式、投机冒险或是犯罪，它们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也许贾西亚·马奎斯（Garcia Marquez）比任何人更善于捕捉有组织犯罪世界中年轻杀手的“急先锋文化”（culture of urgency）。他的小说《绑架案消息》（Noticia de un secuestro, 1996）曾描写年轻杀手



们宿命的与否定的心理世界。对他们而言，活在这个社会中了无希望，而一切事物，尤其政治与政客都是腐败堕落的。生命本身没有意义，而他们的人生也没有出路。他们知道他们不会活得太久。所以，只有当下最值得珍惜，即时的享乐、体面的服饰、美好的生活、永不回头地逃走，这一切再加上制造恐惧获得的快感，以及一枪在手八面威风的满足，(p.210) 但只有一条至高无上的价值准绳：就是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妈妈，为了她们，他们可是愿意做任何事情。再另外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特别是那些在他们倒霉的时刻显示出有帮助作用的宗教圣徒。马奎斯将那些已被许多国家中的社会学者观察到的现象，以动人的笔调写道：年轻的罪犯们陷于他们对生命的狂热与对他们的限制与困境的事实体认两种情境间的泥沼。如是，他们压缩他们的生命成为几个轰轰烈烈的刹那，活得尽性而紧凑，彻底地消耗，然后如灰烬般消逝无迹。那些活着时的短暂时刻，成规桎梏的挣脱破坏，无边权力的感觉盛宴，相对于那种漫长而悲惨的生命的灰白表征，毋宁是他们换来的报偿。他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许多其他年轻人的认同与追随，即使行事方式上比较不极端。^①

有组织犯罪的文化随着犯罪世界的日常生活情节在媒体上演，而成为家喻户晓并扩大了它的传播度。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对于黑道杀手与毒枭弟兄们如何干活，以及他们直观反射的内心世界与精神状态，恐怕比起人们对于自己平常投资金钱之所在的金融市场的动态，还更加耳熟能详。全球观众对于主角们是黑道人物的动作派电影表现的集体性痴迷，实在无法只由我们压抑暴力之吁求的心理构成所能解释。它恰恰足以指出传统道德秩序的文化解体，以及对于一个由共有性认同与狂纵的竞争所构成的新社会的默认。全球性犯罪，就是一个属于这样性质的社会的浓缩化表现。(p.211)

^① 米纳由等 (Souza Minayo et al. 1999); 韦塞费次编 (Wauselw, ed., 1999)。

第四章 亚太的发展与 危机：全球化与国家

亚太命运的改变

1997年7月2日之前，亚太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与技术现代化的成功故事。的确，在1965—1996年间，世界的年均GNP实质增长率最大为3.1%；相对地，在亚太，中国达到8.5%的年均增长率，中国香港达到7.5%，韩国达8.9%，新加坡达8.3%，泰国达7.3%，印尼达6.7%，马来西亚达6.8%，菲律宾达3.5%，日本达4.5%。1950年时亚洲只占全世界收入的19%，到1996年时已达33%。(p.212)在大约30年的时光里亚太已成为全球资本积累的主要中心，最大的制造生产者，最有竞争力的贸易区域，并成为两个领先的信息技术创新生产中心之一（另外一个美国），以及增长最快的市场。而且从各种发展或开发的角度来看，此浮现中的市场已经成为全球资本最热门的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到估计超过4200亿美元的资本投入，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升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以及日本的技术和金融实力，看来似乎有一个地理经济的结构变动正在发生，引领太平洋时代的来临。然而，1997和1998年，有些亚太国家整个经济崩溃（印尼、韩国），有些则



进入大萧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以及中国香港特区）；而居领导性地位的日本，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金融破产而动摇，日本的证券和股票面临国际性下跌，结果令日本经济进入萧条。虽然，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受创较少，但也经历一定的货币贬值，1998年台湾增长开始趋缓，而新加坡则首度轻微的衰退。中国似乎在危机开始时经受了震荡，成为对于区域稳定惟一有贡献的国家。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在1997年和1998年全球性风暴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经济表现，可以作为重要的观察标的，提供我们解释其后续发展的重要观察线索，我将在本章结尾解释这些观察的意义。

在1999年初期，亚洲经济似乎从危机中复苏，日本经济在政府主导的复苏下，自亚洲国家进口值增长了13%，脱离了1998年10%的负增长。亚太恢复了增长，由于国家货币的贬值，刺激出口再次成为经济复苏的引擎。这个区域的证券交易至少在1999年7月前都快速地增长：在1999年的上半年，股票价格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增加了60%，不过1999年下半年除了日本之外所有国家经济增长都放缓。虽然中国内地继续维持7%左右的增长率，但主要都是由政府的资金投注，将钱放进濒临通货紧缩的经济中。在金融危机前，1996年有1100亿美元的正差额，亚太（日本例外）的国外借贷在1998年有500亿美元的负差额，1999年有另一个260亿美元的负差额，预测2000年也同样是负差额。（p.213）的确，1998年东亚的外国借贷发行者必须勾销3000亿美元的呆账（商业周刊，1999年10月18日：169页），1996~2000年间在亚洲的有价证券组合式投资也大幅衰退，因此，大体而言，后危机的局势特点是经济不稳定和金融市场反复无常，亚太随着千禧来临确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不是太平洋时代，而是经济重组的不确定时代，也就是在危机余波中浮现的经济、社会与国家机构等之间新的组合与关系。

深思1997/1998年亚洲危机的成因与特质可以帮助了解亚洲

整合进入全球资本主义过程的特殊性，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自身的新特质。在这方面经济学家之间当然有很多辩论，但那样细琐陈述的辩论将令我们偏离于本章核心的分析性焦点，此外因为亚洲危机不是单一的事件，而且其后续影响在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中持续展露，任何对其轮廓的经验性评估，在阅读此段文字时都可能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我将致力于一般性价值分析，在亚洲发展的长期过程的框架下诠释亚洲危机，聚焦于我相信是此过程的核心因素：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化。

亚洲危机一开始是金融危机，为货币危机所激化。在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后，除了不完全可兑换的人民币之外，此区域大部分货币都大幅震荡（例如印尼盾在一年之内丧失其相对于美元的80%价值，而其中的六个月还有更糟的记录：-250%）。货币贬值令地方银行无法偿还国外债主的短期债务，因为他们是用货币操作来盯住美元，当大部分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为了捍卫币值而提高利率时，他们对于无力偿债的银行及企业增添压力，终于榨干资产而拖垮经济。此外如杰弗瑞·沙克（Jeffery Sachs）等顶尖经济学家也令人信服地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相当程度地加重了危机。的确，当主要的议题是对特定货币缺乏信心时，重建对它的信心是很重要的，相反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处于危机中的经济的警告性陈述以及对它们银行及金融制度的不信赖加大了金融恐慌，（p.214）促使国内外的投资者撤资并中断新贷款，因此货币更加滑落，数以千计的厂商接着破产。亚洲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也引发穿透区域货币市场的投机运动，1997年10月23日象征稳定的港币遭逢持续攻击，严重损害当地经济，资产价值在1997年中到1998年中之间骤跌了40%，直接自中国香港特区财富中抽走1400亿美元；虽然中国内地捍卫香港特区金融体系的决定稳定了一阵子货币，香港特区危机成为警告全球投资者亚洲新兴市场风险的转折点。接踵而来的是借债最多、当时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韩国的实际崩溃，



到了1997年底韩国必须得宣布破产并让出其经济统治权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最大的580亿美元担保金，在韩国和中国以外广及整个区域引进的紧缩措施使得除了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地区之外的大部分亚太经济体在1998年进入萧条。

因此亚洲危机根本上存在着投资者信心的丧失以及对于亚洲货币和证券在全球金融市场上顿时缺乏信赖，危机的开端是资本流动的逆转：五个受创最深的经济体（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1996年转进了930亿美元的资本投入，之后在1997年变成120亿美元的资本流出，总共是1005亿美元的震荡，但这样信心危机的原因是什么？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克劳地·费雪（Claude Fischer）认为是由于亚洲经济体的经济本身的缺点（例如货币账目赤字、隔离的金融体系、高估的币值、过度短期举债及使用夸大的房地产做为融资担保品）；与此相反，其他的经济学家如杰弗瑞·沙克（Jeffery Sachs）或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则指出了大部分亚洲经济体的基本健全特质：预算剩余、低通货膨胀、高储蓄率、出口导向经济等等都是一般健全发展的经济体的要素，而的确这也是全球投资者一般的想法。此外，在同样面临危机的不同经济体间有显著的总体经济、生产资料和产业混合的差异，而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内地一开始的确控制了风暴面避免经济萧条，所以一方面联系上全球市场金融动力的危机有其外部的原因，（p.215）另一方面经济异质性和制度特殊性导致危机的冲击和余波非常不同的结果，让我们依序思考这两个观察。

首先，我们讨论此危机的外部面向。为何及如何金融全球化会影响众多国家的金融稳定，亚洲经济体的一些元素（例如政治性引导的银行实务以及缺乏透明化的记账）都曾令精明资本家感到不安，但多年来已成众人皆知的特征，而且并未在安全上直接

阻碍大量的外国投资。为何这样的信心突然在 1997 年数个月内就瓦解了？就投资者的认知而言，政府保护是如何变成私相授受的资本主义的，而金融弹性化变成无法负责的借贷？亚洲金融不稳的一个主要原因似乎是超量的国外贷款，其中许多是短期的，它已经到达如杰弗瑞·沙克所提示的面向——投资者知道如果每个投资者都终止借贷，像泰国、印尼和韩国等国家将会欠债，因此一旦对于特定货币（特别是泰铢和韩元）高估的忧虑浮现就会有投资者间竞相撤出资金的竞赛。它变成自我实践的循环，当不动产价格因经济不稳定而崩溃时，大部分用以担保未给付贷款的资产就破灭了，面对无数银行和企业同时所需援助的规模，政府的支持变得无济于事。之后全球性的机构深化了危机，如慕迪 (Moody's) 或标准普尔 (Standard & Poor)^① 等私人估价机构通过不乐观地看待如韩国的整个国家而宣布了警讯，这样的不乐观的看待自动地扩及所有金融公司企业，它们离开被不乐观地看待国家的操作（所谓的“至高教义”）。于是国外资金对内投资停

① 为了衡量 1997 - 1998 年的亚洲危机对于亚太国家与社会以及对全球经济的意涵，这一章在 1998 年秋天引入新的分析素材并大幅地改写。

1996 - 1998 年所有亚洲国家危机的资料得自于标准的商业出版品，特别是得自《东亚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 以及《国际先锋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以及网络上的资料来源，由于这些资料来源都是在公共领域中，我想不必将此处每个引用的图表都提供详细的参考资料，亦见约摩 (Jomo, 1999) 和赫德森 (Henderson, 1999)。许多同事提供了有价值的想法和讯息，我特别要感谢中国台湾地区大学的夏铸九、曼彻斯特大学的杰弗瑞·赫德森 (Jeffrey Hender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邢幼田以及金洙澈 (Jong - Cheol Kim) 和哈佛大学的杰弗瑞·萨克斯 (Jeffrey Sachs)。

萨克斯 (Sachs, 1998)

赫德森 (Henderson, 1998a)。

标准普尔 (或译为史坦普) 为国际信贷评级的私人机构，



止，除了特别是在金融业的国内新公司的廉价交换物取得外，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导的政策在恶化信心危机和让厂商更难以偿还贷款以致扩大破产进而停滞国内经济的代价下，挽救了许多外国投资者的钱，像印尼那样真正崩溃的最弱经济体体验了普遍的去工业化和回乡移民潮，接着是显著的社会不安，有时因为种族/宗教的仇恨出轨而混乱，有时因为社会政治的变迁而得利 [例如苏哈托独裁政权的终结，(p.216) 韩国在金大中领导下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强化，以及泰国的政治变动]

其次，在讨论下一个因素时，必须将此危机的时间点和特质考虑进去。因为几乎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本身所发生的危机，是造成无法回应快速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崩溃的重要因素。如果日本可以融资、吸收进口并重组金融市场则亚洲危机将会局限于暂时的骚乱。但实际上日本自 90 年代初期正遭逢其发展模型的结构危机，甚至日本政府有时还会沉迷于自我欺骗，以致日本不但无法成为抵抗亚洲危机的堡垒，其自身同样也受到遍布全区的金融崩溃的严重冲击。日本银行和金融制度的不稳定状况更为暴露，而且整个经济在数年的停滞后进入萧条，直到日本终于决定致力一连串经济改革，而在 1998、1999 年得到一些成果。在本章稍后的节段，我将回来讨论日本危机的特殊性以及它和亚洲整体危机的关系。

对亚洲危机的诠释终究必须放在一个更宽广的分析架构内，并依循着我在全书中所倡议的信息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我认为全球金融市场之所以压倒亚洲国家经济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是迄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全球金融流动已深深地穿透这些经济体，它们已热衷于大量的短期借贷，这使得经济极容易因任何突然的资金逆向流动而受创。投机行动当然是许多货币崩溃的一个原因，然而我们不能将投机等同于一些在法人场所中图谋的恶质行为假设，我反面将投机视为所有投资者的牟利策略，包括避险基金公司以及机构的投资者，匿名地连上电脑网络在

乱窜的货币或新兴股票市场上创造金融优势，因而决定性地扩大市场趋势。

然而为何全球金融流动在亚洲经济体得到如此压倒性的角色？似乎两个主要原因在作用着：首先是这些经济体的成功和它们高经济增长的前景；其次是它们完全仰赖国家的金融制度的弱点，国外投资者得到比美国或欧洲市场多得多的报酬——毫无疑问地，因为亚洲政府长期以来充分支持它们的银行和金融机构（p.217），一般预期，如出差错，政府会掩护，所以一般全球投资者的抱怨（缺乏法令管制、政府干预）反而正是促成亚洲空前投资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要问：为何亚洲的金融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么不稳定？为何让政府引导亚洲历史上最杰出的经济发展过程的金融经理机制变得无法管理全球贷款和投资？我的观点是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快速发展过程期间，亚洲经济体在它们国家的保护下免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免于全球贸易竞争。然而另一方面在其经济体庇护的亚洲厂商正变成全球贸易投资的玩家，当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这些厂商的大小和它们与全球资本网络的纠缠导致一个在全球经济的双边整合，国家便不再能够保护或控制资本、货物和服务的移动。因为全球经济流动对国家视若无睹，国家无法找到适当的位置，在原有的规则之下调控它们的经济体，国家因它们自己的成就而显得过时了。没有了国家的保护，亚洲金融市场和厂商被大量获利的全球资本流动所占领，而当这些市场缺乏透明度而风险增大时，便将之遗弃不顾。不管是不是有计划性的，整体而言，它几乎是全球投资者（包括全球化的亚洲资本）的获利操作方法。因为国际性的抽回拖欠贷款主要是为弥补它们的损失，而本地厂商的破产则成为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外国公司的大好机会，能够在非常优惠的状态下经由购并和合资，最终破坏了亚洲国家

的金融产业。总之，发展性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① 变成全球整合和亚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障碍，亚洲经济体若要完全加入全球经济，不只要作竞争者和投资者而是要成为市场和全球投资接受者，那么，国家必须依循全球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这意味它们必须顺从于标准的市场规则，必要时被迫经由破产、坏的评估和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强制政策。这并非资本主义阴谋的结果，而是透过整合金融货币市场而作用的，分担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无情后果。(p.218)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航程顺利地将贫穷的边缘经济体带到信息资本主义的大海中，然而，在航向没有中心、没有机构的全球金融网络的惊涛骇浪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沉没了，变成一艘没有用的船，抛锚于其国家之岸，成为其锚的俘虏而已。当惊觉到由电脑荧屏闪烁的指令所显露的资本流动新暴政时，经济和社会已经逐渐地非国家化了 (de-statized)。

然而就像杰弗瑞·赫德森 (Jeffrey Henderson) 所观察到的，亚太的发展与危机模式依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而有很大

① 本书将 developmental state 统一译为发展中国家，也可译为“发展性国家”或是“发展型国家”，关于它的理论概念讨论详见本章后文对四小龙的国家的讨论中。赫德森 (Henderson, 1998b)。

我对日本社会的分析主要是我在 1995 年于一桥大学担任社会学客座教授期间所进行，我特别要感谢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矢泽修次郎 (Shujro Yazawa) 教授，包括他的邀请以及过去和之后我们持续进行的启发式讨论。我也感激该学院和日本各个大学研究生的热情参与以及在我一桥大学讨论会上有洞见的发言，还有协助我一起分析日本素材并建立一个日本信息社会资料库的研究助手谷川启介 (Keisuke Hasegawa)。东京大学社会系主任庄司 (Kokichi Shoji) 教授慷慨地提供我丰富的日本社会学研究并与我分享他对于日本社会转化的想法，在我的诠释中矢泽和庄司都是灵感的来源，但当然他们无须为我任何的陈述或可能的误解负责。

转引自鹤见 (Tsurumi, 1970: 172)。

艾兰 (Allen, 1981); 鹤 (Tsuru, 1993)

雷斯豪尔 (Reischauer, 1988); 庄司 (Shoji, 1991)。

鹤 (Tsuru, 1993)。

大的差异，发生在日本、韩国、中国内地、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尼或其他任何国家里和地区的情况，起因于国家、经济和社会间的特定关系形式。因此我们同时需要去解释为何各个经济体会发展，它为何遭逢危机（或不遭逢），以及为何这波危机在不同的程度下影响这些状况非常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皆为国家制度调节之内，在社会动力与外在金融流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将呈现出解释亚太发展与危机的矛盾过程的重要依据。

因此要了解亚太的新历史阶段及其与信息时代的关系，我必须追溯其发展故事的社会与制度根源，将焦点集中在特定的社会以及发展过程，只有在进行一系列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后，我才可以回到 1997/1998 年亚洲危机的原因与影响去评估其对于亚太乃至世界的潜在结果。由于社会并非全球的而是植基于历史和文化，要达成对亚太兴起的分析，我将总结过去 30 年来几个社会的历史过程，由于本身研究能力有限，我必须将几个就了解这波危机而言亦是重要的国家在此观察中省略，特别是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总而言之，我将试着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将经济危机的分析整合入亚太再结构的脉络中。我首先将集中在共同构成亚太新经济体核心、并改变了过去发展的历史意义的六个地方的发展过程；我将从本区域关键经济体——日本开始，(p.219)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的研究，最后以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家乡——中国的转化的总结观点做结束。

平成时期的日本： 发展中国家与信息社会

日本的战败是必然的，日本缺乏原材料，在科学上落后，长久以来人们的习性腐败而盲目，你应该将日本的战败



视为幸运的和天赐的报应，并应该欢喜地为重建我们的新祖国努力做贡献，日本人民应该获得重生，获此结论的今日，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在他被处决的当天）

——一个 1949 年在关岛被处决的日本海军医疗官的遗书

日本在过去半个世纪从被粉碎的帝国主义野心灰烬中萌芽所达到的经济增长、技术转化和社会发展过程是非常惊人的，它能够结合增长与再分配，显著提高实际工资并将收入不均减至世界上最低的水平。日本确实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发展的认知。此外尽管日本的整个社会与环境景象深深地被转化了，但在一个现代化而未西方化的历史可能性的有力展现中，日本的文化认同大体上被保存了下来。而这些成就确实需要整个日本社会全力以赴的努力，(p.220) 加上劳工长期较美国与欧洲对手工作业更多的小时数、消费更少以及储蓄/投资更多。同时，日本也看似矛盾地从美国占领期间强制的改革而获得帮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土地改革、包括认可组织性劳工权利的劳动立法、导致财阀 (zaibatsu) 分解的禁止经济垄断以及赋予妇女投票权利的新选举法；此外在冷战脉络下美国为日本设下的军事保护伞令日本经济免于军事花费负担，并使日本政府免于会令其在生产、技术和出口等相关问题上分心的头痛外交政策。尽管此脉络看起来如此顺利，然而，日本令人敬畏的发展与结构转化过程，只有从日本社会内部的动力才能加以解释。

这种动力的根源是肯定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计划 (project)，并与 1868 年明治维新有历史的承续性。在全世界的国家中，日本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文化上、社会上最同质的社会之一；但这并不是像大部分日本人自己所想的那样，不考虑数万个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琉球人，以及文化相近但在社会上被排

除的“部落民”（Burakumins）^①。其数百年的岛国孤立强化了这样的认同。而在1853年面临培利（Perry）将军的“黑船”所带来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逼迫开放对西方贸易时，对此威胁的回应导致了明治维新，以及往后几十年国家加速现代化做为能够让日本面对西方挑战的惟一途径。这才是了解日本社会一致性与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日本百年来发展的动力基础）的根本因素。当大正时期（1912～1926）朝向现代化的民主方针，以及昭和天皇第二个十年内（1935～1945）的军国主义计划双双失败后，日本民族主义再度浮现，并以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计划形式朝向国际经济中的和平竞争。一个贫瘠的、无防卫能力的国家，在能源和天然资源完全依赖外国，并面临自我怀疑、进步知识分子圈中的罪恶羞愧感的情况下，日本整个动员了起来：首先要求生存，接着要求有竞争力，（p.221）最后则是以工业生产、经济管理和技术创新的手段来证明和肯定自己。任何对日本发展的分析必定以此为起点：以和平的（经济的）手段追求民族^②独立和民族权力，并根据1947年的宪法，永久放弃战争和

① 歧视或差别化的少数民族或地区。并未指特定的种族。

诺曼（Norman, 1940），

加藤（Kato, 1987）；毕斯里（Beasley, 1990）

② national 可译为民族的、国族的、或是国家的

依我的看法，从西方的观点对日本发展的起源与特质最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由优秀的英国学者艾伦（G.C. Allen）所写的一本不为人知的书（Allen, 1981），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形构与作用和发明这个概念的经典研究是查莫斯·强生（Chalmers Johnson）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1982），对于这个观点的进一步阐释见强生（Johnson, 1995）对于日本政治体系的著作选集。对日本从明治维新起现代国家萌芽的最佳历史分析依然是诺曼（Norman, 1940）的分析；对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发展的日本角度见鹤（Tsuru, 1993）；对于新的发展中国家萌芽下的文化与心理状态见鹤见（Tsurumi, 1970）；对日本在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的演化的广泛社会政治分析，尤其是新民（国）族主义，见庄司（Shoji, 1991）；对于日本社会运动的分析见矢泽（Yazawa, 1997）；对文化民（国）族主义



军事武力。我将试着揭示此一民族计划和日本发展模型间的直接关联性；而此发展的特色彰显了 1956 - 1973 年超增长、1974 年成功回应石油危机冲击的大胆技术经济再结构等两个阶段。然而，前面铺陈的论述，在我的分析 21 世纪太平洋区域浮现成为枢纽的分析脉络里，将不仅是对这些广为人知的发展经验再评价而已。我认为在昭和时期（从 1989 年 1 月 7 日开始），日本的发展模型存在着根本的危机，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因政治系统的不稳定（明显地不同于前五十年）而显露出来；随着“泡沫经济”破灭而来的长期萧条，以及由奥姆真理教暴动戏剧性揭露的年轻人普遍的心理困惑（见第二卷第三章），我认为此一多面向

①（上接前页注②）的研究见吉原（Yoshino, 1992）。如果你想要沉浸在西方对于日本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中（在我看来是偏差的），你将会在凡·伍夫兰（Van Wolferen, 1989）和哈维（Harvey, 1994）中找到，至于一个同情的西方观点，见雷斯豪尔（Reischauer, 1988）。对于日本国家一个理论性的诠释，见加藤（Kato, 1984, 1987）和田口与加藤（Taguchi and Kato, 1985）；至今对于日本官僚体系（Kanryo）相当杰出的研究为井口野（Inoguchi, 1995）；对于日本政治生活的经验分析可在岸间（Kishima, 1991）中找到；至于对日本政治机器的研究，包括政治腐败，见史莱辛格（Schlesinger, 1997）；对于日本的新民（国）族主义，见渡边（Watanabe, 1996）；对于妇女的处境和日本的妇女动员，见上野（Ueno, 1987）、哲伯与莱芙·芭雷（Gelb and Lael Palley, 1994）、冢（Shinotsuka, 1994）和矢泽（Yazawa, 1995）；对于日本家庭，见关（Seki, 1987）、川谷及矢田泽（Totani and Yatazawa, 1990）；对于日本教育的经验角度，见恒吉（Tsuneyoshi, 1994）；对于日本资料来源的社会学辅助目录，见庄司（Shoji, 1994）；对于日本商业结构、产业关系、工作组织、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实践，见我在第一卷第三、四章中的分析，这里我将不再重复这些分析中在第一册可以找到的参考资料来源，其他在我这一节分析中所使用的资料来源将被引用在正文的注脚里，当然在这一节主题所包括庞大潜在资料来源的目录与资料甚至没有被提及，我仅引用在我的分析中直接使用到的那些资料来源。

艾文斯（Evans, 1995）。

加藤（Kato, 1984）；田口与加藤（Taguchi and Kato, 1985）；强生（Johnson, 1995）。

危机，正是因为新经济社会文化力量，挑战了民族计划及发展中国家优越性做为日本成功发展模型的假说。此一危机解决的情况与形式将深深影响日本社会、日本与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以及最终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命运。

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模型

在多年研究发展社会学后，很明显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化的过程是深植在制度当中、为文化所引导、由社会整合所支持、由社会冲突所塑造、在政治上竞争并由政策与策略所指引的。(p.222) 日本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发展过程的核心，是由政府官僚在民族利益上所设定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计划。在小权力核心，国家官僚引导并协调日本公司，组织在企业网络之中（系列 Keiretsu 和企业集团 kigyo shudan），^① 透过贸易政策、技术政策和融资贷款协助它们成功地世界经济中竞争。贸易剩余再循环为金融剩余，并伴随国内的高储蓄率容许了没有通货膨胀倾向的扩张；同时实现了高投资率、实际工资快速增长以及生活品质的改善。对研究发展的高投资率以及对先进制造能力的关注，让日本产品与制程在全球经济中变得关键的同时得以在信息技术工业上取得领先地位。这样的经济表现有赖社会的稳定和经由劳资合作所获致的高劳动生产力，并由稳定的就业及核心劳动力的年资鼓励所实现。劳动参与率快速提高的妇女所组成的部分工时与暂时性就业，确保了劳动市场的弹性化。整体的社会稳定依靠三个主要原因：(a) 人民重建民族的决心；(b) 消费的增加和生活品质的改善；以及 (c) 强大稳定的父权家庭，在压抑妇女顺从的代价下，再生产

^① 在日本，以相互拥有股权的公司网络，株式会社 (kabashiki mochiai) 组成企业集团。其网络有水平式网络与垂直式网络两种次类型，前者称企业集团 (kigyo shudan)，后者称系列 (keiretsu)，参见第一卷第二章。



传统价值观、酝酿工作伦理并对其成员提供人身保护。(p.223) 而其政治稳定性则有赖于自民党保护伞下所组织的利益与庇护性拥护者联盟来维持，而自民党则是依靠美国的坚定支持，尽管相当腐化贪污，一直执政到 1993 年。发展中国家借着散布经济增长的承诺来建立其特殊的合法性，额外地，日本还从两个合法性的来源中获利：来自人民对自民党的投票；以及提供民族认同根源的历史连续性的“象征天皇制”。图 4-1 试图提出日本经济发展背后社会/制度逻辑的综合性描述。我将多花一点功夫来弄清楚这个非常扼要的总结。

就如同所有社会动员过程一样，最重要的是辨认出（在这个例子中是日本国家）(state) 合法性的来源，依此支配性，行动者得以在过程中寻求社会支持并整合企业。日本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是在官僚体系之外的所谓“象征天皇制” (Shocho Tenno-sei),^① 以及较少程度的 1947 年宪法以来的民主选举政治体系。我所谓较少程度是因为日本政府尽管在宪法上是民选的，但几乎五十年来一直依赖于“永田町 (Nagatacho)^② 政治”；那是一个围绕着为腐败所操纵、在大部分老百姓眼中被苛刻地评价的自民党所组织起来的利益、派系与庇护性网络的联盟。而领导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来自一个有效率、通常是清廉的国家官僚体系，确保了决策的稳定性，协调自民党内部不同派系间的争论，形成一个综合各种利益、意识形态与人物的联盟。虽然在形式上依赖于政府，国家官僚体系仍将合法性建立在已更新的天皇体制的价值上。丸山正雄 (Masao Maruyama) 在 1946 年写下了至今

① 日本宪法制定天皇制，天皇是国民总称的象征，并代表着其对国政的权力。

② 永田町为日本国会和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意指行政决策的权力高层或核心。

井野口 (Inoguchi, 1995); 史莱辛格 (Schlesinger, 1997)

丸山 (Maruyama, 1963: 8)。

丸山 (Maruyama, 1963: 6-7)。

艾兰 (Allen, 1981); 强生 (Johnson, 1982, 1995)



仍被认为是对天皇体制及其在日本文化与政治中的角色的最有洞见的经典日本政治科学。根据他的分析，“在日本我们正面临一个状态，即国家主权同时牵涉到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力。国家行动被评断为正确或错误的标准在于其自身之内 [也就是在‘国族（民族，国家）政体’（national polity）中]”，这是因为（p.225）尽管宗教改革的后西方的国家权力植基于正式的、对外的主权，日本的国家“明治天皇以后”从未能够区分出对外的与内政的领域之间的差别，也未能见其权威只在前者的状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此直到1946年当天皇的神圣性在帝国诏书中正式被否认的那天。原则上日本没有信仰自由的基础，由于这个国家将所有真善美的内在价值包含在其“国族（民族，国家）政体”中，学术与艺术都不能独立于这些民（国）族价值而存在……正是当成功的动机加上民（国）族主义的力量使得现代日本得以能够展开其“冲向进步之路”。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组合导致日本的衰退，私人事务无法在其自身当中被合法化，而总是必须和民（国）族事务一起才能得到认同。

依据这样的逻辑会有一个倒转的言外之意：私人利益无止尽地渗入国家的利害关系，在各种评论者的标签中，丸山的政治文化分析清楚地指出了日本企业体或公司的社会逻辑。在极端民（国）族主义计划严重挫败后，一个改头换面的象征天皇制确保了进行国家重建，并在过程中汲汲寻求如何借着进入世界经济来创造一个强大的现代日本的官僚体系的历史连续性与政治合法性。艾兰（G.C.Allen）和查莫斯·强生（Chalmers Johnson）已提供日本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以及它至少在1955~1985年间策略性地领导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角色的实际经验分析。此一官僚体系中的支配性作用者是控制国库并因而拥有决策的物质权力的大藏省（MF），^① 其两个主要政策工具是传奇性的通产省（MI-

① 财政部。

TI)^① 和日本银行；因为信用贷款、进出口配置以及技术发展的各项支持等，是国家官僚藉以协调、帮助、组织竞争并且有时抑制企业的必要工具。此外其他基础设施取向的部门，尤其是邮政省（MPT）^②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在提供生产的物质条件与选择性地组织技术扩散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他部门有时一致有时冲突地根据它们特定的权限领域执行不同的功能。因此，文部省（MESSC）^③ 关切于保存文化认同，并通过强化一个阶层化的严格考试体系来组织一个关注日本儿童和青年整体生活的有序的阶层化与社会移动体系，因而将所有家庭封入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和仪礼中，其他部门执行政治化的功能。（p.226）因此建设省、农林省和运输省似乎在将私人资金导入自民党的政治活动，和借着分配政府资源到能接纳的地方和省级政府而确保地方侍从者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附属于发展中国家分支部门的国家官僚体系的凝聚力不宜过分强调，如同所有的政府，当许多官僚竞相建立其在权力游戏中的地位，日本政府也为内部冲突和利益矛盾所苦恼。例如邮政省的角色不限于基础设施和技术，由于它经由邮政储蓄体系控制了最大的储蓄来源，使它拥有决定性地干预金融市场和进入公私部门投资的政府投资的权力。此外，虽然一般来说国家官僚体系是相对自主于政治精英，并且很少受到利益团体的影响，在政客与官僚之间有相当可观的交互作用，就像行政上的地位做为各种政治派系的权力基地，增加了这个体系的复杂度。然而，文化的同质性以及民族利益至上的共同信念，仍在天皇体制中象征性地具体化，由被文部省小心监控的对高层官

① 全称通商产业省，是负责国际贸易与产业的部门，亦即经济部，其部长则为通产大臣。

② 邮政省即邮政与电讯部。

③ 文部省主管科教文政策。

生田（Ikuta, 1995）；强生（Johnson, 1995）

欠泽（Yazawa, 1997）。



僚招募来源的严格控制制度所确保。此一招募成员的关键要素是东京大学，特别是法学院，和各帝国大学以及一些精英的私立大学，实际上提供了高层官僚的所有成员，这样的高层社会凝聚力穿透了整个社会。因为这些成员只有1%能够进到官僚体系的高层，其他人在往后的生涯阶段中“从天而降”占据了企业经理人、政治领导人或组织领导公民社会的准公共性基金会领袖。因此，官僚阶层的文化保守性由不同社会与经济生活领域间的精英流动而扩散，确保了思想的沟通、利益的协调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p.227) 这样由民(国)族主义官僚设计与执行来引导经济增长的机制，已经被一大堆“日本奇迹”的论文所揭露：一个基于由劳动生产力的显著增长、劳工素质和国内市场保护所达成的杰出竞争力的竭力出口导向策略；基于高储蓄率和由日本银行给予财阀银行的短期低率贷款的充裕资金；技术发展的持续努力和政府资助的技术取得与创新计划；对于制造的着重；以及跟随着技术演化、世界市场需求及日本产业生产能力由低技术转移到中高技术产业的产业政策。通产省完成大藏省的计划后，在策略性规划以及帮助、引导和支持日本企业网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贸易政策、技术政策与决定投资优先部门的产业政策上，其决策并非总是成功，也不必然被贯彻。例如，80年代相当有名的第五代电脑计划就是一个大失败。此外，通产省的科学城计划在80年代和90年代于国内各个地方所推动的26个科学城当中，大部分就算成功时也只是分支工厂的聚集而不是通产省原先打算的迷你硅谷。不过，一直以来屡次通产省的策略规划师设定了目标，而日本产业界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从低附加值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制程，从汽车到半导体，在大部分重要产业上先超越欧洲之后又超越美国，直到90年代美国厂商的技术/管理反击才令它们在微电脑、软件、微电子、电信、生化科技和决定性的网际网络(互联网, Internet)相关新产业的发展上领先日本的竞争者。不过，日本厂商继续支配了消费性电子、记忆体芯

片和半导体设备的制造，并且在除了制药及化学工业以外的全部先进制造工业范围保有相当强大的竞争力。而且，低估其未来在网际网络（互联网）相关技术和商业上的竞争力，则是有欠深思熟虑的建议。

我在第一卷第三章中较详细陈述的日本企业网络结构（networking structure）显著地有助于行政引导的成效。（p.228）借着协调一些竞赛者和维持组织网络高层间的竞争，国家官僚体系能够伸向整个经济结构而不需借助中央集权式计划的自我毁灭程序。日本模型是显示策略性的、选择性的国家干预之所以能够让市场经济更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经验，从而否定了自由放任经济体较有效率的意识形态宣示。但是若没有日本竞争力的根本决定因素的生产力、稳定性及长期策略投资来源，以及劳资间全面合作的话，以上所述都无法实现。贸易保护主义在拉丁美洲经济体普遍地被执行，有的保护程度很大，却都未能变成高附加值的全球市场中的重要成员。在工厂一般劳工阶层的劳动参与和日本企业界享有的社会祥和提供了日本经济从早期以来的重要优势。这对于确保日本能够转变到需要动员全部劳工的思考能力，以创造最佳新技术的信息技术基础的制造业与服务行业特别重要。拥有这些自由时，日本劳工强盛的文化特质并不能阻止它们形成体系。它依循四个主要特征而建立。第一是大型厂商核心劳动力被公众所认可，日本劳工履行他们工作生涯都呆在同一家公司的承诺。第二是通过人际竞争将他们分类；这样的年资体系使得劳工的生涯模式可以预知。第三个特征是工作实践的合作体系，包括工厂及办公室监督工作中的扁平组织阶层、工作团队与管圈式的结构和劳工普遍地主动改善制程效率品质。（p.229）第四个要素是以公司为基础的工会组织，将工会领袖及会员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变成一致，有日本劳工联盟，也有在展现组织性劳工势力的象征性动员〔例如仪式性的“春斗”（spring offensives）〕前在全国层次对于部分部门的集体谈判。到目前为止大体上来说日式



资本主义经由公司特性的工会主义、工厂一般劳工层次的劳工参与及劳资对于国家经济福祉的承诺，已经享有较任何其他市场经济体更佳的工业关系。

这些劳动习惯对于关系着成功的日式管理方式的机制实现相当重要，如同我在第一卷第三、第四章中对于日本劳动力与工作安排的讨论中所谈到的。因此，减少存货的“即时”（just in time）系统只能在来自于工业关系平稳秩序的不间断工作的情形下才能发挥作用。为劳工所发展和扩散的“秘方知识”（tacit knowledge）只有在劳工有为他们所属公司的成功付出其独特经验和公司生产系统的内部知识的动机才有可能实现，依据野中（Nonaka）和竹内（Takeuchi）的重要分析，那正是“知识生产公司”的根源。总之，日本竞争力根源的劳动生产力及工作品质是立足于在一个协力劳动和产业关系体制的基础上的，由包括丰厚公司福利和即使在企业衰退期间长期保有工作的承诺的实质劳动所得所实现。不过一些文化因素也的确对1960年左右资方、劳方和政府间的社会契约的巩固有所贡献，例如追求和谐（和，Wa）的工作关系、团队合作的公共精神和重建日本并让它变成强大、受尊敬国家的民（国）族动员。

然而，这个劳动关系（labor relation）的合作面向只是日本劳动力市场故事的一部分。随着我在第一卷第四章中提出的经验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是由于更为弹性的劳动习惯以及在小型厂商、传统部门（如零售买卖业）和大厂中兼职工人的更少劳工权利而得以确保。许多这些兼职工和临时工，而且越来越多是妇女，特别是在抚养小孩长大后重新工作的已婚妇女。（p.230）妇女劳动力市场的扩大（目前达到成年妇女的50%）是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和适应化的关键，确保劳动生产力来源的核心劳动力稳定，并让厂商仍可以在萧条期间借着开除临时工而得到缓冲。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中有类似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因而导致同样分割了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不均和贫穷。日本社会的真正奇迹是这

样的阶级分化，被在家庭中重新结合稳定的男性劳工和临时的女性劳工的日式父权家庭的力量所消除了，因此社会分裂在家庭的团结中溶解了。当我们考虑到日本妇女的高教育程度时这显得更为重要，这意味这种临时劳动力并不是较没有技术，而只是价值被低估了。

父权主义是日本发展模型的基本因素。不只是就经济原因，父权家庭已经克服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做为个人稳定及文化再生产的稳定单位。虽然离婚率增加但还是低于意大利及西班牙以外其他先进工业化国家（见第二卷第三章）。1980年时几乎三分之二的日本中老年人和他们的成年子女住在一起，尽管过去30年人口迅速下降但大部分的人还是这样做。子女大致上服膺于父母严格的训诫，羞耻文化依然是他们行为的重要标准。妇女实践她们所有的角色而很少有普遍的反叛迹象，相当程度是因为大部分日本丈夫，以他们的父权式承诺为荣，不像在美国，她们通常不会沉溺于追求家庭规律以外的个人欢乐（见第二卷第三章）。必要时国家会进来加上小小的制度扭曲，鼓励父权主义。例如日本的税务法令让妇女在兼职薪资之外增加太多钱变得很荒谬，因为双薪家庭的累进税变得相当高。受教育且极为活跃的妇女对于日本的弹性化劳动力市场、家庭安定和传统文化的贡献是日本整体社会经济平衡的关键元素。而且，如果比较经验是有价值的话，这可能是日本模型最弱的环节。

文化再生产也是由国家所确保，特别是经由紧密地监督着从学前到一流大学的教育课程的文部省。着重的是传统文化，以及往往在生涯初期就决定着每个日本人职业命运的阶层式复杂考试制度。（p.231）严格的训练就是规则，就像1990年一个女学生被学校为了把迟到学生关在外面而装置的推拉门夹死的意外悲剧所显示的。此一阶层化的文化同质性，对于确保合作沟通和对于一个社区的/民族的文化归属感，并且同时承认社会差异并尊重每个人的相对地位至关重要。从下而上的强大父权家庭和从上



而下的强大文部省的联合压力，使得文化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并将体制外激进挑战的另类价值观排除，进而边缘化了反抗。

在生活品质提高、产业合作、传统价值有序地再生产及民（国）族利益的社会动员的基础上，一个由各流、利益团体、庇护性侍从者在美军占领期间于自民党名下匆忙地组成的权宜性联盟，确保了政治的稳定。自民党是（很像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由梵蒂冈和美国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而创立）一个政治派系的不稳定联盟，每个派系都有它的“首脑”[其中最有权力的是田中角荣（Kakuei Tanaka）]，环绕着的是纠缠 50 年的利益网络、共犯、阴谋、沉默和债务。自民党的派系受益于美国的自满（对于日本企业而言相当重要的是需要一个美国信任的对话者以确保美国市场和代理者的关键通路），娴熟于政治协商的艺术。他们以选票交换金钱，以金钱交换赞助，以赞助交换地位，以地位交换庇护，再用庇护交换选票，以此类推。他们不断地在这个庇护体系中为了资源的控制而起争执，但总在其共同利益下联合起来。他们周期性地被丑闻所撼摇，特别是在 1976 年促使首相田中下台的“洛克希德（Lockheed）事件”^①之后，该

① 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了销售飞机对日本政界进行贿赂，1976 年被美国外交委员会发觉，造成前首相被逮捕。

生川（Ikuta, 1995）；强生（Johnson, 1995）；史莱辛格（Schlesinger, 1997）。

对于日本 1996 - 1998 年间金融危机的分析是基于注脚②所引用的商业出版品报告，至于有效的综括，见《经济学家》（1997）、爱因斯坦（Eisenstadt, 1998）；以及中木黑国际经济研究、日经，与全球《商业周刊》（Nakam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Nikkei, and Global Business Network, 1998）有趣的情节

町村（Machimura, 1995）

福井（Fukui, 1992: 217）。

《朝日新闻》（Asahi Shinbun, 1995）

事件类似美国政界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冲击，也显示媒体的政治性揭露的可能性。如同第二卷第六章所分析的，政治腐化在日本就像大部分其他国家一样，是联系到竞选活动及政治派系的政治献金，还加上一点是给政党资金的筹募者。如上所述，建设省、农林省及运输省似乎已成为引导政府资金到受惠的私人公司的特权机构，以交换这些公司资助自民党的活动和领导人，以及为地方头面人物拉票。但这绝非是政治资金的惟一来源（p.232）。此外，山口组黑社会和自民党领袖（包括首相）间的公开管道已在日本媒体上不断地揭露。

在政治腐化之外，传统庇护体系确保了自民党候选人在乡间及相对未发展地方的普遍支持。选举法律让这些地区在国会中有更多的代表，因此使得挑战自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极端困难。它产生作用。几乎50年来，尽管有各种限制，自民党体系确保了日本的政治稳定，将冲突局限于“家族”之中，并且让大众享受他们辛苦赚来的富裕时却变得更加讥笑所有的政客。尽管正当性有限，但这个体系还是能够存在，因为更高权威的天皇体制仍是日本人民道德的担保，以及一个处理国家事务的开明专制的班底，结合了劳资双方，共同重建国家。

这就是震撼世界、惊吓美国，并令欧洲政体寻求欧共同体保护的社会发展模式，它的确是有条理、强有力且卓越出色。就历史标准而言，它也是短暂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达到顶点，以及约在平成年代早期，进入一个开放的、结构性的危机。

下降的太阳：日本发展模型的危机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逐渐进入一个结构性危机中，表现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景象的不同层面，虽然1999年日本经济似乎在恢复当中，危机背后的大部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日本的再结构在世纪交替中仍正在开展。90年代的危机在一系列无显著关系的事件中表露出来，其相互关联的逻辑我



希望能在我的分析中加以展现。

让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似乎在日本结构性危机最前线的金融危机。将金融危机的复杂性浓缩到其本质，主要问题是日本银行界积累的惊人数量坏账，1998年估计约有80兆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2%。(p.233) 1998年评估日本银行界状况的外国专家认为最大的19家银行中只有两家有足够的资本能力补偿它们的潜在损失。最喧腾的事件是世界最大银行之一、在拖欠超过70亿美金债务后于1998年秋天国家介入，之后被卖给一个主要由美国基金管理公司涟漪木持股公司(Ripplewood Holdings)所组成的金融集团的长期信贷银行(Long Term Credit Bank)。情况危急的银行中还包括17亿坏账的富士银行，有另外11亿潜在损失的樱花银行，和欠债15亿的日本信用(Nippon Credit)，所有这些银行在1998~1999年不是被国有化、重组与合并就是有一些被变卖掉。日本银行界濒临欠债的情况令其股价贬值，使得它们取得国际信贷的方式非常昂贵。随后存活的银行彻底紧缩它们的贷款，于是枯竭了经济体的信用。自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日本的经济在1998年首度萎缩。

关键问题是：为何会有这么多坏账？以及为何其潜在欠债长期以来仍旧未被处理？答案在于日本发展模型所内含的，并为日本金融体制日渐暴露于全球金融场所加剧的矛盾。日本的高增长依靠一个政府支持的金融体制，致力于确保存款人和银行的安全，并提供厂商低利率宽松的贷款。长期以来日本金融体制相对地独立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并在财政部设定和阐述的规定及政策领导下操作。股票市场并非资金筹措的主要来源，也不对存款提供具吸引力的投资。高储蓄率对于推动投资而不引发通货膨胀至为关键。不过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调节，经由邮局、银行中的储蓄金和存放款来引导。1997年储蓄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2.5%，相较于美国的34%，因此银行及存款机构满载着现金并急于贷出。银行联系着系列，因此不得不成为它们贷款的优先

客户。相对地，它们也被整个系列结构所保护。政府则确保没有银行会破产，贷款的担保品为房地产及股份，所以在低风险和低利率下，银行有兴趣于高额贷款而不是获利差额。当国内外的宽松资金推动着经济，高增长率似乎确保了贷款的偿还并提供未来更多的信贷现金。(p.234)此外，房地产价格飙升了起来，尤其在东京和大阪，提供不断扩张的信用贷款更高的担保品价格。此一房地产价格过分高估的原因有双重因素。一方面，持续的贸易盈余，导致日本资本快速积累，使得房地产投资的资金充沛，而提升了地价。另一方面，明显地相对于生产及技术的细致策略规划，日本都市化的未经计划的混乱特性，导致了一个狂野的房地产市场。在一个已困扰于可使用土地稀少的国家中，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人口与活动集中在密集的都市地区。政治性庇护机制使得地价戏剧性地上涨，它对大量的小地主提供特殊的利益，其中许多是在都会区周围的乡村。举例来说东京地区在1983~1988年间平均住宅和商业土地分别上涨了119%和203%。小地主对于房地产的投机，受到从中获取重要利益的大金融公司的协助。地方政府为确保其税收与政治支持，不加规划也不提供替代性住宅而任由市场决定，使得地主和银行在膨胀的房地产价值中人为地富有起来。同时，民众渴望拥有房屋而必须增加其储蓄，因而提供额外的金钱给银行及金融单位。在一个互相关联的发展过程中，受日本出口增长所带动，股票市场价值倍增，膨胀的股票资产要求担保，而引起附加的借贷。在国外竞争力、出口带来的高收入、高储蓄率及国内增值的基础上，只要这样的体系能运作的话，金融体系对其膨胀可以自我调适。的确，全世界的企业顾问群集到东京去研究，并称许这个能够自我生产价值，并刺激产业及贸易竞争力的金融体系的奇迹。至1990年，以存款量来衡量的世界前十大银行，其中有八家是日本的。

对于宽松信贷还有另一个隐藏的面向：对信用的偏斜门道。银行被迫不顾投资的稳健或融资的风险，放款给那些对银行有特



权管道的厂商、个人或组织。这种“优先借贷”模式有四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银行所属系列的公司，(p.235)所以借贷政策是更广泛的企业政策的一部分。第二是财政部认为对日本经济有利而直接或间接建议的特别信贷。第三个是银行（或储蓄与信贷机构）受到和山口组黑社会有关系的厂商压力的借贷（见上述，第三章）。第四个是提供政党资金，通常是执政的自民党或对其部分人士的帮助，最后做为回报的是银行受到政府、它们所属系列和银行业的全面保护而免于遭受厄运。这样的循环是封闭的，银行体系很少受到金融市场、个别投资者及消费者的影响。日本金融界运作得像国家资本主义整合主义的范本范例。银行少有自主性：它们主要是捕捉储蓄并将其配置到由日本公司纠葛的网络所决定的标靶，以及服务日本国家利益，成为其取代个人利益的工具。

只要这个体系持续下去，它能非常有活力，而且相当有效率地完成其目标。但当它翻转其自身，从增值转为贬值时，就粉碎了日本经济。此一金融体系崩溃有三组重要因素。首先，不动产及股市泡沫在1991年破裂。其次，日本金融机构暴露到全球金融市场之上，使其越来越难以遵循原有日本的金融运作方式。第三，政府丧失了许多掩护银行债务和潜在拖欠的能力。我们再稍微详细地检视这三个动向。

首先，泡沫会破裂是因为所有的泡沫最后都会破裂。它被称作企业周期。不过在日本的案例中，是有特殊的恶化环境的。过热的经济推动日元汇率升值，损害日本贸易竞争力。但强势日元和上涨的股市，促使企业进入金融投资，并在国内外大量贷款。房地产价格由于住宅需求不足以吸收价格的上涨，以及办公室建筑市场的供给过量而最终下跌。股市随着滑落，动摇了立足于冒险地假定一持续高涨模式的日本金融体系。害怕通货膨胀，政府对经济踩了煞车，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景气。急速滑落的股市连同房地产崩溃，到了1996年已消去大部分80年代不正常

地创造的价值（见图 4-2）。40 年来日本经济首次停滞，而且只有在 90 年代中期受政府支出刺激而得到复原，不过增长速度很慢。（p.236）但这样的复原是短暂的，金融不稳定迫使银行紧缩银根。因此，尽管政府努力降低利率，在 1998 年达到历史新低 1% 左右，经济体的资金还是紧缩。1997 和 1998 年，日本滑入急剧的下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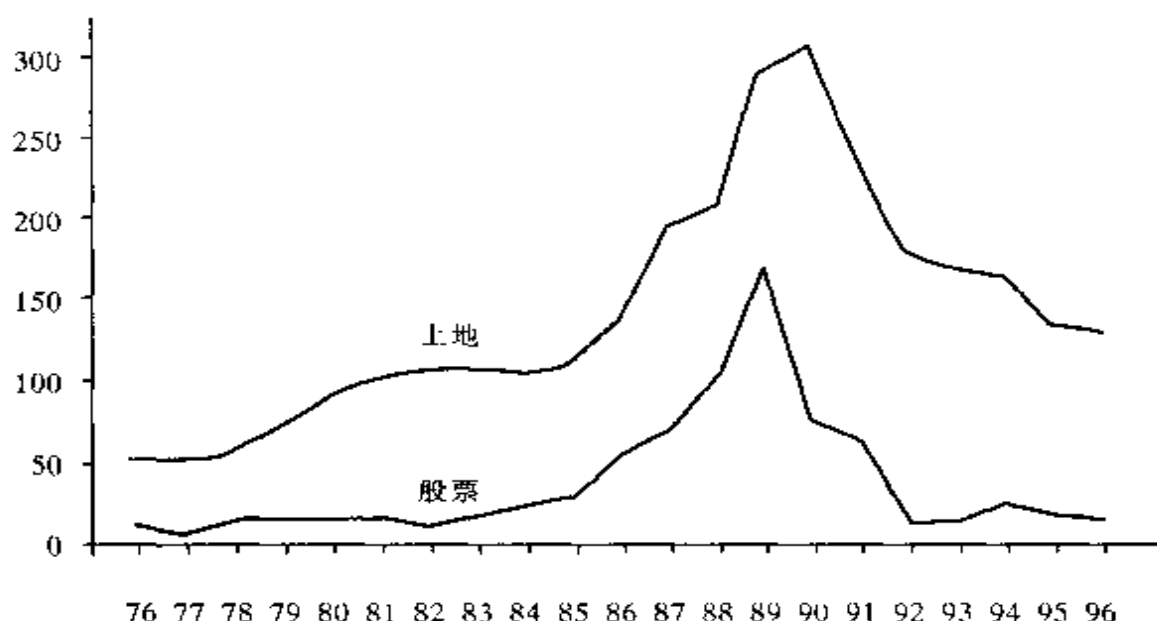


图 4-2 1976~1996 年日本股票和土地的价值(百万日元)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Economist·1997, 4)

然而影响日本金融最严重的问题来自其日渐暴露于全球金融市场。在这个面向上三个主要问题应被考虑。第一，面对停滞的日本经济及蓬勃的亚太市场，日本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量在这些新兴市场放款。它们复制了日本的信贷方式：它们在当地企业及政府的双重保证下提供大量短期贷款给偏好的顾客而无视于其偿债能力。它们用许多被高估的不动产做为其贷款的担保品。这样的做法让它们对于亚洲的信贷暴露到和它们的日本贷款同样的风



险。当亚洲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许多融资丧失其担保品而导致拖欠债务。当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区的股市崩溃时，过去对融资提供担保的本国公司变成无法偿还贷款，(p.237) 当本地货币下跌，日本银行于是无法取回它们用美金或日元给付的贷款。而当它们求助于亚洲政府，包括它们在政府中重金得到的“朋友”，要求它们履行承诺时，政府实在是做不到。政府面临同时到期的大量外债。因此，在寻求亚洲市场的救助时，日本金融机构主要的是促成输出它们的危机，然而终究结果还是回到了国内。

其次，当日本金融企业变成全球玩家时，它们较难继续进行国内习惯的内部交易和游走于边界的企业伎俩。这不是因为它们进入了一个“较干净的环境”。事实上，在西方金融体制内有许多可疑、危险甚至非法伎俩的例子。美国及欧洲政府与银行业也曾参与疏忽那些若没有政府果断行动将会破产并引起金融恐慌的银行与金融机构，也通常使用纳税人的钱。美国对20世纪80年代存放款公会的疏忽（高达2500亿元的惊人损失）、卢森堡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的倒闭、拯救法国里昂贷款银行（Credit Lyonnais）（填补一亿美金的金融漏洞）和1998年疏忽纽约的长期资金管理（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40亿美金）都是全球经济中普遍的风险性金融操作模式的例证。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的问题是它们没有准确掌握国外赛局的游戏规则。换言之，它们在全球没有像在日本所享有相同的内部知识和交际网络。此外，它们在全世界的主要金融市场不像在日本能够指望政府的共谋。当它们学到全球的、冷酷无情的游戏规则时，对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而言已经太迟了。其他厂商中三和（Sanwa）银行在美国被判刑；野村（Nomura）保险为丑闻及在日本、美国的大量损失所打击；还有全世界最大公司的山一（Yamaichi）保险在1997年被迫倒闭。

此外，透过完全拥抱全球金融市场，日本银行与保险公司加

入了不断扩充的看似强大实际无力的金融军团。换言之，尽管积累并投资大量资本，它们却难以控制、塑造及改变金融市场的事件。因此，日本企业跟全世界其他公司一样受到同样的危机，不过有两个因素造成日本企业的更大危机。(p.238) 首先，它们已建立一金融金字塔，依靠建立在高度而持续增长基础上的风险性信贷的偿还。若短期性信贷居其信贷的主要部分，则任何衰退的趋势都可能造成财务损失的连锁反应。其次，则是我称之为“虚弱巨人的自相矛盾体”(weak giant paradox)。与一般常识的描述相反，在现今的全球金融体系中越大的金融机构越容易受到危机的伤害。这是因为规模决定了全球性卷入的程度。越大量的资本需要回收，为了确保平均获利，金融机构就必须卷入越大的范围和尺度。全球金融市场是互赖的，但经济的基本原则却是相当独立的，这些金融网络中任何节点的骚乱都会扩散到其他的市场。因此，公司的投资越暴露于全球金融市场，其在某些地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就越高，或者，同时是多重性的损失。另一方面，在成功的市场上获利的机会，也随着规模而增加。不过由于在时空上很难预测会赚或会赔，投资报酬的无常性(volatility)将随着金融公司的规模及复杂度而增加。因此，对于一特定的风险程度而言，公司规模及其全球化程度越大，其金融投资收益的无常性就越高。对冲基金(hedge fund)被视为此矛盾的一个解答。但相反的，它们已变成最冒险的投资模式来源。通常风险基金公司投注的不是减低风险的金融资产替代方案，而是要赚取该笔投注进出的时空间，相对分歧的超额利润。因此，归根究底风险基金是增加了，而不是避免了金融的无常性。在这个脉络下，当装载着来自日本企业的贸易剩余资金的日本大银行步上全球化的时候，面对由电子化交易所加速的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它们变得越来越脆弱(见第一卷第二章)。

导致日本金融体系危机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日本政府掩护金融机构亏损的能力的衰退。这归因于几个理由。亏损的数量与规



模增长到公共基金渐渐变得不敷所需，特别是由于金融金字塔的涟漪作用（ripple effect）而让亏损同时发生的时候。大藏省试图要让经济脱离停滞，于是调降利率而让银行失去额外收入。（p.239）此外，可用的公共基金被指定做为公共工程投资，降低了利用纳税人的钱去监管银行的金融调度额度，不过，说明政府修补金融体系的能力衰退最重要的因素是其政治上的虚弱。如同我接下来要讨论的，自民党对于日本政治支配的结束，意味着决策必须要对反对党负责，当一连串的丑闻瓦解了公共信任的时候，政府丧失了幕后协助陷入困境的金融界朋友的权力。此外，信心危机首次影响了日本官僚体系，特别是过去拥有全面性权力的大藏省，在1997、1998年所有来自反对力量要求改革的呼声都是设立一个和大藏省分离的独立金融机构，来监督金融改革。因此，包括自民党及官僚体系的政治上的虚弱，都导致金融体制的危机，而危机的深化甚至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力，因而使得无政治义务的拯救银行更不容易。

最后，我所分析的这三组因素，也就是，企业周期的翻转、金融全球化内在的矛盾以及政治管理的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彼此强化，而导致全面性银行危机失控的恶性循环。当政府急于保护投资人时，就对日本金融机构的信用状况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部分金融交易解除管制，让资本更容易流动，使得资金从日本外流而贬低日元，因而进一步增加资本外流。由于日本储蓄者/投资者将在未来短期内享受到方便的国际共同投资基金管道，加上国外市场的利率较高，日本资金掏空的可能性就不难预料了。

面对国内股市及房地产价格的崩溃，以及无法对于国内的大量借贷索偿，加上在亚洲也没有足够的担保品，日本银行及金融公司要求政府出面援助。政府答应要求，在1997年，提出600亿美元的配套，之后，在1998年有另一笔5700亿美元的投入，光是对大和（Daiwa）银行集团在1999年就增加一笔720亿美元

的资金。一些银行被国有化或被接管，然后被卖掉，其中大部分进行重组、合并。几个主要由政府引导的合并者，在1999年创造了巨大的银行/金融集团：第一劝业银行（DKB）、日本兴业银行（IBJ）和富士银行（Fuji），有141兆日元的总资产，使它成为世界上就资产而言最大的银行；住友（Sumitomo）和樱花（Sakura）银行有98.7兆日元；^①东海（Tokai）和旭日（Asahi）银行有66.3万亿日元，大和（Daiwa）银行也有可能并入其中。这些合并者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们超越不同系列在运作，这些银行有可能结束和它们从属系列的义务关系。（p.240）这个趋势也结合了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在这波重组后，加上东京/三菱银行和三和集团，日本的金融业变为由五个主要集团组成，政府承担了银行坏账的一个庞大份额。到1999年末，证券市场回报了银行重组的努力，1999年大型银行的股价较以前每股获利的预测增加60倍。由于政府没有现金可以用于解困，同时它正增加支出以刺激经济，它还借了钱，所以，政府和国家为拯救日本银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接受一个惊人的预算赤字（国内生产总值的10%），和一个在21世纪将萦绕日本经济的空前水准的国债（大约国内生产总值的140%），然而，日本金融危机的暂时性解决并未化解日本经济根深蒂固的问题。它是已被质疑的经

① 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合并，说明了住友与三井两大财阀在金融领域的结合。
青山（Aoyama, 1996）。
小泽（Ozawa, 1996）
青山（Aoyama, 1996）。
卡斯特与霍尔（Castells and Hall, 1994）
青山（Aoyama, 1996）
今井（Imai, 1990）。
康与吉原（Khan and Yoshihara, 1994）
上野（Ueno, 1987）；矢泽（Yazawa, 1995）。
矢泽等（Yazawa et al, 1992）；岩雄（Iwano, 1993）；矢泽（Yazawa, 1995）。

济发展总体模型。

的确，全球化也转化了工业发展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保护主义和强势日元及日本高营运成本的恐惧，终将日本企业推向全球的分散化，相对地削弱了日本的制造业基础。第一波移动是往亚洲寻找较低的生产成本，和输出到先进经济体的更有利平台。但是到80年代后期速度加快，以整个生产单元与研发中心及工厂和商业场所一起转移到日本的主要市场，特别是美国、英国和德国。亚洲国家也成为市场而不只是一个生产基地。通产省尝试通过发展科学城计划来扭转日本资本与技术的移动，与较低度发展省份地区合作，引导高技术厂商至一区域分散化策略而不是外移。九州大地得益于科学城计划，不过部分是由于外国电子公司在日本市场设厂的兴趣。日本公司确实也分散了一些分支工厂，但另一方面保存他们最重要的人才和高级作业在东京—横滨的创新氛围中。然而，制造业、商业和金融活动的外移牵涉到无比的更高投资量。(p.241) 部分这些外移的目标是较低的生产成本，并且把产品运回日本，因此事实上日本—亚洲的贸易的一大部分是日本在亚洲的生产网络的来回运输。但是大多数日本公司的外移乃是超越日本国界的真正全球化，这种趋势曾经验性地显示在青山(Aoyama)对日本消费性电子公司的国际区位策略研究的柏克莱博士论文中。这个趋势在90年代后期扩大，由对保护主义的害怕以及确保特定市场知识、技术途径(例如在美国)、劳动力市场开发(技术与非技术性)和多样化出口平台的需要所推动。总而言之，日本跨国公司和日本国民经济之间的分离倾向正在增加。此一倾向的最重要结果是，通产省和发展中国家体系已失去它们对日本企业大部分的作用力甚至影响。这不只因为它们是更大了以及认为本身能力足以设计自己的策略，而是因为他们是全球性的并属于全球网络。因此，做为公司和公司集团，他们的利益越来越多样化，对不同国家、不同

部门和不同产品线需要不同的策略。当然，他们大部分的资产仍在日本（尽管比例在减少中），而日本公司很可能有比其他类似全球延伸的公司对它们国家更高的文化/地理的忠诚。日本政府对其公司采用优惠的政策也还是真的，如同美国政府所做的（例如1996年国防部对波音和麦道之间的超级合并的协助，以对抗空中客车的竞争）。但是，相对于60年代或70年代，通产省不再对日本公司有直接的影响；而这些企业也不主要在日本经济利益的框架中决定它们的策略。发展中国家和立足于日本的跨国公司网络间系统性互动的分离，对日本和全世界，引入了一个新的动力。

这个新动力的关键元素如下。在顺从于全球竞争状况的一个多层次的区位结构中，日本公司能够维持其核心劳动力的终身雇佣体系是值得怀疑的。1999年，失业增加了，尽管是以一个约4.6%的中等程度。但新创造的工作大部分是部分工时的兼职工作。（p.242）日本企业逐步淘汰了它们大量表现较不佳的子公司，从而关闭了在主公司里变得多余的工人和管理人的光荣退路。制造业受到暂时解雇的打击特别严重。这个稳定就业体系的逐渐弱化以及暂时性劳动力的扩张正在破坏稳定工业关系的日本式制度。日本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新游戏规则下能够长期关税壁垒也是值得怀疑的，可以在例如和美国政府贸易谈判中的严重摩擦看出。日本为了避免和美国直接对抗，试图将贸易谈判多边化而实际上却可能提高压力，因为欧盟也正强化其竞争态势。日本过度暴露于全球流动的遍及全世界的金融投资，让日本银行越来越难以完成他们系列内部的义务。进出日本经济体的持续性金融流动漩涡，限制了日本央行货币控制的影响，因此大藏省已无法决定日本产业金融政策基石的利率。电信、媒体和公共事业股票的解除管制进行得缓慢，但是肯定开启了许多不同来源投资的可能性，包括来自外国的。尽管在日本金融重建时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稳定性，新改组的日



本银行开始变得纠缠在全球金融网络中，而且他们必须依照全球赛局的游戏规则行动，而不是听从政府官僚的忠告。此外，做为日本经济复苏信号的1999年的日经（Nikkei）股票指数上涨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股市中外资的大量流入（在1999年大约有1250亿元），相对于10年以前的5%，1999年东京证券交易量的15%是由外国投资客控制。就像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所显示的，这个金脉的黑暗面是资本逆向流动的市场无常性。因此，后危机的金融市场，已深深地把日本与全球资本的移动连接起来，破坏了日本国家的自主性。

此外，在1998年，G7集团、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觉得日本已经如此虚弱，所以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制定被视为克服危及整个全球经济的危机所必需的经济政策。（p.243）尽管日本坚拒了外国人的意见，但这些压力仍是日本决定几个关键措施的一个因素，特别是涉及财政改革和金融政策。

总之，表现日本奇迹特征的行政指导体系正处于解组的过程中，特别是由于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情境下，政府无力控制金融体系。要打开日本市场仍有一系列的文化/制度性障碍，例如官僚体系的繁文缛节、企业网络的内部行规与日本人购物/消费的文化民族主义习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设置的强制性国家机器仍然在引导/协助/支持日本企业，工具创造功能是官僚生涯一个著名的规则：通产省总会找到一些事去做。然而，整个发展模式中有—基本的转化，例如当公司试着将日本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视为一致，而不是如丸山正雄所预言是服务着国家利益时。

有一个更基本的改变正在发展，例如矢泽澄子（Sumiko Yazawa）、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和其他研究者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已经指出了的，日本女人在政治系统中都逐渐动员了，特别是在地方政治中，她们的大量进入与劳动力一致。尽管旗帜鲜明的妇女运动的扩展仍然有限，妇女运动与妇女权

力在愈来愈多的地方社区已是公共议程的最前线。媒体对这些活动的关注正扩大她们的影响，开启了挑战妇女做为二等工人和政治上驯服了的主体的当前地位的方法。一旦妇女运动扩展，渗入父权家庭的私人领域中，由于父权结构和整个制度体系的相互联结，整个日本社会结构就将会面临压力。而且，有了零星却有意义的象征，这些挑战正在浮现。1999年，日本离婚率急剧上升，妇女更晚结婚，而遍及全日本日常生活的专业和个人独立的增加态势，提供了日本父权关系正在转化的轶事的线索。做为最后一着，经济危机和日本的社会变迁共同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可能为国家和公民社会间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模型。(p.244)

“永田町政治”的终结

日本发展模型的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为其政治系统的危机所加剧。1993年自民党选举失败，从自民党分裂的新党与社会党结合的组成联合政府展开了这项危机。两年以后赛局改变，自民党与社会党联合而重新执政。继而，在1996年新的选举中，未获多数席次的自民党政府，得到议会许多小党的支持，包括席次下降的社会党。然而，议会的组成、新的联盟也面临瓦解和重新洗牌，在日本政局中展开一个不稳定的纪元。的确，自民党在1998年7月议会参议院的选举中遭到惨败，在126个席位中仅仅赢得44席。这次选举中看到在野的民主党的领导人菅直人(Naota Kan)的崛起，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政客。一个显著的发展是共产党推动了积极的基层竞选运动并使其席次增加到三倍。由于这次选举失败，首相与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辞职。在自民党拼命抵抗可能瓦解该党的离心力的企图下，由富有经验、舆论营造者、党的领导小渊惠三取代他的位置。然而，在本书写作的

同时，极少观察员认为自民党在下次选举中依然能执政。^①的确，在本世纪交替的时候，自民党似乎越来越依赖于由佛教力量鼓舞集结的团体——创价会（Komeito）^②的联盟，这是政治领域一门松动的大炮。

这场政治危机所揭露的东西比它的直接社会影响更为重要。的确，1993~1999年间政治系谱没有发生实际的变化是可以辩论的，由于社会党失去相当多的支持，以及自民党失掉政权的主

① 由于日相小渊惠三于任内突然逝世造成的影响，继任首相森喜朗的自民党执政联盟在2000年6月25日的全国选举中虽表现不佳，但仍在众院守住绝对多数的门槛。选举中自民党联盟的通产大臣与农林大臣都失去了国会席位。

② 由佛教团体所组成的联盟。

生田（Ikuta, 1995）；强生（Johnson, 1995）；史莱辛格（Schlesinger, 1997）。

庄司（Shoji, 1995）；史密斯（Smith, 1997）。

寇蒂斯（Curtis, 1993）。

寇蒂斯（Curtis, 1993）；强生（Johnson, 1995）；史莱辛格（Schlesinger, 1997）。

长谷川（Hasegawa, 1994）；史密斯（Smith, 1997）；矢泽（Yazawa, 1997）。

庄司（Shoji, 1994, 1995）。

对日本信息社会的分析，部分是根据我在二桥大学社会系的助手谷川启介（Keisuke Hasegawa）在1995年所收集与制作的资料库。针对日本信息社会文献与资料的居前的概要叙述，则是由1990~1994年我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城市与规划系的助理青山优子（Yuko Aoyama）准备的。增加的信息来自我们与彼得·霍尔（Peter Hall）对日本科技城市的研究（Castells and Hall, 1994），以及我于1989年与1995年在日本所做的访谈。关于信息技术在日本扩散的主要统计资料来源为邮政省（1995）。亦见日本情报处理发展中心（Jap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evelopment Center）（1994）；若林（Wakabayashi, 1994）；与《情报传播研究》（InfoCom Research, 1995）。对日本信息技术工业竞争力的西方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已有些过时的“日本征服”（Japanese Conquest），可见佛雷斯特的精彩概述（Forester, 1993）对联结日本信息化过程的社会转化的分析性课题的讨论，见伊藤（Ito, 1980, 1991, 1993, 1994a, b）；一弘（Kuzuburo, 1990）；绵贯（Watanuki, 1990）；与屋（Sakaiya, 1991）。

要原因是它的一些派系离开自民党去成立新党。在某些情况下经过党内如此辛辣的斗争，自民党和前自民党的集团间未来的联盟将更为困难，尤其是在小泽一郎的自由党（Jiyu）的案例中。然而，这个危机比它的表象更为深刻，我将接着庄司（Shoji）所提示的“大改变”系由“小改变”累积而来，其中最主要是日本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p.245）

紧急地缘政治状态的结束，促使自民党逐渐分裂，在过去那种状态下，亲美力量的统一对日本企业与社会精英以及对美国利益都极为重要。此外，公开承认与美国的贸易压力，显示旧式的自民党政治在压制美国所不愿承认的新经济强权上不再有用。与经济全球化一致的日本国家利益的分化，加上金融危机开启了关于政策与策略的辩论，要求建立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政治体系，超越发展中国家官僚体系政策橡皮图章的看守者联盟。日本全面的都市化则破坏了传统的庇护网络。为了承认新的选举地图，一次政治改革将1994/1995年的选区重划，并将单一选区代表与国会选举的全国性投票结合。公众对于系统性政治贪污腐化的厌恶让政客小心谨慎，因此他们的中许多人尝试了新方案，将自己展现为洗心革面的政治领导者。展开政治竞争，以及放弃对自民党的家族忠诚，创造了政治谋略机会，加上名流、政治社团和特定利益团体投入政治市场，一个竞争政治的新领域就产生了。在这个过程中，自民党的肮脏洗衣店被越来越敢于自主的媒体进一步揭露出来，因而破坏了联盟的重构并激起离心力。这是为何大多数日本和国外的观察员认为自民党掌控的纪元已经结束了。由于社会党的瓦解比自民党更快速，加上地方政治明星，例如在1995年反对政治集团的竞选纲领中当选的无党籍东京知事青岛幸男（Aoshima），在没有稳固群众基础或信服人的政纲下迅速地窜升，使下一步的发展更难预测。或许，这个“过渡政治”（transitional politics）纪元一点也不是过渡的，也就是“政党系统”（party system）将被一个有赖于舆论的曝光和公共言论的支



持的“政治市场”（political party）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系统性的政治不稳定，削弱了政党与代表天皇体系作用的强势国家官僚体系之间合宜的缓冲作用。大藏省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丧失权力，以及企业界、反对派政客和一般人民对于过去无法触及的官僚体系的不信任，展现了日本国家（the Japanese state）时代的结束。（p.246）并非官僚体系失去了权力。事实上，它可能是今天日本所惟一遗留的有凝聚力的稳定权力体系。然而它的权威正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变成日本纠葛的决策网络中另一个不知是否重要的节点。日本新社会的渴望与历史合法性的旧结构间的直接对抗，可能产生更重大的政治危机，影响日本民（国）族认同的核心。

这种深层的社会与政治危机的一些元素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本浮上了台面。一方面，总体上自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失败以来沉寂的社会运动开始复苏，它们主要集中在环境与反核课题、妇女运动和社区与区域的再活化。通常他们与地方政治相联系，例如在市政选举中成功地支持民粹主义候选人（如在东京和大阪1995年的市政选举），或者用公民投票拒绝核电厂的兴建，例如1996年8月在卷町（Maki）镇。另一方面，一个越来越困惑的社会，特别是当传统父权家庭与官僚教义的结构在一个充满多样化来源的信息流动的文化中丧失支配的时候，在富裕中长大的年轻种族开始失去有意义的价值观。一个仪式化了的日本传统、美国图像和高科技消费的混合体，填补了社会动力、文化挑战或个人梦想的真空，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其被指派的任务：在50年内让日本安全、富裕，并受尊重。现在，在艰辛的努力之后，日本人在光明的尽头发现的隧道，竟是一个比紧急状态存在还要久的发展中国家所提出来的、更加抽象的、新技术官僚的挑战。或者更糟的，在为繁荣、安全与独立辛勤奋斗几十年后，金融危机和全球化的冲击却将日本打入不景气的状态，刺激经济再结构，并破坏了就业的稳定。根据社会学的研

究，大多数人只想要最后能安享美好生活的平静消费，也就是较少的劳累（karoshi）、较多的假期、更好的住宅、更好的城市 and 没有考试的生活；而年轻人则燃烧他们越来越解放的热情能量寻找实验方式。一些邪恶途径在这些探索间来到，激荡出破坏性反叛的症候，（p.247）例如由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所显示的（见第二卷第三章）。奥姆（Aum）并不是，而且也将不只是一个孤立的意外，因为由麻原彰晃（Asahara）和他的跟随者所揭露的日本社会之镜的裂缝，似乎源于平成时代日本浮现的根本矛盾：发展中国家——日本发展的行动者和日本认同的确保者——和这个国家大力催生的信息社会两者间的互不兼容。

发展中国家和信息社会：一个矛盾的关系

信息社会（Johoka Shakai）⁵⁷的概念事实上是日本的发明，在1978年由西蒙·诺瓦（Simon Nora）和阿兰·明克（Alain Minc）以他们对法国首相的报告标题输出到西方。它于1963年由梅倬惟人（Tadao Umesao）在关于以高度信息工业为基础的社会演化理论的文章中第一次被提出。这篇文章是1964年1月《朝日新闻》（Hoso Asahi）杂志一个辩论主题的文件，引入这个辩论的编辑第一次使用信息社会的术语。几年后它被日本的未来学者广为宣传，特别是松田（Masuda）和林（Hayashi）。

然而信息社会成为未来政策和战略思想的重要主题的原因在于1967年通产省工业结构委员会的信息工业部门将之采纳为核心议题，在达到以传统制造业为基础的庞大发展模型的极限后，通产省正寻找国家的新动员目标；着重于发现能减少污染和能在较低生产成本上，与浮现中的亚洲竞争对手保持竞争优势的工业部门。（p.248）根据1969年该委员会发表的文件：“信息的任务：关于信息处理工业发展的报告”一文，信息技术工业是明显的候选人。

这个报告在两个面向上是相当卓越的：一方面它预见在了全



球竞争新舞台中电子业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它将信息主义 (informationalism) 的概念延伸至全部的经济与社会，希望经由信息技术的扩散深刻地转化日本。的确，这个新发展方式与日本专攻知识密集性生产和出口的计划非常吻合，并远离了日本由于其贫乏的自然禀赋而明显缺乏优势的资源消耗与能源密集型工业。1973 的石油危机强化了诊断的精确度，驱动日本进入一个世界信息技术领导者的竭力竞赛，它几乎成功了：在超过三十年的卓越竞争努力后它在美国之后而居第二。设计与生产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平行，日本也在经济企业部门的工厂和办公室中进行快速的新技术扩散，全世界大部分的工厂机器人产自日本，微电子控制机器成为日本的天下，并在日本工厂比全世界其他地方更早普遍使用。录放影机、电视机、游戏机、摄影机和消费性电子，一般而言变成日本独占，直到其他亚洲生产者开始进入低档次产业的竞争中。卡拉 OK 密布在日本大部分的酒吧与娱乐中心，政府机构、家庭和学校通往信息技术之路的速度是慢得多，然而日本的技术现代化进行得比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快速。在长谷川启介 (Keisuke Hasegawa) 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一些日本、美国和英国在 1985~1992 年间“信息化” (informationalization) 程度与发展的指标 (在 1995 年我研究时最新可得的统计)，根据我们的资料 (我认为不必要在这里重复，因为它们在日本统计年鉴中很容易得到)，日本仍然落后于美国而领先英国，但其进展速度非常快 (尽管在个人电子设备中比美国慢，例如家庭电脑和移动电话)。(p.249)

伴随信息技术机器的生产和扩散，日本建立了一个环绕信息社会的未来学式景象的新神话，实际上试图以加上一些人文主义伪哲学的陈腔滥调的电脑化/电信化社会意象来取代社会思想和政治计划。一阵机构创立、出版、研讨会和国际会议的旋风，为技术革命将是日本及全世界未来光明之路的新意识形态提供了组织基础。发展中国家 (日语中的 Hatten Hokka) 发现了策略性

启动的新宝山：每个部门在其各自领域都竞相生产技术导向的计划，旨在通过建立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来转化日本。而后，通产省发动了目标为大量生产“硅谷”以及在此过程中庇护地方性行政单位的科学城计划，以巩固通产省在信息年代中的政治地位。邮政省确立了它在电信以及其他先导项目中的特权角色，发动电信城（Teletopia）计划，在63个模范城市中装设互动式媒体。建设省利用它对安装光纤网络的控制权与对公共工程的掌控去建造智慧型办公楼和住宅复合体，与其本身的智能型城市计划相抗衡。日本区域发展公司打造了筑波科学城，并从中央政府那边争取到新大学的创设以及40个国家级研究单位在筑波的设立。以农业生物研究为重点，强而有力的地方也发展出本身的计划。所以日本大部分地方均涉入了大批未来学者认为有前途、由退休高层官员所率领的整团智囊机构所领导的新信息社会物质基础的打造。问题是在此期间日本社会逐步展开其特殊文化/历史的信息社会模型，而这不只是与一个抽象社会模型的技术官僚蓝图产生矛盾，而是与其孕育者的制度性、政治性利益的矛盾。此外，在日本将它整个技术和经济发展孤掷在信息模型之后，国家的逻辑在这个模型蓬勃发展之际产生了矛盾，让我一一解释。信息社会不是指使用信息技术的社会，它是与信息化模型的兴起相联系，但非为其所决定的特定社会结构。（p.250）本书第一卷试图呈现这个社会的结构特性和历史/文化变异性，为了提出更社会学式的刻画，我称之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它的大部分特性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尽管日本有其特色。网络社会的这些特性与日本国家在过去半世纪历史地建构的制度和逻辑产生矛盾，我将解释到底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

首先，如先前所提到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损害了发展性国家的影响力，并暴露了其官僚体系的无力面向，这在一个以策略性调遣与适应为主的，在无情竞赛中求生存至关重要的无常世界中成了障碍。



其次，在全世界和日本的去管制化与私有化浪潮，逐步而确定地迫使日本政府松开它在电信、媒体、公用事业、建设工程以及其他许多领域上的掌控，因而失去许多它控制经济和驾驭国家的工具。第三，一旦日本公司到达技术创新的最前沿，日本科学的虚弱限制了日本改进现有技术、使它更好和更便宜的能力。美国的电子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地翻转了日本的竞争态势。而日本厂商在生物科技与软件上的成就有限，系来自于此基础科学与研究训练的落差中。尽管有些关于日本先天能力/无能的类似种族主义式的描述，对于日本在技术调适和产生基础科学技术之间的能力落差的解释其实在于制度性的，而非文化性的因素。基本上，它来自于日本大学体系的官僚特性，以及重点在确保文化再生产，而非刺激知识创新的过时的、考试取向的教学体系。(p.251) 如众所周知的，大学被指示不为企业工作，教授是公务员，通常禁止经商；研究所是虚弱的，博士课程是为配合机构内部的晋升；并且同族通婚式的关系是招募教员规则，从而不鼓励投资时间和资源到国外研究；更有甚者，女人在她们的学院生涯中被公然歧视，因此造成科学创新和教学品质的卓越潜力的浪费。大学是授予学位的官僚体系，主要目标是文化再生产和社会选择，不是创新与训练自主性思考的中心。国家机构相当清楚这些事实，但是不容易解决，因为他们的修正将与文部省所赋予的基本任务矛盾：其任务为保存日本认同、传递传统价值和精英领导阶层的再生产。若将体系向个人竞争、自主性思考、依据市场需求的多样计划以及外国影响开放，相当于拆除日本持论 (nihonjiron)^① 的堡垒。让我弄清楚一下：我并非认为日本的认同与

① 即日本的主张，日本独特性的意识形态。

“日本科学的跃升”，《商业周刊》，1996年9月2日。

电通 (Dentsu) 人类研究所 (1994)。

庄司 (Shoji, 1994)。

庄司 (Shoji, 1995)；史密斯 (Smith, 1997)；久泽 (Yazawa, 1997)

信息社会对立。如任何文化认同一样，它必将由历史路线加以修饰。我的观点是出产信息社会人民的活水源头的日本教育体系，以它目前的结构和目标，尽管有天文数字的工程毕业生，并无法产生企业能赖以在工业、技术和文化发展新领域中创新的关键性大量研究者与研究计划。而且由于日本厂商在60年代到80年代擅长的模仿策略现在已为全世界许多竞争对手所精通，日本公司不能再依靠日本机构和日本训练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在高层次信息基础工业的竞争中跟上。日本政府似乎认知到这个事实，它在1996年8月批准一个为了在100个国立大学和私立学校中实施提升科学技术努力的特别计划，而在五年内投资1550亿元。然而除非教育机构有一个基本的改革，额外的投资仅仅意味着在官僚组织的研究中心中更多训练较佳的官僚心态毕业生，且将越来越无法和交流日趋热络的全球研究领域互动。由于缺乏个人式的企业精神，以及，政府官僚体系认为信息社会将会立基于超级电脑，而不是电脑所中介的传播的错误预测，导致了退步，在90年代后期，在商业领域和整个社会中网际网络（互联网）遍及全球的爆炸性发展，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的技术缺陷。

对于网络社会的弹性要求的第四个制度性限制，关乎长期核心劳动力的终身雇佣（Choki koyo）体系的潜在问题。这个体系不仅是资本和劳工之间协议的结果，而且产生于由国家为发展所召唤的紧急民族动员情境中。（p.252）日本企业与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以劳动力弹性化为特征的企业习惯、持续增加的互赖，使得终身雇佣体系越来越难以保存（见第一卷第四章）。这个体系位居三个面向社会稳定性的核心：工业关系体系；以家长式作风保障长期安全的国家合法性；父权式家庭，因为只有确保家户长的工作稳定才能让妇女的弹性有可能，它令妇女较低风险地保持她们做为家庭主妇和暂时性工作者的双重角色而不需独立打造自己的未来。工作的无法保障，如果扩散超出目前年轻工作者中职业不稳定的趋势的话，在日本将会有特别戏剧性的后果产生，



因为大部分的社会利益都依赖于这样的雇佣公司。

第五，虚拟实境的文化在日本扩散得很快（参见第一卷第五章），多媒体、电视游戏机、卡拉OK、有线电视和最近的电脑中介的传播是日本社会生活的新领域。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虚拟实境文化的真正特征是在一个潜在互动的超文本（hypertext）下，主题、讯息、意象和认同的混合。由于这个文化同时全球化和个人化，特殊的日本认同将与这个文本合并/或者互动，而对不同的文化表现开放，日本认同的结果将是什么？表面的观察会注意到日本青年文化显著的美国化（从饶舌歌到运动图像），不过更接近的观察显示对这些意象的21世纪日本存在方式的特殊调适。不管它是什么，它不是传统的日本式认同，也不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更新版本。它是别的东西：来自包括日本本身的不同文化来源的千变万化讯息和图像，在日本和由日本人酝酿和消费的，但决不再孤立于全球路径的虚拟超文本。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组织所强调的对日本惟一价值的忠诚，将与新生代所增长的文化环境产生冲突，随之而来的是刺耳杂音而不是高度忠诚。

第六，环绕保卫领域性社区、性别和环境的认同为基础的社会动员新大道，与日本社会同质性神话以及由国家官僚体系所象征的至高无上民族社群的想象直接矛盾。（p.253）根据庄司的考察，确实大多数日本人仍然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并清楚表达出相对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是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浮现的新社会运动把民族统一性意象除去，同时提出了他们不同的利益，不是与民族对抗，而是宣称民族之内的多样性。这个观点和天皇体制所立基的民族政体无法分解的统一性直接矛盾。

第七，日本在过去20年所创造的信息社会是一个活跃的、自主的、肯定的公民社会。对于腐败、低效能的政治体系越来越不满，并且拒绝了政治性辩论的例行公事化。这个社会要求一个有活力的、开放的政治体系，能够处理日本正浮现的，关于长期

折磨结束后应该如何生活才能超越受困心态的根本辩论。因为“1955年政治体系”是有点装饰性地添加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控制性机制，它缺乏将自身转化为信息时代市民公共空间^①的合法性和能力。因此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失去，使发展中国家直接暴露在信息社会的要求和挑战中，这个对抗在日本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将持续在日本占有重要的地位。

最后，在世纪交替之际，尽管存在着所有上面所提到的障碍，许多迹象显示日本的网络社会正沿着未预见的路线发展，网际网络（互联网）发展快速：在1999/2000年大约有2300万日本人使用网际网络（互联网），这使得水平的、自由的传播成为可能。不久，它将被利用到消费者和市民的批评声音中去，并且

① 原文系 agora，阿果拉，希腊城邦中城市中心的公共空间，小广场，为市民发言与参与政治的公共领域的象征

井野口 (Inoguchi, 1995)

“一个新日本？特别报道”《商业周刊》，1999年10月25日 (Business Week, 1999b)

渡边 (Watanabe, 1996)

此处分析大多根据我在中国香港（香港大学，1983，1987），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1987，1989），韩国（韩国人类聚落研究中心及汉城国立大学，1988），和中国台湾地区（国立中国台湾地区大学，1989）的调查、阅读和个人经验。在我对香港、新加坡1990年之前的分析（详见卡斯特等 (Castells, et al. 1990)，应可视为有关香港、新加坡一般性参考资料，以避免和本专论的参考书目重复。有关中国台湾地区、韩国部分，感谢夏铸九、邢幼田及金洙澈 (Ju-Cheol Kim) 教授提供协助及构想，在此致谢。

其他资料在这节中直接引用者，包括：列什布莱居 (Lethbridge, 1978)；艾姆斯丹 (Amsdem, 1979, 1985, 1989, 1992)；刘 (Lau, 1982)；林 (Linn, 1982)；蔡明发 (Chua, 1985)；高棣民 (Gold, 1986)；戴约 (Deyo, 1987a)；克劳什等人 (Klause et al. 1987)；金 (Kim, 1987)；怀特 (White, 1988)；温克和格林霍夫 (Winkler and Greenhalgh, 1988)；罗宾森 (Robinson, 1991)；辛格 (Sigur, 1994)；艾文斯 (Evans, 1995)。我也感谢一个有趣、前瞻且少为人知的贡献，这是出自一个年轻的韩国研究学者——安 (Ahn, 1994)，他于成书后旬即过世。其他参阅资料则特别标记于文章注脚中。

和世界连接起来。个人电脑销售量也大幅增加（1999年达到80%），透过信息处理容量和电子邮件传播的使用提供年轻专业者动力，电子商务跳过既有公司，变成一个多变的工业。个体企业家成为部分工时、临时工时、在企业晋升阶梯长期等待、不准备再接受传统日本公司阶层次序的成千上万个年轻毕业生的一个选择。到2001年，4300亿邮政储蓄存款可能释出，开创了建立一个巨大资本库的可能性，可能彻底改变日本经济的远景。（p.254）稳定工作生涯的危机和个人流动性并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行为所预期的延迟报偿模式。越来越多的妇女以前所未见的决心，主张她们的权利。传统日本家庭和传统日本企业、日本的发展中国家一起面临了威胁。因此，对于通产省的策略规划师而言，如果他们还在的话，未来就在现在，而且，如同历史里的情形，它看起来比他们的蓝图所预测的更为混乱，因为它充满了真实的需要、权利要求、担忧牵挂和日本人民的梦想。

日本和太平洋区域

天皇体制在日本证明是活跃的，否则不能解释日本政治精英顽固地拒绝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侵略与战争罪行向他们的亚洲邻居道歉。若非德国已采用这样的姿态，今天将不会有欧盟。而且由于日本选择了根植于其文化民（国）族主义体制中的不同道路，太平洋区域将不会有政治整合的制度，它势必被中国人、韩国人和俄罗斯人（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不约而同地拒绝。

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有一个增长中的经济互赖性，以及主要由环绕日本公司在亚洲的生产网络所建立的一系列利益。此外，日本对于能源、原材料、地理亲近性和亚洲市场扩张的倚赖，在一个最终能增加太平洋合作的过程中，创造了和平合作、交流的强大诱因。然而，将日本和其他亚太国家推入全球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制度，正是超越经济利益紧绷的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

合作的主要障碍。这是因为对日本和诸亚太国家而言，发展过程的引擎都是各自发展中国家核心的民族主义计划，因此在日本和其他地方只有抛弃民族主义式发展中国家才能创造新的认同、新的制度和新的历史奇迹。(p.255)

龙途末路？

亚洲四小龙及其公民社会

日本的发展及其对西方的威胁，只能一半算是历史的惊奇。毕竟，日本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工业化，并且有能力在1930年代建造令人畏惧的工业与军事器械。真正在欧洲文化体系（当然包括俄罗斯）支配下的秩序世界里，摇起警铃的是东亚四“龙”^①的崛起：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些不毛之地，经济上饱受战火及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摧残，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或能源的地利，没有工业传统与技术基础，却能够在三十年间转型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者与出口国家和地区，显示新的全球化经济乃是被新的竞赛规则调整步调及结构。这些小龙似乎比老牌工业化国家对于新规则的学习更为迅速，掌握得也比较好。新规则即是吸收、使用并提高制程、产品

① 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称东亚四小“龙”为四小“虎”，译文为顾及读者阅读习惯，将原文的四“虎”均改为四“龙”，也符合作者欲凸显的发展中国家为四小龙的“龙头”之意

艾姆斯丹 (Amsdem, 1979); 艾文斯 (Evans, 1995)。

戴约 (Deyo, 1987a); 爱波鲍恩与韩德森 (Appelbaum and Henderson, 1992)。

强生 (Johnson, 1987)。

卜斯特等 (Castells et al., 1990)。



的新信息技术能力，以及预知新的技术潜力的策略，全盘应用于国家的工业、管理和劳动等技术的检视。因此，分析四小龙的发展过程，可以聚焦在科技、经济、与社会的新关系上，彰显其向信息化、全球化经济过渡的特征。此外，始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对于每只“小龙”具有非常不同的冲击与宣示。(p.256) 1997年12月21日韩国——四小龙当中最大的经济体面临破产，以致无法履行国际债务的偿还。从1997年10月起，中国香港的股票价值、不动产急剧下降，如前文所叙。新加坡受危机的波及，新币只受些微的贬值，在1998年呈现负增长。而中国台湾地区似乎经得起危机。

基于本书的分析目的，四小龙对危机的不同回应，提供了了解危机本质的绝佳机会。因此，在透过比较的方式观察、阐释四小龙的发展过程后，我将延伸此一比较分析来诠释他们的危机。在本节中我也将试图在有关发展过程与危机本身的分析之上，进一步阐释在朝向信息化社会及向全球经济整合过程中所触发的社会、政治矛盾。事实上，在发展性国家和地区（我故事中的“龙”）过去三十年间扮演促成、导引和确保经济增长与技术现代化的关键角色后，到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和企业体面对国家令人窒息的表现，日益觉得不舒服。而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民族化（nationalization）二者也互相冲突。于是，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情境；而新加坡则进行着转化自身为网络世界的全球节点的特殊实验。正是通过发展、危机、国家及社会的演变互动，我们得以解释这些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不同形式的应对和社会变化的特殊路径。

了解亚洲的发展

1960~1990年间，亚洲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很高的社会成本和政治压迫之下，表现出耀眼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而在情绪性的意识形态争辩下，此社会过程至今依然模糊晦涩难以了解。

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表现挑战了教条的依赖论分析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理论部分传统见解。不同于左翼流行的观点——资本主义下的依赖社会无法发展经济，亚洲四小龙在全世界中维持了将近三十年的最高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持续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p.257）并且在此过程中转变了他们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组织。再者，虽然剥削和压迫是发展过程的构成要素之一（就如同欧洲工业化一样），经济增长却伴随着生活状况的充分改善（在工资、健康、教育及住宅上）。除此之外，收入不平均的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缩短差距，在70年代维持稳定；而虽然80年代略微升高，但80年代中期仍旧低于50年代，并且较诸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为低。虽然这个经济和社会的转化发生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压迫之下，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社会也有类似的遭遇和压迫情境，却大多承袭他们殖民（colonial）或半殖民（semi-colonial）的历史，至今仍无法超越发展的障碍。（p.258）惟有这些小龙们能够成功地和过去断裂，并激发90年代亚洲其他国家的效仿，虽然有不同的条件和些许政策差异，却似乎也都依循着类似的途径，而正是四小龙的发展过程所带来的改变，使得他们建构和操作的新的太平洋和全球经济关联的脉络也正在改变中。另一方面，亚洲小龙们的经济成功，也被用来支持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政客的意识形论述。在他们所建构的亚洲发展观点中，重新发现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乐园。然而，任何严肃、无偏见的亚太观察者，会了解到不论是国家系统地干预经济，还是策略性地引导国外公司和跨国企业在国家领域内的着陆，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确保经济发展能够达到工业化每一阶段目标的基本因素。就像在日本，“发展中国家”位居新工业化经济的经验核心。此一事实在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普遍也都被认为是如此。而在一些较不广为人知的研究——包括我个人的研究中，我将论证中国香港也是同样的个案。然而，相较于对发展理论做出回应，论证国



家乃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引发更多质疑。因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也在多方面介入经济发展，但却都无效率。我们必须重建亚太的国家、社会和经济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了解特殊社会条件，以解释发展过程的成功结果。我首先聚焦于每一国家的特定过程，试图提出解释；继而提出分析性的问题，从比较的角度予以回答。陈述的程序，则按照国家和地区干预程度最高至最低的次序：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

新加坡：经由多国公司营造民族的国家

曹媛 (Yuan Tsao)^① 以计量经济的观点分析新加坡 1965~1984 年间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果显示资本输入乃是主要的贡献因素；而劳动力输入虽有正效应，但从生产力因素整体来看则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劳动力，1996 年新加坡的失业率是 9%，而劳动参与率则为 42.3%。到了 1983 年，失业率降至 3%，而劳动参与率则是 63%，主要归功于出现了大批女性加入劳动力的行列。而在学校中强制学习英文，以及延伸职业教育等做法也使得劳工教育获得实质上的进步。移民被严格地限制于非低薪行业，并享有新加坡国民的优待。非法移民则备受压制。

然而，关键性因素乃是大量的资本涌入，其主要来源有二：(a) 海外直接投资，20 世纪 70 年代在 10~20% 间起伏；(b) 罕有的国民储蓄总值增长率，在 80 年代中期达到世界最高的 42%。在 1966~1985 年的全部时期，国民储蓄总值相当于超过国内资本总值组成的 74%。有许多是由公共部门产生 (46%)，主要是通过中央准备金 (Central Provident Fund) —— 一个被

① 音译。

曹 (Tsao, 1986: 17~65)。

戴约 (Deyo, 1981)。

陈 (Chen, 1983)

设计来强迫人民储蓄，由政府管控的社会保险计划。政府干预了大部分（但并非全部）的储蓄，许多被运用于社会性和实质性的公共建设，部分则投入国营企业（新加坡在80年代有超过500家国营企业）。政府也在海外投资股票、不动产，以降低相对于新加坡经济循环的政府税收的风险。（p.259）此外，大约有政府总税收的四分之一被存放在政府发展基金中，借以稳定经济和提供政府策略性的支出。这项储备金提供了政府保障货币稳定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充裕手段。

由于政府在财政上的谨慎，使得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责任落在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之上。新加坡政府自其1965年独立那一刻起，就注定其贫瘠、狭窄的领土仅能提供做为跨国公司的输出平台。至今，新加坡发展过程的核心因素乃是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他提供了吸引外国资本的必要诱因，并通过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联系到投资者，对国际经济的未来方向提出了策略性的规划。吸引到新加坡投资（主要是制造业的起步阶段）的诸多关键因素是：低廉劳动成本的优越企业环境；压制、平息20世纪60年代早期独立工会之后的社会安定；多数讲英语、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对企业友善的社会、环境法令；完美的运输、交通公共设施；配备完整的工业用地，可能还包含由政府建造完善可以直接交付使用的工厂；有利的通货膨胀差别待遇；稳定的财经政策；以及政治安定。

新加坡政府在造就工业多样化的可能性方面，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实现了生产作业的技术升级，强化了新加坡产品价值，使之能与时俱增。新加坡从传统服务业（区域贸易），慢慢地转变为制造业（主要是电子装配），然后再到高级服务业（海外金融、传播、企业服务）。它从低技术的装配制造，到先进的产品与程序制造——包括设计研发和微电子工业的芯片制造；从沿海贸易和石油提炼为主的经济，到高度差异化的工业结



构——包括机械、电子、交通工具、生产服务和国际金融。政府大力推动产业的升级，完善创造科技与教育的公共建设（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电信及空中运输公共建设）经由提供不动产、信息系统和管制宽松的环境，新的国际性企业服务欣欣向荣；而一系列大胆措施则提升了劳工素质——包括在 1979~1982 年间当新加坡经济已经度过求生存阶段后，慎重、明快地提高工资，以淘汰需要非技术性、廉价劳工的公司。（p.260）通过强力支配和社会整合的机制，确保效率的政府管理和政治稳定，让多国公司相信新加坡乃是乱世中最安全的乐土——除了知识分子、独立新闻记者、政治反对者、叛逆的年轻人、非法移民、怀孕的合法移民、吸烟者、毒瘾者、乱丢垃圾者之外。品质良好的公屋（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大多位于经过规划、充满绿意的住宅区，且生活设施完善，供应了 87% 人口的居住需要，起先是承租，而后是拥有所有权。除此之外，大力补助民众健康、教育及大众运输，同时提高实际工资，降低收入不平等，戏剧性地改善了全民生活状况：新加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每人收入比英国还高出许多。此一富裕繁荣，有助于安定诸如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出现在新加坡的社会及种族间的骚动。精明的国家安全机构严密监控着少数的反对者，并使新加坡在“非亚洲价值”影响下一枝独秀。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为了提升教育与技术基础，由新加坡推动的再结构过程，导致了 1985~1986 短暂的经济不景气。但是，当政府登上经济自由化与国际化后，狮城（Lion City）从匮乏、平庸中脱颖而出，逐渐转变为东南亚科技、金融、商业服务中心，拉近了与吉隆坡的竞赛距离。

20 世纪 90 年代，当中级技术的产品制造生产线开始从新加坡出走——如电脑光盘驱动器外移到东南亚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地点，政府开始着手大力投入关键微电子的生产，确保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制造业的贡献不低于 25%，以符合其坚信制造业对于国家财富举足轻重的策略。

它将目标定在高价值的制造，亦即高级芯片的设计研发与芯片制造。即使新加坡现今已是不虞匮乏，仍自行投资微电子工业的生产。政府所有的“特许半导体制造公司”在新加坡建造了两个工厂，总投资额高达11亿美元；并且计划在1966年再盖四座工厂（p.261）。政府也和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佳能（Canon）、惠普（Hewlett Packard）等合资，以16亿美元建造其他两座工厂；另外和日立（Hitachi）、日本钢铁（Nippon Steel）合资约10亿美元建造其他两座半导体工厂。汤姆斯（SGS-Thomas）凭着政府在训练及赋税减免的赞助下，决定在1988年前再投入7100亿美元扩充新加坡的芯片制造厂。总而言之，新加坡的半导体工业将目标定位在：公元2000年前，微电子工业生产数量及品质超越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此外，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尼，助长新加坡登上信息主义的阶梯，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之一。这不仅是增长的速度，还包括增长的品质，使得全世界企业选择新加坡做为在此全球最具变动性的经济区域的最佳操控基地，藉以管理和投资。因此，自从脱离20世纪60年代中期破败的经济之后，1965年努力挣脱了马来西亚的地理关系，并且在1968年摆脱了被视为日趋没落的大英帝国的转运和军事基地。新加坡排除万难，将自身建设成为新的发展过程的展示橱窗，并且在那些受此发展中的城市国家所吸引、保护的多国投资之上，建立民（国）族认同的基础。

韩国：垄断性资本主义的国家生产

美国在1948~1960年对韩国的干预——通过土地改革、军事支持，以及大批的金融投入，使这个国家历经近代史上最为残酷的战役之后得以重建和存续——此乃开创现代经济基础的主因。然而，韩国得以快速的发展，却是由朴正熙政权所启动的，该政权建立于1961年5月军事政变，并在1963年10月经过选



举舞弊，最后，体制化为第三共和国 (Third Republic)。在美国军事、金融、政治援助的基础之上——此援助是以北纬 38 度线的亚洲柏林围墙为分界——韩国军方及其政治势力，民主共和党 (Democratic Republic Party)，决定建构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做为民 (国) 族主义计划的基础。在发展的最早阶段，国家通过国营公司和政府投资，担任企业家的角色。于是在 1963 ~ 1979 年间，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年收益，每年平均高达国内资本总值组成的 38%。(p.262) 可是，被日本模型深刻影响的朴氏政权，目标在于创造以韩国大型公司为基础的工业结构，并组成企业集团。为了达到目的，他采取了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然而，由于国内市场购买力极为有限，政府决定支持以制造业为基础、完全出口的策略。利用对银行体系和进出口许可的控制，国家推动韩国公司合并，形成一种大规模的垂直网络形式，也就是财阀 (the chaebol)，^① 有点类似日本的系列 (keiretsu)，但财政不是独立的 (见第一卷第三章)。在 1977 年以前，雇员超过 500 人的韩国工厂，只代表工厂总数的 2.2%，却占总劳动力的 44%。政府设置了经济计划局 (Economic Planning Board)，规划并实施了一系列的五年经济计划，引导韩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无论是建立自信或提高竞争力，都能发展成为与国家经济策略相关的部门。于是，韩国在方法上采取工业发展的途径，相继投资纺织、石化工业、造船、钢铁、电动机械、消费性电子产

① 韩国式财阀，历史地由日本的财阀 (Zaibutsu) 所促成，但比日本还要更为阶层化，参考第一卷第三章。

李 (Lee, 1988)

强生 (Johnson, 1987)

林与杨 (Lim and Yang, 1987)。

戴约 (Deyo, 1987b)。

恩斯特与欧寇纳 (Ernst and O'Connor, 1992)

艾姆斯丹 (Amsdem, 1989)。

品，以及（在 20 世纪 80 年代）汽车、个人电脑和微电子工业（最后几项工业有令人瞩目的成果，包括较西欧更早拥有设计及生产 256k 芯片的制造能力）。虽然政府机构的一些策略性的决定经常是粗糙地误导，致使经济遭受挫败，但是政府会出面弥补损失，复原工厂，并且担保新的贷款。

就像新加坡的案例一样，只是规模较大，国家在吸引外资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控制、动员劳工，使得 20 世纪 60 年代及 70 年代间的“财阀”的形成和发达成为可能。资本的重要部分仍旧来自国外，但是韩国和新加坡经验却有着关键性的差异，其政府的民族主义，由于担心海外多国公司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以至于排斥它们的过度出现。因此，资本主要是以贷款的形式流入韩国，而由政府在美国的担保下借贷。例如世界银行的国际组织所借贷的公共贷款，主要提供各国政府建造的具生产效能的公共设施。私人贷款则是在是否遵从政府策略性的规划的原则下，被政府引导至韩国公司。（p.263）依此，在 1962~1979 年间，外国资金占国内资本总值组成的 30%。而 1978 年的外债比国民生产总值超出 26%，使韩国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世界上负债最高的经济体。然而，若将负债做为出口比例的一部分时，就不算过度偏高。事实上，最近十年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19.4% 降到 10.5% 了。而其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对外贸易（出口及进口额）比例也已经从 1963 年的 22.7% 跃升到 1979 年的 72.7%。韩国的经验显示负债本身并非发展的障碍：适当地利用贷款，才是决定经济的结果。韩国，相较于一些拉丁美洲的军事政权（如阿根廷），乃是利用外债来营造公共设施，以及扶持出口；而确保调度外债的自由度，并由美国承担韩国政府庞大的军事防卫，补偿其做为抵御共产主义的亚洲堡垒所付出的代价。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经济的基础坚实地建立在财阀紧密的控制之下，并在国家的指导之下政府积极寻觅外国直接投资。但



即使是在当时，仍有严格的限制加在外国公司上：国外持股最高限于 50%，强制外国人与韩国合资设厂，并将它们隔离在与韩国市场无关的出口加工区内。同时，政府在许可外国投资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即特别留意那些可能提供技术转移的公司。日本公司多投资于纺织、电动机械和电子业，美国公司则主要在石油及化工业占有一席之地。但整体而言，外国投资仍是层层受限；在 1978 年只占韩国出口额的 19%，占制造业总输出的 16%。国家也组织了服从的劳工投入新工业经济，但是在生产第一，分配问题次之的原则下进行的。受过教育及工作勤奋的劳工，如同东亚其他地区，是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然而，劳工的组织方式在韩国较诸其他社会，却受到更多压制。大型工厂的劳工聚集，乃是由准军事管理（quasi-military）来加以组织的，因而助长军事化的工会主义的产生。独立的劳工联盟是禁止的，罢工被粗暴地镇压，而工厂和家庭的劳动及生活条件，长期维持在最低水准。此种压制的态度也导致了亚洲最为激烈的劳工运动的形成，（p.264）如 20 世纪 80 年及 90 年代发生的频繁暴力罢工。让工资的增长维持在比生产力增长还低的水准，乃是韩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石。

无论如何，广大人民和工人的生活条件确实因为经济的骄人表现在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推动下而获得改善。例如，在 1972～1979 年间的重要发展时期，政府年度税收出色地提高了 94.7%；前 46 的财阀的附加价值年增 22.8%；而实际工资的年增长率为 9.8%。在贫穷界线以下的人口比率，从 1956 年的 41% 下降到 1975 年的 15%。虽然收入差距在 20 世纪 70 年代拉大，但整体而言，韩国在 80 年代还比美国表现出较为合理的收入分配。最后，强调科学和技术以及工业产品及制程升级，已经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韩国工业发展的信念。它创设及编制了一系列专业化设计研发的研究单位，将它们结合到由科学技术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指导的业界。韩国是在新国际分

工中最快速登上科技阶梯的工业化国家。例如，在 1970 - 1986 年间，韩国的机械输出以年平均 39% 的增长率，远超过日本 20% 的表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的微电子、消费性电子产品、电脑工业已经成为威胁日本和美国公司的对手；在角逐电子业的世界市场里，更凌驾在欧洲公司之上。韩国曾被爱丽斯·艾姆斯丹 (Alice Amsdem) 誉为“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人”；韩国在 1965 - 1986 年间，在全世界中国生产所占有的比率增加了 345%。

韩国最大的四大财阀：三星 (Samsung)、金星^① (Lucky Gold Star)、大宇 (Daewoo) 和现代 (Hyundai)，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位居全世界前 50 大企业集团。它们如今已是具有全球性触角的投资者，将其出口和直接投资遍布于美国、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市场中。欧洲和美国地区也竞相争取韩国前去投资，1996 年法国政府试图将其病人膏肓的“国家的荣耀”——汤姆斯 (Thomas) 公司，以一法郎的代价售予由大宇集团所领导的策略联盟，然而消息宣布后却触怒了法国民族主义，只得撤销此笔交易。(p.265)

从残破、分裂国家的废墟中，韩国短短三十年间竟有了如此非比寻常的跃进，乃是凭借发展中政府的民（国）族主义计划，审慎地缔造一些特定的韩国公司，使其能够在世界经济中参与全球性的赛局。韩国政府通过外国贷款、美国军事援助和无情地剥削韩国劳工，完成了他的目标。

① 其缩写为亚洲各城市常见的商标 LG

郭 (Kuo, 1983)。

高 (Gold, 1986)。

格林霍夫 (Greenhalgh, 1988)

高 (Gold, 1986)。

邢 (Hsing, 1997a)。



台湾：在无弹性管制指导下的弹性资本主义

即使是从亚太地区发展的高标准来看，中国台湾地区可算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就各种指标的组合来看，台湾维持了高度经济增长率（在1953～1982年间平均为8.7%，而1965～1986年为6.8%）、区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的占有率的增加（1965～1986年权数为3.6）、出口额在全球的占有率的增加（在1986年为2%，高于所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包括韩国在内），以及在全球制造业产量的占有率（相较于韩国的3.6，在1965～1986年间权数为6.8）的增加。同时，在此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较任何其他国家（除了北欧、日本）还更为平均：1953年基尼系数为0.558，1980年为0.303，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不平均有些攀升，但健康、教育及一般生活水准等方面也有稳定的改善。

台湾经济增长大多是在有竞争性和生产性的弹性化生产系统下完成的，在美国学界提出北意大利的相关研究前，这种弹性系统早就在台湾行之有年。此弹性指的是在政府强势指导下，工业结构本身及其对世界经济多变状况的整体适应力，而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的强势指导是借助美国国际发展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提供的支持与顾问。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这个增长的模型的改变很富戏剧性：从20世纪50年代强调进口替代，到60年代出口导向工业化（起飞时期），再到70及80年代高立民（Thomas Gold）所谓的“出口导向的进口替代”（亦即，深化工业基础来提供制造货品的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当台湾靠自己的力量成为经济强者时，（p.266）其企业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将它们的生产与投资推向国际化，包括亚洲（特别是中国内地）和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国家（特别是美国）。

在发展过程四个阶段中的每一个时期，我们观察到了一个在没有重大危机下，不同的工业结构逐步形成以及叠加于其上的现

象。但在所有案例中，有两个特征对于了解这个过程至为关键：(a) 国民党政府 (KMT state)^① 位居这个结构中的核心；(b) 这个结构是一种网络 (network)，由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以及企业透过贸易公司 (主要是日本) 与全世界的商业中介和世界市场所形成的关系 (relationships)，共同组成 (见第一卷第三章)。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国民党政府凭借来自美国的大批经济援助和军事防卫，在经过 1947~1950 年血腥镇压及 20 世纪 50 年代“白色恐怖”后，取得社会的全面控制，便着手经济改革。在美国鼓励下的土地改革，瓦解了地主阶级，并且创造了大部分的小农人口，在政府支持下，实质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乃是剩余积累的首要来源。它产生了投资所需要的资本，而且供应了都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政府通过控制信贷与肥料，组织了以大米换取农业输入品的易货贸易系统，迫使农民和工业经济之间进行不等价交换。通过控制银行 (一般为政府拥有) 和输入许可，政府将中国台湾地区经济朝向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调整，在全面的市场保护下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初始结构。在美国国际开发援助 (USAID, 美援) 的援助下，也提供了工业及交通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及加强劳动力的教育。为了执行这些策略，设置了一些政府机构，并且精心规划了四年计划。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结束前，本地市场已经耗尽了刺激增长所需要的潜力，再次由美国专家的建议下，国民党政府开始进行经济重构的雄图，这次是循着对外导向。1960 年，“经济与金融改革计划” (Program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form) 的十九项要点，放宽贸易管制，刺激出口，并且设计了吸引外国投资的策

① 俗称的国府。

派瑟 (Purcell, 1989: 81)。

卡斯特与霍尔 (Castells and Hall, 1994)



略。台湾第一个创立“加工出口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于高雄）。在1964年，通用公司（General Instruments）开拓了台湾的电子装配厂。（p.267）日本中型公司立即跟进，以享受工资低廉、没有环境管制、受过教育的劳工、和政府大力支持的好处。然而，台湾工业结构的核心乃是家庭企业的增长。它是由众多小型和中型的公司所组成，以家庭储蓄和公司储蓄的网络（有名的标会）而设立，必要时由政府银行授予债信。这些公司大部分开始于都会地区的边缘农村，在这里家庭得以同时分摊农耕和工厂的工作。例如，我在1989年造访靠近台中的彰化县的农业与工业地带，小型工厂的网络在当时却供应了将近全世界雨伞市场的50%。台湾地区的政府吸引外国投资，以此做为获取资本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但是外国公司却经由转包的安排，联结到众多小型工厂的广阔网络，后者提供了工业化生产的稳固基础。事实上，除了电子业外，直接的外国投资，过去和现在，一直没有做为中国台湾经济的主要部分。例如1981年，外国公司的直接资本持股在台湾地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外国公司的雇佣比率只占全部的4.8%，产量占总数的13.9%，输出也只有占25.6%。进入世界市场的促成者，最初是由日本贸易公司，以及从台湾工厂寻找直接供应的美国百货公司的那些买主。

因此，经济对外导向并非意味着跨国公司的控制（像是在新加坡），亦非大型民族企业集团（national conglomerates）（像是在韩国）——虽然许多工业集团是在国家羽翼下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几家非常大型、完全国际化的中国台湾地区公司。但是，台湾地区发展的启动，绝大部分乃是由以家族为基础的台湾本地公司，形成了去中心化网络的弹性组合——借以成为位于台湾地区之外国制造厂的转包公司，而且常常是通过中介者所串连的国际商业网络的供应者。这也是为何“台湾制造”（Made in Taiwan）的商品穿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领域。

虽然台湾中小企业借着灵活组织以赢得竞争力，功不可没，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也不能忽视——至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是如此。它是指令和协调国际化过程中的主角：设置了必需的公共设施，吸引外国资本，决定策略性投资的优先顺序——假使必要的话便提高其限制。(p.268) 例如，当政府拒绝丰田汽车 (TOYOTA) 所请求的条件，台湾首度开始汽车生产的企图便告失败。

就像其他小龙的案例一样，强化经济生产力的关键因素是充分劳动力的提供，通过低廉的工资、像样的教育、勤奋的工作和社会的安定等条件的组合实现此目标。台湾地区的社会控制，首先是对任何挑战政府权力的行为进行肆无忌惮地压迫。但是，除了压迫以外，一些决定性因素虽然助长矛盾的扩大，但也同时摆平劳工的要求。政府以贴补健康与教育的方式（但不包括住宅）提供了一个安全网。由政府银行协助的住宅贷款制度，延缓了住宅危机，但危机终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引爆，也启动了都市社会运动。然而，维系社会安定最为重要的因素，乃是由数以千计的小型公司所构成的工业结构本身；许多公司系基于家庭成员和主要的社会网络，有时联结了部分工时的农业活动。在跨国公司当中，多数非技术性的劳动力，如同其他的亚洲社会，乃是受制于家庭和工厂双重父权体制 (patriarchalism) 下的年轻女性。然而，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 (见第二卷第三章)，这点正在改变；在工业起飞的关键时期中，以劳动力的性别划分确保社会安定，乃是重要的因素。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为了抵抗世界市场中保护主义的威胁，以及美国对中共的外交承认后，国际孤立的威胁，国民党政府投入一系列工业的提升及现代化，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此项努力包括开展台湾地区的微电子、个人电脑、电脑周边产业，并且建造了亚洲最为成功的科技园区：邻近台北的新竹。许



多台湾公司成为大型电子公司，如迪吉多电脑公司（DEC）^①及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主要供应厂；而其他公司则联结到国际网络，在硅谷、美国其他地点设厂，自力蓬勃发展。其他工业部门，如服装和纺织，经政府建议以提高产品品质与价值，来克服海外市场经常是以数量计的进口限额。（p.269）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以其在世界市场站稳一席之地，以及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存底，已经成为一成熟、多样化的经济体。台湾公司经由香港特区对中国内地投资，感觉到足能承担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角色（如后所述）。因为工资的升高和台湾劳工组织的增加，以及对来自台湾地区出口额度的紧缩，台湾的最大公司展开了在中国内地及东南亚的生产。例如，台湾是当今世界中鞋子最大出口者，但是台湾地区公司——大部分的制造，却是在中国内地进行。然而，台湾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巩固，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增长，致使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声浪日益高涨，也导致了当本省人李登辉于1988年1月担任“总统”之后，台湾政治本土化的转变。当初国民党为了在台湾及至越过台湾海峡到大陆重新获得合法性统治而开始的发展过程，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工业经济体和富裕、受过教育的社会，

① 迪吉多电脑公司（DEC,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即生产康柏（Compaq）电脑的公司的中译名。

恩斯特与欧寇纳（Ernst and O'Connor, 1992）。

邢（Hsing, 1997a）。

梁等（Leung et al., 1980）；杨森（Youngson, 1982）；基弗（Schiffer, 1983）；卡斯特等（Castells et al., 1990）。

何（Ho, 1979）；杨森（Youngson, 1982）；卡斯特等（Castells et al., 1990）。

高斯（Ghose, 1987）。

陈（Chen, 1979）。

林等（Lin et al., 1980）。

陈（Chen, 1980）。

现在这个社会却使得国民党的统治显得过时了。

香港模式与香港现实：世界经济中的小型企业和福利社会的殖民地版本

中国香港仍然是放任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的历史参考点。尽管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超增长（hypergrowth）经济体中，政府的突出角色相当明显以致无法忽视。而香港却在港府明确的“积极性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政策支持下，以其 20 世纪 50 年代较早的经济起飞，和资本主义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醒目招牌，实现了无国家的资本主义者的梦想。循此，香港的模型得以妥善地幸存到 1997 年。就像俗语讲的，香港社会是在借来的土地上运用借来的时间。然而，仔细分析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香港的经济的发展，揭露了政府为了增长和竞争力而开创环境时，政府的关键性角色——虽然它比起其他三只小龙所采取的干预方式较为隐晦、间接，但是并非不重要。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些事实。在香港自由市场的天堂中，所有土地，除了新界的乡村以外，都是皇家土地，政府只租不卖多年，为了增加公共收入而全面操控土地市场。（p.270）这项土地政策也使政府得以补助其公房（公共住宅）计划（不需成本地提供土地），以及政府开发的工业土地和厂房不必负担利息，于工业化初期提供建造小型厂房，扮演重要的角色。更进一步来看，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1949~1980），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增长 13 倍，而实际的政府支出增长了 26 倍，政府的社会支出部分（包括住宅、教育、健康和社会福利）则以惊人的 72 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 1980 年达 20.3%。而政府占总资本形成的比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间，从 1966 年的 13.6% 增长到 1983 年的 23.4%；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则下降到大约 16%。政府的规



范的重要性超过我们现在的认知。例如，当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一连串威胁到香港市场的金融丑闻之后，它对银行业的影响更至关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在世界市场中为香港经济竞争力所创造的条件。我将简要概述如下。

由陈坤耀 (Edward K. Y. Chen) 针对 1955 - 1974 年间香港经济增长的资源所做的传统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资本和劳动的输入在香港（以及新加坡），较诸先进工业经济体，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也指出出口和国际贸易乃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该项诠释，在林松标 (Tsong - Biau Lin)、维克托·莫克 (Victor Mork) 与何因平 (Yin - Ping Ho) 针对制造业商品输出和经济增长间的紧密关系所做的详细统计分析，也获得确认和延伸。这个发现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但仍不失为深具意义的观察；特别是从 1990 年这个时间点来看，当香港崛起成为金融和高级服务中心，而有些模糊了此地最初繁荣的源头时，他们的研究显示：过去的输出，相较于其他三只小龙，乃是以一种不同模式被集中到相同的少数工业上——纺织、服饰、鞋类、塑胶、消费性电子产品。(p.271) 输出的扩张，主要是由于林氏等人所谓的“因应差异化商品组合的变革”；亦即同一工业部门中生产线和产品价值的改变。在此的重点是香港制造业的灵活性，迅速而有效率地适应了同一工业部门中世界市场的需求。

除了他们适应需求的能力以外，我们仍然需要对这些工业的竞争力提出解释。爱德华·陈的另一个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线索：香港的增长方程式中重要解释变数，乃是香港的相对价格和美国——香港输出的主要市场——的收入水准之间的差距。因为香港制造业的价格水准，主要决定于劳力密集型工业的工资水准。香港公司将工资的增加维持在远低于美国收入的增加——同时还保证提供效率的、熟练的、健康的劳动力。这种能力为制造业输出的扩张——继而是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于是，制造弹性 (flexibility of manufacturing)，以及基于十分低廉的生产成

本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是解释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解释变数”本身，却是特定工业结构和既有的制度性环境之下的结果，它们使经济的灵活性和竞争力成为可能。

一方面，灵活性是一个以小型企业为特征的工业结构的结果：在1981年，有超过90%的香港制造厂雇佣的员工不到50人，而大型工厂（超过100个员工），仅仅占贡献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制造业的22.5%。既然90%的制造货物是做为出口，我们可以认为小型企业在输出方面乃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缺乏可信的资料直接印证，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外国制造商只占香港制造业的出口比率的一小部分（1974年占10.9%，1984年占13.6%）。事实上，香港制造业单位的平均规模在过去不断降低：从1951年的平均52.5个员工，到1981年的20人，其秘诀就在于这些小工厂如何连接到世界市场。不同于中国台湾地区，外国贸易公司在香港并不重要。的确存在早已设立的传统英国贸易“商行”（Hongsg）[如同传说中的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①，或者太古集团（Swire），其中的人物出现在詹姆士·克列弗（James Clavell）的小说中]；但是，他们在香港制造业出口中扮演的角色相当微不足道。根据维克托·西特（Victor Sit）的传统研究，大约有75%的本地出口，是由本地进出口公司所经手。这些小型工厂，绝大多数是小型企业。（p.272）这样的工厂，

① 香港怡和集团，原英国公司，1832年创立于香港的多国公司。在2000年7月24日发行的《财富》杂志，根据1999年度全球企业以美元计价的营业额，公布了全球五百强企业排行榜，怡和集团排名第462名，也是上榜的九家中国公司中的最后一家。

西特（Sit, 1982）；

史基弗（Schiffer, 1983）。

于和李（Yu and Li, 1985）。

香港政府（1967）；茵德考特和柏屈（Endacott and Birch, 1978）；却斯纽克斯（Chesneaux, 1982）；陈（Chan, 1986）。

西特（Sit, 1982）



1977年在香港有14000多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来自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大型百货公司，在香港设立了自己的营业处，便于向本地工厂下订单。因此，香港的基本工业结构乃是由小型工厂所组成，在特殊的基础上——按照专门从事进出口的小型工厂们的输送程序，建立网络和转包。如此灵活的结构——源于1949年中国革命后，在中国香港特区重新落脚的21个上海实业家为最初核心，通过他们的本领诀窍（know-how）和少数家庭储蓄，成为适应世界市场扩张下快速改变的需求的有效的企业手段。但是，这些小型企业如何能够获得关于世界的信息，以提升他们的生产，改进他们的机器和增加他们的生产力呢？香港政府在这当中，扮演了重要，虽然并非决定性的角色。首先，它在纺织工业中，在多纤维协定（MultiFiber Agreement）许可下，整编了出口额度的分配给不同工厂，于是塑造了在工业局指导下的生产网络。其次，它设立了（在20世纪60年代）几个信息和训练中心——例如香港生产力中心（Hong Kong Productivity Center），投入训练课程和顾问、技术的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协会（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则通过遍布世界的办公处促销出口商品，并在香港工厂之间传播信息。其他行政部门，例如中国香港特区投信财团法人（Hong Kong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负责处理一些出口所引发的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调整及提升香港经济，以回应核心市场保护主义的挑战成为必要时，政府指定了一个工业多元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针对香港工业化的新阶段提出策略性的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全面执行。

然而，香港政府对小型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力的重大贡献，在于广泛地介入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领域。此项介入的关键要素是一个大型公共住宅计划——就居住人口比率位居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二大：在20世纪80年代大约为45%。（p.273）虽然这首屈一指的房产在数量上令人震撼，但是他们过

去建造了几个具备都市生活设施的大型新市镇，来改善住宅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进行此计划的升级，拆除、修复老旧建筑，并且为承租户建造新住宅。除此之外，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大众运输、社会服务和补助食物的综合系统，在这几年来引进了地方对于劳动力的间接工资，提供了主要补助。史基弗（Schiffer）统计了在1973-1974年，非市场力量（non-market forces）对于蓝领家庭支出的影响：平均每一户的家庭补助高达总支出的50.2%。于（Yu）和李（Li）估计：对普通承租户的类型转移（transfer-in-kind），相当于家庭收入的70%。就这样，公共住宅以及各种补助，贴补了工人，并且使他们在长时间工作下，不会给他们的老板太多压力——他们大多数没有太多利润来负担加薪。通过将许多照顾劳工福利的责任转嫁到政府肩上，小型企业能全神贯注于具竞争力的价格，根据不同需求来缩减和膨胀他们的劳动力。

香港的殖民地福利政策，确实履行了两个其他重要的功能，直接关乎这个经济体的竞争力。首先，它令工业长时期的和平成为可能，这是在香港劳工阶级社会斗争的历史传统（经常受到忽视）下的一些结果；暗潮汹涌的社会斗争以1956、1966、和1967年充满疯狂暴力的城市骚动浮出台面。其次，它为那些在香港刻画出小型企业场景的低风险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创造了安全的网络。事实上，香港——如同其他各处的小型企业，存在着高失败率：平均说来，一个企业家在七次尝试以后才可望成功。但是，多数企业是从那些以微薄积蓄孤注一掷的劳工开始，依赖家庭的后援，以及公共住宅和公共生活设施的安全网络，来获取他们的机会。一旦他们企业家的梦想破产时，他们能够软着陆于这个安全网络中，重整旗鼓，并且东山再起。于是，社会安定和贴补性的集体消费，缓和了对直接薪水的压力，稳定了工业关系，并且创造了酝酿中小企业家的温床——他们其实是香港发展的驱动力，（p.274）但他们所处的社会和体制



的情况，却是非常不同于密尔顿·费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描写香港经济的小说中所想象的，图 4-2 对于这组关系——根据我的研究和资料，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观照，并深刻地描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和 80 年代中期之间香港的发展过程。

关于 1997 年主权移交的历史性的一刻。在 1984 年的中英协定决议后，香港进入了发展的新模型，同时也被来自世界经济的新的竞争压力与制度性环境的急速转化两者所催逼。它的新经济仰赖三个主要策略性的行动。第一，分散大部分的生产活动于越过边境的珠江三角洲，深化了香港在制造业输出中的作用（见第一卷第六章）。据估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约有 1000 万、或 600 万、或不少于 500 万的劳工，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内部或周围，投入香港工厂的制造业。第二，香港扩张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建立的国际企业中心的角色——利用它灵活的金融政策，极佳的传播通信和企业基础设施以及联系的网络。第三，香港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曾经是，但是这次的规模更大——并且是中国奇迹的一部分。多数在中国的投资，乃是通过中国香港特区流通。于是，香港在全球经济中抢先提高其比重——经由成为中国公司不可或缺的一员，和以其能力做为适应新环境的押注，在隐然成形的中国所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中，繁荣昌盛。可是，中国香港特区能够将自己售予中国内地和全世界，凭借的是过去半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表现——一个尚待证明的、所谓的香港模型的过程，但是却提供了必须从香港现实中学到的诸多发展中的教训。

龙的品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在前面的篇幅中，我斟酌四个地区的特殊发展过程，试图概述其潜在的政治/经济逻辑。（p.276）为了在经验理论化的途径中有所进展，我现在尝试通过聚焦于四个过程彼此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性的思考，并且以此做为线索，来理解在全球经济中促成发展的社会制度条件。



让我们从差异因素开始，我认为每个案例中各自的独特性，不能被认为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首先讨论的是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工业结构。在此我们要特别排除“新国际分工”的论点，即认为边陲地区发生的新工业化，主要是源于核心的多国公司的生产分散化等论调。固然，跨国公司就新加坡而言举足轻重，但是它们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中却扮演次要的角色，并且在韩国及中国香港地区一直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多国金融公司成为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新加坡的工业结构，系以多国公司和国家——包括一些重大的政府所有或者政府参与的公司——之间的直接联结为特点。韩国经济在过去及现在，乃是以国家孕育、支持和指导的韩国财阀为中心；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四个最大集团甚至占了韩国输出的84%。台湾的弹性组织，则是由中小型的家族企业网络、一些大型的国营企业和重要却为数不多的多国公司——不是大型的（美国公司），就是中型的（日本公司）——等三类，混合而成。香港的经济增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都是由本地制造业所推动；它们大多是由殖民地政府妥善支持的中小型企业，政府提供了具生产性的基础设施、补贴集体消费，并且大胆提出巧妙的工业策略。因此，我们可以说既有的工业结构和其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关联。^①

此外，经济中特定部门的表现，也不能做为一个共同的特点。并不是集中关注于工业成效于纺织或电子工业上，就足以解

① 即经济增长并非特别受惠于某种既定的、特定工业结构
吉原 (Yoshihara, 1988)
却斯纽克斯 (Chesneaux, 1982); 陈 (Chan, 1986)
华兹波尔 (Fajnzylber, 1983)
蔡 (Chua, 1985)
高 (Gold, 1986)
科勒与莱门 (Cole and Lyman, 1971); 林 (Lim, 1982)

释竞争力；因为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分散其生产活动到多样化部门。新加坡则是从石油和电子工业开始着手（主要是半导体），继续深化其电子工业的专门化（加入电脑光盘驱动器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的主要生产者；继而是90年代的高级微电子工业，并且将全面范围延伸到高级服务业、金融和贸易活动等。香港一方面加强和提升早先五个部门的专业化：纺织、服饰、塑胶制品、鞋类和消费性电子产品，并且像新加坡一样，增加了行情看俏的先进服务业。因此，四个发展过程的惟一共同特点是：在面对世界市场的需求时，企业和政策的适应性（adaptability）和灵活度（flexibility）。（p.277）但是，此一灵活度，或者由几个部门同时运作（如中国台湾地区），或者由优先部门来接管（如韩国），或者经由提升传统部门来完成（如中国香港地区）。竞争力似乎不是“挑选胜利者”的结果，而是产生于学习如何取胜的过程中。

另外，福利国家透过补助诸如此类集体消费，是城市国家/地区（city-state）——如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在发展上的关键性元素；但是在韩国，却不是那么清楚：国家并没有照顾工人的需要，只有财阀（chaebol）引进了“压迫性的家长制”等元素，如公司住宅（company housing）。在中国台湾地区也不是这种情形，国家致力于减低收入不均，普及国民教育，让市场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使人们相信成果共享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社会安定做为东亚发展过程中一个主要因素的神话，无法经得起检视。新加坡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国家大举压制、禁止独立的多数贸易联盟运动后，才变得稳定。中国台湾地区则是处决了估计大约有1万~2万个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当地人，以及20世纪50年代株连甚广的“白色恐怖”以后，才维持紧张的安定。此外，社会冲突在1977年的中坜事件后再次引爆，而各种社会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并没有危及经济功能。香港长期以来，劳动力维持



相当程度的整合，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强有力的社区运动，创造了今天活跃的“民主运动”的基础，也引起香港政府和北京方面的严重关切。韩国从1960年推翻李承晚的学生暴动，直到一连串的学生示威、劳工斗争（大多数温和而遭忽视）、市民和工人暴动——尤其是最著名的20世纪80年光洲事件，由全斗焕独裁政权所镇压，导致大约有2000人遭到屠杀。韩国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运动在1987年瓦解了军事政权，并且开启了民主的大道。（p.278）政治骚动，以及劳工的每日抗争和强力罢工，挑战了财阀的威权，但是没破坏韩国的经济增长：它以1991~1996年5%和9%之间起伏的年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旺盛的进步。因此，虽然寻求社会安定以及此目标下的部分成果，是四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策略中的基本因素，但却不是该社会的先决的条件。刚好相反：这四个社会都是在社会和政治动荡下，开始他们的发展过程，因此社会里地位高的部分无疑地是被压制、驯服，然后是整合，以便保持一个经济得以增长的最低秩序。而当社会运动再次浮出台面时，经济发展已能适应社会紧张，四个国家或地区得以维持增长、收入重新分配，以及自由民主——除了新加坡外。社会稳定并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社会稳定反而是发展的结果，一个不能断定的结果。

对亚洲发展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些共同性。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想出一个循环性的模式，以弄清楚我们对此发展的新历史过程的理解。第一个共同因素涉及存在于社会中的非常时期状况（an emergency situation），乃是民族与地缘政治的紧张、冲突下的结果。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尤其明显，也应该可以追溯到香港在1949年，急剧转变为中国革命下的牺牲者——大量失去了做为对中国贸易转运港的传统主角，因而为了不致成为皇家预算的负担，被迫以制造业输出做为求生存的出路。的确，正是它相对于中国的角色和经济上的成功，使得香港没有进入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过程；因为无论英国还是中国，都无法

接受其独立。这也是新加坡的情况：首先英国军队防止它被印尼并吞，继而是 1965 年从马来西亚联邦中除名。英国在 1965 ~ 1968 年间任其自生自灭，然后因为支持了美国投入越南战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拯救。东亚地缘政治上的关键因素——相对于拉丁美洲，乃是美国意识到：许多亚洲国家正处于陷入共产主义政权沦为其附庸的险境之中；而事实上许多事件支持了此一认知。基于战略的考量，掩盖了美国对于这个区域所有其他政策盘算，给予亚洲国家在经济运作上相当大的调遣自由。在此情况下，这些国家为了外交及压制国内共产主义，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家”（藩属国，vassal state）——而这也是他们所乐见的。（p.279）假如这四只小龙（包括中国香港特区）的政策间普遍存在着共同的基本特性，那就是在发展过程的开始阶段，我们发现其政策服从于求生存的政治之下。

造成此脉络的另一个成因是，受亚洲冷战的影响，美国和英国对于这些政府及其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的重建和定位，美援乃是主要因素。虽然香港对英国的贡献多于英国对香港，一些至为紧要的功能——如防御——却是由英国承担。而最重要的，香港被允许出口到英联邦，并在保障出口额度上获得英国强力支持，对于早期能够打进世界市场而言，至为关键。尽管新加坡没有得到许多外援，却透过可获利的石油和修船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和在越南的美军打交道，而获得经济上的跃进。地缘政治所提供的基

础，使求生存的政治适于成功的发展中政策。

第二个主要的共同因素是：所有四个发展过程都是基于对外导向的经济，更清楚地说是，他们在输出制造商品上的成功——特别指向美国市场。固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替代政策，对于建立发展过程初期的工业基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他们的高度增长，仅发生于开始保护国内市场时在出口上取得成功。就这个意义而言，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贸易的扩张，和一个新



的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似乎都是这些亚洲小龙无法避免的处境。

第三个共同因素是：没有农村的地主阶级。他们不存在于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在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也被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倡议的土地改革所消灭（或者转变成为工业家）。一个强有力的地主阶级的存在，乃是发展的障碍——因为他们在投资上经常性的投机性格，也因为他们抗拒危害到其社会、文化支配性的现代化过程。这似乎是印尼发展过程当中的障碍之一——直到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国际化中，在国家的保护下绕过了传统农村/金融寡头的利益。（p.280）

四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中的第四个共同因素是：受过教育的劳工的可用性，能在工业升级的过程中再次自我训练——以其高度的生产力和相较于国际标准的低廉的工资水平。整体而言，就工作纪律和劳动需求而言，除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韩国大型工厂中的劳工以外，劳工乃是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下。有纪律、有效率、相当廉价的劳工，是亚洲发展上的基本要素。但是，纪律和效率，并非来自亚洲劳工传闻的天生顺从性（坦白说，这是种族主义者的说词），也不是——用较为时髦的话来说——儒家思想（Confucianism）。儒家思想确实可以解释对教育赋予高度肯定的价值，因此一旦政府提供了接受教育的管道，便出现了高素质的劳工。但是，儒家文化不能解释服从，因为在儒家哲学中，威权必须要合法化，并且通过合法的方式运作，否则就应该予以抵抗。事实上，在中国人民抗暴的悠久历史中，以及在上海、广东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中，都和这种消息错误的、意识形态的说法相矛盾。如前所述，在所有四个国家或地区中，都是首先通过压迫来强加劳动训练。但是，在所有案例中，接踵而来的是强大的社会整合，这点解释了历史上的反抗人士最终却屈从于剥削的情境——在大部分发展时期，这是多数人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特征。在整合的因素中，极为重要的是工人生活的标准的实际改善。美国或日本工人的微薄工资，对于贫穷的东亚国家工业劳动

力而言，却是一笔财富。再者，资料显示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收入不均降低了；而在过去三十年，实际工资却急剧地提高。此外，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中，围绕公屋计划和新市镇而组织的福利国家特殊版本，就改善生活条件以及建立国家/地区的社会控制、政治合法性而言，十分重要。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案例中，相同家庭中农村和都市生活的整合和社会网络的活力，同时提供了抵抗快速工业化冲击的安全网，以及劝阻工人挑战体制的同类团体社会控制（peer-group social-control）机制。于是，通过结合了国家压迫、国家整合、经济改善和社会网络的保护和监控，逐渐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部分由女人所组成），发现其最佳利益，就是满足体制与系统的期望。而这个系统的动力，一如其无情。（p.281）只有在求生存的阶段过后，自发性的社会抵抗开始塑造劳工运动和政治选择，特别是在韩国。

东亚工业化中的第五个共同因素是：适应信息化的模型和全球经济变迁模式的这些经济体的能力，通过技术升级、市场扩张和经济多样化，登上了发展的阶梯。特别明显的是（如同日本的案例，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榜样——除了中国香港特区外），他们意识到了新全球经济的研发和高科技部门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他们之所以强调科学和技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较强烈些，但也出现在城市国家中），乃是由国家决定并执行，但也被工业部门的公司所欢迎和内化。这四个国家或地区，在过去三十年间，过渡到信息化经济的先进生产结构，尽管还保留许多低技术层次的生产活动，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如此。

从一个发展水平转移到另一个水平的能力，从边陲编入到全球化经济，进入到一个在高价值的创造活动中，更为动态、更具竞争的优势，并导向持续的增长，这和那些多数拉丁美洲经济昙花一现的爆炸性增长的特征有很大的不同。

在东亚四小龙的经验里，大部分共同的重要因素背后，似乎存在一个所有共同性中最为重要的：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角色。高



素质劳工的生产力和对它的后续控制，航向茫茫大海的世界经济的策略性指导，引导经济过渡到信息主义与全球化的能力，工业多样化的过程，科学和技术基础的开创，及其在工业系统中的扩散——这些都是关键性的政策，它们的成功决定了发展过程的可行性。政策，当然是政治的结果，而由国家所制定。亚洲小龙的经济成就背后是一条龙，发展中国家的龙，屏气凝神。

东亚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论发展中国家的概念

假如我在之前所描述的东亚工业化言之成理，那么理解这个发展经验，便需要针对这些国家中，发展中国家的形成与干预，进行社会学的分析。(p.282)

但首先，我需要界定发展中国家的精确意义——我已经在关于日本的分析时用过。这是汲取自查莫斯·约翰逊 (Chalmers Johnson) 的概念，而且我也并非不接受约翰逊、彼得·艾文斯 (Peter Evans)、爱丽丝·艾姆斯丹 (Alice Amsdem)，以及在发展理论 (development theory) 领域中其他学者所赋予的意义。然而，我认为，基于我对东亚小龙们的分析，提出自己的定义将是有所助益的，而它亦适用于其他脉络。

一个国家 (state) 之为发展中 (developmental) 乃是其以促进和维持发展，做为建立国家合法性的原则；而发展 (development) 则被理解为：在国内与其对国际经济的关系两者中，结合稳定的高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系统的结构性改变。然而，这样的定义是特别将“合法性” (legitimacy) 的意义，放在既定的历史脉络中来讨论的。许多政治学家由于民族优越感，将合法性的思考与民主的国家联系起来。在这种思考下，当国家相对于 (vis-à-vis) 公民社会建立起领导权 (hegemony) 或共识时，便合法化 (legitimate) 了。但是，此合法性的特殊形式，预设国家本身接受这样的原则，即国家服从于其社会自身 (现在) 的代表/表征 (representation of society as it is)。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已

经企图跳过历史摆脱既存的秩序，并没有认知到公民社会的（过去）所是（civil-society-as-it-was）乃是其合法性的来源。况且，他们并不单纯是赤裸裸权力的机器（apparatuses），例如许多防卫性的军事独裁的情况。最清楚的例子是革命的国家（revolutionary state），特别是那些由共产主义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浮现的产物。他们从未以人民认可的名义合法化，而是以他们所投身的历史计划（the historical project）为名，即使是阶级或民族先锋（avant-gardes）亦不能全然觉察他们的命运和利益。在我看来，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 and 东亚右翼独裁者间存在明显的和有意义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易使我们忽略一些形式的外观之外国家逻辑核心的基本相似性：合法性原则组成政党集团，建构并组织起法规和原则，以接近权力和行使权力。换言之，合法性原则可能代表社会（民主国家）或是代表一个社会的计划（a societal project）而被行使。（p.283）当国家在社会目的的界定下，将本身替代了社会时，这样的—个社会计划涉及了社会秩序的根本转化（不管我们对此事件的价值判断如何），我称之为革命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社会计划重视强调比社会秩序更为广泛的变量（例如，全球化资本主义），而且目的是经济秩序的根本转化（不管公民社会的利益或愿望为何）。我提出这个假设：我们看到的是发展中国家。此社会计划的历史表现，通常是以营造或重新营造民（国）族认同的形式出现，来巩固既有的社会、文化在世界中的民（国）族面貌（如大多数东亚经验的个案）。有时候这些民（国）族的主张，甚至和发展中国家本身政治所及的领土范围不一致：例如，国民党政府是在美国第七舰队所提供的安全避难之下，代表“中华民国”发言。

所以，归根究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对所有亚洲小龙们而言，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竞争力，是他们做为—个国家/地区或社会，求生存的第一步。接着，也就是他们在世界上维护民族利益的惟一方法，亦即摆脱



依赖 (dependency) 的情境，即使以无条件成为美国前线做为代价。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从自在 (in itself) 的政治主体过渡为“自为 (for itself)”的政治机器，是借着坚持称为惟一合法性原则下完成的，而此合法性原则似乎可以不受到威胁，因为国际势力共同看管其命运：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求生存的政治到民族营造的过程

东亚发展中国家在求生存的需要下诞生，接着在民（国）族计划的基础上增长，并在世界舞台中确立了文化/政治的认同。求生存是第一考虑。

新加坡在 1965 年独立初期是个无名小卒——一个被解组的大英帝国遗弃的军事前哨，一个从印尼联邦中分离出来的破败的转口经济港；做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马来西亚驱逐。(p.284) 它是一个承受内部和外部压力的多种族社会，外部压力来自马来亚环境和情势，内部则是暴力的种族、宗教冲突的拉扯，这些冲突存在于大多数的华人与少数回教马来人 (Muslim Malay) 和印度泰米尔族 (Hindu Tamil) 之间。它可能很容易变成另一个斯里兰卡。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领导了反抗英国的反殖民战争；而其首要任务，在于驱逐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的威胁，凝聚新加坡，存活下去。

韩国才从同共产主义的朝鲜战争中存活下来，并摆脱了麦克阿瑟 (MacArthur) 的帝国幻想和战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左右为难的牢笼。在 1953 年，这个国家处于混乱、民族分裂的局面。而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国，仅仅只是美国以战火洗礼下的韩国军队，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间的北亚边境，所建立起的强固防线的上层结构而已。

昔日的中国台湾地区还不像现在这样。它是破败的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堡垒——一个困顿匮乏和恐怖统治的岛屿，由美国保存

下来，以做为抗衡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力量的潜在威胁，和政治立场的宣示。事实上，正是朝鲜战争，使得美国决定在中国地区海峡中划出中线，这个决定拯救了国民党，并且允许它保留了在中国台湾省重建“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幻想——一个并非和华人资本家（他们多数移民到其他地方去了）所共有的幻想。

中国香港在中国革命运动，以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时期对中国提出禁运后，很快地成了时代中的错位。因为和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已沦为走私，于是落入成为消逝的大英帝国最后殖民地一途。中国是否愿意让它脱离控制的基本疑虑，以及工党或英国舆论害怕包括新界在内将会有下一波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使得香港一直怀疑它的命运——当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移民/难民把殖民地当作他们自己的围篱，以逃避革命或是苦难。

国家机器的最先回应——稍晚则成为发展中（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韩国的朴政权、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中国香港地区的殖民地政府）——是要确保由他们所负责的，社会的实质性、社会性与制度性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他们建构并巩固了身为国家机器的自身认同。然而，根据我所提出的假设，他们围绕着合法性的发展中原则，基于特定的政治计划——在每一个案中都有特定的政治行动者，被创造来和他们将要控制、领导的社会决裂——来塑造他们的国家。

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确实领导了反殖民地斗争，但却在20世纪50年代中，和左翼运动紧密地结盟——乃至于共产党。（p.285）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事件，使新加坡国家领导人李光耀相信，他必须压制左派（他的确无情地做了）以确保一个自主的政治计划，将新加坡从殖民地的前哨转变到现代化国家。事实上，人民行动党是沿着列宁主义的路线组织起来的，具有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紧密机制、政党中央集权的形式，并且通过一群训练有素、薪资丰厚、通常是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来直接领导



经济。人民行动党的社会政策——包括公屋和社区服务——目的在于将新加坡复杂的多种族结构，混合成一个民（国）族文化；而在华人中强调儒家文化及中文读写能力，则是有意尝试打散来自不同区域、操持不同方言、依照华人网络而组成的次文化。经济发展乃是一举两得的手段，使得新加坡既能存活下来，又能将自己打造成为新民（国）族（new nation）。

在中国台湾地区，一旦国民党必须接受失去大陆的现实，它就试图将台湾转变成为展示橱窗，昭告革新后的国民党能够对中国人民做出贡献——其觉悟是：失败的经济管理以及贪得无厌的腐化损害了它曾经对中国的政治控制。这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清楚地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国民党尝试洗心革面，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基于此进行土地改革政策、降低收入不均和加强教育。巩固国民党在中国台湾地区权力的重要因素，在于它保障岛屿繁荣增长的能力。国民党认为其发展计划的成功，对于获得全世界华人的支持至为重要，以便将来挑战共产主义在大陆的势力。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是针对那些已知悉的中国人，也是针对中国领导者本身——乃是部分回应了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奇迹的冲击。

韩国朴政权的起源，也能算是溯及到政治行动者的出现，他们不但与殖民地秩序断裂，而且与腐败无能的李氏政权断裂——李氏政权则经历亲日商业资产阶级的余留者，通过美援的国家再分配而获得荣华富贵，尽管国家继续饱受战争的摧残。（p.286）虽然1961年的政变瓦解了张勉短期的平民政府——出自于反对李承晚、学生领导的反对运动——军事密谋者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超过了法律与秩序（law-and-order）的简单反射。政变领导者是一群年轻民族主义者的低阶军官；除了朴少将之外——他在日本训练，且曾在伪满洲国的日本军队里服役。韩国军队是个全新的制度，其组织和增长明显地和韩战有所关联。它从1950年的10

万人，增长到1961年的60万人，成了世界上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专业部队之一。由于美国在韩国军事利益，大部分现代化的努力和援助集中在武装力量。就这样，如果我们不考虑小型学生团体以及更小型的知识圈的话，在20世纪60年代军队的专业训练和组织能力似乎在韩国社会其他部门之上。于是，当出现了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分裂时，在1961--1963年夺权的军官，俨然和民（国）族主义军事政权的“纳瑟拥护者”（Nasserite）^①风格似乎十分接近。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以及对于美国超出地缘政治功能的韩国民（国）族计划所给予的支持，感到不确定，朴政权认定发展中策略是重新营造韩国民（国）族，以及赢取政治自由的工具。

但是，中国香港地区如何呢？香港这个无心插柳但却更微妙的半发展中（semi-developmental）地区是如何形成的呢？殖民地政府如何能够和殖民地命运融为一体？如果这些传统商行（Hong）和新的企业家仅仅关心他们的事业，如果这些英国老家伙终日盘算他们在萨里郡（Surrey）^②的退休计划，而华人工业家则汲汲于他们在加州的绿卡（居留证），一个集体的政治行动者如何能在香港出现，使得它能在世界经济中规划自己以成为繁荣的城市？且让我们检查历史特写中的一些问题。香港的制度性权力，在整个发展过程期间乃是集中在殖民地政府的手中——受英国国会所任命。然而，一旦任命后，总督（Governor）在决定香港地区内政策时，几乎具有完全的自主性。从1957年起，香港预算不需要伦敦的正式批准，于是殖民地便如同自治国家来运作，集中在总督和一群被指派的委员会——由高级文职官员、

① 纳瑟（Gamal Abdel Nasser），埃及军人、政治家，总统（1956--1970）。

② 英国南部环境幽美的郡。

麦纳斯（Miners, 1986）

司、局长 (Secretaries)^① (也是由总督任命) 所领导。(p.287) 政府的执行部门, 依靠一群官方和非官方的成员所组成的立法、咨询团队, 他们大多数也是由政府任命,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改革。这些机关, 乃是由许多训练有素、充满效率的政府公务人员所任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约有 16.6 万个公务人员。然而, 在此一权力结构的形成背后, 根据米罗恩·玛西凯特 (Miron Mushkat) 的经验研究, 亨利·列什布莱居 (Henry Lethbridge) 的历史/人类学专论, 和一些其他研究, 包括我自己的田野调查, 却透露了关于香港真正权力结构一个不同的、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个权力结构的核心, 似乎早就掌握在一小群脱颖而出的公务人员——玛西凯特所谓“行政阶级”——的手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他们都是由殖民地行政公署 (Colonial Civil Service) 从英国最好的大学中 (通常是牛津和剑桥大学) 精挑细选。在 1842—1941 年之间, 香港殖民地行政公署中仅仅有 85 个“预备干部” (cadets) (直到 1960 仍被如此称呼)。即使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大举扩编人员, 包括大量使用华人时, 也仅有 398 个“一般等级的行政人员”。正是这个行政阶级, 以其强烈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

① 英政府时期称为司, 以及次一级的局, 例如, 政务司长陈方安生, 财政司长曾荫权等。

列什布莱居 (Lethbridge, 1970); 玛西凯特 (Mushkat, 1982); 关与陈 (Kwan & Chan, 1986)。

史考特和伯恩斯 (Scott and Burns, 1984)。

列什布莱居 (Lethbridge, 1978); 金与李 (King and Lee, 1981); 史考特 (Scott, 1987); 卡斯特等人 (Castells et al., 1990)。

卡斯特等 (Castells et al., 1990)。

本章节在知识上受惠于杰弗瑞·赫德森 (Jeffery Henderson)、夏铸九、邢幼田、金洙澈 (Jong - Cheol Kim), 而如有诠释上的文误则一概由我负责。至于分析性的发展和资料来源, 可参考杜文 (Dolven, 1998)、多尔布什 (Dornbush, 1998)、赫德森 (Henderson, 1998a, b)、赫德森等 (Henderson et al., 1998)、金 (Kim, 1998)、史丁格利兹 (Stiglitz, 1998)、汤姆逊 (Thompson, 1998)。

内聚力，共享的专业兴趣和文化价值，似乎在殖民地的大半历史中，拥有香港政府的控制权力。他们牢记企业精英的利益——但仅限于那些能够保障中国香港特区经济繁荣的企业——这乃是行政阶级的权力、收入、威信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合法化的所赖。他们的兴趣对于香港未来的影响有两部分：在解除殖民的骚动和英国工党的胁迫立场中，维护殖民地的存在；以及向世人显示，殖民地公署（Colonial Service）——代表大英帝国遗留下来的传统，比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包括新的独立民族国家）更能够保障新亚洲世界的繁荣，包括人民最大范围内的福祉——此种家长制的态度，令人想起“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的历史前例。虽然我在这方面的民族志素材过于缺乏系统而不能下结论，但是这确实让我相信，香港殖民地行政公署精英们的贡献和效能，等于是大英帝国的最后喝彩。（p.288）“香港预备干部”以建设繁荣的香港成为意识形态的纪念碑，做为没落帝国的历史记忆为目的；而他们也在退休后，于英国获得妥善照料。

所以，特定社会中的不同形式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似乎是民族（或城市）营造（或重新营造）过程的工具，并且由政治行动者在他们的社会里自主地担纲上演。然而，这只是因为这些政治行动者能够既动员又能控制他们的公民社会，他们才能执行其发展策略。

东亚再结构中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成功

辨明亚太发展过程的主角（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功的基本问题——假如经由成功，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经济发展眼光的话。为了确认其成功的因素，我必须提出三个问题：（1）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间的关系；（2）发展中国家的内在逻辑；（3）发展中国家和他们社会间的关系。首先，必须谨记，东亚工业化的初期受到地缘政治脉络的特



别眷顾，在其间塑造了这些经济体：亚洲冷战、美国对于这些政权的全力扶持和英国的支持（在中国香港个案中）。然而，我们必须避免左派过于简单地将这些国家或地区视为“美帝的傀儡”：事实上，这些国家通过酝酿他们自身民（国）族营造的计划（nation-building projects），的确展示了他们的自主性。为了了解他们的历史特殊性，我为这一特殊政治形式提出“藩属国家”的概念。

这一概念类似于封建制度的藩属国（vassal state），藩属国，就我的理解是：政府在它的策略施行方面具有相当多的自主性；只要谨守着必须对其“宗主国”（sovereign state）做出特殊贡献的原则。因此，亚洲小龙们的政府，在这层意义上并不是“依赖性国家/地区”——依赖性社会与依赖性国家是由结构-历史的依附理论（the structural-historical theory of dependency）所界定。这些国家面对其所属的全体地缘政治体系而言，只拥有十分有限的自主性，藉此换取他们所获得的保护以及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时相当程度的自主性。（p.289）我认为中国台湾地区——至少要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韩国——至少要到1987年，都是美国的藩属国家/地区；而香港始终是英国的藩属性城市地区（而非殖民地）。至于新加坡，从越战起——包括一些不寻常的情况，如由以色列与中国台湾地区训练其军队——就成为美国半藩属国家。这种藩属的情况创造了一个防护伞，减轻这些国家的许多国防预算的负担，并且在经济增长的关键初期，助其轻易通往世界市场。

解释发展策略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效率的、技术官僚的国家机器建构。但这并不牵涉到腐败官僚制度和廉洁官僚制度间的传统区分。贪污在韩国十分普遍，在中国台湾地区尤其显著，也在香港出现过，在新加坡则较受到约制，但也并不是没有。然而，四个国家或地区却能够以高效率的水准来运作，使用训练有素的公务人员，并且具有随着发展中每一阶段的不同需要而改变的弹

性组织。就功能来说，当贪污阻挠了官僚政治完成其受委派的任务时，贪污只是对效率的一个障碍。以及，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对于公民社会期待公共服务战胜私人利益想要有所担当，贪污就是合法性的障碍。例如，在韩国，贪污乃是由军官和政党公职向韩国工业家强索的报酬，以换来国家朝向发展的目标，创造对这些国家资助的工业家的庞大利益。整体而言，这些国家是较为倾向技术官僚的（technocratic）而非官僚政治的（bureaucratic），因为它们的机器乃是建立来执行一个战略性、历史性的计划，而不只是（但也是）收割独裁政权的好处。

发展中国家完成其计划的能力，当中的另外一个基本因素是：他们将其逻辑强加和内化在社会中的政治能力。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以及执行计划时对于社会需求极少让步的能力，必须从经验性、历史性的术语来加以解释，而不是追溯儒家思想的形上学。

第一种简单的解释是：压迫。国民党通过 1947 年的屠杀后（二二八事件），开始着手对岛屿的掌控。接着建立一个残暴的政治控制组织，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逮捕、拷打和杀害政治反对者。无论从左派到右派，都在共产党的标签下混在一起。在 1961~1965 时期，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清算了所有重大政治反对者，驱逐了主要商业联盟，逮捕对抗的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cialist），导致人民行动党从国际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成员中被除名。香港利用英国部队来镇压 1956、1966 和 1967 年的动乱，保持超过 20000 人、庞大而有效率的警力，对于任何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其危及公共秩序，可以毫不犹豫地当场驱逐到中国内地。韩国，在世界上最有效率、无情的警力庇护下（韩国中央情报局，the Korean CIA），逮捕、拷打、监禁和屠杀政治异议者，同时禁止所有自主性的联合活动，和最为公开的政治活动，直到独裁政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退位。

然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类似的压迫政策时，无论是压制抗议，或者（更不要说）发动社会投入发展途径，少有成功。



因此，其他因素必须能够解释这些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对其社会时，所展露出来的组织能力

一个重要因素是：传统的、支配的社会阶级被政府摧毁、解组或是屈服，除了香港部分例外。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不存在于非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土地改革，摧毁了这些社会里的传统地方寡头（oligarchy），遗留下来商业/工业资产阶级，不过是政府所决定的发展策略中的附属物。因为缺乏资本积累的国内基础，政府角色做为一个进入世界经济的看门人，便使得许多本地资本家完全仰赖进/出口许可和政府担保的信誉。在新加坡，跨国公司很快就理解到，狮城只有在“不惹火”政府的条件下，才能成为他们的热带天堂。在香港，经常发展出一种更复杂的模式。资产阶级——包括传统（英国商行）和新富（上海工业家），和政府委员会进行合作。华人资产阶级必须向政府报备并恪守其指示，才得以留下来经营自己的事业。赛马俱乐部社会性地“黏合了”政治和企业精英——但却是在“预备干部（cadets）”的明确领导下。一些高层政府官员中的要员，退休后成了中国香港特区企业协会的代表，从而建立了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式、却有效果的沟通渠道——在一般是由政府的开明技术官僚（enlightened technocracy）所领导的和谐分工上。（p.291）

至于对待劳工阶级，四个国家或地区设计了整合的策略来和镇压互补；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终则取而代之。所有四个国家或地区都依靠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准的改进——包括促进教育和健康，来满足工人。事实上，这些策略长期以来成效显著。除了改进生活条件以外，也存在着明确设计的策略来进行社会整合。中国台湾地区非常强调收入不平均的降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创造了英国福利国家的亚洲版本，以公屋和社会服务为核心。公房在社会整合中，起了基本的作用。在香港个案中，租赁公屋，乃是赋予大批迁入的劳工阶级事实上的公民身份（de facto citizenship）。在新加坡个案中，公屋/新城镇计划的社会工程，对于冲

淡日常生活中内在的种族紧张，十分重要。韩国对于劳工阶级，采取较为严苛的政策，结果却必须面临今日亚洲中最强悍的劳工运动之一。再者，生活条件的积极改善，富裕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家庭里格外顽强的父权主义，让韩国控制住劳工冲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充分意识到，需要将他们的社会整合到能够和经济条件维持兼容的程度，因为这些条件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是必需的。他们不仅仅是压迫性的专政独裁；在他们的计划中带着——把双边犁头，一旦必要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将它转为利刃。

然而，他们所成功执行的发展过程，不仅转化了经济，而且完全改变这个社会。一个新的、更为独断的资本家阶级，准备在世界中跃跃欲试，在20世纪80年代浮现出来，并且逐渐相信不再需要由技术官僚、敲诈者和政治警察来管理政府。一个崭新、消费者取向、受过教育、和自由主义的中间（产）阶级，认为生活太好了，不必去为一个人造虚构的民族的历史计划而牺牲。以及，一个新的、更有意识、更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工人、学生、市民、女人、环境，似乎开始针对发展的状况、目标和成果共享提出质疑。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最终却引来其统治者的更迭本身的终结，而且也褪去了他们救世主的空想。他们以汗水与眼泪所缔造的社会，确实是工业化了、现代化了的社会。（p.292）但是，当千禧年翻转之时，真正的历史计划，在创造历史的开阔土地上，目前才正要被其市民所塑造。

分道扬镳：经济危机中的亚洲小龙

20世纪90年代后期留下来的经济危机，在我们所分析的四个国家和地区中差别很大。韩国的经济崩溃了；中国香港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之间，股票和不动产的价值损失了大约3000亿美元——约略等于在当地银行的所有存款。在1998年，中国香港特区经济遭逢三十年以来空前的萧条。新加坡则是



经历了缓和的衰退，在 1998 年下滑一个增长百分点中国台湾地区在 1998 年，却持续以大约五个百分点稳健增长。虽然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受到 1999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但是理解他们面对危机更为灵活的弹性（resilience），也许可以开启领悟未来 21 世纪的发展途径。中国香港特区和韩国的危机根源，截然不同。香港不动产市场的崩溃，及其对股市的冲击，对于金融危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韩国，大型财阀的获利发生危机，促使他们冒险借贷外国资金，包括延期偿还债务。然而，在这两个个案中，投机者借着全球资本的资源，动荡不稳的金融系统使其有机可乘，而在通货上发动攻击，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危机。为了简化分析，我将新加坡对比于中国香港特区，然后将中国台湾地区对比于韩国。在香港不动产价格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在私有市场中猛然飙升。在 1990—1996 年间，房屋价格陡升四倍。一部分的原因来自 1984 年中英两国达成协议后，将政府土地拍卖限制在每年 50 公顷以下，除非中国中央政府授权批准。于是土地供给短缺；但同时，因为金融及商业服务在香港景气好转，土地需求快速增加。香港政府于是提高土地价格而从中获利。（p.293）诚如前述，土地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实它已经取代了租金税收。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将其经济形态从制造业转化为服务业。香港制造业者放弃技术升级，而选择了经由境外生产来降低成本，以及投资企业服务、金融市场和不动产。海外华人投资者参与其间，并将香港当成营运的主要根据地之一，而他们也偏爱证券市场。随之而来的是，股票、不动产惊人的升值，吸引了世界各地短期、投机的资本蜂拥而来。然而，香港缺乏适当的金融法规，以及稳定汇率的货币调节委员会系统，局限了政府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因此，1997 年 10 月的港币外流，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只好由中央政府决定保卫港币对美元的兑换维持在固定水准，但是，所付出的代价难以估计。高利率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导致了不动产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损失。

在1998的夏天，香港特区政府试图和投机客的“钱潮”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没有预警下买进、卖出中国香港特区股票，目的仅是为了要对投机客造成惩罚性的损失，挫败他们的动机。但是损失巨大。在将自己转变成金融、服务业经济后，因为顽固地拒绝贬值，相较于邻近国家丧失了竞争力，香港终于尝到不景气的苦果。

在此同时，另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在20世纪90年代却走上一条非常不同的路——一条终究可能缓和金融危机许多震撼的道路。总的来说，不动产价值尚在控制中。居住在公屋的大量人口比例（87%），制住了投机不动产价格的冲击；因为土地为政府所有，一如中国香港特区。但是不同于中国香港特区的是，在政府财政中土地税收极为有限，所以政府对于冒险让自己变成投机性格的地主，兴趣欠缺。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继续仰赖中央信托资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孳息的循环积累，以及庞大、多数能够获利的公共企业部门的收益。实际上，在1998年，政府和政府相关企业，创造了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60%。

除此之外，当新加坡成为主要的金融重镇和高级服务业的经济结构后，（p.294）它仍旧位居制造业中心的领先地位。制造业基本上是多国运作，但是也从政府策略里获得稳定的支持，如同此一章节前面所提。新加坡政府为那些以新加坡为根据地的公司规划了一个策略，使得制造业受雇劳工总数的25%因为生产高附加价值的制品，而大大提高了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借着对金融市场较中国香港特区更为强硬的法规 [特别是在新加坡霸菱（Barings）银行倒闭之后]，不动产价值的严密管制，一个稳固、有生产力的公共部门，以及提供投资制造业、企业服务业有利可图的机会，新加坡并没有遭受像马来西亚或中国香港特区同样投机性的攻击。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和东南亚周围的经济体间的连带关系，引发1998年其经济增长的衰退和缓慢萧条。亚洲金融危机仍然持续在经济上造成相当大的痛苦。然



而，新加坡政府的强硬和果断，以及和多国制造业公司之间的坚实联结，比起中国香港特区毫无束缚的金融市场和正统的经济策略，在新的全球经济的状况下，证明是克服危机更好的条件。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非常不同于这香港和新加坡。他们基本上依靠制造业的竞争力。但是，他们彼此的工业结构差异很大：在韩国的个案中是大型、垂直整合的财阀；在台湾则是灵活的中小企业借着他们的竞争力增长到相当规模。政府控制的原则也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深深地介入了财阀，并且在高度增长时期全面地控制其财务。中国台湾地区政府，则是在技术、基础设施和贸易政策上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如前所述，而让公司为他们自己来制定策略。此外，尽管台湾地区政府拥有、或投入了台湾的主要银行，却很少利用银行放款做为工业政策的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企业家的起步乃是依附供应良好的风险资本市场（venture capital market），将家庭储蓄引导到生产投资。这两个政府在危机期间不同的轨迹，突显了这些差异的重要性。韩国危机始于1997年1月——一个专门从事钢铁、建筑业财阀——韩宝（Hanbo）的倒闭。（p.295）接下来几个月内，一些其他的二十大以内的财阀，跟着宣布破产：三美（Sammi）、真露（Jinro）、大农（Daenong）、双钟（Sangbangul）、獬豸（Haitai）。^①直到1997年9月以前，拖欠的债务和破产高达32兆元（韩币单位），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随后，股价的下跌，以及韩国金融稳定性在国际排比上的滑落，导致被要求收回借款的外国债务人大量逃窜；继而是资本的出走。在花费了大部分的储备金来保护货币后，韩国政府不得不弃守，而韩元也宣告崩溃。1997年11月21日，韩国政府声明无力缴纳国际款项，并且在放弃经济主权下，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① 1963年底创立的韩国食品公司，獬豸是一种传说中的独角神兽，能分辨是非曲直，以角触理屈之人，它也是象征忠心的神兽

协助。就这样，韩国大型公司——不久前，还是全球经济中最凶猛的对手——的破产，爆发了金融与货币危机。三个因素似乎在他们的倒闭中是关键性的。首先，韩国制造业者自从早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大体上已经失去了竞争性；特别是在美国市场。韩国公司因为过高的生产成本，以至于不能与日本、美国，或甚至是中国台湾地区公司的技术水准相提并论，也不敌新的亚洲下一梯次生产者。这个趋势在半导体业尤其明显：韩国公司在记忆芯片上的相对优势（世界市场的 40%），被更为弹性和创新的台湾公司（宏碁、力晶、华邦）所侵蚀——直到 1998 年结束时，它们拿下了大约 9% 的世界市场。汽车公司起亚（Kia），在输出策略上遭受重大挫败。已经习惯于在政府全力支持下增长的韩国财阀，则回应以借贷、投资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但是，韩国政府以及全球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就已经改变了。在金泳三的经营下，经济规划局（Economic Planning Board）被放在财政部里，而失去了引导经济的战略能力。金融系统解除管制，开放了借贷外资的直接管道。金融业务现在已非由国家来介入，而是管制松散的韩国银行。日本金融公司，既然无法在本国获得高额利率，便乐于借款给那些习惯于依附韩国政府保护惯例的财阀。于是，韩国公司的负债/资产比率暴涨，将金融系统推向险路。

第三，并且是引发这个危机的关键因素是：韩国政府态度的改变。这一次，它并没有接济财阀。（p.296）几个财阀因此而产生的违约，使得外国债务人之间陷入信心危机，进而引爆了全面性的金融危机。但是，为什么国家不早些干预，预防破产？首先，最大的财阀已经成为全球中的一员，非常独立于国家的掌控之外。财阀利用金融的松绑，引来之前较国家控制的银行所提供的贷款更多、更为全球性的资源。其次，韩国政府在民主的环境中，对于社会整体变得负有全责，因此局限了其政策调度的空间。财阀与政治阶级间的紧密联结，在民主制度时期仍然持续



着。但这是一种侍从关系，而非国家系统的特点。各种政治派系拥有自己和特定财阀的关系，从而开始从事支持其伙伴的游戏，而不是去维护国家/财阀的整个系统。换句话说，从整合型国家资本主义（corporatist state capitalism），到服务于特定企业利益的贪污政府的习惯，存在着一个变化。缺乏调节，以及政府在金融系统方面的宽松管制（而非过度干预），乃是金融危机破坏经济的重要因素。

因此，财阀在失去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于全球经济中无力继续增长和竞争，也许已经点燃了韩国的经济危机。韩国发展中国家，无法履行一如过去的支持，一方面，这是因为社会动员和政治民主，限制了将国家资源运用于财阀的独占利益。另一方面，因为韩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整合，以及美国压力下金融市场、货币控制的松绑，国家已经拱手让出这些基本的政策工具。于是财阀的需要和国家有限的的能力两者间的空白，遂为炒作性金融流动的全国性旋风所填补，韩国公司贷得了取之轻易的钱。但是，短期、高风险的借贷，这类金钱乃是潜在性拖欠债务的第一征兆。

总之，韩国危机产生于以下因素累积的影响。能获利的大型韩国出口制造业者的危机；韩国金融制度的脆弱；受投机性、高风险外国借款人——特别是日本人——所榨取；以及国家的发展能力，因为民主社会所建立的新约束，和国际（即美国）推动贸易、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因而不断受到局限。（p.297）

相对地，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台湾地区政府在台湾公司竞争力的增长上，扮演次要的角色。这些公司的网络在台湾地区、亚洲和美国（特别在硅谷）中，从一蹶不振的半导体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的确，他们制服了韩国、日本的对手，在记忆芯片、个人电脑、液晶显示屏以及软件产品中，赢得市场占有率。世界上最巨额的台湾外汇存底，吓住了多数投机者的肆虐。然而，新台币贬值了6.5%——恐怕是出于政治谋略，使人民币贬值，以此造成中国经济出轨。但是，日后市场行情却使新台币

升值，这清楚地标示了台湾地区经济基本坚实。实际上，尽管台湾地区的确因为损失了亚洲稳定的出口市场，而蒙受经济危机，却没有太多金融骚动。这是因为不动产市场在资本积累中扮演较次要的角色；银行体系相当程度地与出口制造业者欠缺联系，制造业者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同时，证券市场中的股票价值，主要由其中买卖的公司的利润率所决定。因此，台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案例，以了解遭受外来危机的冲击和产生于国内经济、制度缺陷而自内部酝酿的危机两者之间的差异。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较为软弱，就像韩国的个案一样，因为它必须重视民主政治和旺盛的公民社会；这相当程度降低了其统治政策（dirigisme）。但是，由于企业的灵活弹性，台湾企业不再需要政府。依靠制造商的竞争力以及国内的资本市场，台湾地区经济没有被从全球涌出、不受约束的金融流动所冲垮。因此，金融骚动没有摧毁经济，虽然它确实使台湾地区在东南亚扩大投资与贸易的“南向”（March to the South）政策受挫。

总之，没有轮廓鲜明的模式显现在四只小龙的危机根源中，因为每一个案例看起来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能够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现和极度的干预主义，并没有招致此一危机；因为新加坡证明了有效率的政府干预，能限制住危机的冲击。而中国香港的放松管制的环境，和按照正统经济对策的货币政策，却导致金融价值体系惨重的解体。而且，在韩国个案中，发展中国家似乎从经济管理、（陷入危机的）银行体系的宽松管制中，仓皇地撤守。（p.298）因此，并不是国家的干预产生了危机，而是这个干预前后不一致才造成危机。中国台湾地区统治政策（dirigisme）的“软着陆”（soft landing），和新加坡国家控制的持续性，都避开了韩国国家的混乱撤退，或中国香港特区易变不定的政府干预所产生的陷阱。第二个观察是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制造业的竞争力，持续地是它们相对坚实的经济表现的根基；而香港特区的非工业化，和韩国财阀丧失其竞争力，削弱了它们的经济。



一个先进服务业经济，仍然需要与充满动力的制造业部门有坚实的联结——纵使这是后工业主义的神话。最后，全球性金融流动的短期动乱角色，依旧是危机的最重要来源。而当这些国家降低国内的调节，并且沉溺于容易得来的金钱时，便使得经济更加暴露在其破坏性的影响中。另外，制度的缺点，乃是国民经济面对全球金融破坏效应时的各种不同抵抗的关键因素。做为最后一点，这些制度的缺点，也能被追溯为国家的危机；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似乎和国家及社会间关系的转变模式密切相关。

90年代东亚的民主、认同和发展

1996年8月26日，前韩国独裁总统全斗焕将军，因为参与1979年的政变，以及负责20世纪80年对光州支持民主示威活动进行大屠杀，在汉城被宣判死刑。他的继任者，也是以前的党羽——卢泰愚，主导了韩国过渡到民主，被判至少22年的监禁。通过这个具有高度象征的姿态，韩国民主——在金泳三总统领导下——在对抗独裁者主义政府中，将自己显示出来，不仅是军事独裁者受到审判：独裁政权和韩国企业之间的狼狈为奸，也同样被谴责。八大财阀的首脑，因为贿赂前总统卢泰愚而受到监禁的判决。判决虽然暂缓执行，但是审判已是和过去的断裂。

更大的断裂，发生在1997年韩国激进民主反对阵营中无异议的领导者——金大中于12月被推选为总统。他在混乱中掌管经济，十分具有象征性。(p.299) 韩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和政治控制上，两者都失败了。金大中以一种高度象征的姿态，原谅了前任独裁者全斗焕——他曾经将金大中判处死刑，民主意识强大到足以造就国家和解的局面，也替未来和朝鲜进行最终再统一的民主的民族主义计划 (democratic nationalist project) 预先铺路。但是，这个政治计划的重新建构——与独裁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决裂，需要打击韩国政治的腐败根源。在1998年9月，检察官指控前任政府的全国民众党 (Grand National Party) 利用

税务人员，从财阀中榨取 600 万元做为竞选活动经费。金大中总统要求该政党为其“偷税行为”道歉，却引发新的政治危机。此外，1999 年 8 月，金大中更拍卖了一家已告解散的大型财阀——雇佣超过 250 万名员工的大宇 (Daewoo) 集团，对韩国经济发展尤其具有象征性，为了避免 500 亿美元外债导致无法控制的破产，数以百计的财阀公司被分割及单独出售，仅有汽车和贸易公司得以保有品牌名称。这事件标志着传统支配韩国政治与经济的财阀已然遭遇新的瓶颈。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连串事件中，使韩国政治重心从残余的军事官僚，转移至植根于专业中产阶级的一群清新的民主、政治精英。假如没有社会运动的冲击造成的公民社会转化，这个政治和国家的转化就不会发生。

1996 年 12 月 27 日，成千上万个韩国工人通过不同的形式发动全面性罢工，并持续了几个星期。他们抗议金泳三总统提出的新法，并由政府的议会多数批准，使韩国公司在适应新的全球化竞争下必须对劳动市场进行灵活调度时，依法比较容易解雇工人。工人也抗议工会的主要联盟未被合法承认。经过数周罢工、示威及数度和警察冲突后，工会在舆论和反对派的支持下，获得了承认，和劳动法令上的一些让步。其后，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工会受此影响却壮大了。但是，面对韩国经济的崩溃，在 1998 年他们同意和企业、政府签订社会协定，于是金大中总统才有振兴国家的主导机会。

在 1987 年后，当全斗焕对于民主人士的压力让步，进入了有限度的自由化过程后，四个交杂的因素转变了韩国的国家、社会和经济间的关系。(p.300) 第一个结束军事政权的因素是：公民社会逐渐高涨的坚定自信，强大的社会运动在其间四处蔓延。虽然存在着传统的强悍的学生运动，但是，在他们多年以来和独裁政权的斗争中，激进的学生已经和整个社会孤立开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一个使其重获生机的劳工运动——出自于数以千计松动韩国压制劳工阶级的非法罢工——加入了运动行列。1996



年12月和1997年1月的罢工和示威，乃是工会的力量展现，斩钉截铁地粉碎了政府和企业凌驾在工人上的支配。社区运动——特别是住宅和反对都市更新运动——经常是由教会所支持，动员了韩国大部分重要的都市社会（urban society）。此外，受过教育、优裕的中间（产）阶级渴望在“正常的国家”（normal country）中，过着“正常的生活”（normal life）。总的来说，他们对于改变政治情势有所贡献。第二个因素是：当韩国财阀成为全球化公司后，和政府渐行渐远；他们的获利来源多元化，而对政府所强加的政策产生怨尤。第三个因素是：稳定一个民主的韩国的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就抗衡朝鲜的政治立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当美国和苏联紧张关系消失后，美国军事承诺的地缘政治的理论根据，也就宣告瓦解。198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象征着焕然一新的韩国，向世界敞开大门。

第四个因素虽非众所周知，但我认为却是过去和现在理解韩国的政治动力的基础：政治的区域化。令人惊讶的是，虽然韩国似乎是一个种族上同质的民（国）族，而且在地理上是一个小国，区域认同（regional identity）却是韩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军事政权想把认同融人民（国）族主义计划中，但是对于政治控制却徒劳无功。例如，在1988年，首度民主议会选举，金泳三的政党在他的家乡釜山从16个席次中拿到15席，并在邻近的庆尚南道表现抢眼。他的民主反对运动中的对手——金大中，在自己的区域基地——全罗南道与全罗北道，从32个席次中拿到31席。而“第三个金”——金钟泌，则掌控了忠清南道。至于发动军事政变的政党民主自由党，在卢泰愚的家乡——庆尚北道省，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只有汉城/仁川，由迁入的移民潮所形成的都会人口，才似乎有着多样化的政治选民。1997年总统选举中，金大中的胜利（再度地）乃是立足于他在全罗道压倒性的优势。但是，该次选举中，金大中在汉城/仁川能够集结了广大的支持；特别是中间（产）阶级们，对于金泳三主政下贪污腐

化持续不满。(p.301) 只要军事政权能够容忍多元政治的表现, 韩国政治这种派系, 乃是基于备受地方群众信任的区域性领导者, 以及基于区域认同, 拥护反对军事政权的组织就这样瓦解了军事控制。但是, 另一方面, 它也因为意味着分化而削弱了民主反对运动, 因此破坏了民主人士击败执政党的选择机会。事实上, 此一胶着状态只有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被克服: 当金泳三和卢泰愚携手协力, 让卢泰愚登上总统, 换取对残余支持军方的政客们提供民主的合法性。此外, 地方认同的分裂状态, 对于韩国的动员和不稳定, 持续成为主要的因素。1988 年, 我和金泳三在他汉城家中的个人谈话里, 当时他仍然陈述着民主反对运动的部分理念, 他对我指出: 重新定位韩国的分裂政治 (divisive politics) 似乎是重大的目标。在他的观点中, 将民族主义计划从非民主的军方手中夺走, 交到民主人士中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到那时, 韩国地方认同才能融入到强大的韩国民族认同。但是, 这一民主化的民族主义必须完成一个重要任务: 韩国的统一。长期以来在韩国, 统一确是民主运动的箴言; 20 世纪 90 年代的韩国民主运动仍然受制于如何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辩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计划, 因为在朝鲜这个国家中, 共产主义是较东德共产主义 (举例来说) 更加牢不可破的。但是, 韩国民主运动领袖——金大中及金泳三, 相信统一, 建设 21 世纪强大的韩国——强大到能够在日本和中国双双崛起于世界权力及影响力的高峰而浮现的艰巨挑战中存活下来; 以及, 稳定得足以继续成为新的全球化韩国公司的基地——十分重要。于是, 一旦合法性原则从发展中民族主义转变到以市民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之后, 在民主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民族主义认同的计划, 对于去除从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乃是不可或缺的。^①

① 终于, 2000 年 6 月 15 日金大中与金正日在平壤签署了“南北共同宣言”, 开始历史性互动的和解之门, 这也是重新建构民(国)族主义计划的一环。



认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台湾地区民主政治中的定位和辩论，也至为关键。（p.302）台湾社会总是面临认同模糊的问题——台湾学者夏铸九所谓的“孤儿意识”（the orphan syndrome）。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仅仅在一件事情上取得一致：台湾地区不是独立的台湾，而是中国的一省。但在台湾地区民众间仍存在尖锐的社会/文化间隔。当国民党领导层牢牢地掌握在外省人手中时，这个间隔渗透到政府的各个部门，直到 1988 年蒋经国去世。1987 年解除戒严（深具意义的是，同年韩国开始民主化），乃是在新的历史现实上建立中国台湾地区政治体系的一项成就。1990 年，李登辉——一个出生于台湾、接受高等教育的国民党领导者，被选为“总统”。另一方面，民主运动的重要团体也在向前迈进：主要的反对党——建立于 1986 年的民主进步党（DPP），则高举台湾独立的目标。中国政府则对上述两种政治动向都采取反对态度，并以威慑性的军事行动，强烈反对台湾渐行渐远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再度向中国台湾地区伸出援手，但却是有限度地。亦即，只要中国向美国保持合作的态度，台湾必须行为检点，并保持在政治的不确定中间状态。于是，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重返其独特历史的开端：产生于美国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策略。总的来说，这仍然是完全取决于可预知的未来美中关系。问题是，在此同时，居住在岛屿上的 2000 万人民，已经成为经济动力的发电厂，彻底网络化纳入全球经济中。并且，他们在中国内地投资，对于中国南方的新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台湾地区的公民社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活跃的社区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及男、女同性恋运动（参见第二卷第三章）、重现生机的工会。同时，大众经由独立而其影响力的媒体得到信息，形成舆论。这些社会运动的汇聚，和民族与地方认同（local identity）的追寻，致使倾向独立的民进党赢得了 1995 年台北市长的选举。（p.303）新当选的市长陈水扁发现人们普遍支持他的

口号：“市民主义”（市民的城市，A citizens' city）然而，全国性的政治仍由国民党所操纵：李登辉再度当选任职到 21 世纪的“总统”。主要因为人们惟恐选出亲独立的领导人会激怒中共。但是李登辉的独断，却足以让中国政府将其个人视为对头。此外，1999 年，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运用其个人魅力，批评民进党首次执政一些值得争议的表现，当选台北市市长。但是，比起五十年前，早先在这岛屿上建立的血腥独裁专政，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国民党。它正在国内外追求新的合法性，例如试图将社区运动结合到参与式民主机制的建立。相对地，在争取独立及国家认同的基本教义派，和追求民主及社会改革的社会运动派之间，独立运动却并未真正进入地缘政治上的辩论，从而逐渐分裂。然而，更大的分裂产生在国民党内部。“精省”（实为废省）的专断与急切过程，造成了国民党机器的内部伤害，迫使原来的省长宋楚瑜投入“总统”选举，与国民党的候选人“副总统”连战一较长短。结果，在 2000 年的大选中，这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大政党终于失去了政权。民主选举与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对国（民）族认同的分裂使得在台北市市长连任选举失败的陈水扁，以不到 40% 的多数选票当选“总统”，让他有机会面对中国台湾地区进入新的世纪中，来自历史的、全球经济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政治制度的与公民社会的，多重而棘手的社会转化的挑战。然而对于进一步压缩、乃至解除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则有了趋同的意见。因为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网络，从大到小、如今都已在全球或亚洲经济中，找到了他们的利益空间。政府的经济指导，经常被视为妨碍。而台湾地区的公民社会对政府的要求则是关乎消费和生活品质，而非生产和技术。而且，认同的追求，则逐渐从公共转向到私人领域；从国族（民族，国家）转向到家庭和个人；从达不到的台湾地区文化认同¹⁾，转向到中国入日常的个

1) 指国族主义式的国家认同



人认同^①；这些曾在贫瘠的岛屿上奋斗、求存、生活的人，已经以历史的转向^②为结局了，中国香港特区的未来，更是被深刻

① 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生活层次的认同

② 此处的历史，即指前述认同的转向

蔡 (Chua, 1998)

我的中国分析主要来自两个一手资料的观察。第一个是我 20 世纪 80 年代亲自在中国访问和田野研究。1987 年与马丁·卡诺伊 (Martin Carnoy)、帕翠欧·毕区 (Patrizio Bianchi) 共同做的田野调查特别使我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重要的了解，主要是受国家科技和国际经济咨询研究所的邀请来研究科技政策和经济现代化。我们访问了中国的政府官员，中国工厂的管理者，美国和欧洲公司的经理人，以及北京、上海、深圳、广东等地的地方和省的代表性人物。我们研究的结论请见毕区等 (Bianchi et al., 1988)。但自那时起中国已经改变了很多，这就是为何我必须依附第二个一手观察资料来源：1992-1997 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邢幼田教授在整个中国所做的田野访问，主要的地区是广东、福建、上海、北京等。部分关于她个人的观点，请见邢 (Hsing, 1997, 1998)。我也参考了许多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发展的资料，仅抄录部分文献为例，一本杰出的事件回顾整理可参考林 (Lam, 1995)。有用的新闻和经济评论，见《经济学家》1996 年 8 月 17 日，以及欧弗雷特 (Overholt, 1993) 综合性的历史报道，见史宾塞 (Spence, 1990)。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经典之作是沃德 (Walder, 1986)，循此要了解近况可见沃德 (Walder, 1995)。海外中国企业的网络除了邢 (Hsing, 1997a, b) 之外，可见《商业周刊》1993 年 11 月 29 日 (特别是《亚洲财富》的报道)，还有可立弗 (Clifford, 1994)，汪和诺尼尼 (Ong and Nonini, 1997)，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见金和林 (Jin and Lim, 1994)。关系和非正式网络，见杨 (Yang, 1994)。中国的财经政策和中央地方关系，见沃德 (Walder, 1992)，中英文兼具的特别选集，讨论新中国资本主义特色，见邢 (Hsing, 1997a)。

而有关三十年前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憧憬，我建议阅读沃德和关 (Walder and Gong, 1993) 翻译的文集。与撰写此章节有关的其他参考资料：格林尼克 (Granick, 1990)、纳坦 (Nathan, 1990)、怀德 (White, 1991)、麦奇 (Mackie, 1992)、鲍尔斯和怀德 (Bowles and White, 1993)、陈 (Cheung, 1994)、纳顿 (Naughton, 1995)、戴木进 (Yabuki, 1995)、李 (Li, 1996)。

转引自林 (Lam, 1995: 12)

转引自林 (Lam, 1995: 5)

地织入历史的模糊性中。它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终将是中国非常特别的一部分。一方面，这是因为它将继续扮演多年以来的角色：中国和国际经济间的主要纽带，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企业学院和测试场地。但是另一方面，也因为20世纪80年代期间，香港成为活跃的公民社会；其中社区运动和大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民主价值。成千上万的专业者离开香港，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追求他们的天堂。其他数以万计的人们，持有外国的居留证或护照，往返于香港有利可图的工作与家人在加拿大温哥华或澳大利亚帕斯的新居之间。但是，香港人多住在特区内，(p.304)而本地和多国企业则在中国香港特区产生联结，因为中国香港特区至今仍然是（并且将来继续是）全球经济的主要节点——即使在它重创于不动产和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特区人的前途固然称不上稳定，但他们的认同却是有把握的。他们是新中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个由中国制造的企业与区域社会的跨国网络（transnational networks），由一个国家/省/地方政府的繁复网络（a complex web）所管理，并且与之互动。而他们也必将一并分担中国的未来。

我们故事中的最后一只小龙——新加坡——困惑着我和其他所有人。不像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新加坡在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公民社会，国家似乎仍旧一如往昔般地强大、活跃，即使有相反的看法表达出来。权威主义政治的运作和信息控制，就像对新加坡发展的掌握和监控一般。政府继续与多国公司密切往来，如同三十年前的情形；但因为变得富足，它如今也运用自己的资源来投资公司——不是通过本身，就是以合资企业来进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如今已超越欧盟平均值。这个城市国家，以整体性计划的都会系统、顺利地运行。这个岛屿，是最早使用光纤完成全面连线的国家，并且预备成为第一个禁止吸烟、禁用毒品的国家（贩毒要被判处死刑，而且是经常执行）。城市一尘不染：当街乱丢垃圾将被课以重罚，而且罪犯将穿着绿色



制服，在媒体曝光下进行社区劳务。政治和文化的分歧，被维持在最低限度，因而没有必要诉诸暴戾的压迫行动。虽然存在形式上的民主和象征门面的反对党，然而，当反对的领导者揭发政府滥用权力时，相关的政府官员便在法院中控告他，而法院则负责对这个敢于批评时政者处以重罚或监禁。种族之间的张力被有效地控制。新加坡和周围回教世界十分和谐地共存，虽然全体人民持续被编进武装的民兵部队，并且新加坡空军经常处于备战状态，以便针对仅数分钟之远的大城市进行报复性轰炸的飞行计划。李光耀的崇高形象，尽管不再担任总理，却持续渗入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他成功地开创了一个脱离无名之地的社会，并且使之成为“亚洲价值”（Asian values）优越性的历史证据——一个可能是他在牛津学府的岁月中，一个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梦想的计划。（p.305）实际上，他再度发现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崇拜其品行道德，执著于其洁净无瑕，痛恨不当的贫穷，相信教育，以及少数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天生优越性。他增加了高科技的花样，实际上是为支持某些种族的生物优越性，建立科学基础的研究；这并不是基于种族，而是基于阶级。他的信念直接塑造了新加坡的政策。例如，在新加坡接受大学教育的女人，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特别准许可以尽其所能地生育，以及得以告假在家教育其子女；而劳工阶级的妇女，则因有过多孩子而被罚款。以上目的在于透过增加儿童出生在受过高等教育家庭中的比例，来改善新加坡的人口品质。整个新加坡乃是基于最适者生存的简单原则。国家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新加坡能够在对抗全球经济的无情竞争下，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用科技、社会工程、文化一致性、人类血统的自我选择和冷酷的政治抉择等等，来获得生存和胜利。人民行动党执行了这个计划，并继续贯彻——依照李光耀以身为劳工律师在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抗争岁月中所了解并赞许的列宁主义的原则。而事实上，这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真正列宁主义者的计划，比起它的原始组织更为持久。新加坡代表革命的

国家在构筑合法性、控制社会和调节经济的过程中，与发展中国家融为一体。它也可能揭示了 21 世纪的成功模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追求民（国）族主义计划的发展中目标时，有意识地寻找的模型。

正当大多数的亚洲小龙们，以及新兴工业化的邻居——除了新加坡以外，似乎都处在发展中国家的龙被处以斩首的过程当中时，一条大得多的龙（记得龙是中国神话中有益的动物），却出于千年的孤寂，试图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无论是好是坏，它肯定永远地改变了世界。（p.306）

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 发展中的民族主义

邓小平在 1994 年说：要做到经济建设的政策决不改变，改革开放政策不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我们必须谨记前苏联的改革教训，处理好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路线，中国共产党做为党的领导地位永远不会改变。

江泽民在 1990 年说：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开创世界新局面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马克思主义。（p.307）

新中国革命

中国，打破千年来绝对或相对的孤立模式，谨慎地将自己 and 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在“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全世界中最快速的。其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也让各国政府或厂商们感到吃惊并产生矛盾复杂的感觉。一方面，按照西方国



家的水平稍微减少一点需求，12亿人口的市场都有可能使得生产过量的危机扩散一段很长的时间，并将新兴的全球资本主义冻结进入21世纪。从更宽广的观点来看，与此具有特殊文化传统的古老文明互动逐渐增加，一定会增加精神的丰富性和互惠的学习。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做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出现，特别使得亚洲和其他地区，如美国，非常严肃地担心一个可能的、新的冷战一触即发，并使21世纪陷入危险当中。另外，也有些观察家担心，一旦亚洲经济危机拖垮中国内地、贫穷和失业点燃社会抗争和政治变动，中国将陷入长期的混乱和内战。但是，不论这些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看法和感觉为何，我相信其中有很多人对中国内地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特色必定有很深的误解，(p.308)形成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错误的推断。在以下有限的章节中，我将在下述前提下试着提出不同的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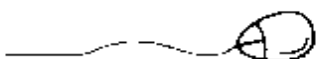
此前提是：中国的现代化和国际的开放政策，迄今，一直都是在共产党领导者的设计和管制下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国家政策(state policy)。这是邓小平的成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毛派斗争胜出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反对自由改革派而提出的。邓小平死后党内没有发生明显的斗争和内在冲突，江泽民为维护其自身的领导地位，继续坚持邓小平的领导中心和谨慎的政策。因此，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定位和发展必须理解为一个特殊的政治计划，是以共产党利益出发的，也如其所宣称的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策划与执行。而且，为了要更了解此利益的内涵，必须记得中国的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具社会主义特色的民族革命。由于腐败且不得民心的国民党无能抵抗日本军队的入侵，使共产党的主要力量人民解放军获得增长和影响的空间，并服从于毛泽东的领导魅力。在西方联俄抗日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终于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关键（虽然国民党在1945~1949年曾获得美国的帮忙）。在毛泽

东的想法和共产党实践里从未想过中国革命是一场联合阶级阵线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主的革命”。它动员贫穷的农民反对腐败的都市世界里的买办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这场革命里几乎没有出现，理由之一是中国尚未工业化，当时工业人口的比例非常少。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民族主义基本原则，但显然不能用它的专用术语来理解20世纪中国复杂的阶级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中国抵抗外国势力与欺侮的重要武器，包括给予中国共产党重大支持的苏联老大哥在内，苏联也发生了加强农村结构的分田地的农业改革，排除了可恨的地主，而非为难富农。分田地的农业改革和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两条腿走路”，但是脑子、发动机和弹药都深植在共产党内。(p.309) 因为它是共产主义，亦是列宁主义，它将“社会主义”的特色烙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上，进行一个新国家 (state)、新经济和新社会的全面建设工程。像苏联一样，党拥有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中央计划体系控制经济，通过严密的思想机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并严密控制信息和传播。政治体系也是依循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传统，由党通过人民委员的政治网络控制政府机构的各阶层和分支，包括军队在内。此权力系统的核心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至今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共产党也是个强大而绵密分散的政治机器，全国每个乡村、邻里和生产单位形成一个巨大的阶层性网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能够实际控制达到最偏远的地区。然而这并不是人人皆知的旧闻：1998年，依然还有5400万名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 (CCP) 党员，而地方领导和干部在他们的辖区内，即使不见得孚众望，仍旧享有最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就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条件和环境的根本事实。论及中国个人式领导的历史连续性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此共产党的特色太具中国色彩。中国共产党个人式的领导对政治自愿和服从有很大的帮助。只要

是领导所决定的就会变成重要指挥命令、系统实质的力量，穿梭回旋在社会和权力中心之内。这是我们惟一可以解释有巨大破坏力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大胆的冒险活动，由毛泽东决定和主导，反对党中央的集体领导，(p.310) 指派他的“红卫兵”，以人民解放军为靠山，砸烂了主要目标的共产党干部和组织。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其自我毁灭的运动（主要是毛主义）后存活下来，显示其较其他社会主义经验的国家有更强大的政治实力。毛主义者一点也不愚蠢。它在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供解答：要如何使中国强大、独立，在世界列强势力中继续保存共产主义的力量，而这些列强在中国的彼端正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力量快速前进。自 20 世纪 50 年代，邓小平和刘少奇回答这个问题是，追随苏联的模型加速工业化、经济增长，以及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惟一可用的模型。毛泽东自己的答案则是，自力更生、强调思想教育、保存农村文化、分散化和用游击战（“人民战争”）打击任何入侵者，以核子武力做为威吓的最后手段（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巅峰的时刻，毛泽东曾认真论及要将社会主义建立在以核子摧毁资本主义之上）。处在中间，周恩来获得主战派的同意主持一个中立的计划，目的在保存科技—军事的复合体以捍卫中国的独立性。结果此科技—军事复合体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得以幸存没有遭受毁灭。打倒“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在其家乡的文化大革命中活过来，并重新获得权力。他回到其基本主张，认为经济繁荣和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强大和独立的根本基础。经过如此残酷的意识形态恣意放纵，惟有快速改善生活条件，下放财权，提供生活会更好的展望，一个改革的共产主义政权才能重新将中国团结起来。如同邓小平于 1990 年在十三中全会后说的：“如果经济能够进步，其他的政策就会成功，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也会增加；否则，社会主义，不只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都会面临危险。” 1978 年，中国的对手苏联，其经济明显走下坡，而环绕中国的亚太，

尤其是华人经济体、史无前例地快速增长和现代化。(p.311)因此,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央委员会做了令人侧目的转变,于1978年北京寒冷的12月,保证中国全心投入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信息化模型(虽然开放政策和“四个现代化”政策并没有宣称或明文规定此事),以亚洲的四小龙的经验为教材。然而,这个将进行的新发展道路会继续维持“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权力、控制和影响力,也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在此意义下,它和戈尔巴乔夫在七年后于苏联进行的改革有根本上的不同。戈尔巴乔夫的傲慢完全无法想象为何会失败,和此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深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要放松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因此社会和变迁都得以脱离轨道、置身事外地朝“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邓小平和他身边的人对此理念深信不疑,而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命运,或至少他们的观点,证实了这个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模型”会如此受到中国领导者的欢迎。这个模型的构想是可以不顾来自公民社会的压力充分地进行和发展经济和技术,以及稳定地在国家的手里调遣斡旋全球竞争的能力。但是,城市小国新加坡的经验几乎不可能推广到一个拥有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大国,而苏联由共产党统治过渡为资本主义又以灾难为终结。这就是为何中国共产党的掌舵者,在未知的历史洪流中,如此谨慎和务实的原因。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并不是依照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临时性蓝图,而是许多不同的行动者所作的一些特别的决定以及经济改革政策所引发和显现的各种利益、冲突、妥协和联盟的结果。

总而言之,在新的全球经济架构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施行的,并且成为展现国家权力不可或缺的工具,及共产党的一个新的合法性原则。(p.312)以此看来,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和革命国家的历史性结合。为了要符合此项计划的目标,中国共产党20世纪90年代在邓小平、江泽民和朱镕基的领导之下必须处理



一系列艰难的困局：整合融入全球经济的政策；掌控分散化的国家权力；处理因农村移民和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控制浮现的公民社会；制衡权力精英分子的权力和影响力；保持意识形态现状，避免引起军队和政党的派系激烈的冲突。我将简述这些不同的议题，并将我的论点建立于一个可以包括以下的假设：即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平衡措施都是有脉络可循的理性的运作，但并不一定有成功的机会；集区域的发展中国家（regional developmental states）和可以强大中国力量的民族计划（nationalist project）二者之力，期能永久从外国敌对势力下解放。资本主义，或是命运未卜的民主，甚至在这过程中的权力精英新获得的丰盛的财富和声望，都只是为了达成根本目标的手段而已。

关系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中国

中国整合于全球经济中，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个错误的注解：也就是经济特区的政策。它创造了四个加工出口区，^①直接面对着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目的在于提供廉价劳动力、土地、租税减免及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社会

① 即1979年开放的四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邢（Hsing, 1997a, b）。

杨（Yang, 1994）

邢（Hsing, 1997a, b）

林（Lam, 1995: 88）

转引自林（Lam, 1995: 132）

林（Lam, 1995: 94-95）。

钟（Cheung, 1994: 26-39）。

陆（Lu, 1994a）。

陆（Lu, 1994b）。

引自陆（Lu, 1993）。

引自邢（Hsing, 1997a）。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1998: 64-66）

训练，以做为一个出口的平台。这些地区被设计为和其余的中国领土实际地和合法地分离，因此社会主义不会被污染，中国工人将被送到这些地区。在这个计划中，经济特区将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产生税收并为中国提供珍贵的专业技术。基本的计划是创造四个、然后许多个新中国小龙，但这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并且是为了全中国的利益。但最后并没有都成功。1987年我在这些议题上和中国的中级官员访谈，并理解了他们基本的错误：他们阅读并相信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新国际分工理论”，并渴望向多国公司提供一小部分中国劳动力，以便换取技术转移。(p.313)然而如同当时我对他们解释的，当多国公司能在各式各样政治环境里特别是更有利的发展中国家里获得类似条件时，他们没有兴趣为了寻找廉价劳动力和租税减免，而进入对其政治不清楚及基础设施匮乏的中国。多国公司的目的是要穿透中国这个市场，扩张散播未来投资的种子；为此它们需要充分地进入中国，超越有限的经济特区范围，他们需要在完全免除或大幅减免的关税下输入本身的供给，而且它们也需要自由地创造自身的供给和分配网络。总之它们要参加中国的经济而不仅是为了出口的目的而使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他们明显的企业要求给谨慎的中国领导人带来了麻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外国公司参与中国的竞争条件下，保护可能被取代的国有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输出制造的商品并且输入技术和诀窍，而不只是让外国生产者接手中国的工业，或任由外国产品在中国市场泛滥。因此尽管中国政府在14个沿海城市政策下，正式对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中国大部分的都市——工业区域，并限制规定各种繁文缛节，确保这样的过程是在政府控制下，多国公司则藉由抑制投资、保留技术和直接与政府谈判市场股份来回应。在我1987年对位于上海、北京的美国及欧洲公司的访谈中，他们描绘了做为技术和经济落后的海洋中工业孤岛的运作，其中部分公司进口了多达90%制造其产品所需要的投入物品，没有任何



东西是赚钱的，所有都是在将来机会的期望下进行资本投资和转移老旧技术以换取在中国的立足。之后情况改变了，日本、美国和欧洲公司的生产大量增加，特别经由政府指定的高技术市场以及由省级政府保护的区域性市场（例如上海的大众汽车（Volkswagen）]、一些象征性的协议，例如通用公司1994年的一个10亿美元投资，反映出政府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决心。然而至少直到90年代中期，多国公司和西方及日本的投资不是中国和全球经济之间的主要联结。的确，如同表4-1显示，在1979-1992年间，在对中国的1164亿美金投资中，71.2%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7%来自美国，5.8%来自日本，个别欧洲国家的投资份额更低。（p.314）同样地，只有一小部分的中国进口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国家。另一方面，不计入武器销售，中国的一大部分出口（来自中国厂商或在中国合资的公司）系输出到西欧和美国。的确，和中国进行一个比他们和任何其他国家更大的贸易赤字，美国似乎处于险境；但是中国的新竞争优势并非来自其无效率的国有企业，大部分也不是来自其依然幼小的私有部门企业，它是由和一种特殊的制度性伙伴合作的海外华人投资者组织起相关投资、诀窍和市场技术（参见下面），建构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和全球经济之间的基本联结。

中国的全球整合的种族联结性（ethnic connection），的确是一个充满实践和理论涵义的特别故事。但是如同邢幼田所做的，它必须避免许多对在“中华经济圈”（China Circle）中运作的“华人企业网络”进行的乡镇企业研究所特有的浪漫化和轶事性的证据。（p.315）这些种族企业网络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相当重要，但是他们是利用开放政策所提供的机会来到中国的。在中国的投资是高风险的，但是要是知道如何在一个复杂环境中运作，就能以微小的劳动成本在大幅未开发的市场中得到很高的利益。当母国的生产成本较高以及他们输出额度的减少危及他们的竞争位置时，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投资者利用开放政

表 4.1 1979~1992 年中国的相对海外直接投资来源
(百万美元, 括弧内是百分率)

	1979 - 1990	1991	1992	1979 - 1992
全国总额	45244 (100)	12422 (100)	58736 (100)	116402 (100)
中国香港	26480 (58.5)	7531 (60.6)	40502 (69.0)	74513 (64.0)
中国台湾	2000 (4.4)	1392 (11.2)	5548 (9.4)	8968 (7.7)
美国	4476 (9.9)	555 (4.5)	3142 (5.3)	8163 (7.0)
日本	3662 (8.1)	886 (7.1)	2200 (3.7)	6748 (5.8)

在 1979~1989 年之间, 中国的相对国外直接投资是 32.37 亿美元, 而实际值约为 15.61 万, 占相对直接投资值的 48%。以此值推算全国投资总额中中国的国外直接投资额于 1979~1992 年间约为 56 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 孙 (Sung, 1994: 50)

策分散他们的生产, 特别在珠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南方的其他地区。为了使风险减到最少, 他们使用他们的关系 (guanxi, relationship) 网络, 特别寻找来自相同出生地的人 (同乡)、他们的亲戚或朋友或熟识方言者, 建造支持国际联结性所必要的基础设施 (旅馆、商务服务、机场、道路、房地产开发), 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很早就进入这种投资的港商, 创造了即刻的市场 (早在 1983 年我在广州就享受了香港企业所开发的国际旅馆服务)。如同在第一卷第六章所分析的, 包括大约 6000 万人口的中国香港特区—深圳—广州—珠海—澳门—珠江三角洲的巨型区域, 90



年代初期建构了 21 世纪有潜力的全球节点之一。为了不甘示弱，上海在北京政治精英的协助下，在 90 年代初期发动了浦东新区的开发，准备成为中国主要的金融服务中心。

当 80 年代后期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网络建立之后，资本从全球流入，大部分是来自海外华人，来自新加坡、曼谷、檳城、吉隆坡、雅加达、加州、纽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统计数字上表现突出的中国香港，事实上是海市蜃楼，因为它反映的是由立基香港的华人公司对多重投资来源的管理。它应该被理解为“全球资本”。但是尽管特定市场和计划的激烈竞争状态，这样来自从日本银行到洗钱者的任何来源的“全球资本”可能而且是由通常以家庭关系以及之间的互相联结为基础的华人企业网络来管理并大幅地控制。为何华人企业相较于其他外国投资者拥有优势，为何它不像西方或日本投资者，在中国不确定状况下面临那么高的风险？阅读了杨对于当代中国的农村人情与都市关系习惯的出色人类学报导，我对关于局内人知识和个人联系的文化性解释产生怀疑，毕竟看不到任何和我对于拉丁美洲类似习惯的了解有显著的差别。（p.316）而美国投资者已支配中南美洲经济好几十年。即使我所知道最强调关系取向的国家之一的墨西哥，也在 90 年代得利于一阵不大需要墨西哥调节的国际投资风。然而墨西哥的企业网络不对墨西哥投资而持续输出他们的储蓄。在中国的案例中海外华人企业网络的确是包括海外华人资本的全球资本和中国的市场及生产/输出地点之间的主要接口。但原因并非他们和他们的中国南方伙伴都喜欢清蒸石斑鱼，而是因为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复合联系（multiple link）是地方性（local）的，亦即它是透过海外华人企业和中国地方与省级政府间的联接而运转，邢幼田称之为“官僚企业家”的自成一类的资本家阶层。

中国的区域发展与 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家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他提出了因地制宜（“地方各自依其自身特性”）的原则，在 20 世纪 80 年代间做到相当程度的财政权力下放：中央政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37% 下降到 1992 年的 19%，而中央政府的总体税收收入在 1993 年只达到 35%。他特别夸赞广东和上海做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历史性连接作用。1992 年他进行著名的南巡，特别是鼓励广东借着加速其增长率与对国际经济的开放以超越亚太小龙，他说“发展是硬道理”。广东、上海及其他省份地方听从邓小平的话，并宣称它们在财政措施及信贷政策上来筹措本身基础设施资金、创造新产业及吸引外资的经济自主性。经济过热和接着在 1988、1992、1993 年的通货膨胀冲击，使中央政府加紧调控并通过在 1993 年设立一个由中央政府保有自身税收来源的双元税制。如果说邓小平想要灌输集体企业主义（或许对实用主义者的他而言是太复杂了）的话，那么他是成功的。中国的省级和地方政府（为了简单起见我在下面以“区域”的标签概括之）经常与外国投资者合资，投资于新市场导向的产业并成为“私人”资本累积的来源，就像分享其企业获利的集体企业家那样。在 1993 年国营企业（全民所有的企业）占了工业生产总值的 48.4%，私营企业（包括国外参与的企业）仅占 13.4%，而“集体企业”（为特定政府当局参与的企业，他们许多是区域的及私人的投资者）占了 38.2%，并且还在增长。此外，工业生产并非区域政府和最常是海外华人的外国合伙人的主要投资部门。房地产开发是这些外国投资者的切入点：一个提供较低风险



的直接收益的国家，使得它的沿海地区马上变成了巨大的建筑工地，并提供进入本地网络的稳固关系。此外，对本身土地的控制是地方/省级政府一个确实的资源，财政也是强化地方自治和采取现代经济管理的关键部分。早在1981年广东省政府就展开了大胆的财政实验，人民银行广东分行得到使用特定数量资本和发行中短期信贷的自主权。广东省自己的财政机构——广东发展银行在1988年被批准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广东省也被允许发展股票和证券市场，建立了外汇调节中心并操作外汇户头交易。广东省也能够取得外国借贷并经由中央批准对国外发行自己的债券。(p.318) 当中央政府在1994年紧缩金融时，广州市政府开始从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通过广州的合资企业外国合伙人，或经由市政府拥有的广州国际信用投资公司和中国香港特区的越秀企业。在1994年6~11月的国家紧缩措施期间，广州的六个外国银行对本地企业提供了38亿美元的贷款。除了对国外贷款外，广东也吸引中国其他省份的资本。于是当许多区域在90年代中期为宏观调控感到苦恼时，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和乡镇持续其扩张计划，用债券和贷款融资而运转了比由中央政府计划所允许的高出五倍的预算。在经济过热问题的争论中，一个珠江三角洲城市东莞的市长指出“如果我们步伐谨慎，那珠江三角形如何能赶上东亚四小龙？”在一个由中国口号制造者所显露的快速吸收市场原则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钱往利润跑”的原则下，广东的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惠利率（18~20%，比四川或湖南省高出8%）吸引投资；只有通过这个对外的金融资源管道，广东、上海和中国其他快速增长的地区才有办法隔绝中央计划系统的经济控制。这个中央计划系统仍然适当，但其主要角色是资助无生产力的国营部门，和确保对中央的优先事项提供足够的税入。这些优先事项是技术和军事的投资，和国家及党机器自身的再生产。

通过和这些类似的过程，一个新资本家阶层已在中国出现

了，主要由“官僚企业家”（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也就是由他们对政府机构和财政的控制所产生并利用其资源管道的个体所构成。他们自己联合其他官僚或逐渐结合起外国投资者，投资于他们代理的政府机构所代表的企业，而这些混合企业成了中国新市场经济的核心，（p.319）这是高度分散化的市场经济，因为它跟随省级和地方联盟以及他们所联结的企业网络的轮廓，一个在本地市场由少数买方控制的、在国家和国际的层次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也是一个知道它必须产生足够剩余来满足其对于不直接涉及经营的政府高层和在地方/省级企业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的要求。这个“官僚资本家发展”（Bureaucratic capitalist development）过程，在90年代中期受到国家的监管，然而，它变得越来越难以达到政治控制而不引起混乱的目标。主要由于三个原因，首先因为资本积累的核心主要在这些星罗棋布的省级/地方企业中，并直接联系到国外市场和金融来源。第二个原因涉及成千上万个来自中国任何地方使用信息技术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进行买卖的股民（“疯狂股票投机者”）的快速增长，他们往往调动资金并绕过政府的控制。而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权力平衡已采取一个在中央和区域之间，经由党和军队相互连接起来的互赖性的复杂模式。中央决定削减地方经济自主性的任何意图，特别是面对富有的省份时，不仅能使经济改革（基本上基于省级政府的资本主义）出轨，并且能在中国国家权力旗帜及邓小平“致富光荣”口号下，引起对改革开放的共产主义国家所达到的脆弱现况表示疑问。

安然度过风暴？亚洲经济危机中的中国到了1998年底，仍然在经济增长的路上，大约年增长7%。然而增长主要有赖于大量的政府支出，以刺激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的经济。物价在1999年秋天连续23个月持续下跌，1999年出口下降了5%，贸易顺差减少了60%多。然而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80亿美元，外汇存底仍在1500亿美元，政府的债务（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



允许一个为恢复景气的政策筹措资金的膨胀预算。(p.320) 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主要仰赖亚太的整体表现，其经济前景并不确定。

然而，总的来说，在 1997 - 1998 年的危机中，中国通过抵抗金融流动的破坏性袭击和避免陷入衰退而展现了其经济动力，并确保了相对稳定性。中国政府认为足以能够拯救港币的贬值，中国用 1400 亿美元强势货币储备做后盾的决定，让香港特区货币交易系统至少存活了一阵子。除了目前领土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外，中国有很充分的理由支持香港特区经济。中国政府和银行是最大的地主以及最大的股东之一，所以他们尽力减少他们的损失，但更重要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是外资对中国投资，主要的来源当中大部分来自海外华人企业通过香港公司来操作，每当中国必须缓和资本外流的趋势时，稳定香港对于结合起国际投资者与中国市场十分重要。当其亚洲对手的出口由于它们的货币贬值而变得相当便宜时，为了确保港币和人民币的稳定汇率，中国正准备牺牲它的部分贸易竞争力，中国在两个基础上遭受损害：出口增长显著衰退（从 1997 年的 22% 增长率下降到 1998 年的 5% 左右）和资本的外流（如同其他亚洲国家剧烈增加一样，中国 1997 年有 200 亿美元外流，接着在 1998 年当投资者害怕人民币贬值时又有一个更大的数目），不过，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受到比其他太平洋地区少得多的危机冲击。解释中国相对能够吸收 1997/1998 年危机震荡的能力，主要因素是它在全球经济中的有限度整合。特别是在金融市场方面，人民币不是完全可兑换，所以在对抗投机攻击比开放市场的货币交易容易保护许多。中国的银行体系在 1997 - 1998 年中陷入像日本一样的困境，银行至少有 2400 亿美金的坏账，其中许多银行破产，其他来自标准普尔的报告，估计银行坏账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0%。(p.321) 然而政府一方面支持这些银行，只有在可控制的情势下才会使其破产，另一方面，由于严格控制对外借贷，中国银行没

有被其他亚洲大多数金融危机来源的短期的外债所扼死。尽管有一些银行通过以香港特区为基地的银行对外国贷款，香港特区的“保险杠”作用还是避免了中国遭受到像印尼或韩国的那种金融恐慌的打击。因此政府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和全球的市场间的联结的控制，给抵抗世界金融流动的狂野运动提供了一个缓冲垫。

帮助中国保持发展路径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对其整合进国际贸易的进度的管理。尽管中国努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及暗示其对贸易开放的政策，中国在1998年还是依附进口的限制来弥补其出口的衰退，从而维持健康的货币平衡，为了终止便宜的低级产品从亚洲的竞争者流入其市场，中国对于进口商诉诸于繁杂的公文程序和货币控制以鼓励本地的生产。但是在重要的高科技与高附加值产品制造部门中，中国由于其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水准而能够控制进口。的确，尽管关于国营企业部门的陈旧过时已有许多描述，但部分国营企业，特别是电信业已能够改善它们的生产力和技术素质，并胜过它们的外国竞争者而赢得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甚至是那些外商在中国的制造生产线也开始依靠着国营企业，例如华为、大唐和巨龙等中国公司已增加他们中国电信市场的占有率，从1995年的10%增加到1998年的大约55%。尽管政府提供部分合约的支持，特别是在省级的层次而帮助了中国的制造商，产业观察家认为低薪资而具创新能力的中国工程师，高素质与勤奋工作以及中国本地制造商对于研发的努力是获得外国公司的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汽车工业中也发现类似的趋势，其中由完全中资公司长安铃木所生产的奥拓^①的销售量已超越外国进口车，因此主要朝向国内市场的升级、保护和扩大制造业的能力成为一个避免戏剧性衰退的关键因素，至少在这波危机中是如此。(p.322)

① 位于重庆的中国长安汽车集团的重庆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引入日本铃木公司微型汽车生产技术所推出的奥拓轿车，占中国小型车市场第一位（30%）。



然而这些事项若不是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都不会将中国从潜在的衰退中拔出。1998年3月以后的新总理、20世纪90年代间反通货膨胀计划的设计师朱镕基，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就了解到亚洲真正面对的问题是通货紧缩，而不是政府支出，因此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逼迫印尼、泰国和韩国去抑制经济及采取紧缩政策，中国政府展开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府支出计划，大部分是基础设施与住宅，为了能够支付它，政府依靠调动存放在国营商业银行里估计5600亿美元的储蓄；为了把银行做为媒介，政府先用320亿美元让银行再开始运作，并允许它们重回信贷事业以刺激经济。以此看来，中国一开始成功地平安度过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宏观尺度上的凯恩斯主义：防御了破坏性的金融流动，以及由政府领导通过货币控制和贸易政策来管理。主要问题仍未解决，我将在后面加以详细说明，无论如何中国是否可以继续“有点全球”和“有点资本主义”，同时保持共产党领导和政府对经济的强势干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不过对照于世界上其他“新兴市场”，在处理危机时的中国经验的第一个结果，似乎支持了关于国家在处理全球化冲击方面的决定性角色的论证。

民主、发展和 民族主义在新中国

新中国的观察家经常从他们对于发展和民主间必需结合的绝对假设开始预测。因此他们的预测是当新城市中产阶级增长以及一个更强盛而有影响力的公民社会到来时，共产主义权力不是逐渐腐蚀就是突然崩溃。目前，可用的信息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共产党组织网络牢固地控制大部分的志愿性社团和市民生活的表现，党征服着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媒体是开放和多元的，

但是在政治正确的边际内，有新的电子媒体，但即使是外国卫星广播公司，例如梅铎的卫视（StarTV）^①，在面对中国政治时也执行自我限制以免丧失一个巨大的市场。（p.323）中国有网际网络（互联网，Internet），但中国是全世界惟一成功地控制网站的国家，尽管代价是使得通往世界信息网的集体通路贫困。至于对中产阶级来说，赚钱和花钱是太忙的了，从而证实邓小平的通俗经济学达到革命的新舞台。此外，因为接近政府机构和党掌控资源的机会在企业中至关重要，而且因为机会是丰富的，当每个人献身于个人的“原始累积”时，很少有人对拆除这个体系或打开它感到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关系是那么重要，但又那么依靠一个计划经济正式系统的存在，对它的日常性旁道为其把关者提供重要的收入来源。中国浮现的市场体系借着打入仍占优势的指令式经济的市场缝隙所得到的竞争优势而发展。

因此，自主的公民社会扩展，以及政治民主发展的能力，基本上将依靠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保持它的团结，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妥善管理不同阶层和政府间，和竞争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省份间的冲突。

然而，在千禧年转换之际，中国必须面对许多问题，其有效地解决将会决定它和亚太地区 21 世纪的命运，它们都与西方所关心但对大多数中国而言并非真正议题的民主无关，但这些问题周遭所产生的社会冲突的确可能刺激民主运动。我至少已能明确指出四个这样的问题，最迫切的或许是 20 世纪 90 年代由农业现代化和私有化所激起估计约影响三亿农民的大量农村人口外流，他们的一小部分由中国政府为应对冲击所发展的小城镇吸纳，其他则投入新都市经济以及散布在半农村地带的工厂和商店，他们

① 凤凰卫视。

柏（Po, 2000）

毕安琪等（Bianchi et al. 1988）



之中许多人（也许多达 5000 万）似乎成为“流动的都市人口”的范畴，浪迹中国城市寻找工作和住所，这个大量的无根移民很难以“公民社会”的观念来比喻。他们是未加入组织的，缺少文化政治资源来代表一种接合的反对力量。但他们是一个特别反复无常的元素，其潜在的愤怒能够动摇整个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

第二个重要问题涉及激烈的省级矛盾的存在。由于上述原因，中央和省，特别是南方和沿海富有省份间的对立，似乎明智地被借由省领导者选举进入北京政府（特别值得注意的来自上海）和由中央赋予各省凭借自身能力在国际经济中发展的自由所缓冲。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环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构建他们的利益，确实存在于中央和沿海省份间的尖锐矛盾看来有恰当的处理管道。此外，不像前苏联，中国种族/民族因素并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来源，因为汉人大约占了 94% 的人口。（p.326）所以，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之外，对于中央的民族性或区域抵抗的种族基础很薄弱。然而，省级间有着激烈敌意和尖锐竞争，特别是内陆贫穷省份对抗彻底加入市场经济与全球交易的富有沿海省份。1996 年，内政部揭露超过 1000 个争论和一些“流血冲突”，已在涉及其领域边境界定的省和区域之间发生了。一些省使用他们的自治权，在他们境内禁止来自其他省的产品销售，并遵循他们本身的租税、信用和产业政策。由于省的政治影响仍然相当取决于他们在北京的影响，他们的混战，以潜在的不稳定趋势被输出到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此外，当贫穷、被补贴省份和自给自足、市场导向省份之间的区域不均急剧增加时，关于指令式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安全网的程度与持久性的意识形态冲突，正具有、而且会越来越具有区域性的意涵。中国浮现的潜在区域冲突看起来不像苏联的解体，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主义也或许有可能变坏到如同历时约 200 年，在 2400 年以前在汉人间所发生的那样，一个新战国时代的危险。

中国面对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进入市场经济而同时避免大量失业和安全网的拆除。在这一点上有两个主要课题，第一是住房的私有化。一方面，这是政府借着动员大量未开发的私人储蓄进入巨大住宅抵押市场来刺激中国经济的秘密武器，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城市人口无法进入这个新兴房地产市场，因此迁徙、都市隔离和大量无家可归者可能是快速进行的住房私有化的结果。这是为什么在1998年7月宣布的“大爆炸”私有化计划，为了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小心谨慎进行，而被无限期延后的原因。(p.327)

中国经济改革减缓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许多（但并非所有，如同我上面所指出的）低生产力、低获利率、依附补贴维持的国有企业仍然雇佣最大部分的工业劳动力。私有化急速地进行了，但是大部分国有企业找不到买主，而且政府持续关注它们可以多久？所有的指标都是中共决定不要犯像他们的欧洲对手一样的错误。尽管在处理国际经济问题时部分听从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但他们似乎准备确保一个基于补贴公共部门的福利国家以做为本身权力和合法性基础的长期转变。为了这样，保持中央计划体系做为公共部门会计和管理的系统至为紧要，从而调整数百万政府雇员赖以维生的功能和工作。因此，中国经济是通过三个部门的并列而发展的：隔离于市场竞争的公共部门；对准国外投资贸易的国际导向部门；一个国内市场导向、主要环绕官僚企业家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部门。这三个部门之间的联结性和通行系由党的企业网络，所谓的“红色资本家”（red capitalists）所确保。然而这个体系的复杂性，和许多潜在利益的冲突，开启了激烈权力斗争之门。例如在1999年，财政部长了解为了防止银行危机必须减少由银行对无法营利的国营企业所提供的“坏账”数字，为了那个目的，它创造了一个由受美国训练的金融专家管理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Cinda），信达着手进行一个为大型政府银行计划公平交换的雄心勃勃的债务计划，承担一些它们的坏



账，并且用这个债务换取其债务人公司的股份。然后信达为每一个公司设计重整计划，包括成千上万个工人下岗以减少支出和增加收益。虽然有一些痛苦的重整实验，信达的强硬路线被掌握任何重整审批权的中国债券调控委员会的管理所局限。因此，私有化和营利取向策略的进程，高度取决于涉入到经济改革的执行中的政治当局间的政治考量和冲突观点。（p.328）

第四个问题具有不同的特性，但是我认为它对于中共领导人似乎寻求实施的“新加坡模型”的可行性相当关键。的确，如同我在第一章企图阐述的，它是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因素。它涉及技术，而且特别是信息技术。如果中国的经济要进入全球范围的竞争，以及中国政府要发展它的军事能力，一个强大的技术基础十分重要。中国至今尚未掌握。当然，在1987年我有机会评价它时，它必然还没做到，即使是表面的。然而最近的信息显示中国已在过去十年取得大幅的进步，特别是在电信和个人电脑中，如同上面所描述的。不过技术变迁的速度是相对于美国、日本、亚洲小龙和世界上的多国公司的，中国必须加快其技术升级。然而，中国能把卫星放入轨道，并且拥有优秀的科学团队。它也是一个拥有发射导弹能力的核武国家，包括很可能少量的洲际导弹（ICBMs）。如同苏联一样，问题是当前基于信息科技的技术革命是否可以在一个封闭社会下发展，其中内生的技术在国家安全体系下被隔离，而商业应用是依靠外国授权或模仿，其中个人、企业和大部分的社会不能将技术应用并发展利用它的潜力。我不这么认为，而且苏联的经验似乎也证明了这点，虽然必须承认在苏联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其他因素，以及中共拥有苏联经验的后见之明，中国领导者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取得国外技术、购买机器、获得许可、自外国公司技术转移和派遣自己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赴国外受训而处理这个矛盾。在我1987年就这个问题和他们的一些专家交换意见和对他们的技术政策研究中，我了解到当时中国官员对

于技术是什么有一个过时的工业主义式观点 (p.329)。他们仍然认为技术就是机器，而且以中国专家的科学与技术优秀能力，如果有适当机器的话他们就可以处理一切。于是他们强调许可、强调输入机器和强调对中国工业结构有示范性效果的先进科技多国企业区位的寻求。这当然是错误的，虽然今天不是要在这里对你们讲授技术，在信息模型中，技术的使用不能从技术本身分离。除了特定军事硬件之外，到处都容易买到这些机器。重要的是要知道用它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在一个需要开放、无检查的互动和回馈网络中，相当程度地，能在全然无意地发现新奇的过程中，计划、再计划与互动。不可或缺的精华技术在我们的脑袋和经验中。中国继续派遣学生和专家出国，做为建设其技术潜力的最有效方法。但是如同全世界主要大学的教务人员知道的那样，大多数这些聪明的年轻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不是真心喜欢回到为科技官僚体系所窒息、技术低水平使用的环境中。因此，在他们训练完成以后，他们自我官僚化，或进入更有利可图的企业，或者许多情况就待在西方或在中国以外的兴旺的太平洋区域找到好工作。我不至于说没有民主中国就无法真正得到进入信息科技模型的路，它的总设计才是要害：政治过程不能被简化到简单的陈述。但是，缺乏某些形式的开放社会，基于第一卷和这一卷第一章所提到的理由，它很可能就无法达成。然而，似乎有某些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改良的证据，特别在电信设备中。这很大程度上是从和合作技术先进的国家企业合作的多国公司和海外华人公司的技术中转移过来的，或是依靠中国科技类大学的优秀人才。问题是这样的技术升级，是否能在整体制造工业的现代化仍羽翼未丰以及中国的大学没有更普遍地参加与显露在国际交流的情况下，继续维持。这方面关键性的课题是做为网络经济和网络社会骨干的互联网的发展。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中国政府彻底意识到自由通讯潜在的政治含义，在提供新企业主义的需要和



对信息控制的损失之间烦恼不安。中国互联网用户快速增加，从1997年的90万人增加到2000年底的1000多万人。(p.330)但是可能的增长更大得多，吸引外国大量投资在中国创办网络公司。1999年9月，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要求外资停止对网络投资，因为这些投资违反了1993年对于外资对中国电信掌控的禁令。^①本书写作的同时，在中国政府内部，正有关于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允许互联网开展，及其与外国联系的尖锐冲突中。总而言之，中国正经过在信息控制的社会里发展信息科技的矛盾的混乱时期。但是，当中国公司需要一个逆向工程^②无法被满足的、较高层次的技术创新时，这个务实政策将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

因此，尽管民主在中国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尽管邓小平的之后的中国仍在有能力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之下，但在千禧年转换之际，中国所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少，一个基本问题是有关这些社会课题做为社会冲突表现的可能形式。仔细考虑中国历史，我假设21世纪中国的社会冲突可能发展为基于认同的动员，而不是夺取国家机器的政治运动，这与我在全球化和认同之间矛盾关系的整体分析一致。的确，在1999年，这个可能性似乎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1999年11月5日的社论所证实，它声称：“我们必须为对抗邪恶力量的艰苦而复杂的斗争和强有力的反制手段彻底准备……这是关乎中国未来、人民未来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重大努力未来的一个主要政治课题。”

① 中国“电信管理条例”于2000年7月审查完成与实施，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电信市场，但仍有比例限制

② 也称作反向工程、根据拆开的机器仿制的倒序工程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1999年11月5日, A3页)。

结论：全球化与国家

本章节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论证发展中国家是过去半个世纪亚太地区在经济增长与技术现代化的特殊过程中的驱动力，其他个案可以加入我们已分析的案例中。马来西亚像新加坡一样处于发展中，虽然为其内部潜在爆发的种族与宗教矛盾所削弱。20世纪80年代的印尼以及泰国，是准发展中国家。当然，苏哈托政权是建立在苏哈托家族经由他们对军队、政府及金融体系的控制而对于国家财富所占有的重要部分之上。苏哈托的个人独裁让他及他的伙伴与跨国公司（特别是日本公司）和富裕的华人企业社群进行联盟，而让他们操控国家经济并分享利益。不过，尽管印尼和泰国的发展中策略都包括了统治者个人致富的基本元素，国家政策着重在将国家联系到全球经济，以推动工业化，并活化国民经济。这些政策在增长及现代化方面达到相当的成功，尽管付出了很高的社会代价。毕竟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甚至日本政府中的体系性贪污腐化也都存在。而个人独裁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及新加坡政府的主要特征。因此，除了菲律宾的马科斯（一个掠夺性国家）、缅甸军国主义和为战争撕裂的柬埔寨和老挝之外，不同程度多样形式的发展中国家是亚太区域成功发展过程的主要行动者。发展性国家植根于两相对自主性的前提：而对全球经济的相对自主性使本国公司在国际领域具有竞争力，控制贸易和金融流动；(p.333) 面对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则压制或限制民主并在生活水准的改进而非公民参与上建立合法性。即使是服务统治者也都是是在服务国家（nation）乃至创造它的旗帜下进行，在



两个方面，国家的自主性受到此发展过程的结果的挑战，全球经济的全面整合使得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金融流动、贸易以及产业政策。国家培养的公司变成全球性公司或全球企业网络。金融机构自己开展了国际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找到了他们进入繁荣的亚洲经济体、解放的资本主义新狂野东方的直接路线。而且，在90年代末期的日本也是。发展中国家所建立的传统机制已经过时，但是适合于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新游戏规则还没出现。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不等同于自由市场，如果历史的教训是有价值的话，没有可靠机制和规则的放任市场就相当于掠夺、投机、诈欺、终极混乱。由发展中国家混乱地转化到新的、调节性资本主义架构所产生的制度性空隙很快地就被全球金融业主、投机家和他们的本地密友^①所填满。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成功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导致了反对威权国家的公民社会的浮现。当社会改变以及民主透过政治制度争取它们的发展道路时，发展中国家能够操纵的幅度减少了，因此它们同时越来越无法确保全球竞争的经营管理以及统治者个人的财富。似乎没有人比马来西亚的历史性领袖马哈蒂尔·穆罕穆德（Mahathir Mohamad）更了解维持此二元自主性和发展中国家的存活之间的关联了。他对危机的回应是二叉式的，首先，通过使马元不可兑换并对金融交易建立严格的控制，将马来西亚从全球经济部分地脱钩，同时仍支持多国公司在马来西亚的直接生产投资。其次，为镇压公民社会和民主的气焰，他将自由主义倾向的副手兼财政部长安瓦尔·伊巴辛（Anwar Ibrahim）免职，并以荒谬的借口将他下狱，以及打压支持安瓦尔的示威群众。第三，可能受到犹太人的启示，而且必定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① 即朋党（cronies）。

约摩（Jomo, 1999）

所刺激，他借着痛斥全球金融策略做为殖民主义和西方支配的新形式来号召马来西亚民族主义和宗教认同。(p.334) 尽管这些姿态大部分具有统治性的象征价值观，他们表达了至少一个发展中国家拒绝被这个发展中国家协助创造的全球化过程所毁灭的讯息。马来西亚为了这个表面的独立付出了代价。当马来西亚政府于1999年9月1日对于被遣送回国的外国基金主角调高退场税10%，随着外资撤离马来西亚股市，累积的外国基金投资净值从8月的12亿元急速降低到9月的1.78亿元。

从令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中国内地得以安然度过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特殊过程中撷取一些分析性的教训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教训可以帮助解释太平洋区域恢复经济增长的条件和远景。

对台湾地区并不难理解，台湾经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过渡为结合上环绕与横跨过太平洋的市场与制造网络的灵活的企业网络。国家力量足以部分捍卫银行体系，但不足以强化裙带资本主义，或压抑浮现的公民社会。因此，大体上台湾地区的企业，和做为整体的政府，是完全被整合在先进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则与程序中了，受到此彻底整合的所有好处和风险。中国台湾地区总的说来是全球化了。

新加坡一直仍是基本的发展中国家，清楚地完成其日本式蓝图。然而，其经济仅受到东南亚全面衰退的轻微影响。而其社会，尽管富裕和现代化了，并不能被描述为葛兰西式（Gramscian）的公民社会。^① 国家对于经济以及社会的掌控依旧不衰，我把它看做是例外，因为它完全整合在全球经济中，它的货币可

^① 在葛兰西的概念下，公民社会由一系列的组 织所形成，像工会、公司、教会……等市民的公共组织，它们深植于人民之中与国家的动力相联系，建构其自主性，而非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以兑换，它是主要的金融中心，它完全对多国公司开放，而国家仍然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狂野起伏保持相当大的控制。而且尽管国家对于个人和团体的潜在监督始终存在，统治新加坡的是人们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检查，而不是严酷的权力。(p.335)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任何国家或社会有类似新加坡的经验。它可能预示了一个正是李光耀想要的人类文明未来的模型。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新加坡做为 21 世纪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的实验室的深度研究会变成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中国的状况不一样，即使中国领导人想要采纳新加坡模型。目前，中国展示了得利于全球化，同时部分地保卫国家经济不受全球市场不可控制力量影响的可能性。通过限制人民币兑换和保持对金融流动的严格控制，加上政府完全控制的银行体系，中国政府能在出口市场刺激中国厂商的竞争力并吸引受市场规模诱惑的外国投资。因此，中国能维持高经济增长率，根据企业周期在通货膨胀或紧缩上施加作用。控制金融流动策略的明显背景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借贷/投资的勉强态度。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超速增长主要来源之一的国外投资可能缩小而威胁到增长的减速。然而，资金有一重要的替代性来源：国内的高储蓄率。由于这些储蓄的一部分是强势货币，需要的是世界市场中的出口竞争力。总之，正是这个由发展中国家所策划的公式，在中国加入并超越他们之前，刺激了亚太国家的增长。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似乎在大多数亚太国家中衰退，做为肯定民族主义及政治合法性工具的中国可能在上升。中国的规模，它的科技潜力，它与强有力的海外华人企业网络的联系，可以为这一条最大的龙提供呼吸的空间。在这里它可能循着亚历山大·格尔申科 (Alexander

Gerschenkron) 的逻辑^①，就如同我所假设的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部分来自于其较晚进入全球经济。因此，接下来这样的优势将逐渐减弱，迫使中国面对比它更成熟的邻居相同的矛盾。然而，历史不是预先写好的剧本。事实正是中国仍然能表现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并改变其脉络，因为中国并不像新加坡那样是全球规则的小小例外。如果中国在过渡到信息时代中成功地管理全球化并整顿社会，它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至少在 1/5 的人类中是存活且健全的，而且如果世界上的国家面对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觉得无力，他们可以寻找替代方案并在中国经验中得到灵感。(p.336) 但是，这当然只是可能的行动方式之一。相反地，也可能发生的是，中国失去对其经济的控制能力，一连串快速交替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损坏了国家，触发社会暴乱并引起政治冲突。如果是那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将终结其历史路线与进程，而资本和信息的全球流动会无可争论地到来，除非一种国家的新形式，网络国家 (network state)，可能可以用欧盟为例来说明，出来拯救受其经济奴役的社会。全球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位居亚太区域发展和危机的核心，是千禧年转换之际最主要的政治课题。(p.337)

① 亚历山大·格尔申科 (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04 - 1978)，重要的俄裔德国经济史学家，《经济落后的历史角度》(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失败的经济冲刺》(An Economic Spurt That Failed)、《德国的面包与民主》(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等书作者，对德国、瑞典、俄国的经济史，以及对经济史中的历史连续性、后进经济等有重要的见解。

第五章 欧洲的统一： 全球化、认同和 网络国家

在第二个千禧年即将交接之际，欧洲的统一如若完成，将会是决定我们新世界的最重要潮流之一。^①

① 这章在知识上受惠于我和一群欧洲学者的互动，包括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于1994 - 1999年我担任西欧研究中心主席期间的系所研究生；我也要感谢许多欧洲的学者和演讲者（包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在这段期间造访。而我欧洲经济社会与信息科技关系的讨论有一部分得自于我与欧洲委员会的同事交换的心得，于1995 - 1997年间我曾在该委员会的信息社会高层精英小组工作。我很感谢该小组的主席吕克·索特（Luc Soete）促成这项交流。同时，我也受惠于1995 - 1998年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在柏克莱组成的研究计划，关于斯拉夫和东欧的研究“欧洲的东与西：对国家主权来自下层和上层的挑战”，我很感谢这个计划的主持人维多利亚·伯尼尔（Victoria Bonnell）和吉拉德·费尔曼（Gerald Feldman）热情邀约参与他们的计划。最后，很重要的是我与下列一些人的对谈：包括阿兰·杜罕（Alan Touraine），维里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贾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卡洛斯·阿隆索·扎尔迪瓦（Carlos Alonso Zaldivar），乔迪·鲍佳（Jordi Borja），罗伯特·杜拉多（Roberto Dorado），彼得·休兹（Peter Schulze），彼得·霍尔（Peter Hall），斯蒂芬·科罕（Stephen Cohen），马丁·卡诺依（Martin Carnoy），和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等人，他们在本章的议题上塑造了我的想法且相当程度地丰富了我的信息。

首先，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可能（虽然不一定）结束这一千年来欧洲列强间的战争为欧洲及现代社会所带来破坏和苦难等周期性的影响，以及其在近代 20 世纪的前半叶史无前例地将巨大的暴力推向全世界的巅峰。另外，它的重要性是一个统一的欧洲将挟其技术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等影响力，（p.338）伴随着太平洋兴起的势力，为世界权力体系开创多中心的结构，并排除任何超级霸权的可能，即使美国在军事和科技上拥有领先的地位。同时，我认为欧洲统一的重要性在于其制度创新将会为民族国家的危机提供一些答案，因为在欧洲联盟形成的过程当中，新的政府形式、新的政府制度不断地被创新：在全欧、国家、区域和地方层级上，也包括一个新的国家形式，我提议称之为网络国家（the network state）。虽然，欧洲统一的真正意义和将要卷入其中的各种角色都仍然是未定之数，而这样的不明确状态也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也正是这种混沌不明才使得统一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统一的过程是一场折冲和辩论，而不是一张规划好的蓝图。事实上，欧洲统一的想法是综合了过去半世纪国家间以及经济和社会行动者之间不同的观点与利益冲突。所以，认为欧洲是基于单一的共识和认同的想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著名的历史学者约瑟夫·方塔纳（Joseph Fontana）曾说，综观历史，欧洲认同总是建立在对抗“他人”（the other）的、不同血统的蛮族之上。^①

然而目前的统一过程却有不同涵义，因为它是延续了参与其中的民族国家间在防卫性政治计划（defensive political projects）上的共同兴趣，以此欧洲在此千禧年之交将有更多更复杂的意义。它产生于一个统一交互动态过程，建立在防卫计划之上，并在最近与两股宏观潮流的支撑与挑战，也就是信息时代相交错：其一是经济、技术与沟通的全球化；其二是平行发生的认同确认做为其意义来源等两股潮流。由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在回应这相应对立

^① 方塔纳（Fontana, 1994）。



的挑战时面临失败，欧洲组织正尝试以新的形式和方法去处理这两股潮流，并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系统，也就是网络国家。这就是我在这一章节中所要阐述的故事，我无可避免必须说明欧洲联盟建构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的复杂性，并提及一些丰富而启发性的相关文献和书籍。^① (p.339) 我将聚焦于阐释信息时代的潮流——我认为最重要的机制，全球化、认同以及民族国家的危机——将如何塑造欧洲统一以及 21 世纪。

欧洲统一是一连串防卫性的 回应：以半世纪来的视野出发

欧洲联盟起因于三个政治机制创制的过程，而参与的国家建

① 大部分我分析所用的资料可以在一般的报章杂志找到，如《马德里国家报》(El País)，《法国世界报》(Le Monde)，《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我想我不必将这些已在期刊流传广布的信息再加上出处来源，同时我也不打算提供读者一大堆关于欧洲整合的一些特殊个别的事件的参考资料。我将简要提及一些我认为较有用的报章杂志，能够增加补充和加强我的记忆与想象。例如：关于过去 25 年法国和西班牙的资料的分析，阿隆索·扎尔迪瓦 (Alonso Zaldivar, 1996) 可能是知识最丰富的。一个全面性回顾，我受用良多的是欧斯特壮·莫勒 (Orström Møller, 1995)。还有科罕与霍夫曼 (Keohane and Hoffman, 1991b)。欧洲整合关于政治方面有发展性的论文，见威弗 (Waever, 1995)，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危机，见杜罕 (Touraine, 1997)。另外还有一些适合的读物如：鲁吉 (Ruggie, 1993)；萨施瓦尔 (Sachwald, 1994)；安塞尔与帕森斯 (Ansell and Parsons, 1995)；贝尔纳兹 (Bernardez, 1995)；埃斯特方尼亚 (Estefania, 1996, 1997)；希尔 (Hill, ed., 1996)；赫斯特与汤普森 (Hirst and Thompson, 1996)；帕森斯 (Parsons, 1996)；皮萨尼-费里 (Pisani Ferry, 1996)；(Tragardh, 1996)；比德卢斯与塔罗尔 (Bidelux and Taylor (eds), 1996)；希尔 (Hill (ed.), 1996)；齐斯曼等 (Zysman et al., 1996)；齐斯曼与韦伯 (Zysman and Weber, 1997)；而回到经典之作厄恩斯特·赫兹 (Ernst Haas, 1958a, 1958b, 1964)，亦能温故知新，许多现在的政治辩论在其分析中已经有所讨论。

立这些机制的目的是为了共同防卫和对抗三个历史点上明显的连续威胁，这三个历史点就是 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这些例子当中，最原初的目的都是政治性的，而为达成此目的的手段却主要都是用经济的方法。在 1948 年，上百位欧洲领袖在海牙讨论欧洲整合的可能性，除了意识形态的宣示和科技野心之外，核心的目标是避免一场新的战争。因此一个永久的调解形式必须成立于德国，这与德国在两次大战期间的罪行相对应；这个调解主要设立在德国和欧陆另一强权（法国）之间，并且由美国见证保护遭受严重摧残的战后欧洲。接着，冷战挟其冷锋掠过德国，因而需要一个经济强大、政治稳定的西欧和其对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军事保护伞，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则适时帮助恢复欧洲经济，同时也为美国跨国企业的投资铺路。（p.340）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需要在这些过去就经常交战或联合作战的民（国）族国家之间建立稳定和制衡的关系。也难怪在欧洲推动的第一次整合是煤矿和钢铁工业的共同市场，使得国家不可能在工业上各自为政，因此也无法致力施行发展未来的战事的战略工业。1951 年 4 月，由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组成的欧洲煤矿钢铁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简称 ECSC）成立于巴黎。伴随此创制有两个很好的决议，其一是 1957 年 3 月 25 日签订的《罗马条约》，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将各国的新战略工业之原子能政策整合在一起。其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 EEC），以促进此六国间的贸易和投资为目标。

欧洲经济快速的整合，衍生出对欧洲整合的各种看法和远景前瞻。主张技术治国的政治家，特别是让-莫内（Jean Monnet）钟情于联邦政府的形态并勾画出一个联合欧洲的蓝图，然而，没有一个欧洲的民族国家真正会相信或寄望这种设计，因为在欧洲官僚体系手中握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不将之称为权力），并造



成了欧洲制度的惯性和推动的阻力，所以，德国也只是因其本身国际角色的限制将欧洲共同体当成一个方便施展的国际舞台。在戴高乐（de Gaulle）当选法国总统后，首先打破此主权运作的过程，并主张一种后来渐被了解的“政府间”（intergovernmental）的观念，也就是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决策，必须由各国的代表来共同决定。戴高乐还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加上一个政治目标，此目标强调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独立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在1963年及1966年两度否决英国加盟欧洲共同体的申请，因为顾虑到英国和美国的密切关系将影响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自主性。而事实上，英国的确也某种程度代表着（至今仍是）对欧盟统合的另一种不同的看法：强调将欧洲发展为自由贸易地区，而不必强调政治权力。1973年，戴高乐下台后，英国终于（还包括爱尔兰、丹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此种想法主导了整合的方向大约十年，也就是着重经济发展，不强调政治互动，这却使得欧洲统合的脚步减缓，因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消耗过多精力和预算在协调各国家间的经济状况。所以，当1973~197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感受到其政治力量受到两股超级势力的影响而被剥夺了，因此陷入一种欧洲悲观主义（Euro-pessimism）的气氛；此两股超级势力分别是在欧洲之外的信息技术革新和科技突飞猛进（p.341）以及欧洲在经济上除了落后于美国还落后于太平洋地区新的竞争国家。

1981年希腊加盟，特别是1986年西班牙及葡萄牙加盟，为欧洲的经济提供了喘息的空间（毕竟，西班牙在当时是全世界第八大贸易市场），并带来一些新的互动和作用；但此同时也加重了各国间经济、渔业、劳工立法及选举程序等方面妥协的复杂性。因为担心欧洲成为美国和日本公司的经济科技的殖民地，引发20世纪90年代第三波欧洲的防卫性回应，主要以1978年签订的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简称SEA）为代表，此法案为后来于1992年真正建立的统合市场奠下基础。在经济

措施方面特别强调科技政策的结合，并配合欧洲全观探索计划尤里卡计划（European-wide Eureka Program）施行，此计划由法国密特朗（Mitterrand）总统提出，其目的在于对抗美国如星球大战计划的科技攻势。接着，密特朗软化法国和其他各国的对峙，西班牙 [在维里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的领导下] 支持德国的主张，也强调欧洲制度/机构（European institution），并加强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权力；欧洲议会（代表行政首长，European council）因此得到对一些重要议题的决议权，而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也在其原本象征性的角色之外，获得一些权力。

为何西班牙和德国可能会转向支持并成为联邦式国家的拥护者，其原因也是极为政治性的：从西班牙民主政治的观点来看，欧洲统合的强大势力将可避免重返政治威权及文化隔离的老路，西班牙过去五百年的历史便深受其苦。在南欧急剧的民主化及德、法提倡科技经济自主等两股力量的催化下，欧洲经济共同体转型为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简称 EC）。虽然也还是一种建立资金、货物服务与劳力的共同市场的经济措施，但实质上却是为了达成政治的统一，国家各自让渡出一部分的主权，以确保会员国家在此新的全球化环境里，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英国方面，撒切尔夫人必须花费很多精力对抗其国内往民族主义方向退缩的力量，虽然大部分的英国政治经济精英了解欧洲统一所带来的契机并愿意配合，但对于一些可能会遭到排除的政策则持保留态度，例如劳工的社会权力（对保守主义者而言）。（p.342）

正当欧洲决定加速经济统合并且渐进达成政治上的超国体（supernationality）时，1989年11月9日，欧洲整体的地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引发另一次的建构工作以便回应此欧洲大陆掀起的新政治议题。东西德突然统一对欧洲的统一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一直以来欧洲统合的目标，就是要缓和德国的地理区隔



产生的压力。新的统一的德国，拥有 8000 万人民，占整个欧洲共同体（EC）国民生产总值的 30%，形成欧洲大陆一股强势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战胜国监督达 40 多年，现在冷战的结束使德国得以真正独立免受监督了。于是整个欧洲，便急于加强德国和其他欧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关系，因此就要强调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功能，并且将德国的利益列入考量，统合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策略就是建立单一的欧元系统（euro），并且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那么德国就要牺牲强势的马克（deutschmark），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德国中央银行（Bundes bank）的抗拒，这就需要注意到下列三个妥协策略：

1. 欧洲的经济要配合德国的经济需要而订定财政策略，使之能顾及到通货紧缩策略，特别要注意到东、西德间币值统一可能造成的通货膨胀。

2. 欧洲组织要朝向建立一个较高层次的超国体目标而努力，如此才能克服法国的抗拒和英国的阻力，为了使德国免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敌意而能重新定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欧洲统一是惟一的方法。现在德国可以全力参与建立超国体，也就是达成欧洲统合的目标，但是战后的日本无法扮演类似德国的角色，因为它无法挥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阴影。

3. 德国请求 12 个欧洲共同体会员国认可，英国支持这项请求是因为想将欧洲共同体（EC）的势力扩展到北部及东部。（p.343）奥地利、瑞典及芬兰等国支持德国的请求，则是希望能平衡欧洲共同体，较富裕及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加入，才能弥补南欧贫穷国家带来的经济负担。东欧的立场则认为，经由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共享资源，可以促成经济、政治的稳定，也可防止因移民或地理区隔而产生的冲突。因此德国现在可以扮演它在（东）欧的传统地位，而不至于被猜测为想要重建俾斯麦帝国（Bismarck）。

如此看来，审视传统历史对地缘政治的威胁观点是很有趣

的，东欧国家施压于德国盼其能加入欧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同时也对美国施压盼其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根本的理由就是谋求安全而免受俄国的影响，而德国的回应就是在东边靠俄国的边境建造疆界防卫堡垒。以上所讨论的策略目标似乎很陈腐，为什么呢？首先，现代信息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将是空中开战，也就是经由电子通讯的方式而干扰信号，破坏导弹的发射及飞行器的飞行。此外，俄国似乎不再是西方社会安全上的威胁，即便俄国民族主义再度复苏〔例如，20世纪90年代受到西方影响的叶利钦（Yeltsin）政权〕。而事实上，俄国的军队和国防为了保有其核能超强国的优势，在国家整体经济的衰退等情况下，未来几年内不会允许俄国的民族主义者扩张其在欧洲地理政治上的野心。然而，因为数世纪以来俄国、德国、法国在东欧的军事武力对抗，在这块土地上的惨烈激战所留下的印记却远超过今日欧洲地理政治的对垒状况；又顾及欧洲对俄国军事武力（不论真实或潜在的）的恐惧，和俄国本身制度的不稳定，所以，俄国这个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将不会被接受成为欧盟的一员。另一方面，早已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下的东欧国家，也将会提出各自的要求和不同的条件来与欧盟（EU）联结，所以，欧盟势力要扩展到东欧的时间表将可能会延长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左右，同时，也将为欧盟（EU）的实质整合带来相当大的困难。（p.344）因为，即使是和欧盟最穷的国家比较，这些以前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技术条件和情形与欧盟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更进一步，若完全由博弈论（game theory）来看，成员越多，决策过程越复杂，且有可能会使欧洲整体的制度运作瘫痪，最后，欧盟只能被当作一个自由贸易区，而有较少的政治整合性。而事实上，这也是英国会极力支持扩充会员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会员国越多越复杂，对各个国家的主权威胁将会越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最支持联邦制的国家）和英国（最反对联邦制的国家）以各自全然不同的立场来支持欧盟扩张

会员国的矛盾情形。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欧洲统一最主要问题是东欧整合的艰难过程，此过程的起点将由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可能还包括爱沙尼亚等国家加入欧盟开始，因为这些国家深受欧洲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德国），同时又需要大量出口到欧盟各国。虽然，将会有一段时间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并且在欧盟的投票和决策过程设下政治藩篱，但是此扩张的历程和作用终究会促成欧盟政治制度的改革。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签订于 1991 年 12 月，并在 1996 年的府间会议（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中修订；于 1993 年曾因丹麦和法国国会以及英国议会的反对而差点被否决。这反映出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及各国机构施展其整合的野心，却又不想公开地面对超国体的基本问题。事实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欧洲统一的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贡献，包括决定欧元货币及欧洲货币制度（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以及协调各国财经政策等，而此作用在未来的十年也将继续存在。借由加强欧洲制度和组织的整体决策力量，并特别在欧洲议会中帮助弱势会员国参与投票排除可能会面临的各种障碍；以整体欧洲为考量的政策取代了各国本身各方面的决策，包括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研究、环境、区域发展、移民、法律或警政等，而此政治整合在欧洲共同体（EC）转变为欧盟（EU）的过程中成为最重要的特色。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欧盟中仍有许多地方的外交政策、安全或防御政策并未得到真正整合，即使在修辞上宣称整合，仍持续混乱和犹豫了一段很长的时间，（p.345）科索沃（Kosovo）战争却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欧盟于波斯尼亚（Bosnia）处理战争难民之后，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称其为欧盟的安全防卫基础，同时，西班牙社会主义领袖贾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被任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显示出冷战时期的结盟关系已经转变成欧洲（和美国）于此新政治地理空间

中合纵连横的政治/军事操作性工具。而此变化似乎也宣判了欧洲在军事和战略上独立于美国之外且与之抗衡的戴高乐式梦想将被遗忘。因为英国和德国从来就不期望这样的独立性，而且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人民有成为世界强权的心理准备，或为此在军事和税务上作努力，结果造成欧洲在军事战略上对美国的依赖。因此，在1999年欧洲国家终于以联合行动对抗南斯拉夫，发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一次战争时，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在此阵营中承担了最重要的分量；卫星科技和精密导引的军火使得欧洲军事彻底成为美国科技的附庸。科索沃战争显示出欧盟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依赖，成为欧盟在对外政策上不可或缺的军事工具。奇怪的是，欧盟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彻底意识到这种依赖关系，并刺激他们另谋一个自主的、共同的安全防御政策。由英国首相布莱尔推动的欧洲防御体系，使得欧盟的西部国家联盟产生新的安全防卫约定；1999年欧洲的安全防御工业也重新整军，将原有的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和朗格迪利-马特拉（Lagardere-Matra）等两个防务生产部门合并为欧洲航空防卫（EADS, European Aeronautic, Defense, and Space）。同时，在欧盟政府组织里也出现新的职位掌管调度整体欧洲的安全和防卫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职位的首位任命者就是刚卸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职务的贾维尔·索拉纳，此现象说明了这两个安全防卫任务的关联性。事实上，自主性的欧洲防卫政策的出现并不是说其和美国关系的断绝，而是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虽然在南斯拉夫获胜，却预示其历史性的任务将告终，新的欧洲军事联合关系将成为欧洲军事自主性的开路先锋。而军事自主性则意味着欧洲各国安全防御预算一定会增长，同时也必须付出更多精力在防御性科技的研究开发与设计上。整体而言，因为科技和政治地缘等因素，(p.346) 欧洲的防卫体系仍必须和美国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会有相当大程度的政治自由。事实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策过程也已经逐步朝向会员国间的沟通、协商以及网络



关系：在1999年的南斯拉夫战役，主要国家的政治领袖都能够通过每日的可视会议（videoconference）沟通，并且不断地和北约组织的秘书长和军事将领进行协商。而此决策过程的集体性和沟通特色，也可以由此次战争的一段危险插曲来说明：当俄国伞兵出奇制胜占领普里斯汀那（Pristina）机场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国军事总指挥下令强力驱逐俄国的军队，但是在现场指挥军队的英国指挥官却回绝了这个命令，并使得此命令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领导者推翻，而此美国将领则获致提前退体的下场。在过去民（国）族国家的逻辑中，抗拒战时最高联合将领的命令的行为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但此次南斯拉夫的战役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策网络和共同参与却使之成为可被接受的操作和实践。科技优势和以人民纳税的钱所换来的超级强国优势，使得美国成为欧洲安全防御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但是美国不再拥有像在冷战时期的决策主导权力，而变成这个复杂的战略决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key node）而已。

在欧洲统一期间的各种限制和矛盾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代表的是欧盟经济和政治整合不可逆转的过程，而此过程也大致在1996年都柏林举行的“稳定（及增长）综合提案”中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英国、瑞典和丹麦等国也勉强同意欧元单一货币制度和其主权并行，并接受未来会员国协商的各种情境，此情境称之为“视个别状况或条件而定的欧洲”（Europe la carte）也就是说根据各国不同的条件和议题而有不同层次的沟通。

而这种“多变的几何形势”的多层次、不连贯特性，是欧洲统一建构过程本身的重要手段，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主要成员间的正面冲突，并允许欧盟制度可以有调和处理下列两项同时发生的挑战：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认同。（p.347）

全球化和欧洲的整合

欧洲的整合是一个回应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全球化最先进的表现。它证明了全球经济并不只是一个由企业体和资本流动所组成的同质的体系，而是一个区域化了的结构，由旧国家体制和超国家实体在其中持续扮演操控经济竞争的角色并钻营利润。然而，这并不是说全球化只是一个意识形态，正如我在第一卷第二章以及第二卷第五章中所论述的，全世界大多数的经济活动和工作，不论是在全国的、区域的、甚至是地方的层次上，其核心和策略性的经济活动正全球性地卷入信息时代，借由电子网络来达成资本、商品和信息的交换。正是这个全球性的整合促使欧洲能够在过去以政治目的主导的历史基础之上，达成目前统一的过程。全球化过程首要关注的面向是金融和货币市场，而它们确实是全球性的，借由电子通货的穿透能力摆脱政府的控制而将各种工作整合在一个时间点上。支撑欧洲统一的重要决策是1999~2002年欧元体系的诞生，并逐步废除各国货币，并在英镑之外盯紧欧元或是美元。经过两次明显的经验之后，20世纪90年代在欧洲经济中保持金融货币最小程度的稳定性变得十分迫切。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法国密特朗第一个政权独自着手进行扩张政策的企图惨遭失败，只好迫使法郎连续三次贬值，并有很长一段时间被社会党和保守党指责为全欧陆最严苛预算政策的罪名。第二次的经验则是发生在1992年秋季欧洲货币体系的双边危机，并在1993年夏季，英镑和里拉（意大利币）被迫退出体系，而比塞塔（西班牙币）和英镑贬值，虽然获得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银行的大力支持，但在这次1992年10月份干涉活动中一周之内损



失了欧洲货币市场一兆美元。经过这些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唇齿相依的经济体中，(p.348) 由各国货币间汇率的浮动不断形成的魔力会导致资本市场骚动，因为不论过去或现在，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资本流动都在永无止境地追求最大回收和获利机会。依此脉络，所谓的投机只是一个误导，因为我们所目睹的并不是“投机”，而是在一个新的、全球的、信息化的经济中的金融市场结构性地主导着所有其他的投资机会去追求最大利润。然而这并不是说银行、或是金融机构在掌控工业资本，或可以用一个陈腐的公式说明网络经济不同部门间的资本活动，而这些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中阐明。

资本市场的整合以及建立一个单一金融必须均质化所有欧洲经济的总体经济条件，也包括各国的财政措施。预算与各国的政策息息相关，也就是在预算编审的限制下去排列各种预算项目的优先顺序，而欧洲经济却必须更进一步在一组既定的总体经济参数下将标准朝向国际标准，至少和相对应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而事实上是由马斯特里赫特条款制定最基本的要求，并于1996年12月在都柏林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k)中更细致化，而这些标准紧密地反映出其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干预：低预算赤字(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相对较低的公债(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60%)，低通货膨胀、低长期利率以及稳定的汇率等。欧洲经济环境的和谐和全球总体经济的参数有密切的相关性，若有需要时将受到七大工业国家年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会员国家的看守和干预。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真切地说不能小看资本主义经济中全球资本以及资本循环的情况。至少稳定欧元、美元和日元间的汇率的企图是被期待的，但是金融市场中电子交易的速度和数量使得无法能控制其不稳定波动(就像前述的欧元货币市场的例子一样)，未来，这三个主导的货币将相互钉牢对方，并排除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用

性目的，虽然国家尊严也意欲排除全球金融的形成，但是技术性的障碍说明这是不可能的。

全球化的第二个重要面向：(p.349) 信息技术进驻经济生产能力以及国家军队的核心。如我在前面所提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刺激欧洲整合有部分原因来自其相较于美国和日本科技预算赤字的回应。事实上，大部分的欧洲科技政策一开始就失败了，过渡期许空中巴士而较轻视航空工业发展，意味着重视商机策略而非科技内涵。虽然，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欧洲在微电子和软件的某些重要领域已经跟不上美国企业以及韩国和日本的先进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脚步 [诺基亚 (Nokia) 除外]，“国家至上”的政策却浪费补贴在不合时宜没有效率的公司上面，例如法国政府在 1996 年的失败案例。欧洲的研究计划过度偏离工业的研究发展，很多大学以此牟利却未能开创出进步领先的科技道路。欧洲在激励创新商业上的努力是有局限性的，并在促进多国合作以创新方面过分依赖层叠的官僚法规。电子通讯是欧洲企业 [特别是阿尔卡特 (Alcatel)、西门子 (Siemens) 和爱立信 (Ericsson)] 能够有生产的技术秘方、强力的工业基础、健全的市场关联等的重要基础，然而，它们对电子组件和电脑的依赖也使欧洲科技的自主性变成无法想象。即使如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前，欧洲的决策者或工业策略都没有严肃地思考过戴高乐和密特朗曾经提倡过的欧洲科技的独立性，但是在新信息科技工业特性的全球经济下，这些名词或论辩又显得过时。所有高科技产业都依赖全球网络来从事信息和经济交换，而说真的不论是微软公司的个人电脑软件或是英特尔先进微电子产品都有些供过于求了，而用户的电子和周边科技产品如高分辨率电视 (HDTV) 和液晶显示器等则多为日本所掌控 (韩国正逐渐增加中)。然而，科技革新的催化，衔接上特定市场的需求以及投注在不同顾客群的围堵策略 (见第一卷的第一章和第三章) 等都会诱发网络丰沛的跨国公司和中型企业，以一种相互渗透的技术、



生产和市场方式出现，也就是我所说的“网络企业”（the network enterprise），因此，并不是美国和日本及欧洲企业之间的对立，全球化的信息科技发生于完全纠葛的先进地区和企业以及美国、太平洋、欧盟体制之间的研究、研发、生产和分配等。信息科技在全球的发展并不均衡，而欧洲许多相关的企业和市场足以证明欧洲深深地整合入主要的科技网络当中。举例而言，互联网传播的突破性关键，也就是全球信息网（World Wide Web）的技术基础是1990年日内瓦的欧洲原子核研究组织（Conceil European Pour Recherches Nucleaires，简称CERN）发明的。在此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伊利诺大学的超级电脑中心（Supercomputer Center）研发出一种新的网络浏览器，马赛克（Mosaic），最后此技术于1994~1995年在硅谷被一家名为网景（Netscape）的公司商业化，而此新兴的公司成员主要是由伊利诺大学工作团队组成（见第一卷第一章）。另一个科技相互影响的例子是下一波的遗传工程科技，日本已经落后一步，（p.350）欧洲实验室得到无性生殖技术要领，但因为美国的研发最具机动性，很多研究者受邀到大型的瑞士、法国和德国的药厂进行研发工作。而移动电话（Mobile telephony）的生产技术，欧洲在21世纪将会大量超越美国，因为欧洲国家和公司较具有共享电脑数据协定（Protocol）及标准的能力。诺基亚（Nokia），这家芬兰公司借由掌握自己的技术资源并联结美国研发技术公司等策略，似乎已经巩固了其在移动电话（cellular telephony）世界市场的领导地位。而法国的软件业界巨人，双子星号（Cap Gemini）于1999年也在欧洲攻占了相当大的市场，并且通过合并美国一些新兴的公司而对美国市场造成重大冲击。虽然以美国为基础的信息科技研发和生产仍然会持续超越欧洲（除了一些特殊例外，如诺基亚），然而在纠葛的信息科技网络中不断汲取新知和应用资源确保了欧洲的企业和制度的发展，并使其在全球市场中跟上高科技产业的脚步。依此看来，欧洲在信息时代的生产基础确实已经全球化了。

资本和信息技术的全球化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关于投资和贸易的古典议题，一个关于欧洲和全球化的重要的课题是，在真实的全球市场中，上有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排挤，下有低生产成本的新工业国，欧洲竞争力有可能衰退。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联盟和美国维持贸易平衡，和日本也是相当稳定，年复一年都是如此。和新的工业国家间则有赤字，但是欧洲国家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却不足以大到影响平衡。这是如何达成的呢？虽然是高工资、较保守的企业资金以及低技术研发，欧洲国家如何以其整体性来保持竞争位置？部分的解答可以说关乎时机的掌握。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尚未真正全球化，一些传统的部门如纺织和成衣已经受到亚洲和拉丁美洲竞争的冲击。而在欧盟之下大部分的欧洲贸易，策略性部门降低关税，例如汽车和农产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施行乌拉圭会议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规定。另一个重要因素是，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重新整合，使得欧洲的公司得以跟上（德国）甚至超越（法国）美国的劳动产值，确保了其在开放市场上的竞争力。以竞争对手日本来说，日本公司的劳工成本高于欧洲，而且日本信息业的重要部门如软件或网络设计等都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公司。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贸易和投资网络是跨越国家边界的。日本、美国和亚太的企业除了各自对欧洲的贸易外，在欧洲当地也都有投资和生产，同时，欧洲企业亦在亚洲和美国等地生产。有三分之一的世界贸易是跨企业和网络的，因此很多货物和服务的流通在贸易统计中看不出来（见第一卷第二章）。欧洲企业在欧洲面临输出竞争力减退时，就会在美国、亚太和拉丁美洲等地投资，并将此市场服务由海外据点例如新加坡等地输出回欧洲。在 1994~1996 年间，德国工业企业骤减其在德国的投资，并大肆在世界各地投资，特别是亚洲。例如在 1995 年，德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双倍增长，达到 320 亿美元的纪录，而在德国的投资则



减少许多。这就是投资活动的全球性以及转向海外投资网络的建构，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更能说明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并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全球市场上。

虽然欧洲 20 世纪 90 年代的资本、技术和生产投资等活动的特色是全球化，但劳工运动却相对地保守和局限。欧洲人民确实存在着一种被外国移民入侵的感觉，但此实际趋势却相当复杂，需要更多的实例来澄清，而这对回应欧洲认同的问题来说也相当的重要。^① 正如我在第一卷第四章中所论述的，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整个欧盟合法登记的外国人口比例维持在相当低的 4.5% 水平，但相较于 1982 年的 3.1%，确实有增加，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和英国外国移民比例较低，大多数的增加人口都移入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这情况到了 1990 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原因有四：第一，苏联和东欧藩篱开放，促使来自该区的移民显著增多。灾难预言家认为会有 250 万的苏联难民涌进西欧的情况虽未发生，但也有超过 40 万的来自苏联和东德，具有德国血统的德国人获得移民后的公民权，另外，也有数十万计的东德人移民到德国和奥地利。第二，南斯拉夫的种族隔离造成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不稳定，及伴随而生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战争掀起巨大的难民潮涌向德国和意大利。在此情况下，德国因其自相矛盾的移民同化政策而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由于德国国籍取得的困难，使得数百万计在德国长期居住者，包括在德国出生的人，在其土地上都被当作是外国人。另一方面，宽松的庇护政策，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政治和经济难民。在此双重影响下，在 20 世纪结束之前，德国外国人口的比例将会大幅增加到 10%。而此外国人口包括不合法和合法的移民在内。意大利亦深受阿尔巴尼亚动乱以及巴尔干半岛战事的影响。第三，欧洲内陆边界的开放，使得位于贫穷非洲大陆前缘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

^① 马西等 (Massey et al., 1999).

国家的移民骤增，移民可以选择留在这些国家或往北方国家寻找更多工作机会，(p.353)而这也使得可预见的未来南欧将会出现移民的高峰。第四，欧盟紧缩其边境管制造成非法移民暴涨。截至1999年，欧盟估计其境内的非法移民每年约有50万人。此人口的流动成为东欧地区黑手党有利可图的贸易大宗，包括贩售出口上千万的女人提供欧盟的男性公民嫖妓。伴随着来自地中海南端的人口压力将使得欧洲边防在21世纪面临戏剧性的挑战。美国南部边境格兰德河(大河, Rio Grande)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但却不相同，因为美国一直都是多文化和多种族的社会，但欧盟国家的欧洲人却长期渴望在文化和种族上达成同质的社会，而这梦想在今日势不可挡的全球化风潮中成为幻影。欧洲处于自我形象和新的人口现实之间相互矛盾的精神分裂状态，而此也将为欧洲认同在重新出发时，文化和政治互动的重要特色。^①

另外，全球化对欧洲统一的直接影响还有两个面向，虽然在书中他处也曾提及，但为论证之呼应我在此必须再说明一次，然而重复之处则毋庸赘述。首先，是通讯媒体的全球化和相互渗透(见第一卷第五章和第二卷第五章)创造出一个欧洲的视听空间，并且彻底改变欧洲的文化和信息，在这过程中使得它们与民(国)族国家渐行渐远。其次，方兴未艾的全球犯罪经济(见本书第三章)发现像目前欧盟这样半整合的制度体系正好是一个聚集繁衍的大好机会，因为新的资金、人员和信息流通很轻易地穿透国家控制并视若无睹。而欧盟警政控制发展缓慢的种种阻碍来自各国官僚体系抗拒放弃原有的权力垄断，因此创造了一个犯罪、权力和金钱勾结流窜无人管理的境地。终于，1999年10月，欧盟部长委员于芬兰举行的坦佩雷(Tampere)会议成立一系列提升警政合作的措施，以便逐步开创一个欧洲共同的司法空间。如此一来，欧盟政府虽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打击全球性犯

① 阿萨亚与卡斯特(Alsayyad and Castells, 2000)



罪的工具，但同时也必须打破疆界共享各国的主权。(p.354)

多面向的全球化塑造欧洲统一的过程对整个欧洲社会有着深远和持续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是欧洲目前福利国家的形式很难继续维持，因为流动的资本和生产网络化使得投资可以游走全欧以及世界各地，找寻较低的劳动成本、社会福利较差、环境保护限制较少的地方去。因此，20世纪90年代晚期，欧洲的厂商，特别是德国厂商在东欧国家大量投资（但在俄罗斯或乌克兰），以该地低廉的劳动成本以及他们加入欧盟的预期：在1999年，西欧在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等国总共投资了11亿美元，而此投资年增长率为20%。

欧洲要继续维持目前福利国家形式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发展，以及在欧盟国家投资相对减少等因素都降低了福利国家中劳工所赖的国库稳定性基础。相对于其他地区（例如美国）的相同甚至较低廉生产力的条件，欧洲如果不能在国际网络系统中有相对稳定的生产成本和工作机会，我们很难想象它要如何维持其福利国家的形态。事实上，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撒切尔和梅杰已经着手减低福利国家功能，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程度较轻）也都将减缩福利国家功能列为首要工作。如果英国的经验有任何价值，也并不表示贫穷、不公平和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美国也会跟进，毕竟福利国家仍然是保卫政府合法性的最后支柱。^①

伴随欧洲、东欧和美国/亚洲经济间分工和竞争之相对均衡，劳动市场也产生相似的过程，也就是网络生产的弹性化。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信息资本主义的特色被清楚地呈现出来。荷兰于20世纪90年代为使失业率维持在5%以下，所创出的工作机会

① 卡斯特 (Castells, 1996), 那弗洛 (Navarro, 1996)。

大部分都是兼职的工作。而根据一份德国“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地区工人”（Lander of Bavaria and Saxony）的报告报告，（p.355）到了2015年将有50%的德国劳工无法拥有一份稳定而全职的工作。^①如果此例具有代表性，全欧的社会结构未来将会有变动。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对全欧劳动市场弹性化的趋势也有相似的看法。^②

然而，我并不是说这一连串欧洲统一及欧洲社会的全球化是无法改变的过程。例如阿兰·杜罕（Alian Touraine）所说的，有一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自然力，要将社会变为经济，再将经济变成市场，并将市场变为金融流通。^③这只是一个简单粗糙的关于资本利润理性化的论点，却常获得新自由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的辩护，认为大部分企业都有全球视野并足以了解其社会责任及保护其社会稳定之需要。然而，阿兰·杜罕也指出，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反抗全球化行动通常是一些捍卫狭隘的合作企业等社会行动，这些企业通常都是由腐败的公共部门以纳税人的钱补贴，并且没有什么利润可言，^④例如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 pilot）。即使如此，呼应这些合作单位之特权部门劳工的抗议，在法国各地仍得到相当广泛的回响，他们一起反对缩编甚至可能裁撤的社会福利政策，反对劳动市场弹性化牺牲了劳工的稳定生活，并以人民对抗政客、国家对抗欧洲国家的措词来表达他们的不满。^⑤因为对抗的来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来自社会和经济，所以，他们用一种民族主义式的口气来捍卫文化认同，并对抗全球化市场的非人性力量以及欧洲主义的严苛契约。此外，1999年法国的农民在约瑟·布夫（Jose Bove）领导下

① 杜罕（Touraine, 1996c）。

② 卡诺伊（Carnoy, 2000）。

③ 杜罕（Touraine, 1996b）。

④ 杜罕（Touraine, 1996b, c）。

⑤ 杜罕等（Touraine, et al., 1996）。



对抗美国麦当劳快餐的文化建构，明确且口径一致要捍卫法国的认同（标志着法国烹饪与快餐的对立），抨击美国对法国美食进口以税制价，且以健康为由拒绝过度人工化的食品。上述这些政治诉求或社会抗争都是回应逐渐卷进全球经济的欧洲社会变动之各种控制或谋求出路等方式，不应该将之简化为只是新自由主义者和官僚政府部门间的传统对抗。（p.356）根本来说，此论辩应以一种信息时代的语言替代：这是流动的权力和认同力量之间的抗争。

文化认同和欧洲统一

全球化的旋风使得保卫行动在世界各地一触即发，且大多是围绕着民族和地缘认同（national and territorial identity）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第二卷第一章和第二章）。在欧洲，主要的威胁来自欧盟势力的扩张，市民对这些过程的反弹相当盛行，而这些反对声浪却被多数政治领导者强化为欧洲联盟适应全球化的必然过程，并宣称是经济调整、劳动市场弹性化以及福利国家缩水的必然结果，是每个国家进入欧洲联盟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① 既然在20世纪90年代整合过程的调适阶段伴随着生活水准的停滞、失业攀升以及社会不平等加剧，那么欧洲人民中的各重要团体就开始誓言要以民族（nation）来对抗被欧洲超国体所俘虏的国家（state）。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前欧洲时期，除了英国的一部分例外，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领袖阶层，不论是中间偏右还是中间偏左，都是亲欧洲的，而多数的公共意见则至多是

① 杜罕（Touraine, 1996b）

左右分明各守其位的。^①但是，反对移民日增的仇外运动激起了民族主义政治，包括奥地利和瑞士等一些国家，对欧洲公民来说，似乎已经永远拒绝了这些民族主义政治的极端主义印记。欧洲整合问题的争论的重点在于民族存在的理由（raison de nation），而不是关于国家存在的理由（raison d'état）。欧洲整合进程是否得以继续取决于各民族维护自身存续的能力，一个民族只有在其存续得以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允许整合继续进行：意即民族的认同不受到威胁，或是其认同朝向不同的方向而壮大其自身。但是如果一个民族觉得惟有通过国家主权的封闭和独立才能够继续维持其生存，并且不相信国家可以通过文化再生产来进行整合，那么民族将成为未来整合的最大阻碍。^②（p.357）

这个不安肇因于欧洲社会与日俱增的多种族和多元文化，并触发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结，因为人民的认同来自对抗超国体和文化的分歧。^③政治煽动家例如法国的勒庞（Le Pen）就是利用这种不安并通过政治系统和媒体来扩大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家的心里，将犯罪、暴力、恐怖行动与少数民族、外国人和他人联结在一起，将特别会在欧洲统一和排外的时刻掀起戏剧性波涛。事实上，这将与基督教时期的中欧统一有历史上的联结，那就是一个排除异己、异端和无神论者的宗教疆界。^④

另外，人民对欧洲制度/机构的不信任还有一个根本的来源，也就是近来所谓的“民主赤字”（the democratic deficit），因为影响人民生活的重要权力已经转移到由欧盟，主要是由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和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代表各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来执行此权

① 阿隆索·扎尔迪瓦（Alonso Zaldivar, 1996）

② 威弗（Waever, 1995: 16）。

③ 卫弗卡（Wieviorka, 1993）。

④ 方塔纳（Fontana, 1994）

力。许多重要的经济决策已经由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进行决策，因此，人民影响决策的能力已经大幅减低。在每四年一次的泛欧洲体系选举中，虽然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政府可供选择，但人民普遍感到置身事外，因为，人民觉得没有实质上可以运作的管道来参与欧洲制度。欧洲委员会的合法性危机日益严重，因为1999年议会调查结果揭露其不当的处理程序和小规模的贪污腐败，促使整个委员会下台。尽管由受到相当尊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罗曼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出任委员会总理挽回了某种程度的信誉，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事实上，在欧洲委员会中主管电子通讯事务的班杰曼（Bangeman）先生，于1999年6月受雇于西班牙电话公司（Spanish Telefonica）未来的顾问，却仍同时拥有委员会的官方身份，虽然没有正式违反规则，但此举普遍被认为是欧洲委员会这个布鲁塞尔官僚体系逐渐腐化的标志。此外，就像鲍佳（Borja）所强调并不存在所谓的“欧洲的冲突”（European conflicts）^①，（p.358）事实上，民主过程的基础并不只是建立在其所表述的一致性建构上，同时也民主地上演着不同行动者各自不同利益的竞争和冲突。但是，除了在布鲁塞尔街头抛掷农产品示威的农民之外（虽然已经受到欧洲或发展中国家的金钱安抚，但仍感到忧郁不乐），多数以欧盟决策为标的的跨国的集体动员都是无关痛痒的，欧洲人民在此见习过程中缺席，很大程度要归咎于欧盟制度本身一直沉溺于其科技官僚和部长会议的封闭世界里，例如，在20世纪末最有可能成为传播信息的电子通讯工具就被彻底忽略了。^②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欧洲化的同时，面临民主和市民参与的衰落，人民开始退缩回自己的国家，并加强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是民族主义而不是联邦主义伴随欧洲整合过程而发展，所以，除非欧盟可以掌

① 鲍佳（Borja，1996：12）。

② 信息社会高阶精英群会议（HLEGIS，1997）。

控或调和，民族主义才能成为一种政治建构。就像威弗（Waever）在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看法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虽然欧洲建构会接受法国式的民族认同，也就是围绕政治认同为中心的民族认同，但欧洲的民族可能会高举并主张德国式的民族认同（Volk），以一种语言为基础的建构。^① 此二者听起来似乎有所矛盾，但这可能是除了共同市场之外，能够促进欧盟发展的制度性和社会性接合的两个主要认同原则。

但是，如果民族独立于国家之外，成为欧洲建构过程的认同合法性基础，哪一种民族将成为问题的焦点呢？从法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民主公民权之普遍原则，全面消除了多元的民族认同，所以当法国以“法兰西”（La France）之名回应和挑战欧洲制度时，此名词将被理解为相当于戴高乐或法国共产党。虽然原因不同，在德国的情形也相当清楚，由于强调种族血统，在拥有甚至数以万计移民的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当地出生的移民之子也不算德国人，所以德国人血统依旧没有被混染；（p.359）而此情形在1999年由基督教民主党精心策划反对社会民主党/绿色政府的种族同化法案大获全胜之后将不会改变。在其他多民族的国家诉诸民族认同则更加复杂，例如在西班牙、英国和比利时、卡泰隆尼亚或苏格兰人会坚持其民族认同抵制欧洲的制度吗？或是刚好相反，他们会因对欧盟的偏好，放过，而不对抗西班牙和英国的政府吗？^② 此外，北意大利地区对“巴达尼亚”（Padania）的认同遭到奚落和揶揄，只因“北列格区”（Lega Nord）领导人博西（Bossi）的浮夸奢糜气质所致。诚然，此认同根本上是经济性的、甚至更狭隘地说是财政考量的，但是也有其19世纪末意大利的人为整合之历史根源，其发展应该超越政治轶闻的形式。即使不存在巴达尼亚认同

① 威弗（Waever, 1995: 23）。

② 基廷（Keating, 1995）。



的问题，从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来看，也相当令人怀疑意大利和一些地区可安然共度到 20 世纪结束，包括梅佐乔尔诺 (Mezzogiorno) 以及至今关系仍疏离的伦巴第 (Lombardy)、皮德蒙 (Piedmont)、或是艾米利亚 - 罗马涅 (Emilia - Romagna) 等地。^① 退回到以民族认同原则为堡垒，在有些国家里强化了一些民族国家和欧盟的对抗，同时也强化了欧盟和其他民 (国) 族国家间的对抗。

认同的追寻探索，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剥夺公民权的调整器，弥漫于民族国家深层之内，并为欧洲区域和城市添加了新的动力。如同欧斯壮·莫勒 (Orstrom Moller) 写道，欧洲的未来模型将由经济国际化和文化分散化二者的作用力组合起来构成^②。在目前，与国家层级与超国体相比，区域和地方政府 (Reg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正扮演复兴和重振民主和民意的角色，显示人民对底层的政府的能力有高度信心，在经济发展的策略制定和国际性公司的协商互动中，城市已经变成一个重要而关键的角色。城市和区域 (cities and regions) 已经建立的欧洲网络 (European networks)，统筹倡议，相互学习，建立起一个新的合作和竞争的原则，我们已在别的地方阐述过这些实践了。^③ (p.360)

从一个轻松的角度来看，有一个比喻可以说明我认为会越来越重要的地方认同和欧洲网络的双边互动，就好像是说在过去这十年，有一支专业球队，足球或篮球之类。众所周知，地方球队在本质上是聚集人民的认同的焦点，但当国际竞争持续加温时，最大的注意会投向欧洲的比赛（比方说欧洲共有三支足球队），因此，在国际竞赛争夺奖牌的队伍便成了“欧洲”可以达成此目标的队伍。在此同时，也可以看到欧洲球队开放劳工市场，产生

① 金斯堡 (Ginsborg, 1994)

② 欧斯壮·莫勒 (Orstrom Moller, 1995)。

③ 鲍佳与卡斯特 (Boja and Castells, 1997)

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移民球员，意味着在地方球队中有外国球员显著的比例有关。其结果是人们动员围绕着它们的城市认同，由一群外国专业球员代表上阵在欧洲联赛中竞争。就是通过这种形式的生活机制，真正的欧洲才会被实现——在有意义且活生生的认同中分享经验。然而，统一的进程要如何在这强劲的全球化旋风与地方性温暖的炉火之间前进呢？

欧洲的制度：网络国家

当我们回顾欧洲统一衍生的各种观点和利益的矛盾时，也可以看到多数国家的人民对此缺乏热情，因此，在千年之交此前卫的整合过程看来近乎神奇。部分解释整合能够顺利完成的原因是欧洲联盟并未取代既存的国家，相反地，欧盟成为保障各国主权不受影响的条件下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以及在全球化时代里各国掌管国内事务的基础。然而，整合各种利益需要寻找一个制度性表达的机制来操作，因此，综合各国政府决策的欧盟制度相当复杂、变动及多边性（欧洲理事会，每六个月召开高峰会议、议会主席的轮流原则以及部长级议会的常会等），一般性的欧洲事务则是由欧洲委员会政治性任命的技术官僚来管理，而关于合法性的象征性表现则诉诸欧洲议会、司法庭、陪审庭等。（p.361）

这些制度机构中无止境的协商沟通及各国的角力竞逐，看起来虽然相当庞杂繁琐且缺乏效率，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其能够在不同利益和多变的政策间（不仅来自不同国家，而且来自各国政府不同政党取向的各种政策）拥有调适的能力。但是此操作程序因欧洲单一货币的出现、操作层面的扩大而会变得更加复杂，有些国家，如英国和丹麦运用其退出条款（opt-out clause），有些国家则交涉拥有一般通则之外的特别待遇，同时也因



为欧盟各国情况或条件之差异越来越大，随着各种不同的议题变化，投票程序将会改变。从一方面来看，部长会议采用的多数表决投票使得大部分国家能够执行推广计划决策，而不会受制于其国内特定利益或少数联盟或团体的牵绊；而另一方面，欧盟决策的多数表决的强制能力推广到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段时却有相当的弹性。就如同阿隆索·扎尔迪瓦（Alonso Zaldivar）所写的，在欧盟的体系之下，联邦和邦联的逻辑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例如，邦联或政府间的逻辑会优先考虑防卫、治安和公共支出等事务，而财政金融措施、贸易、居留，以及资金、财货、人民等流通管理等事务，欧盟的功能将会较接近于联邦或超国体。而其他事务，例如外交政策、环境、税务和移民等，欧盟将会采取中立的立场。在未来，欧盟的扩展将会越来越有弹性而越少制式规定……此制度体有可能较接近网络状而非树枝状，然而各种政治学理论都尚未提出一个简单又明了的词汇来说明此制度形态，虽然学理建构并不会太困难，但是它不能够只是满足学术官僚的构思，而且它必须能够被市民接受。^①在不危及决策能力的情况下，欧盟逐渐建立合法性的关键性因素在于其制度组织和各国以下的（subnational）政府层级（区域或地方政府）联系的能力，欧盟组织借着有技巧地运作补偿性原则（subsidiarity principle），关照接管较低政府层级或民族国家不能实现效率的事务。而最能够说明这些关系的是区域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Regions），（p.362）一个拥有222个会员代表欧盟国家区域或地方政府的咨议性体制。欧洲再合法化（relegitimization）的过程将会在蓬勃发展的地方或区域政府，经由各自政府的管道或直接和欧盟的计划联系致力于经济发展、文化表现或社会权力等各层面水平联结的关系中真实地展现出来。^②

① 阿隆索·扎尔迪瓦（Alonso Zaldivar, 1996: 352-353）；译卡斯特尔。

② 鲍佳（Borja, 1992）。

基于欧洲政治过程日益复杂与弹性化，科罕（Keohane）和霍夫曼（Hoffman）提出看法，认为“欧盟在基本上是一个网络的组织，意味着主权的联合和分享而不是将主权转变到更高的层级。”^① 威弗（Waever）将此分析近一步发展并理论化^②，将欧洲的统一视为与新中世纪精神（neo-medievalism）相近的制度特色，意即多元权力之交错重叠。此说法乃源自海利·布尔（Hedley Bull）多年前提出的概念，当时也曾引起诸多欧洲研究的分析和回响，例如阿兰·明克（Alain Minc）就是其中之一。^③ 虽然历史学者可能会反对这样的比拟：欧洲制度之新国家形式的意象非常适合用“网络国家”（the network state）来说明。此时国家隶属于网络之中并共同分享权威（意指最后的手段，诉诸合法化了的暴力的能力）。就网络的定义而言，是很多的节点，而不是一个中心。这些节点大小可能不同，而且在网络中的相互联结关系也不对称。所以网络国家并不排斥成员间不平等的政治关系。事实上，所有政府制度在欧洲网络里是不平等的。各国的政府部门仍然集中掌握大部分的决策能力，且国家间的权力有很重大的差异，因为权力的层级在各个面向都不相同：德国经济实力居重要地位，英国和法国则较看重军事，至少需和科技能力一样强。然而，且不管这些不对称关系，欧洲网络国家的各个节点相互依赖，所以没有一个节点，甚至是最强的也不能忽视其他节点的存在，而甚至是最弱小的也会在决策过程中。如果有些政治节点不愿遵循，将会使整个系统出现问题，这就是网络政治和传统的集中的政治结构不同之处。（p.363）

政治理论最近的辩论和一些证据似乎都提出网络国家，在几何形势上变动的主权做为对全球化回应的政治体系。而欧洲联盟

① 科罕和霍夫曼（Keohane and Hoffman, 1991b: 13）

② 威弗（Waever, 1995）。

③ 布尔（Bull, 1977）；明克（Minc 1993）



可能是最清晰的实例说明这种国家形式的浮现，可能是信息时代的国家特色。

欧洲认同或欧洲计划？

然而，最后的结果——可能欧洲的统一并不全是精密的政治工程。在民主社会当中，欧洲的统一惟有其市民意欲完成才有可能，而且须在不同程度条件及尚未浮现的形式之下完成。以我在三卷书中所阐释的社会趋势来看，此统一形式未必一定会在以治理全球化为手段的基础之下发生，特别是此治理可能会危及许多不同部门的人口时。如果说意义和认同有关，而认同又限定在国家、区域或地方时，欧洲统一将不能超越共同市场的局限——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没有不同。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欧洲的统一需要欧洲的认同。

然而，欧洲的认同此概念却充满了问题，^① 因为教会和国家分离，以及欧洲人对宗教不太热衷，即使有很普遍的反回教行动象征十字军东征的历史精神，也不可能如其历史般建立在基督教之上。但也不能建立在民主之上，首先，因为民主是普世共享的价值；其次，主要是因为民主对目前民族国家的依赖而陷入危机当中。（见第二卷第六章）在欧洲对种族一词越来越分歧的时刻，要将认同建立在种族之上将会变得很困难而戏剧性。也绝对不可能建立在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之上，虽然在欧洲统一的进程中继续保留民族认同是必须的。而在核心经济变得全球化，越界（cross-border）生产网络开始将欧盟和东欧及东南亚等世界其他地区连成一体，欲捍卫一个欧洲经济的认同〔“欧洲堡垒”

① 阿萨亚和卡斯特编（Alsayad and Castells, eds., 2000）

(Fortress Europe)』也变得相当困难。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的人除了能感受到法国、西班牙等,是否能感觉到欧洲?^① 是的。而他们是否知道它是什么意思?(p.364) 大多数人的答案则是否定的。你知道吗?虽然欧元发行了,其特殊的经济意义会被遗忘,除非欧洲社会有更宽广的文化转型。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所谓的欧洲认同存在。但它是可以被建构的,建立在国家、区域或地方认同的互补之上而非矛盾之中。它将以一种我曾定义的社会建构方式进行,第二卷所讨论的计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也就是一种蓝图设计,以能够吸引社会上大多数人且不排除任何人的社会价值和规范性目标为原则。而所谓的民主或是民族国家是工业发轫之初的历史呈现和计划。在此信息化时代欧洲认同计划的内容将是什么呢?我也和大家一样各有偏好,但这些偏好不应该妨碍我们探索此历史塑造的过程。社会行动者在对抗全球化及其对公民权的剥夺时,论述和实践不会退缩回社区主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② 对福利国家、社会安定、就业稳定,以及劳工权益的捍卫;关心全人类的权利以及第四世界的苦难;对民主的再肯定,及市民参与在地方和区域层次的扩张;根植于历史/地方的文化,在语言中展现活力而不屈服于虚拟实境的文化……。可能大多数欧洲公民都会支持这些价值。他们对这些价值的肯定,例如捍卫福利国家和就业稳定以抵抗全球化的压力,将会带来经济和制度上异常的改变。而这正是所谓的认同计划: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声明或梦想,而是在经济发展、社会能力(sociability)和治理体系(governance)等寻求另类出路的抗争和努力。欧洲的计划性认同正在发芽,也许只有当这些芽能找到政治表现的空间时,欧洲统一的过程才会持续并终于完成。(p.365)

①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October 23d, 1999)。

② 杜罕(Touraine, 1997)。

结论 理解我们的世界

这意思是说我们才刚
踏进生命
就仿佛新生般地到来；
我们不要让嘴巴塞满
这么多变动的名字，
这么多悲哀的礼制，
这么多华丽的字母，
这么多你的跟我的东西，
这么多文件的签署。

我有心弄混事物，
结合他们，令他们重生，
混合他们，解脱他们，
直到世界上所有的光
像海洋一般地圆一，
一种慷慨、硕大的完整，
一种爆裂、活生生的芬芳

——巴贝洛·聂鲁达，《太多名字》片断，《狂想集》。中
译引自《聂鲁达诗精选集》，第158~159页陈黎、张芬龄译

这是三卷本《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总结论。我试着避免重复。结论中所使用的理论概念的定义（例如，信息主义，或是生产关系），请参照本书第一卷的总导言。针对网络社会概念的阐明可见第一卷结论，而分析文化认同、社会运动与政治间的关系，则见第二卷结论。（p.366）

新世界的开端

在此千禧年之交，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成形。此新世界的开端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与 70 年代中，历史巧合有三个独立发生的过程同时进行：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随后发生的再结构；文化上的社会运动遍地开花，像自由意志论、人权、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等。这三个过程的互动与它们所触动的反应，带来了一个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即网络社会；一个新经济，也就是信息化/全球经济；一个新文化，真实虚拟的文化。而深植于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内的逻辑，已经成为整个相互依赖世界里的社会行动与制度的基础。

这个新世界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已经在三卷书所提出的调查研究中加以界定了。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主义的浮现，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在信息主义之下，财富的生产、权力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信息技术变成为有效执行社会—经济再结构过程的不可或缺的工具。特别重要的是它所扮演的角色，提供网络化（networking）的发展成为人类活动组织的动态、自我扩张（self-expanding）的形式。（p.367）这个占主流优势的网络化逻辑转化了所有社会与经济生活的领域。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发生了危机，并促成它们从 20 世纪 70 年



代中开始进行再结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公司与政府持续进行许多措施与政策的同时产生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其特征为核心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的弹性化，管理在劳动关系上获得更大的权力等。福利国家做为工业年代社会契约的基石，因为竞争的压力、弹性的工作及弱化的组织劳工而萎缩。新信息技术在催生此年轻和弹性化的资本主义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它提供网络化工具、远距传播、信息储存/处理，统筹协调工作的个体化，并且同时集中和分散处理各种决策。

在这个全球的、相互依赖的经济中，新的竞争者、公司与国家开始对生产、贸易、资本、劳动等利益分享且与日俱增。一个强大的，有竞争力的太平洋经济浮现了，虽然有持续的经济危机与系统不稳定发生，在世界各地仍进行着工业化与市场扩张的新过程，这些都扩大了全球经济的范畴与规模，并建立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多重文化基础。资本、劳动、信息与市场的网络将世界各地的技术、价值机能，不同的人和地方都联系在一起，但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没有价值或利益的人们和地域的网络却是关闭的 (switching off)。结果造成社会排斥以及社会、城市里的地区、区域，整个国家中许多不相干经济的区段 (segments) 产生，形成我所谓的“第四世界”。其中有些人和地方会铤而走险和全球犯罪挂钩，脱离自身的边缘性，造成我所谓的“异常联结”，此时犯罪组织趁机利用这些人和地方困苦处境，推动全球犯罪经济而获取利益。它的目标在满足被禁止的欲望，并提供非法商品满足富裕的社会和个人无止境的需求。

而国家主义的再结构证明是更加困难的，尤其是对身处于国家主义国家与政党广大网络的中心且为世界上具主导性的国家主义社会——苏联而言更是如此。事实证明苏维埃国家主义没有能力消化信息主义，所以经济增长动弹不得，并确实削弱了军事机器这个国家主义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p.368) 警觉到停滞与衰退使得一些苏维埃领袖，由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都试图再

结构现行体系。为了克服来自党/国家的惯性与抵制，改革派的领袖开放信息，并召唤市民社会支持。然而，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表现与人民对民主的需求，并不容易引导到一个规范性的改革计划之内。事件的压力、策略运用的错误、政治上的无能与国家机器内部分裂导致苏维埃共产主义突然瓦解，成为政治史上最非比寻常的事件。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家主义体制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也决定性地削弱了。从历史的标准来看，崩毁的速度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曾主宰 20 世纪的革命性实验，同时也结束了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间的冷战，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分割我们的世界，决定地缘政治，并萦绕纠缠我们的生活。

国家主义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宣告结束了，虽然还有中国的国家主义，为了各种现实的目的，采取一种更复杂的、微妙的道路走向历史的出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所述。为了使我在此处说明的论证更一致，让我提醒读者，在此千禧之交，中国的国家仍然完全在共产党所控制下，并在代表着国家的民族主义计划（nationalist project）基础上，组织起来编入全球市场经济。这个有社会主义特性的中国民族主义，正迅速由国家主义移向全球市场经济，从而试着找到一条既适应信息主义却避免开放社会的道路。

在国家主义做为一个系统崩溃之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更加兴盛，且深深地穿透各个国家、文化与生活领域。不论社会与文化的景象高度变化，在历史上第一次，全球都被按一种共同的经济规则组织起来。然而，这是一种十分不同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工业革命中形成的，或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按经济凯恩斯主义与社会福利主义的形式所浮现的资本主义。在目标上，它有更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形式，但是在方法上它却比它的前身有更多的弹性。这是信息化资本主义，仰赖以创新为诱导的生产力，以及全球化为取向的竞争力来产生财富，



以及选择性地占为己用。它比过去更深植镶嵌于文化之中，更将技术做为工具来使用。但是这一次，在一个全球交换的循环网络中，文化与技术都更依赖能真正发挥知识与信息作用的知识与技术能力。

然而，社会，并不只是技术与经济的转化结果而已，同时也不能将社会变迁局限于制度性的危机和调适。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生的同时间里，强大的社会运动在工业化的世界中几乎同时遍地开花，先是在美国与法国，然后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日本、巴西、墨西哥、捷克，在许多其他国家也都有回响与回应。做为这些运动的一个参与者（1968年我是巴黎大学南特校区的社会学助理教授），我为他们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作证。^①虽然他们经常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其激进和前卫，却与马克思主义没什么关系，因此也与劳工阶级关系很少。他们基本上是文化运动，想要改变生活而非夺权。他们直觉地认为进入国家体制会使运动被收编，而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家则是叛离了运动本身。他们的野心包含了一种对霸道权威多重向度的反应，一种对抗不正义的反叛，以及寻求个人的实验。虽然经常表现为学生运动，却非学生运动，因为他们渗入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他们的价值观回响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当然，他们在政治上被击败了，因为，就像历史上大部分的乌托邦运动一般，他们不会妄求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他们带着高

^① 关于自由意志主义，有必要针对中文读者的历史与政治脉络略做补充。作者所称的自由意志主义系指，做为一种原则，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反对在所有情况下国家有优于个人的权利。它有两条主要的传统：一、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中的个人主义，极端的自由主义传统；二、无政府主义（安纳其主义），有时称为自由意志的共产主义（libertarian communism）。个人赞成平等主义的社区，但是，个人与社区的权利却不对任何更高的权威低头或投降。在20世纪前三分之一，自由意志论的共产主义，在俄国、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中十分重要。

度的历史生产力，带着许多他们的信念和梦想，逐渐隐退，而这些信念却在社会中发芽，盛开为文化的创新。对此，政治家与思想家们得花上好几世代来讲述：由这些运动所涌现的理念就是环境主义、女权主义、对人权的捍卫、性解放、族群平等与草根民主的来源。20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文化运动，坚持以个人的自主性来对抗资本和国家，为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抛出不同的看法。当20世纪90年代，工业年代以来的制度的合法性面临危机并且民主政治意义也变得非常模糊时，上述的这些理念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es）的建构铺平了道路。

社会运动并非经济危机的反应。事实上，做为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者，他们活跃崛起的20世纪60年代末，是经济持续增长与充分就业的全盛期。他们催生了一些劳工罢工，像在法国，助长了政治上的左翼，像在意大利，但他们不是工业年代围绕资本主义阶级分裂而组织的左/右翼政治的一部分。（p.370）广义来说，虽然他们与信息技术革命同时存在，大部分运动的价值或是批判都相当地忽视了技术，除了一些反对去人性化机械的呼唤，以及反核（在信息时代是一种过时的技术）的主张之外。如果说社会运动原本是属于文化的范畴且和经济及技术的转换无关，但是这些社会运动的确对也确实对经济、技术造成影响，并确保了再结构的过程。他们的自由意志的精神相当程度影响了运动朝个体化发展的方向，且使技术应用分散化。他们与传统劳工政治明确分离，弱化了组织化的劳工，使得资本再结构的过程更顺畅。他们的文化以开放性为象征来操弄刺激技术的实践，建构了想象再现的新世界，发育成真实虚拟的文化，他们的寰宇性（cosmopolitanism）与国际性建立了世界相互依赖的知识基础。他们对国家的厌恶侵蚀了民主仪式的合法性，虽然也有少数运动领导者持续致力于政治体制的更新。更甚者，经由拒绝有序地传送永恒的符号和价值，如父权家长制，宗教的传统主义，与民



(国)族主义等，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为全世界各社会的根基的分裂搭起了舞台：一方面，活跃的、在文化上自我界定的精英，以他们经验为基础建构他们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越来越多被剥夺了信息、资源与权力而感到不确定、不安的社会群体，他们围绕这些曾被造反的20世纪60年代所贬抑的永恒价值，挖掘他们抵抗外界的**战壕**。

技术革命，经济再结构，以及文化的批判三个历程汇聚并历史性地重新定义生产、权力与经验关系，而社会则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

一个新社会

一个新社会的浮现，同时我们可在生产关系中，权力关系中，与在经验关系中，观察到一种结构性的转化。此转化导致空间与时间的社会形式经历相当实质的修改，以及导致一种新文化的浮现。

在本三卷书中所展现的信息与分析，对此第二个千禧之末发生的多面向的转化提出了清楚的论述 (p.371)，我将综合说明此转化的各个方面和主要特色，读者可参考各章包含的主题找到经验材料以增加呈现于此的结论的可信度。

生产关系已经转变，不论是在社会面与技术面。当然，它仍是资本主义，但是是一个和过去种类不同的资本主义，我称为信息化资本主义。为了清楚之故，我将依序审视生产过程、劳动与资本的新特性。然后，阶级关系的转变就能被看出来。

生产力 (productivity) 与竞争力 (competitiveness) 是信息化/全球经济的指挥性程序。生产力基本上来自创新，竞争力则来自于弹性。所以，公司、区域、国家以及各种经济单位，都将

它们的生产关系调整到最高限度的创新与弹性。信息技术与使用它的文化能力，是新的生产功能展现不可或缺的。此外，新的组织与管理，目标是同时具有调适性与统筹协调性，并成为操作系统最有效率的基础，我所称的网络企业就是例证。

在这个新的生产系统下，劳动（labor）的角色被重新界定为生产者（producer），并且按照工作者的特征精确地被区分开来。主要的区分就是我说的无标签一般劳工（generic labor^①）与可自我教育和设定（self-programmable）的劳工两种。区分这两种劳工的关键品质在于教育，获取更高教育的能力；也就是吸收和活用知识与信息。教育与技能（skill）两个概念应该区分一下，技能可能因技术与组织变动而很快过时，而教育是过程（不同于孩童与学生时期的知识批发），由此，人，即劳工，所获得的能力是能针对既定任务再界定后所必要具备的技能的能力，以及接近学习这些技能的资源。只要受教育，任何人在适当的组织环境中，都能朝向生产过程无止尽变化的任务来重新设定他/她自己。另一方面，无标签劳工被委以既定任务，没有再教育的能力，而除了接收与执行信号的能力，并未预设有活用信息与知识的情境。当然，这些“人类终端机”能够被机械取代，或是被围绕城市、乡村或是世界有赖企业决策的任何基地所取代。而它们对生产过程是集体地不可或缺，它们在个体上是战略上可牺牲的消耗品，价值是为每一个小碎片所增加上去的，而它又是被组织所产生的。来自不同来源与区位的机器与无标签劳工，栖身于生产系统的相同的恭顺从属的回路之中。（p.372）

弹性是依网络企业组织的需求而制定的，它们需要网络工作者、弹性工作者，还有一大堆工作配置，包括自我雇佣者以及互惠的外包者等。这些工作安排的不同的排列组合使得工作的合作形式去中心化，以及劳动力个体化。

^① 又称为“无印劳工”



信息化/全球经济是资本主义，事实上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经济体更如此。但是，在这个新经济中资本也和劳工一样被转化着。规则仍然是为了利润而生产，以及在所有权的基础上，利润为私人所占用——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这些利润占用如何发生？谁是资本家？回答这个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必须界定，而只有第三个层次是信息资本主义特有的。

第一个层次涉及财产权的所有者。基本上有三种：(a) 公司股东，一群在制度上无名的股东越来越有势力，他们投资与撤资决策经常仅仅为短期财务考虑所指导；(b) 家族所有人，仍然是以与资本主义关系密切的形式，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以及 (c) 个人企业家，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心智为其主要资产），冒险家，以及自己创造利润的业主。最后一类是工业资本主义起源的基础，大部分已被公司资本主义所逐步淘汰，而在信息资本主义下，利用新生产系统所需的卓越的创新与弹性特色，又显著回潮。

第二个层次的资本家的形式与管理阶级（the managerial class）有关；即股东的资本资产的控制者。伯利（Berle）与明斯（Means）^①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指出，这些管理人员的卓越性，至今仍然是信息主义下建构资本主义的核心。我看没有理由不把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包括在内，他们为了所有现实的目的，顺着相同的逻辑，分享相同的文化，减少纳税人已同意认购的损失风险。

资本家占用利润的过程，第三个层次既是老故事又是新的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理由存在于全球金融市场的性质之

① 此处的伯利与明斯指 AA. Berle and G. C. Means，他们 20 世纪 30 年代的古典研究就指出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关系中，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分离的重要意义。（见：《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New York: Macmillan, 1932）

中。在这些市场中，所有的利润都最终集中在追求更高的利润。事实上，在股票市场、证券市场、货币市场、或在期货、期约选择权等，亦即在整个金融市场中的获利，除了一些投机失败的例子外，都比直接投资的利润大得更多（p.373）。但这并不是因为金融资本的本性使然，长久以来它是资本最古老的形式。而是因为信息主义下它所操作的技术条件。换句话说，经由电子手段，撤废了时间与空间，其技术与信息能力无情地扫瞄整个地球的投资机会，在以秒计的形势下由一个选择移向另一选择，让资本恒常运动，所有的资金来源都融入这个运动中，相当于财源自身互相投资。金融管理模型的计划与预测能力使它有可能进一步掌控人类的未来，以及未来的缝隙（也有可能发生的剧情），并贩卖这类非物质的财产权“虚拟财产”（unreal estate）。在此游戏规则下，全球赌场中没有什么事物是罪恶的。毕竟，只要谨慎小心的管理与适当的技术避免了市场戏剧性的摧毁，一部分人的资本的损失却是其他人的成功；因此长期来看，市场均衡并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然而，因为利润的差额和获利空间是来自财货与服务的生产，而不是金融投资本身；而所有形式的个人资金的命运却取决于其投资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于是资金流动绝不能停滞。所以，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它们的管理网络，是真正的集体的资本家（collective capitalist），是所有积累之母。这并不是说金融资本支配工业资本，这种过时的二分法并不符合新的经济现实。实际上，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全世界的公司，总的说来，在其贸易进行中，自我筹措了大部分投资的资金，银行并未控制制造业公司，也没有控制它们自己。而是各类型的公司，金融生产者、制造业的生产者、农业的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者，还有政府和公家机关等，利用全球金融网络做为其薪资与潜在更高利润的托付保管者。它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信息化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是全球金融网络。它们的运动决定了股票、债券与货币的价值，带给储蓄者、投资者、公司与国家意想不到的幸运或厄



运。但是，这些运动并没有一种市场逻辑可循，市场被扭曲、操控和转化，在电脑设定的调遣策略、多重文化的群众心理，以及全球资本流动和互动越来越复杂所导致的不可预期的狂乱之下。(p.374) 虽然，有顶尖的经济学家正试着在博弈论 (game theory) 的基础上模式化市场行为，而他们发现的合理预期模式的伟大努力成果，很快就会被载于金融巫师的电脑中，藉由此知识来更新已知的投资模式，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这些社会阶级关系 (social class relationships) 发展的因果关系和他们本身一样复杂和深奥。但是在界定它们之前我需要区分阶级关系的不同利益。其中一个取向是沿着社会阶层化理论的线索聚焦于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社会不平等 (social inequality)。由这个角度，新的系统所表现的特征是增加了社会不平等与两极化的趋势，即社会层级的顶端与底层同时增长了。这个结果有三点特色：(a) 能自我教育和设定的高生产性劳动者，与无标签的，战略上可牺牲的消耗性一般劳工间的基本分化；(b) 劳动的个体化，逐渐损害了其集体组织，因此放弃了工作力中最弱的部门而听任命运摆布；以及 (c) 在劳动个体化，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去合法化，福利国家逐渐让位的冲击之下，个别的无法自食其力者的安全网被摧毁了。这个不平等与两极化的趋势并不是无法改变的：它能由深思熟虑的公共政策来对抗与防止。但是不平等与两极化却设定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动态过程，除非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来抵消这些趋势才能够击败它。

阶级关系的第二个意识涉及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我意指在全球尺度的信息资本主义动态过程中，“人做为人” (people - as - people) 和“人做为工作者/消费者” (people - as - workers/consumers) 间的断裂。在本卷第二章中，我试着表明在不同情境中这个趋势的原因及结果。在这个生产的新系统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类，由这个系统逻辑的角度来看，其比例还可能日增，无缘做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我必须再度强调，这与有或将有

大量失业的说法不同。比较资料显示，总的来说，在所有的都市社会中，大部分的人与/或他们的家庭都是为了薪资而工作，即使在贫穷的邻里与贫穷的国家均然。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做什么工作，获得多少酬劳？正在发生的是大量无标签的一般劳工，流通在不同类工作中，临时工日增，以及大量的不连续性工作。所以，千百万人经常在有酬工作中进出，经常是非正式活动，以及，相当大数目是在犯罪经济的工作间里。(p.375)更有甚者，失去了稳定的雇佣关系，与许多工作者贫弱的讨价还价力量，导致他们家庭生活中危机发生率大为提高：失去临时工作，个人危机，疾病、药/酒瘾、失去称职能力，失去资产，失去信用等。许多这样的危机彼此相关，形成社会排斥的下降螺旋，滑向我曾经提到的“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由统计上来说，它很难逃脱。

在所有的社会，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日常求生存与社会排斥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其间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安全网，特别是后福利国家年代的新时代。人们不能跟上持续不断更新技能，在竞争的历程中落后，而他们曾是工业年代中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所以，社会排斥的过程不仅仅影响了“真正弱势者”，而且还包括那些不断打拼生活，避免陷落到底层世界的人和社会群体。那是个被污蔑为降级的劳工与社会性无能的人的底层世界。

了解新阶级关系的第三种方式，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关于谁是生产者以及谁占用了他们的劳动产品。假如创新是主要的生产力来源，知识与信息是新生产过程的基本原料，以及教育是劳动的关键品质，信息化资本主义的新生产者是一些知识生产者与信息制造者，他们对公司、区域与国家经济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但是创新不会孤立地发生，它是系统的一部分。在这里，组织的管理，知识与信息的制造，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是相互纠缠的。可以如此界定这个信息化生产者的范畴，包括一个十分



大的经理人、专业者以及技术人员群体，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工作者”（collective worker）；即，由许多不可分离的个别工作者合作所组成的生产者单位（producer unit）。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它们可能占了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大部分其他的工作者可能都属于无标签的一般劳工，有可能被机器，或是其他无标签的一般劳动力的其他成员所取代。他们需要生产者来保护他们的协商权力。但是信息化生产者却不需要他们：这是信息化资本主义的一种根本分裂，造成工业化社会阶级团结的遗风逐步烟消云散。

然而，是谁占用了信息化生产者的一部分工作成果呢？在某种意义上，（p.376）相对于古典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改变：他们的雇主占用了，因为雇主是在一开始的地方雇佣他们的人。但是，在另一方面，剩余占用的机制却是远为复杂的。首先，雇佣关系越来越倾向个体化了，意味着每个生产者都收到一份不同的合约。其次，有越来越多比例的生产者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过程，以及进入特殊的水平工作关系，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他们变成独立生产者，屈服于市场力，但是玩弄市场策略。第三，他们的工资经常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漩涡中，完全为全球富裕部门的人口所供养，以至于他们也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集体所有人，所以变得依赖资本市场的运作成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很难认为在高度个体化的生产者与全球金融网络的集体资本主义之间有什么阶级矛盾。肯定的是，就像无标签一般劳工广大群众一般，个人生产者也同样受到主管生产过程者经常性的伤害与剥削。然而，劳动的区段化（segmentation of labor），工作的个体化，与全球金融回路中资本的散布性，已经联合起来造成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逐渐消失。还是会有强大的社会冲突，其中有些是由工作者或有组织的劳工所策动，从韩国到西班牙都可看到。但是，他们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面是利益团体的需求，以及/或对不公平的反感和对抗。

信息时代真正的根本社会分裂是：第一，存在于信息化生产者与可替代的无标签一般劳工之间，也就是劳动者本身内部的片断化。第二，社会排斥在社会内造成明显区段，这些区段由被社会抛弃的个体所构成，他们做为工作者/消费者的价值被耗尽，做为人的相关性被忽视。第三，资本流动的全球网络市场逻辑与工作者生活中的人类经验相分离。

权力关系也一样正在被我在本书中界定与分析的社会过程所转化。主要的转化关乎民族国家做为一个主权实体的危机，以及政治民主化的相关危机，而它们是过去两个世纪所建造的。由于国家的命令无法被完全实施，以及它的一些基本承诺——福利国家的具体表现，不能被保持，以至于国家的权威与合法性双双告急。因为议会民主制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主权边界的模糊导致人民意志委任代表过程的不确定性。（p.377）资本的全球化，权力机构/制度的多边化，以及权威分散化到区域与地方政府造成权力的新几何形势，或许造成一种国家的新形式：网络国家（the network state）。社会行动者，及绝大多数的市民，经由在不同的机构/制度，不同层次的竞争间关系的网络中处理策略，将他们的利益与价值代表的机会增加到最大的程度。既有欧洲地区的市民假如他们支持区域当局对抗国家的中央政府，与欧盟联合，会有更好的机会来保卫他们的利益。或者反过来也是如此。又或者，与上述情况都截然不同，即经由确认地方/区域自主性对抗民族国家与超国家的机构/制度。例如，美国的不满现状的反抗者可以辱骂联邦政府代表的美国国家；或者新的中国企业精英可以由连接省级政府，或是仍旧有权力的中央政府，或是海外华人网络，来推展其利益。换言之，新的权力结构为网络的几何形势所支配，对既定的行动者与机构的配置言，其间的权力关系经常是特殊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信息化政治，主要是以象征操弄（symbol manipulation）的方式在媒体中上演，正好符合这个权力关系经



常变动的世界。策略性游戏，符合顾客要求的象征，与个体化的领导能力代替了阶级的拥护者，意识形态的动员与党的控制，它们都曾经是工业化年代中政治的特征。

当政治变成了剧院，以及政治机构/制度是讨价还价的代理而非权力基地，全世界的市民的反应都是防御性的，投票是用来防止来自国家的伤害，而不是委托他们的意志。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系统中的权力，显然不是其影响力无效，而其实已经虚位化了。然而，权力并未消失。在一个信息社会中，它变得铭刻在一根本的层次上：在文化的符号中。这些文化符码再现了人们与机构/制度的生活与决策，包括了政治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权力虽然真实，却变得是无形的，它是真实的，因为无论何时与无论何地，它暂时巩固了，提供了个人与组织有能力来执行其决定，不管他们当中有无共识。但是它是无形的，是因为这样的能力源于架构生活经验的能力，在某种范畴下易接受某种既定的行为，然后表现出对某种领导的拥护。举例来说，如果人们感觉受到一种无法辨认、多重向度的恐惧时，这些恐惧将会在移民 = 种族 = 贫穷 = 福利 = 犯罪 = 丧失工作 = 税金 = 威胁等一系列符号下被架构出来，提供一种可兹辨认的标的，界定出一种“他们”和“我们”的对立，并使许多坚信需要一定程度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领导们从中获利。(p.378) 或者，在一个十分不同的例子中，如果人们将生活品质等同于自然保育和他们的精神宁静，新的政治行动者就可能浮现，新的公共政策就可能被执行。

信息时代的权力战斗是文化的战斗。媒体是他们主要的战场和战斗工具，但是媒体本身不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所具有的强制行为能力，存在于信息交换与象征操弄的网络中，经由图像、发言人与知识的扩音器，与社会行动者、机构/制度和文化的运动等发生关系。长远来看，谁在权力中真的不再重要，因为政治角色的分配变成普遍的与轮流。因此，不再有稳定的权力

精英，而是出自权力的精英 (elites from power)，也就是说，精英形成于他们通常简短的权力任期之中，在其中藉政治地位特权之便，取得较永久接近物质资源与社会关系的机会。文化做为权力来源，以及权力做为资本来源，构成了信息时代新社会层级性的基础。

经验关系的转化主要以父权家长制的危机为中心，对家庭、性别关系、性欲特质以及伴随的人格特质等根本重新定义。为了结构性的理由（关系着信息化经济），以及因为社会运动的冲击（女性主义、妇女的斗争与性解放），父权家长制权威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受到了挑战，虽然在不同的文化/制度的脉络以不同的形式与强度表现。家庭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父权家长制的未来则是：它只能在威权的国家与宗教的基本教义派保护下苟延残喘。就像在第二卷第四章中的研究所示，父权家庭在开放社会中有严重危机，平等主义家庭的新胚芽仍在与利益、偏见与恐惧的旧世界作斗争。人们的网络（特别是妇女）越来越替代了核心家庭，成为感情与物质支持的主要形式。单独的个人与他们的子女依着家庭延伸的模式、非家庭、或个人安排的模式终其一生。在父亲照顾小孩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同时，妇女们带着小孩——无论是单身还是与人同居，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不断复制的主要形式，因此在根本上成为社会化或社会再生产的修正变量。(p.379) 我承认是以美国与西欧的经验（在某个程度上，南欧是欧洲脉络中的例外）做为我的主要参考点。然而，正如我在第二卷中所主张的，它显示了妇女的抗争和奋斗，无论是否要公然称为女权主义，但它正在全世界流行蔓延，并逐渐削弱在家庭中、经济中以及社会制度中的父权家长制。我认为随着妇女抗争的普及，以及随着妇女对压迫的觉悟日增，他们集体挑战父权家长秩序，将普遍引起传统家庭结构的危机。我确是看见家庭改组的信号，无数男人似乎准备放弃他们的特权，与妇女一同工作，来找到爱情，分享与拥有子女的新形式。事实上，我相信以平等形式重建家庭



是由下往上重建社会的必要基础。在以工作个体化，市民社会解构，与国家去合法性为特征的世界里，家庭更提供了人们心理上的安全与物质上的幸福，然而，向家庭新形式过渡意味着整个社会中性别关系，以及其所决定的性欲特质的基本再定义。因为人格特质的体系为家庭与性欲特质所塑造，所以也处在流变的状态中。我称这种状态的特征为弹性的人格特质（flexible personalities），也就是能够无止境地从事自我重建，而不是将自我调适成昔日的常规性、不再适用或不再有意义的社会角色。在信息时代中经验关系最根本的转化，是社会互动的模式变成主要建构在关系中的实际经验之上。时下今日，是人们自己制造社会交往的诸多形式，而非依循行为的模式本身。

生产、权力、与经验关系的改变汇聚成社会的生活、空间、与时间等的物质基础的转化。信息时代的流动空间支配了人们文化的空间，无时间的时间成为社会趋势，藉着科技淘汰了工业年代时钟时间的逻辑，废止时间。资本回路、权力规则与电子传播，以交换的流动席卷于挑选的、有距离的地点间，而片断化的经验则仍被局限在地方之内。技术将时间压缩成为一个微小随机的刹那，因而将社会去连续性（de-sequencing），历史去历史化（de-history）。藉着流动空间中分割的权力，资本得以逃离时间，并使历史消融在朝生暮死的文化中，网络社会使社会关系变成了空壳，并且引进真实虚拟的文化。且让我解释它。

综观历史，文化是拥有时空的人们所生产的，在生产关系、权力与经验等条件的决定下（p.380），因为他们的计划而修改，彼此战斗，将他们的价值与目标强加于社会之上。所以，空间—时间的配置形态对每个文化的意义与其特定的演变而言，都是关键。在信息范型之下，流动空间与无时间性时间取代了地方与并废止了时间，新的文化已经浮现：真实虚拟的文化（the 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由第一卷第五章所示，真实的虚拟性，我意指真实本身（即，人们的物质/象征存在）完全沉浸于虚拟意象

的场景、伪装的世界里，在其中象征并不只是隐喻，而且包括真实经验。但是这些并非电子媒体造成的结果，虽然它们是新文化表现不可或缺的工具。为何真实的虚拟能够占领人们的想象及表征再现的系统，解释的物质基础为在流动空间与无时间性时间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方面，社会中的支配性功能与价值无需接触就可以同时被组织起来，亦即，在无须任何地域具体经验的信息流动里就可如此。在另一方面，支配性的价值与利益无需参考过去或未来就能在电脑网络与电子媒体的无时间性的景象中被建构起来，此处所有的表现不是瞬时的就是无可预测的次序。由所有时间与所有空间的表现都混合在相同的超文本中，按照发送者的利益与接收者的情绪，不断重新安排，随时随地传播。这个虚拟性是我们的真实，因为它是存在于这些无时间性、无地方性象征系统的架构中，在其中我们建构范畴，与唤起意象，它塑造行为、诱发政治、养育梦想以及触发梦魇。

这是信息时代新的社会结构，我称为网络社会，因为它由生产、权力与经验的网络所组成，在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全球流动中建构出一种虚拟的文化。然而，并非社会所有的面向与制度都跟随着网络社会的逻辑，就像工业化社会也包含许多人类长期以来生存的前工业形式一般。但是在信息时代中全部社会实际上都被网络社会普遍化的逻辑以不同的强度穿透了。它动态扩展，逐渐吸收与制服了先前存在的社会形式。

网络社会，就像任何其他的社会结构一样，并非没有矛盾、社会冲突以及来自其他社会组织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都是网络社会的特性所引起的，所以，它们与工业年代明显有别(p.381)。依此，它们化身为不同的主体，甚至这些主体有时与由工业化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继承而来的价值与组织所提供的历史材料一同起作用。

了解我们的社会有必要同时分析网络社会及其冲突性的挑战。历史的规律继续适用，哪里有支配，哪里就有反抗。但是仍



需要致力于分析界定谁是挑战者，在网络社会非物质但强大的支配过程将如何。

社会变动的新大道

根据观察，如第二卷中所载，对网络社会支配性模式的社会挑战一般以打造自主性认同的形式出现，这些认同置身于网络社会的组织原则之外。对抗技术崇拜、流动权力与市场逻辑，他们反对其存在、其信念与其遗产。信息时代以认同为主营造的社会运动与文化计划的特色是，他们并非源自市民社会的制度之内。由一开始，他们就引入一种另类的社会逻辑，不同于围绕社会支配性制度所营造的运转原则。在工业年代，劳工运动尖锐地与资本战斗。然而，资本与劳动却曾分享工业化的目标与价值——生产力与物质进步——每个都企图掌控发展，以及寻求分配成果中更大的部分，最后他们终于获得一份社会协定。在信息时代，支配性的全球网络的优势逻辑是如此渗透，以及如此穿透，以至于离开其支配的惟一方式似乎就是离开这些网络，以及在一个全然不同的价值与信念的基础上重建意义。这就是我已发现的抵抗性认同的共同体（communes）的情况。宗教的基本教义派并不拒绝技术，但是却将其服务神的律则，所有的制度与目标都必须屈服，不可能讨价还价。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族群分离主义与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es）和社会整个分裂，以及不是由下往上重建其制度，而是由内往外，以“我们是谁”对抗不属于集体一分子的那些人。

甚至是为了改变而动员的运动（proactive movements），（p.382）其目标也在于转化人们之间整个的社会关系，像女权主义；或是转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像环境主义。他们由拒绝我

们社会建造的基本原则开始：父权家长制与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当然，在社会运动的实践中还有各种细微差别，就像我在第二卷里试着理清的，但是，相当根本地，自我界定的原则是他们存在的根由，这意味着与制度化了的社会逻辑之间的决裂。如果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制度接受女权主义与环境主义，将产生本质上的转化。用个老字眼，它将是一场革命。

以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力量，是他们相对于国家制度、资本逻辑、与技术吸引力的自主性。很难收编他们，虽然有些参与者可能被收编。即使失败，就像我在第二卷中提出的一些个案所示，他们的抵抗与计划仍然冲击与改变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不能化约为网络社会的结构与动力，顺着我对我们世界的扫描，我们的社会看来似乎建构在“网络”（net）与“自我”（self）的互动，以及网络社会与认同力量的互动之上。

然而，社会变动过程所产生的基本问题是，他们主要是外在于社会的制度与价值，如其所是，它们宁为断片而非重建的社会。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共同体，而不是转化了的制度。我们会见证部落崛起，而不是社会阶级。我们会能观察到支配性的全球精英退缩于由传播网络与信息之流建立的、非物质的宫殿中，而不是流动空间功能与地方空间意义之间的冲突性互动。同时，人们的经验仍旧局限于多重的、隔离的地域，被抑制和片断化在其存在及意识之中。因为没有—个冬宫（Winter Palace）^① 可以被攻占，革命的爆发可能内爆（implode），转化为日常无意义的暴力。

欲借文化社会运动重建社会制度，并将技术置于人们的需要与欲望的控制下，似乎是一个长征，需要由基于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而营造的共同体，朝向这些共同体酝酿的价值观所催生的新的计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ies）为高度的

① 为俄国十月革命所攻占的对象



长征。

此过程实例，如同我们在当代社会与政治运动中所见的，是建造新的、平等主义的家庭；永续发展概念被普遍接受，营造世代间的团结朝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型；(p.383) 以及在任何需要捍卫人权之处普遍动员捍卫的。当此转换一旦开始，由抵抗性认同转换成计划性认同，一个新政治必将浮现。这会是一种文化政治，而它发生的前提是，信息化的政治强势地在媒体中上演，与象征符号战斗，并且和信息时代人们生活经验所涌现的价值与议题紧密扣连在一起。

越过这次千禧之后

贯穿全书，我坚决不让自己沉溺于未来学，尽可能贴近观察我们所知的信息时代带来什么，及其在 20 世纪最后消逝之时的建构。总结本书之时，仍须读者继续保持耐心，我仅想要以几段篇幅来阐述可能是 21 世纪早期社会的一些趋势，单纯地将这个发现与假说综合起来使其处于一个动态的、预期可能的状态。

信息技术革命将更凸显它转化的潜力。21 世纪将由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完成，以及移动通信与电算力量显示其特征，所以分散化与普及化信息力量，实现多媒体的许诺，以及强化互动式传播的乐趣。电子传播网络将建构我们生活的主题。此外，这将是遗传学革命完全盛开的世纪。第一次，我们的物种将识破生命的秘密，以及将能展现对生活情势的实质操控。虽然这将触发对此能力所造成的社会与环境后果的戏剧性辩论，而向我们开放的可能性却真正是非比寻常。若是高明慎重，遗传学革命可能治愈疾病，与污染战斗，改善生活，以及在求生存中节省时间与精力，以便给我们机会探索精神事物上许多还未知的新领域。然

而，假如我们犯下像我们在 20 世纪的错误，利用技术与工业化在凶暴的战争中彼此屠杀，以我们新技术的力量，我们可能完全结束这星球上的生命。相对而言，因为核能与核武集中化，核子瞬间的大屠杀反而较易被阻止；但是新的遗传技术则是普遍散布的，它们多变化的冲击目前尚未能完全掌控，而且它们的制度性控制也更分散。(p.384) 为了预防生物革命的不良后果，我们不仅需要有责任感的政府，而且需要一个有责任感、受过教育的社会。我们会走上哪一条路将视社会的制度而定，视人们的价值而定，以及视新的社会行动者塑造与控制他们自己命运的意识与决断力而定。让我提出一些经济、政治和文化主要的发展方向，并简要地回顾这些观点。

信息化经济的成熟化，与信息技术做为一个普及与适当利用的系统，将有可能释放这个技术革命的生产力潜力。当 20 世纪的语汇与步骤程序已然呈现不足，即将由新的衡量经济的概念所替代之时，我们也会看到统计量上显著的变化。毋庸置疑的是，21 世纪将见证一个，以历史标准来看，非比寻常生产力的系统的崛起。人类的劳动将以相当少的努力就可以生产得更多与更好。智力工作将在经济上最有生产力的部门替代体力劳动。然而，对个体而言，要分享这些财富取决于其获得教育的管道，以及，由于社会是一个整体，所以也有赖于社会的组织、政治与政策。

利用电信与信息处理力量的增加，全球经济将进一步扩展。它将穿透所有国家、所有领域、所有文化、所有传播流动以及所有金融网络，为了追逐利益无情地扫描捕捉全球各种新的可能和机会。但是它会十分有选择性地做，联系有价值的区段 (segments)，抛弃耗尽了，或无关的地域与人民。生产上领域的不均等性 (unevenness) 将导致一非比寻常的获利差异地理学，它将国家、区域与都会区尖锐地对照。有价值的地域 (locales) 与人民将在每个地方被找出来，即使是在撒哈拉南部的非洲，就像



我在本卷书里所提到的，但是被关闭掉的领域（switched-off territories）与人民也随处可见，虽然是以不同的比例。全球正为不同的时间管理体制所界定分割成许多可清晰区分的空间。

从被排除的人类的片断和区段来看，两种不同的反应能被预期。一方面，在此操弄下，我所称的“异常联结”将急速增加，以不同的规则玩弄全球资本主义的游戏。全球犯罪经济，我在本卷第三章中试着界定它的轮廓与动力，将是 21 世纪的基本形貌，以及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影响将穿透所有生活的领域。（p.385）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否能消灭犯罪网络，而是犯罪网络是否不会结束，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制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占了实质性的控制。

另外，还有一种对抗社会的排斥及经济无关联性的回应行动，我确信它会在 21 世纪中扮演根本的角色：被排斥的放逐者的放逐。因为全世界的生活基本结构会越来越纠缠在一起，在网络社会的逻辑之下，退出的人民与国家将不是和平地撤离。它将采取基本教义派主张的形式，或一组另类的生存价值与原则，在这原则之下，与深深伤害人民生活的邪恶犯罪系统没有可能共存。如我所写的，在喀布尔^①街上，妇女因衣着不当被塔利班的勇士攻击。而这并非按伊斯兰教人文主义的教诲行事。如第二卷的分析，基本教义运动爆发，手持可兰经、圣经或任何经文，诠释它与利用它，做为绝望的旗帜与狂热的武器。不同种的与不同来源的基本教义派展现了最敢于不妥协地挑战信息化、全球化资本主义片面支配的勇气。而他们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也在信息时代乐观的前景上投射出一片巨大的阴影。

民族国家将幸存，但是它们的主权却未必能够，它们将以承诺、责任、联盟与附属的不同几何形势、在多边网络中团结起

① 阿富汗首都。

来。最值得注意的多边建造是欧洲联盟，将欧洲大部分，但不是所有国家的技术经济资源集中在一起：俄罗斯可能被遗漏，出于西方的历史恐惧，而瑞士需要划清界线，以保持世界的银行家的职责。它基本上是一个为了欧洲文明避免变成亚洲与美国经济殖民地的防卫性建造。欧洲的民族国家将仍旧为了它们在欧洲制度架构之内的个体利益，不断地协议讨价还价，但是，它们将会不顾它们的联邦主义者的修辞，不论是欧洲人情怀，还是它们的政府的爱护使然。欧洲非官方的颂歌（贝多芬的“快乐颂”）是普通的，但是它的德国重音却可能变得更受到注意。

全球经济将由一组相互之间网络化了的多边制度所治理。在这个网络的核心是七大工业国（G-7）国家俱乐部，或许有一些附增的会员，以及其执行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立场负责调节与干预。（p.386）这些技术官僚们和相似的国际经济机构，都将在其委员会授权执行中加上他们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专业者的专家意见。非正式聚会，像达沃斯（Davos）^①会议，或其相等物，都是有助于创造全球精英的文化的/个人的黏着剂。

全球地缘政治也将由多边主义者共同经营，像联合国，与区域国际机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美洲国家组织（OAS, OEA），或非非洲国家团结组织（OAU），在国际的甚至是国家的冲突管理上有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将越来越利用安全联盟，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遂行其决策。必要时，特别的国际警察力量将受命来干预纠纷地区。例如，1996年秋，克林顿政府建议一些非洲国家与非洲国家团结组织，成立一个非洲的快速干预力量，附属于联合国，由美国武装与训练并由美国、欧盟和日本支付财务。这个建议并不成功，但它可能是未来国际武装部队有特色的示范，准备维护全球网络的和平与其拥护者，

^① 瑞士东部达沃斯每年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



与/或，防止卢旺达这种有计划的灭种屠杀：在这种国际干预的双重角色中呈现了多边主义的模糊性。

假如本书持有的分析被证明是正确的话，全球安全局势将可能为三种主要的议题所支配。首先是在太平洋区域所升高的紧张，当中国显示其全球力量，日本进入另一轮的国家偏执状态，以及韩国、印尼与印度对前述二者的回应。第二个是俄罗斯力量的东山再起，它不仅是核子超级强权，而且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不再忍受贬抑。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的条件下，它会或不会被纳入全球共同管理的多边系统，决定了未来安全调整的几何形势。第三个安全课题可能是所有之中最有决定性的，将可能是整个世界欲长期维持安全的条件。这指的是战争的新形式，为个人、组织与国家所利用。它们的组织坚强，军事手段较弱，但却也能接近新的毁灭性技术，就像发现我们社会贵重而有价值的地点一般。犯罪帮派也可能诉诸高度的对抗，当他们看不到其他选择时，像哥伦比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经历到的。全球或地方的恐怖主义，在千禧年翻转时，已被认为是遍及世界的重大威胁了。但是，我相信这都还是温和的开始而已。技术精进导致两条趋势汇聚成为彻底的恐怖行动：一方面，一小撮决策群体，财务情况很好，情报灵通，能毁灭整个城市，或攻击我们生活的神经中心；另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由能源到运输到水资源供应，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及如此纠缠，它的脆弱则成为递增函数。新技术有助于安全系统，它们也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暴露。(p.387) 提高保护的代价将是生活在一个电子锁系统、警报系统与警察巡逻连线作业之中，它也意味着在恐惧中增长。或许这无异于历史中大部分孩童的经验。而它也是衡量人类进步相关性的一种方式。

地缘政治也越来越被决策的多边主义与执行这些决策的军事单位之间的基本矛盾所支配。这是因为，苏联解体后，新俄国在技术上的落后，美国在可见的未来将是仅有的军事超级强权。所

以，大部分的安全决策将必须被美国执行或者是支持，才会真正有效或可信。欧盟，以其所有夸大的协商，清楚地显示其无能在巴尔干单独操作行事。日本已经禁止建军，其国内和平意识的运作远超越于极端民族主义支持者的挑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之外，在可见的未来只有中国与印度可能有足够的技术与军事力量取得全球势力，但肯定还不会与美国，或甚至是与俄罗斯相称。因此，除了一种不太可能的假说，即超级中国军事势力的建立（但中国至少还未具备技术的实力），美国仍是世界上一个超级强权。在这种条件下，不同的安全联盟将必须仰赖美国的力量。但是美国遭遇如此深的国内社会问题，假如它的公民安全未受到直接的威胁，它肯定将无法、也缺乏政治支持来使用它的力量，就像好几次在20世纪90年代中美国总统所发觉到的一般。当冷战已被遗忘，也没有“新冷战”的等同物在地平线上朦胧出现时，美国可以保持其军事地位的仅有方式是出借其军力给全球安全体系。但得有另外一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多边主义的极端扭曲情形，以及民族国家失去了主权的最有力的说明。

国家还是并未消失。它只是在信息时代缩小了尺寸而已。它在地方与区域政府的形式下扩散，伴随它们的计划星布世界，建立选区，与中央政府、跨国公司与国际机构协商，讨价还价。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也是政治地方化的年代。地方与区域政府所缺乏的正是权力与资源，它们以弹性与网络化补足。它们是财富与信息全球网络活力仅有的对手，假如有的话。

至于人民，他们是，以及将会是，与权力的殿堂距离日远，同时与市民社会崩坏的制度日渐疏远。(p.388)他们在其工作与生活中被个体化，在他们自己的经验基础上建造他们自己的意义，以及，假如他们幸运的话，重建他们的家庭，在不知名的流动与不受控制的网络的漩涡中摇动。当遭受集体威胁时，他们将营造共同体的避风港，在那个地方与时候，先知可能宣布新神的降临。



21世纪将不会是黑暗时代。但也不会将此历史中最非凡的技术革命所许诺的慷慨嘉惠大部分给予人民。倒不如说，它表现出的特征是一种对消息灵通的困惑。

怎么办？

每当有一个知识分子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以及严肃地履行这个问题时，悲剧就会接踵而至。这其实是尤尼阿诺夫（Ulianov）在1902年的情况。^①所以，在确定不去假装符合这个比较的资格后，我决定放弃对我们世界的病症加以治疗。但是既然我确实关心我经过这个信息时代早期的景象的旅程中的所见，我想要以第一人称写作，解释我的弃权，并审视我自己的世代及我的政治文化。

我是一个来自传统工业年代的政治左派，为马克思在高门（Highgate）墓上的碑文，他的（与恩格斯的）十一段费尔巴哈提纲所沉迷。转化性的政治行动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致力的终极目标。我仍然相信这种宽宏气度比不被世界上人民的劳动所扰，有序地追求官僚学术的生涯，更为慷慨无私。然而总的看来，我不认为左翼与右翼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家分类，会在两个群体的学术品质上产生有意义的差别。毕竟，如同左翼所为，保守的知识分子也会从事政治行动，经常对他们的敌人很少忍让。所以，问题不在于政治承诺妨碍了，或扭曲了，知识的创

^① 这就是列宁（V. I. Lenin 是 Vladimir Ilich Ulyanov 的匿名）的《怎么办？》。列宁以一个有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的政党领导民主革命，将其观点扼要化为党的目标与组织形式的必要性，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实现其计划。这就是列宁借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小说之名《怎么办？》，在1902年写的有名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1902）。

造力。我们大多数的人在这些年间已经学会如何与我们找到的、与我们之间将要发生的紧张与矛盾共处。我认为社会行动与政治计划是改善一个社会所必要的，它显然需要改变与希望。我确实希望本书能由提出问题，再到提供经验与理论的元素来处理它们，可以贡献于信息灵通的社会行动来追求社会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中性的、脱离人类戏剧的观察者。(p.389)

然而，我已经见到这么多被误导的牺牲，这么多为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死巷，以及为教条政治的人为天堂所导致的恐怖，以致我必须表达一种有益的反应，对抗依社会理论或意识形态来架构政治实践的尝试。理论与研究，一般而言就与本书一样，应该被认为是了解我们世界的一种方法，也应该仅限于就它们的正确性、严谨性与相关性来加以评断。至于这些工具是如何有用，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被使用，则应该是社会行动者在特殊的社会脉络中，根据他们的价值与利益而行使自己独占的优先权。不再有后设政治学，不再有“哲王”(maitres a penser)，也不再有知识分子自命如此。最根本的政治解放是人们从不加批评的坚持与固执中解放他们自己，而获致理论的或意识形态的计划，然而，也应根据不同的来源使用任何对它们有效的信息与分析，在他们的经验基础上建构其实践。在20世纪，哲学家已经试过去改变世界。在21世纪，这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的时候。所以我审慎，不是不关心这个为其自身的许诺所折磨的世界。

终 场

信息时代的许诺是经由心灵的力量解放空前生产的能力。我思，故我生产。由这样做，我们才有闲暇从事精神上的实验，才



有机会与自然和解，而不牺牲我们子女物质上的幸福。启蒙主义的梦、理性与科学有可能解决人类的问题。然而，我们技术的过度发展与我们社会的矮化发展间存有巨大的鸿沟。我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是建立在利益、价值、制度与再现系统之上。总的说来，限制集体创造力、没收信息技术成果，以及将人们的精力背离在自我破坏的对抗之中。事情不该如此。人性本非恶。万事其实俱可由提供信息、支持正当性，而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所改变。假如遍及全世界的人们信息灵通、主动、能沟通；假如企业能承担其社会责任；假如媒体变成使者而非信息；假如政治行动者对抗犬儒主义，以民主方式恢复信念；(p.390)假如文化由经验来重建；假如人类遍及全球感觉到物种的团结；假如我们由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确立世代间的团结；假如在我们之间已取得和平，并启程开拓我们的内在自我；假如所有这些都因我们的信息灵通、有意识、分享决策而变得可能，而时间之河仍在流淌，或许我们能最终生活下去，爱同时被爱。

吾已尽吾言。那么，请让我最后一次借用巴贝洛·聂鲁达的诗：

对我和你而言，我们顺从，
我们共享希望和
冬天；
而我们受了创伤——不仅被
致命的敌人
并且被致命的朋友（那似乎更令人难堪），
然而面包不见得变得更味美，
我的书也是一样：
我们活着，

补足痛苦所需要的统计表
我们继续去爱爱情，
用我们愚钝的方法
我们埋葬说谎者并且活在
诚实的人当中。

——巴贝洛·聂鲁达，《船歌是终》片断，船歌。中译引
自《聂鲁达诗精选集》第220页陈黎、张芬龄译

在近年我的研讨课上，有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可能读者也会有用。这就是关于“新”的问题。所有的这些何者为“新”？为什么这是一个新世界？我确实认为在这个千禧年终结之时有一个新世界浮现了。在本书三卷中，我已经试着提供信息与观点来支持我的看法。晶片与电脑是新的；到处存在的移动电话是新的；遗传工程是新的；电子整合的、在真实时间中作用的全球金融市场是新的；一个环绕整个地球相互联结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新的；在先进经济中都市劳动力的大多数处理知识与信息是新的；地球上都市人口占了大多数是新的；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褪色以及冷战结束是新的；亚太崛起为全球经济中的平等伙伴是新的；对父权家长制全面挑战是新的；共同的生态保护意识是新的；以流动空间与无时间性的时间为基础的网络社会浮现历史性地是新的。然而，这却不是我特别要说的。我的主要论点是，你认为这个世界或是它的任何特征是否是新的，其实都无关紧要。我的分析自己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世界，信息时代的世界。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分析，它必须被它自己了解、使用、判断，能界定与解释我们所观察与经历的现象，不论它是否为新。毕竟，若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为什么还要费神去调查研究、思考、写与读它呢？

附录 信息时代如何 改变生活

——在大洋彼岸与虚拟世界哲学家卡斯特对谈

千年交替，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名字在西方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倾心十四年，著成《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杂志称他为“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哲学家”。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由曼纽尔·卡斯特握于掌中。”

1942年出生的卡斯特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社会学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两系，会讲六种语言，是具有惊人的“欧洲式”理论分析能力的思想家。30岁时他就曾以《都市问题》一书震惊世界，迫使整个都市社会学研究方向转轨。但为求“美国式”经验研究，他的足迹遍及世界。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请卡斯特出山做高级顾问；巴西总统卡多索，南非总统姆贝基，甚至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纷纷邀他

当高参。欧盟、法国、墨西哥、智利等其他世界组织和多国政府也不甘落后。卡斯特对发展中国家尤为关注。2001年5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专门在纽约召集会议，特邀他主讲。会上，他大胆提出“科技马歇尔计划”，旨在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援助，使发展中国家进行飞跃，缩小数字鸿沟。安南已指派专门委员会执行。

卡斯特的《三部曲》最新版本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已在国内出版，第二、三卷也预计近期出版。在即将离开柏克莱赴巴塞罗那之际，他不顾连日高烧与异常繁忙，抽出整整两个小时给《北京青年报》，把看世界的崭新视角奉献给中国读者。

第四世界意味着什么

记者：谢谢你抽时间接受采访。

卡斯特：我希望尽我最大所能与中国人民交流。我这周做了三次广播采访，上两个月做了十五次报纸采访，三次电视采访。现在等着采访我的媒体或文章有19家，《华尔街日报》等了两个月，还有《伦敦时报》等等。但我把仅有的一点时间都给了你，因为中国太重要了。我不是指人口数量，而是指文化质量。

记者：你提出了“第四世界”的理论，能解释一下吗？

卡斯特：通过高科技网络，全球化把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摒弃毫无价值的。所以富有创造性的世界精英们都联合在一起，可同时大片地区、大批人民被边缘化，世界上的一半的人每天生活费还不到两美金。

现在不再有“南北”，而变为我所称的第一世界或第四世界。南北指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一向反对这种提法。现在



财富、信息和权利网把南北各地联在一起，不是按地域分割。不管南北，都有地区和人民被排除在全球网络之外。当然，区别关键在于网络内与网络外的人数比例。美国人口四分之一在网外，22%美国人属于文盲，他们在飞机场不能认路，也看不懂报纸。中国有四分之三，非洲有90%。他们不是被剥削，而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由于太边缘连剥削都不值得。许多中国人在资本主义世界眼中还能剥削，但波多黎各、智利却不值得一用，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在挣扎线上。第四世界最惨的例子在非洲，比如在塞内加尔或尼日利亚，黑帮控制政府和军队，侵占了所有的自然资源（尼日利亚盛产石油），而大多数人民完全被排除在外，只能时不时从政府、犯罪经济的施舍中求一杯羹。

我们生活在第一世界，而对门邻居可能就身陷第四世界。不是在上演贫与富的《双城记》，而变成出局或人局。现在世界大多数人都与全球体系的逻辑毫无干系。这比被剥削更糟。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为你工作，你剥削我，我很可能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她才剥削我。这与说“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我可以这样说，“我能打我的计算机，自己单干，我不需要你。滚吧。”

这就完全不同——成了没有剥削，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去反抗。我没有敌人，我可以炸掉整个世界，或者炸掉自己。我没有敌人，没有伙伴，和谁都没有关系。19世纪波澜壮阔的工运斗争是有目标、有意义的。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整个世界危机即将爆发，但不会以革命的方式，而是：我忍无可忍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不得不爆发，为爆发而爆发。

记者：在我们生存的网络世界里，有什么没有改变？

卡斯特：我得说统治、剥削、压迫与不公依然如故。但统治与压迫的形式和主题变了。目前最重要的统治方式是操纵沟通方式，提供信息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现在网络的不集中性给认清事物真相带来很大困难。比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本质不

在于公司这个形式，最主要的是看全球财经市场，而不能归结到某一群资本家或某一市场。整个经济系统的逻辑就是对利润无休止的追求，绝然不顾他人。这隐蔽于全球财经网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和处于明显中心地位的压迫者和殖民者相比，这一规律更难于分辨，反击和抗拒。

科技将我们带向何方

记者：你是科技专家，科技好处很多，但有什么信息和科技办不到的？

卡斯特：让你幸福。只有你自己才能让你幸福。科技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

记者：听说在一次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有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在街上飞驰。马放开四蹄狂奔，骑马的人不得不紧紧勒住缰绳才不被掀于马下。“你去哪儿？”街上的人问他。“我不知道，问我的马吧。”这匹马就是科技。Sun Microsystems 的首席科学家比尔·卓依（BILLJOY）去年在《连线》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论述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你怎么看？

卡斯特：这篇文章很重要。科技发展之快已大大超出了我们个人、组织、文化与道德的控制能力。我们可以克隆生命。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试验室已造出一个布满传感器的建筑，这些传感器还可以相互沟通。诺基亚和爱立信的蓝牙技术使短波能在相距10米之间传播。我们已有了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的机器人，尽管目前的机器人还很简单，但这已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很清楚，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辨别什么样的科技可以用来为什么服务的话，科技会被利用做各种坏事。这不只是政府规范管



理的事。基因工程不像核能那样可以由政府集中控制，基因工程在试验室就可以做。你能在世界各地创造出形形色色的生命。

记者：我们该怎么办？

卡斯特：必须加强组织和个人的责任感。科技发展势不可挡。你猜怎么着？该轮到好的科学哲学诞生了。现在到了跳出局外，自我反思，融汇全局的时候了。要改善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机器。

科技的症结在于科技是人类的折射，而我们并不十分善良。我们丑陋，科技就会呈现出来，造成各种恶果。如果我们能改变、能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科技就可以赋予我们解放自身的巨大潜能。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拥有最神奇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或是毁灭我们。现在我们做的是后者。

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

记者：信息社会给人带来什么变化？

卡斯特：“我上完学，找个好工作，成家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的方式结束了。今后的社会，临时工与合同工是主流，而不是特例。荷兰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就是兼职工人比例在欧洲最高。荷兰失业率 20 世纪 80 年代为 20%，现在是 2%。这使得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就业人数增多，特别是妇女。他们从事兼职和有弹性的工作，但政府保障他们的全部社会福利。尽管你拿到的工资只是从前的一半，但所有健康、教育、退休及其他福利都由政府提供，你尽可享受。

记者：商业公司希望更多人从事临时工作，因为经济不景气时，临时工比全职工人好打发得多。对吧？

卡斯特：对。但这是惊人的革命。工业革命把店主与工匠们编入大组织，大工厂。信息时代恰好相反：打碎大组织，重组为网络，个人在其中流动，一辈子不断换工作，接新活儿。今天你可能是一个银行的经理，下个月你会代表现在的银行到另一家银行做咨询。明年你去别的城市帮这两家银行建分所。后年你开自己的咨询公司，为先前建立的客户网服务……总之，能把握住不确定性，在工作及家庭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活会充满兴奋与创新。把握不住的人则将生活在一个恐怖的世界里，因为一切都不可理解，不可控制。

记者：工业时代应运而生了大众化生产，大众传媒，大众教育，而信息时代将变为个体化生产，个体传媒，个体教育。是吗？

卡斯特：是。但别说“将”字。是现在。现在就是信息时代，不是将来。我对未来一无所知，记得吧？

记者：工作变了，那家庭呢？

卡斯特：家庭也在变。众多妇女加入了劳动大军，我们过去熟知的家庭已被打碎。

记者：工业时代妇女就工作了，这不是信息社会才开始的。

卡斯特：不对。20世纪70年代前，工业国家的大多数妇女不是领取报酬的工人，结婚后通常成为家庭主妇，几乎一辈子照顾孩子。苏联和中国特殊，社会主义让每个人都工作。

（对于传统家庭的改变）我可不是高兴。这是个严重问题。美国有爸爸、妈妈和孩子的家庭只占23%，单亲家庭却占26%。我们过去熟知的美国家庭已经垮了。欧洲有些不同。但这些国家中，妇女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旧式家庭模式还没转变过来。妇女的反应就是不再生孩子。她们说：“OK，要这样，你们自己去生吧。”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天主教国家的出生率在全世界最低。因为那儿育儿服务很差，男人尤其有大男子主义，可是妇女也一样的独立，解放。除非男人和社会给女人平等待遇，不然她们就



拒绝生孩子。所以传统家庭危机中现显出的一点就是，除非我们能找到新型的男女关系，否则欧洲人种就要灭绝。

记者：每个人怎样去适应这个网络社会？

卡斯特：首先要培养“自我编程能力”。人是历史上最好的计算机。教育不只限于学校，教育是每时每刻学习、怎样学习。不是把信息全堆在脑子里，而是增强获取信息的能力：决定什么样的信息是你所需，从哪儿找到，怎样综合信息，怎样处理信息。这种适应环境、最大限度利用环境的能力恐怕仍是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所缺乏的。职业学校越来越不流行了，因为你今天学会怎么开这部机器，明天它就可能被升级，甚至根本不在那了。我曾在欧洲提过一个极有争议的想法：让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教父母和爷爷奶奶计算机，发起一场群众扫盲运动。因为我们最终目标是提高全民教育水平，适应新环境。

记者：你是如何“自我编程”的？你看了那么多书，写了20本著作，调查采访几千人次，被采访过好几百次。你是如何管理时间的？（卡斯特的秘诀之一是：他曾告诉我他30岁左右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卡斯特：知识方面，你要有良好的教育。但还要有一个能让你发挥潜力、鼓励你个性发展、奖励自信、强调创新的教育和文化。比如日本文化重视秩序、等级和纪律，使人很难“自我编程”。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今天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停滞不前、缺乏创新的原因之一。

记者：信息时代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混乱的系统，在信息时代“信息”可能成为最讨人烦的词，因为“信息垃圾”铺天盖地。你是怎样在“信息垃圾”的海洋中航行的？

卡斯特：“信息太多了”是未来学家和记者制造的悬念。如果你去柏克莱的图书馆，你不是有“太多的书”。那里1000万册书不是要你全读，而是你真想读的，能够有最大几率找到。互联网也是一样。你需要的是教育和“自我编程”能力，能知道什么

是你需要的，怎样找到和怎样去用。

记者：世界进步了吗？

卡斯特：现在我们更有知识，更有创造性。与十年前相比，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更富有，40%更贫穷，30%没变多少。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意义迷失。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们不了解周遭的环境，我们不懂得发生的事和我们想要的有什么关系。金钱上，我们在一间全球的大赌场里，拿自己的积蓄赌博，然后看看赌得怎么样。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对生活和自我都失去了控制。像我们这些人还能进行选择，在世界航行，但整个社会却在下沉。虽然人类有条件生活得更美好，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我们走向最戏剧性的崩溃。

中国能够做些什么

记者：您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卡斯特：中国正积极试图与世界经济接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政治稳定，经济活力与创业精神，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平等与保障。保障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仅是消费者或工人的权益。另一个挑战就是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怎样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记者：面对新经济，中国应该采用怎样的信息产业政策？

卡斯特：1987年，应中国国务院之邀，我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进行科技政策的研究。我和我的同事马丁·卡诺依给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听好几个政府人员告诉我，他们对报告中的科技政策进行了反复推敲。其实报告的基本观点很简单。从20世纪80年代的观察中我看出中国政府在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和科技运用上分析有误。他们希望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认为跨国



公司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把中国作为出口平台，作为当时经济特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在模仿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出口区。这就错了。因为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已有了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他们要的是中国的市场。

另一方面，中国想要马上见效的技术。这是对的。但政府的人认为：“我们不需要知识。中国有杰出的科学家，杰出的工程师，再加上先进的美国和日本的机器，这就是技术。”首先，跨国公司不能带来先进的机器，因为中国的工业基础不够，这些机器运转成本太高。再有，中国的确拥有杰出的工程师，但重要的不仅在于要有杰出的工程师，还得有精通国际特定大系统中某一软件、某一新设计的工程师。这种专长只有从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中才能获得。中国现在开始开发与诺基亚和 NTT 配套的无线通讯软件，这很好。在我们递交报告五六年之后，中国的政策正是向着这方面演变，但我不知道政策的转变和我们的报告有没有必然联系。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政策是用市场换技术，而不是用廉价劳动力换廉价资本。这个转型很重要。20 年前贫穷国家像马来西亚和印尼当跨国公司的出口平台还可行，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不能再做出口平台，而要参与国际经济网络创造价值。最终中国应对内成为有活力的市场，对外成为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的一员。

记者：您是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家，西方城市化进程发展了用很长时间，从它们的经验教训中，北京的城市规划应注意什么？

卡斯特：第一，千万不要扔掉自行车。20 年前，我在广州遇到首席城市规划师。我跟他说明我很敬佩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盯着我说：“你有种族歧视。”咦？我怎么有种族歧视呢？“你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就该心甘情愿冒着日晒雨淋骑自行车？我们也能造汽车。”我觉得这种策略太傻了。当然不是干什么都能骑自行车，但在欧洲，西方人已开始转回骑自行车。你们有一套以自行车为主的交通系统，绝对应该保留。50 年后你们就能派

上用场了。第二我想谈一下公共交通。欧洲的交通比美国要好得多的多。在加州伯克利，我家有两辆车。现在我们要去西班牙巴塞罗那，一辆车也用不着。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到任何地方，既方便又便宜。周末人们才租车出去玩。加州这种靠小汽车、高速公路发展城市的方法是误入歧途，高速公路越多路越堵。因为路多，车也越多。（马丁·卡诺依讲，当时他们另一个建议也被怀疑有“自己办不到，却强加于人”的帝国主义色彩而被断然拒绝。这个建议是大城市应取消小汽车，大力发展轻轨，以减少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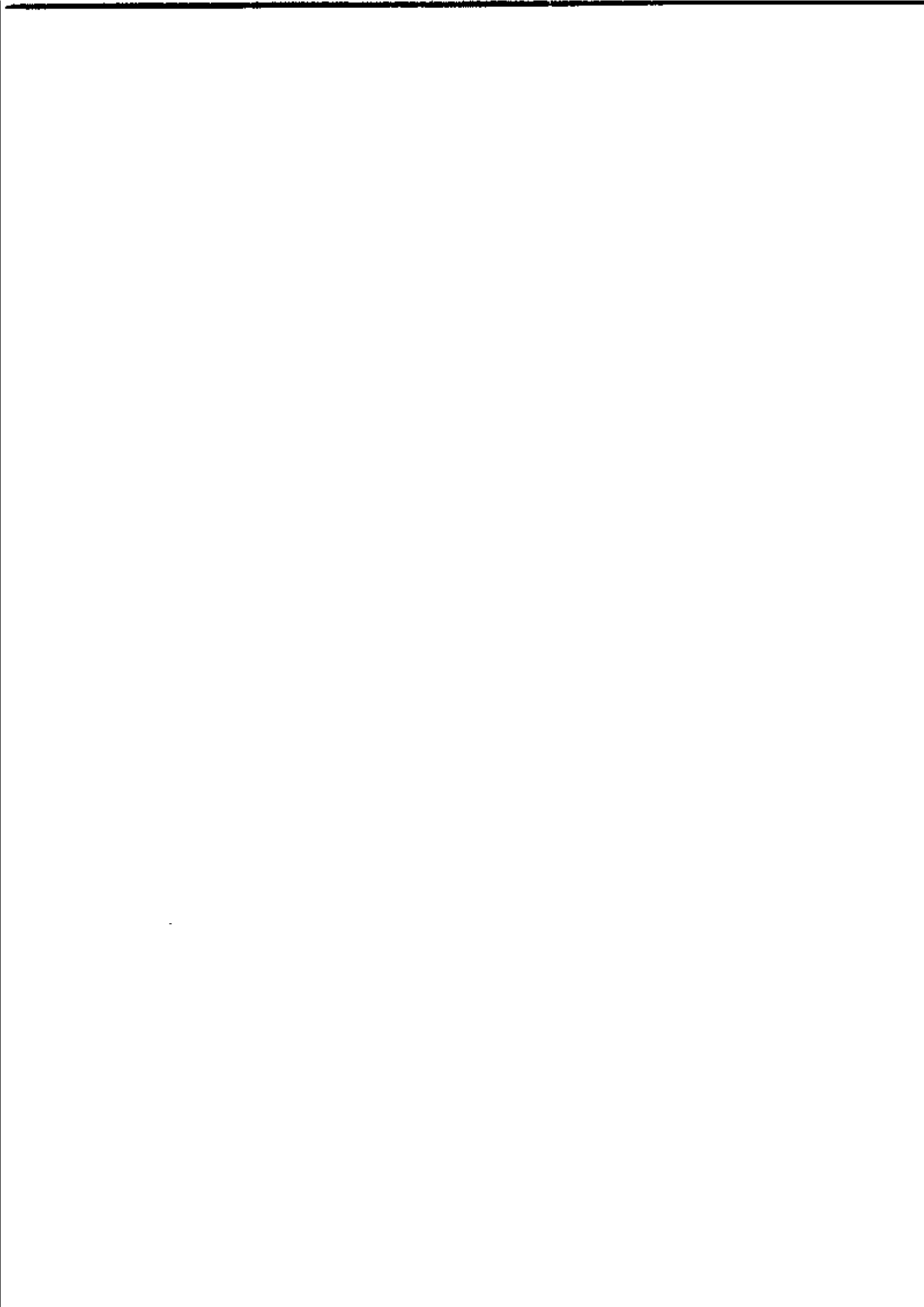
记者：您有什么对中国读者说的吗？

卡斯特：别听外国人的，中国话把外国人叫鬼子，对吧？在互助基础上进行科研与文化学习交流是好的，但有一些美国和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总有一个幻想：“可有 10 亿人听我的了。”但愿这 10 亿人别听他的。大多数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和中国人需要的是什么。

我是想说别听信任何主义。不要不加任何分析就接受什么技术至上主义，什么美国道路……中国必定会进入信息社会，必定有自己的特色，但不会和加州一样，也不应该和加州一样。走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社会道路吧。（本篇部分摘自荷兰 DNW 电视台）

（原载 2002 年 3 月 11 日《北京青年报》）

特约记者 周燕）



References

- Adam, Lishan (1996) "Africa on the line?" *Ceres: the FAO Review*, 158, March–April.
- Adams, David (1997) "Russian Mafia in Miami: 'Redfellas' linked to plan to smuggle coke in a submarine", *San Francisco Examiner*, March 9: 3.
- Adekanye, J. Bayo (1995) "Structural adjustment, democratization and rising ethnic tensions in Afric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6 (2): 355–74.
- Adepoju, Aderanti (ed.) (1993)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the Population of Africa: th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Health and Employment*, Portsmouth, NH: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nd Heinemann.
- Afanasiev, V.G. (1972) *Nauchno-tekhnicheskaya revolyutsiya, upravleniye, obrazovaniye*, Moscow: Nauka.
- Agamirzian, Igor (1991) "Computing in the USSR", *BYTE*, April, pp. 120–9.
- Aganbegyan, Abel (1988) *The Economic Challenge of Perestroika*,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8–90) *Perestroika Annual*, vols 1–3. Washington, DC: Brassey.
- (1989) *Inside Perestroika: The Future of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Agbese, Pita Ogaba (1996) "The military as an obstacle to the democratization enterprise: towards an agenda for permanent military disengagement from politics in Nigeri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31 (1–2): 82–98.
- Ahn, Seung-Joon (1994) *From State to Community. Rethinking South Korean Modernization*, Littleton, Colo.: Aigis
- Aina, Tade Akin (1993)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frica's lost decad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frica's crisis and current trends in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ractice", in Margareta Von Troil (ed.), *Changing Paradigms in Development – South, East and West*, Uppsala: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pp. 11–26
- Alexander, A.J. (1990) *The Conversion of the Soviet Defense Industr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Allen, G.C. (1981) *The Japanese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Alonso Zaldivar, Carlos (1996) "Variaciones sobre un mundo en cambio", Madrid: Alianza
- Alvarez Gonzalez, Maria Isabel (1998) "La reconversion del complejo industrial-militar sovietico", unpublished thesis, Madrid: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 Departamento de Estructura Economica.
- Amman, R. and Cooper, J. (1986) *Technical Progress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 Amsdem, Alice (1979)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5 (3): 341-80.
-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A theor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Louis Putterman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State and Market in Development: Synergy or Rivalr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Andrew, Christopher and Gordievsky, Oleg (1990) *KGB: the Inside Story of its Foreign Operation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Anonymous (1984) "The Novosibirsk Report", April 1983,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Survey*, 28 (1): 88-108.
- Ansell, Christopher K. and Parsons, Craig (1995) *Organizational Trajectories of Administrative States: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S Compar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Western Europe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 Antonov-Ovseyenko, Anton (1981) *The Time of Stali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Aoyama, Yuko (1996) "From Fortress Japan to global networks: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multinationals among Japa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the 1990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 Appelbaum, Richard P. and Henderson, Jeffrey (eds) (1992)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ndon: Sage.
- Arbex, Jorge (1993) *Narcotrafico: um jogo de poder nas Americas*, Sao Paulo: Editora Moderna.
- Arlacchi, Pino (1995) "The Mafia, Cosa Nostra, and Italian institutions", in Salvatore Secchi (ed.), *Deconstructing Italy: Italy in the Nine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Series.
- Arnedo, B. Alejandro (1990) *El narcotrafico en America Latina: sus conexiones, hombres y rutas*, Cordoba: Marcos Lerner Editora.
- Arrieta, Carlos G. et al. (eds) (1990) *Narcotrafico en Colombia: dimensiones politicas, economicas, juridicas e internacionales*, Bogota: TM Editores.
- Asahi Shimbun* (1995) *Japan Almanac 1995*, Tokyo: Asahi Shimbun Publishing Company.
- Aslund, Anders (1989)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udigier, P. (1989) "Le poids des dépenses de défense sur l'économie soviétique", *Defense Nationale*, May.
- Azocar Alcala, Gustavo (1994) *Los barones de la droga: la historia del narcotráfico en Venezuela*, Caracas: Alfadil Ediciones.
- Bagley, Bruce, Bonilla, Adrian and Paez, Alexei (eds) (1991)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narcotráfico: el caso ecuatoriano*, Quito: FLACSO.
- Barnett, Tony and Blaikie, Piers (1992) *AIDS in Africa: its Present and Future Impact*, London: Balhaven Press.
- Bastias, Maria Veronica (1993) "El salario del miedo: narcotráfico en Ame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SERPAJ-AL.
- Bates, R. (1988) "Governments and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Africa", in R. Bates (ed.),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tes, Timothy and Dunham, Constance (1993) "Asian-American success in self-employ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7(2) 199-214.
- Bauer, John and Mason, Andrew (1992),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in Japan",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8(4): 403-28.
- Bayart, Jean-François (1989) *L'état en Afrique: la politique du ventre*, Paris: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English trans., London: Longman, 1993).
- Baydar, Nazli, Brooks-Gunn, Jeanne and Furstenberg, Frank (1993) "Early warning signs of functional illiteracy: predicto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63(3).
- Beasley, W.G. (1990)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Beaty, Jonathan (1994) "Russia's yard sale", *Time*, April 18: 52-5.
- Bellamy, Carol (director) (1996)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UNICEF.
- Benner, Christopher (1994) "South Africa's informal economy: reflections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unpublished research seminar paper for geography 2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nnett, Vanora (1997) "Interchangeable cops and robbers: Russian police moonlighting for organized crim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7: 12.
- Bergson, Abram (1978) *Productivity and the Social System: the USSR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rliner, J.S. (1986) *The Innovation Decision in Soviet Indust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ernardez, Julio (1995) *Europa: entre el timo y el mito*, Madrid: Temas de Hoy.
- Berry, Sara (1993) "Coping with confusion: African farmers' responses to economic instabilit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n Callaghy and Ravenhill, (eds), pp. 248-78.
- Berryman, Sue (1994) "The role of literacy in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NCAL Technical Report TR94-13*, Philadelphia: National Center for Adult Literacy.
- Betancourt, Dario and Garcia, Martha L. (1994) *Contrabandistas, marimberos y mafiosos: historia social de la mafia colombiana (1965-1992)*, Bogota: TM Editores.

- Beyer, Dorianne (1996) "Child prostitu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Labor Affairs, *Forced Labor, the Prostitution of Children, Symposium Proceeding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 Bianchi, Patrizio, Carnoy, Martin and Castells, Manuel (1988)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t Stanford, Research Monograph.
- Black, Maggie (1995) *In the Twilight Zone: Child Workers in the Hotel, Tourism, and Catering Industr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Blomstrom, Magnus and Lundhal, Mats (eds) (1993) *Economic Crisis in Africa: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Responses*, London: Routledge.
- Blyakhman, L. and Shkaratan, O. (1977) *Man at Work: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Soviet Working Class and Intelligentsia*, Moscow: Progress.
- Boahene, K. (1996) "The 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IDS and STD in Africa", *AIDS Care*, 8(5): 609-16.
- Bohlen, Celestine (1993) "The Kremlin's latest intrigue shows how real life imitates James Bond",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 (1994) "Organized crime has Russia by the throa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 Bonet, Pilar (1993) "El laberinto ruso". *El País Semanal*, December 12.
- (1994) "La mafia rusa desafía al gobierno de Yeltsin con el uso de coches-bomba", *El País*, June 9.
- Booth, Martin (1991) *The Triads: the Growing Global Threat from the Chinese Criminal Societ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orja, Jordi (1992) *Estrategias de desarrollo e internacionalización de las ciudades europeas: las redes de ciudades*,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irectorate General XVI, Barcelona: Consultores Europeos Asociados.
- (1996) "Ciudadanos europeos?", *El País*, October 31: 12.
- and Castells, Manuel (1997) *Local and Global. the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Earthscan.
- Bourgois, P.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sistance and self-destruction in the crack economy: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749: 97-118.
- and Dunlap, E. (1993) "Exorcising sex-for-crack: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from Harlem", in P. Bourgois and E. Dunlap (eds), *Crack Pipe as Pimp: an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of Sex-for-Crack Exchange*, New York: Lexington.
- Bowles, Paul and White, Gordon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Breslauer, George W. (1990) "Soviet economic reforms since Stalin: ideology, politics, and learning", *Soviet Economy*, 6(3): 252-80.
- Brown, Phillip and Crompton, Rosemary (eds) (1994)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Exclusion*, London: UCL Press.
-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 Business Week* (1996) "Helping the Russian Mafia help itself", December 9: 58.
- Callaghy, Thomas (1993) "Political passion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n Africa", in Thomas Callaghy and John Ravenhill (eds), pp. 463-519.
- and Ravenhill, John (eds) (1993), *Hemmed In: Responses to Africa's Economic Dec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lvi, Maurizio (1992) *Figure di una battaglia: documenti e riflessioni sulla Mafia dopo l'assassinio di G. Falcone e P. Borsellino*, Bari: Edizioni Dedalo.
- Camacho Guizado, Alvaro (1988) *Droga y sociedad en Colombia*, Bogota: CEREC/CIDSE-Universidad del Valle.
- Campbell, C.M. and Williams, B.G. (1996) "Academic research and HIV/AIDS in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86(1): 55-63.
- Carnoy, Martin (1994) *Failed Drea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Castells, Manuel and Benner, Chris (1997)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US labor market?" Research report o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 Carrere d'Encausse, Helene (1978) *L'empire eclate*, Paris: Flammarion.
- (1987) *Le grand défi: Bolcheviks et nations, 1917-30*, Paris: Flammarion.
- (1991) *La fin de l'empire soviétique: le triomphe des nations*, Paris: Fayard.
- Castells, Manuel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 (1991) *La ciudad científica de Akademogorodok y su relacion con el desarrollo economico de Siberia*, Madrid: UAM/IUSNT, research report.
- (1992) *La nueva revolucion rusa*, Madrid: Sistema.
- (1996) "El futuro del Estado del Bienestar en la sociedad informacional", *Sistema*, March: 35-53.
- and Hall, Peter (1994) *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21st 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es*, London: Routledge.
- and Nataluskho, Svetlana (1993) *La modernizacion tecnologica de las empresas de electronica y de telecomunicaciones en Rusia*, Madrid: UAM/IUSNT, research report.
- , Goh, Lee and Kwok, Reginald Y.W. (1990) *The Shek Kip Mei Syndrom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ousing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London: Pion.
- , Shkaratan, Ovsei and Kolomietz, Viktor (1993) *El impacto del movimiento politico sobre las estructuras del poder en la Rusia post-comunista*, Madrid: UAM/IUSNT, research report.
- Castillo, Fabio (1991) *La coca nostra*, Bogota: Editorial Documentos Periodisticos.
- Catanzaro, Raimondo (1991) *Il delitto come impresa: storia sociale della mafia*, Milan: Rizzoli.
- Cave, Martin (1980) *Computers and Economic Plann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 M.K. et al. (eds) (1986)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and Hong Kong Labor Movement*, Hong Kong: 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
- Cheal, David (1996) *New Poverty: Families in Postmodern Societ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Chen, Edward K.Y. (1979) *Hypergrowth in Asian Econom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ng Kong, Japan, Korea, Singapore, and Taiwan*, London: Macmillan.
- (1980) "The economic setting", in David Lethbridge (e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Peter S.J. (1983) *Singapor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rend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ru, Fantu (1992) *The Not So Brave New World: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Post-Apartheid Southern Africa*,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Chesneaux, Jean (1982)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ung, Peter (1994) "The case of Guangdong in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 in Hao and Zhimin (eds), pp. 207–35.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96) "Safeguarding the children", series of reports, August 22–September 16.
- Chu, Yu-Kong (1996) "International Triad movements: the threat of Chinese organized crime", Lond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 Conflict Studies Series, July/August.
- Chua, Beng-Huat (1985) "Pragmatism and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in Singapore",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3 (2).
-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90a) *Measures of Soviet GNP in 1982 Prices*, Washington, DC: CIA.
- (1990b) *Measuring Soviet GNP: Problems and Solutions. A Conference Report*, Washington, DC: CIA.
- Clayton, Mark (1996) "In United States, Canada, new laws fail to curb demand for child sex",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3: 11.
- Clifford, Mark (1994) "Family ties: heir forc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17: 78–86.
- Cohen, Stephen (1974)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 Cohen, Stephen S. and Borrus, Michael (1995) "Networks of American and Japanese electronics companies in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RIE working paper.
- and Guerrieri, Paolo (1995) "The variable geometry of Asian trade", in Eileen M. Doherty (ed.) *Japanese Investment in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RIE-Asia Foundation, pp. 189–208.
- Cohn, Ilene and Goodwin Gill, Guy (1994) *Child Soldiers: the Roles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ole, D. C. and Lyman, J.A. (1971) *Korean Development: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Paul (1995) "The marginalization of Africa",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4(4–5): 541–57.
- Colombo, Gherardo (1990) *Il riciclaggio: gli strumenti giudiziari di controllo dei flussi monetari illeciti con le modifiche introdotte dalla nuova legge antimafia*, Milan: Giuffrè Editore.

-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1994) *Crime and corruption in Russia*, Briefing of the Commiss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lsinki Accord, Washington, DC: June.
- Connolly, Kathleen, McDermid, Lea, Schiavaldi Vincent and Macallair, Dan (1996) *From Classrooms to Cell Blocks: How Prison Building Affects Higher Education and African American Enrollment*, San Francisco: Center on Juvenile and Criminal Justice.
- Conquest, Robert (ed.) (1967)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 (1968) *The Great Terr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Harvest of Sorr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ok, John T. and Brown, J. Larry (1994) "Two Americas: comparisons of US child poverty in rural, inner city and suburban areas. A linear trend analysis to the year 2010", Medford, MA: 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Nutrition, Center on Hunger, Poverty and Nutrition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CPP-092394.
- Cooper, J. (1991) *The Soviet Defence Industry: Conversion and Reform*, London: Pinter.
- da Costa Nunez, Ralph (1996) *The New Poverty: Homeless Families in America*, New York: Insight Books.
- Cowell, Alan (1994) "138 nations confer on rise in global crim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 Curtis, Gerald L. (1993) *Japan's Political Transfigurations: Interpretation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Davidson, Basil (1992) *The Black Man's Burden: Africa and the Crisis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Times Books.
- (1994) *A Search for Afric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Books.
- De Bernieres, Louis (1991) *Senor Vivo and the Coca Lord*, New York: Morrow.
- De Feo, Michael and Savona, Ernesto (1994) "Money trails: international money laundering trends and prevention/control policies", Backgrou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Money-Laundering and the Use of the Proceeds of Crime: a Global Approach, Courmayeur, Italy, June, 18–20.
- Deininger, Klaus and Squire, Lyn (1996) "A 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0,(3): 565–91.
- Del Olmo, Rosa (1991) "La geopolitica del narcotrafico en America Latina", in *Simposio Internacional*: 29–68.
- Del Vecchio, Rick (1994) "When children turn to violenc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11.
- Dentsu Institute for Human Studies/DataFlow International (1994) *Media in Japan*, Tokyo: DataFlow International.
- Desai, Padma (1987) *The Soviet Econom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xford: Blackwell.
- (1989)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the Design and Dilemmas of Soviet Reform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yo, Frederic (1981)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Order: An Asian Case Study*, New York: Praeger.
- (ed.) (1987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7b) "State and labor: modes of political exclusion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in Deyo (ed.).
- Doucette, Diane (1995)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Drake, St Clair, and Cayton, Horace (1945)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rev. edn 1962.
- Drogin, Bob (1995) "Sending children to war",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6, A1-A14.
- Dryakhlov, N.I. et al. (1972) *Nauchno-tekhnicheskaya revolyutsiya i obshchestvo*, Moscow: Nauka.
- Dumaine, Brian (1993) "Illegal child labor comes back", *Fortune* 127(7), April 5.
- Dumont, René (1964) *L'Afrique Noire est mal parti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Dunning, John H. and Narula, Rajneesh (eds) (199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London: Routledge.
- Eggebeen, David and Lichter, Daniel (1991) "Race, family structure, and changing poverty among American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 Ehringhaus, Carolyn Chase (1990) "Functional literacy assessment: issues of interpretation",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40(4)
- Ekhholm-Friedman, Kajsa (1993) "Afro-Marxism and its disastrous effects on the economy: the Congolese case", in Blomstrom and Lundhal (eds), pp. 219-45.
- Ellman, M. and Kontorovich, V. (eds) (1992)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 Endacott, G.B. and Birch, A. (1978)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rlanger, Steven (1994a) "Russia's new dictatorship of crim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 (1994b) "A slaying puts Russian underworld on parad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 Ernst, Dieter (1994) "Carriers of regionalization? The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of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RIE working paper 73.
- and O'Connor, David C., (1992) *Competing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the Experience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 Estefania, Joaquin (1996) *La nueva economia: la globalización*, Madrid: Temas para el Debate.
- (1997) "La paradoja insoportable", *El País Internacional*, April 14: 8.
-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ainstein, Norman (1993) "Race, class and segregation: discourses about African Americ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384-403.
- and Fainstein, Susan (1996) "Urban regimes and black citizen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black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in US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 March.
- Fajnzylber, Fernando (1983) *La industrialización truncada de América Latina*, Mexico: Nueva Imagen.
- Fatton Jr, Robert (1992) *Predatory Rul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Af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Fischer, Claude et al. (1996) *Inequality by Desig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lores, Robert (1996) "Child pro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Labor Affairs, *Forced Labor: the Prostitution of Children, Symposium Proceeding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 Fontana, Josep (1994) *Europa ante el espejo*, Barcelona: Critica.
- Forester, Tom (1993) *Silicon Samurai: How Japan Conquered the World's IT Industry*, Oxford: Blackwell.
- Forrest, Tom (1993)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rtescue, Stephen (1986)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viet Sci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Fottorino, Eric (1991) *La piste blanche. L'Afrique sous l'emprise de la drogue*, Paris: Balland.
- Fouquin, M. et al. (1990) *Pacifique: le recentrage asiatique*, Paris: Economica.
- Frankel, J.A. (1991) "Is a yen bloc forming in Pacific Asia?", in R. O. Brien, (ed.) *Fi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5. The AMEX Bank Review Prize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nch, Howard (1995) "Mobutu, Zaïre's 'guide', leads nation into chao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0: 1.
- "Yielding power, Mabutú flees capital: rebels prepare full takeover of Zaïr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7: 1.
- Frimpong-Ansah, Jonathan H. (1991) *The Vampire State in Afric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cline in Ghana*, London: James Curley.
- Fukui, Haruhiro (1992) "The Japanes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profile of a nationalist-paternalist capitalist state", in Richard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190-226.
- Funken, Claus and Cooper, Penny (eds) (1995) *Old and New Poverty: the Challenge for Reform*,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 Gamayunov Igor (1994) "Oborotni", *Literaturnaya gazeta*, December 7: 13.
- Gans, Herbert (1993) "From 'underclass' to 'undercaste':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 and its major victi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327-35.
- (1995)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arcia, Miguel (1991) *Los barones de la cocaína*, Mexico, DF: Planeta.
- Garcia Marquez, Gabriel (1996) *Noticia de un secuestro*, New York: Penguin.
- Gelb, Joyce and Lief-Palley, Marian (eds) (1994) *Women of Japan and Korea: Continuity and Chan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Gerner, Kristian and Hedlund, Stefan (1989) *Ideology and Rationality in the Soviet Model: a Legacy for Gorbachev*, London: Routledge.
- Ghose, T.K. (1987) *The Banking System of Hong Kong*, Singapore: Butterworth.
- Gilliard, Darrell K. and Beck, Allen J. (1996)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1995", *Bulletin of th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ugust.
- Ginsborg, Paul (ed.) (1994) *Stato dell'Italia*, Milan: Il Saggiatore/Bruno Mondadori.
- Gold, Thomas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M.E. Sharpe.
- Goldman, Marshall I. (1988) *USSR in Crisis. the Failure of an Economic System*, New York: W.W. Norton.
- (1987) *Gorbachev's Challenge: Economic Reform in the Age of High Technology*, New York: W.W. Norton.
- (1996) "Why is the Mafia so dominant in Russia?", *Challenge*, January–February: 39–47.
- Golland, E.B. (1991) *Nauchno-tekhnicheskii progress kak osnova uskoreniia razvitiia narodnogo khoziaistva*, Novosibirsk: Nauka.
- Gomez, Ignacio and Giraldo, Juan Carlos (1992) *El retorno de Pablo Escobar*, Bogota: Editorial Oveja Negra.
- Gordon, Michael R. (1996) "Russia struggles in a long race to prevent an atomic thef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4.
- Gould, Stephen Jay (1985) "The median isn't the message", *Discover*, June: 40–2.
- Granberg, Alexander (1993a)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USSR: trend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72(1): 3–23.
- (1993b) "Politika i uchenyy, kotoryy zanimayetsya ey po dolgu sluzhby", *EKO*, 4: 24–8.
- and Spehl, H. (1989) "Regionale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UdSSR und der BRD", report to the Fourth Soviet–West German Seminar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Kiev, October 1–10.
- Granick, David (1990)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a 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en, Gordon et al. (1992)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arnings inequality for men in the 1980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8(1): 1–15.
- Greenhalgh, Susan (1988) "Families and networks i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inckler and Greenhalgh (eds).
- Grindle, Merilee S. (1996) *Challenging the State: Crisis and Innov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ootaert, Christiaan and Kanbur, Ravi (1995) "Child labor: a review",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454.

- Grossman, Gregory (1977) "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26: 25-40.
- (1989) "Informal personal incomes and outlays of the Soviet urban population", in Portes et al. (eds), pp. 150-72.
- Gugliotta, Guy, and Leen, Jeff (1989) *Kings of Cocaine: inside the Medellín Carte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Gustafson, Thane (1981) *Reform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as, Ernst B. (1958a)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8b) "The challeng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2(4): 440-58.
- (1964)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Tony (1995) "Let's get Africa's act together . . .", report on the UNESCO/ITU/UNECA African Regional Symposium on Telematics for Development, Addis Ababa, Ethiopia, May.
- Hallinan, Joe (1994) "Angry children ready to explode", *San Francisco Examiner*, May 22.
- Handelman, Stephen (1993) "The Russian *Mafiya*", *Foreign Affairs*, 73(2) 83-96.
- (1995) *Comrade Criminal: Russia's New Mafiy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o, Jia and Zhimin, Lin (eds) (1994) *Chang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China: Reform and State Capaci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Harrison, Mark (1993) "Soviet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28: the alternative statistics of G.I. Khanin", *Europe-Asia Studies*, 45(1): 141-67.
- Harvey, Robert (1994), *The Undeclared: the Rise, Fall and Rise of Greater Japan*, London: Macmillan.
- Hasegawa, Koichi (199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for a post-nuclear energy era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23rd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Research Committee on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Bielefeld, Germany, July 18-23.
- Healy, Margaret (1996) "Child pornograph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orking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World Congress against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Stockholm, Sweden, August 27-31.
- Heeks, Richard (1996) *Building Software Industries in Africa*, downloaded from: http://www.sas.upenn.edu/African_Studies/Acad_Research/softw_heeks.html.
- Herbst, Jeffrey (1996) "Is Nigeria a viable stat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9(2): 151-72.
- Hewitt, Chet, Shorter, Andrea and Godfrey, Michael (1994) *Race and Incarceration in San Francisco, Two Years Later*, San Francisco: Center on Juvenile and Criminal Justice.

- High Level Expert Group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HLEGIS) (1997) "The European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V.
- Hill, Christopher (ed.) (1996) *The Actors i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 Hill, Ronald J. (1985) *The Soviet Un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London: Pinter.
- Hirst, Paul and Thompson, Grahame (1996)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Oxford: Blackwell.
- Ho, H.C.Y. (1979) *The Fiscal System of Hong Kong*, London: Croom Helm.
- Holzman, Franklyn D. (1976)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Commun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 Hondagneu-Sotelo, Pierrette (1994) "Regulating the unregulated?: domestic workers' social networks", *Social Problems*, 41:(1).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67) *Kowloon Disturbances, 1966: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 Hope, Kempe Ronald (1995)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AIDS in Afric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30: 1-2.
- (1996) "Growth,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Botswa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14: 1.
- Hsing, You-tien (1997a)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b) "Transnational networks of Chinese capitalists and development in local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amboo Network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Research Workshop on the Work of Chinese Entrepreneur Network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April 11-12 (unpublished in 1997).
- Hutchful, Eboe (1995) "Why regimes adjust: the World Bank ponders its 'star pupil'",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9: 2.
- Hutching, Raymond (1976) *Soviet Science, Technology, Desig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tton, Will (1996) *The State We're In*, rev. edn, London: Vintage.
- Ikporukpo, C.O. (1996) "Federalism,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economic game: conflict over access to petroleum resources in Niger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14: 159-77.
- Ikuta, Tadahide (1995) *Kanryo: Japan's Hidden Government*, Tokyo: NHK.
- Imai, Ken'ichi (1990) *Jouhon Network Shakai no Tenka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society], Tokyo: Tikuma Shobou.
- Industrial Strategy Project (ISP) (1995) *Improving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Ottawa: UCT Pres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 InfoCom Research (1995)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Japan, 1995*, Tokyo: InfoCom Research.
- Inoguchi, Takashi (1995) "Kanryo: the Japanese bureaucracy in history's eye", paper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on Crisis and Change in Japan Today, Seattle, October 20-21 (read in a revised version, suppli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March 1996).

-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1994) *Adjustment in Africa: Reforms, Results and the Road Ahe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 (1994) *World Labour Report 1994*, Geneva: ILO.
- (1995)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1995*, Geneva: ILO.
- (1996) *Child Labour: Targeting the Intolerable*, Geneva: ILO.
- Irusta Medrano, Gerardo (1992) *Narcotrafico: hablan los arrepentidos – personajes y hechos reales*, La Paz: CEDEC.
- Irwin, John (1985) *The Jail: Managing the Underclass in America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d Austin, James (1994) *It's about Time: America's Imprisonment Binge*, Belmont, CA: Wadsworth.
- Ito, Youichi (1980) "The *Johoka Shakai*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in Japan", *Keio Communication Review*, 1: 13–40.
- (1991) "Birth of *Johoka Shakai* and *Johoka* concepts in Japan and their diffusion outside Japan", *Keio Communication Review*, 13: 3–12.
- (1993) "How Japan modernised earlier and faster than other non-Western countries: an information sociology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4(2).
- (1994a) "Why information now?", in Georgette Wang (ed.), *Treading Different Paths: Informationization in Asian Nations*, Norwood, NJ: Ablex.
- (1994b) "Japan", in Georgette Wang (ed.), *Treading Different Paths: Informationization in Asian Nations*, Norwood, NJ: Ablex.
- Iwao, Sumiko (1993) *The Japanese Wo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Izvestiya*, (1994a) "Krestnye ottsy i inoplanetyane", January 27.
- (1994b) "Rossiiskaya mafia sobiraet dos'ye na krupnykh chinovnikov i politikov", January 26: 1–2.
- "Ugolovnaya rossiya", October 18, 19: 1–2.
- Jackson, Robert H. and Rosberg, Carl G.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n personal rule" in David Apter, and Carl Rosberg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Realism in Sub-Saharan Afric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 Jamal, Vali (ed.) (1995)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Rural Labour Markets in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ILO.
- James, Jeffrey (1995) *The Stat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Jap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evelopment Center (1994) *Informatization White Paper*, Tokyo: JIPDEC.
- Jasny, N. (1961)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1928–195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zairy, Idriss et al. (1992) *The State of World Rural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Jensen, Leif (1991) "Secondary earner strategies and family poverty: immigrant-native differentials, 1960-198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5: 1.
- Jensen, Mike (1995) Draft discussion paper for UNESCO/ITU/UNECA African Regional Symposium on Telematics for Development in Addis Ababa, May, downloaded from <http://www.idsc.gov.eg//aii/ddpf.htm#tele>
- (1996) "Economic and technical issues in building Africa'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presentation to Conference on Africa and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Geneva, October 17-19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Devo (ed.).
- (1995)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ew York: W.W. Norton.
- Johnson, D. Gale, and McConnell Brooks, Karen (1983) *Prospects for Soviet Agriculture in the 1980s*,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J. (1992) *The Dispossessed: America's Underclasse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Jowitt, Kenneth (1971)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Romania, 1944-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iser, Paul (1996)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fragile nation: the demise of social unity in Tanzan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4: 2.
- Kaiser, Robert G. (1991) *Why Gorbachev Happened: his Triumphs and his Failur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Kaldor, Mary (1981) *The Baroque Arsenal*,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Kalmanovitz, Salomon (1993) *Análisis macro-económico del narcotráfico en la economía colombiana*, Bogot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Facultad de Ciencias Económicas.
- Kamali, A. et al. (1996) "The orphan problem: experience of a Sub-Saharan African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AIDS epidemic", *AIDS Care*, 8(5): 509-15.
- Kaplan, David E. and Dubro, Alec (1986) *Yakuza: the Explosive Account of Japan's Criminal Underworld*, Menlo Park, Calif.: Addison-Wesley.
- Kasarda, John D. (1990) "Urban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the underclas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1: 26-47.
- (1995)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changing location of jobs", in Reynolds Farley (ed.),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Kassel, Simon and Campbell, Cathleen (1980)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Kato, Teisuro (1984) "A preliminary note on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Japan",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6(1): 19-30.
- (1987) "Der neoetatismus im heutigen Japan", *Prokta*, 66: 91-105.
- Kazantsev, Sergei (1991) "Ozenka ekonomicheskogo effekta NTP v sisteme tsentralizovannogo upravleniya nauchno-tekhnicheskimi progressom", in

- E. Golland, and T. Rybakova (eds), *Tekhnologicheskiiyi progress i ekonomicheskoye razvitiye*, Novosibirsk: Nauka, pp. 162–74.
- Kazuhiro, Imamura (1990) "The compute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in Japan", in Adriana Boscaro, Franco Gatti, and Massimo Raveri (eds), *Rethinking Japan*, Folkestone, Kent: pp. 97–106.
- Keating, Michael (1995) *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 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in Quebec, Catalonia, and Scotl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elly, R.J. (ed.) (1986) *Organized Crime: a Global Perspective*,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Kempster, Norman (1993) "US consider seizing vast wealth of Zaïre's Mobutu to force him out",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3.
- Keohane, Robert O. and Hoffman, Stanley (1991a)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urope in the 1980s", in Keohane and Hoffman (eds).
- and — (eds) (1991b) *The New European Community: Decision Making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Khan, Sikander and Yoshihara, Hideki (1994)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of Foreign Companies in Japan*,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 Khanin, G.I. (1988) "Ekonomicheskii rost: al'ternativnaya otsenka", *Kommunist* 17.
- (1991a) *Dinamika ekonomicheskogo razvitiya SSSR*, Novosibirsk: Nauka.
- (1991b) "Ekonomicheskii rost v SSSR v 80-e gody", *EKO*, 5.
- Khazanov, Anatoly M. (1995) *After the USSR: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Kibria, Nazli (1994)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ologies: the dynamics of immigrant economic adaptation among Vietnamese refugees", *Social Problems*, 41:1.
- Kim, Kyong-Dong, (ed.) (1987) *Dependency Issues in Korean Development*,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Kim, Seung-Kuk (1987), "Class formation and labor process in Korea", in Kim (ed.).
- King, Ambrose Y.C. and Lee, Rance P. (eds.) (1981)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King, Roy (1994) "Russian prisons after perestroika: end of the gulag?"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4, special issue.
- and Mike Maguire (1994) "Contexts of imprison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4, special issue.
- Kirsch, Irwin, Jungeblut, Ann, Jenkins, Lynn and Kolstad, Andrew (1993) *Adult Literacy in America: a First Look at the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Kiselyova, Emma, Castells, Manuel and Granberg, Alexander (1996) *The Missing Link: Siberian Oil and Gas and the Pacific Econom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Monograph.
- Kishima, Takako (1991) *Political Life in Japan: Democracy in a Reversibl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leinknecht, William (1996) *The New Ethnic Mobs: the Changing Face of Organized Crime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Koetting, Mark and Schiraldi, Vincent (1994) *Singapore West: the Incarceration of 200,000 Californians*, San Francisco: Center on Juvenile and Criminal Justice.
- Kontorovich, V. (1988) "Lessons of the 1965 Soviet economic reform", *Soviet Studies*, 40, 2.
- Kornai, Janos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86)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Studies on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90) *Vision and Reality, Market and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 Korowkin, Wladimir (1994) "Di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Russlands zu den Staaten der ehemaligen UdSSR", *Osteuropa*, 2 (February): 161-74.
- Kozlov, Viktor (1988) *The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Kozol, Jonathan (1985) *Illiterate America*, New York: Anchor Press.
- Krause, Lawrence, Koh Ai Tee and Lee (Tsao) Yuan (1987) *The Singapore Economy Reconsidere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Kuleshov, Valery and Castells, Manuel (directors) (1993) "Problemas socio-economicos del complejo de gas y petroleo en Siberia Occidental en el contexto del la reforma economica", Madrid: UAM/IUSNT, research report.
- Kuo, Shirley W.Y. (1983) *The Taiw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Kuznetsova, N.F. (1996) "Konferenciya po problemam organizovannoi presupnosii", *Gosudarstvo i Pravo*, 5: 130-37.
- Kwan, Alex Y.H. and Chan, David K.K. (eds) (1986)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Writers and Publishers Cooperative.
- Lachaud, Jean-Pierre (1994) *The Labour Market in Africa*,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 Lam, Willy Wo-Lap (1995)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 the Power Struggle in Beijing since Tiananmen*, Singapore: Wiley.
- Lane, David (1990) *Soviet Society under Perestroika*, London: Unwin and Hyman.
- Laserna, Roberto (ed.) (1991) *Economia politica de las drogas: lecturas Latinoamericanas*, Cochabamba: CERES/CLACSO.
 — (1995) "Coca cultivation, drug traffic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ochabamba, Bolivi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1996) *20 juicios y prejuicios sobre coca-cocaina*, La Paz: Clave Consultores.
- Lau, Siu-kai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avalette, Michael (1994) *Child Employment in the Capitalist Labour Market*, Aldershot: Avebury.
- Lee, Chong Ouk (198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f Korea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eoul: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 Leitzel, Jim et al. (1995) "Mafiosi and Matrioshki: organized crime and Russian reform", *The Brooking Review*, winter: 26-9.
- Lemarchand, René (1970) *Rwanda and Burundi*, London: Pall Mall.
- (1993) "Burundi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imensions of ethnic strife", in John McGarry and Brendan O'Leary (eds), *The Politics of Ethnic Conflict Regulation: Case Studies of Protracted Ethnic Conflic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1994a) "Managing transition anarchies: Rwanda, Burundi, and South Af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2(4): 581-604.
- (1994b) *Burundi: Ethnocide as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rman, Robert (1996) "The impact of changing US family structure on child pover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a*, 63: S119-39.
- Lethbridge, H. (1970) "Hong Kong cadets, 1862-19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0: 35-56.
- (1978)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ung, Chi-keung et al. (1980) *Hong Kong: Dilemmas of Growth*,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 Lewin, Moshe (1988)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wis, Peter (1996) "From prebendalism to pred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cline in Niger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4(1): 79-103.
- Leys, Colin (1994) "Confronting the African tragedy", *New Left Review*, 204: 33-47.
- Li, Linda Ch. (1996) "Power as non-zero sum: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 over investment implementation, Guandong and Shanghai, 1978-93",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ing paper 1996/2.
- Lim, Hyun-Chin (1982)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Korea: 1963-79*,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Lin, Jing (1994) *The Opening of the Chinese Mind: Democratic Changes in China since 1978*, Westport, CT: Praeger.
- Lin, Tsong-Biau, Mok, Victor and Ho, Yun-Ping (1980) *Manufactured Exports and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indqvist, Sven (1996) *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Lim, Hyun-Chin and Yang, Jonghoe (1987) "The state, local capitalists and multinational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 triple alliance in Korea", in Kyong-Dong Kim (ed.), *Dependency Issues in Korean Development*,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pp. 347-59.
- Loxley, John (1995) "A review of *Adjustment in Africa. Reforms, Results and the Road Ahead*",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9: 2.
- Lu, Jia (1993) "Jingji guore wnti geshuo gehua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n the problems of overheated economy)", *China Times Weekly*, 61, February 28-March 6: 44-5.

- (1994a) "Zhonggong yabuzhu difang haiwai juzhaif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 cannot control the trend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eign borrowing)", *China Times Weekly*, 150, November 13–19: 6–9.
- (1994b) "Laozt jufen juyou zhongguo tese (Labor disputes ha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Times Weekly*, 116, March 20–6: 11–13
- Lynch, Michael J. and Paterson, E. Britt (eds) (1995) *Race and Criminal Justice: a Further Examination*, New York: Harrow and Heston.
- McDonald, Douglas (1994) "Public imprisonment by private means: the re-emergence of private prisons and jail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4, special issue.
- Mace, James E. (1983) *Communism 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National Communism in Soviet Ukraine, 1918–33*, Cambridge, MA: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 Machimura, Takashi (1994) *Seikai Toshi Tokyo no Kozo*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 global city: Tokyo],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 Mackie, J.A.C. (1992)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sian 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6(1): 41–64.
- McKinley, James C. (1996) "Old revolutionary is a new power to be reckoned with in Central Afric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 Maddison, Angus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 Malleret, T. and Delaporte, Y. (1991) "La conversion des industries de defense de l'ex-URSS", *Le Courrier des Pays de l'Est*, November.
- Mamdani, Mahmood (1996) "From conquest to consent as the basis of state 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Rwanda", *New Left Review*, 216: 3–36.
- Manning, Claudia (1993) "Subcontracting in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an analysis of future prospect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TASKGRO Workshop, May 21–3.
- and Mashigo, Angela Pinky (1994) "Manufacturing in South African microenterprises", *IDS Bulletin*, 25(1).
- Marrese, Michael and Vanous, Jan (1983) *Soviet Subsidization of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 Soviet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Martin, John M. and Romano, Anne T. (1992) *Multinational Crime*, London: Sage.
- Maruyama, Masao (1963) *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ed. Ivan Morr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ssey, Douglas S. and Denton, Nancy A.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Grow, Andrew and Shibuya, Kumiko (1994) "Migration, segregation and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425–45.
- Medina Gallego, Carlos (1990) *Autodefensas, paramilitares y narcotrafico en Colombia*, Bogota: Editorial Documentos Periodisticos.
- Mejia Priete, Jorge (1988) *Mexico y el narcotrafico*, Mexico, DF: Editorial Universo.

- Menshikov, Stanislas (1990) *Catastrophe or Catharsis? The Soviet Economy Today*, Moscow and London: Inter-Verso.
- MERG (Macro-Economic Working Group)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a Framework for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South Africa*, Belleville, South Africa: Center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 Mergenhausen, Paula (1996) "The prison population bomb", *American Demographics*, 18(2): 36-40.
- Minc, Alain (1993) *Le nouveau Moyen Age*, Paris: Gallimard.
- Miners, N.J. (1986)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ngione, Enzo (1993) "The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 (ed.) (1996)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Oxford: Blackwell.
- and Morlicchio, Enrica (1993) "New forms of urban poverty in Italy: risk path model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 Mishel, Lawrence, Bernstein, Jared and Schmitt, John (1996)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996-97*,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 Mita Barrientos, Fernando (1994) *El fenomeno del narcotrafico*, La Paz: AVF Producciones.
- Mitchell, R. Judson (1990) *Getting to the Top in the USSR: Cyclical Patterns in the Leadership Succession Proces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Mollenkopf, John and Castells, Manuel (eds) (1991)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 Morris, Martina, Bernhardt, Annette and Handcock, Mark (1994) "Economic inequality: new methods for new tren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205-19.
- Motyl, Alexander M. (1987) *Will the Non-Russians Rebel? State, Ethnic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USS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untarhorn, Viti (1996)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child prostitution in Asia", in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Labor Affairs, *Forced Labor: the Prostitution of Children, Symposium Proceeding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 Murray, Diane H. (with Qin Baogi) (1994) *The Origins of the Triad: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shkat, Miron (1982)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Clas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for Asia Studies.
- Nathan, Andrew J. (1990) *China's Crisis: 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ational Center for Adult Literacy (NCAL) (1995) "Adult literacy: the next generation", *NCAI Technical Report TR95-01*, Philadelphia: NCAL.
- Naughton, Barry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varro, Mireya (1997) "Russian submarine surfaces as player in drug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5: 1-8.
- Navarro, Vicente (1996) "La unidad monetaria, Maastricht y los Estados del Bienestar: notas comparativas de la UE con EEUU", paper presented at

- the Conference on New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for Europe, Fundacion Sistema, Madrid, December 18–19.
- (1997) *Neoliberalismo y estado del bienestar*,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 Nekrich, Aleksandr M. (1978) *The Punished Peoples: the Deportation and Tragic Fate of Soviet Minorities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W.W. Norton.
- Network Wizards (1996) Internet Survey, July, downloaded from: <http://www.nw.com>.
- Newbury, Catherine (1988) *The Cohesion of Oppression: Clientship and Ethnicity in Rwanda, 1860–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ewman, Anabel, Lewis, Warren and Beverstock, Caroline (1993) "Prison literacy: implications for program and assessment policy", *NCAL Technical Report TR93-1*, Philadelphia: NCAL.
- Noble, Kenneth (1992) "As the nation's economy collapses, Zaireans squirm under Mobutu's heel",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4.
- Nonaka, Ikujiro and Takeuchi, Hirotaka (1994)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d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E. Herbert (1940)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eiji Period*,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Nove, Alec (1969/198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7)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Nzongola-Ntalaja, Georges (1993) *Nation-building and State-building in Africa*, SAPES Trust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3, Harare: Sapes Books.
- Odedra, Mayuri et al. (1993) "Sub-Saharan Africa: a technological deser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6(2) 25–9.
- OECD (1995) *Literacy, Economy and Society: Result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 Paris: OECD.
- Ohmae, Kenichi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 Ong, Aihwa and Nonini, Donald (eds) (1997)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Orstrom Moller, J. (1995) *The Future European Model: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ultural Decentral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 Ovchinsky, Vladimir (1993) *Mafia: Neob'yavlenyi vizit*, Moscow: INFRA-M.
- Over, Mead (1990)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atal adult illness from AIDS and other causes in Sub-Saharan Africa: a research propos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World-Bank, Washington, unpublished.
- Overholt, William H. (1993) *The Rise of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Ozawa, Terutomo (1996) "Japan: the macro-IDP, meso-IDPs and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 (TDP)", in John H. Dunning and Rajneesh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pp. 142–73.
- Palazuelos, Enrique (1990) *La economia soviética mas allá de la perestroika*, Madrid: Ediciones de Ciencias Sociales.

- Panos Institute (1992) *The Hidden Costs of AIDS. the Challenge to Development*, London: Panos Institute.
- Pardo Segovia, Fernando (ed.) (1995) *Narcotráfico: situación actual y perspectivas para la acción*, Lima: Centro Peruan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 Parsons, Craig (1996) "Europe's identity crisis: European Union dilemmas in the 199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Western European Studies, research paper.
- Pasquini, Gabriel and De Miguel, Eduardo (1995) *Blanca y radiante: mafias, poder y narcotráfico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Planeta.
- Pease, Ken (1994) "Cross-national imprisonment rates: limitations of method and possible conclusion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4, special issue.
- Pedrazzini, Yves and Sanchez, Magaly (1996) *Malandros, bandes et enfants de la rue: la culture d'urgence dans la metropole latino-americaine*, Paris: Fondation Charles Leopold Mayer pour le Progres de l'Homme.
- Perez Gomez, V. (1988) *Historia de la drogadiccion en Colombia*, Bogota: TM Editores/Uniandes.
- Peterson, G. and Harrell, Adele V. (eds) (1993) *Drugs, Crime, and Social Isolation*,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 Pfeffer, Max (1994) "Low-wage employment and ghetto poverty: a comparison of African-American and Cambodian day-haul farm workers in Philadelphia", *Social Problems*, 41(1).
- Philipson, Thomas and Posner, Richard A. (1995) "The microeconomics of the AIDS epidemic in Afric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4): 835-48.
- Pinkus, Benjamin (1988) *The Jews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History of a National Mino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pes, Richard (1954)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 Pisani-Ferry, Jean (1995) "Variable geometry in Eur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shaping the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an Agenda for the Next Ten Years, Bruges: The College of Europe, March 20-2.
- Plotnick, Robert D. (1990) "Determinants of teenage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735-46.
- Podlesskikh, Georgyi and Tereshonok, Andrey (1994) *Vory V Zakone: Brosok k Vlasti*, Moscow: Khudozestvennaya Literatura.
- Portes, Alejandro (ed.) (199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 and Sensenbrenner, Julia (1993)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6): 1320-50.
- , Castells, Manuel and Benton, Lauren (eds) (1989) *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o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otter, Gary W. (1994) *Criminal Organizations: Vice, Racketeering and Politics in an American City*,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 Praaning, R. and Perry, C. (eds) (1989) *East-West Relations in the 1990s: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Dordrecht/Boston: M. Nijhoff.
- Press, Robert M. (1993) "Some allege Mobutu is stirring up deadly tribal warfare in Zaïr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ust 17: 1.
- Pritchett, Lant (1995) *Divergence, Big Tim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522.
- Prolongeau, Hubert (1992) *La vie quotidienne en Colombie au temps du cartel de Medellin*, Paris: Hachette.
- Psacharopoulos, George et al. (1995)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1980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1(3): 245-63.
- Purcell, Randall P. (ed.) (1989)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a World Econom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Ravenhill, John (1993) "A second decade of adjustment: greater complexity, greater uncertainty", in Callaghy and Ravenhill (eds).
- Reischauer, Edwin O. (1988) *The Japanese Today: Change and Continuit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emnick, David (1993)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Renard, Ronald D. (1996) *The Burmese Connection: Illegal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Golden Triangl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Rezun, Miron (ed.) (1992) *Nation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an Empire: Russia and its Periphery*, Westport, CT: Praeger.
- Riddell, Barry (1995) "The World Bank speaks to Africa yet again",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9:2.
- Riddell, Roger (1993) "The future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Callaghy and Ravenhill (eds), pp. 215-47.
- Riley, Thyra (1993) "Characteristics of and constraints facing black businesses in South Africa: survey result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ld Bank's presentation to the Seminar on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annesburg, June 1-2.
- Rizzini, Irene (ed.) (1994) *Children in Brazil Today: a Challenge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 Rio de Janeiro: Editora Universitaria Santa Ursula.
- Roberts, Albert E. (1994) *Critical Issues in Crime and Jus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obinson, Thomas W. (ed.) (1991)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
- Rodgers, Gerry, Gore, Charles and Figueiredo, Jose B. (eds) (1995) *Social Exclusion. Rhetoric, Reality, Responses*,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
- Rodgers, Harrell (1996) *Poor Women, Poor Children*, Armonk, NY: M.E. Sharpe.
- Rogerson, Christian (1993) "Industrial subcontracting in South Africa: a research review",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WV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um, June.
- Rohwer, Jim (1995) *Asia Rising*,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oom, G. (1992) *Observatory on National Policies to Combat Social Exclusion: Second Annual Report*, Brussel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 Roth, Jurgen and Frey, Marc (1995) *Europa en las garras de la mafia*, Barcelona: Anaya and Mario Muchnik (orig. pub. in German in 1992).
- Rowen, H.S. and Wolf Jr, Charles, (eds) (1990) *The Impoverished Superpower*,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 Ruggie, John G. (1993)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1): 139-74.
- Sachwald, Fredrique (1994)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quisitions and Alliances in Industr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Sakaiya, Taichi (1991) *The Knowledge-Value Revolution: or a History of the Future*,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Salazar, Alonso and Jaramillo, Ana Maria (1992) *Medellan: las subculturas del narcotrafico*, Bogota: CINEP.
- Salmin, A.M. (1992) *SNG: Sostoyanie i perspektivy razvitiya*, Moscow: Gorbachev Fund.
- Sanchez Jankowski, Martin (1991) *Islands in the Str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ndbrook, Richard (1985) *The Politics of Africa's Economic Stag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ndholtz, Wayne et al. (1992) *The Highest Stakes: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BRI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ntino, Umberto and La Fiura, Giovanni (1990) *L'impresa mafiosa: dall'Italia agli Stati Uniti*, Milan: Franco Angeli.
- Sapir, J. (1987) *Le système militaire soviétique*, Paris: La Decouverte.
- Sarkar, Prabirjit and Singer, H.W. (1991) "Manufactured expor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terms of trade since 1965", *World Development*, 19(4): 333-40.
- Sarmiento, Eduardo (1990) "Economía del narcotráfico", *Desarrollo y Sociedad*, September 26: 11-40.
- Sarmiento, Luis Fernando (1991) *Cocaina and Co.: un mercado ilegal por dentro*, Bogot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 Savona, Ernesto (ed.) (1993) *Mafia Issues*, Mil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Program.
- Savvateyeva, Irina (1994) "Kontrrazvedka sobirayetsya proveryat' chinovnikov: dlya chego?". *Izvestiya*, April 28: 2.
- Scherer, John L. and Jakobson, Michael (1993) "The collectivis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Soviet prison camp system", *Europe-Asia Studies*, 45 (3): 533-46.
- Schiffer, Jonathan (1983) *Anatomy of a Laissez-faire Government: the Hong Kong Growth Model Reconsidere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for Urban Studies.
- Schiraldi, Vincent (1994) *The Undue Influence of California's Prison Guards' Union: California's Correctional-Industrial Complex*, San Francisco: Center on Juvenile and Criminal Justice, report, October.
- Schlesinger, Jacob M. (1997) *Shadow Shoguns: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Postwar Political Machin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Scott, Ian (1987) "Policy making in a turbulent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report.
- and Burns, John P. (eds) (1984) *The Hong Kong Civil Servic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Peter D. and Marshall, Jonathan (1991) *Cocaine Politics: Drugs, Armies and the CIA in Central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dlak, Andrea and Broadhurst, Diane (1996)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Third National Incidence Study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Seki, Kiyohide (1987) "Population and family policy: measuring the level of living in the country of familism", Tokyo: Nihon University,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25.
- Seymour, Christopher (1996) *Yakuza Diary: Doing Time in the Japanese Underworld*,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Shane, Scott (1994) *Dismantling Utopia: How Information Ended the Soviet Union*, Chicago: Ivan R. Dee.
- Shargorodsky, Sergei (1995) "In troubled Russia, contract killings are a way of lif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17.
- Shaw, Denis J. B. (1993)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future of a federal Russia", *Post-Soviet Geography*, 34(8).
- Shinotsuka, Eiko (1994) "Women workers in Jap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Gelb and Lief-Palley (ed.) : 95–119.
- Shirk, Susan and Twomey, Christopher (eds) (1996) *Power and Prosperity: Economics and Security Linkages in Asia-Pacific*,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Shoji, Kokichi (1991) "Rising neo-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 changing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world society",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search paper.
- (1994), "Sociology", in *An Introductory Bibliography for Japanese Studies*, vol. 9, part 1, Tokyo: The Japan Foundation: pp 150–216.
- (1995) "Small changes make big change: changing Japanese life-style and political chang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search paper.
- Sigur, Christopher J. (1994)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ntemporary Korea*, New York: Carnegie Council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Silver, Hilary (1993) "National conceptions of the new urban poverty: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September.
- Simon, David (1995) "Debt,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Sub-Saharan Africa in the 1990s", in Simon et al. (eds).
- , van Spengen, Wim, Dixon, Chris and Naarman, Anders (eds) (1995) *Structurally Adjusted Africa: Poverty, Debt and Basic Needs*, London: Pluto Press.

- Simon, Gerhard (1991)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ward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Simposio Internacional (1991) *El impacto del capital financiero del narcotrafico en America Latina*, La Paz: Centro para el estudio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el desarrollo.
- Singh, Tejpal (1982) *The Soviet Federal State: Theory,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elhi: Sterling.
- Sit, Victor (1982) "Dynamism in small industries: the case of Hong Kong", *Asian Survey*, 22: 399-409.
- Skezely, Miguel (1995) "Poverty in Mexico during adjustment",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1(3): 331-48.
- Smaryl, O.I. (1984) "New technology and the Soviet predicament", *Survey*, 28(1): 109-11.
- Smith, Gordon B. (1992) *Soviet Politics. Struggling with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mith, Patrick (1997) *Japan: a Reinterpretation*, New York: Pantheon.
- Smolowe, Jil (1994) "Lock 'em up and throw away the key", *Time*, February 7: 55-9.
-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1996a) "Restructuring the South African labour market", report of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Labour Market Policy.
- (1996b)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al equity: policy proposals", Department of Labour Green Paper.
- Specter, Michael (1996) "Cemetery bomb in Moscow kills 13 at ceremony",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A1-A4.
- Spence, Jonathan D. (1990)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 Staebler, Martin (1996) "Tourism and children in prostitut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ld Congress against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Stockholm, August 27-31.
- Steinberg, Dimitri (1991) *Soviet Defense Burden: Estimating Hidden Defense Costs*, Washington, DC: Intelligence Decision Systems, research report.
- Sterling, Claire (1994) *Thieves' World: the Threat of the New Global Network of Organized Crim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Strong, Simon (1995) *Whitewash: Pablo Escobar and the Cocaine Wars*, London: Macmillan.
- Sung, Yun-wing (1994) "Hong Kong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China cir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a Circle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Global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ong Kong: December 8-11.
-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rvey* (1984) "The Novosibirsk Report", *Survey* 28(1): 88-108 (English trans.).
- Susser, Ida (1991) "The separation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John Mollenkopf and Manuel Castells (eds),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pp. 207-24.

- (1993) "Creating family forms: the exclusion of men and teenage boys from families in the New York City shelter system, 1987-1991",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13(3): 267-85.
- (1995) "Fear and violence in dislocated communiti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9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 (1996) "The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in US cities", *Annual Reviews of Anthropology*, 25: 411-35.
- and Kreniske, John (1987) "The welfare trap: a public policy for deprivation" in Leith Mullings (ed.), *C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51-68.
- Svedberg, Peter (1993) "Trade compression and economic decline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Magnus Blomstrom and Mats Lundahl (eds), *Economic Crisis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Policy Respons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p. 21-40.
- Szelenyi, Ivan (1982)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 in Michael Burawoy and Theda Skocpol (eds), *Marxist Inquiries*, special issue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287-327.
- Taguchi, Fukuji and Kato, Tetsuro (1985) "Marxist debates on the state in post-war Japan", *Hosei Ronshu*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105: 1-25.
- Taibo, Carlos (1993a) "Las fuerzas armadas en la URS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Madrid: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
- (1993b) *La Union Sovietica (1917-1991)*, Madrid: Editorial Sintesis.
- Talih, Azizah (ed.) (199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SEACEN Countries*, Kuala Lumpur: the South 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 Tarasulo, Isaav T. (ed.) (1989) *Gorbachev and Glasnost: Viewpoints from the Soviet Press*,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Books.
- Tevera, Dan (1995) "The medicine that might kill the patient: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urban poverty in Zimbabwe", in David Simon, Wim van Spengen, Chris Dixon and Anders Naarman (eds), *Structurally Adjusted Africa: Poverty, Debt and Basic Needs*, London: Pluto Press.
- Thalheim, Karl (1986) *Stagnation or Change in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with a note by Gregory Grossman), London: Center for Research in Communist Economies.
- The Current Digest* [of Post-Soviet press] (1994) "Crime, corruption pose political, economic threat", *Current Digest*, 45(4): 14-16.
- The Economist* (1993) "Let down again: a survey of Nigeria", special supplement, August 21.
- (1995) "Coming of age: a survey of South Africa", special supplement, May 20.
- (1996a) "Africa for the Africans: a survey of Sub-Saharan Africa", special supplement, September 7.
- (1996b) "Belgium: crony state", October 26: 61-2.
- (1996c) "Death shadows Africa's Great Lakes", October 19: 45-7.

- Thomas, John and Kruse-Vaucienne, Ursula (eds) (1977) *Sovie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 Thoumi, Francisco (1994) *Economía política y narcotráfico*, Bogota: TM Editores.
- Timmer, Doug A., Eitzen, D. Stanley, and Talley, Kathryn (1994) *Paths to Homelessness: Extreme Poverty and the Urban Housing Crisi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Tokatlian, Juan G. and Bagley, Bruce (eds) (1990)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narcotráfico*, Bogota: CEREC/Uniandes.
- Tonry, Michael (1994) "Racial disproportion in US prison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4, special issue.
- (1995) *Malign Neglect: Rac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tani, Osamu and Yatazawa, Noriko (eds) (1990) [*The Changing Family: in Japanes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Touraine, Alain (1995) "De la globalización al policentrismo", *El País*, July 24.
- (1996a) "La deconstrucción europea", *El País*, April 4.
- (1996b) "La globalización como ideología", *El País*, September 16.
- (1996c) "Detrás de la moneda: la economía", *El País*, December 22.
- (1997) *Pourrons-nous vivre ensemble? Égaux et différents*, Paris: Fayard.
- et al. (1996) *Le grand refus: réflexions sur la greve de decembre 1995*, Paris: Fayard.
- Townsend, Peter (1993) *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 London: Harvester/Wheatsheaf.
- Tragardh, Lars (1996)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Germany and Sweden, 1945–199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Slavic Studies/Center for German and European Studies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November 22.
- Tranfaglia, Nicola (1992) *Mafia, politica e affari: 1943–91*, Roma: Editori Laterza.
- Trotsky, Leon (1965) *La Revolution Russe* (trans. from Russian), Paris: Maspero.
- Trueheart, Charles (1996) "String of crimes shocks Belgium: national pride damaged by pedophilia, murder, coverup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5.
- Tsao, Yuan (1986) "Sources of growth accounting for the Singapore economy", in Lim Chong-Yah and Peter J. Lloyd (eds), *Singapore: Resources and Growth*,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uneyoshi, Ryoko (1994) "Small groups in Japanese elementary school classrooms: comparis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30(2): 115–29.
- Tsuru, Shigeto (1993) *Japan's Capitalism. Creative Defeat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surumi, Kazuko (1970) *Social Change and the Individual: Japan Before and After Defeat in World War I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urbino, Fidel (1992) *Violencia y narcotráfico en Amazonia*, Lima: Centro Amazonico de antropologia y aplicacion practica.
- Tyson, Laura d'Andrea (1992)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Ueno, Chizuko (1987) "The position of Japanese women reconsidered", *Current Anthropology*, 28(4): S75-S82.
- UNICEF (1996)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19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96)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1996: 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199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UN-ESC) (1994) "Problems and dangers posed by organized transnational crime in the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Background Document for the Worl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Organized Transnational Crime, Naples, November, 21-23, Document E/CONF.88.2.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89) *Critical Technologies Pla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6) "Probation and parole population reaches almost 3.8 mill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ess release, June 30.
-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94) *By the Sweat and Toil of Children: Vol. I. The Use of Child Labor in US Manufactured and Mined Import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ur.
-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95) *By the Sweat and Toil of Children: Vol. II. The Use of Child Labor in Agricultural Imports and Forced and Bonded Child Labor*,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ur.
- US News & World Report* (1988) "Red Star Rising", pp. 48-53
- Van Kempen, Ronald and Marcuse, Peter (1996) *The New Spatial Order of C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Van Regemorter, Jean-Louis (1990) *D'une perestroika à l'autre: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de la Russie de 1860 à nos jours*, Paris: SEDES, Les Cours de la Sorbonne.
- Van Wolferen, Karel (1989)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 Veen, Hans-Joachim (ed.) (1984)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Domestic Affair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Leamington Spa: Berg.
- Velis, Jean-Pierre (1990) *Through a Glass Darkly: Functional Illiterac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aris: UNESCO.
- Veloza, Gustavo (1988) *La guerra entre los carteles del narcotráfico*, Bogota: G.S. Editores.
- Venezky, Richard (1996) "Literacy assessment in the service of literacy policy", *NCAI. Technical Report TR95-02*, Philadelphia: National Center for Adult Literacy.

- Verdery, Katherine (1991) "Theorizing Socialism: a prologue to the "transi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August, pp. 419-39.
- Volin, Lazar (1970)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from Alexander II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oshchanov, Pavel (1995) "Mafia godfathers become fathers of the nation", *Komsomolskaya Pravda* (read in the English version in *Business World of Russia Weekly*, 18/169, May: 13-14).
- de Waal, Alex (1996) "Contemporary warfare in Africa: changing context, changing strategies", *IDS Bulletin*, 27(3): 6-16.
- Wacquant, Loic (1993) "Urban outcasts: stigma and division in the black American ghetto and the French urban periph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September.
- (1996) "The rise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notes on its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Acta Sociologica*, 12: 121-39.
- Waever, Ole (1995)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solving the sovereignty puzzle in EU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8(2): 1-43.
- Wagner, Daniel (1992) "World literacy: research and policy in the EFA decad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520, March 1992.
- Wakabayashi, Hideki (1994) *Japan's Revolution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Tokyo: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 Walder, 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Popular Protest in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 263-301.
- and Gong, Xiaoxia (eds) (1993) "China's great terror: new documentat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6(1), special issue.
- Walker, Martin (1986) *The Waking Giant: Gorbachev's Russia*, New York: Pantheon.
- Wallace, Bill (1996) "Warning on Russian crime ring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18.
- Wallace, Charles P. (1995) "The Pacific paradox: islands of despair",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6: A1-A30.
- Wa Mutharika, Bingu (1995) *One Africa, One Destiny: towards Democracy, Good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Harare: Sapes.
- Watanabe, Osamu (1996) "Le neo-nationalisme japonais", *Perspectives Asiatiques*, 1: 19-39.
- Watanuki, Joji (1990)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impact on Japanese society",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paper.
- Weiss, Herbert (1995) "Zaire: collapsed society, surviving states, future polity", in I. William Zartman (ed.), *Collapsed St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Weitzman, Martin L. (1970) "Soviet postwar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4): 676-92.
- Welch, Michael (1994) "Jail overcrowding: social sanitation and the warehousing of the urban underclass", in Roberts (ed.).
- (1995) "Race and social class in the examination of punishment", in Lynch and Patterson (eds).
- West, Cornel (1993) *Race Matters*, Boston: Beacon Press.
- Wheatcroft, S.G., Davies, R.W. and Cooper, J.M. (eds) (1986)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reconsidered: some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1926 and 1941",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9, 2.
- White, Gordon (ed.) (1988)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ed.) (1991)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 Wieviorka, Michel (1993) *La démocratie à l'épreuve: nationalisme, populisme, ethnicité*, Paris: La Découverte.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Knopf.
- Winckler, Edwin A. and Greenhalgh, Susan (eds.) (1988)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Armonk, NY: M.E. Sharpe.
- Woherem, Evans (199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fric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airobi: African Centre for Technology Studies Press.
- Wolcott, P. (1993) "Soviet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case of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 and Goodman, S.E. (1993) "Under the stress of reform: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in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6(10): 26.
- Wong, Christine et al. (1995) *Fiscal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Congress (1996) "Documents of the World Congress against the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Stockholm, August 27-31, downloaded from <http://www.childhub.ch/webpub/csechome/21ae.htm>.
- Wright, Martin (ed.) (1989) *Soviet Union: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Harlow, Essex: Longman.
- Yabuki, Susumu (1995) *China's New Political Economy: the Giant Awak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Yang, Mayfair Mei-lui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Yansane, Aguibou Y. (ed.) (1996)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frica: Current Economic, Socio-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Trends and Issu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Yazawa, Shujiro (forthcoming) *Japanese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Aldeen.

- Yazawa, Sumiko (199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Japanese women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 – its trend and review", Tokyo: Tokyo Women's Christian University, research paper.
- et al. (1992) "*Toshi josei to seiji sanku no new wave, kanagawa network undo no chosakara*" [New wav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urban women: research results of Kanagawa network movement], in *Yokohama Shiritsu daigaku keizai kenkyujo "keizai to boeki"*, no. 161 (as cited and summarized by Yazawa 1995).
- Yeltsin, Boris (1990) *Memorias* (trans. from Russian), Madrid: Temas de Hoy.
- Yeltsin, Boris (1994) "Ob ukrepleniyi Rossiyskogo gosudarstva", *Rossiyskaya gazeta*, February 25.
- Yoshihara, Kunio (1988) *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 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oshino, K. (1992)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Youngson, A.J. (1982) *Hong Kong: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u, Fu-lai and Li, Si-Ming (1985) "The welfare cost of Hong Kong's public housing program", *Urban Studies*, 22: 133–40.
- Zartman, I. William (ed.) (1995) *Collapsed St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Zimring, Franklin and Hawkins, Gordon (1994) "The growth of imprisonment in California",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4, special issue.
- Zysman, John and Weber, Stephen (1997) "Economy and security in the new European political architec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Roundt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research paper.
- , Doherty, Eileen and Schwartz, Andrew (1996) "Tales from the 'global economy': cross-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Roundt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orking paper.